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军界首脑

齐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军界首脑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21辑

齐齐哈尔市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内 部 发 行

军 界 首 脑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21辑

出版单位：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承 印 厂：齐齐哈尔铁路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2年5月11日 印数2000册
开本32·字数35万·印张16.5

黑新出图（1992）162号

目　录

齐齐哈尔—屯兵重地……………………………叶永才　宋金林（1）
齐齐哈尔军乐队始末……………………………彭　立　林　雨（9）
兵事逸闻…………………………………………………叶永才（18）
在东北军的一段经历…………………………………蒋凤鸣（21）
万福麟家事琐谈………………………………………刘静茹（25）
江桥战役…………………………………………………叶永才（29）
义勇军血战腰库勒……………………………………张伯谦（35）

盘据齐齐哈尔的日军部队……………………………叶永才（38）
齐齐哈尔一带的日本宪兵队………………………付大中等（43）
回忆日本宪兵队………………………………………张家栋（57）
我所知道的伪第三军管区……………………………由潜如（61）
关于“六·一三”事件…………………………………王国玉（64）
克山“一二·二〇”大逮捕事件……………………马集明（79）
张平洋在泰来…………………………………………叶永才（87）
朱榕死因有结论………………………………………史为文（90）

苏联红军进入齐齐哈尔……………………叶永才　宋金林（92）
我在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工作的前后……………王福林（96）
西满军区述略………………………………叶永才　吴铁男（98）
从齐齐哈尔卫戍区到西满军区……………………吴富善（104）
齐市的地方武装………………………………………顾卓新（107）
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部队……………………………叶永才（109）
解放齐齐哈尔的劲旅—西满二支队…………………叶永才（119）

齐齐哈尔民兵……………………………………………………叶永才(123)
我军的四所军事院校………………………………………叶永才(132)
军工部—人民兵器工业的摇篮…………………………叶永才(139)
我当上了人民战士…………………………………………戴文祥(142)
在西满军区后勤部的日子里……………………………戴文祥(145)
解放齐齐哈尔之役…………………………………………叶永才(153)
军事围剿 铲除匪患………………………………………叶永才(158)
榆树岗智退顽匪……………………………………………张凤海(165)
解放朱家坎…………………………………………………杨树明(168)
讷河争夺战…………………………………………………叶永才(183)
解放平阳镇…………………………………………………叶永才(185)
鳌龙沟遭遇战………………………………………………叶永才(186)
围歼黑六旅、黑七旅………………………………………叶永才(190)
中学生战地服务团…………………………………………陈 彬(193)
我所知道的高凌昭…………………………………………关锡昆(197)

宋小濂………………………………………………………陈志新(199)
毕桂芳………………………………………………………陈志新(224)
朱庆澜………………………………………………………陈志新(238)
许兰洲………………………………………………………陈志新(263)
鲍贵卿………………………………………………………陈志新(280)
孙烈臣………………………………………………………陈志新(300)
吴俊升………………………………………………………陈志新(321)
张 钺……………………………………………张慕骞 张慕良(343)
万福麟………………………………………………………陈志新(354)
梁忠甲………………………………………………………陈志新(381)
韩光第………………………………………………………陈志新(396)
苏炳文………………………………………………………陈志新(411)

韩家麟…………………………………………………………马玉文等(432)
张竞渡…………………………………………………………张慕骞(441)
彭济群自述………………………………………………………(458)

齐齐哈尔——屯兵重地

叶 永 才 宋 金 林

齐齐哈尔，不仅是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也是屯兵的重要基地，民国时期尤其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世昌任东北三省总督后，对东三省的新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和调整，将中央直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会）调往锦州和新民，将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调沈阳北×大营，将第三镇（统制曹锟）调驻长春，将第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派驻永吉，将第一混成协（协统朱庆澜）派驻齐齐哈尔。

第一混成协编成于宣统二年（1910年），是黑龙江的一支新军。

民国元年10月（1912年11月）第一混成协改编为混成旅，许兰洲任旅长。

黑龙江军队与混成旅同时存在的还有防营七路， 计马队29营、步队21营、机关枪队1哨，合计官佐为397人、士兵8976人、夫役1276人，按人数足有一师。

混成旅和防营七路都是由清末旧军队改编而成的。因为当时军制不统一，编制混乱，陆防分途，军队如一盘散沙，难以配合一气，加之中央财政困难，难以支付防营全部经费，决定裁减防营经费 ，当时身为镇安右将军 、督理军务兼巡按使的朱庆澜认

失：唯有一律改防为陆，统一军制，汰弱留强，才能节省军费，使松散的军队化而为整。于是，朱庆澜提出了改编计划，经中央批准，于民国3年7月1日（1914年8月21日）实行新的编制，把混成一旅与防营步兵合并选编为一师，番号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另外，挑选精锐的骑兵编成一旅，全国统一番号为陆军骑兵第四旅。

黑龙江陆军第一师下辖两个旅，1个骑兵团，1个迫击炮营，1个工程连，1个辎重连，计8817人。

黑龙江陆军第一师编成后，师部、步兵二旅旅部、步兵第三团、骑兵团团部、迫击炮营、工兵连、辎重连均驻省城齐齐哈尔，其它旅团分驻各县。

黑龙江陆军第一师的命运，随着师长许兰洲在与毕桂芳的争斗中失败而告结束。

民国3年7月（1914年8月）第一师编成之际，朱庆澜以镇安右将军衔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第一师师长许兰洲对黑龙江的军政要职觊觎已久。他凭着手中掌握的第一师，对朱庆澜横加干涉和威胁，终于迫使朱庆澜于民国5年5月（1916年6月）去职。朱庆澜去职后，袁世凯任命毕桂芳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后名称改为督军兼省长），许兰洲未能如愿，便耿耿于怀。民国6年5月（1917年6月），许兰洲乘北京政府混乱之机，与英顺（黑龙江骑兵第四旅旅长）、巴英额合谋赶走毕桂芳。事先许兰洲曾对英、巴承诺：他任省长兼督军，任英顺为镇守使，任巴英额为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但毕桂芳被赶走后，许兰洲因英、巴不是他的亲信，不想让镇守使和师长这两个要职落入英、巴之手，于是任亲信任国栋为一师师长。英巴二人对此极为愤怒。于是二人联合毕桂芳等反对许兰洲。一方面，串通黑龙江军界联名给北京政府发电，迫使政府不能任命许兰洲，另一方面，调兵遣将，以武力威协许兰洲。由于英、巴的威协和张作霖乘机干涉，

许兰洲未能如愿。由张作霖保荐，中央政府于民国6年10月26日（1917年9月12日）任命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兼省长。许兰洲被任命为将军府参军并调往奉天省。

英、巴迫使许兰洲调走后，又对新任督军鲍贵卿进行威逼，英、巴率所部两旅集结在省城齐齐哈尔，要求鲍贵卿任巴英额为师长，英顺兼镇守使，英顺并要求把部下团长统升为旅长。鲍当时手中仅有刚调来的奉军张明久的5营部队和张奎武6营部队，量以武力解决，不是英、巴的对手，遂求援于张作霖。于是张派吴俊升率二十九师开赴齐齐哈尔。随后鲍、吴对骑兵四旅进行分化瓦解，使八团团长李庆禄、九团团长袁庆恩保持中立，接着以督军署名义召开会议（英顺未赶到会），会议议决将英顺革职查办，勒令巴英额辞职，并很快得到北京政府的免职令。后派李庆禄接任巴英额的旅长职务，刘德权接任英顺骑兵四旅旅长职务。

鲍贵卿的督军地位得到巩固之后，于民国6年11月（1917年12月）对黑龙江的军队进行整编。把全省陆军统编为四个旅。即混成两个旅，骑兵两个旅。李庆禄、张明九为混成第一、第二旅旅长。袁庆恩、张奎武为骑兵第一、第二旅旅长，至此陆军骑兵第四旅被彻底改编。

整编后混成第二旅、骑兵第二旅驻防齐齐哈尔，骑兵第一旅旅部设在富拉尔基。

混成旅每旅辖步兵、骑兵各一团；第二混成旅辖步兵第二团，骑兵第六团（团按统一序号）；第一混成旅辖步兵第一团、骑兵第五团。骑兵两个旅辖骑兵第一至第四团。

第二混成旅旅长张明久，步兵第二团团长江显珍，骑兵第六团团部驻齐齐哈尔。步兵第二团所属三个营分驻齐齐哈尔、海伦、俘虏收容所、畜牧场、拉哈站、宁年站、满洲里、免渡河。骑兵第六团团部驻讷河县城，团属一二营分驻克山、讷河、嫩江三县及塔溪、伊拉哈各站。

骑兵第一旅辖两个骑兵团，每团辖两个骑兵营，共四个营，每营辖4个连，共16个连，每连辖两个排，共32个排。

骑兵第一旅旅长袁庆恩，第一团团长刘宗尧，第二团团长于琛澂。

骑兵第一旅旅部驻富拉尔基。第一团团部带第一营在泰来一带游击，第二营分驻扎兰屯、富拉尔基、肇东、安达。第二团团部驻安达，所属两营分驻安达、宋站、萨尔图、喇嘛甸子、昂昂溪、小蒿子、烟筒屯、富拉尔基站。

骑兵第二旅辖两个团，每团辖3个营，共6个营，每营辖4个连，共24个连，每连辖两个排，共48个排。

骑兵第二旅旅长张奎武，第二团团长张奎武（兼），第四团团长李相庭。

骑兵第二旅旅部、第三团团部驻齐齐哈尔。第三团所属的3个营分驻齐齐哈尔、拜泉县、林甸县、布西、库勒、李家地房子等处。第四团团部驻海拉尔，所属3个营分驻景星镇、索伦山、海拉尔 、李三店、盛家地营子、新站、哈拉苏 、廉家大岗子等处。

民国10年5月（1921年6月），黑龙江省又增编第三、第四混成旅，以巴英额、张海鹏为旅长。分别驻防黑河、讷河。其它各旅驻地也做了调整 。第一混成旅驻海伦 ，第二混成旅驻海拉尔，骑兵第一旅驻安达，骑兵第二旅驻泰来，二十九师驻齐齐哈尔。

民国7年5月（1918年6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日本东京签字 ，两国密议出兵西伯利亚，吉 、黑两省借机增兵，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早于民国7年3月（4月）就编成了混成第十九旅。此旅编入中央陆军序列，归黑龙江督军调遣，鲍贵卿兼任旅长（后由张焕相任旅长），康宗仁为一团团长，高占鳌为二团团长。

第十九混成旅编制：旅辖两个团，每团各辖1个工辎混成营、1个骑兵营、1个炮兵营、1个机关枪连。全旅编制官佐46员，士兵4,551名，工匠136名，看护士兵44名，驾车兵32名，伙夫、马夫513名，合计5,522人，年需经费87.946万元。

第十九混成旅旅部设在齐齐哈尔，部队除一团二营五连驻防扎兰诺尔，二团二营分驻满洲里、博克图、兴安岭各站，骑兵营有两连分驻齐齐哈尔附近外，其余均驻齐齐哈尔城内。

民国8年8月（1919年9月），黑龙江督军鲍贵卿调任吉林督军，第十九混成旅也调驻吉林。

民国6年（1917年），张作霖为了扩大势力，计划新编第二十九师，同年5月底获中央批准，6月底改编完毕。第二十九师由奉天巡防营后路和骑兵第二旅（旅长吴俊升）合编而成，吴俊升任师长。师辖两个旅，原骑兵第二旅第四团团长石得山为五十八旅旅长，原奉天后路巡防队帮统陈玉田为五十七旅旅长。

每旅辖两个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每连辖3个排，每排辖3个棚：1个棚编制14人，1个排编制42人，1个连编制157人，1个营编制492人，1个团编制1518人，1个旅编制3,050人，全师编制6,392人。后来，随着奉军军制的变化，二十九师的编制也不断变动，到民国10年9月（1921年11月），第二十九师编制有较大增加，编制员额已达7028人。

第二十九师编成后，师部设在洮南，师长吴俊升兼洮辽镇守使（归奉天省管辖）。民国6年9月（1917年10月），张作霖趁黑龙江军界混乱之机，以剿灭蒙匪为名，命吴俊升率二十九师一部开赴齐齐哈尔。民国8年12月（1920年1月），第二十九师以加强边防为由全部移驻黑龙江省，师部设于齐齐哈尔，第五十七旅驻防满洲里，第五十八旅驻防绥芬河。此后，第二十九师作为军阀吴俊升的嫡系部队，一直驻防齐齐哈尔。第二十九师参加过两次直奉战争，参与了镇压郭松龄反张的战役。吴俊升把二十九

师视为他的“命根子”，曾说过，宁可不当督军、省长，也不能舍去二十九师师长职务。民国10年3月（1921年4月），吴俊升凭手中掌握的二十九师当上了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民国14年5月（1925年6月），张作霖整顿奉军编制，将奉军改名为东北军，统编二十个师，实行统一番号。第二十九师改编为东北军第十八师，辖第十五、第二十二旅，师长吴俊升，十五旅旅长梁忠甲，二十二旅旅长石得山。民国17年（1928年）吴俊升被炸死，吴泰来（吴俊升之侄）继任十八师师长。

民国17年6月（1928年8月），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对东三省军队进行彻底整编：取消师的编制，以旅为单位，仍称东北军。第十八师的十五旅番号未动，仍为十五旅。旅长梁忠甲，辖第三十八、四、十三、五十一团，夏鸿模、王永盛、高云鹏分别任团长。第18师其余部队改编为第十九旅，旅长孙德全，辖第十二、四十五、六十一团，关英翰、刘宗凯、刘多荃分别任团长。

民国17年5月（1928年7月），奉军从关内退回东北，黑龙江省部队返回驻地。当年10月间，新任奉军首脑张学良为缩减军费，决定对奉军进行整编。于11月1日在沈阳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取消军、师名称，将所有军队改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军称“东北陆军”，省防军称“某省陆军”。“国防军”以养成劲旅保卫国境为任务，省防军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任务。国防军的步骑兵均以旅为单位，炮兵以团为单位，工兵以营为单位，辎重兵平时设军官和军士教导队。战时分配各部队担任后勤工作。省防军步、骑兵以旅或团为单位，归各镇守使指挥。其他宪兵队、通信队、铁甲车队、战车队、探照灯队、汽车队等，均仍以队为单位。

整编后，黑龙江省的国防军有步兵第十五旅，旅长为梁忠甲，驻防在齐齐哈尔。此外还有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管辖

本路各营的训练。

黑龙江省防军由原来的黑龙江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编为黑龙江陆军步兵三个旅，骑兵四个旅。黑龙江陆军第一旅旅长张明久，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兼黑河警备司令）。黑龙江陆军骑兵第一旅，旅长王南屏；第二旅，旅长王克镇；第三旅，旅长刘斌；第四旅，旅长徐景德。

1932年江桥抗战后，黑龙江省防军有的组织义勇军继续抗日，有的被日伪收编。至1932年12月，在日寇的疯狂追剿下，大部解体。各部队的大体情况是：

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三旅，于1931年10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黑龙江省北部各县。该旅李青山团随马占山参加了江桥战役。1932年12月4日，马占山、苏炳文等4千余人退入苏境。后转道回国，部队到新疆被盛世才改编。留在黑龙江省的部队有6千余人，由邓文率领退入热河。

黑龙江省防军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于1931年10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克山、拜泉、明水等县。1932年12月马占山退入苏联后，吴率余部进入热河。1933年5月，吴率部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吴任骑兵第十二师师长。同盟军战败后，被宋哲元改编。

黑龙江省防军骑兵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兼哈满护路军副司令），于1931年10月率部参加了江桥抗战。1931年12月×日，程率部投敌，任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司令。

兴安屯垦军，统带苑崇谷，1931年10月开始抗日，江桥抗战失败后，苑率部退入克山、拜泉一带活动。1932年4月，苑将部队交给马占山，自己只身逃入关内。

黑龙江军政两署卫队团，团长徐宝珍，于1931年10月参加抗日。江桥战役之后，率部退至讷河、拉哈一带活动。1931年12月，徐宝珍随程志远投降。1932年12月徐在与抗日义勇军徐子鹤

部作战中被击毙。

驻黑龙江东北军炮兵第九团，团长朴炳珊，于1931年11月开始抗日。该部在江桥战役中发挥了作用。战役结束后，马占山任命朴为黑龙江省警备司令，率部驻防于克山、拜泉一带。1932年5月，朴由民众推举任黑龙江省抗日军总司令，10月失败后化装逃跑入关，其余部被马占山改编。

东北军驻黑龙江辎重第九营，营长孟宪德，1931年10月参加了江桥抗战，后转战于黑龙江省北部各县。1932年12月，随马占山退入苏联。

东北军驻黑龙江工兵第七营，营长刘润川，于1931年10月参加了江桥抗战。

黑龙江省保安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克镇，于1931年11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绥化地区。1932年1月，王率部随程志远投降。

黑龙江省保安第二大队，大队长陈海胜，于1931年11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大赉地区。1932年12月马占山退入苏联后，陈率部随邓文退入热河。

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兼呼伦警备司令），于1932年9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抗日失败后，于1932年12月4日率部与马占山退入苏联，后转道回国。其余部由张玉挺率领退入热河，于1933年5月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旅长张殿九，于1932年9月开始抗日，主要活动在扎兰屯、富拉尔基一带。1932年12月，张随马占山退入苏联，其余部随张玉挺退入热河，于1933年5月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齐齐哈尔军乐队始末

彭立　林雨

卜奎城的老居民，还都记得齐齐哈尔有个军乐队，它虽然经过三个朝代几易其名，但给齐市人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军乐队老队员彭瑞祥（彭立之父）和孙长喜（邻居）等几位老人，常常谈起乐队的历史。

民国元年，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决定从俄国购进一批乐器，从防军第二路会吹步号的士兵中挑选年纪、个头儿、长相都说得出的加以训练，将成绩好的编成军乐队。那时军乐队很不正规，只是按照乐器的多少来确定员额。队员大都是文盲，有个小学文化就算是“圣人”了。民国3年7月（1914年8月），黑龙江军队改省防军为陆军后，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决定，将原来的军乐队改编为陆军军乐队，隶属将军行署。军乐队计划编51人，每月俸饷生计591元，其它经费每月共计208元。到这时算是步入正轨了。

从建队起，历任督军对军乐队都扶植过，特别是吴俊升把它视为“掌上明珠”。他每次出巡都是骑着高头大马，骑兵卫队紧随其后，都是清一色的黑马，蹄冠都是白的。这种时候往往要军乐队开道，以振军威。

吴俊升在黑龙江省当督军时，军乐队一个时期驻在公园外边关帝庙里。那时的公园比现在的小得多，关帝庙还没圈在公园里边。庙内只住几个出家人，空房很多。30多队员每天在这里练

号，一来清静，二来离城区远对市民不干扰 。说起练号 ，真是艰苦极了，连三九天在练功前为了气血充足每人都要喝3杯凉水。在零下30°的天气里，喝这么多凉水，真够劲！关帝庙内住的一个老和尚一百多岁了，法号薄净，据说年青时是清宫内的一名太监 ，不知何故触犯了老佛爷西太后 ，便把他发配到塞外当了和尚。这当然是个稀奇人物，有人说他未卜先知，能看出人的吉凶祸福，越传越神。每逢庙里关老爷大祭，达官贵人都携儿带女请这位老僧看手相。此人专会说那些人爱听的话，所以讨得很多赏钱，出家人不爱财，赏钱越多越好。

跟爱马一样，吴俊升喜欢军乐队是出了名的，所以很快把它调入城内，这一来，人走庙空，荒郊野外孤零零一座庙，几个出家人怎能撑持得了，没过多久，薄净的多年积蓄就成了匪徒们的囊中之物。不久老僧也失踪了，有人说是“升天”了，这大概是实。

军乐队到了城里，就更是吴俊升的私人乐队了。光他家的活路就数不完，大太太拜寿、娶姨太太、认干儿子、公子小姐过生日……，都要军乐队侍候。拿他本人五十大寿来说吧，寿堂内两厢挂满了贺联贺幛，中间寿桃之类堆积如山，一旁是全副武装手持黄灿灿乐器的军乐队员。他们挺直地站着，吹着一曲曲的祝寿乐曲，什么事情都怕多 ，把所有会吹的曲子都吹完了 ，没新的了，不知哪位队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竟用窑姐们常唱的小曲起了个头儿，所有队员不约而同地合奏起来。一曲过后，大家才醒过味来，这要是让吴大帅知道还不得都枪毙呀！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旧社会兴“叫条子”，让从永安里临时拉来的妓女做招待员，按钟点给钱。她们并不端饭，而是点烟倒茶，为高层次的官僚们斟酒陪酒。老寿星这时根本顾不上这个，正在忙活。他非要“条子”脱掉绣花鞋穿上他的大马靴不可。这次祝寿一直闹腾到深夜，可苦了军乐队员了，从早晨5点钟一直顶到晚上12点，中

间不换班，每个队员的眼睛都熬红了，这一天下来好几天都解不过乏来，很多人病倒了。有人粗略地统计过，这次祝寿光现大洋就花掉4万多块。当时一个学买卖的，一个月才挣1块大洋，这次祝寿居然花掉了4万人一个月的劳金。至于省城内外官宦士绅拜寿送礼要花多少钱就可想而知了。

吴俊升是靠大军阀张作霖起家的，他们是磕头弟兄。张作霖每次祝寿，办红白喜事，吴俊升都携带大批礼品前往沈阳，每次都让卫队保镖、军乐队陪同。有一次去沈阳，他竟把他骑的马和乐队全体人员安排在同一节车厢里。当火车开到安达站听说附近有一块瓜地，这里产的香瓜特别甜，可火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位大帅非得要吃瓜，司机只好将火车倒开，要了几筐瓜，军乐队也分了1筐。在安达站又遇见一件事，这里发生一件抢劫杀人案，大帅要亲自审讯，就地将杀人犯处决了。

火车过了哈尔滨，吴俊升就不那么神气了，他清醒地知道，到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在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上，自己说了不算了。这一路大帅也老实了，顺顺当当地到了沈阳。

在张作霖的公馆里正在打牌，全东北各省的头头都聚在这里，跟张作霖同桌的都是大将军衔，院里一个少将衔的旅长想看看打牌的情形，也只能偷看几眼便马上溜掉。有意思的是，吴俊升指着牌说了句什么，竟惹得张作霖瞪了他半天，吓得他慌忙躲开。这牌整整打了一天一夜，而全体军乐队员在院子里不吃不喝也恭候了一天一夜，不敢离开原地一步，万一散场大帅们出来，乐队侍候不上去，那还了得？

大约民国8年，苏殿龙从白城子带一部分队员到齐齐哈尔。到民国10年，这个军乐队的规模已大大可观了，原有的人员加上白城子来的，还有从天津来的当年西太后御乐队队员，一共有50多人。这个军乐队很受吴俊升赏识，保证了每月的薪饷，乐器也增加了许多。为了使军乐队得以发展，在招收新队员的同时，

又培养了旧队员，成了军乐队的骨干。当时队员的生活很苦，上顿下顿大楂子就咸菜，每月只有2元小洋补贴，星期天几个人合伙去小馆吃一顿解解馋。

军乐队队长（兼总指挥）是苏殿龙。他个儿不高，身体很结实，有军人气度。他对学员（那时叫徒弟）的基本功训练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苟。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练习拔音，吹练习曲，哪一个学员吹得走调，不是味，苏队长除了狠狠打你一顿耳光外，还把谱架拧矮了教你跪着吹一上午。严师出高徒，彭瑞祥原是乐队的学徒，吹小号，经苏殿龙的亲自培养成了军乐队的指挥。苏殿龙这个人不“踩”人，对品德好、老实厚道、上进心强的，他真培养提拔，彭瑞祥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副队长、副指挥，授中尉军衔。“九·一八”事变后，彭瑞祥进关，在河北省参加了八路军，当了号兵，精兵简政退役后又回到齐齐哈尔，拜见时苏殿龙仍一见如故，并不因彭参加过抗日态度就有了改变。苏殿龙在伪满初期是上尉衔，以后又提升为少校，成为伪满军乐界中军阶最高的指挥。他平时挎的腰刀是红色的带子（尉官是蓝的，将官是黄的），日本人见了都立正敬礼，但对人不端官架子，特别是每年春节都身着便服到彭瑞祥的小土房看看这位当年的老下级。

吴俊升治下的齐齐哈尔文化生活贫乏得很，只在永安里有一个茶座式的戏园子德魁茶园，一个无声电影院。这种地方，地痞流氓，鸡头鱼刺，什么人都有。大兵星期天看戏是免费的，为了你捧这个角儿，他喜欢那个角儿，双方大打出手，茶碗横飞的事常常发生。有一次军乐队队员都去看戏，那天都是军人，由于唱戏的不卖力气，大兵们往楼下扔桌子，砸了园子。事后吴俊升惩办肇事者，把一个营长给枪毙了。

旧中国每逢双十节，师范学校、中学经常表演一些具有新思想的舞蹈、文明戏，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尤其是跳舞的都是女

学生，在当时来说更是稀奇。在这些活动中，军乐队常被邀去，在演出中穿插一些吹奏节目，这使文化不高的军乐队员呼吸点新鲜空气。

后来被称为“官吹鼓手”的军乐队也用于民事，开展了对外“营业”。哪家大商号、大公司、大公馆开张营业或办事情，为了造声势、显气派，都邀请军乐队去演奏，队员也得意这种差事，不但有赏金，还有丰盛的宴席。比如当时的大红幌买卖洪昌盛开市，庆祝了3天，就请军乐队吹了3天，不仅每日三餐有酒席，还赏江洋600元。

1927年，博济工厂开了一个半专业性的军乐训练班。博济工厂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收容一些流落街头的儿童或无家可归的残疾人。从年岁小的学徒中，把文化学习成绩好的、相貌端正的挑选出来，每天进行3个小时的军乐吹奏训练。这些孩子生活艰苦，但学习刻苦，大都成才了。他们被吸收到军乐队，到了伪满时期都成了军乐队的骨干，如孙长喜、孙显廷哥俩，都具备了较高的演奏水平。

“九·一八”前夕，军乐队驻地门外，来了一个白俄，随身携带一把小号，大概是院内军乐队演奏的乐曲声触发了他的情感，也情不自禁地独自吹了起来。这乐声突如其来，闻所未闻，优美无比，一下打断了军乐队的练习，全体队员，包括指挥在内，全被吸引过去，连那个在北京见过大世面的御乐队员，都傻了眼，过路看热闹的更是围了一大群。只见这个俄国人，吹一阵子，哭一阵子，吹得如泣如诉，哭得悲不自胜。那悲哀的情调揉进号音内，那号声更显得凄凉。为了弄清原因，队员找来一个俄国侨民，谁知这人中国话二五眼，正宗俄话也不通，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后来那个白俄拿出一个军衔肩章，又通过那个侨民连说带比划，人们这才明白。他原来是沙皇军乐队的指挥，他的演技代表了西方军乐的最高水平，怪不得吹得那么好，边塞黑龙江军

乐队的水平跟人家没法比。这个老毛子，在沙皇被推翻后，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于是通过西伯利亚流亡到中国东北。那时哈尔滨俄国人多，他一路上靠吹号乞讨，一站一站地奔向哈尔滨。他的眼泪是在表露没落者的悲伤，号声是追念已逝天堂的哀鸣。由于同行的原因，队员们凑了点钱，请他吃了顿猪肉炖粉条大馒头。他千恩万谢地走了。从来没有观摩机会的队员们，这次也算是一次学习，看到了自己的短处，激起了大家努力学习的劲头。

"九·一八"事变前军乐队归省政府管，人们称它为省府大乐队。江桥抗战失败后，省府军乐队全部随马占山退到海伦。马占山投降日本回齐齐哈尔后，把失散的队员又找回来。他逃离齐齐哈尔后，就把这些人留下来，由原来的队长苏殿龙组建了新乐队，队员穿伪军陆军制服，隶属于伪满第三军管区。队址在砖城东门里，与伪第三宪兵团相邻，就是现在第十二中学门前那个位置。

军乐队员是职业兵，军阶都是中士、上士，每月薪金三四十元，每周一到周五在营里住，星期六晚上才准回家去住，这个时候军乐队有50多人。除了大型集会由苏殿龙亲自指挥外，一般都是白准尉指挥，苏殿龙腰挎指挥刀，骑着高头大马在队后"压阵"。伪满时无论日军、伪军，营长以上都有资格骑马。

伪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副职都由日本人担任，惟独军乐队没有日本人副队长，但却有个日本指导官，类似顾问，名字叫"高桥"什么。这个人受过高等音乐教育，懂音乐，有知识素养。大家觉得他不同于别的部门的日本人，不以占领者自居，从不干涉军乐队的业务。军乐队每星期六傍晚或星期日都在公园的格言亭或在亭子南边现在已修成水池子的那个地方表演，象这些活动，吹什么曲子全由苏殿龙决定，也不用高桥审查。起初都以为他是特务，但一直到日本投降也没发现他有暗中监视中国人员的事。他对军乐队员很友好。一次军乐队员和相邻的伪宪兵队

发生了冲突，队员军阶都比宪兵高，但宪兵见官大三级，自然是军乐队吃亏，于是高桥亲自出面找宪兵队的头头，替中国队员说话。

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齐齐哈尔军乐队和沈阳、长春、哈尔滨 、吉林等大城市的比 ，无论从队员的音乐修养、演奏技巧、乐器的配备、指挥的水平，都公认是第一流的。之所以它有这样高的水平，是因为它的全部人马刀枪都是旧中国省府军乐队那个班底，不下40人。伪满曾在长春举行过一次全东北的军乐队大赛 。齐齐哈尔队获第一名 。齐齐哈尔军乐队赴长春经哈尔滨时，被哈尔滨军乐队奚落一顿："这套装束，登不了大雅之堂。"意思是齐队穿得不够华丽，气派，显得土气。据说哈尔滨队员穿的衣服跟长春伪御乐队服装相似 ，象将军服一样 。但一比赛却看出了齐齐哈尔队员的真功夫，演奏技巧及指挥水平确实高超，名列前茅当之无愧。从此齐齐哈尔军乐队名声大振，身价十倍，每个队员的军阶都升了。

1943年 ，齐齐哈尔军乐队举行过所谓" 建队十周年庆祝大会"，这里就是指伪满的那个"建队"。参加庆祝会的除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及大小军官外，还有伪省公署、市公署的文职官员。已脱离军乐界给日本工头干苦力活的彭瑞祥也被邀请参加，可说是荣幸之至了。不过，象一般办喜事一样得随份子。当时彭瑞祥月工资才60元伪币，而随的份子竟是50元，闹了半天酒席不白吃，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庆祝会开得挺象样子，苏殿龙宣读伪皇帝的《时局诏书》，来宾讲话，最后是文艺节目，一个大官还清唱了京剧《苏三起解》选段，由孙显廷拉胡琴，有的队员还表演了小戏法之类的节目。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进入齐市，伪满洲国垮台，伪军瓦解，但作为军队编制的军乐队却还存在，不过不穿军服罢了。这时日本关东军及其它部队的武装被全部解

除，军乐队那些上好的进口乐器也象武器一样被苏军用汽车运往兵营。不巧不成书，恰巧彭瑞祥上街，他看到那些乐器被人家当胜利品缴走，觉得很不是滋味，那天正是9月1日。回到家，在那天的日历上，他画了一个圆圈。

9月3日，在龙沙公园举行了"战胜日本庆祝大会"。各行各业都兴高彩烈地去参加，当然人数最多的是中小学校的学生。这是齐市光复后的第一次盛会，由伪省长申振先主持，他在麦克风前首先宣读《总理遗嘱》。主席台前树5棵旗杆，英美法三国国旗首先升起，中苏国旗随着中苏军乐队乐曲声徐徐升起。苏联军乐队用的乐器正是9月1日拉走的那些。苏殿龙今天穿灰色中山服，拿着小白指挥棒，指挥部分军乐队员吹奏国民党党歌，用它代替国歌。中国乐队使用的乐器，正是苏军扔的那堆破烂，吹出的声音不是味，声音有点象嘶哑的喉咙发出的。会后游行时，军乐队做前导队，由于队员长时间没吹中国曲，有几个地方竟然吹错了。

1945年齐市第二次大型集会是在10月10日那天，晚上进行了万人提灯游行，自然是军乐队做前导了。大家欢天喜地地提着自制的各色灯笼，踏着军乐进行曲的点子向城内进发。沿途，有几个苏军士兵自动加入游行队伍的行列，夺过小学生手中的灯笼高高举起，高喊着："上高，哈拉绍！"

1946年4月25日，全市人民在龙沙公园召开了"齐市人民庆祝解放大会"。大会开始前仍由齐齐哈尔军乐队奏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曲子。这是军乐队从建队以来第一次演奏共产党八路军的曲子，还是苏殿龙指挥。

1946年5月3日，齐市万余群众集会，公审大汉奸袁大成和土匪头子张伯藩、卢兴周。在罪犯戴着高帽在大街上示众时，参加大会的军乐队在苏殿龙的带领下走在前面，吹奏着乐曲，表情很严肃。

1946年10月10日，在龙沙公园举行的全市小学生运动会上，军乐队再次公开露面。主席台上坐着个外国老太太，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是从蒋管区到齐齐哈尔采访的。她在会上讲了话，由三人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朱光做翻译。这次运动会，实际上是个团体操、秧歌的表演会，没有田径项目。军乐队员穿着整齐，是人们头一次看到的：绿色制帽，海蓝色呢子半大衣，红呢裤子，一色黑马靴。这是解放前在长春参加大赛时的那套装束。这次是齐齐哈尔军乐队最后一次亮相。

1947年，军乐队的成员都有了出路，苏殿龙在共同商场楼上租了个柜台，做买卖旧号、修理乐器的生意。孙长喜初在家中纳布鞋底儿，后来在南大街路东开了个东方红乐器修理部，直到文化大革命。孙显廷去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演奏员，八十年代初经常来齐市探亲，有时早晨去公园，还唱两口京剧老生。

1947年以后，齐齐哈尔出现了许多乐队，但都是工厂的，文工团的，野战军的。

兵 事 逸 闻

叶 永 才

抢劫事件

民国3年5月22日（1914年6月15日）凌晨1时许，驻省城齐齐哈尔的步兵3营30名士兵哗变，冲出营房沿街行抢，后逃到城外。

凌晨1时15分，城东北连响两枪，没过5分钟，丁家胡同的枪声成串。在卞家胡同东口11号，岗警高履宽发现20余名身穿军服者奔来。高问其口令，对方没有回答，并连开两枪。其中一枪击中高的小腹，一枪击中左手。当叛兵由松家胡同奔至丁家胡同3号住户吴雨亭院时，将院内堆放的柴草点燃。然后在悦来胡同向西南开枪。当奔至东二道街27号兴隆泉磨房时，闯入室内，抢走江帖9293吊，小洋180.35元，羌帖17张3毛，金耳环一付，铜子600吊；又至殷家胡同1号，抢金银锁1把、江帖500吊，而后窜至二署界内。

进入二署界内后，叛兵用枪乱击住户门板。并先后在119号义会成鞍韂铺抢江帖700吊，114号银铺抢江帖100吊、首饰20余两。

据居民孟俊卿报称，23日早1点多钟，有20余名穿军装带肩牌的军人，手持快枪，腰背子弹，闯入屋内索要钱财。他们在屋

内连放数枪，然后翻箱倒柜，当即抢去银元、官帖、手镯、衣物等，并将孟俊卿的母亲用枪托打倒在地。

这次叛兵所抢物品和现金折江钱16,938吊，岗警高履宽被枪击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警察厅认真进行了调查，所有损失由巡按使公署赔偿。

五福事件

民国11年(1922年)冬，驻海拉尔混成第二旅步兵团士兵因不堪军官的克扣，有两个连的士兵携械离队，声称宁做流寇，永不当兵。团长靖国伦见全团士兵情绪不稳，未敢冒然采取直接行动。

黑龙江督军吴俊升闻讯后，忙亲赴海拉尔，到后集合步兵团好言相劝，发放欠饷，并声言一定法办克扣兵饷的军官。

叛兵被吴俊升言行所感动，都返海归队。吴又亲自温存宽慰说："你等驻防边境，劳苦功高，本应提前换防。你们准备行装，今夜随我登车回省城休整。"吴的这番举动，士兵们很是感动，都欣然从命。

次日拂晓，当火车行至富拉尔基与昂昂溪之间的五福时，吴俊升下令停车，叫两个连的徒手士兵下车列队，等候训话。当士兵们列队齐整后，车上突然枪声大作，霎时间车下士兵纷纷倒地，惨叫声震动原野。

这次事件的幸存者不过三四人。消息传到省城后，闻者无不惊恐战栗。

西大桥事件

民国12年（1923年）夏，黑龙江督军轻骑简从，亲自到拜泉

收编了"粳米客"、"闯王贤"等匪伙，答应回省城齐齐哈尔后换发新枪，编入正规军，各首领都要加官晋爵。

吴俊升将队伍带回齐齐哈尔后，将其编入1团，徐子鹤为团长。匪首有4人被委任为营长，16人被委任为连长，32人被委任为排长。

数日内，吴俊升谎称有病，概不会客，与董参议密谋对众匪的处置计划。

一日，吴俊升传令，命令徐子鹤团把52名军官骗到军署，并全部逮捕。不多时，众人被押到西大桥，用机枪全部击毙。

与此同时，吴俊升命令侄子吴泰来团长带精兵1,000人，包围了收编后驻南大营的士兵。吴泰来将众人集合在操场后，突然内中有1人掏出暗藏的手枪连开数枪。随即，吴泰来也下令开火，顷刻间弹如雨注，众人纷纷倒地。有的逃入屋内钻进炕洞、烟筒，也都被搜出来击毙。

在东北军的一段经历

蒋凤鸣

我于1913年5月出生在齐齐哈尔市郊前平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8岁那年，父亲为了使我将来能有点出息，咬着牙送我去读书。全家人省吃俭用，勒紧了肚子供我读小学。即将毕业时，家里实在无能为力了，我便辍学回家务农。

1930年春，家中的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为了能挣点钱养家糊口，父亲让我去昂昂溪找一个在铁路上做事的远房亲属，求人家帮我找个事做。结果我在昂昂溪呆了一个多月也未找到活干。一天，我到街里闲逛，走在一家官店门口，看见那里插着一面蓝旗，有不少人都围在那里。我上前一问，原来是在募兵。当时我就动心了，既然找不到事做，回家也得挨饿，何必不去当兵混碗饭吃呢？我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就急忙赶回亲戚家，向他说了我的打算。经过一夜的思考和商量，我决定去当兵，并托那个亲戚给我家捎个信。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跑到那里报了名，随即把我们那批20多人用车送往泰来县去受训。

到泰来县后，把我编入黑龙江省国防军第15旅38团步兵连并开始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步兵操典。除了训练以外就是干杂活、种地、修工事等等。那时的部队的军纪很严，稍有违反，轻则拳打脚踢，重则得挨几十军棍（当兵的叫它黑红棒）。平日一律不准外出，请假时发给一个小木牌，并规定时间，没有小木牌就别想

迈出营门一步。如果超过了时间，回来就得受罚。每天的活动内容也很多，早晨起床后就出操跑步，回来洗脸吃饭，然后就开始操练或劳动，弄得你一天到晚不得消停，什么也顾不得想了。我一入伍时被定为二等兵，每月发给大洋6元2角，一等兵是7元2角。每人发给一套内衣内裤、一套单军衣、一条褥单和一床灰布面的棉被，冬天发给一件质量很次的小皮袄，平时吃的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逢年过节稍微改善一下。在泰来县驻防时，我父亲及家里人曾来看过我两次。

1931年6月，原归张学良指挥的石友三部6万余人，受日本军方煽动，从邢台北犯，企图夺取平津地盘，把东北军撵出山海关。为此，张学良除调派1930年9月进关的两个军（于学忠、王树常）外，又将驻辽宁和黑龙江的步兵、炮兵共七个旅调入关内参加讨石战役。我所在的15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而进关的。我记得我们是在定州下的火车，一下车便投入了战斗。此后驻防在吴清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相继侵占了东三省。但它野心不死，于1933年初，又进攻长城各口，西侵热河。同年3月，热河沦陷。张学良在下野之际，将所部改编为四个军，即51军、53军、57军、67军。我所在部队被改编为53军116师346旅691团，我任该团机关枪连司务长。53军的军长是万福麟，我们691团团长是吕正操，我的连长是李英武（后升任营长）。此间，为了阻止日寇向热河进犯，我部曾进至长城喜峰口一带与日军作战，但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仅与日寇接触几次，在日军步炮兵的猛攻下，我方战斗失利，抵抗不久便向后撤退。此后，一直在吴清县驻防。

1935年10月，我被选送到洛阳军士教导总队参加集训。这个军士教导总队是张学良将军感到东北军初级军官缺乏，向蒋介石提出成立一个东北军的军事教育机关的请求，经蒋批准后成立的，专门训练东北军的军士（班长）和少数排长。目的是在毕业

后用以补充东北军中的初级（排、连长）干部。训练时间以10个月为一期。训练内容有战术、兵器、地形、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演习等。训练中还有四分之一时间的政治教育，即所谓国父遗教，领袖言行和国民党党史等。军士教导总队下辖两个大队，每大队下设4个队。1936年8月毕业前夕，张学良将军到校视察，给总队全体学员训话。张将军身披斗篷，脚穿高筒红马靴，精神抖擞，红光满面。在训话中，他慷慨陈词，号召大家团结一心，集国仇、家仇于一身，赶跑日本侵略军，打回东北去。说到东北军眼下的处境时张将军声泪俱下，在场的许多军官也都流下热泪。张将军这次训话以后，我们就毕业回原部队了。时过不久，张将军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时我们才回悟到张将军给我们训话的深刻含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将军。东北军群龙无首，走上了无娘的征途。蒋介石以改编所谓杂牌军为幌子，取消东北军，将其分化得七零八落，几十万精兵被缩减不足20万人，以万福麟为军长的53军亦是如此，将原来5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1个炮兵旅的编制缩减为2个步兵师。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53军在第一战区宋哲元指挥下，由平津方面沿平汉路阻击日军逐渐南撤。8月4日北京沦陷后，53军驻保定一带，我部曾参加了吴清县战斗，保定战斗、在大部队退过黄河时，我与吕正操为团长的691团失去了联系，随着692团进驻河南辉县。后来听说吕正操已率全团起义，参加了八路军。此后，我随着部队步步退却，直至1938年6月驻防在湖北麻城、黄坡一带。同年秋天我们转移到湖南洞庭湖三角地带，部队进行整编。至此，我借机脱离了部队，在同乡介绍下去江西南昌谋职。

解放后，1954年我从南昌调回齐齐哈尔市第一建筑公司工作，直至1983年退休。回想起这段历史，心情格外地沉重。惨痛

的历史教训使我记忆犹新。我从自己一生中懂得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吴铁男整理）

万福麟家事琐谈

刘静茹

我叫刘静茹，今年七十一岁。民国时的黑龙江省主席兼督军万福麟，是我婆婆万淑贤的亲弟弟，万福麟是我的舅公公。

小时候，我家住在依安县，家里人口很多，穷得象水洗得一样。我十二岁时母亲去世了，父亲为了让我活下来就把我嫁到老伊家做童养媳。这样，我由于婆婆的关系便与万家沾亲了。当时，婆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好歹俐手俐脚的人多，大伙一起忙活还能对付着填饱肚子。

我记得有一年春天，我和婆婆正在依安西门外刨树疙瘩，忽然有个我不认识的人对婆婆喊道："喂，嫂子，快别干活了，刨那玩艺干啥，你弟弟在省城当大官了，叫什么主席、督军什么的，这些我说不好，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婆婆半信半疑，以为是人家拿她开心，她苦笑一声摇摇头说："去你的吧，我们家祖坟没冒青气，是你做梦想当官吧。"那个人听了有点急了，说："我真地不撒谎，唬你我能捞到啥？"婆婆又接着说了："他就是真地当了官与我啥关系，我还得干我的活。"说完向我做了个手势，领着我继续刨树疙瘩。说也巧了，没过几天，我们家可热闹开了，男女老少来来往往，把我公公、婆婆闹得手脚不着闲。我也忙得手脚不沾地，一会儿给这个点烟，一会儿给那个倒水。这些人有的是当地的头头脑脑，有的是亲戚朋友，还有的是左邻右舍。

他们都是来干啥的？全是来贺喜的。有不少人都不空手来，有送米的，送面的，送肉的，送布的，还有送钱的。当地几个管事的和我婆婆特别近乎，他们点头哈腰地对我婆婆说："大姐，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只要您去省城时能在督军大人面前说句话，我们怎么孝敬您都行。"我婆婆是个穷苦人出身，冷不丁地哪受得这一套，她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应承。折腾了几天后，总算消停了。不久，婆婆就收到了他弟弟的信，叫她到齐齐哈尔去享几天福。自从万福麟当了大官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宽绰多了，接长不短地婆婆就到省城去一趟，哪趟回来也不空手。

万福麟有个老母亲，从打他当了督军以后每年都要给祝寿。每逢祝寿，我婆婆都必须去省城，完事后还要住上两三个月才能回家。在祝寿那几天，就别提有多热闹了，天天吹吹打打，鞭炮齐鸣。省城的官也多，天天都有，他们接的礼品可多了。人家老太太过生日可真阔气，每天酒席摆上百桌。再有，在祝寿的七天里，万福麟为了表示他慈善，还要大开粥锅，周济穷人。那阵子要饭的也都摸准规律，每年到时候就都上来了。在祝寿的正日子，万福麟上司的太太们都来，象张作霖的太太，张学良的太太都来过，她们和老太太一桌吃饭。

老万家的丫鬟、老妈子可不少，我只记得侍候万福麟他妈的那个贴身丫鬟叫玉香，这姑娘特别讨老太太的喜欢。老太太去世后，玉香嫁给了孟副官，后来有病死了。

听婆婆说，万福麟的出身也很苦，老家是吉林省。万福麟没有文化，不识字，十几岁时就开始扛活，外号叫"万半拉子"。以后他在外边摆弄枪杆子，总打仗，腰里不是子弹就是枪。婆婆家在拜泉住的时候，有一次万福麟带着队伍路过，他在她姐姐家吃了一顿饭，我婆婆给他炖了一只小鸡。从那以后，直到他当了大官，我婆婆才见到他。万福麟这个人有时候是同情老百姓的，我婆婆有一次从省城回来说，有一天万福麟下班回公馆，在路上

有一个老妇人拦路喊冤叫苦，痛哭流涕。万福麟不仅没有责怪，而且还下马问候，在下马时由于急了点，他还摔了一跤，把腿都摔坏了，万福麟当场给了那老妇人些钱，又叫手下人为她找个存身的地方。那妇女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趴在地上象捣蒜似地磕头。

婆婆每次到弟弟万福麟家，回家时总要带不少东西，较多的是衣服，家里虽然人很多，但每人都能分上一件两件的。记得有一年冬天，婆婆一下子给我带回一件棉袍，一双毡鞋，可把我乐坏了，我长这么大也没穿过呀。其实我婆婆年轻时比我还苦，她十八岁以前冬天没穿过棉裤，天天抱着火盆过日子，直到过门那年，才由婆家给做了一条棉裤。

有一次，婆婆在万家与别人唠家常时，有人教她把我休了，或是另给我找个主，然后给我丈夫在城里找一个姑娘。当时我婆婆没做声，可我二舅母（万福麟的二姨太）不让了，把那个人数落了一顿对我婆婆说："咱可不能干对不起良心的事，那孩子没爹没妈，命多苦哇，你又没个姑娘，可要好好待承她。"那次婆婆回来时，二舅母还给我捎来两床红缎子被面呢，说是叫我结婚时用。说良心话，我婆婆对我可好了，重活不教我干，有什么好事都落不下我，从我到他们家那天起，婆婆从来没捅我一手指头。我也尽心孝敬婆婆，她活了九十七岁，都是我侍候的。

万福麟有四个姨太太，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万国宾，二儿子叫万国权。大的不知哪去了，听说是跑到台湾去了。二的万国权在天津，前几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他，是"十三大"前，开一个什么座谈会，他在政协里八成有什么角色。万国权小时候特别爱骑驴，要得没招儿了，我们家的大伯子就从依安给送去一头驴，万国权就常骑着这头驴在街上转悠。

日本鬼子打来前，万福麟到北京去了。我婆婆去看过他一次。我婆婆抽大烟袋，人家都笑。说这是从东北来的老太太。万福

麟对我婆婆说："我是回不去了，你回去就给那孩子'上头'吧。"他是指我结婚的事。婆婆从北京回来后，真地给我"上头"了，那年我十七岁。万福麟去后，婆婆没了接济，我们就在依安种菜为生，直到解放。

1987年12月18日

（叶永才整理）

江 桥 战 役

叶 永 才

江桥战役爆发于1931年11月，是“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军民抵抗日军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江桥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辽、吉两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沦陷。接着，日军又以齐齐哈尔为目标，向黑龙江进犯。但是，日军面临两个困难：其一是兵力不足，黑龙江没有日本守备队；其二是中东路横贯黑龙江境内，担心苏联出兵干涉。于是日军采取了收买汉奸，“以华治华”的侵略政策。

9月，日军以黑龙江省主席为诱饵，收买了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民国20年8月20（1931年10月1日），张海鹏宣布独立，自封为“保安边防军总司令”，得到日军补给的6000枝步枪，200万发子弹以及粮食、服装等军用物资。

10月13日，张海鹏在日军的指使下，命令少将旅长徐景隆统领新编第一、二支队，独立第九、十一、十二团共3,000余人自洮南出发，向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进犯。15日，徐景隆抵泰来县城，先头部队到达江桥以南地域，并完成了进攻准备。

驻江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珂得知张海鹏投降日军并可能进犯齐齐哈尔的情报后，立即进行了防御准备。9月下旬，将朴

炳珊炮兵团调驻齐齐哈尔，委任朴为齐齐哈尔警备司令；将程志远旅的朱凤阳团从小蒿子站调驻泰来，负责对洮南方向的警戒；将驻拜泉的吴松林骑兵旅调到齐齐哈尔，在城南设防；调徐宝珍卫队团及配属给该团的1个炮兵营、2个工兵连、1个辎重连到江桥以北沿嫩江构筑防御工事。为了加强卫队团的火力，谢珂还将新购进的库存200挺捷克轻机枪全部配发给该团。10月13日，谢珂得知张海鹏军北进的报告后，决心以江桥为中心，沿嫩江一线组织防御，遂将朱凤阳团又调到嫩江以北，以保障江桥的左翼安全。同时，命令卫队团进入战斗状态。

10月15日，日军为配合张海鹏北进，派两架轰炸机自通辽起飞对江桥守军阵地进行轰炸。16日拂晓，张海鹏军突然发起进攻，徐宝珍率部奋起还击。徐部虽人少势单，但将士个个勇猛强悍，使江桥防线固若金汤，张军不能前进一步。翌日晨，徐景隆见战况不佳，便亲自到前线指挥，不料误触地雷，当场被炸死。

当日，日军派3架飞机进行轰炸，使守军受到伤亡。但将士们斗志不减，不断组织反冲击，终将敌军击溃，形成两军隔江对峙的状态。

10月16日午后，为了防止敌军再度进攻，徐宝珍命令工兵将江桥第一、二、五孔拆毁。

10月20日，驻黑河骑兵第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奉命到达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面对日军的威胁和恐吓，马占山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积极进行抵抗准备，并于29日前完成了部署：将朴炳珊炮兵团（1,400人）、徐宝珍卫队团（2000人）、步兵第3旅第1团（团长李青山，约2100人）、刘润川工兵营（440人）、孟宪德辎重营（约500人）配置在江桥至大兴一线，将省防军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配置在昂昂溪，所辖的骑兵第2团（团长刘斌）配置在莫古气、依布气地域，第3团（团长王克镇）配置在汤池至头站沿铁路一线，第

4团（团长萨力布）配置在富拉尔基、景星；将国防军骑兵第8旅（旅长程志远）所辖的第53团（团长周作霖）配置在昂昂溪；将驻在塔子城、仙人洞地域的屯垦军改编为暂编第1旅（旅长苑崇谷兼第1团团长，张玉龙、赵冠五分别任第2、3团团长），命其到景星集结待命。各部队进入防御地域后积极修筑防御工事，同时征调大批民工在齐齐哈尔南大营南侧高地、大民屯以北2里处修筑防御工事。制订了在拜泉、海伦等县募兵的计划。

张海鹏部队被击败后，日军改变了策略，一方面对刚刚到职的马占山进行政治讹诈和军事恫吓，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做直接出兵进犯的准备。

10月26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第2师团所属的第29联队进占四洮路全线，并做好北进的准备；命令由第2师团第16联队、野炮第2联队各抽调一个大队，从工兵第2大队抽调一个工兵中队，编成嫩江支队，迅速占领泰来至江桥一线；命令飞行第8中队配合嫩江支队的行动。

10月27日，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步兵少佐林义秀，伙同日驻齐领事馆书记官早崎真一，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代表的名义，要求马占山务于11月3日前修复江桥。10月29日、11月2日，日军又两次向马占山发出所谓最后通牒。声称：嫩江桥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并派兵保护，如有妨碍，则动用武力。

11月1日晨，日军嫩江支队自吉林出发，2日傍晚到达泰来，当夜派遣一个小队到江桥南侧地域进行了侦察。11月3日，第2师团先遣队，野炮第2联队第1大队到达江桥，并占领了阵地。

11月2日，日军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出通告，限汉奸张海鹏部队与黑龙江省军务于4日正午前，各后撤距江桥10公里以外。

11月3日上午11时，30名日本兵和100余名满铁工人，在飞

机和铁甲车的掩护下强行修桥。守军为了避免与日军直接发生冲突，命令一线部队撤至大兴南第5桥以北地域，但撤退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伤9人。当夜，守军又被日军虏去士兵3人。

11月3日下午，日军第2师团工兵第2大队第2中队到达江桥并立即投入了修桥工程。

11月4日晨5时，日军嫩江支队由泰来到达江桥。9时10分，支队长命令编成内的第16联队第7中队向大兴进发，正午到达第5桥梁，与工兵第7中队中队长花井取得了联络。之后，便向大兴站发起了冲击，遭到徐宝珍卫队团的还击。日军嫩江支队得到进攻大兴站的报告后，支队长于13时30分做了如下部署：第16联队第2大队迅速增援第7中队；工兵第2中队要加速抢修桥梁，以保证炮兵通过；野炮第1大队以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飞行队在空中进行火力增援。

11月4日14时前，日军第2大队在小菌江少佐的指挥下，到达了第5桥梁第7中队的后方，以主力从左侧向守军阵地后方迂回，以第5中队向守军左翼前的后营子北侧高地实施突击，以第6中队及机枪队配合第5中队的进攻。同时，日军飞行队也投入了战斗。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炮火压制的情况下，守军官兵抱定以死相拼的决心，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日军的进攻。晚18时许，日军嫩江支队全部到达大兴一线，在炮兵、航空兵的配合下，对守军阵地发起新的进攻。这时，马占山命吴松林骑兵旅一部到大兴前线增援，从两翼对日军实施反突击，守军步兵乘势发起冲锋，将日军击退。

11月5日晨，日军再次进攻、被守军击退。下午，日军在5架飞机的火力支援下，又组织了大规模的进攻，均被守军击退。当日晚，日军又增兵1,000余人于大兴前线。

根据连日来的战况，马占山于11月5日调整了部署：命令在景星待命的苑崇谷暂编第1旅必须在6日前到达大兴前线；命令

程志远旅第52团（团长朱凤阳）、第59团（团长涂全胜）迅速向昂昂溪集结；命令步兵第1旅旅长张殿九率部向昂昂溪方向集结；命令在齐齐哈尔的部队全部开往前线。6日，又征调民工800人，到前线帮助部队构筑工事。

11月6日，日军投入步兵4,000余人，火炮40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在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的指挥下，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当日，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慰劳将士，使官兵受到很大鼓舞。战至下午1时，守军伤亡过重，于是马占山命令部队向三间房方向撤退，并重新调整了部署：命令步兵2旅4团（吴德林团）、步兵3旅1团（李青山团）沿汤池至三间房铁路一线组织防御；命令骑兵第1旅（吴松林旅）以两个团在佰大街经汤池至乌诺一线设防，保障汤池两翼安全；命令暂编第1旅（苑崇谷旅）在三间房、小新屯、大伯岱一线组织防御；命令骑兵第8旅第52团（朱凤阳团）、第54团（涂全胜团）、在昂昂溪以西设防，负责景星方向警戒；命令骑兵第8旅第53团（周作林团）及其余部队在昂昂溪周围组织防御。

11月6日下午日军占领大兴后，又于7日上午向汤池的依里巴发展进攻，并派出侦察机对三间房、昂昂溪守军阵地实施侦察。

双方激战4日，各有伤亡。日军被击毙167人，伤百余人。守军伤亡达600余人。

11月8日以后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一方面采取政治讹诈的手段要求马占山下野并退出齐齐哈尔；一方面加紧调整部署，增派援兵、为夺取齐齐哈尔作准备。

11月13日，日军将江桥全部修复。于是，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第2师团的所有剩余部队全部投入战斗。

11月17日上午11时，日军第2师团以洮昂铁路为中心发起全面进攻。首先出动飞机对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同时集中野炮

和山炮联队对守军阵地前沿实施炮火准备。而后，步兵以坦克为前导实施突击，炮火不断向纵深延伸，骑兵第2联队从两翼实施迂回冲击。守军据战壕进行英勇抵抗，集中步炮兵主要火器阻击正面突击之敌，骑兵从两翼实施反突击，打退日军骑兵的10余次进攻。但是，守军没有防空武器和反坦克火器，无法抵御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的日军坦克的冲击，前沿阵地很快被突破，只好且战且退。

18日中午，守军已退至昂昂溪以北，日军继续追击。马占山见部队伤亡过重，难以阻挡日军进攻，便于当日18时命令部队向齐齐哈尔撤退。

18日正午，日军占领了昂昂溪，并于下午1时30分调整部署，于当夜向齐齐哈尔发展进攻。

马占山指挥部队在向齐齐哈尔撤退，沿途埋设地雷、破坏铁路，以小股骑兵袭扰日军。加之当时夜间气温已达摄氏零下24°，日军有4千余人被冻伤，进攻速度缓慢。

11月19日凌晨4时，马占山为了保存实力，率所有部队及军政两署人员离开齐齐哈尔，向海伦方向撤退。为了防止日军追击，命令掩护部队将齐齐哈尔至依安的铁路破坏。

11月19日，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大民屯，对齐齐哈尔实施空中和地面侦察。上午11时30分，第二师团命令部队发起全线进攻，下午2时30分占领了南大营，齐齐哈尔至此沦陷。

义勇军血战腰库勒

张伯谦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九·一八”后，抗日义勇军战士，在腰库勒战斗中，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勇敢杀敌的爱国精神。

那是1932年秋，为响应马占山将军共击日寇的号召，苏炳文、张殿九将军于是年10月1日在满洲里通电抗日，并率领军队挺进嫩江西岸。当地的老百姓把这支抗日的军队，习惯地称为“苏张旅”。就在这一年的10月末，苏张旅的抗日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腰库勒村进行了一场殊死激战，苏张旅的英雄们一举歼灭日寇几十人，日军少尉布施也在这一战斗中毙命。

腰库勒村，位于富拉尔基西北20华里左右，在滨洲铁路线虎尔虎拉车站北侧约2华里。该村西南紧靠铁路线有一居高临下，可以鸟瞰全村的无名高地，村西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秀水湾湾的库勒河静静地在那里流过，穿过铁路，穿过村庄，一直泻入嫩江。虽然这是一所仅有百十户的小小村庄，然而它却是苏张旅反攻富拉尔基的重要门户，是扼守碾子山、海拉尔等大西北抗日基地的前沿阵地。因此，这里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驻守这一带的苏张旅约有一个团的兵力。一营驻守前库勒村，二营在腰库勒，三营在后库勒，团部设在腰库勒，团长姓唐。这个团装

备比较强，有迫击炮连、机枪连，军需大部分是由苏联供应的。他们在村子里修筑了比较坚固的工事，加之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所以这个团的士气十分高涨，随时准备给进犯的日本鬼子以迎头痛击。

10月末的一天，刚刚黎明，盘据在富拉尔基的日本侵略军沿着滨洲铁路线疯狂地向我西北侵犯，并抢占了腰库勒西南的无名高地，向驻守在村内的苏张旅开枪开炮，我军被迫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在腰库勒村打响了。我军利用有力的地形，沉着应战。特别是与敌人占领的无名高地相对峙的村子的西南，恰是我军的机枪连和迫击炮连的阵地，他们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击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村里的老百姓也冒着枪林弹雨，往阵地上送水送饭，运弹药，送伤员。日寇从拂晓攻击一直打到午后两点，却没有前进一步，而且死伤极其惨重。一个小小的村庄久攻不下，激怒了侵略军的头子，他亲临前线爬上无名高地督战，并从富拉尔基派来增援部队，又调来五六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我军阵地。日寇想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采取集团冲锋的办法攻下腰库勒村，这时战斗已进入白热化的程度。我军战士负伤牺牲的也很多，西南村口一个机枪连只剩下一个山东籍的张连长和三个弟兄，他们脱掉上衣，轮番用5挺机枪扫射冲到村口的日本鬼子。苏张旅部命令主动向朱家坎、碾子山撤退，这时这位张连长又担负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在混战中有些日寇的小股部队，已攻入村中，并迫不及待的将日本的膏药旗插到村中的制高点上，以示腰库勒村已落在他们手中。于是在一帮鬼子兵的前呼后拥下，少尉布施骑着马趾高气扬地向无名高地缓缓而来。村子西南虽然没有枪声了，而在老关家的前园子一个很隐蔽的掩体里，机枪连张连长和三个弟兄，仍坚守在阵地上，他们紧握手中的机枪，准备见机行事。掩体附近正是布施等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当张连长等发现一群鬼子簇拥着一个骑洋马的鬼子迎头走来时，他们几挺机

枪同时发出仇恨的子弹，把这群鬼子打得人仰马翻，那个为首的布施当即毙命。当进村的鬼子发现这里又响起了枪声，他们从四面包抄，向暗堡猛烈开枪开炮。张连长等人最后英勇牺牲，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恼羞成怒，进村后进行疯狂的报复，逢人就杀，见房就烧。据一位七十多岁的刘殿魁老人回忆说，当时年轻的都跑到河西去了，晚间回村时这里几乎是一片火海，鬼子把所有的房子、庄稼垛都给点着了，杀害了老弱病残无辜百姓30多人。后街老平家院里有两个鬼子在巷战中被打死了，鬼子一见就红了眼，他们端着刺刀搜查，从地窖里赶出来17名老人妇女，用机枪全给打死了，王丁发一家就被鬼子杀害了3口，日本鬼子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腰库勒大屠杀。

伪满时期，日本鬼子征用了这个无名高地，竖起大大小小许多石碑，其中有个最大的墓碑，据腰库勒村老乡傅连生说，这就是鬼子少尉布施的。

当年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英雄们已长眠地下54个春秋了。他们虽然没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们爱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盘据齐齐哈尔的日军部队

叶永才

1931年11月19日，是齐齐哈尔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曾遭到马占山率领的爱国部队沉重打击的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在师团长多门二郎的指挥下侵占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从此，齐齐哈尔人民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经受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

当时的齐齐哈尔，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又是军事上不可忽视的战略要地。在她身旁不仅有沟通松花江水系和黑龙江水系的嫩江，而且有横亘东西的中东铁路，她既是北部边陲的军事指挥中心，又是连接腹地的纽带。正由于这些原因，在齐齐哈尔沦陷的十四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齐齐哈尔一直驻有重兵。

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是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因此，齐齐哈尔被日军占领后不久，关东军总部就急令第二师团开回长春一带保护日伪的大本营。继第二师团，接驻齐齐哈尔的是关东军第十四师团。这期间，虽然省城齐齐哈尔失陷，但广大农村日军还没有占领，众多的爱国将领，如马占山、苏炳文等正在高举抗日的大旗，进行抗日斗争。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依仗精良的装备，对马、苏领导的义勇军进行了疯狂扫荡。至1932年底，血战数月的义勇军由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只好在苏炳文的带领下由满洲

里退入苏联境内。

此后，第十四师团调走，由第一师团接替．它的主要兵力部署是，师团司令部驻齐齐哈尔，师团长河村；第一旅团（旅团长小泉）及所属的6个大队，分驻北安、泰安、黑河一带；第二旅团及所属的6个大队、骑兵联队、野炮联队、工兵大队、辎重队、通信队等都驻齐齐哈尔。1935年，又由第十六师团接替第一师团。该师团共有兵力7,022人。除第十六师团外，齐齐哈尔还驻有骑兵、炮兵、航空兵部队．具体情况是：第十六师团司令部，师团长蒲修中将，步兵第三十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安冈正臣少将；步兵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田路朝一大佐；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及川源士大佐；骑兵第二十联队，联队长阿父津四郎大佐；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烟勇郎大佐；工兵第十六大队，大队长加滕恰三中佐；飞行第十大队，大队长白石付助大佐；辎重兵中队，中队长中西字大尉；第十六师团通信队，队长常奇猛中尉；无线电所，所长石田直美中尉；经理部派出所，所长北野或正；齐齐哈尔支库，库长山下支太郎；缘瓦支部，官长墨野秀敏少佐；停车场司令部，官长丰田长治中尉；独立守备队分遣队，队长三原中义；医院，院长领助治一军正。

1944年以后，日军为加强对中东路和中苏边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防卫力量，齐齐哈尔军营林立，恐怖气氛笼罩全城。至9月，齐哈尔驻扎的日本侵略军有：

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代号13部队，原驻齐齐哈尔东树林，司令官后宫淳大将．第三方面军辖驻扎孙吴的第44军，该军辖两个师团，分驻海拉尔、阿尔山，与驻牡丹江的第五方面军构成对苏防线。

第十四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天野中将，该师团隶属于18部队，驻齐齐哈尔现正阳大街。

第二航空兵司令部，司令官下村中将，驻齐齐哈尔原日本神

社附近，1945年1月改为飞行军第三十旅团。

步兵第五十九联队，代号209部队，驻齐齐哈尔原南大营。

步兵第四十六联队，驻齐齐哈尔原东大营。

工兵第十四联队，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

轻重机枪第十四联队，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

第十四师团通信队，驻齐齐哈尔原东大营四十六联队院内。

关东军停车场齐齐哈尔支场，代号983部队，驻南大营以南，火车站西南约300米处。该场储存大量粮食、被服和其它军用物资，是齐齐哈尔、孙吴、海拉尔、阿尔山等地日军的物资补给基地。

关东军野战兵器厂齐齐哈尔支厂，代号76部队，驻齐齐哈尔原南大营三里岗子，厂长烟草屋大佐。该厂主要负责战区部队的弹药补给。

关东军自动车队齐齐哈尔支厂，代号562部队，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以北。

关东军齐齐哈尔陆军医院，代号54部队，院长井上少将，驻齐齐哈尔原东大营附近。

关东军龙江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长谷直三少将，驻齐齐哈尔原伪高等法院附近。

关东军兵事部齐齐哈尔兵事部，司令官池田大佐，驻齐齐哈尔商埠路原日本宫前小学附近。

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齐齐哈尔支部，司令官安达大佐，驻齐齐哈尔铁路局内。

关东军齐齐哈尔停车场司令部，驻原齐齐哈尔铁道局内。

关东军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原为林义秀少佐，后为田中中佐，驻齐齐哈尔原南大营陆军官舍内。

飞行队，代号1006部队，驻齐齐哈尔原火车站东南2公里

处。

关东军齐齐哈尔经理部派出所，驻齐齐哈尔“忠灵塔”附近。

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驻现一百商店东侧的二层楼内（现齐市公用事业总公司）。

关东军工兵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驻齐齐哈尔南市郊船套子。

关东军齐齐哈尔野战马场，场长滨中甚五郎，驻齐齐哈尔原北大营。

关东军重爆击队，驻大民屯以东2公里处。

工兵联队，代号1991部队，驻齐齐哈尔小民屯。

关东军齐齐哈尔自动车队，代号412部队。

航空队燃料场，驻榆树屯火车站以东。

关东军野战兵器厂齐齐哈尔支厂三间房分厂，驻三间房火车站以西。

独立守备步兵第42大队，队长米泽大佐，驻昂昂溪火车站东北约500米处。

迫击炮第三联队，代号416部队，驻齐齐哈尔火车站以东约1公里处。该部队是化学武器的试验部队。

陆军化学研究所，代号516部队，所长秋山少将。该研究所约250人，其中大部分是技术军官。除所长秋山外，部队中还有一名少将军衔的军官。这个研究所建于1938年（民国27年），主要是研究制造毒瓦斯迫击炮弹。该研究所不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指挥，直属于日军参谋本部。至1944年，除试验消耗外，研究所内还存有20万发毒瓦斯炮弹。研究所的仓库设在516部队以南约600米处。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奉参谋本部的命令逃往南朝鲜，库存的毒瓦斯炮弹由留下的一名少将负责全部销毁。

1944年9月12日，驻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奉命

调离，全部与由哈尔滨移驻齐齐哈尔的部队合编成107师团。1945年4月，107师团又调到白阿县五叉沟。1945年5月，日军第三方面军，即13部队从齐齐哈尔一带调到沈阳，部分驻扎于郑家屯一带。随后，驻扎在孙吴的第四十四军移驻齐齐哈尔。8月9日，四十四军又调往哈尔滨。8月13日，齐齐哈尔又新编成一个师团，师团长佐佐木中将。苏联红军攻占齐齐哈尔后，该师团及其他侵占齐齐哈尔的日部队向苏联红军投降，受降仪式在原13部队院内举行。

齐齐哈尔一带的日本宪兵队

付大中　石　晶　石　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随之进入“北满”，开始和苏联对峙，为此，日本陆军重新分析和研究了未来对苏作战问题。不久，参谋本部提出了一个设想，即把漫长的中苏国境分成东、北、西三个方面，拟定作战部署。日本陆军认为：中苏东部和北部国境苏联一边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大部是未能充分开发的地区，人烟稀少，战时难以构成独立作战的势态，苏联在战时只能将其做为辅助战场。而中苏西部国境，由于和苏联欧洲部分接近，运兵方便，这一地区肯定是苏联未来对日作战的主战场。根据这种认识，日本陆军采取相反的对策，提出将中苏国境的东部，作为日本方面的主攻战场，重点配备兵力；将北部和西部做为防守战场，尤其是在西部中苏、中蒙边境，更是如此。整个日伪时期，日本陆军的这一作战设想虽有所变化，但一直未能改变“东攻西守”的这一布局。齐齐哈尔、海拉尔、兴安宪兵队，正是关东军按照这一作战设想而设置的宪兵机构。现将这3个宪兵队在日伪时期配合关东军的活动情况及自身的变化情况概述如下：

齐齐哈尔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在中苏西部国境建立的宪兵机构，以后的海拉尔、兴安宪兵队，则是由它的下属分队扩充编成的。

1932年5月10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及“北满”大部城市后，最先以铃木混成旅团的海村园次郎等60名配属宪兵，编成了齐齐哈尔派遣宪兵队，在齐齐哈尔、克山两地设分队。6月15日，日本陆军省根据侵华日军情况，发布了《满洲派遣部队编成要领》，根据这一《要领》，齐齐哈尔宪兵队在派遣宪兵队的基础上正式编成。新编成的齐齐哈尔宪兵队主要是围绕中苏西部国境活动，并在齐齐哈尔、嫩江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设置了4个分队和3个分遣队。

1933年以后，随着关东军对全东北的占领，齐齐哈尔宪兵队管区也随之扩展到伪满西部的兴安东、北、南省及龙江省广大区域。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东铁路以后，齐齐哈尔宪兵队又以滨洲铁路哈尔滨至满洲里段、齐齐哈尔至嫩江段、白城至阿尔山段铁路为中心，在满洲里、海拉尔、昂昂溪、博克图、王爷庙、白城、阿尔山、嫩江等地，设置了宪兵分队和分遣队，在充当关东军军事警察的同时，配合日伪军讨伐队，参与了镇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1935年9月，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后，他命令各地日本宪兵队，要对中共的地下组织和苏联间谍进行侦察和镇压活动。根据这一活动的需要，1936年初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在大兴安岭以西设立了海拉尔宪兵队，专门围绕兴安北省活动。海拉尔宪兵队人员及管区，均由齐齐哈尔宪兵队划拨。

海拉尔宪兵队分出去后，齐齐哈尔宪兵队的主要机构及主要业务是：

本部，下设特高、思想对策、防谍、警务4班，其中思想对策和防谍两班为本部主要部分。思想对策班负责镇压反满抗日团体，侦察伪满政府官吏的思想动态，侦察白俄的思想动态。防谍班以苏联领事馆为重点，负责搜查苏联间谍网，监视、防范所谓的谋略破坏事件。齐齐哈尔宪兵队下设机构有扎兰屯、齐齐哈

尔、昂昂溪、王爷庙4个分队。其中扎兰屯分队下辖博克图分遣队；齐齐哈尔分队下辖嫩江分遣队和泰安分驻所；王爷庙分队下辖白城子分遣队和索伦、阿尔山两个分驻所。

1935年11月，齐齐哈尔宪兵队长中田敏雄根据东条英机半年内侦察清楚中共地下组织的命令，指挥管内的日伪警务机关对共产党的活动开展了侦察，后依据伪满齐齐哈尔警察厅提供的线索，掌握了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王甄海等人的活动情况。1936年6月1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全东北第一次组织统一大逮捕中，齐齐哈尔宪兵队也参加了行动，在队本部临时设立了"搜查本部"，指挥伪龙江省警务厅、齐齐哈尔领事馆警察署，在齐齐哈尔市进行了大逮捕。这次总共在文教界逮捕了38人，其中有教员、学生，也有部分伪满职员和新闻界人士。以后齐齐哈尔宪兵队将被捕者送到伪第三军管区进行了"军法会审"，其中数人被判处死刑。

齐齐哈尔宪兵队在指挥日伪警宪破坏中共地下活动的同时，也围绕中苏西部国境开展了对苏联间谍的侦察。1936年秋，宪兵在孙吴附近逮捕了两名越境去苏联的中国人，经审讯判明他们是苏联潜伏在齐齐哈尔地下间谍网的联络员，担当着从孙吴往返苏联传递情报的任务。通过审讯这两名苏联间谍，齐齐哈尔宪兵队又初步摸到了苏联在齐齐哈尔的一些谍报活动情况，据此，宪兵又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苏联间谍的活动。

不久，齐齐哈尔宪兵队上等兵土屋芳雄利用密探先在齐齐哈尔市城北关逮捕了一个叫张惠民的人，从他的住宅中搜出了发报机等间谍活动器材，并缴获了大量未来得及送出的情报，齐齐哈尔宪兵队根据这些情报的内容——关东军驻屯、部队番号、兵种、人数、军用机场设施、飞机架数、机种、齐齐哈尔铁路军事运输、龙江省公署的政治经济情况、伪第三军管区部队编制和各级军官姓名等，判明这不可能是张惠民一人所为，张很可能就是苏联设在

齐齐哈尔地下情报网的成员，于是，宪兵对张进行了残酷的刑讯。由于张的变节，齐齐哈尔宪兵队将苏联间谍网的十余名成员全部逮捕。经审讯查明，这个谍报网的成员，分布在铁路、新闻、商业各界及飞机场周围，主要任务是搜集关东军在中苏西部国境的布防情况及伪满政权方面的情报。张惠民负责对各类情报进行整理，然后交联络员以看病为名，从孙吴一带越境送往苏联。

破获苏联间谍网这一事件，在关东宪兵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促使关东宪兵队在中 苏西部国境加强了一系列的防谍措施。

"诺门罕事件"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关东军对苏联采取攻势时期，这期间关东军在中苏边境上围绕着侵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防谍活动。这期间也是齐齐哈尔宪兵队最活跃的时期。

在"诺门罕事件"中，齐齐哈尔宪兵队配合关东军的行动，曾在队本部专门设立了"龙江防卫警察部"，统一指挥日伪警察、宪兵、特务、协和会，在白（城）阿（尔山）铁路、齐齐哈尔至嫩江铁路两侧，搜集伪满内部各方面的情况，然后由"龙江防卫警察部"统一将情报整理、汇总，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此外，"诺门罕事件"期间，白城子分队还专门派出小川繁三等数名宪兵，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操纵200余名蒙古人，在中蒙边境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谋略活动，他们经常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采用绑架边民和哨兵的手段，索取苏联方面的情报。

"关特演"期间，齐齐哈尔宪兵队也直接参与了大量的对苏阴谋活动。当时，哈尔滨特务机关在关东军第二课的指挥下，曾制订了一个《对苏挺进突击方案》，内容是派遣一支武装谋略部队，从齐齐哈尔宪兵队管区的甘河出发，沿大兴安岭北上，寻找翻越大兴安岭的道路，然后秘密进入中苏边境漠河，开战后潜入

苏联境内，炸毁西伯利亚铁路上的大桥，破坏苏军军事运输，对苏开展谋略宣传，扰乱苏联后方。这一方案在1941年6月开始实施，哈尔滨特务机关将由白俄组成的浅野部队300余人调到了甘河地区后，关东军命令齐齐哈尔宪兵队配合行动。齐齐哈尔宪兵队曾派出数名宪兵进入该部队。当时，哈尔滨特务机关给齐齐哈尔宪兵队派遣宪兵的任务是：

1、配合武装谋略部队，征集运输所需的车马、劳工，并负责对其进行监视。为了彻底隐匿这次行动，当部队抵达漠河后，由派遣宪兵负责对征来的运输人员执行集体屠杀。

2、派遣宪兵负责对浅野部队及行动区域进行警戒，发现有人逃跑或擅自进入行动区域，由宪兵逮捕后执行就地处决。

齐齐哈尔宪兵队派遣宪兵，根据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命令，先后从嫩江等地强行征掠了近300辆大车和数百名民工，为武装谋略部队运输物资。在行动中先后枪杀了因打猎而误入戒严区的5名中国猎人。

这支谋略部队从甘河出发后，经巴彦街、五家子等地后摸索前进，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山中艰难跋涉了3个多月，死了200多名民工，损失了大量的车马，最后也未能找到一条翻越大兴安岭的道路。于是，同年9月下旬，浅野部队返回嫩江，不久被调往它地，齐齐哈尔宪兵队派遣宪兵随即返回原部队。

“诺门罕事件”以后，日苏关系更日趋紧张，关东军也逐渐加强了对中苏西部国境的兵力，与此同时，从1940年开始，关东军在齐齐哈尔宪兵队管区的阿尔山、五叉沟、罕达嘎呀等地修筑了大量的对苏作战阵地，并从华北和东北等地运来了大批战俘和劳工，驱使他们做苦役，围绕这些阵地和劳工进行防谍，又成了齐齐哈尔宪兵队1940年以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都遭到了沉重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出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转

折，日本帝国主义已无力对苏联采取攻势，故开始调整对苏策略，从武装对峙的方针转向尽量不刺激保持静谧的方针。相反，由于苏联红军对法西斯德国作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逐渐减少了从远东地区外调的兵力，这样又给关东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关东军鉴于"诺门罕事件"的教训，日益对伪满西部国境的防卫感到不安，尤其是对白城至阿尔山以南地区的平原更是担心，特别是恐惧苏联将来在这一地区使用大规模机械化部队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从1943年开始，又在林西、吐列莫杜、户地、乌勿林等地修筑了大量防御苏军机械化部队行动的工事，并向阿尔山、五叉沟增派了兵力。为了适应上述地区军事行动的需要，1944年5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又正式设立了"阿尔山宪兵队"，下设阿尔山、兴安（王爷庙）两个分队，直接管辖白阿铁路两侧地区及各野战阵地。同时，阿尔山宪兵队还负责以王爷庙为中心，对伪满政权中蒙族官吏的思想动向和伪兴安军官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侦察。

阿尔山宪兵队成立以后，齐齐哈尔宪兵队机构缩减成齐齐哈尔、昂昂海、嫩江3个分队，管区缩小到伪龙江省境内。

1945年4月，关东军转入全面防御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为贯彻关东军开战后，在齐齐哈尔至四平铁路以西地区节节抗击苏蒙军队，进行长期战争的意图，又对阿尔山宪兵队进行了扩编，将阿尔山宪兵队改称"兴安宪兵队"，本部迁到王爷庙，调日本宪兵少佐小林喜一为队长，在兴安、阿尔山、五叉沟、白城子设宪兵分队。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齐齐哈尔宪兵队转入战时体制，本部40余名宪兵在队长玉冈严的带领下，开始焚烧文件，准备执行"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下属各分队根据关东军的命令，和哈尔滨特务机关、兵站警备队人员联合改编成关东军特别警备队，但正在改编过程中，关东军又突然下令停止改

编，这样，齐齐哈尔宪兵队各分队在脱离原部队后又失去隶属关系，遂各自开始了独立行动。嫩江分队在少尉分队长笹城户哲郎的带领下，筹集了粮食及大量的生活日用品，准备潜入到大兴安岭山中，策动欺骗鄂伦春人，一同与苏联进行长期游击战。同时还编成了3个放火班，准备撤离嫩江街前，放火烧毁嫩江街的全部建设。8月12日驻嫩江附近的伪满军骑兵团和辎重第八团部分官兵举行了起义，嫩江分队还组织伪满警察、铁警及日本在乡军人进行了镇压。

昂昂溪分队在开战后，在分队长凌真喜雄的带领下，也烧毁了全部文件，做了对苏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8月17日，苏联红军进入齐齐哈尔后，齐齐哈尔宪兵队及各分队亦随日军被解除了武装，队长玉冈严服毒自杀，余部随被俘日军押往苏联。

从齐齐哈尔宪兵队分出去的兴安宪兵队，在苏联出兵东北后也都做好了对苏顽抗的准备。本部60余名宪兵，在驻王爷庙的伪满兴安军大量逃跑的情况下，将当地的日本在乡军人组织起来，构筑了工事，准备进行顽抗。11日，该部接到南下与奉天宪兵队汇合的命令后，队长小林喜一带领部分队员乘车赶到奉天，被编入奉天防卫司令官隶下，8月20日日本投降后被解除武装。

兴安宪兵队的阿尔山、五叉沟两个分队，由于设在白阿铁路最西端，开战后由于苏联空军猛烈地轰炸这条铁路，使王爷庙至阿尔山一段被炸毁，这两个分队无法与本部汇合一同撤到奉天，故随当地日军撤到了齐齐哈尔，日本投降后随日军被解除了武装。

设在伪满西部国境上的另一支宪兵队海拉尔宪兵队，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设立较早的一个宪兵机构，它成立于1936年，前身是齐齐哈尔宪兵队海拉尔分队。该队第一任队长是日本宪兵中佐坂尾秀一，1936年正式编成时，下设海拉尔、满洲里、

三河、扎赉诺尔、牙克石、阿穆古郎等分队和分遣队，管辖区域主要是伪满的兴安北省。

伪满的兴安北省，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地处中、苏、蒙三国交界处，西面向通往苏联的门户满洲里、东背靠东北平原的屏障——南北走向的大兴安岭山脉，北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一条中东铁路横贯东西，将其与“北满”紧紧相连。日伪时期，这里是关东军对苏作战的最前沿，也是关东军对苏“东攻西守”作战构想中的永久防御地区。海拉尔宪兵队的活动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日伪时期海拉尔宪兵队的活动主要有四项：

其一、对蒙古族、白俄进行控制

兴安北省当时是伪满境内蒙古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因这一地区与外蒙接壤，伪满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对这一地区不放心，唯恐当地蒙古族民众联络外蒙，起来反抗日伪统治。因此，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尤其是对蒙族上层社会的控制更是严密，这一活动主要由海拉尔宪兵队具体负责。1936年的凌升事件，既是海拉尔宪兵队直接监视、控制蒙古族的一起重大事件。

1935年5月，一个叫川濑的宪兵军曹，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海拉尔市大街上逮捕了一名有泄露军事机密嫌疑的蒙族青年，这名青年因喝醉了酒，声称他有省长凌升给他的密令。吉濑将这名醉酒青年押到海拉尔宪兵分队，经审讯他供出了密令内容，即以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为首的一些人，正在秘密筹划着“呼伦贝尔独立行动”，准备在兴安北省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蒙古族独立。海拉尔宪兵队根据这一意外的收获，开展了对凌升等人的侦察，不久凌升等人的活动全部被海拉尔宪兵队侦察清楚。于是，具体负责这一行动的海拉尔宪兵分队长北川三郎，专程赶赴新京，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做了报告。

由于凌升等人属伪满政权的要人，与皇帝溥仪有亲戚关系，

且在伪满建立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对他们的处置须十分慎重，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最后由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批准，决定对其镇压。1937年4月12日，海拉尔宪兵队将凌升等人逮捕，24日押往伪新京南岭处决。凌升事件曾在关东宪兵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意识到对蒙古社会的控制，将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于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专门责成海拉尔宪兵队，对蒙古社会特别是上层人物严密监视，严防他们与外蒙古联络，进行民族独立一类的活动。

日伪时期，海拉尔宪兵队管区还居住着2万多名白俄，他们分布在三河、满洲里、扎兰屯、博克图、牙克石等地，其中90%以上聚集在三河地区。

三河，位于海拉尔以北大约180公里的地方，它在伪满西部国境的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是关东军准备对苏作战的前哨阵地。这一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是白俄聚集区，有近2万名白俄在这一地区生活，白俄人数在东北仅次于哈尔滨。1933年苏联对农业进行改造以后，又有4千多名不愿走集体农庄道路的白俄从苏联逃到了这一地区，致使这一地区白俄的成份变得更加复杂。伪满成立初期，关东军对这一地区的白俄曾抱有错误认识，认为他们多是"继承着外贝加尔哥萨克的传统，有着强烈的反共意识，是抵御苏联影响满洲国的屏障"，因此，未曾认真加以防范。1934年以后，随着日苏关系的日趋紧张，关东宪兵队逐渐注意了这一地区，并着手对这一地区的白俄开展了调查。经初步调查发现，这一地区的很多白俄与苏联境内有联系，并进行着秘密往来。对此，关东宪兵队从防谍的角度出发，开展了侦察。结果从中查出了一名叫奈斯·米亚诺夫的苏联间谍。这个人1933年从苏联越境进入三河地区，当时宪兵曾对他进行了审查。在审查中，他发表了大量对苏联不满的言论，并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大肆攻击。由于这名"白俄"反苏、反共的出色表演，蒙蔽了日

本宪兵，被日伪方面录用为伪满警察。奈斯·米亚诺夫在受审中交代了他的间谍活动，并供出了三河地区白俄中的其他十余名间谍。对此，关东宪兵队极为震惊，慌忙在1934年4月设置了三河宪兵分遣队（当时归齐齐哈尔宪兵队海拉尔分队管辖），着重围绕白俄展开侦察活动。1935年9月，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后，认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与苏联间谍有联系，故特别将三河地区做为重点，命齐齐哈尔宪兵队海拉尔分队加紧侦察，试图通过侦察白俄的"通苏"活动，掌握海拉尔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侦察从1935年冬开始，首先海拉尔宪兵队在三河地区白俄中选出100人做目标，对其逐一进行跟踪侦察，最后将其中19人定为有重大通苏嫌疑者，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做了报告。1936年"六·一三"大逮捕中，这19名白俄被海拉尔宪兵队全部逮捕。

在审讯中，由于1名白俄经不住宪兵的残暴酷刑，供出"三河地区的白俄，正在组织突击队，准备与苏联联系，在7月24日举行暴动，袭击日满军及政府机关"的情况。海拉尔宪兵队得到这一情况后十分惊慌，急忙与当地日本驻军联系，又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逮捕活动，结果又有108名白俄被捕。海拉尔宪兵队审讯后，不久，将其中的32名所谓主犯押送到伪齐齐哈尔第三军管区，进行了军法会审，大部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

这件事在日伪内部称为"三河突击队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实程度，日伪内部也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宪兵望风捕影、屈打成招制造出的假案；也有人认为证据不足。但海拉尔宪兵队还是采取残酷手段，将其进行了镇压。以后，海拉尔宪兵队一直对三河地区的白俄，采取严密监视、控制的政策。

其二、围绕对苏作战工事进行"防谍"活动。

根据关东军"东攻西守"的对苏作战部署，关东军设在西部国境的兵力要比东部少得多。西部在1938年以前，关东军仅用相当于1个旅团的骑兵集团守备。"诺门罕事件"前夕增到1个师

团，“诺门罕事件”后又增到1个军（相当于两个师团）。尽管关东军不断在这一地区加派兵力，但还远远达不到能与苏联对峙所需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拟定了“以坚固阵地为依托，以海拉尔为中心独立对苏防御”的西部作战构想，准备日苏开战后，在滨洲铁路被炸毁、兴安北省与伪满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海拉尔的日军能以有限的兵力，在这一地区单独与苏展开长期的战争，藉以牵制西线苏军的行动。

这一构想在“关特演”期间为关东军最后所完善，确定在日苏开战后，关东军从东部国境跨过乌苏里江，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尽快捕捉苏联远东军主力决战；西部以大兴安岭浩翰的林海为依托，以海拉尔和牙克石两个阵地为核心，由第八国境守备队和第六军固守3个月，牵制西路苏军主力进入东北，待关东军在东线决战取胜后再挥师西下，最后在西线与苏军决战。

根据关东军这一对苏作战的设想，日伪时期关东军在海拉尔和牙克石等地构筑了大量的作战阵地。

其中以海拉尔为核心的阵地被称为“第八国境阵地”，其规模相当大，该阵地围绕海拉尔市由5个阵地群组成，围绕每个阵地群还修筑着大量野战阵地，构成交叉火力网，阵地内配备了大量的火炮和轻重武器，守备这一阵地的第八国境守备队，是关东军最大的一支国境守备队，兵力相当于一个联队。

此外，西部国境的另一个比较大的阵地群是牙克石永久阵地。该阵地自“诺门罕事件”后开始修筑，以牙克石、免渡河、乌奴耳、兴安4个核心阵地为主，绝大部分的碉堡群设在大兴安岭山中。这个阵地在1944年以后由关东军第六军守备，主要任务是阻击苏军通过大兴安岭，进入伪满中部。

海拉尔宪兵队管区，除海拉尔、牙克石两个大阵地群外，在博克图等地还有大量的野战阵地。上述这些阵地规模庞大，有的修了很多年，这样每年都要从华北和东北各地运去大量劳工和战

俘服劳役，对这些劳工和战俘的常年监视及围绕这些阵地的防谍，则是海拉尔宪兵队的头等重要任务。为此，海拉尔宪兵队在免渡河、兴安、海拉尔等地的阵地周围，专门设置了宪兵分遣队和分驻所，直接负责对阵地的防谍和监视。

其三、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操纵指挥对苏作战的谋略部队。

关东军在西部国境的作战构想中，除指望利用海拉尔、牙克石等坚固的碉堡群对苏军进行长期阻击外，战时还寄希望利用大兴安岭特殊的地理条件与茫茫的林海，与苏军开展变幻莫测的游击战，与碉堡群相配合，共同弥补西线作战兵力的不足，将苏军拖住。基于这一设想，哈尔滨特务机关曾在海拉尔宪兵队的管区三河、修里坎、吉拉木图、牙克石、扎赉诺尔等地，设置了很多谋略活动据地，重点对白俄、蒙古族及生活在大兴安岭山中的鄂温克少数民族进行收买，企图利用他们熟悉地理环境，战时配合关东军西线的游击战。此外，哈尔滨特务机关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以蒙古族为主的“矶野部队”、以白俄为主的“浅野部队”和以鄂温克少数民族为主的“鄂温克部队”。为了配合哈尔滨特务机关对这些部队的监视、控制，海拉尔宪兵队则向这些部队派去了配属宪兵，协助其活动。

其四、制订屠杀政策，战时准备在海拉尔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关特演”开始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命令海拉尔宪兵队，做好战时对内镇压的准备，据此，海拉尔宪兵队根据管内的情况，拟定了“全队非常时期防卫措施”，将其任务规定为以下10项：

1、密切配合国境警察，对出入该地区的人进行盘查，发现可疑者立即逮捕。

2、从防谍的立场出发，对来往于该地区的信件进行严格检查。

3、加强对驻军、军工厂工人的思想控制，防范其破坏活动。

4、加强对邮电、铁路、一般工厂工人进行监视，严密注视其动向，防止其破坏活动。

5、严厉取缔室内外一切集会活动。

6、侦察通苏及反满抗日分子，根据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规定，做好开战时的处置准备。

7、加紧对日满官吏进行监视、侦察，及时掌握其思想动向。

8、搜查苏联间谍活动的器材，重点是无线电发报机。

9、搜查爆炸物，防止破坏。

10、加强对海拉尔地区及大兴安岭地区防御工事的防谍。

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在东北转入全面防御后，海拉尔宪兵队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命令，又制订了战时防卫计划，其中规定：

满洲里宪兵分队的战时配合伪满外交部驻满洲里办事处，占领苏联领事馆，扣押领事馆外交人员，没收文件；海拉尔宪兵分队，对海拉尔市及扎赉诺尔发电厂进行重点警备，防止破坏，在苏军进入海拉尔地区前，由本部派人协助将扎赉诺尔发电厂及煤矿彻底破坏；全队在满洲里、海拉尔、嵯岗、扎赉诺尔等地同时执行《战时有害分子处理计划》，对登记在案的“战时有害分子”，同时进行镇压。

1945年8月初，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编成，海拉尔宪兵队本部被撤消，文件及一切设施移交给了齐齐哈尔宪兵队。海拉尔、博克图、满洲里3个分队的大部成员被编入关东军第三特别警备队中，3个分队均降为分遣队。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满洲里分遣队10名宪兵带着两挺机枪参加了阻击苏军的行动，结果全部被消灭。海拉尔分遣队及本部45名宪兵，在苏联红军突破关东

军的满洲里防线后，与关东军作战部队一同进入了海拉尔第八国境阵地第二地区阵地内负隅顽抗，结果27名被击毙，余部在8月18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随关东军作战部队放下了武器。

回忆日本宪兵队

张 家 栋

1917年我生于齐齐哈尔市。1933年我在齐市工科职业学校毕业后，在伪满宪兵队当了宪兵。3年后，我考上了日本关东军宪兵，在长春受了3个月的特别训练，结业后被分配到白城子，成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成员。1941年，我被调到齐市本部，在齐齐哈尔宪兵队中任职。

伪满时的宪兵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其罪行累累。当时齐市有两个宪兵队，一是伪满宪兵队，在第三军管区的里院；另一个是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现在一百商店东侧的那座楼房里，我就是在这个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的职能基本是两个：一是军事司法，维护军纪，惩治军人犯罪，搜查和追捕逃兵；二是高等军事警察，即特高课，进行社会政治思想调查及分析，镇压反满抗日活动，搜捕反满抗日者，反国际间谍和共产党的策动等等。我的任务属第二种，具体分工是外勤。我平时穿军装，在外边活动都是穿便衣。在我的同行中，大多数是日本人。

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的机构设置和组织体系是：队长一人，军衔为中佐或少佐。队长以下设副官一人，军衔为中尉或少尉。队下设一课，课长一人，军衔为中尉或大尉。课以下设两个班，一个为内勤，一个为外勤。此外还设有管理财经的经理室，管理

文书的庶务室。上述这些机构，共有人员60左右。

齐齐哈尔宪兵队下设五个分队，分别驻在齐市、昂昂溪、富拉尔基、白城子、扎兰屯。分队长的军衔为中尉或大尉。每个分队有40人左右，又分为两个分遣队。

日本宪兵队的刑罚并不多，但施用者却非常残忍，对犯人常用的手段除用皮鞭、竹条抽打外，还有老虎凳、灌凉水等，对个别强硬的政治犯，还要临时想出一些对付的办法。

我在几年的特务生涯中，亲身参加的较大的事件有两起。第一件是在1941年。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在郭铁坚的率领下，在讷河一带进行抗日活动，袭击了讷河县城。情报传到齐市后，驻齐日军13部队的田中部很快就出动了，赶赴讷河讨伐抗日联军。由于日军掌握的情报较准，郭铁坚的抗联部队没有摆脱日军的追击，在某地遭到日军的包围，使抗联部队损失相当严重。在打扫战场时，日军缴获了一份秘密文件，其中有一个齐市抗日组织的人员名单。很快宪兵队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展开了侦察和搜捕，先后有30多人被捕。

第二件是，由于叛变分子万先琦向宪兵队告密，连续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组织和一个国民党组织，共涉及几百人，其中知名的有阎佑文、王文萱、伊作衡、田维民等，除王文萱是四平的以外，其他大都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

由于齐齐哈尔市是日伪在黑龙江的统治中心，因此军事机关和驻扎的部队较多。首先是第三军管区，它是日伪在齐齐哈尔的最高军事机关。第三军管区的第一任司令官是程志远，以后是张文铸、朱榕，最后一任是赵秋航，他们都是中将军衔。第三军管区里有一个顾问部，都是日本军官，虽然军衔不高，但都说了算，实质是起控制作用的。伪满第三宪兵队，就驻在第三军管区的院里。这个宪兵队一部分执行军事警务任务，另一部分执行军事任务，两个连驻在齐市，一个驻在黑河。伪军部队不少，分

别驻在 南大营（ 商埠路三百间房附近）、西大营（实验中学附近）、北大营。

日本军队在齐齐哈 尔有一个司令部 ，在现在的一百商店后边，还有一个警务队。东大营驻的是日本军队，就是后来的13部队，它的前边是日本陆军医院。南大营是日本军用仓库，有日本军队把守 ，代号叫983部队。这个仓库主要是储存军需物资，被服粮食。日本宪兵队就在一百东边的那座楼，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再就是铁路的路警队，先是穿警服，1943年以后就穿军装了。关东军在齐齐哈尔的秘密特务机关在现在第三食品商店以南的一个小楼里，公开挂的牌子是第三军管区司令部顾问部。

1945年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敲响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大约在苏军进入齐齐哈尔的前一个礼拜，日伪特务机关就开始清理文件，焚烧档案。我记得足足烧了3天。苏联红军的大规模进攻开始后，日军命令各部队不要抵抗，一是要把文件烧毁，二是要掩护家属撤退。因此，苏联红军的进攻如走平道。在进入齐市前，苏联红军投了几次炸弹，有人伤亡。进入齐市后，最高指挥官可能是巴林斯基。苏联红军把日本投降部队集中在13部队院内，把伪军集中在南大营 ，都由苏联红军武装看押 。我们“特高”也随着部队就地投降。至此，我才结束了这段罪恶的历史。

1946年初，国民党派接收大 员彭济群来齐接收 。他在来齐前，在警务处长张维仁、公安局长熊文洪的策划下，在哈尔滨收买了一个连的“铁石”部队，做为彭的警卫部队。彭济群乘火车来到齐市时，还有一些人到火车站去迎接。彭带来的一个连驻在了解放门里，彭的官邸设在伪省政府。不久，彭济群就开始收罗人马，扩充实力。当时还有这号军那号军，主要是尚其悦拉起来的光复军，马传悦拉起来的挺进军，还有宋同山拉起来的“黑七旅”，等等 。这些人马有四五千人 ，并且把日军投降扔下的坦克、大炮都用上了。在彭济群来齐市之前，人民自卫军已撤出齐

齐哈尔，把首脑机关搬到了达呼店。到1946年4月下旬，又打了回来，彻底解放了齐齐哈尔。

（叶永才整理）

我所知道的伪第三军管区

由潜如

我于1908年出生在齐齐哈尔，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曾在伪第三军管区混事，所以那里的情况知道一些。

1931年齐齐哈尔沦陷后，为了谋生，我到一所学校当了教员。一年以后，有位朋友说给我找到了合适的差事，是搞通信业务的地方。我虽然学的是工科，与通信业务不相干，但毕竟是搞技术的，更主要的是去那里的收入要比教员高得多。于是我就进入了伪第三军管区通信队。刚去时我只知道它的名称，至于它的职能、业务一概不知。干了一段以后才知道，它的准确名称叫“军用通信处齐齐哈尔支处”，后来改叫第三通信队。

第三通信队，是伪满军队通信部队之一。业务上受“新京”（长春）总部领导，配属于第三军管区，为保密单位，因此，对人员的挑选、审查很严格。对队内人员的管理就更严了，进了通信队，尤如进了牢笼，也就失去了自由。

我在通信队度过了八年牢笼般的生活，耳闻目睹了侵略者和汉奸走狗门的种种丑闻。伪第三军管区的官员门多数对日本顾问摇尾乞怜，百依百顺，而对下属却狐假虎威，非打即骂。我所知道的三任司令官张文铸、朱榕和赵秋航都是这样的人。张文铸大我十几岁，我们都是民国黑龙江省一中毕业。张文铸在一中毕业后投考了保定军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前他只是个中校，事

变后被日本人看中，平步青云，当上了伪军管区中将司令官。张文铸这人，在事变前还比较正经，生活也算检点。当上伪军管区司令后，他为了讨好日本人，证明自己是主人喜欢的那种人，便施展起投机钻营的伎俩。他手提"双枪"，一把钢枪，一杆大烟枪，逛妓院，进赌场，给日本人以吃喝嫖赌无所不好的印象。他并从妓院里赎出一名妓女为妻，以此来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张文铸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时，军管区参谋长是于智恭，也是个铁杆汉奸，他直接管通信队，曾兼任过通信支处处长，继张文铸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的是朱榕。朱榕任军管区司令后，参与了日本人和苏联打仗的诺门汗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日伪军遭到惨败，日军参战军官大部遭到处罚，有的自杀谢罪了。朱榕是参战伪军的最高负责人，听说日本人以让他去日本考察为由，在途中被日本人推进了大海。接替朱榕任伪第三军管区司令的是赵秋航。

伪第三军管区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傀儡机构。军管区设有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军医处和军法处。每个处都有日军顾问，日军专门在军管区设有顾问部，军管区的一切决策权都在日本人手中。配属于军管区的通信支处，处长由军管区参谋长兼任，以示它的重要，后来改为第三通信队时改由日本人任队长。当时的通信队队长叫高宗久，是个日本海军上尉。

通信队内按照通信 专业分为无线 、有线和鸽子通信三个部分。有线通信的范围不太大，主要与城内和邻近县的部队及有关单位联系。无线通信的联络范围较广，有黑河 、呼玛尔 、奇克特、安达、泰来、克山、拜泉、满洲里和兴安省（扎兰屯），还有一个秘密点，代号叫"国境"电台，它在什么位置，工作人员不知道，也不许问，只是联络时按规定的密语呼叫即可接通。这些电台每天都定时联络。鸽子通信平时主要掌握鸽子的喂养与训练，一般不作实际通信之用。

通信队的人员，日本人和中国人各占一半，技术人员都是日本

人，他们大多是日军正规部队退下来的技术兵。他们到军管区搞通信要比在部队好得多：一是不打仗，日本兵大多数是不愿打仗的；二是少受长官打骂，因为他们都在中国人之上；三是待遇不低。当时的通信队队长高宗久就是从日本海军调来的。日本海军素与陆军不合，其他从日本陆军调来的人员与他有矛盾，经常发生一点摩擦。以后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通信队的日本兵陆续被抽去参战。被调走的日本兵大多数都很不情愿，有的甚至发牢骚，表示对战争的不满，当然，决心以死效忠天皇者不乏其人。

通信队内的日军技术人员，不象武官那样凶暴，对中国人的专横跋扈差一些。他们也很少谈论政治，他们议论更多的是待遇、家庭和业务技术问题。通信队内的中国人、中国雇员和士兵受着双重欺压—日本人和中国官长的欺压。在军管区内，实行的是日军的一套规章制度，提倡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官长打士兵，上级打下级，日本人打中国人司空见惯。即使你被打耳光，也得立正、挺胸、抬头、伸长脖子，等着挨第二、第三撇子，直至长官出完气为止。我们这些中国雇员和士兵被上属官长召见时，不能面对官长，不能正视官长。院内遇到上属官长要立正侧视回避。

我到通信队后，虽不懂通信业务，但懂日语，所以让我作庶务。我之所以能在那干八年，也仅仅是因为我懂日语。到了1942年，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日军不断抽调大批军政人员到前线，因此，也决定抽我到热河的一个部队去。我得到这一消息后，设法在抽调前离开了通信队，算是逃离了牢笼。

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尽管对往事的记忆有些模糊，但这段亡国奴的历史总是历历在目，它从另一方面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而奋斗。

（宋金林整理）

关于"六·一三"事件

王 国 玉

关于"六·一三"事件，侵华日本战犯前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处长、宪兵大佐齐藤美夫，前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部附、宪兵中佐宇津孟雄，前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土屋芳雄均有所供。他们供述，1935年11月前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令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以6个月时间将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情况侦察完结。1936年6月前，各宪兵队向司令部报告了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侦察结果。根据宪兵队的报告情况，齐藤美夫又综合向关东军司令官做了书面报告。关东军司令官根据报告，又命令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计划对全东北中共党员进行一次大逮捕。1936年6月10日，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发布中警委第143号《关于全面逮捕北满共产党的命令》。齐齐哈尔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在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设立搜查本部。6月13日，日伪警宪机关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实行大逮捕。对在齐齐哈尔的被捕者，第三军管区进行普通军法会审，于8月15日做出判决：判处死刑者5人，判处无期徒刑者1人，判处15年徒刑者6人，判处13年至3年徒刑者16人。

本文的史料，是事件亲历、亲闻者提供的。

一、杨钧甫的自述

1、被捕之前

我在1936年（康德 3年）齐齐哈尔的大检 举中被日寇逮捕了。逮捕后送到日本宪兵队、伪满齐齐哈尔市警察厅，受刑讯将近两个月才被释放。50多天的狱中生活是我有生以来特殊经历的第一次。在这50多天中，惊慌、恐怖、愤怒、忧虑、痛苦、悲哀，甚至麻痹，无所不备，精神肉体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出狱后半年之久，精神还没有恢复常态，事隔几十年，至今思之，记忆犹新。痛定思痛，余恨难平。

伪满齐齐哈尔市出版一种报纸，名叫《民报》，民报社长王甄海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在报社消息比较灵通 。在1936年初，他即秘密告诉我，日本特务在各处调查知识分子的反满抗日思想和行动，不久可能来一次大检举。过了几天，他又偷偷地告诉我，特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教育厅长和两级中学校长王宾章、王宸章弟兄，也有他和我。他还告诉我，如果能有办法躲避一下也好。恰好在这时，长春伪中央文教部要由齐齐哈尔市老教师中调去一人编教科书，齐齐哈尔市教育厅曾推荐我去，我因不愿离家而谢绝。

当时王甄海积极动员我去 。他说：“ 齐齐哈尔是危险的地方，有机会离开是最好不过的。”此后我遂听了他的话而决定到长春（当时叫新京）去了。王甄海曾对我说，他自已如有机会也要早早离开齐市。他送我上火车时向我说：“到长春时耳目要灵通，万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要上火车往关内逃避。到关内作流亡者也比在东北家中安全。那里好歹是自已的祖国。”说时，他落泪，我也落泪了。不过，那时我思想很麻痹，总觉得日寇对我们怀疑是自然的，但还不致于那样凶险，我们有反满抗日思想他也看

不见，反满抗日现实行动我没有，怕什么？哪知我这种想法是大错而特错的了。

我那时的家庭观念是很深的，多年未离过家，并且在到长春去的前半年妻子死去了。留下失掉母亲的孩子四个，他们时时复信说想念远离的父亲，总要求我不久回家一次。所以我在长春上班两个月后，遂请假回齐市。我回家后到女子师范学校去看了看，因为该校校长教师都是熟人，我又是由该校调走去长春伪文教部的。但是一到学校校门，即见有日本宪兵把守，用枪对着我问："找谁？"我说："找王校长。"那宪兵向里边一招手，由里边走出一个中国人特务，问我："找校长干什么？"我说："明天我要走，今天来告别。"他又问我名字叫什么，我告诉了他。他用小本记下来。我后悔了，我说个假名字就好了，但是已来不及了。

我回到家里，觉得不好，赶快收拾东西要走，可是在这时已经有两个中国人特务走进我家来了。先问我的名字，然后拿出手铐就把我铐上了。他们说："本打算到新京去逮捕你，现在你回来了，那就不用去了。"

2、拘押在日本宪兵队

我被带到日本宪兵队，被送入一个小屋。屋内空无所有，只有一光板木床和一个小凳。押送我的特务把我推进屋内，把门锁上就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处置我，心中非常恐怖、焦急，只得在屋内来回走，有如笼中小鸟欲出而不可得。由窗玻璃向外望，院中颇清静，往来的人并不多。约两小时左右，来了一个特务，把门打开教我跟他走。我出屋跟他越过一个小院，到另一大院，听到有脚镣声，似乎是监狱。那特务领我进一屋中，叫我把我身上穿的西服都脱下，帽子、手表、眼镜都被摘去，身上只穿着衬衣，连裤带都被他们解去了。我以为这回是要被杀害了，但是脱完衣服之后又领我进入里屋，看见粗大的木栏里边囚着

“犯”人，我才知道这是要把我送入监牢来尝铁窗的味道了。但又不叫我入牢，等了好久。忽听“呛啷”一声一个铁门开了，由里边提出一个戴脚镣的人，从我面前走过。我一看原来是日语专修学校回族教师麻秉钧 。我两人本来很熟识 ，这时彼此只看了一下，谁也没说话。他被提走了，遂把我推进他那囚室内，只听“呛啷”一声，铁门又锁上了。这囚室只我一人，别的囚室有的两人，有的三人不等 。说话只能小声地偷着说 ，门外有日本兵看守。他们听着说话就吆喝，但他们有时却向囚室内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这个问那个的，打哈哈逗乐，闲聊天。我听出在我隔壁的囚室内的几个人是我教过的女学生。听他们小声说，在我进来那天遇见的麻秉钧可能送到郊外枪毙了。我当时想，我被送进他的囚室，也可能和他一样不知为什么就被拉到郊外枪毙了。就这样无缘无故、无声无息地被枪毙，这是多么冤屈啊！我越想越悲伤。我那时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只是有迫切求生的愿望，所以当有生命危险时是非常难过的。

有一个日本看守兵持枪站立在我的囚室外，有时跟我说话。他用日本语问我：“你是什么人 ，是共产党吗？”我说 ：“不是。”他又问：“那么是为了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说：“是反满抗日吧？”我说：“也不是。”他猜测地说：“是思想犯吧！”我带着气愤的情绪说：“我不懂什么叫思想犯！”那个看守兵不但不介意反而向前凑近我说：“思想犯是有的，日本国内也有，我就是 。我是大学的学生 ，由于思想左倾被捕入狱。在狱中押了6个月，把我送到满洲国当看守兵。唉，好吧，干什么都行，让我活着就行了。”说罢，他“哈哈哈”地笑了一阵，意思好象是发牢骚。但是我不敢讲什么，我不知他的话是真是假，加上我的日本话不怎么好，说不明白的地方还得借他的笔写，何必找麻烦呢？就不说了。

3、逼供拷打

监狱是每天夜间过堂，都是日本宪兵特务审讯。审讯时有一个日本人记口供。他们得不到所要的口供即用残酷的肉刑。我在牢中听不到审讯的话，但用刑时，人的悲惨嚎叫却是能听到的。尤其是受刑完了用人搀扶着回牢房时，多是哭泣、呻吟，痛不忍闻，甚至有的用担架抬回来，也有的死过去了，也有的不屈不挠破口大骂。

我被审讯时也是那样。有一天夜间把我提到一个小屋。进屋向下走，似乎是个地下室。一个日本特务和两个中国人翻译，坐在我的对面。日本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似乎是记载我的材料。问我时他屡屡翻看那本子。他问我答。

"你哪年加入了共产党？"

"我并没有加入共产党。"

"没有加入共产党，你为什么宣传共产主义？"

"我没有宣传 什么共产主义 ，并且我也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

"你向女学生们讲什么是贤妻良母时说，妇女也是人，她也是凭劳动吃饭的，和男子一样，为什么偏要当贤妻良母！这不是共产主义思想吗？"

"这话是我说的，要说我对贤妻良母教育缺欠理解则可，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不妥当的。"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厉声地问。

"我不是。"

"看你是不是？"日本人大喊着向用刑的人说，"把他架起来！"

当时两个中国人扯着我 ，把我的两臂绑在 一个木架的横杆上，撤去脚下的凳子，两脚悬空，把我吊起来了。日本人用皮鞭

子劈头盖脸地打。抽得我头脸都破了，流了一脸血，还往死里打，打得我昏了过去，什么时候把我抬回牢房，我都不知道了。

过了几天之后，第二次对我审讯。地点是另一个比较宽阔的屋子。屋内有些旧板凳，好象是仓库。审讯者仍是以前那个日本人。他问我："女师那个名叫王恩的女教员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我不知道。"

"她是共产党员，她和你关系很密切，能不告诉你吗？"

"我俩的关系是不错，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呀！"

"那你为什么把她偷偷地送走了？"

"她上火车时我去送了，但是送时还有许多人，不是偷偷走的，而是公开走的。"

"她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不过她在未走前曾说过她要到新疆去，但究竟去了没有，我不知道。"

"你是真不知道吗？"

"我是真不知道。"

"哈哈！你是明明知道，偏说不知道。"那日本人厉声地说，"到底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我干脆地说。

"到底知道不知道？"那日本人越法厉声地说，他向一个中国人示意。那个中国人遂用几个竹棍把我的右手手指夹在中间，然后用一个夹子夹我五指尖，越夹越紧，把五指都夹弯了。我只觉得痛彻心腑满身流汗，以后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们用冷水浇我，我才醒过来。他们又把我拖起坐在椅子上，仍问以前问的话。我不做声。他们又夹我左手，未等我发昏，便停止了，送我回牢房。路过一个屋子，只听屋内惨叫两声，便无声息了，大概也是受刑死过去了。

这时我反倒不觉得恐怖了，在路上向送我的中国人说："我

们都是中国人，凡事要多关照些，可以不？"他们说："给你上的刑是最轻的，重的你更受不了啦。我们也不愿意这样，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4、转押伪警察厅

我在牢里又过了两天，忽然开了锁把我提出来。那是白天，看情形不象是过堂。我心里忽然一沉，自以为这回完了，一定和麻秉钧一样，拉出去枪毙了，这时万念俱灰，只有死是归宿而已。上了漆黑的囚车，同别的囚犯被送到一处，下车后仍被送进一个牢房。过来一个日本宪兵把我领到一个夹道，一看里边是厕所。我不知道是什么意图，也可能是使人不知不觉地在这里用绳子绞死？正在猜想，那个日本兵叫我走，把我领到一个牢房里锁上了门。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我先大小便，然后关入牢房。

原来我是由日本宪兵队被送到了齐齐哈尔市警察厅。这里的情况和日本宪兵队不一样，中国人看守兵多，有时背着日本人可以和他们谈话，外面的事能够从他们口里听到一些。也有些人早就认识。日本特务股长姓米持，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审讯我们的主要人物。

我的父亲听说我被押到警察厅，要求会见我，被拒绝。我父亲坐在大门口不走，请求把他也押起来，好和我在牢房里见面。结果被警察推走了。

在狱中听说这次被捕的有60多人，主要是《民报》报社的人、各中等学校的教职员、学生，少数是机关职员，《民报》社社长王甄海也在其中。伪警察厅也是夜间过堂。过堂时也有刑讯，不过谁过堂时的情形如何，中国人看守兵们常对我们说。在我隔壁的囚犯是我的女学生马文凤、马文鸳姊妹二人，又隔壁是女学生王文兰，再隔壁是女教师胡绍超（日本留学生）。马氏姊妹是

因为跟一位苏联人学习俄语，有了通苏嫌疑。王文兰是因为写了一本小说稿本，咒骂了满洲国，被特务搜查出来了。她们都被威吓而承认了“罪过”，尚未受重刑。胡绍超则受刑颇重，乱棍之下折了胁骨，已经不能行动了。

我在警察厅被审讯时米持追问：“王甄海和你最好，是真的吗？”

“是，我和他最好。”我回答。

“他劝你加入他的反日组织时是怎么说的？”

“他没有劝过我加入什么反日组织。”

“没有？是真的吗？”进而米持用诈语说：“那么王甄海为什么说反日组织里有你？”

“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反日组织。”

米持突然发怒了，用一根木棍向我身上乱打，幸而我双手没有被绑，用双手双臂护着头，而双臂和肩背都被打得青肿起来。他打完还问，问完还打，不过没有的事情我死也不承认。这时我真觉得亡国奴真不如一头牲畜，养牲畜也舍不得这样打。

米持又问我：“王社长在庆祝《民报》出版2000号的庆祝会上邀请知识界一百多人开茶话会，在那会中组织了一个反日大同盟，参加的人有百人，其中怎么能没有你？”

“那个庆祝会曾经邀请我参加，但是因为我有别的事，我没到场。”我回答说，“成立没成立什么同盟我真的不知道。”

当时米持和两个中国人特务找出一个人名单，在里边找，的确没有我的名字。他们觉得奇怪，暂时把我送回了牢房。

隔了几天，一连又过我两次堂，反复问的都是这件事，我始终也没有承认。以后就不过我的堂了。在这期间，特务们把我的家搜查了好几次。我的几箱书，大部分都拿去检查了。我家的亲戚也都被查问，连左右邻居也都查问了。

5、非刑定罪

这次被捕的60多人，都是按照这张黑名单逮捕的。其中最首要的就是以前所说的《民报》社社长王甄海。据说日本宪兵特务为了研究他的思想行动，曾经把王甄海历年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都剪裁下来联系在一起，看出他是暗中鼓吹反满抗日的。当时以王甄海为中心，还有报社的人员及齐齐哈尔市的知识阶层，自然而然地被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内中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而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不能容，视为这是个反日集团。

其次，在齐齐哈尔市教育界有一批民族意识、爱国心较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往往流露些不平不满，这些人虽然不是一个反日集团，但是日寇也把他们当作一个集团，当时我也被划在这个集团里。日寇把教育界反日集团为首者视为当时教育界的上层人物，因而黑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宾章、督学官厉通维、齐齐哈尔市两级中学校长王宸章等人均先后被捕。

反日同盟这个名词是日本宪兵队给制造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同盟”。他们为了给被捕的人加上反日同盟、共产党的罪名，则进行残酷的逼供。据我所知，王宸章虽未死，但一臂已落下了残疾，《民报》记者刘大川睾丸被割去，他们都被判处15年徒刑。我不知道的还有许多。其中受刑最残酷的是王甄海，他的眼睛瞎了，耳朵掉了，肋骨断了，临刑前已经不成人形了。他只承认有爱国抗日意图，只承认自己，不承认和别人有什么联系。他虽然受刑死过去多次，但仍是一口咬定与任何人无关。知道他的人都有口皆碑，说他是英雄好汉。他不知道我被捕，他设法从牢房传出他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的“我死后，你把我妻子送到香港。她自己回云南。”可恨，我得到纸条已经是

他死的第二年，他的妻子早已找不到了，成为我终生遗憾。

6、获释以后

我被关押了50多天，忽然一天的傍晚，在我家逮捕我的那个姓高的特务来到我的牢房门外，向我说："你大喜呀，你的官司有头绪了！"我闻听很惊慌，以为这回要杀害我了。因为旧社会犯人快处死刑时都这么说。那特务见我不说话，又急忙说："真的，你的事快完了，可能快放你了！"我也没有深信。

第二天，特务科把我找去，桌上摆好了酒菜。米持对我说："你的事情弄明白了，明天释放你。你虽然受了些委屈，但是这一次弄明白了，以后就不再怀疑你了。来，在这里喝一杯酒，压压惊。"

我在当时虽然死的恐怖暂时减轻了，但是心中百感交集，悲不自胜，酒不能喝，菜也不能吃，只是呆呆地坐着。不大工夫，仍然被送回了牢房。

翌日下午，又把我带到特务科。米持狞笑地对我说："现在你可以回家去了。但是你要在这里写一张"誓约书"（日语叫始末书）。他说着递给我纸笔教我按照他说的写，内容是："被释放我很欢喜，今后甘愿遵守以下各项誓约：（一）在审讯中的一切情形在三年内对任何人也不暴露一句；（二）今后绝不参与一切反满抗日活动；（三）在今天晚间即上火车前赴新京，一年之内不回齐齐哈尔；（四）到新京后安心供职，不许悲观消极。

我按照他们的规定写完誓约书，他们把我的衣服、手表等物品归还给我。米持皮笑肉不笑地说："按誓约书你应今晚就离开齐齐哈尔，但从对你的关怀考虑，你回家可以住一夜，明天晚7时仍到厅里，送你去新京。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没有？"

我说："没有。"这时有几个逮捕我、打我的中国人特务都来

向我道喜，并表示过去对我有些失礼，请我原谅。我没说多余的话，只唯唯退出，走回家去。

我一到家，父母喜出望外的神情自然是不用说了，四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都依偎在我膝前，不愿离我一步。我抚摸着他们说："今后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不要想念我。我明天晚上就要走，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我不知不觉地落了泪。

父母和孩子们都惊异地问："为什么还要走？"

我只说："人家还叫我上长春去，不去不行，一切事将来就会明白。不必多说了 。"大的孩子还要问 ，我的父母不叫他们问。这一夜，我没睡多少。我知道父母是一夜没合眼的。

第二天，我到街上去理发洗澡，买点零用东西。在街上遇到相识的人都远远地看着我，不敢近前跟我说话。在一家商店里我正买东西，遇到一位长亲，他迟疑地走到我近前小声向我问："你还好吗？"我说："没什么，我还好。"他连连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别的什么也没敢说赶快就走了。当时人人都在恐怖之中，大家以为我早已死了，哪想到我还活着，还会出现在街上？那日的晚 7 点，我准时又到警察厅。米持教我和他坐一辆小汽车到火车站，把我交给二名日本宪兵。他们给我买张车票，把我一直送到长春，交到伪文教部人事科，他们才离开我。

二、王宾章殉难

1936年王宾章继续任伪龙江省教育厅长。"六·一三"事件不久，传出了王宾章被捕殉难的消息。但传说不一。

阮振铎回忆说："我在伪文教部大臣任期时，发生了龙江教育厅事件，龙江省教育厅王厅长不知何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当时龙江省长是金璧东，实业厅长是卢元善。因为王宾章被捕，卢元善到伪新京来了 。他让我营救王宾章 ，认为王宾章没有什么问

题，希望文教部使使力量，将王宾章放出来。当时我找总务司长皆川，和他说托他向关东军说情把王宾章放出来。皆川笑着说："恐怕不赶趟了吧？王厅长想逃跑，大概可能已经处置了！"我听了大吃一惊，告诉卢元善说："这个人已死了。"

当时的齐齐哈尔宪兵分队上等兵土屋芳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供述："这次大逮捕后大约有10天，就逮捕了教育厅长王宾章，把他软禁在齐齐哈尔宪兵分队的宿舍内，当天我负责值日，命令藤树敬三上等兵监视他。藤树把手枪放在桌内拿脸盆去洗脸，王厅长便拿手枪自杀了。过20分钟后，我听到紧急电铃响时，看到王厅长已死在便所路口。宪兵队长为逃避处分，向宪兵队司令官作了假报告，说王厅长因逃跑而被枪杀。"

土屋芳雄的供词说明他作了假证，所证王宾章因逃跑而被枪杀之说是假。至于王宾章自杀他并没有在场，不是目睹者，亦不足以为证。

当时对于王宾章之死有些传闻。杨钧甫在他的回忆中曾谈道："当60多人被刑讯时，王宾章尚未被捕，但他是教育界的首脑人物，早已感到他的处境危险。他平日练武术，他曾说：'如果侵犯到我头上，我就抓一个和他对命。'果然日本宪兵不久又逮捕了他。听说他在日本宪兵队戴上了铁手铐，放他到便所，他一手铐打死了一个日本宪兵，然后就跳墙要跑，日寇遂开枪把他打死了。死尸被打得靡烂不成人形了。"

杨钧甫所谈亦非目睹，逃跑被枪杀之说与敌人故意散布这种假造的消息欲盖弥彰有关。

关于日本宪兵队惨杀王宾章的始末，庄瞻智了解得比较清楚。他说：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那个时候我正担任伪满瞻榆县县长的职务。原瞻榆县属于奉天省管辖，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间起划归黑龙江省管辖。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划归龙江省管

辖。每回县里接到伪龙江省教育厅来的公文，厅长的署名全是王宾章。民国二十五年夏天，有一天又由伪龙江省教育厅来了公文，可是突然间厅长的署名不是王宾章了，是由该厅第一科黄科长代理。不几天又换了新厅长荣孟枚接任。前厅长王宾章升调何处并未说明。当时我心里颇觉疑惑，但也无从打听消息，只有等待有机会再打听吧。

同年十月间，伪龙江省公署来电召集县长到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参加县长会议。我到省之后即参加会议，会议完了我藉便到伪民生厅长杨乃时家中串门，前时他任齐齐哈尔市政局长，他与我有点亲戚关系。谈话中谈到前教育厅长王宾章的事啦。

杨乃时说："王宾章的事你还不知道吧！让我详细和你谈谈。在事件发生前不到1个月，王宾章厅长有位胞弟在法国留学，学费由王宾章供给。"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弟弟始终没有和王宾章通信。这次突然由法国寄来一封信。信皮上写着他哥哥的名字"王宾章亲启"，内容的意思是说哥哥你既受了高等教育，过去又在黑龙江省办过中等学校教育多年，由你栽培受业的学生很多，对你的为人都一致同声钦佩。你不应当给日寇作走狗，给伪满作傀儡。你不应当忘掉了我们的祖国，侮辱了我们的祖先。你这样没有气节，寡廉鲜耻，还能够做人吗？信内对王宾章的遣责，还有其他过甚的词句。"

像这样的信，伪满日寇宪兵队认为这是反满抗日的证据。像王宾章这样的人，伪满日寇宪兵队天天暗派特务监视。伪满当时邮局凡是由国外来的信，全部送到邮局内处理，由特高部门的人员检查，送到日寇宪兵队照像留案后，再发给收信人。王宾章这封从法国寄来的信，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封信由邮局内的特高人员检查后送到宪兵队照像留案封好，再送交王厅长。

杨乃时说："王厅长在厅里办公室接到这封信后，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划一根火柴，就这样把这封信烧掉了。哪知道把信烧

掉不几天，龙江日本宪兵队来人见他说："你弟弟从法国来信了吗？"王厅长说："没有来信。"宪兵队来的人说："真的没有来信吗？"王厅长仍然说："确实没有来信。"最后宪兵队来的人拿出冲洗好的照片原信给王厅长看，接着说："这不是你弟弟给你来的信吗？"在确凿的证据下，王厅长只好承认来信啦，并解释说"我弟弟远在国外，不知道家里的实际情况，信口胡说，我把信已经烧掉了。"说完宪兵队来的人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我听到这里为王厅长捏一把汗，以为总算过了这一关。可是杨乃时又说："日本宪兵队接到报告，说王厅长把信烧了，立即派宪兵把王厅长带到宪兵队，组织临时法庭，并召集我和警察厅长刘小胡刘允升亲自到法庭陪听。宪兵队长亲自审问。王厅长把收到和处理这封信的经过说了一遍。当时宪兵队长横眉竖眼，杀气汹汹，如临大敌。旁边站着好几名宪兵，都枪上膛，刀出鞘，气势汹汹。王厅长虽身材矮小，但体格强健，又兼熟练武术，看上去很是威武。宪兵队长责问王厅长有通敌行为时，王厅长郑言厉色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通敌行为。"旁边站立着的宪兵时时对王厅长施以手推脚踢。王厅长认为有辱人格，当以拳还击。像这样来来往往不只一次。宪兵队长认为王厅长不太老实，乃令旁立的宪兵以刀枪向王厅长加以威吓。王厅长挺身而起，一脚踢倒宪兵二名，旁立宪兵群起围攻。王厅长拳脚还击，又打倒宪兵两三名。宪兵队长恼羞成怒，纵身掏出手枪向王厅长连射三四枪。王厅长当即应枪声欲站立而不能，瞪圆双目，举拳而倒，由脑和胸部流出鲜血不止，不大一会就死了。宪兵队长让手下人开具证明王厅长当庭逞凶伤人，制止无效，开枪镇慑，误伤毙命。然后叫我和刘小胡签字作为证明。我们两个人当时吓得颤颤兢兢魂不附体，不得已在上边签了字。我回到家里余悸多日难消，每当提起此事心神剧变，难以平静。"

我听了杨乃时这番话，才解开了王宾章不知去向之迷，为王

宾章遇害感到悲愤。

克山"一二·二〇"大逮捕事件

马 集 明

1940年12月20日，日本关东军驻北安宪兵队长和田昌雄、伪北安省警务厅长大烟苏一，按照关东宪兵司令和伪满洲国警务司长的指令，对讷河、克山等地抗日救国会员和支援抗联的爱国民众进行了疯狂的大逮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二〇"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中共讷河地下中心县委，克山、讷河两地的群众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遭到破坏。一些共产党员、抗日救国会员和一大批爱国群众先后遭到逮捕、监禁、判刑和屠杀，成为四十年代日伪统治集团血腥镇压抗日民众的大暴行。现将这一事件的简要情况叙述于下。

事件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第十二军，在李兆麟率领下由东满西征，于1938年底挺进小兴安岭西南麓的南北河、朝阳山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在广阔的嫩江平原、讷漠尔河两岸，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给苦难深重的民众带来了希望，广大民众纷纷起来以各种形式开展支援抗日联军的活动。中共北满省委决定在这一地区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

支援抗联，开展武装斗争。1939年党组织派下江特委组织部长方冰玉（原名姜桂和，化名李相坤）协同抗联部队战士高木林（原名高仁忠，化名王树民）到讷河五区（今龙河乡）建立了中共北满省委特别支部。1939年6月中共北满省委决定将地下党的活动由讷河、克山扩大到嫩江、甘南、德都、布西一带，派出抗联六军一师三团政治部主任尹子奎（化名李俊峰）、指导员陈静山（朝鲜族，女）等同志，到讷河天字19号（现讷河友好乡友好村）抗日救国会员赵连贵家与方冰玉接头，共同筹建中共讷河地下中心县委。尹子奎为负责人，陈静山为地下党交通员；尹子奎与陈静山假扮夫妻（后正式结婚），到讷河县登科村任家粉房（现讷河县二克栈乡富国村）开杂货铺做掩护，设立县委临时办事机关。11月，中共北满省委正式委任尹子奎为中共讷河中心县委书记，方冰玉为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欧某为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后县委决定：高木林为县委青年部长，陈静山为县委妇女部长。

1939年10月，方冰玉、高木林按照县委的安排，来克山开辟工作，他们到克山之后，先和救国会员林太在县城北市场开设三义合成衣铺，做为党的秘密联络点，以后高木林又进入克山平安电影院，以“照座”工人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发展了姜树凯等3人为抗日救国会员，秘密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此外，方冰玉、高木林还先后在克山北兴镇、泰安镇（现依安县城，当时隶属克山）东发店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在孙家村（现发展乡）的小油坊屯、孙家屯、北兴村的张老道窝棚、候宝清屯和曲秉村（现河南乡）、郑家村（现河北乡）、刘大村（现北联乡）、长发村（现西建乡）、西城村、月亮泡等地发展了魏铭臣、刘世忠、丁子刚等40余人为抗日救国会员，建立了抗日群众的秘密组织——抗日救国会。并于1940年9月在克山北兴镇成立了克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克山北部各救国会的领导和地下党的联络工作，高木林为会长，魏铭臣、杨景山担任交通联络工作。

在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会员和广大爱国群众，不顾身家性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是，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除奸活动。先后印发了《告北满同胞书》、《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等宣传品；成立了除奸团，先后除掉了11名民愤大、做恶多的汉奸特务。二是，为抗联部队搜集情报，作向导。1939年8月22日，抗联六军参谋长冯志刚、三师师长王明贵和十二团团长王钧率六军十二团攻打北兴镇时，抗日救国会员吕友、爱国渔民程柏山用船帮助抗联部队渡过了讷谟尔河。1939年10月王钧根据抗日救国会员史振举和群众提供的情报，取得了攻打西城镇的胜利。打入伪克山县北兴镇警察署的抗日救国会员魏铭臣，借伪警察的合法身份，不断把从敌人内部得到的情报，秘密传递给地下党和抗联部队。1940年3月中旬，抗联三支队长王明贵、参谋长王钧率部队攻打北兴之前，先到讷谟尔河的哈利屯找达斡尔族老人，抗日救国会员巴喀布了解了北兴镇内敌人的兵力部署、防御设施情况，并由巴喀布引路，顺利地打进了镇内，全歼了北兴的敌人。三是，为抗联部队施医送药，掩护伤病员。1940年11月15日，抗联九支队长边凤祥率战士六七十人袭击了克山县杜保董屯（现涌泉永丰村管内），将克山县守备队和伪军、警察队200余人击溃，敌人死伤18人，其中击毙日军军官1人。九支队伤3人，牺牲1人。抗联战士陈忠龄因伤重不能随军队行动，附近屯子里的王大娘不顾性命危险，把陈藏在家里养伤，后来因为敌人搜查很紧，王老大娘和一农民又把陈转移到林子里，搭起窝棚藏起来，送饭送药。经过两个月的休息疗养，陈伤好返回抗联部队。侯宝清屯的中医贾焕文经常给抗联战士治伤治病，并几次去北兴、克山等地为抗日联军购买药品和配制红伤药（贾在大逮捕中巧计脱逃，幸免于难）。四是，为抗联部队采购和捐献物资，支援抗战。中共讷河地下中心县委联络员赵连贵潜入克山城内，住在福兴栈，负责地下党和抗联部队的情报联络工

作，并以拉脚做掩护，将采购的粮食、布匹、鞋帽和鞍鞯等物资运送给山里的抗联部队，并动员了12名青年农民参加了抗联。爱国绅士侯宝清在地下党和抗联部队的抗日救国的行动感召下，也积极主动地拿出一些粮食、衣物资助抗联部队，并把自己的坐骑送给抗联领导同志。抗联三支队每到侯家屯，他都帮助安排食宿。抗联三支队领导王明贵、王钧有时住在他家，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抗联部队的抗战行动大得人心，他们打开西城、北兴之后，当地群众和商店均拿出一些衣服、靰鞡、毡袜、棉帽等物品，慰问自己的子弟兵。

抗联部队在地下党、抗日救国会和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和有力支援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取得了两打北兴、夜袭西城、智取刘大柜、攻克杜保董屯、火烧荣家窝棚伪警察署六次胜利，威名大振，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更加坚定。日伪反动当局则对此慌恐不安，又恨又怕。他们除了调兵遣将追剿抗日联军外，为切断抗日救国会、广大爱国群众跟地下党、抗日联军的联系，由克山伪警务科特务股调派了一批特务警察专门组织了一个"特搜班"，并网罗一些地痞流氓，民族败类、大烟鬼，如魏广兴等人充当密侦，冒充抗联人员或装扮成卖火柴、煤油的小贩到北兴、长发、西城、刘大柜等抗联部队活动区域，进行特务活动。北安日本宪兵队派宪兵军曹佐佐木带伪克山特务股特务杨永江到北兴坐阵指挥，日伪反动势力，狼狈为奸，搜捕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救国会员和爱国群众。在此期间，抗日救国会员、中共讷河地下县委联络员赵连贵的行踪被特务魏广兴发现，日本宪兵佐佐木和特务杨永江派出大批警察特务在全县范围内搜捕赵连贵。1940年2月5日，赵连贵在克山街内福兴店被捕，起出匣枪一支。当夜将赵带到克山日本守备队严刑拷问，并将赵妻徐青贤的裤子扒下，用火烧，惨无人道地拷打。赵连贵和妻子英勇不屈，没有向敌人供出地下党、救国会和抗日联军的任

何情况。由于敌人无证，过了一个多月，赵连贵夫妻被释放。日伪特务机关抓不到地下党和抗联活动的具体事实，便无所不用其极。1940年2月28日，在抗日联军第二次攻破北兴后，日本宪兵佐佐木和特务杨永江在北兴指挥警察特务，把给抗联部队送水送饭的，给过衣服、鞋袜的，以及他们认为有嫌疑的无辜百姓，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70余人，进行毒打逼问，后因抓不到任何证据，只得将其中绝大部分释放。

为了给日伪反动势力以更大的打击，扩大抗联部队的政治影响，鼓舞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胜利信心，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三路军指挥部决定攻打克山县城。当时克山县是伪北安省会的西边门户，日伪政权吹嘘为“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克山城内驻有日本守备队、伪军团部和伪警察等反动武装力量近千人。为了做好攻打克山的战斗准备，在1940年6月，负责攻打克山的抗联三支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参谋长王钧在讷河县南阳岗屯与中共讷河地下中心县委领导人尹子奎、方冰玉会面，共同商议研究攻打克山县城的作战计划，决定将侦察克山城内敌情的任务交给住在克山城内的地下党员高木林和克山平安电影院的抗日救国会员姜树凯等人去完成。经过一段紧张的侦察工作，高木林、姜树凯等将敌人的兵力部署、地形位置、防御设施以及我军进城路线画成草图，于7月下旬赶到讷河县头站（现讷河县九井乡祥云村），交给王明贵、王钧和方冰玉，并详细汇报了情况。抗联三支队据此特制订了作战计划。9月2日，高木林与姜树凯到张老道窝棚（现曙光乡民权村）向王明贵、王钧进一步汇报了城内敌人的城防工事、兵力配备情况，确定了攻打克山县城的行军路线、隐蔽办法、进城地点、攻打目标等作战方案。21日凌晨，三支队动身准备向克山方面进发，此刻与抗联九支队相遇，九支队领导有政委高禹民、支队长边凤祥，随队的还有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冯仲云政委当即召开了三、九两个支队的干部会议，

由王明贵、王钧汇报了攻打克山县城的计划，冯仲云表示同意，并部署九支队也参加攻打克山的战斗，同时讨论修订了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冯仲云担任攻城总指挥，王明贵任攻城军事指挥，由高木林、姜树凯作向导。于9月25日夜，抗联部队由克山北城墙豁口进城之后，兵分两路，采取猛攻猛打、速战速决的战术，攻打伪满军十九军一个团部，直扑伪县公署、警务科、警察署、中央银行克山支行、兴农合作社和监狱，击毙日伪军二三十名，烧毁汽车一辆，缴获迫击炮四门，步枪百余枝，子弹万余发，手枪16枝，解放了在押的218名群众，取得了名闻东北，威震敌胆的夜袭克山之战的胜利。

事件经过

抗联部队夜袭克山，敌人气急败坏。破城第二天，在伪克山警务科特务股长中山五郎、特务杨永江指挥下，出动了大批特务、警察在克山城乡进行大搜捕，他们在城郊将已逃出监狱因腿伤不能行走的抗联九支队副官段新阳抓住，带到克山日本守备队砍头示众，并在城内逮捕无辜市民十余人。日本关东军和伪国务院的头目们得知抗联攻破克山的消息大为震惊，急忙派出由伪国务院监察参事官和伪警务司督察参事官组成的调查团来克山调查，同时派出伪警务司特务科大特务、警正铃木介寿随同调查团前来。调查团到达克山后，撤销了宋国程的伪克山县警务科长、刚植（日本人）科附、林延长伪克山警察署长的职务，并留下铃木介寿在克山督促破案。在铃木介寿指挥下，北安日本宪兵队、伪北安省警务厅、伪克山警务科派出大批宪兵、特务、警察在克山城乡侦察搜捕地下党员、救国会员和爱国群众。11月11日，中国讷河地下县委青年部长高木林不幸在北兴村赵贵屯（今曙光乡兴华村）王发家被日伪宪兵、特务逮捕，押到克山，由日本人和特

务杨永江审讯，因高事先已将枪支隐藏起来，日伪又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准备教高木林取保释放，就在这时，抗联九支队支队长边凤祥的秘书尚连生叛变（他曾负责过抗联和地方党的联络工作）只身逃到北安，向日本宪兵队密告了中共讷河地下中心县委的情况，并带领北安日本宪兵队的人去讷河抓中心县委书记尹子奎。当他们路经克山，高木林在监狱被尚连生发现向日寇告密。第二天，敌人再度对高木林严刑烤打，在叛徒尚连生当面对质的情况下高木林变节，向敌人供出了中心县委和抗日救国会的一些情况。11月28日，日本宪兵由叛徒尚连生引路，将讷河中心县委书记尹子奎、县委妇女部长陈静山逮捕。12月8日尚连生又带两名日伪特务去依安将县委宣传部长方冰玉逮捕。至此，中共讷河地下县委，克山、讷河两地抗日救国会组织均遭破坏。大特务铃木介寿和北安日本宪兵队在克山督促侦察、连续抓人，并迅速将情况电告日伪最高当局。伪警务司电令铃木介寿继续留在克山破案，并派出警务司特务科负责共产党组织关系的大特务岗本前来克山协助审讯。12月中旬，日本关东宪兵司令和伪满洲国警务司长密令北安日本宪兵队长和田昌雄、伪北安省警务厅长大烟苏一，会同齐齐哈尔宪兵队、驻北安的横山部队，以1940年12月20日为期，对克山、讷河两地的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救国会员以及与抗日联军有联系的抗日群众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式的大逮捕。和田昌雄和大烟苏一根据这一密令，做了大逮捕实施计划。此次逮捕45名，加上20日前已被捕的8名，共计53名。并从北安日本宪兵队抽调23人，从伪北安省警务厅特务科抽调23人，从驻北安的横山部队抽调50人，共计106人参加逮捕活动。12月19日，北安日本宪兵队中尉渥美就"大逮捕的细节事项"向参加大逮捕的宪兵、特务做了布置。12月20日拂晓，他们分乘十几辆汽车，由克山特务股的特务引路，在克山县城、西城镇、北兴村刘大村（现北联、涌泉乡一带）、孙家村（现发展乡）、长发村（现西建乡）、郑家村（现

河北乡）、月亮村（现种畜场一带）、曲秉村（现河南乡）进行突然袭击式的大逮捕，仅这一次就在克山逮捕地下党员、抗日救国会员和爱国群众一百余人。北兴镇的地下党联络点“克北委员会”的联络员魏铭臣、杨景山，克山城内的抗日救国会员姜树凯、林太，北兴镇抗日救国会员刘世忠，孙家村的抗日救国会员丁子刚，以及与地下党、抗联部队有过联系的开明士绅侯宝清、抗日群众柏俊清等均被逮捕。之后，敌人将被捕人员分别送往北安日本宪兵队和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他们残无人道，酷刑逼供，如用木梓子打，凉水灌，开水烫，用火烧，压杠子，过电刑等，当时致死者有王增福、王殿举等人。据此次被捕的幸存者柏俊清目睹：一名同时被捕的爱国群众，在北安日本宪兵队被打得死去活来，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在敌人刑讯室，渴得无奈喝了半盆洗手水，当场炸肺而死。北安日本宪兵队、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对被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救国会员和抗日群众进行残酷刑讯后，将案件移交给伪齐齐哈尔高等检察厅。1941年8月16日，伪齐齐哈尔高等法院治安厅判处中共讷河地下县委书记尹子奎死刑（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方冰玉被捕后被敌人押往北安日本宪兵队秘密处死），魏铭臣被判徒刑12年，高木林、刘世忠、杨景山被判徒刑10年，丁子刚被判徒刑8年。其他大部份被捕的爱国群众均被哈尔滨、齐齐哈尔伪高等法院判处徒刑。不少人在监禁期间被折磨致死。据这次事件被捕判刑的幸存者柏俊清说，仅他知道，死在敌人监狱中的就有七个人。在狱中苦熬活下来的胡景礼、张宝云、张金贵，终未逃脱虎口，亦于日伪垮台前夕的1945年的6月和7月间，被枪杀在泰康监狱。

继“一二·二〇”事件之后，日伪为扑灭抗日的火焰，于1942年和1943年又进行两次大逮捕，疯狂杀害抗日群众和他们认为的“嫌疑分子”，被害者达一百余人。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用屠杀镇压人民，但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怒潮，终于受到惩罚。

张平洋在泰来

叶永才

1940年春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艰苦岁月，党派张平洋同志来到东北，在泰来、江桥一带长期潜伏，秘密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在那里燃起抗日斗争烈火。

张平洋，原名张希江，1910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县。早在青年时代，张平洋就思想进步，追求真理，于1933年参加了冀热辽边区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他公开参加了遵化县"道德会"，利用合法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张平洋隐蔽在移民中来到泰来后，仍以"道德会"讲道师的合法身份，接触泰来县的上层人物。当时，泰来县也有"道德会"组织，通过接触，张平洋很快就结识了会长。由于"志同道合"，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不久张平洋就被邀请参加了泰来县"道德会"，并被推举为理事会理事，主管"道德会"的常务工作。

从1941年春天开始，张平洋利用讲道和办草绳作坊的条件，广泛接触穷苦群众，在他们当中宣传抗日。张平洋的活动，引起了当地日伪头目们的注意，被列为"要视察人"，于1945年夏被捕入狱。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从此，过了14年亡国奴生活的东北人民见到了天日。日军投降后，张平洋出狱，开始了公开组织武装的斗争。

日伪统治垮台后，土匪和日伪残余立即勾结起来，四处抢掠，残害群众。张平洋想，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坐视不管，要趁此先把队伍搞起来，用实际行动迎接大部队的到来。于是，张平洋拿出了隐藏多年的手枪，往腰里一别，就四处去招集人马。几天后，他把和自己关系好的二十多名青壮年集中起来，成立了人民自卫队，他被推举为队长。

八月下旬的一天，一伙04多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侵略者，沿铁路向五庙子方向逃窜。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得知消息后，张平洋立即把队伍拉了出来，埋伏在五庙子车站南段的铁路两侧。不可一世的鬼子兵在当官的唆使下，发疯般地狂奔，很快就进入了自卫队的埋伏圈。当敌人完全钻入口袋之后，张平洋高举手枪，大喊一声“打”，自卫队员一齐开火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鬼子兵一下子乱了套。这时张平洋又高喊一声“冲”，第一个跃出草棵，率领自卫队员向敌群冲杀。在混战中，张平洋看见几个鬼子兵扛着浇上汽油的秫秸捆子，向路边的粮库跑去。“敌人要烧粮，快追！”张平洋带几个战士冲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就将那几个鬼子打死，保住了粮库。然后，张平洋又急回铁路边，继续指挥战斗。经过激战，日寇死伤大半，少数冲出包围圈落荒而逃。这次战斗，自卫队缴获各种枪支40多，改善了自卫队的装备。此后，张平洋又带领自卫队打了十几仗，都取得了胜利，自卫队也由20几人扩大到60多人。

在与日伪残余和土匪战斗的同时，张平洋还积极开展救济难民活动。对当地断炊的贫苦农民，他打开粮仓挨户分粮，对过路回家的“劳工”和“奉仕队”，他在学校架起锅灶，做饭救济。他的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群众从切身体验中感到共产党好，八路军好。

不久，张平洋听到党派王明贵等同志来到齐齐哈尔开展工作的消息，他如同久别亲人的孩子一样，激动得简直要跳起来。他历经磨难，总算熬到了这一天。他很快来到齐齐哈尔，与王明贵取得了联系并汇报了工作。这时，王明贵正在着手组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张平洋在泰来组建的自卫队编入人民自卫军。

1945年11月上旬，嫩江省军区正式成立，下设4个军分区，张平洋被任命为泰来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成立后，张平洋开展了大规模的扩军工作。经过宣传动员，泰来军分区所属部队已有800余人，完全可以独立执行战斗任务。

革命势力的发展壮大，使那些不甘灭亡的敌伪残余势力和土匪恨之入骨，他们更把张平洋视为眼中钉，于是以伪县长韩岗镇、伪警务科长胡郁文为首的阴谋集团，秘密筹划了一个暗杀张平洋的罪恶阴谋。

1945年11月28日，披着泰来县维持会长外衣的韩岗镇，以“商讨军需”为名，邀请张平洋到福合轩饭馆赴宴。张平洋不知是计，落入敌人的圈套。张平洋带上一名警卫员按时赶到福合轩，当他入席不久，事先暗藏在角落里的匪徒傅国石向他连开数枪，张平洋倒在血泊中，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6岁。

1946年，泰来人民为了永远怀念张平洋，将他战斗过的五庙子改为平洋镇，在泰来火车站广场建立了张平洋纪念碑。

朱榕死因有结论

史为文

1940年4月，曾在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任过伪第四、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的朱榕，在东渡日本朝觐天皇的途中突然失踪。一时间舆论大哗，此后也议论纷纭，莫衷一事。

当时，日伪新闻媒介报道，朱中将腿疾（骑马摔断过），不慎坠海；社会上说是日本人拉完磨杀驴（1939年朱榕曾指挥伪军参加诺门汗对苏军作战，遭失败），当汉奸的没有好下场；同情朱榕并了解他身世的人，都认为这是他自己摆脱降敌耻辱的较好选择，末节不亏；朱榕的遗孀和女儿朱友后则肯定地说朱榕确实是自杀，因为她们听到过他行前的遗言，保留过他写给父亲的遗书。书中曾忏悔“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亲”，有“我是中国人，决不赴日朝觐天皇”等语。但是，当时她们不敢声张。

朱榕的父亲朱庆澜是清末协统，任过黑龙江省督军兼民政长（即巡按使、省长）、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常委等要职。“九·一八”后在北平组织辽吉黑热四省抗日后援会，为逐日复土奔走。

朱榕曾在吉林督军孙占鳌部下当团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延吉一带驻防。陷敌后未能遵父命逃脱，日寇遂强委高级伪职，以此招降朱庆澜。为断绝敌人的幻想，父子曾声言断绝关系。正因为父子殊途，朱榕又是这样一种结局，难怪世人关注和

猜测了。

最近，朱庆澜的女儿朱德君（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公子朱权（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宝山区政协副主席）抄寄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蒋中正（介石）发布的《渝字第367号命令》（载1941年6月2日国民政公报），全文如下：

> 朱榕为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驻防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敌营。去秋，寇以觐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烈，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朱的祖籍）忠烈祠，以彰忠孝而示来兹。此令。

如此看来，朱榕死因有结论，这段北方疑史可以解迷了。

（转自1991年4月1日《黑龙江政协报》）

苏联红军进入齐齐哈尔

叶永才　宋金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第2方面军）同时对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苏联红军攻占齐齐哈尔。

攻占齐齐哈尔，是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实施远东战役的决心之一。齐齐哈尔是日寇在黑龙江省西北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统治中心，地处滨洲、平齐铁路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齐齐哈尔是日军在黑龙江西北部防御的重点。

日军独立第4军（辖3个师团4个旅团）军部设在齐齐哈尔，其兵力主要部署在滨洲铁路沿线和爱辉（黑河）、孙吴、嫩江等地。具体部署是：以1个师（步119师）和1个旅（混80旅）配置在满洲里、海拉尔和博克图等铁路沿线地区；以1个师（步149师）和1个旅（混131旅）配置在齐齐哈尔至哈尔滨地区；以1个师（123师）和2个旅（混135旅和混136旅）部署在孙吴、爱辉和嫩江地区。此外，伪满洲国军还有5个团，分别部署在满洲里、海拉尔、牙克石和齐齐哈尔。日军的企图是阻止和迟滞西、北两线的苏军向齐齐哈尔方向的进攻，以保障哈尔滨、长春、沈阳的侧翼安全，并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与苏军决战。

苏联红军针对日军的部署和企图，决定从西、北两个方向同

时发起进攻。苏联红军的企图是将独立第4军迅速歼灭在齐齐哈尔以西、以北地区，夺取齐齐哈尔，以保障方面军的侧翼安全，配合方面军主力全歼日本关东军于东北平原。

根据上述企图，进攻齐齐哈尔的苏联红军部署和任务是：西线，集结1个集团军（即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第36集团军，辖步兵第2军、第86军，步兵第293师、第298师，第31和第32筑垒地域部队，坦克兵、炮兵和其它兵团），其任务是：由达乌里亚和杜罗依东北地域向满洲里、海拉尔方向实施突击，目的在于迅速夺取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等地，进而攻占齐齐哈尔，以保障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侧翼安全。北线，集结1个集团军（即远东第2方面军所辖红旗第2集团军：辖步兵第3师、第12师、第396师），其任务是由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康斯坦丁诺夫卡和波亚尔科沃地域向齐齐哈尔方向实施突击，其目的是将爱辉、孙吴、嫩江等地的日军分割围歼，以保障第36集团军的侧翼安全，进而夺取齐齐哈尔。

苏联红军为实现战役企图，8月9日凌晨，第36集团军未经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火力准备，在西线突然发起进攻；进展顺利，挫败当面日军掩护部队的抵抗。右翼一举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筑垒地域，向纵深发展进攻；左翼（36集团军主力）强渡额尔古纳河直插海拉尔，为了迅速攻占海拉尔，该集团军的快速集群（编有坦克第205旅，车载步兵团、炮兵团、高射炮团，自行火炮营、火箭炮营和工兵连）实施迂回，于8月10日，出敌意料突入该市外围，开始了夺取海拉尔筑垒地域的战斗。8月11日，第36集团军主力逼近海拉尔，与日军在海拉尔车站、西山和北山展开激战，由于日军工事坚固，加之顽强抵抗，海拉尔未能立即攻克。为了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该集团军留下两个师围攻海拉尔（于8月18日迫使海拉尔筑垒地域守敌6千余人投降），主力继续向齐齐哈尔方向发展进攻。8月12日上午，集团军司令户钦

斯基中将命令部队“强行通过大兴安岭”。于是，该集团军以两个师的兵力迅速攻占大兴安岭各山口要道。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但未下令关东军停止抵抗，苏联红军继续进攻，于8月17日前，攻占了牙克石、伊列克得，8月17日攻占博克图。与此同时，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快速集群，避开日军的防地，分两路向齐齐哈尔方向急进。其一路由伊列克得经26号区域到达博克图；大东沟另一路由沙力车站经博克图西沟至大东沟 。两路会合，作暂短休整，继续进攻，于17日晚9时抵达嫩江西岸的梅里斯屯。并对富拉尔基、昂昂溪和齐齐哈尔实施侦察。于此同时，集团军主力8月17日攻占雅鲁、扎兰屯，18日下午5点抵近昂昂溪，8月18日，集团军完成了对齐齐哈尔、昂昂溪、榆树屯地域的日军分割包围，迫使昂昂溪和榆树屯的守敌伪满洲国军哗变，击毙了团、营级日本军官和教官，向苏联红军投诚。8月18日下午，苏联红军快速集群的坦克第205旅的先遣分队，以10辆坦克 、20辆装甲输送车，20辆水陆两栖汽车，强渡嫩江，从南面向市区实施突击，并掩护主力通过齐齐哈尔江桥，迅速占领了飞机场，沿飞机场西侧向天齐庙方向实施突击，仅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对北市区合围的任务。

在北线进攻齐齐哈尔的苏联红军，8月9日，远东第2方面军编成内的空军第10集团军，对北安、齐齐哈尔的机场等重点目标进行了轰炸；齐齐哈尔机场跑道被炸毁。方面军所辖红旗第2集团军，在司令员捷籁欣坦克兵中将指挥下，于8月9日在布拉戈维申斯斯克（海兰泡）、康斯坦丁诺夫卡和波亚尔科沃地域夺取了登陆场。8月11日，集团军同时向齐齐哈尔和北安方向转入进攻，于当日日终前突破了爱辉筑垒地域，攻占了孙吴筑垒地域基本抵抗枢纽部 ，并以先遣支队向 齐齐哈尔和北安方面发展进攻。8月16日至19日 ，完成了对日军步兵第123师团和其它部队的合围，这些日军很快投降就俘（共歼敌2万人）。8月19日，

集团军之左翼攻入龙镇，20日攻入北安，22日进入富裕、齐齐哈尔；其右翼8月20日攻占嫩江县城，8月21日到达齐齐哈尔。

在此之前，进攻齐齐哈尔的苏联红军西线部队，已于8月19日上午进占齐齐哈尔，接受日军投降，受降仪式在齐齐哈尔日军总部院内举行。

日军投降以后，苏联红军控制了齐齐哈尔。为了稳定局势，苏军指定了临时负责人处理日寇投降的善后工作。指定齐日柯夫少校负责齐齐哈尔地区的军事管制和对日军俘虏及军事物资的处理工作；指定图利金中校负责对日伪特务、情报人员和机关人员的处理工作；任命巴错夫上校为齐齐哈尔卫戍司令，王明贵为副司令。

从1945年8月19日至1946年4月23日，苏联红军在齐齐哈尔共驻四个月。

我在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工作的前后

王 福 林

1945年8月中旬，当时我在伪满齐齐哈尔邮电管理局当司机，给局长开小车。这时我发现日军和伪市政官员有些反常活动，机关清理物品文件，日军不断用军车往外拉东西。大约8月13、14号，日军有一架双膀飞机往市区扔了三枚炸弹，一枚落在现在百花园前面，当时有一老人被炸死，一枚落在宝丰金店门前，另外一枚落在“二食堂”（现和平饭店）后面。这时老百姓纷纷议论说，日本人要完蛋了，“满洲国”要垮台了。果然没过几天，街上出现了苏联兵（后来才知道是苏联红军）。大约17、18号，我被找到市公安局，让我给苏联红军当翻译。因为我会俄语，我的俄语是在哈尔滨一家俄国人开的工厂学的。我生于哈尔滨，13岁进俄国人办的恒信汽车装配厂当学徒，学徒三年，也学会了俄语。我三年满徒后，正赶上齐齐哈尔人到汽车装配厂买车，我便开车到了齐齐哈尔，以后便在齐齐哈尔找到了工作。

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设在原伪满齐齐哈尔公安局（现在的市公安局）。苏联红军司令部和接收过来的市公安局都在一个楼内，两家各占一半。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司令官叫玛里亚新，是个1米80多的大个子，很魁梧。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北边。和我一起当翻译的还有：李国柱、宋贵、赵化朴、王子安、谢明山、齐梅

亚。我们这些翻译归公安局外侨处领导，但同苏军官员一起工作。主要任务是向他们介绍齐齐哈尔情况，随同他们处理有关同中国人交涉的事情。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的任务当时主要是：维持社会治安、接管收缴日伪宪特枪支、弹药，协同公安局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我记得每天都坐车同苏联军官一起出去办案，每次都收回很多武器，或抓来一些坏人。每天晚上，把收缴的武器和坏人集中起来，用车送到苏军大营（现81147部队院内）。每天都要派人押车，因为当时市内治安很混乱，每到晚上，日伪残余的兵匪、宪特和国民党的光复军就出来捣乱。有的拦路抢劫，有的搞绑架或暗杀，枪声不断。一个多月后才平静下来。

（宋金林整理）

西满军区述略

叶永才　吴铁男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于9月9日发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根据这一方针，从11月底开始，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动部队11万，干部2万，抢在苏联红军撤退前进入东北。12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要求“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要将正规部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自卫军”。遵照中央的战略方针，当时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于1945年12月成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军区。

进军齐齐哈尔

西满军区成立于郑家屯，机关分设司令部、政政部、供给部、卫生部。吕正操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张平化任政治部主任。为了尽快开辟西满根据地，西满军区必须进入齐齐哈尔。但是，齐齐哈尔由苏联红军控制，并被国民党接收，所以只有苏联红军撤退后才能北上。

1946年3月苏联红军撤离齐齐哈尔前夕，为了加强攻打齐齐哈尔的作战力量，西满军区派精锐部队西满二支队和特务一团提

前挺进齐齐哈尔，与嫩江军区部队组成联合攻城部队，由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明贵任副总指挥。4月24日，西满二支队和特务团做为主力部队，与嫩江军区部队密切配合，一举击溃了齐齐哈尔市内的3000余守敌，彻底解放了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解放后，为了加强剿匪部队的机动性，西满军区在特务一团中挑选了500名骑术好、枪法好的官兵，成立了一个骑兵大队，由特务一团副团长毛和发任大队长，与各省军区部队一起投入了剿匪斗争。

5月，西满军区机关从郑家屯出发，经洮南、白城子进驻了齐齐哈尔。

1946年3月，吕正操调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由黄克诚接任西满军区司令员。

西满军区的所属部队

西满军区所属的各部队，都是由具有光荣战史的新四军老部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严明的纪律。他们一开进西满地区，就深受人民的爱戴，而敌人则是闻风丧胆，狼狈而逃。

西满军区机关移驻齐齐哈尔后，首先调整充实各直属分区，统一了编制，配齐了干部。至1946年6月，西满军区下辖5个分区。每个分区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各分区都编步兵团1—3个，骑兵团1—2个。

一分区：司令员叶长庚，政治委员王鹤寿。

二分区：司令员王明贵，政治委员刘锡五。

三分区：司令员赵承金，政治委员赵连夫。

四分区：司令员沈启贵，政治委员顾卓新。

五分区：司令员王钧，政治委员朱子修。

兴安军区：司令员阿斯根，政治委员阿丰哈。

除各军区、军分区所辖部队外，西满军区还直属保安一旅（旅长马仁兴、政委邓东哲）、保安二旅（旅长刘述刚、政委罗克荣），另有特务一、二、三团和西满护路军。全区共有部队42,920人，各类武器3万件。

1947年8月4日，军区在昂昂溪组建了西满独立师，吴富善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共7,000人，武器装备齐全。

1947年9月，为了加强西线战地后勤工作，根据东总第44号命令，以西满军区后勤部为基础，成立了西线战地后勤司令部，倪志亮任司令员，李梓斌任副司令员，张汉丞任参谋长，潘振斌任政治部主任。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重新划分各军区的管辖区域，西满地区包括龙江、嫩江、辽吉、兴安四省，区内人口803万，东西1500公里，南北3400公里，江防1500公里。

剿匪作战

1945年"八·一五"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向东北派遣了大批党务、军事特务分子。他们潜入各地招降纳叛，网罗伪军警宪特、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建立了诸如"光复军"、"挺进军"、"先遣军"、"保安军"等名目繁多的建军土匪武装。在齐齐哈尔地区，只"光复军"第三军，后改为第一战区第一军，就有兵力18,000余人。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小股土匪，他们顽固地与我党我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坚决彻底地消灭土匪，是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在东总和中共西满分区的领导下，西满军区部队从1945年12月起，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在各级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下，各部队剿匪斗争进展迅速，捷报频传。至1947年1月，西满

军区部队作战825次，击毙蒋匪官兵8,714人，击伤6,103人，生俘9,066人；缴获马步枪13,554枝，轻重机枪394挺，冲锋枪126枝，美式步枪993枝，其它枪支9,219枝，各种火炮110门，掷弹筒54具，各种子弹726,627发，各种炮弹1,588发，信号弹22发，手榴弹714枚，战马5,163匹，汽车19辆，马车328台，被服及其它军用品无数。

在剿匪斗争中，部队走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帮助驻地党和政府建立农会，建立民兵自卫队组织。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也有力地推动了剿匪斗争的开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123,000名民兵自卫队员和400,000农会会员参加了剿匪斗争。据统计，他们从汉奸、恶霸、土匪手里缴获枪支1万有余。

至1947年3月，西满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使根据地得到空前巩固。

大生产运动

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轻群众负担，西满军区广泛动员各部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让南泥湾精神在祖国的北大荒生根、开花、结果。

为了加强对大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各部队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订了生产计划，确定了以农业为主，以加工业、手工业为辅的方针。并层层召开动员会，层层抓好生产计划的落实。1947年的春天，是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第一个春天，整个西满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部队开荒种地的场面。如军区政治部出动51人，每天开荒15亩。又如二分区所属部队开荒种地1,672垧，而且还开展了放木排、打柴禾、磨豆腐、开粉房、开油房、熬碱、打鱼等副业生产。

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弥补了部队给养不足的困难，不同程

度地改善了部队生活，增强了部队战斗力。在生产劳动中也使官兵的思想作风得到了锻炼，使他们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同时，也密切了军民关系，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些地区还开展了军民生产竞赛、互帮互教活动。嫩江县的一位农民感慨地说："我活了60多岁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又能打仗，又能种田，这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呀！"

加强军民团结

西满军区各部队，是以新四军老部队为基础扩建起来的，具有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但是，军区还是时刻注意从严要求部队，经常征求群众意见，检查群众纪律，使根据地的军民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状态。

1946年12月，是西满军区移驻齐齐哈尔的第8个月。24日，西满军区政治部根据中共西满分局的指示向全区部队发出了《关于开展拥政爱民月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西满军区政治部强调部队要做6件事：一是各部队要排练一些文艺节目，与驻地群众搞好军民联欢；二是对部队深入进行拥政爱民教育，组织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誓；三是召开军政军民座谈会，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四是认真进行调查，检查群众纪律，搞好赔偿道歉工作；五是加强防范工作，搞好地方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六是选举拥政爱民模范，大力宣传好人好事。又在此基础上，各部队还结合驻地的实际情况，制订拥政爱民公约。

为了把拥政爱民活动月开展得扎扎实实，西满军区机关抽出一百多名干部，组成40个小组，对驻齐各部队的群众纪律进行了大检查。在7天的时间里，调查组走访了全市三分之二的居民，调查了36条街，6个村，三个屯，3个铁路住宅区，共查出877家的1,945件物品不同程度地受到部队损坏的问题。对于这类事

情，军区要求各部队召开赔礼道歉大会，然后切实赔偿。对有困难的部队，军区又为他们总共拨出10,000元现款。在这项工作中，绝大多数群众都拒绝赔偿，他们说："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损坏点东西还赔什么，部队打仗流血牺牲，连命都不要了，不都是为了我们吗？"部队的同志反复做工作，说："这是共产党军队的规矩，你们如果不收我们就要挨批评受处分！"群众这才都勉强收下。

在部队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时，地方政府也组织广大群众掀起了拥军优属热潮。在齐齐哈尔市内，浴池、电影院免费或半费优待军人，小学生组织演出队到医院慰问伤病员。1947年5月，齐市商界人士筹白面9,000斤，派代表慰问军队。7月，齐市各中学还联合成立了一个180人参加的战地服务团，分成4个大队，携带各校师生捐赠的新书1,000册，歌本3,000册，慰问信300封，各种小礼品250件，分别深入到前线慰问我军官兵。在前线的日子里，学生们为部队演节目，搞联欢，扭秧歌，开座谈会，并且把齐市人民托他们捎去的21,430双军鞋送到指战员的手里。

西满军区各部队在进行剿匪斗争的同时，从1946年7月起，抽出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帮助人民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和训练民兵，教翻身农民学习文化。

1947年9月，西满军区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奉命撤销建制，所辖部队进行整编后随大军南下，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从齐齐哈尔卫戍区到西满军区

吴富善

我谈的，主要是1945年至1948年齐市地方武装及西满军区的情况，其中包括地方武装的建立、编制、主要任务、主要首长的变动等情况。

1545年，东北局决定，东北成立三个卫戍区：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员吴富善，副司令员王明贵；沈阳卫戍区，司令员邓华；哈尔滨卫戍区，司令员倪浩廷。几个卫戍区的主要任务是大搞军队，也就是扩军，当时组建了四五个骑兵师。

1946年，齐市成立了一个旅，由我任旅长，驻在城东四家子屯一带。它的任务主要是扰乱国民党部队，教他们在城里呆不安宁。我们在城外不断地炮击敌人，有一次打得太厉害了，国民党头目到苏军司令部，要求苏军赶走我们，但我们没有听他们的命令，他们也毫无办法。

同年6月，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部改为城防司令部，王明贵兼城防司令，我是警一旅旅长兼政委，主要任务是负责城防，保证安全，消灭残余土匪。

11月，嫩江省军区成立，司令员王明贵，政治委员刘锡五，副政委朱光，参谋长王化一。后王化一调到警一旅当副旅长，省军区参谋长由兰廷辉担任，并兼城防司令。

1945年底，嫩江省委书记是刘锡五，嫩江省军区司令员是王

明贵。

当他们撤出齐市时，我继续留在齐市，穿上便衣做秘密工作，主要是了解国民党活动情况、武装情况，开始我住在苏军司令部里，后来把我赶出来了，不让我住。接着我又住在一名苏联翻译家里，继续工作。

当时国民党在齐市扩建部队，兵源主要是伪警察，约有一两千人，住在日本13部队，搞破坏活动。

1946年4月苏军撤出后，我们又收复了齐齐哈尔市。军区进行了改组，司令员倪志亮，政委郭述申，参谋长李聚奎，主任朱光。然后成立了军分区。

第一军分区在林甸，司令员吴富善兼政委，参谋长冉泽，主任于光汉，副司令王化一、宋康。管辖龙东（昂昂溪）、林甸、富裕、泰康，组建两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吴富善还任地委书记。

第二军分区在朱家坎，司令员张汉丞，辖1个团，是从林甸、讷河抽来的。

第三军分区在讷河。

同年，嫩江军区编入西满军区，组建了第三师（在昂昂溪），部队从林甸、朱家坎调1个团，从北安调来两个团，吴富善任师长兼政委，朱民亲任参谋长。

1948年。西满成立了野战军，部队3个师，野战军司令是邓华，政委是陶铸，副政委是吴富善，主任是袁新平，高提前是参谋长。

第二次南下后，西满军改为第七纵队，邓华是司令员，政委是吴富善。

同年，西满军区编制，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管辖三个分区：嫩江分区、北满分区、北安分区。主要任务是组建地方武装、民兵，队伍约有一二万人，进行剿匪和维持治安工作。

1945年，苏军驻齐齐哈尔一个师，由少将法明格领导。

1985年9月9日于北京

（叶永才 整理）

齐市的地方武装

顾 卓 新

我在1946年2月担任辽北（四平）省委副书记，这月撤到白城子。1946年5月份，嫩江省和辽北省合并，我任嫩江省委副书记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1946年八九月份搞土改，主要在富拉尔基、泰来、龙江、龙东、景星，后来又在龙江县、朱家坎、碾子山、李三店搞土改。

1947年2月份，我调到三肇地委。嫩江省委由刘锡五担任书记，同年11月我调回嫩江省，担任副书记兼任军区政治委员。1948年9月份至1949年5月份我调到沈阳，在东北人民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

1945年冬，齐市成立了地方武装，叫大队，各县叫县大队，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当时大队里的人员很复杂，成份不好的，光复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也都招了进来，因此出现了少数县大队叛变的事。如讷河的区委书记(名字记不清了)和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就是被叛变分子打死的；又如安广县县大队叛变，把县委书记刘玉堂打伤了，后送往富裕养好，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原因是当时急着扩大队伍，对每个人都没有认真地去审查，另一个是那时干部很缺，派不出去，所以使得很多同志牺牲了。

1946年，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副书记顾卓新，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顾卓新，副政委邵士平，副司令员王明贵，

政治部主任朱光。

第二次成立地方武装是在1946年。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对人员认真审查，杂乱人员坚决不要，只要贫农，中农都不要，所以队伍很可靠。当时还成立了二线兵团，龙江1个团，讷河1个团，齐齐哈尔1个独立团。全东北共成立1百多个团，主要任务是训练剿匪，成熟后充实到野战部队，四野的兵就是这样来的。后又成立了两个骑兵团，打击土匪、光复军和棒子队。

1947年，齐齐哈尔市委书记是朱光，王盛荣担任副书记，1948年5月份刘型担任市委书记。

1948年八九月份省军区首长，顾卓新兼政治委员，司令员冯志湘，副政委朱继光，还有一位政治部主任，名字记不清了。

二线兵团的另一项任务，是搞武器、粮食、衣服，支援部队，而且抽调干部南下。

1985年9月7日于北京

（叶永才　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的地方部队

叶永才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齐齐哈尔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方针的指引下，开辟最早的根据地之一，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革命根据地，这跟建立起一支地方人民军队有密切关系。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齐嫩地区的地方部队担负起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1945年8月17日，党派王明贵、张瑞麟、王文珍、李长德、王坤、贺金来、吴自明、苏广东、王起有、孙兆志、刘庆丰、李洪生、曹庭祥 、 刘和义等17名同志随苏联红军一起进入齐齐哈尔。王明贵同志的合法身份是苏联红军驻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主要任务是就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

要在当时的齐齐哈尔建立人民军队，谈何容易。首先，必须经苏联红军同意，否则就将被视为不友好甚至非法行为；第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14年统治和欺骗宣传，需要提高群众觉悟；第三，要建立军队就必须有武器，而当时王明贵同志手中却一无

所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王明贵同志毫不退缩，千方百计去创造条件。他先是多次找苏联红军最高指挥官，说明我党建立人民军队有利于搞好治安，有利于保护铁路秩序，有利于配合苏联红军剿匪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经过王明贵同志的积极工作，终于得到了苏联红军的同意。紧接着王明贵同志又提出了枪支弹药的问题，也得到了苏联红军的支持与合作。

三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两个，剩下的就是人的问题了。为了尽快把队伍建立起来，王明贵同志在社会治安非常混乱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多次深入工厂、学校和市民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奋斗目标，宣传穷苦人要翻身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的道理。经过几天的工作，他动员出100多名最先觉悟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成立了一个连队。与此同时，王明贵同志又以苏联红军卫戍司令部的名义，派乔明远同志接管了伪警察厅，并将其改称为嫩江省公安局，由乔明远任局长，改编了600余人的警察队伍。当时，铁路的秩序很坏，滨洲线的安全没有保障。鉴于这种情况，王明贵同志又与苏联红军协商，组建了有700余人的护路大队。不久，长期潜伏在泰来县五庙子一带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平洋同志率领一支农民武装，找到王明贵同志，又进一步增加了力量。

在具备一定基础的情况下，王明贵同志为了对这些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必须统一编制，确定编号。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为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并在9月下旬正式宣布成立。以后设立了司令部，王明贵任司令员。

嫩江军区的建立

1945年10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相继到达指定地区，刘锡五等嫩江省党政干部就在这时来到了齐齐

哈尔。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齐嫩根据地，经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批准，嫩江军区于1945年11月9日在齐齐哈尔成立，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五任政治委员，朱光任副政治委员，王化一任参谋长，朱新阳任政治部主任。嫩江军区的成立，标志着齐齐哈尔军事历史的新纪元，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事领导机关。

初建时，嫩江军区辖泰来、讷河、龙江、白城子4个军分区，共有部队千余人。军区成立不久，为了维护治安，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打击惯匪恶霸的反动气焰，于11月23日枪决了窝聚土匪、阴谋暴乱的汉奸高吉川。通过这一举动，迫使一些国民党反动分子操纵的非法组织停止了活动，一些想改恶从善的日伪人员也开始向政府靠近。特别令人鼓舞的是，通过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很好地起了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一些群众开始敢于公开或秘密地揭发坏人坏事了。

1945年11月末，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定》，要求我嫩江军区在限定时间撤出齐齐哈尔，要将齐齐哈尔及嫩江省移交给所谓的国民党合法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嫩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1月29日召开了高级军政会议。会议对齐市及嫩江省的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发展部队，加强部队的巩固工作，实行建军、剿匪、发动群众三个统一体的工作方针，深入广大农村，建立农村据据地，为最后战胜敌人、夺取城市积极创造条件。

12月末，除留部分人员坚持齐齐哈尔市的地下斗争外，嫩江省及齐齐哈尔市的党政军机关全部撤离齐市，迁往由王明贵同志率部队解放的甘南县城。

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率高凌昭、宁向南、苍宝玉、赵德厚、张维仁以及一个连的“铁石”部队进入齐齐哈尔。彭济群等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对齐市和嫩江省人民的

统治，一进城就着手扩充部队。很快，他们将马川越、尚其悦、卢兴舟、张伯藩的各路所谓先遣军、挺进军、光复军等进行改编，建立了嫩江省保安警察总队（后改为保安军），共有3000余人。这些土匪部队被收编后，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搔扰破坏活动。其中最猖狂的有活动于泰来、林甸、讷河、拜泉等地的尚其悦部，有活动于洮南、白城子、安广、镇赉、大赉等地的李树藩部，有活动于龙江、甘南、李三店、朱家坎、扎兰屯等地的张伯藩部，有活动于免度河、牙克石、博克图等地的宋同山部，总共有17000余人。

嫩江军区部队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转战于嫩江两岸，不断取得优异战绩。至1946年3月，王明贵指挥部队相继收复了嫩江、甘南、讷河、林甸、富裕、泰来、龙江、景星、布西10县，迫使敌人残部逃往其它地区或退守齐齐哈尔市内。齐齐哈尔市已成了一座孤城。

据据苏联红军即将撤离回国和敌我双方的态势，东北民主联军据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相继派来主力部队，准备在苏联红军撤退后，配合嫩江军区部队歼灭守敌，彻底解放齐齐哈尔，开辟西满据据地。

1946年4月23日晚，苏联红军全部撤离齐市，敌省主席少将彭济群也随苏联红军离开齐市。24日凌晨，我军攻城部队在总指挥倪志亮、副总指挥王明贵的指挥下，按照预定作战部署，四路出击，以神速的动作攻入市区，占领了各军事要点。由于彭济群已提前逃跑，敌人群龙无首，加之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不堪一击。敌人一听到我军的枪炮声就吓得魂飞魄散，毫无秩序地带着各种贵重物资夺路向城外逃窜，其中大股敌人在王屯一带遭到我军狙击，敌人有的被击毙，大部缴械投降。

1946年4月24日，人民迎着胜利的曙光，庆祝齐齐哈尔的解放。

齐齐哈尔解放后，嫩江省及齐齐哈尔市的党政军机关从甘南迁回。不久，西满军区也移驻齐齐哈尔。解放后的齐齐哈尔百废待举，省市领导组织全市人民紧张地投入了整顿秩序、清算恶霸、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扩大据据地，嫩江军区部队人未离鞍，马未停蹄，驰骋在辽阔的嫩江平原上，与各路残匪继续展开战斗。至1947年3月，境内的匪患全部解除。据不完全统计，嫩江军区部队与土匪作战524次，歼敌15000余人，生擒敌副军长王乃康、旅长张伯藩，缴获坦克9辆，装甲车1辆，各种火炮30门，轻重机枪420挺，长短枪5100枝，各种炮弹和子弹25万余发，战马3000余匹，大车1200余台。在剿匪战斗中，嫩江军区部队团长夏凤林、参谋邓永模以下1540人负伤，科长李超、连长胡庆云以下1200人长眠于嫩江两岸。

嫩江军区从1945年11月9日成立至1948年12月25日撤销建制，编制机构和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王明贵和刘锡五一直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嫩江军区的历史使命完成后，取代它的是嫩江军事部。

嫩江军区的主力部队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嫩江平原上活跃两支年青的部队，他就是当时嫩江军区的主力部队警备一旅和警备二旅。这两支部队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为建立和巩固西满据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9月下旬王明贵在齐齐哈尔成立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之后，冀热辽军区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就开始向东北进军。10月，冀东八路军王化一同志带一个营的部队挺进齐齐哈尔。为了加强扩军工作，王化一将其中的一个连留在白城子，一个连留在扶余，只亲自带一个连队进入齐齐哈尔。按照上级指示，王化一担任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参谋长，所带来的部队并入了自卫

军。不久，王化一同志据据上级有关扩军的指示，带领人员在齐齐哈尔市内开展了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号召各界青年参加我军，为保卫家园，为解放东北出力。

在王化一的有效宣传动员下，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齐市人民很快就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八路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很快，全市就掀起了参军热潮，报名者达数千人。为保证部队的战斗力，对报名者进行了认真地挑选，从中选出一千多人入了伍。此时，嫩江军区已经成立。按照军区的指示，以老部队为基础，组建了嫩江军区警备一旅，由王化一任旅长。警备一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武器装备良好。

与此同时，从延安随刘锡五、于毅夫、冯纪新、朱光、王盛荣来的吴富善同志，接受了组建警备二旅的任务。

当时，嫩江地区各县都编有县大队，旧成份较多，干部是苏联红军任命的。起初想对他们进行收编组建警备二旅。但是对景星、泰来、甘南的县大队进行调查以后，发现各县大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坏人，而且有的人一时搞不清底细。因此，为了纯洁部队，保证部队的安全，嫩江军区决定发动群众，在农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动员。

按照军区的指示，吴富善同志只带警卫员张指南同志首先来到富拉尔基，开始进行组建部队的工作。在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后，吴富善同志只身深入各界，大力宣传我党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启发群众的觉悟，激发青年的参军热情。不久，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动员工作很快扩展到龙江全县。经过几天的宣传动员工作，群众开始对我军有所了解，各村纷纷送来500多名身强力壮的好小伙子。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吴富善带领崔东平、王战瑞、张指南、姜文元等同志，在富拉尔基原日本宪兵队院内，正式组建了嫩江军区警备二旅，由吴富善同志任旅长。根据人数，当时部队只编了3个连。但是没多长时间，中共龙江县

委又送来了500多青年，使部队迅速扩大。此后，二旅又在东海牙、梅里斯、达呼店等地进行了扩军。

12月中旬，吴富善同志将二旅带到甘南，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旅部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全旅辖第四、五、六团；每团辖3个营。其中六团是骑兵团。

警备二旅组建后，很快就投入了剿匪斗争。根据防区内的匪情，第四团活动于富拉尔基一带，第五团活动在朱家坎、碾子山、甘南、阿荣旗一带，第六团活动在景星、扎旗、泰来一带，隶属于二旅的蒙古支队在扎兰屯一带。

至1947年初，经过警备一、二旅的浴血战斗，嫩江地区的匪患基本消除，处处呈现出太平景象。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3月警备一旅补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4月二旅补入了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从此，嫩江地区人民养育的这两支年青的部队，开进了解放全中国的战场。

西满护路军的前身

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有一支名声显赫下辖3个团的西满护路军，曾为保卫铁路的安全运输，为东北全境乃至全中国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最初却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由王明贵同志组建的一支几百人的队伍。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齐齐哈尔后，原日伪时期的军警护路体制被摧垮。为了搞好铁路治安，苏联红军将维护铁路秩序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委员会"。在这个组织中以伪省长申振先为首的一批人仍然站在敌伪立场与人民相对立。领受任务后，他们利用旧基础，成立了以伪齐齐哈尔铁路局长窦青林为首的护路大队，下辖4个分队。这些在日伪时期干惯了坏事的家伙把持了铁路治安大权后，仍时常为非作歹。

面对铁路治安的混乱局面，为了夺回铁路治安大权，王明贵同志多次找苏联红军，建议由我方出人，苏联红军出枪，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护路部队，把铁路的治安管理都接过来。苏联红军起初不同意，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能再建立别的什么部队。但经王明贵同志的反复磋商，终于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为了保证队伍的纯洁，王明贵同志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动员600余人，任命迟万钧担任队长，接管了铁路的治安管理工作。

1945年10月末，中共中央派出的开辟东北革命根地的刘锡五等同志到达齐齐哈尔后，于11月派郭维城同志接管了齐齐哈尔铁路局。不久，在郭维城同志的领导下，将原来的护路大队扩编为一个团，由迟万钧同志任团长。该团辖2个营，每营辖3个连。

12月初，郭维城奉上级指示亲自率护路军赴北安押运2,000枝步枪、200箱子弹。同时，随车还有两个连的新兵和一批老干部同时去齐齐哈尔。由于这一情报被暗藏在铁路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宣明哲窃取，于是他勾结土匪孙藻庆、刘汉等，于12月15日在泰安（今依安）与古城之间的鳌龙沟设下埋伏，扒掉路轨，致使我列车颠覆。郭维城同志临危不惧，迅速组织部队与匪徒展开了激战。在敌不能进，我不能退的情况下，部队两天两夜没吃没喝，被匪徒困在列车与路基上。在非常危急的时候，黑龙江警备旅旅长廖仲符率援兵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将匪徒打垮，支援了被困部队，保护了军火列车的安全。

12月下旬，当我军按苏联红军的要求撤离齐齐哈尔后，以汪兴甲、程继尹等日伪残余势力又活动起来，与国民党接收大员、嫩江省主席彭济群接上了线，然后网罗人马，成立了一个所谓铁路治安大队，又重新把持了铁路的治安大权。

1946年4月24日我军收复齐齐哈尔后，原来的治安大队不攻自垮，铁路的治安大权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嫩江平原上的第一支少数民族人民武装

在嫩江军区最初所属部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即以达斡尔族青年为主体的齐齐哈尔蒙古自卫大队，改称蒙古支队后，划归了警备二旅建制。这支部队最初人数虽然不多，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已被少数民族所接受，也标志着在旧中国备受苦难的达斡尔民族的觉醒。

军人出身的达斡尔族有识之士鄂秀锋，他见多识广，尽管日伪不断进行欺骗宣传，但是对共产党还是有一个正确看法的。他认为，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穷苦人要翻身解放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八·一五"光复后，听说齐齐哈尔来了共产党，于是找到王明贵后向他表白了自己的心思，并表示今后一定要跟共产党干到底。当时，正是王明贵抓组扩建部队的时候，急需人才，而且鄂秀锋又是少数民族的爱国者，为了尽快建立和扩大武装，王明贵委派他回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

10月中旬，鄂秀锋按照王明贵的指示，首先来到齐齐哈尔郊区的奈门沁，召开了一个5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反复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少数民族政策，号召达族群众为翻身解放拿起枪杆子干革命。苦难深重的达斡尔人早就盼望这一天，在鄂秀锋的号召下，很快行动起来，他们有的出人，有的出枪，有的出马，有的出粮，一个昔日死气沉沉的村庄，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几天后，一面绣着"蒙古自卫大队"这几个大字的红旗在奈门沁呼啦啦地飘扬起来。消息传开后，附近村屯的一些达族青年又跑来很多，要求参加自卫大队，很快就使队伍扩大了起来，总人数达到了250人。

部队建立起来之后，军区又派了几名干部，任命鄂秀锋任大

队长，鄂嫩任政治委员，金振玉任参谋长，德文斌任后勤处长。武器弹药除自筹外，嫩江军区又发给20枝马步枪和子弹、手榴弹。按照部队供给标准，嫩江军区又拨给了马料、菜金等，各种物资都分别在长岗子、道卜台、奈门沁保存起来。各项工作就绪后，部队随即投入了紧张的军政训练。军事上主要是练习射击和马术，政治上主要是宣讲政治常识、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整训一共进行了15天，之后就奉命投入了剿匪战斗，并参加了收复齐齐哈尔的战役。

这支部队如同一颗种子，不断发展壮大，从大队到支队，又从支队扩编为旅。1946年5月，这支部队缩编为团，脱离嫩江军区建制，列入了兴安军区序列，番号是42团。

（本文主要是根据吴富善、廖仲泘、王明贵同志的回忆材料整理编写的。）

解放齐齐哈尔的劲旅
——西满二支队

叶永才

1946年3月24日至26日，中央三次电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示必须准确掌握时机，在苏联红军撤退后两日内占领齐齐哈尔，牢牢掌握主动权，建立和开创西满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西满二支队与其他主力部队一起，由白城子出发，赶赴齐齐哈尔以南的昂昂溪，准备参加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吕正操率原东北军53军691团脱离国民党军，参加了八路军，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一团。1938年我军以该团为基础，扩编为冀中3纵队7支队，下辖19大队、20大队、21大队。1930年整军时，21大队与独立一团合编为16团，该团即西满二支队的前身。

1943年16团进入延安，编为教导第一旅第二团，团长常仲连、政治委员张秀川。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延安组成了推进支队，吕正操任司令员，林枫任政治委员。二团参加了挺进支队，奉命开赴东北。此间二团团长缺额，政治委员张秀川，副团长卜云龙，参谋长苏克之。

1945年10月28日，二团在沈阳东陵参加整编，被编为保安纵队第四旅第十团，程源本任团长，何光任副团长，阎生任副政委，董仁任政治处主任。此时十团辖10个连队，其中有7个是延

安带来的老连队，即一营的一、二、三连，二营的五、六连，三营的九、十连。

沈阳撤退时，保安纵队司令员邓华命令十团到吕正操、李富春处报到接受任务，完成任务后回归本部。

1945年12月，十团奉命进驻郑家屯。根据吕、李指示，十团改为西满军区警卫团，但仍保留原保安第四旅第十团的番号，并调西满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张怀礼任副团长兼参谋长。

为适应作战需要，1946年3月，十团与吉江二分区32团合编，组建了西满军区第二支队，夏尚志任支队长、姚仲康任政治委员，程源本任副支队长，罗杰任参谋长，阎生任政治部主任。二支队下辖三个团，各团的主要干部是：一团团长罗赞成，政治委员张怀礼；二团团长何光，政治委员扬道和；三团团长董仁，政治委员孙谦。每个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全支队共有兵员1700余人，武器大部为日式。

二支队到达集结地域后，为了克服情况不明和缺乏打大城市经验的困难，在地方的配合下，发动群众，组织在市内被迫当光复军的家属做他们亲人的工作，教他们相信八路军、弃暗投明，为帮助我军解放齐齐哈尔出力。经过几天的工作，大民屯以南的各村都活跃了起来，在市内当光复军的士兵纷纷回家，为我军提供情报。为了及时掌握市内敌人的动向，劝说他们继续回营当兵。这一阶段的群众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受到了嫩江省军区的通令表扬。

在进攻前的一天，我军与驻齐市的苏联红军取得了联系。苏军告诉我们他们将在4月23日撤退；现在市内的所有重要目标和制高点都被苏军占领，并希望我们进攻时做为重点目标。当我军提出市内街巷道路不熟、各制高点的具体位置不明时，苏军叫我们化装成苦力，用汽车把我们拉进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二支队副支队长程源本、政委姚仲康、一团政委张怀礼、二团团长何

光、三团团长董仁，化装进入了齐齐哈尔市区，为了防止暴露，化装的几个人完全听苏军带路人的指挥，他告诉我们，凡是有苏联红军站岗的地方，就是我军的进攻目标，就这样，我们把该看的都看了，并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经过侦察，不仅熟悉了地形，而且对敌人的各方面情况也都了解得比较清楚。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当时齐齐哈尔市内的光复军守城部队有17,000多人，敌号称30万，而实际战斗力只有7,000人左右。

根据敌情、我情，指挥部确定的作战方针是由西满二支队、三支队、嫩江省军区的警一旅、警二旅及新四军三师特务一团等部队四面包围，同时发起进攻，分别占领市内各重点目标，并调部分部队在要道截击逃跑之敌。为了完成好截击和追歼任务，指挥部决定将二支队的三个骑兵连调出，组成了骑兵支队，由一团参谋长刘志忠任支队长，三团政治处主任查全伦任政治委员，该支队埋伏在宛屯一带，堵截市内东逃之敌。

上级部署给二支队的任务是，由三团强攻据守炮台屯的光复军敢死队，掩护一团、二团从炮台屯西侧迅速进入市区，占领预定目标。一团、二团待三团打响后，要尽量避开敌人火力，不在外围恋战，迅速直捣市内，占领省政府、电信局、13营盘（即十三部队）。

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中西满二支队打了两个漂亮仗。一是炮台屯攻坚战，另一个是宛屯阻击战。

原来，当市内敌人得知我军已将其包围之后，在伪满国兵中挑选千余名素质优良的官兵，组成"敢死队"，据守炮台屯。该敌意图有二：其一是阻击由南向北进攻之我军，二是扼守齐齐哈尔南门，看好敌南逃退路。4月24日清晨2时，三团向炮台屯发起攻击，战斗打响后，三营长带九连和一机枪连从西南近敌，向东北方向打；团长董仁带十连、十一连从东南近敌，向西北方向

打，形成了钳形进攻态势。两强相遇，互不相让，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敌人虽然枪法准，但经不起三团指战员的猛打猛冲，几小时的激战，三团占领了敌军阵地，迫使敌人龟缩在一个大院里。此时，三团的伤亡也很大，加之体力消耗，不少人都跑不动了。就在敌我双方对峙之际，有3辆敌坦克向大院驶来，战前，苏军曾教我们一个打坦克的方法，就是用玻璃瓶子装满汽油，封好后外面包上棉花，用时再沾上汽油，点燃后迅速投出，即可烧毁坦克的薄弱部位。我们虽然按这个方法做了，但到用时却找不到火柴，所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坦克向大院开去。坦克到大院门前停了下来，从中下来几个人。我们分析可能是传达命令的。

在我军发起总攻前夕，敌人曾组织几次突围，但都被我军打了回去。狡猾的敌人一面命令一部分部队继续顽抗，一面命令一部分部队用各种车辆装满贵重物资及银行全部现钞，还胁迫一些不明真象的学生，乘夜色经桥洞子向东八里岗子方向蜂拥逃跑。当敌人大队人马逃到宛屯一带时，早已埋伏好的我骑兵支队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向敌军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顿时大乱，纷纷四处奔逃，互相践踏，人喊马嘶，溃不成军。骑兵支队乘势发起冲击，将敌人穿插分割，然后再往中间兜。本来，敌人数十倍于我军，但在我军四挺机枪一起射击后，接着又发起冲击，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不知我军有多少部队，以为陷入了我军的重兵包围。特别是当敌指挥官被我生擒后，众匪军都纷纷举手投降。

第二天清晨，战场上到处都是武器、汽车、马车和死伤的战马，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物资以及敌人丢在地上的面包和干粮。我骑兵支队除留少数人押送俘虏和打扫战场外，其余继续追歼向北、向西逃跑的残敌。在这次战斗中，三团损失较大，政委孙谦等70余人光荣牺牲，还有63人负伤。

（根据董仁同志口述材料撰写。董仁，原为西满军区二支队三团团长，解放后在军事博物馆、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任职）

齐齐哈尔民兵

叶永才

1946年4月24日，我新四军三师和嫩江省军区部队一举解放齐齐哈尔，省、市党政军机关从甘南迁回到齐齐哈尔。当时的齐齐哈尔，面临着十分繁重的建立政权、安定秩序、除奸反霸、支援前线、没收敌产、遣送日侨等任务。我军主力部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地方部队担负着繁重的剿匪任务，而市内的少数警卫部队，远远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决定把群众武装起来，建立地方群众武装组织。

1946年8月，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做了大量的组织动员工作，建立了党领导下的齐齐哈尔市群众武装组织——民兵自卫队，即齐齐哈尔民兵的前身。初建时，全市共有自卫队员13242人，其中基干队员319人。全市编为一个总队，下辖6个大队，77个中队，270个分队，931个小队。使用的武器是大刀、长矛、洋炮、步枪等，其中各种杂式步枪6700余枝，后来经收缴土匪及日伪残余暗藏的武器，使自卫队的装备不断改善，基本能适应执行任务的需要。

自卫队在党领导下担负清算恶霸、除奸反特、调查户口、监控坏人、警戒放哨、看管公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等任务。在领导体制上，自卫队由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实施组织指挥，具体办事机构是卫戍司令部人民武装科。自卫队的自身领导体系是，市

设自卫队总队部，有总队长一人、政治委员一人、副总队长一人；区设大队，有大队长一人（区长兼）、政治委员一人（区委书记兼）、副大队长一人；街（村）设中队，有中队长一人（街、村长兼）、政治指导员一人、副中队长一人；中队以下设小队若干。

为了全面加强自卫队的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于1947年5月18日颁布了《齐齐哈尔市民兵自卫队组织暂行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自卫队的性质、任务、组织原则、教育训练、纪律作风等方面的内容，使自卫队建设能够有章可循。

建队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和队员成份比较复杂，自卫队中出现不少违法乱纪现象，于是在卫戍司令部的领导下，自卫队于1947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顿。

在组织上，清洗了一批历史不清分子、流氓和伪警察、特务、宪兵等。对一些有一般问题而又能坦白交待的，经审查批准后继续留在自卫队，但不能加入基干队，更不能当干部。对于不适合参加自卫队的人员，让他们参加由街道组成的卫生队和义务劳动小组。为了保证要害部门或单位的生产，在整顿中把铁路、邮电职工退回了原单位，并规定以后也不再参加自卫队。

在工作上，重新明确了自卫队的任务：一、二、三、四、九街以二街派出所为中心，五、六、七、八、十街以六街派出所为中心，各街依次每夜派出一小队，轮流在管区内执行巡逻、查店、查户口等任务。

夜间巡逻的具体任务是盘查来历不清及隐藏不报的坏分子；追查谣言和盘查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氓分子；捉拿小偷、土匪及烟赌案犯；盘查可疑行人以缉拿流窜犯。

小队长和小组长必须明了管区内的所有住户的家庭人口、职业状况、主要社会关系的历史、平时经常来往客人的情况。凡管

区内的外来人，都必须向小队长挂号；管区内人员离开，要向小队长请假。

为了严明纪律，除《暂行条例》规定的纪律外，又做了一些补充规定：

（1）自卫队有检查、监视、报告权，在特殊情况下有直接逮捕权。

（2）在检查或清查中，不得随便拿对方的财物，不得随意没收物品，不得接受礼物或吃请。

（3）对放赌或烟犯，可逮捕送往上级机关，不得私自罚款罚物，更不得自行处理或释放。

（4）自卫队清查户口必须通知小组长，必要时可与街干部共同进行。

全市自卫队通过这次整顿，使组织更加纯洁，工作更加活跃，纪律更加严明，在全市人民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46年至1952年，齐齐哈尔民兵在保卫齐市、建设齐市、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斗争中，完成了市委、市政府赋予的各项任务，同时民兵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为齐齐哈尔市地方人民武装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把民兵工作做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固定下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民兵建设的措施，另一方面又根据城市的地位、作用和特点，对当时的城市民兵工作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在1952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中规定：凡工厂、矿山、商店、公私合营企事业单位不建立民兵组织；大、中城市除郊区组织民兵由城市郊区人民武装部统一领导外，市内不建立民兵组织。根据这一规定，齐齐哈尔市区的民兵组织于1953年撤消，保留了郊区的民兵组织。通过整组，郊区共有民兵595人，其中分队干部31人，

小队干部94人，共编10个分队，62个小队有自卫队员2619人，其中中队干部43人，小队干部75人，其他干部357人，共编22个中队，54个分队，168个小队。郊区民兵共装备各类枪32支，其中三八式步枪14枝、九九式步枪4枝、美“7·62”式2枝、七九式步枪7枝、手枪2只，各类子弹450发。

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9月29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热潮。就在这一年，市区的民兵组织全面恢复。全市共组建了11个民兵师，80个民兵团，383个民兵营，1320个民兵连，共有民兵25万，其中基干民兵95707人。

在普遍建立民兵组织的宣传动员中，各行各业的广大青壮年十分积极，纷纷要求参加民兵组织，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如和平机器厂有的青年为了表示自己的迫切心情，向单位领导递交了血书。在报名过程中，广大女青年也不甘落后，纷纷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保证书，要求向男同志那样扛枪练武，保卫祖国。

196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了我国第一个正式的《民兵工作条例》。该条例共七章三十条，对民兵的性质任务、民兵组织、民兵干部、民兵武器、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民兵执勤、领导关系等各项大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明确规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兵工作的基本法规。从1958年9月至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二十年时间里，全市的民兵工作一直是在“大办”的基本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这期间，全市民兵总数一直保持在20万以上，其中基干民兵在10万左右浮动。

自1946年民兵组织建立以来，就不间断地开展了军事训练，

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改善，在训练、规模、课目、重点、时间及方法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要求。

自1946年至1953年，全市民兵处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由于齐齐哈尔市是东北地区解放最早的城市之一，全市民兵承担着较重的巩固根据地、保卫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奸反霸、支援前线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民兵自卫队，特别是基干队，只能结合任务干啥练啥，用啥学啥，军事训练有很强的应用性。又因所担负的任务和条件的限制，军事训练只能利用零星时间进行，而且训练课目也比较简单，要求也比较低，一般只要会打枪、投手榴弹及刺杀就可以了。

1958年至1965年，由于基干民兵数量过大，而武器较少，有半数左右的基干民兵用自制木枪训练。为了解决武器不足问题，训练中采取多种课目同时进行的做法，轮换交替使用武器。这一时期的基干民兵训练以“五大技术”为主，即以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为主。训练时间一般为五至七天，全年训练两万人以上，但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参加实弹射击。

1969年以后，民兵武器装备在种类、数量、质量上都有很大改善，旧杂式武器全部上交销毁，被各种新武器所代替。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除特种兵外，基干民兵的训练内容在“五大技术”训练的基础上，重点进行“三打”、“三防”训练，即进行打飞机、打空降、打坦克、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训练。训练方法也由小型、就地、分散的方法向以集中训练为主的自训、联训、带训方法过渡。在训练时间上，由120小时增为20至30天。1979年总参谋部下发了《四年训练纲要》，对基干民兵的训练内容、训练重点、训练时间及考核标准做了详细规定，使基干民兵训练趋于正规。

在我市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民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是齐齐哈尔市

民兵自卫队的主要任务。在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全市以民兵自卫队员为主体的较大规模的随军支前运动有四次。第一次是1947年9月，全市动员大车39辆，马152匹，款1200多万元，随军支前48人。第二次是1947年12月，动员大车20辆，马73匹，款2180多万元，随军支前80人。第三次是1948年3月，动员大车31辆，马118匹，款一亿零五百多万元，民工219人。第四次是1948年7月，动员大车10辆，马44匹，款二亿六千多万元。

每次随军支前的人员都由市政府统一编队，由区和市派得力干部带队。如1947年8月，全市编成三个分队，一、二、三区为第一分队，四、五、六区为第二分队，大车编为第三分队，每个分队又编四个小队。

在每次支前动员中，民兵自卫队员都积极响应，争先报名。如五区张秀岩，反复说服了父亲，赶着自家的三马胶轮大车上了前线。又如三区十街的王惠民，因他的马比较瘦，大家不叫他去，他着急地解释说，别看自己的马瘦，但是没毛病，如实在不行宁愿卖掉两匹，再买一匹好马也得去。再如六区的赵吉庆，情愿一冬不拉快马车（拉座的），把马拉出来参加了支前工作。

齐齐哈尔市民兵组织自建立之日起，就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更有着特殊意义和作用。在三年解放战争中，齐齐哈尔市的民兵自卫队在卫戍司令部和各区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密切配合部队和公安机关，担负起了大部分警卫、押送、放哨、巡逻、搜查等任务。1946年7月至12月齐市城乡开展反奸清算运动，民兵自卫队首当其冲，保卫运动顺利进行，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全市民兵自卫队破案370起。其中五区七中队抓住两个土匪，缴获一枝盒子枪，二中队抓到一名携款潜逃干部和一名国民党军官。二区葫芦头的基干队，每夜沿城郊边沿放哨巡逻，使匪案大减，稳定了城乡结合部的治安。秋冬收购粮季节，各区抽调300余名自卫队员，押运120多辆马车分赴农村购粮，防

止了匪扰，解除了群众的恐惧心理。1947年4月，王家屯自卫队收缴暗藏长短枪20余枝，经上级批准，将这些武器装备了自卫队。

全国解放后，民兵仍然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据1959年统计，全市民兵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种案件1100多起，其中民兵单独抓获逃犯七名，捕获枪劫枪支犯两名。1961年至1963年，各区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各种案件275起，逮捕犯人296名。1964年，全市有78个民兵分队参加社会治安执勤，共2347人，设观察哨51处，巡逻组25个，动用汽车33台，马35匹，直接配合公安机关捕获罪犯192人。如华安区，全区破获的六起重大案件都有民兵参加。其中民兵耿展义、李辉昌，协助公安机关连续破案三起。1968年8月22日凌晨，全市出动基干民兵5200名，配合公安机关对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歹徒进行了一次大搜查。根据事先拟定的方案，重点清查了车站、公园、旅店、浴池、医院和城乡结合部等80余处。除少数被拘留审查外，登记了640余名行迹可疑者。从1972年至1977年，全市民兵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大小案件7500多起。1984年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全市抽调120名基干民兵，组成了七个执勤分队，配合公安机关担负执勤、巡逻、看押等任务。

建国以来，齐齐哈尔市民兵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在与各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又经受住了苦与乐、生与死的考验。

1969年5月28日晚，齐齐哈尔市人民银行突然起火，市电业局闻讯后，立即组成了由13名民兵参加的抢险队赶赴现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带电在火中作业，迅速切断了楼内的输电线路，防止了火势的蔓延。之后，他们又以最快的速度架起了600多米长的临时照明输电线路，为扑火救灾创造了条件。

1969年8月下旬，嫩江上游连降大雨，水位不断上升，最高

时达148.61米，是嫩江流域历史上的特大洪水。几天内，齐市西部、北部的洪水一望无际，齐富公路的个别地段被洪水淹没，哈、满铁路的小五福玛地段被冲断，造成了铁路、公路的局部中断，齐齐哈尔和富拉尔基有被洪水吞没的危险。在这极其危急的时刻，在市防讯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市、区、厂三级人武部门和各级人武干部，率领八万多民兵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由于齐市土质不好，含砂量大，每日都有险情出现，但是，民兵们万众一心，多次跳入洪水中组成多层人墙，打桩堵洞、加固缺口。特别是奋战在富拉尔基的第一重机厂民兵师、齐齐哈尔钢厂民兵师、热电厂民兵团等，他们立下了誓与富拉尔基共存亡的决心，昼夜加固江堤。为了便于应付紧急情况，各单位还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水性好的基干民兵组成突击队、抢险队等，专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经过十几昼夜的搏斗，战胜了洪水，保住了齐齐哈尔和富拉尔基。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情十分惨重。8月3日，市委成立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动员全市各方面力量支援灾区。为了保证救灾物资的安全，市武装部抽调192名基干民兵，全副武装执行押运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181760吨物资丝毫无损地安全护送到唐山。

1973年以来，齐齐哈尔郊区农村多次出现旱情，为了支援农业抗旱，市民兵高炮师先后多次执行人工降雨任务。每次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被郊区农民称为“活神仙”。如1977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全市动用了13门高炮、79名炮手，分赴旱情严重的拜泉、依安、龙江、甘南、梅里斯等地实施人工降雨。各分队行程3530公里，对空射击61次，发射炮弹2630发，降雨面积约60万亩，基本解除了旱情，并做到了人员、武器安全无损，于6月20日全部撤回。又如1980年8月为防止雹灾，应市农业部门的请

求，市武装部从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和平机器厂、第一重机厂抽12门高炮、72名炮手，在齐市郊区和邻近各县执行人工防雹任务。由于各分队严格执行命令，坚守阵地，认真按照气象部门的预报适时发射炮弹，有效地防止了雹灾。

我军的四所军事院校

叶永才

我军历来重视院校建设和正规化教育训练。自1945年我军进驻齐齐哈尔以来，就有几所院校设在这里，为我军培养了大批指挥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嫩江军政干校

1946年1月初，嫩江省和齐市党政军机关移驻甘南后，开始了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开展剿匪斗争工作。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无论部队和党政机关，都缺乏具有一定素质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嫩江省工委决定由嫩江军区创办一所军政干校，根据部队和地方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专门培养青年军官和政工干部。

经过简单的筹备，1月下旬嫩江军政干校在甘南县城日伪时期的“兴农合作社”大院里宣告成立。这个院子较大，有20多间房子，虽然破旧，但教室、宿舍、办公室还都能解决。嫩江军政干校的校长由王明贵兼任，副校长由朱光兼任，教育长由张瑞麟担任。学校设政治处，由张晶任主任；教务处，由赵湘荃任主任；另外还设一名教导员，由张骏英担任。

嫩江军政干校设3个队：军事队，由杨文龙任队长；政治队，由杜化任队长；女干队，由赵静任队长。学校首批学员220

人，其中军事队100人，政治队100人，女干队20人。学校的主要课程设两门，即军事和政治课。由于初期的师资十分缺乏，所以主要课程都由军政首长担任。其中军事课主要由王明贵司今员、兰庭辉参谋长担任，政治课由朱光副校长、张瑞麟教育长担任。

建校初期，甘南的土匪较多，不时流窜出来进行袭扰活动。当时部队都在外边剿匪，县城内的兵力空虚。为了弥补兵力不足的困难，按照军区参谋长兰庭辉的指示，学员们担负起了校园和党政军机关的警卫工作。他们白天上课训练，夜间轮流站岗放哨。大家的情绪很高，一直坚持到我军撤出甘南。

1946年2月，军区决定将学校迁往讷河。按照首长指示，一辆车也没用，需要带的物资器具都要学员们背着走。学员们斗志旺盛，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负重很多，徒步行军好几天才到达讷河县城。到了讷河后，干校被安置在一所中学校里。不久，第一批学员该毕业了。经过考试，有的学员水平较低，不能准予毕业，还要继续留校学习。学习成绩最差的是少数民族学员和政治队的学员。部分学员毕业后，部队又送来一些学员，学校在讷河又招收了一部分，加上第一批留下来的，学员共有100余人。根据第一批教学的经验教训，第二批学员在教学上采取了统一上课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法，使不同基础的学员能共同稳步提高，有效地保证了教学质量。

1946年4月24日，我军解放了齐齐哈尔，军政干校迁入了齐齐哈尔市。到齐市后，干校驻进了日伪时期的东大营，校舍很多，校园也非常宽阔。不久，根据中共西满分局的指示，将设在吉林省洮南的政治学校迁到齐市，与嫩江军政干校合并，名称仍叫嫩江军区军政干校。两校合并后，西满军区的首长特别重视和关怀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军区首长黄克诚、李富春、张平化、郭述申等多次到学校看望学员检查工作，给学员作报告。

1946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由于土改工作

队的力量不足，嫩江省委决定干校停课，将现有的学员全部编入土改工作队。学员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成了土改工作队的骨干力量。1947年2月，嫩江省土改工作结束，学员们都重新分配了工作。

东北军政大学

1947年12月，为了适应野战兵团及二线部队建设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将东北军大由以培养青年学生为主改为以训练干部为主的方针。同时在办学方式上也由分散办学改为集中办学。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总部决定将辽宁、吉林、合江的3个分校、松江干部学校、一纵、六纵的教导团合为一体，编成3个团，建立了东北军政大学，校址由北安移驻齐齐哈尔。东北军大由倪志亮任校长，吴溉之任副政委，曾国华任副教育长，刘其人任政治部主任。

东北军政大学驻原日军东大营旧址。自在齐齐哈尔开学后，由于原来声望就很高，加之校方在管理上军纪严明，给齐齐哈尔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群众中一提起"军大"，人们都说他们象老八路。1949年8月，为了我军南下后为地方输送军政干部，军大的第一、二、三、五团开赴武汉，但仍归第四野战军（原东总部队）建制。与此同时，东北军区又以原军大的四团为基础，成立了东北军政干校，伍修权兼校长，周恒兼政治委员，刘子仪任第一副校长，彭施鲁任第二副校长，朱士焕任第二副政委。重新建立的东北军政干校，主要为部队培养连排指挥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培养更多的青年干部，以适应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需要，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三、四大队于1946年2月奉命北进。到达吉林通化后，与原东北炮兵学校及工兵大队合并，成立了东北军政大学，林彪任校长，何长工任副校长，

吴溉之任副政委，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陈伯钧任教育长。

东北军大成立后，一方面抽两个大队的学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辟工作；另一方面重新招收新学员，加速培养干部。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又设立了北满、东满、南满三个分校。1946年4月26日长春解放后军大随军迁入，5月末军大又移至北安，3个大队改称一、二、三支队。

1947年4月，军大奉命调整编制，其中三支队列入六纵序列成立3个教导团，二支队调往西满军区成立西满分校。1947年8月，为了使在职的营、团干部得到轮训与学习的机会，军大又开办了两个轮训队，一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同年12月，军大调整了教育方针，把以培养青年学生为主改为以培养在职干部为主，把分散办学改为集中办学。为此，军大将辽东、吉林、合江3个分校和松江干校，以及一、六纵队的教导团合编为3个团，全部收归总校。同时将校址由北安移驻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步兵学校

1949年9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东北军政大学的一、三、五团南下武汉，以这个三团为基础组建了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同月，东北军区以原东北军政大学四团为基础，合并了辽东、辽西、热河3个省军区的教导大队及东北军区卫生部所属的13医院部分干部，组建了东北军区军政干校。1951年1月，该校改由中央军委直属，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步兵学校，1953年改称第7步兵学校。1955年6月，第7步兵学校划归沈阳军区代管，改名为齐齐哈尔步兵学校。

齐齐哈尔步兵学校继承和发扬了“红大”、“抗大”、“军大”长期形成的优良校风，以毛主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题词为教育方针。齐齐哈尔步校最初的学制为一年半，培养初级指挥干部，学员来

自部队和青年学生。步校共有学员2,500名，编为5个大队。

1959年4月15日，根据总参电示，齐齐哈尔步兵学校移驻锦州市，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锦州步兵学校。1986年，在原锦州步兵学校基础上，组建了大连陆军学院。

齐齐哈尔军医学院

1951年，正值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迅速培养出专业医务人才，8月初东北军区决定："在齐齐哈尔市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陆军医院的人力、物力为基础，组建军医学校。"按照这一指示，第二陆军医院立即成立了建校筹备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建校筹备委员会由40人组成，教学委员会由14人组成。

1951年10月13日，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宣布东北军区军医学校正式成立。学校刚成立时并无正式编制，由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李资平兼任校长。教学委员会由原第二陆军医院院长陆训、政委南阴堂、上海抗美援朝医疗总队第七大队顾问等人组成。学校教育处负责人是李桥，政治处负责人是王维良。学校设生物、化学、解剖、组织、生理、细毒、寄生虫、外文等8个学系，每个系设主任一名。

学校第一批招收学员342名，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天津等地的初中毕业生，年龄都在13——23岁之间。首批学员学制为二年，开设12门课程。当时学校确立的教学方针是："前期服从临床，临床服从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形象化教学。"根据这一教学方针，规定了实习与授课时间为1∶2，第二陆军医院为教学实习医院。

1953年1月，东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新编制，将东北军区军医学校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医中学，将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改为第十一军医中学的附属医院，并重新调整任命了

学校的领导成员。校长王义之，副政委施宁，副校长王恩鉴。学校设政治处、教育处、物资处，教学系由原来的8个增至12个，即生物解剖、生理、组织胚胎、细菌、生化、病理、寄生虫、药理、军队卫生、化学、外文、数理。同时，学校的教学干部和管理有所加强。到1953年底，编员额增至276人，其中教学干部86人，政工和行政干部40人，后勤人员97人，其他工作人员53人。1953年4月，东北军区后勤部将学校附属医院又改为陆军医院，归卫生部序列，但仍由学校领导。

1954年5月，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第11军医中学改为第十一军医学校，并于7月对该校进行了整编。按照新编制，学校除行政机构外，学系设了生物学、寄生虫学、放射学、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小儿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科学、妇产科学等。学校编制全员699人，其中教学人员199人。

1958年9月，总后勤部决定将第十一军医学校移交卫生部，归属黑龙江省领导。7月20日，军地双方在齐齐哈尔举行了交接仪式，学校改名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原学校人员大部分集体转业，少部分调离，义务兵移交给了驻齐部队。移交地方后，学系和学校领导成员未变，但增设了5年制本科班和3年制的护理专业。

1961年1月，国务院又决定将齐齐哈尔医学院回归军队建制，校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齐齐哈尔军医学院。归建后，王义之任院长，章策任政治委员，王恩鉴、许若苇、房荣庆任副院长。学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教职行政人员867人，学员1,000人，学制为3年。

1966年10月20日，总参谋部决定将齐齐哈尔军医学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院“停课闹革命”，学院的领导班子瘫痪，教学体系被打乱，教学设备被破坏。一个建设了几十年的好端端的学校被弄得百孔千疮。1969年

8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学院迁至长沙，1970年2月又迁往广州。1975年7月，中央军委将学院改为第一军医大学，从此，这个学校跨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根据张宝增、赵宏、张太真等同志的回忆材料整理。）

军工部——人民兵器工业的摇篮

叶 永 才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为建立我军的军事工业，中共中央决定从延安、晋绥等地区的军工部门抽调一批干部进入东北，接收日伪在东北的一些军事工业。10月13日，延安、晋绥的军工干部到达沈阳，14日建立了东北军工部，隶属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12月10日，军工部从沈阳转移到通化开展工作。

为了全面开展工作，军工部在东北相继建立了珲春、兴山、鸡西、齐齐哈尔、吉林、哈尔滨等八个办事处，其中齐齐哈尔为第五办事处。

1946年4月28日，新四军三师军工部36名同志在部长田汝孚的率领下，随主力部队进入齐齐哈尔，顺利地接收了曾为日伪军队制造杀人武器的“嫩江省修械所”。接收后，田汝孚同志带领大家深入发动工人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工人们立即行动起来，为我们自己的人民军队制造武器。在深入发动的基础上，田汝孚同志主持召开了全所工人大会，进一步讲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觉悟起来。工人们说：“过去我们给敌人干，造出武器杀自己人，这回我们是给自己的部队干，造出武器杀敌人！”工人们在我军工干部的带领和组织下，立即投入了维修设备、清理现场的紧张工作。

当时，嫩江修械所只有20余台设备，为了提高生产能力，上

级又从白城子调来一些，再加上接收齐齐哈尔伪龙江制造所的一部分设备，使修械所的设备不仅配套，而且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工厂建立起来后，归新四军三师军工部直属。开工后，由于机器设备的增加，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军工部的同志们四处奔走，最后在铁路招收了一百余名日籍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使工厂的技术力量很快适应了生产的需要。

1946年6月，三师军工部奉命北撤，将工厂迁至嫩江县，齐齐哈尔只留129人，从事枪械修理，由赵王珊、陆秉文负责。工厂迁至嫩江后，为了扩大生产能力，将讷河修械所的人员设备一起并入，又从八旅调入一部分人员，使设备增至40余台，人员增至二百余人。为了便于管理，工厂分为三个分厂：一分厂，厂长申醒民，该分厂为机械加工厂；二分厂，厂长董占魁，该厂为弹药加工厂；三分厂，厂长郑锡林（后为刘宏玉、李均高），该厂为铸造工厂。1946年11月9日嫩江军区成立后，新四军三师军工部归属嫩江军区，改称嫩江军区军工部。不久西满军区进驻齐齐哈尔后，嫩江军区军工部又归属西满军区，改称西满军区军工部。工厂在嫩江期间，共生产八一迫击炮弹3300发，八二迫击炮弹4624发，手榴弹21,730枚，同时修复了大量枪械。

1947年7月，西满军区军工部又从嫩江迁回齐齐哈尔。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数量，工厂又奉命接收了解放木工厂、氧气厂、汽车修理厂等几个民品工厂。这时，军工部的编制机构扩大，设政治处、工务科、总务科、材料科，下属机工、弹药、木工、修械、汽车修理、铸工等六个分厂，共有职工540人，设备170台，使生产能力空前提高。仅1947年，就生产八一迫击炮弹150,054发，八五炮弹5,160发，六〇迫击炮弹648发，手榴弹13,566发，爆破筒6,000个。

进入1948年后，西满军区军工部将六〇迫击炮弹确定为定型产品。2至6月试制零件，6月份以后就投入了批量生产。到11月底，共生产六〇迫击炮弹151,615发，保证了前方的需要。同年4月15日，西满军区军工部改为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五办事处，即军工部齐齐哈尔第五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由田汝孚担任，政治处主任由张国安担任。办事处仍辖四个分厂，设备增至260台，人员增至1,302人。

1949年东北全境、全国大部分解放后，第五办事处的炮弹生产和修械任务随之减少。6月，根据上级指示，第五办事处停止了六〇迫击炮弹的生产，各工厂转入和平建设时期。9月28日，东北区军工部决定撤销各办事处建制，将第五办事处改为第31工厂，即国营建华机械厂的前身。

我当上了人民战士

戴文祥

1945年8月，我在齐齐哈尔市寿光优级学校毕业已两个多月。当时我家住在一区，家里有八口人，有父亲、母亲、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全家人都为我发愁，因为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特别紧巴，如果我不能尽快找到事做，不仅不能帮助父亲减轻负担，而且还要去"勤劳奉仕"。这年，我已经17岁，一个喝了墨水的小伙子硬是呆在家里，可实在是难受。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苏联红军打到了齐齐哈尔，日本鬼子投降了，使齐齐哈尔见了天日，齐市人民结束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

就在苏联红军解放齐市的第4天，我看到了人民自卫军贴的招兵布告，解放门、公安局、"白云寮"等地方都有。"白云寮"是日本人开的一个专供日本官兵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地方。当天晚上，我就和父亲谈了我的想法，我说："爹，我在街上看到了布告。"我还没谈完，我爹插话说："布告有啥新鲜，天天都有。"我接着说："我看到的布告与我有关系，是共产党、八路军贴的，动员青年人参加他们的队伍，管吃管穿还给钱。"父亲听了摇摇头说："听说共产党挺好，可是当兵打仗，枪子儿可是没长眼啊，你去当兵万一有个好歹可咋办？你妈身板不好，还不得把她愁死呀，这一家老小要是都扔给我，那可够我呛的！"我说："不叫我当兵你有啥招儿，工作找不上，家里人

口又这么多，老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我受不了，说什么我也得去。”父亲看我铁了心，拦是拦不住了，他打个咳声说：“你说的也占点理，谁让咱没能耐了，随你的便吧，要是能活着回来，就算你命大。”说实话，当时我迫不急待地要参军主要是为了穿衣吃饭。我盘算，当兵如能挣几个钱更好，可以帮父亲一把，就是挣不着钱，起码也把我这张嘴带出去。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了报名处，一个穿着军装叫什么干事的人在那里主持登记。他问了我的身份和来意，又盘问了一些别的情况，就递给我3张表叫我填上。因我有文化，不用找人代笔，自己很快就填完了。交上去后，他向我要3张照片，我说：“没有，没钱照。”他又将我打量一遍，说：“没有就算了，回家去向亲人告告别，下午就到这来报到。”

在我报名的时候，还碰到了几个同学，他们也是参军的。他们和我一样，填完表都回家告别去了。现在能记住的有李玉琢、孟宪忠、王福元、还有个姓许的。

当天下午，我辞别了亲人，到部队报了到。我们集合后，大约有百十来人，大部分是齐市的学生，还有逃散的劳工，失业的苦力。点完名之后，给我们发了军装，每人一套黑色的棉袄棉裤，帽子是圆大盖的，和新四军的不一样。当时天气并不太冷，可按规定都得穿上，把我们捂得直冒汗，可怕首长批评，大家谁也不做声。我们的连长姓马，指导员姓徐，叫什么名字没敢问，我们都叫他俩马连长、徐指导员，他们都是新四军干部。

第天二，马指导员给我们上政治课，主要内容是：我们所参加的部队叫嫩江省人民自卫军，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要有铁的纪律，谁也不能违反。接着，徐指导员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听了并不完全理解，但是感到很新鲜。指导员讲完之后，马连长又讲了话，他宣布了我们的任务：第一、维护齐市的社会治安，打

击日伪残余的破坏活动；第二、没收和看守日伪的各种物资和仓库，保护好胜利果实；第三、警卫首脑机关的安全；第四、随时准备参加剿匪战斗。连长讲完之后，就给我们这些人分配了工作。别的不说，我在的那个班的任务是站岗，主要是看守公安局、伪满宪兵队、监狱、伪满市公署等地方，其余重要地方都由苏联红军把守，不让我们去。苏联红军进来以后，一些重要工厂和仓库都派了兵，好东西运走，好机器拆下来。现在和平厂院里当时就是一个大仓库，建华厂的现址是伪满的军械厂，这些地方都由苏联红军看着。

有一次，首长叫我到伪满军械厂去，到那里捡苏联红军烧毁不要的"火燎杆"。这些"火燎杆"都是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木托全被烧光了，有的还没有大栓。我们当时武器不多，这些"火燎杆"捡回去修一修，装上木托还可以对付着用。

当时，齐齐哈尔的日伪残余势力很凶，白天看起来很平静，一到晚上就出来活动，打枪，打信号弹，制造混乱。开始我也有些害怕，后来时间一长就不在乎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在"白云寮"站了三次岗，在公安局站了一个礼拜，后来又在西满军区后勤部站了一个礼拜。当时西满军区后勤部和苏联红军司令部都在一个院，就是伪满关东军司令部那个院子，解放后市总工会、市武装部都曾设在那里。

参军后，我在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只干了半个多月。当时西满军区后勤部要一批通讯员、警卫员，我就被调到那里去了。那时我的个子很小，只有"三八"枪那么高。调走那天连长给我写了个条子，叫我打好背包，到西满军区后勤部找贾部长报到。从那以后，我又开始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了。

注：戴文祥同志，中共党员，原任齐齐哈尔汽车制造厂三分厂厂长，现离休，家住齐市建华区东二道街仁惠胡同2号。

（叶永才整理）

在西满军区后勤部的日子里

戴文祥

1954年8月25日，我在齐齐哈尔市参加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我们这些新兵都没见过王明贵司令员，只认识我们的马连长和徐指导员。半个多月后，我离开了连队，被调到西满军区后勤部当警卫员。我报到以后，西满军区后勤部就从苏联红军司令部搬了出来，迁到过去的伪满市府。伪满市府在中市场西北，就是全福小学的东院。到那后没住几天，又搬到了伪满宪兵队，就是现在地质队宿舍那个地方。

刚到警卫班时，人地两生，还得从头做起。过了段时间之后，我对人和环境开始熟悉了。我记得，当时西满军区后勤部的部长叫贾石，解放后任外经部副部长，我在北京看过他两次，对我很热情。副部长叫葛江，解放后任北京航空公司总经理。我还认识一个叫阎东江的处长，一个姓谢的处长，还有一个女处长，他们都是新四军过来的。那个女处长特别受战士的喜欢，她每天忙完工作后，总是抽时间给大家补习文化，教大家唱歌。

我刚到西满军区后勤部时，机关人员很少，工作又特别多，特别是接收任务很重。因为我有文化、齐市的情况又熟，首长就没教我当警卫员，而是教我到各处去执行接收任务。当时日伪丢下的军用物资很多，好东西都叫苏联红军运走了，他们不要的教我们去接收。我记得去了这几个地方：一是伪满军械厂，接收

后，首长给我派了一台汽车，叫我带着拉东西。司机叫高三，解放后在齐市银行继续开车。汽车是日本造的“通河”，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当时军械厂是苏联红军把守着，我通过翻译说明来意后，就把我们放了进去。到厂里后，我和司机高三一起，到处捡修枪工具和各种枪的零配件，其中有机枪零件，步枪零件，还有手枪零件。我们两个人累得满头大汗，总共捡了半汽车，然后由我押运到达呼店，装进大车店旁边的一个空房子里。二是伪满第一监狱，就是现在的汽车制造厂。当时里边就是个工厂，机器很多，苏联红军又不要，我去了以后，因没吊车，大机器拆不动，只搬了几台小机床。里边有50多台缝纫机，我们都全部完整地拆下来了。然后我在街里小市上买了很多柳条编的花筐，又雇了20多个老百姓，一件一件地打好包装，又由我押运到达呼店。三是龙江大营。一天，首长教我带一台汽车去龙江军火仓库，苏联红军答应给我们一车子弹，一切都联系好了。我带车到那之后，苏联红军很客气，很快就放我们进去装车。这个仓库都是“三八”枪子弹，我和司机一起满满地装了一车。司机说拉不动，我说拉不动也得拉，因为只叫咱们拉一车，非可劲装不可。当时龙江县在富拉尔基的位置，回来时经过梅里斯运到达呼店。四是第三军管区。在第三军管区院里有个仓库，里边装了很多棉布，苏联红军答应给我们。一天，我带了3台汽车，又雇了一百多台小毛驴车，其中还有我二叔的，到第三军管区运布匹。打开仓库后，我乐得直拍手。嗬，太多了！于是，我先教汽车装，汽车装完后教毛驴车排好，按次序装车，运到达呼店后给车脚钱。这批棉布，我们整整运了一天。在达呼店，为了表示谢意，我们给车夫们做了招待饭，吃的是馒头、小米水饭。发车脚钱时，先领的都是钱，后领的就没钱了，后来首长决定给布，由他们自己挑选，每人给扯一大块。

接收物资工作完成后，我回到了后勤部警卫班。到了10月

份，就是穿棉衣服的时候了，不知为什么后勤部又搬回了伪市政府。几天后，后勤部机关在缴获的战马中挑选了20多匹，除首长外，我们警卫班的一人一匹。马发下来后，我们又在街里买了鞍子，每人还买了一双“翁得”。这玩艺有点象马靴，黑面，高筒，适合冬天骑马穿，非常暖和。装备弄齐之后，首长就教我们抓紧时间练习骑马。当时齐市的人口不多，街上的人很少，我们在胡同里就可以练习骑马。

记得好象是十一月末的一天，贾石部长把我们几个家在齐市住的都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同志们，今天有紧急任务，后勤部要全员出动，具体任务到时候就知道了。”说着，贾部长打开抽屉，从里边拿出很多钱，递给我们每人一打。那钱都是“红军票”，大约每打一百元。钱分完后，贾部长又对我们说：“你们几个马上回家看看老人，替我向他们问好，把钱都留在家里，然后立即返回部队，准备行动。”

我们都非常感动，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啊！当我揣着钱推开家门的时候，妈妈因病正趴在坑上，几个弟弟妹妹都坐在周围，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我心里一酸，差点哭出来。为了使妈妈安心，我硬是把眼泪咽了下去，强做平静地和妈妈说了几句话，又嘱咐弟弟妹妹要好好侍候老人，不要惹妈妈生气。最后，我把钱放到妈妈手里，就急匆匆地归队了。

我从家回来的那天晚上，部队改善伙食，吃的是大米饭、炖猪肉，我饱饱地吃了一顿。大约晚上十点多钟，我们随着西满军区后勤部首长出发了。天黑乎乎的，好在我们路熟，走起来很顺当。我们的队伍经中市场至解放门，又往北走过北大街，很快就过了二道江。队伍到达珠尔金村时，首长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宿营。住下来后，我们从首长们的交谈中才知道我军从齐齐哈尔全都撤了出来。在珠尔金，除了我们后勤部外，还有王明贵率领的自卫军司令部和一个警卫连，其余部队都开到达呼店去了。

第二天，我还听说要打回齐齐哈尔，赶跑国民党。但是，王明贵带着警卫员到市里找苏联红军一商量，苏联红军不同意，说苏军还没有把齐齐哈尔正式移交给国民党，等移交后我军才能打，那样与苏军就没关系了。于是，我们就没有行动，部队全都开到了达呼店。当时到达达呼店的部队有600多人，其中有新四军两个主力连，其余都是嫩江自卫军后组建的部队。在达呼店，我又见到了不少同学，因各有各的任务，所以只是互相打打招呼，并没说什么。

我们在达呼店住了两天，首长就下令去打甘南。于是我们从达呼店出发，经过现在的瑞廷，向聚宝方向前进。部队到达聚宝后开始分头行动，大约在晚上10点多钟，我们就到了甘南县城外围。因人手不够，首长教我们也参加战斗，任务是和公安旅的手枪队一起攻打甘南县城南门。公安旅手枪队是厉男领导的，有几十人，装备是清一色的驳壳枪，战士们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在距离城南门的4华里处，有一个伪满派出所，房子是空的，攻打南门的指挥所就设在了那里。

我们在城外将敌人围了五个多小时，天蒙蒙亮时，上级下达了总攻的命令。交火后，我们才知道南门敌人的火力很强，有两挺机枪。而我们这边都是平地，无遮无掩，加上大部分都是手枪，所以情况很不好。后来发现东南角敌人兵力不足，首长就调动人马从东南角突破。手枪队的同志真有办法，他们把帽子摘下来，用秫楷挑起来，然后插在草堆上，敌人看不清，以为都是人，就集中火力射击，这样就把敌人的火力引开了。当一部分同志摸到敌人炮楼下的时候，恰好我们的一发追击炮弹在炮楼上开了花，我们乘势就攻了进去。当我们打到十字街时，西门也被攻开了，接着北门也打开了。我们前后夹击，敌人很快就懵了，有的被打死，有的缴械投降。只有烧锅的敌人比较厉害，于是我们又拚了一气，最后也拿下来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全部进城，

这时王明贵司令员又下令挨户进行搜查，结果在老百姓家里又搜出不少敌人。

甘南解放后，我们在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开了一个庆功会。有的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不敢来参加。但是当时人也不少，操场上都站满了人。开会的时候，甘南县的一些知名人士都被请到了台上，与我军首长坐在一条大板凳上。在会上，王明贵司令员讲了话，他讲的不多，大意是甘南解放后，我军有了依托，可以伸展了，对将来解放齐齐哈尔有重要意义。

在甘南，西满军区后勤部和嫩江自卫军司令部住在一个院，就是现在甘南县委大院。当时是大院套小院，小院是自卫军司令部，王明贵住里边，大院东西两侧都是房子，后勤部机关住一边，贾石部长住在一座两间的独立房，贾部长住里屋，我们住外屋。于毅夫也住在这里，我们常看到他。我们警卫员除了随首长行动外，还要在住室外面站岗，院外我们不管，另有三个连警卫。

春节过后，王明贵司令员率部队从甘南出发，到齐市周围的各县去剿匪。一个多月后，王司令员带着队伍回来了，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光枪炮不说，还有五辆坦克车呢！不久，我们也离开了甘南，向讷河进军，到那里建立后勤基地。

当时讷河被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土匪头子霸占着，那家伙的外号叫"花蝴蝶"，报号"草上飞"，她手使双枪，心狠手毒，老百姓都怕她。打讷河县城时，一开始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就把东、南、西三个门打开了。可是北门可费劲了，因为北门是由"花蝴蝶"亲自把守，我们集中兵力又打好一阵子才拿下来，"花蝴蝶"带着残余土匪突围逃跑了。部队出城追了90多里，过了飞机场才撤回来。

我军解放讷河后，西满军区后勤部就随之迁到这里。可是，

"花蝴蝶"不甘心失败，第三天她又搜罗人马打回来。那天天还没亮，土匪在北门突然发起进攻，由于我们防范不严，土匪追得快就打了进来。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土匪把我们堵在屋里，他们往里边打，我们往外边打。后来王司令在扎旗调来一个骑兵连，对土匪来了个反包围。这个骑兵连多数是蒙族、达族战士，不仅骑术好，枪法和刀功也都很好。他们砍杀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土匪被歼灭，"花蝴蝶"又夺路逃走了。首长下令猛追，非彻底消灭这股顽匪不可。在骑兵连的迅猛追击下，"花蝴蝶"终于被活捉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讷河军政干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大会，会上宣判了"花蝴蝶"的死刑，会后在城北五六里地的一个高岗下枪毙了她。对俘虏也进行了处理，愿意参加我军的就留下，不愿意的发给路费回家，但必须改邪归正，如再当土匪，抓住严办。

在讷河形势稳定后，首长又把我从警卫班中调出来，叫我当协理员，主要任务是保管军需物资和筹建军需工厂。我上任后，首长又给我配了一个助手，叫他当仓库保管员。这个人姓苏，年纪很大了，是个老红军。他没文化，人很憨厚。我俩一见面他就说："小戴，我归你管，有什么不周到的你大胆批评，我保证接受。"他还说："小戴，你的担子可不轻啊，不过没关系，你就放心干吧，我一定给你看好堆儿。"说实话，我原来真有些担心，人家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我一个小毛孩子，人家能服吗，可老苏的一席话，象是给我吃了定心丸，顾虑都打消了。

当时，讷河有个银行，王明贵司令员在抗战时给放火烧了，可后就没人住了，我和老苏动手收拾出来，就做了仓库。

我的首要任务是筹建被服厂。当时设备已经有了，是以前在齐市拆下来的那部分机器。我发现县城里的戏院空着，就带人打扫清理一下，把机器安上就成了厂房。几天之后，原料也有了，工厂就开工生产军装了。这个厂开始由我代管，后来上级派来了

厂长，他姓李，副厂长叫许军，他俩都是新四军过来的。被服厂投产后，我们又开始筹建制鞋厂。建鞋厂比较简单，因大部分是手工操做，有几台大码缝纫机就行了。我们在市场边找了一栋空房子，也不知到伪满时是干什么用的，就在那儿干上了。职工只有少数几个骨干，其余都是现招的。工具和原料齐了之后，也开工生产了。不久，我们把军械修理所也搞起来了，厂址设在天宝当，任务是修理前方下来的坏枪。这样，我们在讷河就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后勤基地。

生产搞起来后，我的主要任务是供应原料和保管产品，由于工作量的加大，首长又给增加了3个人，这样算我在内，就有五个人了。不久，后勤部首长又给我们一个新任务，就是要多为部队筹集款子。这下可把我们难住了，到哪去筹啊？后来还是首长给我们出了主意，教我们把县城的两个烧锅弄过来，烧酒挣钱，钱不就有了吗？按照这个主意，我们真的把烧锅“军管”了，对厂主说我们借用一段，原料我们自己搞，工人的工资我们开，就算你为革命做贡献了。厂主同意后，我们就烧起酒来了。

当时的酒很好卖，特别是苏联红军还没走，他们特别爱喝酒，所以生产出多少都剩不下。我们把卖酒的钱全部上缴，做为部队的军需开支。后来，我们改变了卖酒方式，对苏联红军不要钱了，教他们拿好枪和子弹换，这样他们也乐意，因为他们多余的枪弹很多。于是，我们用酒在苏联红军手里换了不少好枪和子弹。最高潮时，他们把汽车都开来换酒。当时两个烧锅很热闹，我怕出事，就派人看着，维持秩序。几个月后，我们的情况很有好转，就把烧锅退给了厂主。

1946年3月，我军解放嫩江县之后，我就跟阎处长来到这里，任务是开一个制币厂。经过筹备，制币厂建成了，厂址就在嫩江银行。我们的机器很笨，只能印黑、红两色，所以就只能印“红军票”。钱印出来后，我们就送回后勤部，再把这些票子

发到部队。

1946年4月24日，我军第二次解放齐齐哈尔。大约在6月，上级决定将讷河、嫩江的所有工厂迁回齐齐哈尔。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搬迁的具体工作。第一个迁回齐市的是被服厂，厂址在现在的铝制品厂院里，后来改名叫304被服厂。在抗美援朝期间，这个厂全部生产志愿军军装。1951年，为了方便运输，这个厂迁到丹东一部分。直到1954年全都交给了齐齐哈尔市政府。迁回的第二个工厂是制鞋厂。原来齐市有一家民用鞋厂，上级决定两厂合并，形成一个军民合用的企业，一直发展到现在的黑龙江制鞋厂。第三个迁回来的是制币厂。迁回后就交给了齐市银行，军区后勤部不管了。最后一个迁回的是军械修理所。迁回后正赶上伪满军械厂被接收，于是军械所的人员、设备就都交给了这个厂，建立了西满军区后勤部军械厂，也就是现在建华厂的前身。

从1947年初开始，西满军区后勤部的军工企业陆续移交给地方，我也就在这一时期转业到地方工作，被分配到第五区政府任工商助理。

（叶永才整理）

解放齐齐哈尔之役

叶永才

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接收大员进入东北。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红军要求我党政军撤出齐齐哈尔。中共嫩江省委决定，按照党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将党政军机关迁往甘南，占领广大乡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开展剿匪斗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当时，甘南县城被匪首王维国盘据着，当王维国听到自卫军准备解放甘南的消息后，又从阿荣旗调来刘振清、刘绍一两股土匪，加上原有守敌，共4百余人，企图与自卫军决战。

12月11日晚，嫩江省军区司令员王明贵，亲自指挥自卫军一旅向甘南守敌发起进攻，经3小时激战，一举解放甘南县城。这次战斗，除击毙者外，俘敌3百余人，匪首王维国带二十几人冲出包围向北逃窜，缴获重机枪5挺，轻机枪10余挺，步枪3百多枝，战马3百多匹。

攻打甘南战斗的胜利，为省市党政军机关撤离齐齐哈尔后开辟了根据地，站稳了脚跟。

嫩江军区部队撤离齐齐哈尔后，在甘南进行了暂短的休整，从1946年1月开始，所属部队在齐齐哈尔市周围各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到3月末止，嫩江、讷河、泰来、甘南、林甸、富裕、泰康、龙江、景星、布西等县全部解放，而且广大村镇政

权已相继建立，人民群众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斗争形势不断发展，敌人占据的齐齐哈尔已成为一座孤城，市内的守敌已成为瓮中之鳖。解放齐齐哈尔的客观条件已完全成熟。从东北战局来看，从3月初开始，进攻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占领了锦州、沈阳等地之后，于3月下旬以5个师的兵力，沿沈阳至长春的铁路北犯。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以南歼敌1个多师，致使敌4月初占领四平的计划未能实现。4月18日，四平保卫战已正式开始，因此，开辟西满革命根据地已迫在眉睫了。

对于正确把握时机，适时收复齐齐哈尔，党中央、中央军委也非常重视，在3月22至26日的几天时间里，曾三次电告东北民主联军，做出了明确指示。

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东北局、各兵团：

东北停战谈判有很快签字之可能，苏军也有由此撤退之说，顽军欲乘此和战未定之际，拼命抢占地方。我们应与之针锋相对，占取下述各大城市，以便利于将来继续谈判，争取优势，因此，做如下部署：

不论停战与否，在苏军撤退时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如果在停战前苏军已撤退时，我们应迅速夺取长春，各兵团具体如下：

甲（略）

乙、由西满派适当部队与嫩江王明贵主力，担任夺取齐齐哈尔之任务，其指挥具体部署由李、黄决定。

丁（略）

1946年3月24日22时

第二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林、彭：

恩来今日已到重庆，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实际停战还需若干时间，因此，你们至少还须经过一、

二个星期，也许更长的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期间内，敌方拼命进攻，企图造成控制更多的战略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是保卫北满。据悉，顽军运输困难，弹药不足，望切实破坏铁路、公路，截击顽军后方联络线，以夺取战役的胜利，凡有苏军的地方，小组均不会去，但苏军撤退地区若有冲突，小组即将派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一、二日内控制之，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地方大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也将保证我军的占领。

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

中央（少奇拟稿）

1946年3月25日

第三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林：

（一）顽军由本月起，以沈阳为中心，向我展开扇形攻势，战争还在继续发展中。

（二）（略）

（三）各军区应不顾惜暂时可能丢掉某些地区（例如被土匪占据）将守备兵力减少到最小限度，而抽调最大限度的兵力，参加此次有关东北局的大会战。各军区的兵力具体部署、具体任务如下：

甲、西满军区应抽调主力三个旅至四个旅兼程集中于四平附近地区，归林总指挥，另以主力一部协同王明贵部，准备占领齐齐哈尔。（下略）

1946年3月26日3时

遵照中央的指示，解放齐齐哈尔的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为了加强作战力量，保证一举成功，上级派来了数千人的主力部

队，与嫩江省军区所属部队一起，担负解放齐齐哈尔的作战任务。

参加解放齐齐哈尔的各部队有：一是嫩江省军区所属的警备一旅、二旅和蒙古骑兵大队；二是倪志亮率领的两个辽西支队；三是靳虎率领的第十九旅；四是新四军三师特务一团。

为了便于统一组织指挥，按上级要求成立了解放齐齐哈尔作战指挥部，由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明贵任副总指挥，刘锡五任政治委员，郭述申任副政治委员，指挥部设在昂昂溪。

齐齐哈尔守敌的概况是：1946年1月9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嫩江省主席彭济群进入齐齐哈尔时，只带了一个连的警卫部队。但彭济群于24日宣布就职后，很快就收编了活动在嫩江、讷河、拜泉、依安等地区的尚其悦匪部，活动在龙江、甘南、扎兰屯等地区的张伯藩匪部，活动在齐市和周围各县的伪军警宪特、地痞流氓、地主武装等，于1月26日成立了国民党嫩江省保安警察总队，彭济群任总司令，部队由伪警务处处长张维仁和高凌昭具体组织指挥。不久，保安警察总队改称为保安军，由尚其悦任军长并代理保安司令。保安军下辖23个大队，总兵力约7千余人，形成了国民党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军事力量。经过自卫军4个月的围剿，盘据在齐齐哈尔周围的匪军大部已被消灭，少数逃进齐市。在齐齐哈尔解放前夕，市内共有守敌5千余人。

市内守敌为了阻止民主联军的进攻，紧急构筑了大量工事、街垒，各主要街巷口还设了铁丝网路障。

4月20日，解放齐市指挥部接到驻市内苏联红军的通知，他们定于23日8时全部撤离齐齐哈尔，得知这一情报后，指挥部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总攻时间，调整了兵力部署。各参战部队的具体任务是：第一、辽西支队和新四军三师特务一团为主攻，从南市郊向北发起冲击，主要任务是占领大民屯，夺取飞机场，然后进入市区占领公安局。第二、十九旅从东南郊发起冲

击，主要任务是突破大乘寺，攻取东大营、占领火车站。第三、警备一旅步兵团从东市郊发起冲击，主要任务是拿下北大营；该旅骑兵团埋伏于乌裕尔河大桥附近，任务是阻击向该方向逃跑之敌。第四、三旅一部从西南郊发出冲击，任务是占领市政府；另一部和蒙古骑兵大队埋伏于嫩江大桥两侧，任务是阻击光复军七旅对齐齐哈尔守敌的增援。

4月24日凌晨两点整，解放齐齐哈尔的总攻开始。参战各部队按照预定目标，以锐不可当之势压向市区。由于各部队攻势勇猛，加之总头目彭济群已于23日随苏联红军逃走，因此敌斗志衰退，无心恋战，慌忙将各种贵重物资和银行的全部现钞装上汽车，由部队掩护向乌裕尔河的龙安桥方向逃跑。指挥部发现敌人的企图后，立即命令炮兵进行拦阻射击，将大部敌人堵截在宛屯一带，警备一旅一团在团长李学良的指挥下，将逃跑之敌分割包围，活捉了敌旅长张伯藩以下3百余人，敌人企图运走的全部资财也都被截获，跑得快的敌人到龙安桥之后，遭到警备一旅骑兵团的伏击。这股匪徒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在骑兵团的猛烈打击下，完全失去指挥，四处奔逃，经骑兵团的一阵追杀，除顽抗者被击毙外，其余全部投降。与此同时，各部队都进展顺利，分别攻占了预定目标，至此，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宣布结束。24日清晨，解放齐齐哈尔的各路部队迎着初升的太阳，出现在街巷，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

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共歼灭和俘虏敌人3500余人，缴获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各种武器四五千件，战马数百匹。同时还接收了6千余名伪满国兵。根据上级指示，除特务一团补充7百余人外，其余分别补充各主力部队。几天后，上级又决定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八个骑兵大队，辖4个连，共5百余人，由新四军三师特务一团副团长毛和发任大队长。该大队的任务是在西满地区继续开展剿匪斗争。（根据董仁、毛和发、王明贵回忆材料编写。）

军事围剿　铲除匪患

叶永才

1945年"八·一五"后，日伪残渣余孽，千方百计利用旧势力建立起了名目繁多的土匪武装。为了开辟巩固的西满根据地，我军主力部队和嫩江军区部队在广阔的嫩江平原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以大部队围剿和小部队追歼相结合的战术，剿灭了大股土匪和敢于公开活动的土匪，完成了剿匪斗争第一阶段，即军事进剿阶段的任务，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了土地改革运动，巩固了西满根据地。至1947年3月以后，漏网的残匪和暗藏的土匪主要由公安部门实施侦破，必要时部队给予配合。

一、齐齐哈尔地区的匪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果实，进而扩大其统治范围，在正面进攻我东北解放区的同时，大量派遣国民党建军特务深入我后方根据地，收罗日伪残余分子，收编、组建反动的土匪武装，四处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在国民党建军特务的大肆活动下，一时间，嫩江地区的政治土匪蜂起，各种招牌的"军"、"师"比比皆是，"光复军"、"挺进军"、"先遣军"等土匪部队遍布各地。这一时期的主要股匪有：

尚其悦股。尚其悦为"第一战区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军长"，直辖四个旅，共有数千人，活动于依安、讷河、嫩江、拜泉一

带。

卢兴周股。卢兴周任“嫩黑兴三省保安军暂编混成军第二旅旅长”，手下有四、五、六三个团，约数百人，主要活动地区是甘南。

王中国股。号称“光复军”，有4百多人，活动于甘南境内。

林绍先股。林绍先为“光复军团长”，有4百多人，活动于林甸境内。

宋同山股。宋同山为“挺进军旅长”，有上千人，活动于甘南、龙江一带。

尹彬甫股。尹彬甫为“挺进军旅长”，有近千人，活动于齐齐哈尔周围的朱家坎、碾子山一带。

关作舟股。关作舟为“光复军旅长”，有千余人，活动于嫩江境内。

1946年1月初，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高凌昭率领伪满“铁石”部队进入齐齐哈尔市。这些“接收大员”们一到齐齐哈尔就四处收编“光复军”、“先遣军”、“挺进队”等各股土匪和地主武装。各地的土匪，如讷河的尚其悦、甘南的卢兴周、张伯藩等也纷纷窜入齐市，凭借其拥有的力量讨取封赏。这些土匪经过改编后，组成了“嫩江省保安警察总队”，由张维仁（蒋军警务处长）统率。“保安警察总队”改为“保安军”后，土匪头子尚其悦充任军长。这股国民党建军土匪主要集中在齐齐哈尔市及周围各县，兵力最多时，达一万八千余人。

嫩江地区的土匪肆虐，活动猖獗，给我嫩江地区造成严重危害，其主要祸患是：

（一）攻城夺地，颠覆我新生政权。“八·一五”光复后，我相继在嫩江省所辖各县筹建和已建的人民民主政权，成了国民党武装土匪主要的进攻目标。1945年11月25日，光复军一千人在

匪首尚其悦的带领下，向我讷河县城发动袭击。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虽经奋力抵抗，终于失守。

（二）策动叛乱，分化我武装力量。1945年12月24日，我骑兵独立营在匪首卢兴周的策动下发动叛乱，我党派入的两名官兵被杀害。

（三）匪特勾结，大搞暗杀活动。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在政治、军事上的败局，打击我革命力量，一直把暗杀我党政军领导干部，作为土匪特务的重要活动目标和主要任务。仅1945年10月至46年1月的4个月里，嫩江省境内就连续发生五起国民党匪特暗杀我干部的事件。如1945年11月28日，泰来匪徒胡郁文以请嫩江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张平洋商议军需为由，将其骗到伪商工会，谈话间，匪徒傅国石持枪而入，将张平洋同志杀害。

（四）破坏铁路交通，截击运输物资。1945年12月25日，国民党依安党务专员办事处书记长宣明哲伙同匪首孙藻庆纠集骑兵二三百人，在鳌龙沟西砂场伏击我军火列车，使我受到严重损失。

（五）烧杀抢掠、荼毒无辜。国民党建军土匪既有顽固的反共本性，又有侵扰人民群众的“胡子”特点。他们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如拜泉匪首刘玉堂，仅在1945年至1946年间，就抢得棉布1万6千余尺，银元1700多块，苏联流通券16万5千元和各种金银首饰。

国民党建军土匪的猖狂破坏活动，极大地威胁着我新生民主政权，严重地破坏了我后方根据地的安全，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捍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我嫩江部队的当务之急，就是剿匪平叛，彻底消除嫩江地区的匪患。

二、我军在嫩江地区的剿匪作战

1945年9月间，我进入嫩江地区的部队在齐齐哈尔市成立了

嫩江省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王明贵任司令员。随后，在陆续到达齐齐哈尔市的各部队的基础上，组成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第一旅和第二旅。这两个旅各辖两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一旅还配属1个炮兵营。两个旅装备齐全，是嫩江人民自卫军的骨干力量。11月初，嫩江军区成立，王明贵任司令员。该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泰来军分区、讷河军分区、龙江军分区和林甸军分区。同时成立齐齐哈尔市卫戍区司令部，司令员吴富善。

1945年11月，中共嫩江省委和嫩江省军区党委举行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嫩江省的匪情，决定在齐齐哈尔的我嫩江人民自卫军主力部队离开城市，开赴各地进行剿匪。

11月中旬，林甸县公安部队发生叛乱。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员吴富善奉命率部队进行平叛，我平叛部队采取夜袭战术，快速冲入县城，将叛匪全部捕获。次日，我军当众将匪首枪毙。与此同时，我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率自卫军一旅攻打富裕叛匪，敌人闻讯，仓皇逃窜。

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接收大员"进入东北。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苏军要求嫩江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各部队撤出齐齐哈尔。中共嫩江省委经请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嫩江省党、政、军机关及铁路局全部撤出齐齐哈尔市，迁往甘南。鉴于当时的形势，嫩江省委经全面研究分析后认为，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嫩江我党我军必须顺应形势，占领县城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剿匪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解放齐齐哈尔，全面夺取嫩江省政权。

当时甘南已被匪首王中国、刘振清、刘绍一所率的土匪占领。为保证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机关安全迁入甘南，省委决定由王明贵率自卫军一旅先行出发，进攻甘南，消灭甘南匪部。1945年12月11日，我自卫军一旅在王明贵的带领下，抵达甘南。战斗打响后，我军首先从城东突入城内，刘振清、刘绍一匪部见

势不妙，丢下阵地，仓皇逃离。经三个多小时激战，我军解放甘南。此战我军缴获长短枪500多枝、战马300多匹，俘敌300多人，匪首王中国仅带20多人脱逃。这次战斗是我嫩江人民自卫军第一次较大的战斗，我军旗开得胜，声威大振。

嫩江省党、政、军机关迁到甘南后，省军区对剿匪部队作了重新部署：自卫军一旅开往阿荣旗追剿土匪刘振清、刘绍一；自卫军二旅和蒙古部队在碾子山、富拉尔基、景星和扎兰屯一带围剿国民党建军土匪六旅 、七旅 。自卫军一旅按部署到达阿荣旗后，首先采取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慑于我军威力，匪首刘振清带领20多人向我投降，刘绍一拒不投降，被我消灭。阿荣镇土匪被解决后，我一旅迅速向平阳镇开进。盘据在平阳镇的土匪是从讷河、德都 、克山方面流窜到此的，约有四五百人 ，他们凭借着城壕和四面的炮台企图顽抗。我军到达平洋镇后，迅速将其三面包围，剩下的城东方向，由骑兵团在距城20多里处的江桥埋伏。夜晚，我军发起攻击。顽固的警察署和炮台里的土匪大部被歼，从东面逃出的土匪亦遭我骑兵团的阻击，其余的土匪利用街巷房屋进行顽抗。第二天下午 ，在我强大的政治 、军事攻势的打击下，一百多土匪全部向我投降。此次战斗 ，我军缴获步机枪300余枝（挺），子弹两万余发，战马80多匹，土匪大部被歼。

我嫩江党、政、军机关进驻甘南后，国民党武装土匪“光复军”七旅宋同山部、六旅尹彬甫部和“红枪会”6000余人，沿滨洲铁路向甘南进犯，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消灭我首脑机关。我自卫军二旅奉命进行抵抗，但由于敌强我弱，我二旅不得不节节后退。鉴于甘南的紧迫形势，省委书记刘锡五亲自乘车到平阳镇调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及自卫军一旅速返甘南。我自卫军一旅返回甘南后，经周密地分析研究，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夜间攻击，猛打猛冲，各个击破的战术，将一倍于我的匪军全部击溃，粉碎敌人的进犯。当夜 ，我自卫军一 、二旅和蒙古骑兵旅分别向敌

六、七旅发动进攻。经激战，匪军损失惨重，溃逃。这次战斗是嫩江剿匪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我军各部队协同作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46年1月，活动在合江、龙江地区的刘山东匪部窜入嫩江地区，企图进犯讷河。根据敌情报告，省军区立即命令一旅火速向讷河开进。部队经两天两夜急行军，较敌提前到达讷河镇。刘山东匪部一千多人到达讷河镇边时，探知我援军已到，遂在镇外住下。天黑时分，我一旅和讷河军分区部队，兵分两路向刘山东匪部发起进攻。敌军抵挡不住，仓皇逃窜。我军边追边打，连续追击四五天，歼灭敌军四五百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刘山东残部逃入黑河一带。

经过两个多月的剿匪斗争，我军已完全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为了巩固剿匪斗争的成果，进一步消灭齐市以外的残余匪帮，我嫩江剿匪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将土匪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加紧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全歼残匪的斗争。到1946年4月，我军先后解放了齐齐哈尔周围的各个县城，国民党建军土匪原有的约1万8千余人已被我歼灭过半；除七旅宋同山部二、三千人还盘踞在景星、内蒙一带外，其余全部窜入齐市，陷入我人民自卫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46年4月，经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批准，我嫩江人民自卫军决定向齐齐哈尔发起最后的进攻。遵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第十九旅、第二十一旅之六十二团和×师特务一团前来增援。为加强各部队之间的协同，我围攻齐齐哈尔各部队成立联合指挥部，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明贵任副总指挥，刘锡五任政委，指挥部设在昂昂溪。4月中旬，指挥部下达了各部队的具体战斗任务：东北人民自治军增援各部队的任务是经飞机场，进占省公安局、东大营和火车站；嫩江省人民自卫军第一旅从齐齐哈尔东面进攻，攻击目标是敌“十三”部队和北大

营及省政府；一旅骑兵团的任务是攻占乌裕尔河的龙安桥，堵截和消灭逃向这里的敌人；蒙古自卫军五旅的任务是在齐市江北岸阻击增援齐市和齐市渡江逃跑的敌人；二旅的任务是从齐市西面进攻，占领市政府，另一部守住江桥，阻击宋同山的增援部队。在我军的威慑下，敌军军心动摇，被围困在齐市的敌人也几次试图突围，但均被我军击退。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见孤城难保，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4月23日，苏军全部撤出齐齐哈尔，我军即于当日晚下达了总攻齐齐哈尔的命令。午夜两点，我炮兵发出了总攻的信号，各部队随即展开了全面进攻。守城敌军迫于我军威势，纷纷溃逃，剩下的一批顽军开着坦克、装甲车和装满物资的汽车，企图从火车站北面向乌裕尔河的龙安桥方向突围，但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匪徒纷纷倒毙，剩下的全部缴械投降。战斗中，十九旅占领了南大营和飞机场，二旅占领了省政府、市政府和公安局，一旅占领了野炮队和"十三"医院。至此，齐齐哈尔市被我军彻底解放。

齐齐哈尔解放不久，陈云同志到达齐市，代表中央传达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开展土地改革斗争"的指示。嫩江省委从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学校中，调出成千干部下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的要求，嫩江省军区对所属各部队进行了新的部署，一方面要求各部队继续对流窜在边远地区的残匪实施清剿，另一方面配合土改工作队深挖潜伏下来的残匪。经我军的不断追剿和深挖，到1947年3月，嫩江省的匪患基本消除。

榆树岗智退顽匪

张 风 海

1946年 8月下旬，为了保卫杜尔伯特草原上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根据中共嫩江省委和西满军区的指示，由中共泰康县委①统一组织，杜尔伯特旗保安大队配合两支主力部队，武装追剿盘踞在本旗好尔陶努图克②杏树岗村的王克服匪部。

那是一个秋雨霏霏的傍晚，县委书记胡锡先同志③找到刘金铭同志④，对他说："老刘啊，部队明天打杏树岗，旗里决定派你先行一步，明天起大早，骑快马，带两个战士，到杏树岗附近的村子，秘密发动群众，绑担架、掰青苞米、筹集军需，支援剿匪部队。"

刘金铭接受命令后，立即到公安局刘彩局长那儿领了18颗子弹和1枝手枪。

午夜时分，秋风夹着细雨还在不停地下，天黑得象黑锅底似的，为了不耽误事儿，刘金铭就带领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冒雨出发了。

大约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们来到杏树岗东南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有五六十户人家。村子四周修着七八尺高的黄土围墙。这时，雨停了，太阳也从厚厚的乌云后面挣扎出来。

刘金铭等被获准进村后，首先见到村长。

村长是一个中等身材、微胖、年近五十的汉子。他是本村的地主，我党在杜旗建立民主政权后，曾去旗里开过会，对我党的主张比较拥护。因此，当他弄清了刘金铭等的来意后，连连表示“理应效力”。于是，他一面安排刘金铭他们吃饭，一面去召集村民。

但是，不大一会，村长却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刘长官，不好了，外面来了百十个胡子，要在这儿‘借条道’、‘打打尖’，我教乡亲们关了大门，就赶紧跑来报告了！”

刘金铭听了，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股过路的流窜土匪。如果进了村子，一会影响我们的计划，二会使群众受到损失，因此，决不能让他们进村。想到这里，他对两个战士和村长说：“走，我们到墙上去看看。”

他们到墙上往下一看，只见土匪们在距土围子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并且高喊：“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就往里闯了！”

刘金铭双手作喇叭状，也高喊：“你们闯，我们也不开门！”同时，命令两个战士迅速与他拉开距离，听候命令。

这时，土匪们真的向土围子冲过来了。在他们距土围子20多米的时候，刘金铭果断地大吼一声：“打！”三枝枪同时向敌人开了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把敌人吓蒙了，他们本能地赶紧回头向后跑。一直跑出五六百米。

趁此机会，刘金铭把村长叫到跟前，说：“土匪们醒过盹儿来还会猛攻的，咱们要吓跑他们，你动员乡亲们带着家什（钐刀、铁锹、棍棒之类）都上墙猫着，土匪们真上墙，就使家什打死他们。然后，你再派几个人用扫帚在尘土厚的地方猛扫，把土都扫起来，越显得乌烟瘴气越好。这样坚持一会，我们的援兵就会赶到。”村长哆哆嗦嗦地赶紧说：“从命，从命……。”

果然，不多时，匪徒们经过一番商量，可能猜出了我们的枪

支不多，就又分成几伙，向土围子冲过来。

敌人越来越近了。

这时，土围子里也被一些群众扫得尘土飞扬了。

眼尖的匪徒看到这情景，以为土围子里可能有骑兵要冲出来，怕逃跑不及，就扭转头，边逃边喊："里边有骑兵，快跑！"

恰在这时，我们的一个区联队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从东北方向打了过来，边打边吹冲锋号。

这一下，敌人更蒙了，慌忙向肇源方向逃窜。

注：

①当时在杜尔伯特旗的中共党组织称中共泰康县委。

②努图克，相当于当时县（旗）属的区。

③胡锡光，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④刘金铭同志现已在辽宁省新抚钢厂党委书记任上离休。

解 放 朱 家 坎

杨 树 明

龙江县第三个县城叫朱家坎，是九十多年前形成的一个老地名。“坎”字实因地形名之，意指东有漫岗，西有高丘，北有小山，凹凸坎坷之谓也。说来凑巧，朱家坎的解放道路，也象它的名字一样，充满坎坷，简直使人刻骨铭心！

股匪　盘据朱家坎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黑龙江省西南一隅的龙江县，成为国、共两党的必争之地。位于滨州线上的战略重镇朱家坎，国民党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派遣特务，搜罗伪警、宪、特、地痞流氓、土匪武装、恶霸地主在此建立维持会，成立“党专”，组建“大排队”、“保安军”，一时风云变幻，不可一世，大有朱家坎舍我其谁的架势。

1945年9月中旬，由徐文达、张子敬、陈秉耀、杨而光、高子明，于海川、李茂堂、赵寿增、徐俊青、张凤亭 等10余人 发起，组成朱家坎维持会。

维持会的组织情况是：委员长徐文达（徐英山），副委员长张子敬，公安部长于海川，公安部副部长于××（当过屠宰场主任），宣传部长高子明，宣传部副部长张凤亭，会计部长李

茂堂，会计部副部长李向杰，接待部长张子敬（兼），接待部副部长徐永德，秘书部长陈秉耀。其中宣传部下设5名办事人员，他们是王维斌、徐福库、任嘉明、李子新（当时有两个李子新，不是医院的李子新）和徐胜久。会计部负责管理资金、供给、筹划等事务，办事人员也是5人，都是商人兼任。接待部下设5名办事人员，有李茂堂、张凤亭、李向杰，还有邮局善局长等。这些人都会点俄语，专门负责接待苏军和各方面的应酬。

最初，维持会的宗旨是：维持地方治安，保护日伪留下的财产、物资，供应苏军军需。但因这些维持会的成员均为本地资本家、地主、伪村公所成员，几天后，维持会的上层人物徐文达等，就和以徐子英、徐悦天为首的国民党朱家坎区区党部互相勾结起来。不久，以维持会秘书部长陈秉耀为首，另行建立一个国民党区党部，朱家坎维持会的上、中层人物又参加了这个组织。当时，龙江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是王孝和。朱家坎区党部均归王孝和具体领导。从此，朱家坎维持会成为县国民党党部安插在本地的一个反动政治集团。

维持会初建时，只有几名武装人员，枪支是伪警察署遗留下来的。

1945年10月，国民党派兵东北，占领了沈阳、长春等地。同月张伯藩由齐齐哈尔来到朱家坎。张伯藩在“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由维持会委派在警察局任督查处长，做恶多端。不久、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干部王明贵、张端麟等17人进入齐齐哈尔，以王明贵为司令员建立了嫩江省人民自卫军，随即建起省会公安局，接管了维持会、警察局，张伯藩此时被我清除。他在齐齐哈尔天主教堂隐藏了几天，窜至昂昂溪、朱家坎、景星、甘南一带，带着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的委任状组织嫩江省保安军。他到朱家坎后，马上收编徐文达等政治土匪，他与伪协和会会长、

维持会委员长徐文达，以及张子敬、于海川等组建了嫩江省保安军第三旅。他们开会决定：第三旅接受嫩江省保安军领导，由张伯藩司令统一指挥；招兵买马，迅速扩大第三旅人员，使其成为名副其实“旅”的建制；立即与景星、碾子山、七棵树等维持会及其武装力量联合一起，互相勾通，互相声援；公开打出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号，做好准备，等待国民党前来接收。

张伯藩在朱家坎策划几天之后，又去景星活动，旋即返回朱家坎坐阵两个多月。

在张伯藩的指使下，徐文达马上成立了保安军第三旅，迅速扩大兵员，不久，便建起步兵和骑兵两个分团，后来又建立起一个武术团（即红枪会）。第三旅的情况是：

旅长，少将徐文达；副旅长，少将张子敬；参谋长，上校高子明；旅部副官，上校徐永德；副参谋长，上校于海川；军需主任，上校李茂堂；军需副主任，上校张凤亭；军械处处长，上校徐悦天；军械处副处长，中校王振武。第一团（骑兵团）团长，上校于海川；副团长，少校王海亭。第一团第一连连长，少校于德海；第二连连长，少校王海亭（兼）；第三连连长，少校李洪奎。连下设排长和班长，排长、班长都由地方临时指派。作战时，连长直接指挥。其中委任了4人，即第一团团长于海川和三连长李洪奎发了委任状；二团（步兵团）团长徐福库、三团（红枪会）团长杨福源，都是口头委任的，准备人枪齐备时重新委任，总计260多人，203枝枪。其中自备手枪6只（买4枝借2枝）其余都是张子敬向苏军司令部借的，第一次借30枝，第二次借60枝，第三次借107枝，共借197枝枪。另买重机枪1挺，后来在跟我军作战中得轻机枪2挺、大枪6枝。

为收买人心，让参加自卫团的人死心塌地为其效劳，旅部每个骑兵每月发饷500元，每个步兵发饷300元，武术团每人每月发饷800元。这些军饷的来源，全从当地居民商号中缴收。朱家坎

保安军第三旅，曾枪杀我军侦察人员1人，张姓无辜群众1人，打死拾亚麻老太太1人。从他建立之日起，就是一支地地道道的鱼肉百姓，反共反人民的武装政治股匪，是我军解放朱家坎的劲敌和最大障碍。

收缴　碧血染长街

1945年10至11月，在齐齐哈尔市相继成立了以于毅夫为首的嫩江省人民政府，以王明贵为首的嫩江省军区。在龙江县成立了以张汉丞为首的龙江县军分区，以周刚、张培凯为首的龙江县政府，以肖磊为首的龙江县公安局。他们与先后跟在齐齐哈尔和龙江地区建立起来的“挺进军”、“保安军”“光复军”、“先遣军”及各县的土匪绺子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1945年10月，嫩江省民主大同盟派乔鸣远进驻警察局，改造组建了嫩江省会公安局，刘铁男为局长，乔鸣远为副局长，随即建立了一支有五六百人的公安队，后改为嫩江警备部队。鉴于朱家坎是中东路上一个战略重镇，这里的维持会保安军第三旅又死心塌地地投靠被省会公安队清除的国民党反动派顽固势力张伯藩，因此决定收编和改组这里的反动武装，使其成为人民自卫团，使此地成为革命根据地。

1945年12月初，嫩江省公安队派厉男同志与朱家坎维持会进行一次谈判，准备统一收编这里的武装力量，结果遭到朱家坎维持会反动头头的无理拒绝。

1945年12月26日，驻齐省会公安队和嫩江省自卫处，派乔明远和厉男率领50余人由齐齐哈尔赴朱家坎执行缴械反动维持会和其武装力量的任务。

当天上午，公安队乘坐两辆消防车和一辆卡车出发，路经回子房，其中一辆消防车因出事故，暂时停下修理。吃过午 饭 之

后，乔明远、厉男率领所部40余人乘坐1辆卡车、1辆消防车，先奔朱家坎，准备与驻扎朱家坎的苏联红军联络，共同对反动维持会进行缴械。下午三四点钟，车由东北大架子山开进城里，顺着东一路南北大道进街，经朱家坎维持会院东，开到一道街再向右转，直奔苏联红军司令部。

乔明远和厉男找到了驻防苏军中校萨特斯契克，中校对我公安队的突然到来感到很惊讶，当乔明远和厉男说明情况后，中校说：苏军驻朱家坎的兵员很少，而且毫无对地方维持会武装进行缴械的准备，感到很抱歉。

乔明远和厉男看到，公安队不能得到苏联红军的帮助，自己的力量又远不能和三旅保安军抗衡，处于敌强我弱之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知道缴械不成，决定撤回。

这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保安军三旅副旅长张子敬闻讯带领一些武装人员，匆忙赶来。见其来势汹汹，苏军怕他们横生事端，远远喊话，想阻止他们。他们不听，继续前进。苏军中校立即命令士兵用机枪封锁。这时，才暂时阻止了张子敬一行的到来。

但是，反动的维持会并不甘心，他们又通过其它途径找到我方负责人员，提出无理要求，说什么我公安队车辆来此，影响他们维持地方治安，为避免兵戎相见，要求我公安队车辆取一道街至东岗路撤回。

我方并未被敌人的气焰吓倒，又急速和半路出现故障车辆上的人员取得联系，汽车强行从来路开回。

当卡车行至维持会驻地附近，维持会岗哨，步兵分团二班赵连芳、牟树奎等六七人，在二班带班王兴武的指挥下，突然对我汽车开枪，汽车继续向前冲去，没出几步，“啪”地一声，汽车水箱被打坏了，汽车因漏水而抛锚。同时，我公安队员焦××也被敌人乱枪打死。

这时，苏联驻军司令部听见枪声，萨特斯契克马上派人与维持会进行交涉，在苏联驻军的制止下，维持会被迫停止射击。

乘坐卡车的乔明远、厉男与车上的公安战士马上弃车徒步离开，打坏的汽车被推至维持会门前。

后行的消防车，看到前路被阻，便沿着东岗路开离朱家坎，因此，才免遭毒手。

次日清晨三点来钟，我公安队乘坐的前一辆消防车修 好之后，载着14人，从白天汽车来路进街。行至维持会院东街口附近，发现那里停着的卡车，正是我公安队乘坐的那辆，误以为我先行部队，已经把朱家坎的反动武装缴械。因此，开车直奔维持会而去。

维持会站在房上的哨兵孙宪文、陈凤仪发现一辆汽车开来，远远端枪喊道：

“停下来，停下来，不停就开枪啦！”

我公安队听到喊声，马上刹车。这时，我公安队车辆距维持会大约四五十米远。

按照维持会的要求，我方张排长派一名班长走下车来，与维持会喊话联系。

维持会带班王希岭问：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省公安队的。”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接收朱家坎维持会。”

当时，因徐文达正在齐齐哈尔开会，家里带班总负责是副旅长张子敬。王希岭进屋请示张，张下令：

“开枪打！”

王希岭出屋下达开火命令，匪军孙宪文迫不及待地搂火打了第一枪。

罪恶的枪声，在向我省公安队示威，准备负隅顽抗。我班长立即撤至车旁。匪会员同时向我方开火。我14名指战员，马上进行自卫还击。双方激战1个小时，我公安队员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有4名战士牺牲，有1名战士身负重伤。敌人组织匪军，对我公安战士开始合围包抄。我张排长命令战士迅速撤离隐蔽，自己一边在后面掩护，一边后撤，为了引开敌人的注意力，他向战士撤走的相反方向离去，侥幸脱险，安全归队。司机邹纯银，在撤离中未找到合适的安身之处，在冰天雪地中冻坏了手脚 。天亮后，被住在一道街的岳父救出，脱离险境。司机助手李桂林，撤离中没有跟上其他战士，离开队伍隐蔽出城自行脱险。

匪军冲至汽车前，只发现4具战士尸体和1名重伤人员，还有2挺不便拿走的轻机枪。匪徒王政相，对我完全失去战斗力的重伤员勾动了枪机，这名受伤战士，立即饮弹身亡，为朱家坎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我撤离的战士，隐蔽时的行踪，被二道街一个外号叫铁头的孙玉山发现，他立即向维持会报告：

“有六个八路军正藏在侯家铁匠炉！”

张子敬当场夸奖了孙玉山几句，然后向他面授机宜，让他马上回去，和侯立奎掌柜想方设法将我公安战士稳住。天亮后，张子敬给正在开会的徐文达去电话，报告其攻打八路军的“战果”。徐文达对他大大赞扬一番，并命令：

“抓住余匪，立即枪毙！”

张子敬马上派步兵团长徐福库、骑兵三连长李洪奎率领三四十名匪军包围了永和昌皮铺对门的侯家炉 ，以搜查为名冲了 进去，逮捕了我6名公安战士。

李洪奎等人，把我6名战士五花大绑，押至三道街上。没有多远，李命令同伙的人站住，然后由他带头开枪。结果，我6名被俘战士，被李洪奎亲手用匣枪打死2人，王政相、徐福库、王希

岭、雷振海各打死1人。

在首次对朱家坎维持会收编、缴械过程中，我公安战士共有12人壮烈牺牲，一人受伤致残。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碧血染长街，英灵光日月。

奔袭 受挫进军路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驻扎齐齐哈尔、朱家坎一带长达6个月之久。根据《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规定，苏联承诺与日本军军事行动停止后，东北行政管理权交给国府。为此，陈云同志指示东北局："将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农林、中小城市及铁路沿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及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若干根据地。"东北局立即通知嫩江省人民政府和军区，放弃齐齐哈尔，占据中长路两侧，建立以讷河、龙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于是在1945年12月30日龙江县党政机关由齐齐哈尔撤至江北达胡店，嫩江省党政军机关撤至甘南县。这时，由太岳军区和苏皖军区北上的军队干部相继来到甘南，马上充实和建全了警备一旅和警备二旅，并组建起团、营、连建制。其中警备二旅共4个团，第四团团长是吴永福，政委赵敬璞。

国民党反动派接收齐齐哈尔之后，维持会、接收大员、"党务复兴会"、"党务专员办事处"、"三省党部"、"军统局东北驿站分局齐齐哈尔分站"、伪东北宣抚工作总队嫩江支部等，变本加厉，继续收编土匪，网罗汉奸，笼络特务，发展组织，疯狂进行情报、建军、策反、暗杀和大肆逮捕无辜群众等活动。1946年1月初，保安军司令张伯藩再次窜至龙江，轮流住在

王振武、杨衡两家，与徐文达、张子敬等人继续筹划扩大保安军，以加紧袭击我甘南、达胡店一带人民军队和新生政权的活动。张伯藩走后，徐文达秉承主子的旨意，在原设步兵团、骑兵团基础上，吸收封建会道组织红枪会，组成武术团，到处叫嚣“这些人法术无边、刀枪不入”、“八路军的枪林弹雨，也不能碰倒他们的一根毫毛”一类的鬼话。

但是，徐文达做贼心虚，生怕省公安队随时找他讨还血债，因此，派王兴忠、王勤书等人四处活动，跟景星、碾子山、七棵树等维持会和反动武装互相勾结，到处收集我军活动情报，侦察我甘南警备一、二旅的动向。另外，他还四处求援，从景星借来骑兵100来人，从碾子山尹彬甫处借来100来人，从七棵树借来由姜恩久、曹化东带队的几十名胡匪，以加强朱家坎的防卫。同时，积极配合“挺进军”第六旅和各路土匪，加紧对我甘南一带的袭击活动。

针对朱家坎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鉴于朱家坎位于中长铁路冲要地点，跟内蒙、洮、辽地区接境的重要战略地位，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把朱家坎建成为与国民党斗争的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孤立据守齐齐哈尔的国民党反动派。1月中旬，嫩江省军区决定派警备一旅一个团和警备二旅共同合围，肃清朱家坎保安军第三旅和依附他们的反动武装。

当我军部队行至七棵树驻扎下来时，连夜开会，研究具体的攻城部署。参加会议者有警备二旅张汉丞、政委尹诗言、副政委刘烨、四团长吴永福、四团政委赵敬璞以及一旅副旅长宋康、一团长张文诤等。会议决定：为轻装前进，前后呼应，把旅后勤部和直属部门30多名干部留在七棵树。

我军的军事部署，虽然都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向各营排班传达的，但是我军动向及会议各项决议，马上被七棵树维持会安插在我二旅当教官的刘海山报告给伪保安军七旅姜亦军连长，姜

马上给尚在朱家坎的姜恩久、曹化东送信。徐文达由此得知我大军压境的情报，马上做了应变的准备。打发姜恩久、曹化东速带马队连夜赶回，同七旅宋同山部和挺进军六旅尹彬甫部联系，伺机对我军袭击，以转移和干扰对朱家坎的进攻。七棵树维持会长姜恩久、曹化东领命连夜率队赶回七棵树附近隐蔽待命。曹化东带领连长姜亦军，连夜赶至兴隆沟，与七旅长宋同山、六旅的刘恒等密谋，决定天亮后，伺隙偷袭我军，用以解救朱家坎之危。

第二天早晨，警备一、二旅联队从七棵树向朱家坎进发，旅部直属骑兵警卫连留守。早饭后，这个连队正在上课，当地群众跑来报信，说有几百名胡匪集结在七棵树西方，要来进攻我军后勤部和留守警备队。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警备队立即召开会议，分析敌情。参加会议的有警备连长张国卿、连指导员刘曙仁、副处长范琼、骑兵教官刘海山和1名协理员。会议决定马上派两名通讯员向大部队报信，家里做好战斗准备。开会时，指导员刘曙仁发现教官刘海山心情不安，会刚开完，又马上溜到守备队驻守大院外。他深感可疑，马上派人对其跟踪。跟踪的人回来报告说："刘教官上村东南角姜家去了。"这使刘指导员想起，昨天旅部会议之后，他也去过那家的事。因此怀疑他已把偷袭朱家坎的计划和守备队迎敌部署泄露出去，所以马上把他的种种怀疑告诉给张连长。根据新的情况守备队马上决定重新带后勤部和直属机关干部全部撤离七棵树，向进攻朱家的联队靠拢，如果半路遇敌，便在野外周旋待援。

谁知，当刘曙仁带着前卫部队出发，范琼处长带着车队跟上去时，指挥后卫部队的年青而无经验的张连长，却被刘海山的花言巧语所蒙骗，留下"坚守阵地"，结果被胡匪包围。张连长率部虽英勇抵抗，但因子弹打尽，而失去了继续阻击敌人进攻的能力。

当一、二旅进攻联队行军至朱家坎北疙瘩甸子时，七棵树守

备队两名通讯员飞马赶到，于是向张汉丞旅长报告了匪军正集结几百人准备袭击我后勤部的情况。张旅长立即意识到我军偷袭朱家坎的计划已经泄露，眼下我后勤部和守备队处于万分危险之中，所以当机立断，回师七棵树，粉碎敌人的偷袭阴谋。

挥戈北进的时候，正是内奸刘海山在阵前向匪徒喊话报信之时："快冲啊，里边没子弹了！"受伤的张连长向叛徒开枪未中，却被另一内奸打死。匪徒因此肆无忌惮地冲进守备队院内，把逮捕的战士一个个扒得精光，然后逐个把他们打死在雪地上，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七棵树事件"。这次战斗，我军18名战士为解放朱家坎献出了生命。

奇兵　红旗飘古驿

部队由七棵树回到甘南，整个队伍进行了整训，整训中着重总结了七棵树事件的教训，全体将士一致认为：一要百倍警惕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和叛徒。二要知己知彼。我们在部署这次战斗时，只是着重研究了朱家坎维持会的情况，而对朱家坎维持会与其他维持会的相互勾结，与挺进军黑六旅尹彬甫部、保安军黑七旅宋同山部的互相勾结，与活动于龙景大地各土匪绺子的勾结，以及各路政治土匪的活动情况了解甚少。三要了解地理民情。这次战斗失利，一个主要原因是对贫苦农民未能做好发动教育工作，我们在群众中耳目不多。同时对于当地的地理状况也不熟悉。进军路上，匪军几处可以设伏袭击我们，只因我方为一、二旅联队，人多势众，匪军才未敢贸然行事。四要发展骑兵，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我方仅有一个骑兵警卫连，平时做些传递信息的工作。这次回师七棵树，如果我军有着可与匪军抗衡的骑兵，完全可以对敌人进行包抄，或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只因我方没有这个条件，才使匪军从容上马逃脱。只有刘曙仁率领的骑兵连奋力

追击，才抓回了几个土匪为烈士祭了灵。

经过整训和总结，部队加强了发动贫苦群众的工作，多方面了解黑六旅和黑七旅以及各维持会的情况，根据黑六、七旅为虐于龙江、甘南、景星等地的情况，决定在龙江与甘南交界处地形有利的张家大沟，围剿黑军的主力部队。战斗按照我们的部署打响了，2千余名黑军不时驱马向我沟北阵地的二旅部队、沟南阵地的一旅部队发起冲锋，结果被我军排枪、机枪、追击炮打得一排排地倒下，死伤几百人。这时，我方侦察员相继回旅部报告，黑七旅和维持会的反动武装已向这里集结增援。在消耗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旅部下令：部队于天黑撤离战场。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战后黑军和各维持会密谋，准备春节后集中全部兵力共同进犯甘南。为谄媚邀功，徐文达派红枪会会长杨福源和尹德惠、刘凤山、徐德山等人率领50多名红枪会员，配合于海川、李洪奎等人所率领的骑兵团两次去七棵树黑里沟一带进攻我警备一、二旅部队。其中一次袭击了我驻中兴村的一旅二连部队。此仗虽被我英勇无畏的二连战士击溃，打死11人，但他们在逃跑的路上却与我甘南后勤部为一旅将士送春节食品的卫队相遇，结果打死我军护卫战士五六人，获我轻机枪1挺，手枪1枝。在七棵树一带，又捉住了我方一个姓陈的侦察兵，在朱家坎被徐文达宣判死刑，由王政相亲手枪毙。

为粉碎敌人进犯甘南的阴谋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省军区领导决定，利用春节这一敌人最易麻痹的大好时机，给集结在从碾子山到太平村一带各村中的黑军主力以毁灭性的打击。除夕晚上，我一、二旅全体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毫无准备分散在各村忙于过年的敌人发起总攻，结果有的股匪被彻底消灭，有的村庄敌人扔下许多尸体、伤号和马匹、武器向西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碾子山和李三店。

利用胜利整训时机，军区采纳了吴永福团长的建议，迅速组织起骑兵第六支队（4月份又改称骑兵六团），其组织是：支队长吴永福，一连长刘曙仁，二连长裔国礼，三连长阎××，四连长郭××。骑兵支队组建后，我军活动范围立刻扩大，由甘南、朱家坎以北地区扩大到景星县一带，常采取夜间急袭、声东击西战术，打得景星一带土匪心惊胆寒。骑功队又接二连三奇袭和占领了成吉思汗和蘑菇气，打得光复军的残匪望风而逃。继而转向景星县北片，把骚扰那里的“白合”股匪，打得一败涂地。这时朱家坎北、西、南均已打开局面，只有朱家坎及其以东铁路沿线城市尚被敌人盘据，时刻威胁着已经解放的城镇，为了巩固碾子山、李三店等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骑兵第六支队决定进军朱家坎。

这时，我军已处于优势：一是在大片解放的土地上，我军已树立起威信，有了群众基础；二是扩建骑兵支队时，注意对每个成员的严格考查，严防奸细混入；三是有了一千多人的骑兵队伍，有了压倒朱家坎之敌的绝对优势，并可以随时机动灵活地了解地理民情；四是已经给黑六、七旅以致命的打击，使其元气大伤，早已失去与我军硬碰硬的实力。尽管如此，支队长吴永福仍然牢记“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军事原则，命令骑兵向各方面大造“进军景星”的舆论以暗渡陈仓。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朱家坎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件。当初维持会向苏军借武器时，苏联防卫官中校萨特斯契克曾提出严格要求，维持会的人只准携带武器站岗放哨，不准逛街，但在1946年2月13日（正月12）维持会的高治民却带队去东岗，与苏军发生冲突，结果打死一名苏军战士。苏军因此调来坦克，向朱家坎维持会发动进攻，只几炮维持会队伍就炸了营，骑马的、坐车的、徒步的四散逃跑。这时苏军又是一炮，维持会一匹拉车逃窜的马被炸飞了脑袋。然后缴了朱家坎维持会、保安三旅所有人

员的枪马，并把徐文达、张子敬、于海川和从碾子山逃来的尹彬甫4人押送至长春红军司令部。但为维护地方治安，苏军立即让城市知名士绅陈寿山出面，把枪支又发还给地方维持会。

5天以后，即2月18日（正月17）晚，吴永福把骑兵支队全体骑兵拉到朱家坎东、南两面，然后亲自带领3个连队，悄悄进城，在一个孤立大院隐蔽起来，随时准备战斗。接着，他便带着参谋和警卫员周占英，到朱家坎火车站苏联驻军司令部，苏军这时已接到上级通知，改变过去让国民党军队接收的初衷，而同意中国共产党部队接管朱家坎。因此，当吴永福团长会见苏军防卫官说明来意后，中校萨特斯契克主动帮助找到陈寿山。陈寿山民国年间曾在军队中当过副官，所以大家都习惯叫他陈副官。陈副官的儿子国高毕业，是警备二旅战士。吴永福请陈寿山通知朱家坎党专区党部股长以上人员和保安军三旅营长以上的头目，翌晨8点双方进行谈判。

2月19日（正月18）陈寿山通知的上述人员，均准时到会。吴永福对到会人员大声宣布："我奉王明贵司令的命令进驻朱家坎，朱家坎今后的治安由我负责。你们必须把军队交出来，要统一指挥。"与会人员看到吴永福身后的警卫人员均荷枪实弹，知道反抗没有好下场。又听吴永福说："下午一点，如果不把队伍集中到广场，不把武器和军队花名册交出来，我一千多骑兵，立即进城！"在场的敌方要员自知已是釜中游鱼，如不恭顺从命，便是自寻死路，因此下午一切照办。

朱家坎，从此彻底解放了。这座古老驿站，从此升起了革命红旗；我军没费一枪一弹，缴了"保安军三旅"260余人的枪，改编了保安军三旅，壮大了我人民军队的力量。

2月20日，张汉丞旅长到朱家坎，为欢腾的城市和骑兵将士亲自祝捷。龙江县县长张信凯也随即到了朱家坎，立即组建新的人民政权，打下了龙江县革命政权的坚实基础！

后记 笔者曾多次采访过解放朱家坎的资料，其中王世发、陈〇〇、隋常河、王政革、赵光年、王中柱等人，都是历史的見证者，所述材料颇为翔实。笔者又参照裔国礼、刘曙仁、吴永福等革命前辈的回忆录和龙江县的档案资料，做了专题整理，就是现在发表的这份材料。除对上述同志表示感谢外，敬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改补充，实事求是地反映这段历史。

讷河争夺战

叶永才

1945年11月9日，嫩江省军区正式成立，下辖一、二、三、四分区，其中二分区机关设在讷河县城，金忠任司令员，任德福任副司令员，王文任政治委员。组建初期的二分区只有四个未编满员的新兵连。

此时，光复军匪首尚其悦企图乘人民自卫军立足未稳之际，攻占讷河，而后北取嫩江、东夺依安，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11月20日，尚其悦根据混入民主大同盟的内奸李士敏、洪连生、王永贵、靳文学（女）提供的情报，在褚家窑（今晨光村）召集有刑宪章、张文焕、邓宪刚、陈士文、韩秉歧、刘明飞、于广龙、李凤歧、陈昆、郭敬中、孙广田等团以上匪首参加的军事会议，密谋了一个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攻打讷河县城的行动计划。

11月25日，匪首尚其悦指挥匪军千余人，向讷河县城发起了攻击。战斗打响后，匪军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打西门。由于守城的嫩江自卫军部队人数少，而且又都是新战士，因此西门很快失守。随之，华兴店、裕泰花店、大车店、银行大楼以及南门的自卫军阵地也相继被匪军占领，战斗一直持续到26日清晨。26日下午，匪军们又猛攻北门这个自卫军依然坚守着的最后一个阵地。北门阵地上的自卫军一连，在连长史化鹏的指挥下英勇战斗，连续击退匪徒的数次进攻，一直坚持到27日晚9时，终因伤亡过大

和弹药不足，由司令员金忠亲自率领撤出战斗，突出重围。至此，讷河县城落入敌手。

二分区副司令员任德福在撤退途中，在小门家屯因叛徒告密被李同武匪部缴械抓获。为报告讷河县城失守和任德福被俘的消息，司令员金忠派人到讷河火车站，用铁路电话向省军区报告了情况。省军区司令员王明贵接到报告后，意识到派增援部队已来不及了，于是以苏联红军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当时王明贵任该职）的名义，命令驻拉哈苏联红军就近予以增援，并要求一定要夺回讷河县城，救出被俘人员。

28日晨，苏联红军逼近讷河县城。匪军闻讯后，十分惊慌，惧怕苏联红军炮击破城，在苏联红军的攻势胁迫下，匪军释放了任德福，弃城狼狈逃走，讷河县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解放平阳镇

叶永才

1945年12月11日晚，嫩江省军区司令员王明贵率自卫军一旅攻克甘南后，乘胜进军，又一举占领了阿荣旗。此刻，自卫军士气旺盛，声威大振，于是王明贵决定继续进兵，直捣平阳镇，围歼从讷河、德都、克山方面流窜过来的3股惯匪，共5百多人。

3股土匪在平阳镇会合后，企图依仗坚固的工事和优良的装备，与自卫军顽抗到底。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自卫军将平阳镇3面包围，故意在城东通往江桥的方向留下1个缺口，然后将1个骑兵团埋伏在江桥附近，以全歼过江逃窜之敌。

战斗打响后，自卫军发动猛烈冲击，集中火力打开敌阵地的突破口。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自卫军还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和优待俘虏的政策，使1百多名土匪弃暗投明。在自卫军的猛烈攻势下，土匪渐渐支持不住，阵地终于被自卫军突破，从城东逃跑的土匪，在江桥附近遭到自卫军骑兵团的伏击，打得土匪晕头转向，慌忙窜向江套子，企图过江逃命，不料在自卫军的轰击下，加之冰层冻得不厚，跑到冰面上的土匪全部坠入江中淹死。

平阳围歼战，土匪除投降者外，无一漏网。我们缴获各种武器3百多件，子弹2万余发，战马3百余匹，沉重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根据王明贵口述材料编写）

鳌龙沟遭遇战

叶永才

1945年12月初，我黑龙江警备三旅旅长廖仲符，亲率旅部和一个营的部队从北安出发到克山一带剿匪。部队到达古城后，廖仲符去克山火车站用铁路电话向军区汇报情况时，一自卫军战士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他报告："你是首长吧？快派援兵，快去救郭司令，快去救军火列车！""怎么回事？不要急，慢慢说！"廖仲符用安慰的口吻对战士说。

经那个战士自我介绍，廖仲符才知道他是齐齐哈尔护路军的战士，随司令员郭维城押运一批军火和运送一批新兵由北安去齐齐哈尔。当列车行至依安、克山之间的32号地段(即鳌龙沟)时，因铁路被毁，列车脱轨，有两节车箱翻倒，部队与土匪遭遇。郭维城组织押运人员和3个连的新兵已顽强抵抗了两天一夜，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廖仲符问那个战士说："是部队派你来的吗？"战士回答："不是，我是被土匪打散的。首长，快派兵吧，这的路我熟，我给部队当向导！"廖仲符沉思片刻，然后立即返回古城，命令部队马上开饭，饭后立即进军鳌龙沟。

原来，上级为了进一步扩大人民武装、巩固西满根据地，从北安调运齐齐哈尔步枪2000枝，子弹200箱，还有一批随车到齐齐哈尔的老干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齐齐哈尔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嫩江省军区作战科长姚玉亭，亲自率部队执行这次押运任务。不料，原依安县伪警察署长、国民党依安党务专员办事处书

记长宣明哲，利用暗藏在铁路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萧明声、徐敬文、王殿选、刘德明等，通过铁路调度电话窃取了这一情报。宣明哲随即纠集同伙挺进军匪首孙藻庆、刘汉等，于12月15日在泰安与古城之间的鳌龙沟埋伏步、骑兵200余人，并扒掉了铁轨。这群政治土匪企图把列车颠覆后，消灭押车人员，夺走全部军火，继续扩大反动武装。晚8点35分，当军火列车开到埋伏地段时，全列车脱轨，并有两节列车翻倒，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土匪疯狂地向列车射击，企图封锁车门，阻止押运部队的反击。但是，在匪徒们发起冲击之前，司令员郭维城就指挥押运人员和3个连的新兵投入了战斗。当土匪发起冲击后，部队以铁甲车和铁轨为掩护，以猛烈的火力将土匪压了下去。匪徒们又组织了几次进攻，但都被击退。不幸的是在15日晚的一次激战中，三连连长顾天思在混乱中将副团长饶氏孚、俄语姜翻译打死，带一部分新战士投降了敌人。16日拂晓，土匪又增加了援兵，使总兵力达到六七百人，四面包围了军火列车，给郭维城同志造成极大威胁。此时，部队伤亡很大，而且指战员一天多没吃没喝。土匪依仗人多势众，多次轮番发起进攻，护路军面临着全军覆没、军火被抢的危急时刻。

姚玉亭科长根据多种情况判断，这股土匪的头子可能是刘汉，因他与刘汉有远亲关系，所以他向郭维城提出了一个由他出面去假谈判的缓兵之计。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郭维城只好同意。

不出所料，果然是刘汉的土匪队，于是双方商定谈判地点设在鳌龙沟西北四马架子的一家姓韩的农户家。护路军代表姚玉亭带4名战士参加，土匪有孙藻庆、刘汉等带十几名匪兵参加。谈判中双方提出的条件是：护路军的条件是要送饭送水，修复铁路，并把列车复轨；土匪的条件是要1000枝步枪。姚玉亭提出先恢复铁路后给枪，土匪提出先给枪后修铁路，双方各不相让，谈判

进行了4个多小时。后来，土匪发现姚玉亭并无诚意，可能是有意拖延时间，于是恼羞成怒，对姚玉亭和4名战士下了毒手，然后向泰东站逃走。

傍晚，廖仲符率部队急行军赶到了鳌龙沟。廖部到达后，命令部队原地休息，然后快速查看了一下地形。原来鳌龙沟是一条干河，对部队隐蔽行动特别有利。根据这一地形特点，廖仲符指挥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在路北担任主攻，一路在路南进行截击，形成西北夹击的反包围态势。

战斗打响后，土匪虽然有六七百人，但由于廖部指战员英勇顽强，攻势猛烈，很快把土匪打乱了阵，除被歼者外，都被追退入了31号村。匪部退入31号村后，凭借一个大土围子，与廖部又展开了激战。由于廖部善于夜战、近战，轮番以手榴弹向土匪发起攻击，几个回合就将土围子炸开。廖仲符一声令下，部队发起了冲锋，土匪大部被歼，余者当了俘虏。

深夜，廖仲符与郭维城在32号地区见面，他们只是紧紧地握手，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廖仲符知道郭维城及其部队已两天没有进食，现在急需吃喝，于是叫部队为他们做了简单的饭菜。饭后，郭、廖二人研究了工作，决定将军列暂发回北安，待铁路修好后再发往齐齐哈尔。

第二天，廖仲符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当地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匪军的种种罪行，对群众鼓舞很大。会后，部队把缴获的马匹、车辆、衣服等贵重物品全部摆了出来，叫群众公开认领。廖部的这一行动，使群众深受感动。他们只是把属于自己的衣服等物品领回，很少有人认领车马。他们说："八路军打仗是为了老百姓，土匪有马跑得快，我们不能看着你们光用两条腿跑，这些车马就送给部队了。"部队不收，并再三做说服工作，但群众态度也很坚决，他们说："就算我们借给你们的，等打完土匪再还。"无奈，廖仲符只好代表部队收下

车马，并一再向群众表示感谢。有了车马，廖仲符组建了一个骑兵排和一个运输队。事后，西满军区对廖部的这次行动给予了通令嘉奖。

根据廖仲符、郭维城口述材料编写。廖仲符原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现已离休。

围歼黑六旅、黑七旅

叶永才

1946年1月初，嫩江省党、政、军机关已从齐齐哈尔市迁到甘南县城。省军区及所属部队的中心任务也由组扩建部队转入剿匪斗争。刚刚组建不久的警备二旅，在旅长张汉丞、政委尹诗炎的率领下，与国民党建军土匪"黑六旅"、"黑七旅"在龙江、景星、碾子山、甘南一带周旋，经3个月的激烈战斗将敌人基本歼灭。

1945年"八·一五"日军投降后，窜到嫩江省的国民党特务马传悦招兵买马，收罗军、警、宪、特及流氓惯匪等，建立了"东北挺进军第三师"，自任师长。该师下辖7个旅，番号从一开始称"东北挺进军黑龙江第×旅"。其中第六旅和第七旅群众称之为黑六旅、黑七旅，流窜于嫩江省的龙江、碾子山、景星、甘南等地，与新生人民政权为敌，抢占地盘。

"黑六旅"旅长尹彬甫，原是碾子山维持会副会长、碾子山自卫团头目，曾当过东北军的军官，被马传悦选中加封。"黑七旅"旅长宋同山，曾在东北军中当过营长，被日军俘虏后卖身投靠，当了劳工头目，日军投降后拉起了土匪绺子。"黑六旅"和"黑七旅"共有8千人左右，并且全是骑兵，武器也好。这些匪徒，凶残狠毒，无恶不作，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恨之入骨。

为了适应剿匪斗争的需要，警备二旅将第五团、第六团改成骑兵，武器也进行了调整，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严冬季节，战士

们穿着单薄的军装，转战于茫茫的雪原。

1946年1月上旬的一天，二旅接到探报，“黑六旅”和“黑七旅”正向甘南运动，企图包围警备二旅，吃掉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武装。旅长张汉丞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根据敌情做了战斗部署，决定把四团拉到张家大沟，此地是两山夹着的一条大沟，占领两侧制高点夹击来犯之敌很有利。当旅长张汉丞率四团登上南山时，敌人也快冲了上来。吴团长一声令下，步枪、机枪、冲锋枪一齐向敌群开火。顿时，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敌见势不利，又派数百名骑兵旋风般地扑来。旅长张汉丞立刻改变战术，命令吴团长把部队排成3列，前排卧倒，中排跪下，后排站立，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很快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纷纷退了下去。但敌人不甘失败，又轮番疯狂进攻。这时旅长张汉丞和吴团长研究决定，以步兵牵制敌人，以骑兵向敌两侧迂回，断其后路，围歼敌人。很快，当二旅骑兵在敌背后打响后，使敌人遭到夹击，匪首率残部慌忙夺路西窜。这次战斗，歼敌1百多人，“黑六旅”旅长尹彬甫最得力的营长张百奎被击毙。我四团虽无大的伤亡，但一营营长张增在战斗中牺牲。

春节前夕，二旅通过侦察得知，“黑六旅”和“黑七旅”将在七棵树至甘南一线的村屯集结过年。二旅感到这是个歼敌的好机会，决定在除夕夜把部队化整为零，分别摸进各村，同时动手，堵住笼子“抓鸡”。由于计划周密，除夕夜这一仗进展顺利，二旅没打几枪，就在各村俘敌4百余人，并缴获大量战利品．使敌人元气大伤。

2月4日（正月初三）二旅乘胜出击，一举解放了碾子山，摧毁了“黑六旅”指挥部，尹彬甫率残部逃去。2月5日，二旅又解放了李三店，挖掉了“黑七旅”的一个据点。2月19日，吴团长又率3个骑兵连进攻朱家坎，缴了国民党军保安第三旅的械。这时警备二旅旅部从甘南转移到朱家坎。29日，尹彬甫率残

部误入朱家坎，我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发起攻势，除旅长尹彬甫逃跑外，其余全被缴械。至此，"黑六旅"彻底瓦解，尹彬甫后在土改运动中被抓获处决。

1946年3月初，警备二旅六团解放了富拉尔基，二旅旅部随即由朱家坎转移到富拉尔基。3月中旬，警备二旅得到了"黑七旅"在李三店西南的几个村子集结的情报，于是立即决定歼灭这部分残匪。部队出发后，五团等为左路和右路，旅长张汉丞率旅部和一个机枪炮连为中路，抄小路向敌驻地合围。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四团和五团虽然摸到了敌驻地，但敌人已溜掉，结果扑了空。大约在同一时间，旅部和机炮连与敌人遭遇，这伙匪徒正是"黑七旅"的残部。机炮连迅速占领一高地，旅长张汉丞亲自操纵一挺重机枪，和战士们一起向敌人猛烈射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3次冲锋。我军虽然火力很猛，但敌人多，在负隅顽抗。战斗持续了1个小时以后，机炮连的战士已牺牲过半，子弹也快打光了。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距我军阵地只有20多米。这时，干部战士毫无惧色，有长枪的都上了刺刀，准备与敌人白刃格斗。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四团和五团赶到，从外面包围了敌人。机炮连往外打，四团和五团往里打，使敌人腹背受击。经过不到1小时的激战，敌人尸横遍野，曾猖狂一时的"黑七旅"彻底垮台，被我军歼灭400余人，只有宋同山带几个残兵南逃，后归附了国民党军队。

（根据张汉丞回忆材料编写）

中学生战地服务团

陈　彬

在解放战争中，1947年8月北满几个县组织了中学生战地服务团。参加战地服务团的都是当时在校的中学生，条件是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立场坚定、革命意志坚定。拜泉第一批战地服务团共选出10名同学，有张万喜、周延平、张勤、张济林、李海春等。张万喜是带队组长，他是拜泉中学中二级学生，出身好，思想进步，会写美术字，那时已从学校抽出参加土改工作队，搞宣传工作。1947年8月，他正在县建联会（搞民运的）参加集训，一天县工委领导马乘风同志找他谈话，动员他参加战地服务团，并向他讲了战地服务团的任务，主要是搞战地宣传，在一线部队后边作群众工作。马乘风指定他带队，其余学生由学校动员。报名的学生很多，除张万喜外只批准9名，县工委决定马上出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很高，可是有的学生家长考虑得很多，认为战争非常激烈，随时有流血牺牲的危险，所以不愿孩子离开家。有的学生想出种种妙计瞒过家长，奔赴战场，张万喜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出发前他回到家笑呵呵地向家长说："学校组织我们去哈尔滨参观，几天就回来。"走后才给家来了实信。农历八月十五这天10名同学坐一辆胶轮大马车出发了。在克山县等克东县的到齐后就上火车去齐齐哈尔。同学们特别高兴，谁也没出过家门，都想到省城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可是火车到齐齐哈尔已是

深更半夜，啥也看不清。军区的同志把几个县的同学直接领到原天主堂院子住下了。仍以县为一个小组，没重新编队。集训10天左右，主要内容是讲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战地服务团的任务。各县的同学进一步认清了形势，受到很大鼓舞，人人做好了上前线去迎接新任务的思想准备 。各县到齐后每人发一条毛巾 、一把牙刷、一筒牙膏、二十个面包，不少同学第一次吃到面包，觉得十分香甜，舍不得吃。第二天黑夜坐闷罐车出发了。火车到白城就听见枪声了，国民党的飞机常来扫射，因为那时我军主要靠西线运输，西线的火车是敌机轰炸扫射的主要目标。夜间坐在车里特别凉，一些同学从家穿来的都是夏衣，只好把行里都打开盖上。火车烧的不是煤，而是豆饼 ，蒸汽不足 ，加之常常躲避敌机袭击，走得特别慢。走了十多天到了茂林，从茂林步行往双山走，从家带的大行李成了最大的负担，无奈都甩掉了。又走了两天到达双山。东北野战军派郁干事来接领，他个不高，是个大学生，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群众工作经验，他有一名警卫员，可能是团级干部 。服务团重编两组 ，把拜泉、克山两县的同学编为一个组，张万喜任组长，克山的赵××为副组长，从此郁干事就是服务团的直接领导人。编组后发服装，每人一件衬衣、一条白布裤衩、一双白布袜子、一床薄被、一条褥子 ，没发外衣 。在双山集训4天，首先讲战争形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要到四平一带农村去做宣传工作和发动群众工作；还讲了今后的工作，有时可能碰上炮火，有时要打仗，要坚定信心，将革命进行到底。4天后又出发了。克拜这一组20多人，还有一个警卫连负责警卫工作。服务团初到卧虎屯，那里的群众对我党我军认识不清，开展工作十分艰难，群众见我们人就躲，买东西给钱也不卖。经过服务团同志分别走访，耐心讲解共产党的历史，宣传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慢慢就消除了群众的顾虑，和服务团的同志说真心话了。一天服务团住在东北街一个大

车店里，夜间国民党兵突然攻上来，服务团的同志和警卫连与国民党兵开火了，自此服务团和小股国民党兵遭遇的事就更多了。服务团先后到郑家屯、双山、傅家屯、大洼一带农村开展工作。在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支援前线，战地服务团所到之处，不仅搞宣传或群众工作，而且根据四平前线战事发展的需要，从事多种多样的服务工作，充分体现了战地服务精神。

动员粮草，运送给养。那时前线给养主要靠民工和车马运输，一是速度慢，二是运输量有限，这就不可能做到及时供应，出现时断时续的现象。有时断了给养，就靠前线就近地区补给。当时四平攻坚战打得非常激烈，有时我军攻下来进城住守两个月，敌人太猛我们就退出来，敌人进去后我们再组织兵力攻打，就这样拉锯。有时给养断了，战地服务团经常在四平的西面、北面农村的工作点里为前线动员粮草，组织运输。当时的环境相当复杂，一次服务团几名同志在大洼一带农村动员军粮，路过一片被青纱帐覆盖的高地，反动地主武装隐藏在那里，朝服务团的同志打黑枪。

组织担架，转运伤员。前线担架队不充足，他们从战场上把伤员抢下来，不可能运送很远。服务团就在火线后方设临时包扎所，在当地组织担架队负责转运伤员。从火线上抢运下来的伤员交给临时包扎所，简单处置一下马上往后方转运。可是有的伤员特别危重，只能在包扎所抢救，有时担架少，伤员运不下去，医护人员又奇缺，服务团的同志边组织转运，边当监护，任务繁重时，一个人晚间要看护百余名伤员。他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给伤员擦脸、洗血衣。服务团的同志都是没有经过战争的学生，从未见过血衣，更不懂怎样洗血衣。开始不少同志热情地从伤员身上换下血衣就用热水浸泡，结果血渍凝固，血迹无法洗净，引起伤员责骂。服务团的同志在包扎所亲眼看到许多危重伤员还没等往后方转运就牺牲了，这更坚定了服务团同志将革命进

行到底的决心。

宣传群众，搞土改。服务团在双山南几十里，一个叫其卡窭的屯子住了一个时期，和群众在一起劳动，割地时帮助农民掐高粱，向农民讲解地主怎样利用土地剥削穷人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道理，农民很快觉醒了，拥护共产党分田分地政策。服务团根据党中央关于新区土地政策，只平均分配了土地，没分地主的浮产，也没搞斗争挖财宝，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在双山这一带搞了两次分田分地工作，服务团帮助丈量土地，定标志，农民真正发动起来了，服务团的工作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是艰巨的，三天两头没吃的，经常连夜行军去完成紧急任务，不能睡觉，常常在一两天中才能睡上一觉，有时行军互相扯着衣襟打个盹儿也就是睡觉了，但想到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任何疲劳都忘掉了。战地服务团到前方不久就正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每人发只手枪，1947年冬天战士脚穿的是"趟趟马"，服务团的同志穿的是大头鞋，据说这就是当时干部与战士在装备上的区别。

组织战地服务团是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战地工作的好方法，又是锻炼知识分子迅速成长的成功经验，因此，1947年12月拜泉中学的第二批学生又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我所知道的高凌昭

关锡昆

高凌昭1905年出生在齐齐哈尔的小五福玛。1919年入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当时我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我是16级，高凌昭是17级。学校的学制为五年，小学五年毕业后可直接考入师范。在第一师范期间我和高凌昭经常见面，他个子很高，足有一米七十多。他爱好体育，身体很好，据说学习也不错。他比我大一两岁，那时对学生的年龄要求很宽，同一年级的学生有相差五六岁的。我1923年毕业后考入北京民国大学。一年后，1924年高凌昭在黑龙江省第一师范毕业后也考入民国大学。他只在民国大学念了半年，不知什么原因辍学了，据说是为了应聘。他回到齐齐哈尔不久，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他在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就爱好体育，因而他应聘到齐齐哈尔第一中学担任了体育教师。他在一中当体育教师的时间不长，不久他又到南方投考了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南方国民党部队工作。我1928年从北京民国大学毕业后回到齐齐哈尔，就再也没听到高凌昭的消息。

1945年8月中旬，齐齐哈尔光复了。光复前，我在师学校当教员，以“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捕，押在日本人的宪兵队，我们一块被捕的有三人，其他两人被枪毙了。家里人也以为我死了，为我准备了悼念仪式。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我被放出来。后来苏联红军来了，听说国民党派来个主席，负责接收齐齐

哈尔。几天以后，高凌昭到学校找到了我。我很吃惊，我们分别20多年没见面了，几乎都不敢认了。我们互相谈了离别后的情况。我这才知道，他不是20年前的高凌昭了，现在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了。他是随同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一同来接收齐齐哈尔的。由于我们青年时代只是一般的同学，没有更深的交往；也由于人间沧桑，20年后地位的变化，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也仅仅只见了这一面。听说在1946年齐齐哈尔第二次解放前夕，他便逃离了齐齐哈尔，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叶永才　整理）

宋 小 濂

陈 志 新

宋小濂，字友梅，又铁梅，晚号止园。清咸丰十年(1860)，生于今吉林省永吉县哈达湾乡。其先世居顺天府宝坻县，后徙居奉天义州，数传至其考，讳永瑞，挟医术游吉林遂占籍为吉林人。宋小濂几世皆贫，但少有大志，聪颖好学，读诗书，不拘泥于章句，好格物致知之学，以为经世之用。清光绪九年（1883年）宋小濂年24岁应本郡童子试，以吉林第一名得中秀才，深得知府李金镛器重。

宋小濂本欲科举走仕途之路，不幸严父早逝，慈母在堂，妻及一女，衣食难济。后为生活所迫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秋，以饥躯随刘泉初明府赴奉天谋食，至次年端午节后始投笔从戎。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李金镛以观察使督理漠河矿务，“由申江来漠，取路奉天”，宋小濂在奉天以弟子礼拜见李金镛，深蒙嘉许，并对宋小濂的学业、境况进行了解，甚悉。是时清廷钦差大臣定安赴黑龙江巡阅黑龙江练军齐字营。事前“因约订随节北上时，取便来漠相助”，所以同年九月宋小濂随定安赴齐齐哈尔为定安掌文案，至冬由齐齐哈尔赴漠河。

宋小濂由奉北上写下《北徼纪游》，对沿途地理、风土民俗、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城镇乡村均有记述，对中俄边境所见所闻也有详尽记载，对俄国人的风俗民情更有极生动的描述。宋小濂

应李金镛之召，担任随办文案兼交涉外事。从此“半生心事在筹边，黑水黄沙二十年”，走上治理边务之途。

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下旬（1890年1月中旬），宋小濂以翌年三月有续娶之事，请假返里。适金矿局须解金赴天津提炼，并请领军械，李金镛遂委宋小濂负责办理。宋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身，于光绪庚寅年正月二十九日（1890年2月18日）抵吉林，取便先归家省亲。在家小住一日，聊慰堂上盼切之思，即回省垣，匆匆就道，仍赴天津。沿途经历的一切使宋大开眼界。对于火车轮船之奇大为感叹；对清廷不顾边防也大为愤慨。。宋公返里完婚，家居月余，即复北上。是年秋（1890年9月7日）李金镛病殁于金矿任上，以提调袁大化代理矿务，对宋小濂更为器重，累保官至知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宋小濂遭母丧，衔恤禁声。未等守孝期满，就任复职，效力边荒。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南岸，地处中国的北大门，隔江与沙俄相望。沙俄对漠河金矿早已垂涎三尺，不断寻衅闹事。宋小濂至此达10年之久，“国势敌情罔无周悉，自谓一生致用之学皆积于此”。后袁大化去职，宋小濂亦相偕辞去。同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沙俄趁火打劫出兵占领东北，漠河金矿也随之陷于敌手。继之，日俄不义之战也厮杀于东北，形势极度紧张。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宋小濂挺身而出，以东三省善后十二策上书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袁采纳其言，并委宋小濂为漠河金矿提调，会同总办刘 去收复失地。光绪三十年（1904年）宋小濂遇齐齐哈尔都护道兼垦务大臣程德全求治边之士，伟其才，以宋小濂可供大事，延入幕府总办文案处及善后总局。时俄兵压境，主权仅存，又束于军府旗制，创行新政险阻逾寻常。宋小濂临危不惧，以三寸不烂之舌“审画吐决，不刚不柔”，同沙俄进行不懈的斗争，卒使沙俄撤兵，还所侵占城镇、森林、航务、电业。而奏请放荒招垦，整军兴学，设道府厅县变通旗制，防备沙俄突然

袭击，皆宋小濂赞助之。程德全以宋小濂之功举为海伦直隶厅同知，未到任以道员交军机处存记。时宋小濂与清末民初的诗人成多禄已成莫逆。宋在《澹庵诗序》一文中写道，“岁甲辰，余佐黑龙江军幕，适获与澹庵共事，倾盖如故，把臂深谈，始知二十年，澹庵之慕余，亦如余之慕澹庵也。千里神交，一朝合并，时促膝研究当世之事以相磨砺。”可见其互相仰慕之情。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停战媾和，关系东三省之安危，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以黑龙江关系重要，奏请清廷，召熟悉邦交、边事之宋小濂赴都备外务部议约顾问，得遍谒枢府之权要。清光绪三十二年（1606年）八月，外务部以宋小濂精心力果，熟悉外交，派其赴哈尔滨与中东铁路公司霍尔瓦特谈判。重订铁路展地与伐木合同等事宜，宋小濂力争国权。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一月，宋小濂接替周冕任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其间宋小濂向清廷密陈周冕劣迹。内称，查周冕内心向外，罔利营私。日俄战争期间，周在哈尔滨为俄国购办军粮。其经办铁路两旁垦务所收荒价，悉饱私囊，至今并无只字禀报。现更将所置洋房价值数万余产业，报交俄国红十字会，显登俄报，侈然自得。查周冕向倚俄人为护符，遇事曲媚固结，凡有益于彼族者，无不尽力迎合。黑省公务均置不理，几有独树一帜之势。似此任意妄为，本应请旨立予拿问，因该员尚有经手垦务荒价及交涉经费等款，现撤省，待进一步查明后，再行据实参奏请旨严惩。朱批："著即严行查办。"同年宋小濂又上"详陈周冕欠款摺"。朱批："外务部知道。"

周冕总办黑龙江铁路交涉局，设于哈尔滨，终年并未来省。但周冕迫于沙俄势力，先后于清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1903年、1904年）擅自与中东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订立购地、伐木两个合同。合同规定陆路自成吉思汗站至牙克石站的铁路两旁，长600里，宽60里；水路一为呼兰、诺敏尔两河，各至水源为止，

长300余里，宽100余里；一为浓浓、杈林两河，各至水源为止，长百六十里以上，宽70里，中东铁路公司有采伐森林权。其中本无木之区，名虽与木，实与以地。致使东省铁路沿线占黑龙江土地240余万亩，森林2万余平方里，煤矿尤广。沙俄又借河口护路，沿线常驻数万军队及大量警察。路界内备设民治、司法、军事各职，收货票之捐，形同割地。斯时，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之中东路沿线地带，皆为俄人霸占。

宋小濂到任后，同张寿增、王莘林、涂凤书等“同仇共愤图边功”，揭露敌人奸狡，据理力争领土主权。屡经挫折，不稍退让，多次与沙俄展开斗争。沙俄视前合同为已得利权，多方狡执，不肯放弃。宋小濂“殚尽心力，舌敝唇焦”，一一抗争，一年会议达二三十次，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将购地合同签押。新签订《黑龙江省铁路购地合同》规定：自满洲里以西入中国境起到松花江北岸石当止，共展地12.6万垧，并声明嗣后永不再展，收回土地7万余垧，还提高了地价。双方在重谈伐木合同时，沙俄代表不肯放弃前合同所订呼兰、诺敏尔两河地段。宋小濂深知呼兰、诺敏尔两河流经黑龙江省腹地，既有大宗物产，又是商民交通要道，若将两河划归中东铁路公司，必将影响江省人民生计，尤其会使沙俄“扼我咽喉”，抢我利权。因此，无论沙俄代表怎样要挟，宋小濂始终坚持不允。相持两年余，会议百四十余次，到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终使沙俄侵略者派出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同以黑龙江省会议专员身份的宋小濂重新签订了《黑龙江省铁路伐木合同》。合同规定，凡从前所订合同和所发票照全行作废，中东铁路公司只在火燎沟、皮洛以、岔林河3处地段有伐木权，并规定需纳票照费。新签订购地、木植两改订合同，收回地亩过半、林区十分之九，增加了地租和木炭税，挽回利权。

铁路交涉事将成，抚蒙实边事重。呼伦贝尔地处中国东北边

陲要地，西连外蒙，北、东界沙俄，有1500余里同俄国接壤。中东铁路从呼伦贝尔穿过，它是帝俄侵略中国、掠夺中国东北以及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重要工具。呼伦贝尔有丰富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畜牧业发达，多湖泊盛产鱼盐，地下矿藏甚丰。沙俄侵略者贪心不死，早就觊觎呼伦贝尔，竟借口边界不清，时生蚕食之谋。俄民常常越境垦植、采金、伐木、狩猎、刈草等，欲攘我地为彼有。过去中方则无人过问。更有甚者沙俄侵略者竟乘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机，以护路为名，进兵呼伦贝尔。宋小濂受命于国难当头之时，到任后首先加强行政管理。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收回利权，为筹边实边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变通旗制，加强行政管理。宋小濂赴任之前，呼伦贝尔官制为旗制，设有副都统、总管等官，实际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5月），东三省行政改制，分建行省，以将军改设巡抚，裁撤副都统，设立道府厅州县，即改旗制为民政制度，实行军政分治。宋小濂“因以蒙旗风气未开，骤议更张或恐生枝节”，呈清副都统以下等官暂勿裁改。地方事务可由副都统兼办，但由于边境寥廓，铁路横亘，招垦放荒，外事交涉日多，此非旗官所能胜任。因此，宋小濂采取变通旗制的办法，使旗制逐步向民政制度过渡。即一方面保留旧有旗制承办旗务，另方面在旗署又设立文案处、调查局、会计所、巡警局、审判局、官货局、交涉税务局、边垦局等民政机构，稍俱民政规模。清宣统元年初（1909年初），呼伦贝尔都统改为呼伦道，实授宋小濂为兵备道。宋小濂又在要冲之地增设民治机构，即在道所驻地设立呼伦直隶厅，在满洲里设立胪滨府，在吉拉林设立设治局，至此，民治制度日臻完善。（二）整顿卡伦，兴办屯垦。实边必屯垦，宋小濂于清光绪三十四年春（1908年春），请省署奏清朝廷，变通卡伦章程，以守以耕，通力合作、使戍卒坚持久安之治，无失所之虞。清雍正年间，为防

止俄民越界，在呼伦贝尔沿境设卡伦。但因地方派官轮流戍守，戍兵生活困苦，俄人施以一饱之惠即甘为守牧牛羊之隶役，至八国联军入侵时，沿边卡伦尽毁于俄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虽经苏那穆策麟副都统重设11个卡伦，但因未兴屯垦，“轮戍之制，几同虚设”。宋小濂一上任便重整边务。为严疆域，辨形势，明土宜，蓄地利，重属人，筹边措施力求适宜。为此，自非实地视察，何以施措咸宜。自5月至10月，分道详勘，凡六阅月，踏勘1500余里国境线。陆行则攀登叠嶂山峦，穿过原始森林，道路未辟；水行则荒溪绝涧，舟楫难施；酷暑蛇虫，秋风雨雪，靡险弗履，无苦不尝。宋小濂率众勘察，乃随行随记，随记随图，归而互相核对，详绘编辑，作《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一书。全书计21篇，概括13个门类：首国界，严疆域也；以次河流、山脉，辨形势也；地质、气候，明土宜也；物产，蓄地利也；部落，重属人也；设卡伦，以植屯垦之基；设治所，以立远大之规；发展交通，以谋转输之利；加强税务，以收利权之失；加强兵防，以销侵轶之萌。经过宋小濂实际勘察，既详既实，对边情了如指掌，举而行之，推而利之，此其设卡伦之依据也。

宋小濂沿边设卡伦，严守藩篱，对俄人越垦、渔猎、伐木、采金，或严禁，或课以租税，利权不稍失，寸土不让人，从此边地有起色。宋还制定了《沿边卡伦章程》，规定卡伦“以防守边圉为职务，以招民实边为主义，其办法则大概仿照屯田，兵民并务”。沿边设置卡伦21个，并在呼伦贝尔成立边垦总局，统管边垦事务，卡兵边戍边守边巡防，边垦田，收得粮食为卡兵津贴，以戍以耕，以农养兵。因蒙民不善稼穑，卡兵一律改成汉族，多从辽宁、吉林招募农民充当。沿边卡伦禁绝俄人越境安装水磨、开金矿、挖金等。对俄人越境刈草、伐木、牧放等一律照章纳税。经过一番整顿，沿边俄人渐知主权在我，凡一草一木必经我允许方能取用，迥非前之任意取携可比。（三）加强税收管理，收回

利权。一是设卡征税。宋小濂规定沿边卡伦就近征收羊草税，牧畜、皮毛等税。二是设置税收机构，边垦分局在满洲里，管理边垦事务和税收。设治局设在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吉拉林，负责派员征税。三是税章的制订。呼伦贝尔征税向无定章。宋小濂任期内制订了《呼伦贝尔刈割羊草章程》、《俄人越界牧畜章程》、《俄人越界砍木凿石章程》。（四）大力发展民族实业。呼伦贝尔实业极为落后，3万多人的常年所需，过去仅靠呼伦城百余家商户贩运内地食货分售到各旗，而牧畜皮毛大宗贸易反操之于俄商之手。迨至宋小濂实行屯垦政策以后，"商贾风闻而来"，每年春秋两季在离呼伦贝尔城320里的寿宁寺辟出市场，促进呼伦贝尔商业的发展。宋小濂亲临寿宁寺市场观察，并援笔写下《呼伦贝尔寿宁寺市场记》，记述了寿宁寺市场繁荣景象："各商以万计，畜则驼、马、牛、羊以数万计，货则金、玉、锦绣、布帛、菽、粟、轮舆、鞍辔，凡蒙旗日用器物"无不具备。设立官货局，加强对商业的管理，一方面是掌管呼伦贝尔的内外贸易，防止商人居奇；另方面购运官府所需的粮食及其货物。官货局的设立，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大宗贸易为俄人所乘的局面。收回了已为外人所攘之权利。东北边陲重镇的经济得以繁荣兴盛。（五）创办学校。在呼伦贝尔居住的人口主要是蒙古人，懂得满文者很少，懂得汉文者更是寥若晨星。因此，宋小濂破天荒地在呼伦贝尔城创办小学堂，不久又在陈巴尔虎和胪滨府设小学校，以学习满、蒙、汉文为主，提高了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改变了愚昧无知的落后状态，为开发边疆造就了人材。（六）增编军队，整顿巡警。呼伦贝尔东南一带为兴安岭之北麓，山深林密，向为盗匪巢穴，蒙民长期以来苦于其掠夺。中东铁路通车之后，俄匪越境掠虏劫杀蒙民较东南一带尤甚。呼伦贝尔内地原设马队百二十人，分驻各处，兵力单薄，不足以靖地方。因此，宋小濂一方面请省拨马队两营，加厚兵力维持秩序，另方面设

立巡警局，招练新警。经过训练的警兵，岗哨密布，清理街道，禁止赌博，解散挣斗，稽查匪盗，使呼伦贝尔城警务日有起色，"城街烟赌为之一空，违警轻罪随到随结，行政卫生成效大著"。

满洲里边垦局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末(1908年7月下旬)，在昂昂溪站向俄人征税，俄人非但拒绝纳税，俄巴厘司总管巴尔谢夫斯基反而派兵包围满洲里边垦局，降下中国国旗，夺走局勇枪械，并掳走局员闵臣及局勇等押赴哈尔滨，俄国人无视中国主权，辱中华民族尊严，横暴无理已极。宋小濂闻知，立即电诘俄方，迫使沙俄将闵臣等在中途放回，经宋小濂据理斗争，到同年十二月十日议结画押，俄方被迫答应：①满洲里铁路界内中国照旧设局；②铁路公司由呼伦贝尔用头等专车送闵臣等回满洲里；③闵臣等到满洲里后，俄方官员一律到车站迎接，并送至局内，共同升挂中国龙旗；④俄人掳去之枪械如数归还；⑤边垦局护勇仍照原有之额，不能裁减。清宣统元年一月十三日（1909年2月3日），俄方一切都按议照办。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宋小濂以至诚爱国之心捍卫了中华民族之尊严和国家之主权。清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清廷以宋小濂补授呼伦贝尔兵备道。

宋小濂在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中俄国界自清雍正六年（1728年）签订《博克图条约》后，一直未进行勘测。当时许多鄂博、卡伦虽属中国领土，但仍为俄人所拥有。宋小濂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心，乃上书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条陈利害。清宣统三年二月十六日，宋小濂兼任黑龙江民政使，同年三月（1911年4月）清政府派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为会勘中俄边界大臣，宋小濂为帮办，由宋小濂具体同沙俄代表会勘中段边界，中段边界长达2000余华里。陆路自达尔巴干达胡山至巴陵图山；水路自海拉尔河口循额尔古纳河至汇入

黑龙江，其地界是山环水绕，错综纷汉，界限无可依据。为不使寸土丢失，在与俄国会勘前，宋小濂炎天雪地，历经寒暑，“先自履勘，复同俄员会勘”。精心勘察，寸土必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辱的志气。清宣统末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中俄双方代表在齐齐哈尔召开会议，会勘额尔古纳河等一带中俄边界。中国会勘边界大臣周树模，帮办宋小濂；俄国会勘边界大臣菩提罗夫，帮办儒达诺夫。双方会谈勘界中，俄人儒达诺夫蛮不讲理，视满洲里车站为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路连轨之国际要地，积年经营所费不赀必欲攘为已有，并以武力相威胁。宋小濂大义凛然，不屑威慑，坚执条约，证以山川形势，援引各国图说，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三年苦撑柱，尺土期保障”，证实满洲里为中国领土，截穿了沙俄帝国主义妄图霸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终将沙俄占据的满洲里划归中国界内。宋小濂在同沙俄勘界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同年闰六月二十三日（1991年8月17日）试署黑龙江民政使司的宋小濂到省就任。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呼伦贝尔蒙旗遂宣告独立，逐所置民官，巡抚周树模乞休，朝旨以宋小濂署。1912年2月5日周树模辞职，清廷任命宋小濂为黑龙江省巡抚。12日清宣统帝溥仪下诏退位。15日袁世凯被临时参议院“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宋小濂在齐齐哈尔率各界人等致电袁世凯表示效忠。电称：效电敬悉，大局糜烂赖我公日方补救，始得上存皇室下奠民生，孤诣苦心人人共见。故合南北军民及满蒙回藏海外华侨各团体无不以大总统之任非公莫属。国事虽定，时势方艰，仍恳我公力任其难……江省知共和决定后，凡有布告各界无不欢腾，现在地方安谧如常。宋小濂在另电中积极支持袁世凯建都于北京与南京临时政府相抗衡。称：……据民国联合会等暨报界公电力持建都于北京等情，读之不胜欣幸。方今南北一家，畛域悉化，自宜统筹全国，大势择利而行，

该会所议公允切当，实于民国前途大有关系，务祈合力赞同，从速决定以维大局。袁世凯于2月16日电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如有借名革命紊乱秩序者，均认为是马贼，即行弹压勿贷。17日赵尔巽通告各地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实行民国纪年和改悬五色旗，并称，人民目的已达，更无革命可言，凡革命党人切勿再自扰乱，致生恶果。3月15日，东三省总督与吉林、黑龙江两省巡抚都改称都督。赵尔巽任东三省都督，陈昭常任吉林省都督，宋小濂任黑龙江省都督。补宋小濂陆军上将衔。19日赵尔巽、宋小濂秉承袁世凯的旨意拟定黑龙江省解散革命党人办法：关内籍党人限两日内到官署报告，给资回籍；本省党人要“安分守己”，冒充者按土匪例依法惩办。然而革命党人并未被袁世凯的淫威所吓倒，纷纷来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使东北当局感到棘手无策。为此宋小濂于1912年3月27日写信经赵尔巽研究对策。说明黑省于去年腊月二十六日、除夕等日，屡有党人密谋图举事，幸军警严备而止。维时将党首匡一、石汝峰等传至公署面加开导，资遣以去，但潜伏未走，且有陆续南来者仍暗中鼓煽，于是一再剀切示谕：共和成立无革命之可言，愿行者当给资，愿留者当酌用，而始终无效。并拟于阳历3月21日举事，且有送给本省军界之蓝天蔚委任状上盖有关外都督军政府印信等事。该党人借口谓江省为假共和，又谓有宗社党，其煽惑军界谓大总统颇欲更换等等。宋小濂在信中还说，探知该党此来，在哈埠设总机关，卜奎设分机关。宋小濂遂将党人屡图举事情形电告政府。奉大总统有电称，“如此辈人等有扰乱公安实据，即遵前令，按照新刑律各本条分别审断等因”。宋小濂以为，惟扰乱公安实据能为人所共识者必待扰乱以后，然外人眈眈之际，一经扰乱将无复维持之望，否则又恐贻人口实，演成山东近日之恶剧，实为棘手之事。

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宠信武人地方割据，社会动荡不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武昌首义成功时，外

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帝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背叛祖国，呼伦贝尔少数民族败类也追随外蒙而独立。帝俄侵略者乘隙在边界制造事端，侵吞中国领土，就此宋小濂同赵尔巽往复电商对待蒙俄政策。宋小濂在给赵尔巽的电报中称，胪滨等处蒙人近来购置大宗火药枪支恐有扰乱事情，且俄人亦进兵呼伦贝尔，并携有大炮，任意行动演习大炮，商民惊惧，应妥筹办法以安边境。赵尔巽复电表示除速派兵防御外，一面咨请政府就近与驻京俄蒙大员妥为磋商善后政策，以免酿成重大交涉。呼伦贝尔自宣布独立以来，宋小濂迭次派员劝抚，讵料该蒙头人固执己见，宋小濂不得不又于5月16日派吉索纯前往调查 近来实在情形， 指令强调仍须劝抚，取消独立。如果再不醒悟，拟以兵力剿击。现下共和民国已经完全成立，况经全国承认。请蒙头人既在五大民族之内而不就民国之范围， 似此顽梗不化不得不以兵从事， 请各国派员往观阵，惟各国仍须严守中立，不得干涉。

同年6月，同盟会黑龙江支会会长管颖侯等8人以黑龙江省全体公民代表名义上书北京大总统、唐绍仪总理，呈请撤换黑龙江都督宋小濂。为此，宋小濂于同月14日在齐齐哈尔公园假宴客为名，召某军界各首领及民政提法提学各司以及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多人，周围军警严行守卫，不准入园游览探其内容，实为召开秘密会议，以求对待同盟会之办法。军界多主张以武力震慑，各员皆赞成，唯军政处长徐鼐霖发言劝阻，徐以为若以军力从事惟恐牵动大局，须改用消极手段免致激起公愤。宋小濂为管颖侯控告案曾致电赵尔巽，“东西立宪国组织政党原为法律所不禁，乃有管颖侯者冒充代表赴京在总统府上书条陈小濂10款，并诬及协统庆寿、统领端禄等有与宗社党同情之事，以致军界大动公愤，当即咨询省议会，拟复并未派原任代表。管颖侯因其势孤又称系同盟会之长，是以不得不加查办以安大局而免酿成事端，请即鉴核，以免误会。”与此同时宋小濂还迭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究

其原因仍是管颖侯冒充公民代表控写多名上书大总统，禀奸宋小濂反对共和暗助宗社党各情。由于弹劾宋小濂案酿起绝大风潮，军界亦大受影响。寿协统及军官10余名一并辞职，军心因之动摇异常。后经黑龙江省议会电请大总统参议院叙述江督始终被诬情形仍恳挽留，才未辞却。

为管颖侯控告一事，宋小濂于1912年6月20日派警兵至同信店院内将药铺执事人关步青拿获，复至西站车店又将车廷杰捕获，均送军政处关押，嗣验提讯彼等各认为江省同盟会支部会员禀揭江督，指控各军统领为宗社党图谋不轨等情，均系会长管颖侯冒名控告。彼等事先均不得知。与此同时秦广礼、达哈苏等致电北京大总统和唐总理，声明黑龙江公民代表管颖侯等8人呈请撤换江督宋小濂，书内列有秦广礼、达哈苏2名，“广礼、哈苏皆不知情，特此声明”。管氏唯恐反坐，得司法界某人帮助潜逃。宋小濂防其潜伏他处造谣生事，故通电奉吉两省都督请将管颖侯缉拿。又通电各处一体严拿并悬赏格，“如将管颖侯拿获送省即赏银200两”。

宋小濂自压迫同盟会以来，颇失一般人民信任，省议会正讨论排斥。宋在此情况下宣布脱离共和党，并声明此后不再入他党以自重。宋在声明中说：“民国初建，政党发展，小濂以为欲促政治之进行必须有健全之政党，用是不揣固陋遂隶共和党。乃比月以萌各政党狃于党见枝节横生，几置国家于不顾，循此纵往各党私见愈深感情愈恶，倘演成法兰西革命时党祸之惨剧，窃恐中国之亡不亡于专制而亡于政党之共和也！国之不存党于何有？小濂本无政党上知识，又无力以挽其失顾觇现象，日夜忧戚。因此宣告出党。”其实不然，宋小濂后来又参加统一党，并被推为黑龙江支会名誉理事。

民国建立后，地处东北边塞的呼伦贝尔、呼兰以及大赉、安达、肇州等地，因胡匪滋扰不堪，居民大受其害，黑龙江省社会

不靖。虽经派兵剿办，仍难肃清，而各旗又有随同库伦独立之举。宋小濂对此异常焦灼，就黑龙江省内政外交棘手之事电告东三省都督赵尔巽。对俄人强占疆界，胡匪骚扰猖獗，焚烧抢掠民不聊生之事，请赵督设法援助。赵尔巽则以三省业已分权，未便越俎代谋，如若坐视则关系邻省之危急，亦属非是，现正与各司道会议办法。

民意机关随着民国的建立而方兴未艾，吉林省议会电劾都督陈昭常，有意专制贻害地方。北京政府拟派宋小濂查办。宋对此发辞电谓，此事系由该省议会所弹劾，宋亦吉人一份子，特请避嫌另派他人。

针对黑省旗民与吉奉两省不同，多通满文不解汉字的具体情况，宋小濂呈请北京政府变通选举办法，若众议院议员之选举照选举法第6条第5款不识字不得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势必屏弃数万人于国民之外，殊与五族选举平等有背，因援蒙藏青海之法，请政府变通办理。北京当局以所述当属实情，呈请总统咨送参议院。

宋小濂为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联合会，派巡防营统领袁庆恩邀请杜尔伯特公爵布彦朝克来江省组织五族联合会。8月3日在省议会开会，到会者300余人，临时主席宋小濂首告该会宗旨，然后投票选举会长，宋小濂得票最多当选正会长，布彦朝克为蒙族副会长，选举毕，宋登台演说，强调五族联合为一，人民同享共和幸福。

宋小濂自民国建立以来，贯彻袁的法令不遗余力。对袁世凯所公布的八德之令更是倍加推崇。宋说，此令为全国人民谆谆告语，凡有血气能不敬听？考中国人民夙重八德，由于古先圣贤之教，即以此为本源，经籍所流传，生徒所讲习，父兄师傅所督饬，乡里妇孺所称道，无不殷之于此，以故浸淫濡染由教化蒸为风俗，数千年来罔或荡弃，今国体虽更纲常不改，仍应从本源上切实讲求

方能发生效力，主张饬由教育部力为提倡，即以八德为教育宗旨，修身一科其教科书即本此以编纂，并迅令各省学司注重此点……宋对袁世凯鼓吹的封建礼教八德闻之手舞足蹈。此外宋小濂还奉袁世凯之命通饬各属务在规定期内断绝鸦片。宋小濂说，禁止鸦片一案断难稍涉迁就，特重申禁期统限于本年12月一律禁绝，务即通饬各属一体遵照。

宋小濂自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叛国投靠沙俄后，更加严密注视边情。1912年8月15日，宋向北京政府通报边情时说，内蒙"独立"活动已经显露，请求派兵进驻扎赉特、扎萨克图一带，并添派水师梭巡松、嫩两江。16日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在靖安县（今白城市）发布告示，强行驱逐地方官员。20日乌泰在沙俄与库匪煽惑下，经过长期策划，在归流河东岸举兵叛乱。叛匪兵分三路向洮南、开通（今通榆县）、突泉进发。同时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声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布独立，与中国永绝"。科右后旗镇国公喜敏珠尔追随乌泰同时叛乱，并与乌泰里应外合占领镇东县（镇赉县之一部）城。26日宋小濂派协统许兰洲率军进驻大赉，配合吉奉两省军队协剿。许兰洲带马、步、炮3营定于是日起节向蒙进发。由于乌泰乱起，边务吃紧，宋小濂指示电报局，对所有来往电报务须谨慎传送，同时指示军警严查不法。

自乌泰追随库伦蒙逆叛国以来，宋小濂密切注视边境俄国动向，一面随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一面派员分赴各处密行侦察。得悉俄人近于满洲里站又复运来红牌队40车，每车计40人，各携械沿站驻扎。迭与俄官交涉，皆置之不理，请政府一面授以机宜用资应付，一面动饬外交部速与驻京俄使交涉。俄帝又以宋小濂派许兰洲驻扎大赉、塔子城一带而生疑虑，增兵各站要卡加班守卫，凡属华兵一概不准经过。

宋小濂还把派兵同乌泰作战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宋在电报

中称，前派许兰洲带兵赴大赉，近在楞把塔地方与蒙匪相遇，并迎头痛击，获得胜利，许乘胜追击又遭遇蒙匪之援军于白云花屯，许兰洲乘敌喘息未定以铁骑冲锋复获大胜，夺其枪械马匹颇多。惟查附近各蒙屯汉人被杀者有300人之多，情状至惨至愤，亟拟以火器围攻聚歼为死者报仇。北京政府回电指示，宜稳进不可稍有疏虞致挫锐气。宋小濂以蒙匪猖獗潮流甚急，各路军队已调赴各处防守，因恐尚有土匪乘机而起，故拟编团练若干以补充兵员之不足，防患于未然。

宋小濂对处理黑省蒙乱后的宣抚工作耐心细致。蒙人倡乱平息后，便派得力人员前往宣慰，有知县张毓华、凌祜堪以派赴扎赉特旗王府、塔子城，经历舒崇刚堪以派赴扎萨克图，省议会议员乌泽声堪以派赴扎赉特旗外，议员伊清阿、庆善分赴其余各旗，一一予以宣抚。不久，宋小濂接到袁世凯电令说：洮南之乱指日可平，惟满洲里、呼伦贝尔叛蒙独立尚未取消，其主谋者总管胜福梗顽不化，并多数蒙人误会民国受其煽惑，应将共和理由译成蒙文实贴蒙古各处，俾得周知，并选派精于蒙语人员赴海拉尔一带演说五族共和之大旨，庶可不烦用兵，独立自行取消。宋小濂接电后，即译蒙文布告张贴宣告共和理由，并派精于蒙语者多人，前往宣讲。1912年9月23日，乌泰之叛乱由奉吉黑三省军队协同予以镇压基本摧垮。黑龙江省通告，对未参加叛乱者，一律保护，对参加叛乱而能悔改者，任其各安本业，对临阵脱逃而又弃枪者，允其投降。

宋小濂在黑省实边多年，对沙俄蚕食我国领土进行不懈的斗争。对那些敢于同沙俄侵略者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下属，即时为之请功。1912年10月1日，宋小濂向北京政府保举了对沙俄斗争有功人员张德泰，并报告了张德泰对俄舰斗争事迹。他说，日前俄舰驶入大赉厅境内，该舰上载有中国旧炮，显系接济扎赉特旗。后经张德泰管带鼓勇登舰据约力争，该俄官理屈辞穷，自认

违约业已受验驶回。查该员系隶旗籍，充当吉林省陆军马队第23标第11营管带，此次对于俄人之违约竟能以理相持，卒令俄俯首就范，洵属有胆有识，勇智兼优，拟请饬下国务院酌议优奖。同年10月19日驻黑龙江俄领事与宋小濂会晤，系因俄国虚无革命党风潮日炽一日，政府急欲将远东军队悉数调回，俄政府唯恐将来中国对于蒙古用兵剿抚。俄领事就此向宋小濂表示，该国严守中立，不仅对民国，惟要求担保蒙古活佛所借该国之款项。宋小濂立即将会晤内容报告北京政府 。然而俄领事保证 不干涉中国内政，纯系外交辞令。当扎赉特旗贝勒等于1912年10月29日，应宋小濂之请来省垣与宋会见，大有悔悟之意。当其一行途经中东路腰库勒地方，突有俄官数员，带兵百余人阻止盘问，声称俄政府命令查询因何晋省，是否出于迫胁，寻尔当即护送回旗。该贝勒答以系由都督邀请，亦甚愿往，俄兵始去。事为宋小濂所闻，为此报告北京政府，谓蒙、江本为中国境内，经常往来之俄兵任意阻诘，并以奉其政府命令为词，实为干涉中国内政，必欲鼓动各蒙旗脱离中国而后止。应请饬外交部与俄使严重交涉。再谈贝勒等经此次劝谕，如果效忠民国，拟请酌给爵位。

因蒙乱中蒙民惊窜，村镇一空，宋小濂派员赴蒙地招抚，奈受沙俄、蒙匪煽惑迟疑不决。宋小濂派锡赞臣委员前往，颁发汉蒙告示明白晓谕。于是在各蒙屯之蒙民纷纷迁回修理房屋，迁回者已有680余户。宋小濂为妥筹安抚该处蒙民 ，兹拟制订善后8条。呈请政府批准，即予施行。由于宋小濂所施民族政策得当，致使扎赉特旗贝勒扎特玛拉普丹，咨请该旗蒙民效忠民国，不再承认俄库私约，唯恐外蒙窜扰，土匪又生，请兵镇慑以资保护。贝勒此次回旗，向各盟旗宣布政府抚辑蒙人之德，庆幸勿受库伦煽惑。内蒙各部颇知感戴，并表示库俄之私约喀尔喀四部尚不在内，况库俄订立私约时，各旗一未与闻，现内蒙全部及外蒙数部已决定无论如何对于私约绝对不能承认，请大总统及外交总长尽

可一意与俄人交涉。1912年12月14日，宋小濂接到前派赴呼伦贝尔各旗劝谕的吉祥报告，说该旗总管胜福受乌泰、库伦方面的煽惑和接济，现正蠢蠢欲动。近见俄库私约发表，更是气焰嚣张，虽再三劝导，总管胜福仍置之不理。鉴于此情，宋小濂以为应于各要隘添兵加防以防隐患，令许兰洲旅长为司令官督率所部马队5营、步队2营、炮兵1排驻扎赉特旗以资弹压蒙匪。

自俄蒙问题发生后，全国舆论除主张以兵力征讨库伦外，对于俄人所为，人人心目中皆有愤愤不平之慨。东三省都督联衔致电袁世凯，称俄库私约布露，军务吃紧，现已各设筹防处一所，专筹办防堵、进剿、军饷一切事务，与此同时东三省都督联衔请款，宋小濂委徐鼐霖为总办。而袁世凯却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帝俄一味妥协投降。宋小濂对此气愤非常。他指出：黑省与蒙古毗连，于蒙情形见闻甚悉，此次私约发现，实系由政府敷衍贻误。查外蒙现状非以武力不能解决，若再延误，不但外蒙不能平定，而内蒙亦难保全。

库伦蒙逆叛国以来，袁世凯一味妥协媚外，又酿成内蒙部份旗盟王公追随库匪叛乱，给地方官吏处理边务造成更大困难。宋小濂为严防俄匪徒尽心竭力，特别对招抚蒙旗煞费苦心。宋除用军队堵击逃犯乌泰并就近镇慑江省所属各盟旗外，一面复派宣抚员游说各盟倾心民国，还结交扎赉特旗王，认该王为义子，迎入督署优待以礼。1912年12月25日，扎赉特旗，巴郡王及郭尔罗斯公爵、各旗公众恭送匾额一方，文曰"儒将绥边"。高悬南城门楼上以彰勋业，各界到场致贺。军队奏乐，人民聚观盛极一时。其他各旗亦无不钦佩。

1913年1月12日，《俄蒙协约》签订后，黑龙江省志士奔走呼号，组织义勇队、征蒙队。是日，宋小濂发出布告，令上述组织从速解散，由地方官员随时严禁。22日，宋小濂转发国务院密电：对各地抵制俄国道胜银行钞票及其他反俄行为，必须设法禁

止查办。同年2月19日，俄国人擅于海拉尔、呼兰、绥化等地进行测绘。宋小濂电请外交部与驻京俄使交涉。

自《俄蒙协约》签订后，宋小濂为征库伦蒙乱作积极准备。调查库伦俄兵之确切数字，搜集库蒙匪之情报，如库伦活佛深恐民国用兵讨伐，碍难抵御，乞准俄政府派兵保护。近日以来添派俄军马步三师团，炮兵15营，大炮及机关炮16尊，机关枪数架，大都驻扎库伦附近。宋小濂还分析嫩江、露鲁河及额尔古纳河、色楞河、乌鲁克穆河、哈拉额尔格河等处，系土谢固汗等旗往黑龙江省之大道，为旗民来黑省必经之要路。自库俄私约发表后，库民因闻民国将有征库风声，均怀恐惧之心，纷纷到黑省避匿。因此以上等处为征蒙叛匪之战略要地，如择要地驻精兵则可断绝库匪南窜之患。宋小濂请陆军部调派军队若干开往该处，相机驻守以资震慑。

黑龙江省东西受日俄两大强邻的侵扰而不得安宁。3月27日宋小濂突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吴达基照会要求：（一）中俄人在黑龙江省自由通商。（二）派中俄代理人会同组织航业总公司于黑龙江省。（三）中国官吏宜实行保护俄人之来往于黑龙江省。（四）黑龙江省矿产准俄人自由开採。（五）黑龙江省铁路允准俄人自由建筑。宋小濂除将沙俄之无理要求报告北京政府应向驻京俄使拒驳严重交涉外，均给予严辞拒绝。

自外蒙叛乱，内蒙部份旗王附逆以来，沙俄乘机也在东北边界不断滋扰，据报俄国又有两大队人马在满洲里驻扎，并有俄人充当通译，测绘各处地图，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朱家城子、万和堡、张家烧锅、姜家窝堡等处有俄军200余名，将该处民户宽敞房屋悉行登记以便存查。俄人还在距省城卜奎附近的昂昂溪等处建筑炮台派员测量。江省以北海喇山、榆黄山等处森林稠密，俄人罗克斯夫率工人百余名强占该二处山林霸为己有。同时俄人又在满洲里、哈尔滨及沿中东路各站以及呼兰附近借剿匪为由，屡次秘

密增兵，对江省边陲构成威胁。

由于俄国武装越境骚扰，也助长了江省境内土匪更是横行不法，除不时对商民骚扰外，还引诱驻军加入股匪。驻扎拜泉县克山的第三路马二营有两哨、驻扎绥化十间房的第三路步一营有30余名防军皆因被匪勾结哗变为匪。后经派队痛剿，大股土匪已击散。当时讹传绥化城已落入匪手，宋小濂急调旅长许兰洲督剿，许部已入绥化城。并在绥属十间房处击毙胡匪60余名。黑省马贼一向猖獗，蔓延甚广，长期扰害地方，虽经派队督剿，但并不能彻底肃清。宋小濂曾因江省不靖，盗匪横行通电请求处分，文称：江省马贼异常猖獗，蔓延甚广，扰害地方治安，虽派军队剿办，颇有斩获，惟此拿彼窜，迄未能一律肃清，劳师縻饷之咎已不能辞，请政府加以处分，并称此后仍当激励将士带罪立功，务将寇气迅为扑灭。此虽是官样文章，但也难能可贵。

江省外有强邻侵扰，内有悍匪横行不法，造成市面银价飞涨，钱法毛荒，物价高抬，商民均受其害。宋小濂不得不邀集商会总理王廷瑞及官银号、广信公司总办魁星阶等开会，研究补救办法以维持市面平稳。宋小濂为此辞职函电不下数起，奈北京政府因一时人才难得终未允准。1913年3月宋小濂再次致电政府，力陈病躯难支，加之交涉日形棘手，殊难胜任，恳请另简贤能接替，但宋的辞呈仍未获批准。

江省著名悍匪孙学武素来猖獗异常。呼海绥三府，青冈、拜泉兰西、巴彦等州县，无不遭其蹂躏。其匪数2000余名，烧杀淫掠惨无人伦，闻者无不痛心。虽经当局严饬军队剿除，无奈兵力单薄，地域辽阔，征调运转困难重重。因此宋小濂特商请吉林驻军协剿，并派本省旅长许兰洲率陆防全军分路堵截，两师会合后，大小十余战，枪毙及生擒股匪约有300余名。孙学武已被擒获即行正法。宋小濂电令陆防两军乘胜追击。到1913年3月5日，剿办孙学武余党340余名，仅逃窜10余名。又据帮统李庆禄报告，

在伦东双沙河处与匪首江省四海、满天红、银钟、青山等股匪300余名接仗，生擒匪首满天红、伙匪9名，击毙匪39名，夺获杂色枪30杆，马34匹等。救回人票22名。此役宋小濂为许兰洲请功并荐许兰洲为东省军务不可多得的人材，后晋升师长。

宋小濂以东荒胡匪现已弭平，而该地人民难免流离失所，且饥民过多，若不及早设法安置，难免流为匪徒，急应筹备善后以恤灾民。故特派李梦庚为督办，专办抚恤善后事宜，调查被难之户口，分别灾情之轻重者豁免租税，重者抚恤银两，务使灾惠均沾，以苏民困，并报告政府，同时筹款安置贫民。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主使派人在上海谋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拔出了妨碍他专制独裁的眼中钉。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各政党各政团纷纷要求袁世凯彻底追查凶手。很快真相大白于天下，真正谋杀元凶就是袁世凯，引起国人愤怒，纷起反抗。奉直鲁三省革命党人先后潜去东北，积极筹组武装力量进行反袁。而宋小濂面对反袁怒潮，却致电国务院、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公开发出拥护黎元洪的青、咸两电，同黎一个腔调称鄂军退伍匪徒，竟敢宣言推翻政府。师长季雨霖、税局总理曾尚武为发起人，既发传单又出巨款，此等破坏之徒，煽兵酿乱危害国家，动摇共和前途，影响甚大。宋进而鼓动各都督、民政长有保护治安之责，对于此等匪党应视为国民公敌，不宜曲为宽容。

宋小濂在宋案发生不久又对当时之宪法发表政见。他对大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均表赞成。同时宋也主张法制。他说世界风云日恶，民国内政重在对外眼光，非组织成一强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国权，依本国现情及各国大势，宪法大纲自以采用法制为宜，管见如是。

宋小濂以江省东荒绥海一带之商民去冬被孙匪蹂躏不堪困苦，特派李观察办理善后以惠灾民，因恐有失察之处，故宋拟亲

往调查，带有随员参谋长徐鼐霖、内务司长于驷兴、秘书官蔡品山等于5月1日由省出发，所有民政事务暂委教育司涂凤书代拆代行。后因警察厅长在省议长孙兰升家搜检烟土一案大起冲突迄未解决而展期，直到孙案已有头绪，于5月19日宋一行抵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办霍尔瓦特及文武各官到车站欢迎。宋在哈尔滨逗留数日，因身体欠佳复回省调养，赴绥海之行遂作罢论。迎宋之绥海两县知事、防营李帮统及巴彦、绥化英、巴两统领只好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宋小濂由哈回省后即致电袁世凯，谓此次赴哈专为解释中俄误会，因近日俄人每误信侦探报告以为黑龙江省有备战之事，实于邦交上诸多不便，尤非中国政府表示和平解决蒙事之本意，故本督到哈与中东铁路公司总办会晤数次，双方开诚布公，咸以邦交为重，必不能误听一切谣言。惟胡匪骚扰林场一事，俄方颇为注意；当已电商吉督各派军队分途剿捕胡匪，务期断绝根株使中外商人各安本业。

宋小濂此次外出视察，因委官代职事发电谢罪。宋说，自民国以来京外各官外出均由次官代拆代行，查前清亦系印官代拆代行，乃此次民政长官赴东荒而委参谋长代拆代行民政事务，参谋长既系军政人员代理行政事件，司长等概不认可，除已将应行公事停办外，电请核夺当时即电复改委内务司于司长代拆代行。他还说徐参谋长来署事属荒唐，均小濂之罪也，望诸公和衷共济，勿存意见，大局幸甚。

宋小濂以近日财政困难腾移无术，而办理各项要政及军需筹防各事亦万不可缓，电请中央拨款已去电40余次，而中央置若罔闻，并不复电拨款。特派财政司长魁星阶赴京陈财政艰窘情形。为使中央迅速拨款，宋已面谕各司开具需款节略，并咨请都督府将军事要件亦具节略交魁星阶作到京面请材料。

此时，宋小濂确系处在江省内外交困，又是多事之秋。警察厅长逮捕违法省议员关庆山，省议会对宋大加指责。宋在答复省

议会质问逮捕关庆山一案，认为毫无违法处，自应独断独行。所谓逮捕自由，拘禁自由皆本督权限内事，自无庸得贵会之许可。所谓视议员如草芥、视议会如弁髦毋乃言之太过。查岳武亲供尚牵涉议员多人，本都督但择其情节较重者逮讯，其余概不株连，似此审慎周详苦心维持也，抑任意摧残也？设如在议员无论如何行为，为长官者概置不问，恐人民因而受害，亦必责长官之无状，为长官者又何以应之。总之，贵会不知原因质问可也。

因库伦逆匪及乌泰余党希图起事扰乱边疆。蒙旗地方辽阔，驻兵既虑惊扰，设防尤属非易，宋小濂为巩固边防加强省内社会治安，于不得已之中，筹一变通之计，将本省警察及预警改设民团，根据形势分7区：以肇州、大赉、安达为第一区；以呼兰、西绥化为第二区；以漠河、爱辉、呼玛为第三区；以嫩江、讷河、西布特哈为第四区；以海伦、拜泉、青冈为第五区；以巴彦、余庆、木兰为第六区；以龙江、甘泉为第七区。并将改设内容呈报东三省都督张锡銮和中央。

宋小濂自民国创建以来，以江省地近强邻交涉横生，诸事棘手。又因财政困难诸事掣肘，兼之市面钱法紊乱已极，无法维持，至今徒托空谈毫无一策，又致电袁世凯请免本官另简贤能接替免误要公。其退志甚坚，恐难滞留。

宋小濂身处黑龙江省边务20余年，洞悉边情，对俄人俄情了若指掌，屡挫俄锋。沙俄阴谋分裂外蒙，惧怕宋小濂作梗。因之宋小濂被沙俄侵略者视为眼中钉，借口齐齐哈尔巡警捕获一名冒牌记者、沙俄间谍、俄籍朝鲜人纪达连科，俄驻华使馆库朋斯齐于6月25日照会外交部，提出无理抗议，要求赔偿“损失”，还威胁北洋政府免去宋小濂，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7月6日，沙俄政府因6月25日照会中所提要求，未能满足，调兵3000名自哈尔滨开赴齐齐哈尔附近，进行武力威胁，扬言：如不罢斥黑龙江都督宋小濂职，并赔偿损失，即采取自由行动。北京袁世凯政府因

爆发“二次革命”自顾不暇，遂屈从俄国人的压力，于10日答复允予赔偿和惩办官吏，俄使库朋斯齐方电阻俄兵前进。16日宋小濂“因病”离职，由毕桂芳暂行护理黑龙江都督兼民政长。8月8日，北洋政府正式下令免去宋小濂的职务，被调入京，延为顾问，旋任参政院参政，滞留北京，与宦途绝缘一时。居京六年，无所事事。其间为其好友成多禄《澹堪诗草》做序，并刻印出版。同年宋小濂在为《澹堪诗草》的跋中写道：“中华民国三年七月阴历甲寅六月，余以参政院参政趋戏京师，澹堪皆与俱来寓斋，多辄商権刻集事。旋澹堪仓卒还乡，议道中辍。”宋小濂京居六载，所作尤多，已将60岁前诗作，编成12卷，藏于箧衍。1918年元宵之夜，宋小濂在北京邀成多禄等七诗人到家食熊掌白鱼。宋在《奉邀赵次公徐敬宜等食熊掌白鱼》诗中写道：“赵周我长官，纡降不嫌笃。林马我师友，拳拳膺久服。……涂成徐三君，患难交弥笃。”谈诗会友以度时光。

其实宋小濂时刻关心国家的兴衰安危。在他的《出都》诗中有过表达，“贪狼瘐鼬乘风起，社鼠城狐据地呼。”指责日本帝国主义乘巴黎和会欲侵吞中国山东；对国内军阀割据奸人当道卖国也加以痛斥，同时在诗中大声疾呼，在民族危急的时刻“诸公漫作旁观客，大厦将倾要共扶”，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极大的爱国热忱。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部分权利，长春以北段，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中俄合办，由中国派出督办，北洋政府于1920年6月特命宋小濂当此重任。宋小濂上任后组织新董事会，更换管理局长，整理路政，续订铁路合同。亲自按站巡阅全线，劝勉职工，询问商旅，有关应兴应革者详察通筹著著规划，协约各国翕然无异议，俄人亦不能为之难也。

宋小濂在中东铁路督办任上，志在与苏联搞好关系，开辟国际铁路交通。在《归吉林》诗中是这样表达他的心愿的，“非夸

昼锦还乡里，好辟通途贯亚欧。”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司法部拟定收回中东路司法权暂行办法四条，并电告吉督鲍贵卿、江督孙烈臣和东省铁路公司督办宋小濂。1921年3月4日，宋小濂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江省鼠疫之情，谓哈满线各大站均设防疫所，长春二道沟停车检疫。同年4月，宋小濂电请救助赴哈尔滨关内灾民。同年11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会前北京政府给宋小濂密电询问对大会之意见。宋则主张，在太平洋会议中声明我国担负完全责任，以免他国有所借口。他还主张，中东路重要问题，不外保护经济管理等项，各项之中尤以经济为最重要。此次太平洋会议，如果有此提议我国应当声明中东路归我国担负完全责任，以免他国有所借口。至于经济问题，则与其任各国投资，毋宁以政府名义向各国商借一宗借款，转而借给中东铁路。

宋小濂任中东路督办2年，任事之初，正值事变迭乘，群情惶急，百端纷扰，待理綦殷。每以路务艰难，关系重大，时与中央及三省当局商榷，往来仆仆道途。直至1921年冬，诸务稍为就绪，始获蹈暇出行，按站巡阅。就所见闻，其间应行整理之处尚多，均经随时指示，促其进行。并饬随行各员于车务、机务、工务、商务诸大端，以视察所得，各具条陈，冀收集思广益之效。至铁路警察，关乎维持安宁，保护财产，当如何整顿，如何分布，亦经详察通筹，饬令另行规划，以期改良。两年间，做到了“今日我将去，喜见康庄道”。

1922年1月宋小濂辞职。宋之辞职，其自居是吉林人，感到奉天派的跋扈，彼对三省之所谓“奉人治奉”，亦却怀“吉林人治吉林”之想，无如其力不遂，始终受奉派之压迫。故对张作霖之奉派常怀不平不满之气。直奉战后，东三省宣布独立自治。宋自居三省出身者之中心，曾对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三氏发出劝告电，内称：“大丈夫之处事也，宜光明磊落，成则九合一

匡，不成则息影林泉”等语。

宋小濂以62岁高龄挂冠归京，卜宅后什刹海南岸刘海胡同新居，曰止园。以“好学不知老”，名其室为晚学斋。宋小濂以书史文学自娱，工诗词，善书画。时人把他与成多禄、徐鼐霖誉为“吉林三杰”。晚年宋小濂过着寓公生活。1926年4月12日宋小濂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76岁。政府明令优恤。宋之病不尽一日而卒。其同乡好友徐鼐霖，料理其后事。宋为官数十年，殁后家无一钱，可谓两袖清风。徐鼐霖以书告赙于东三省诸达官贵人。宋小濂起家寒素，饬躬廉峻，虽开藩持节，家无私产，卒之日，只书数楹，书画数簏，所居一庐耳。

宋小濂元配李氏生子名铸功，亦先亡，另有二女；续室王氏，续娶庄氏，皆先卒。再娶沈氏。宋小濂乏嗣。1924年侧室张氏生晚歌。宋小濂一生著有《抚东政略》，代表作有《边声》诗集，被誉为边塞诗人。当年王树楠悼诗有云：“公之伟烈，彰于国防，履虎之尾，而不敢伤，不兵而武，返我侵土。”张锡銮称其为作硬诗、写硬字、行硬事”的三硬先生，其业绩，特别是外交业绩，将垂名竹帛。

毕桂芳

陈志新

毕桂芳，字植忱（又作殖承），清同治四年（1865年）生于今北京市大兴县，汉厢蓝旗。早年入北京同文馆习俄文，后到俄国留学，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归国后，经过清廷大考“递保笔帖式知县加同知衔”。后充驻俄公使馆随员，驻俄都时与日驻俄公使本野交往较深，提倡中日亲善以和邦交。从俄国返国后历任直隶州知州，四品封典，并知府加三品衔。充北洋洋务局随办，东三省议约随员，驻浦盐办理交涉商务委员。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毕桂芳充任“驻扎海参崴办理商务交涉委员，保道员”。清宣统元年闰二月（1909年3月和4月间），改任海参崴交涉商务委员为总领事官，赏副都统衔。清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7月），毕桂芳被清廷擢升为科布多办事大臣，充查办库伦事件大臣，1912年5月17日，袁世凯任命毕桂芳为驻塔尔巴哈台参赞。

1913年1月12日，袁世凯与沙俄签订《库俄协定》，即《俄蒙协约》，消息传出后，黑龙江志士奔走呼号，组织义勇队、征蒙队。后因参议院不予通过，未能实现。同年6月25日，驻北京俄使库朋斯齐照会中国外交部，就齐齐哈尔等地方官员先后拘捕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俄国间谍等事，提出无理抗议，要求赔偿

"损失"，惩办有关人员。帝俄乃迁怒于黑龙江省都督宋小濂，借端寻衅，竟下哀的美敦书，限宋小濂、参谋长徐鼐霖、警务处长翟文选等24小时离开江省。后沙俄政府又以6月25日照会所提出的要求未能如愿，于7月6日，调兵3千自哈尔滨开赴齐齐哈尔附近的富拉尔基，进行武力威胁。扬言：中国政府不将宋小濂等撤职和赔偿损失，俄国政府将采取"自由行动"。当时袁世凯的卖国媚外的北京政府，表现非常无能，不敢据理力争。10日，北京政府允许赔款和惩办官吏，电令宋小濂以因"病"去职离开江省，急告外交部于10日答复俄使库朋斯齐，才使俄国军队停止前进。

袁世凯本拟以朱庆澜接任都督兼民政长职务，但齐齐哈尔地处边陲军事要地，又属俄国人势力范围，对于人事安排，考虑到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惟恐俄国横生技节，因而派俄国通毕桂芳来江省署理都督，由朱庆澜职参谋长。7月16日，北京政府以宋小濂"因病"离职，由毕桂芳暂行护理黑龙江省督都兼民政长。8月8日宋小濂被免职。

毕桂芳既到黑龙江省，又不敢接任，唯恐自家军队不能恪守命令，与帝俄军队发生冲突。但是毕桂芳不接任，宋小濂便走不了。刘德权为使此案快结束，就大胆承担保证江省军队不出事故的责任，毕桂芳始敢接任。毕接任后当即通知帝俄驻齐齐哈尔总领事，表示华方接受帝俄要求，宋小濂等已如期离开江省，此事始告一段落。

刘德权对江省政情颇为熟悉，凡地方军政人员向毕请训者，毕桂芳均令刘德权代为接洽，由是军政皆集于刘一人之手，毕在任内迄未发生事端，多亏刘德权的周旋，众人悦服。刘德权任参谋长，毕桂芳令刘兼领一路统领，刘固辞不就。

毕桂芳主政黑龙江省仅百余日，袁世凯竟借改都督为护军使之机，以毕桂芳为外交人员，不宜在边省担任军政职务，经宋小濂

保荐朱庆澜接替毕桂芳，出任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10月31日，袁世凯调毕桂芳离职赴京。1914年6月29日，任陆军中将的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省军务。

为办理中俄蒙议约事件，北京政府特任毕桂芳为会议外蒙事件全权专使，并加都统衔给二等嘉禾章。恰克图会议时，传令奖授中卿，充总统府高等顾问，现任蒙古厢黄旗都统。1914年8月30日，袁世凯北洋政府派赴恰克图出席中俄蒙三方会议的代表毕桂芳、陈箓一行20多人，于29日由京启程，于是日抵奉天，9月2日离满洲里赴恰克图，"会同俄国代表开中俄蒙会议于恰克图"，"毕桂芳为中俄蒙划界会议全权专使。毕不但深懂俄事，而于蒙古情形亦素有研究，今负此重任当不致有辱命之虞。"到1915年9月，始成立中俄蒙协约22条，其要旨为外蒙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互相承认外蒙自治与其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外蒙无权与各国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其权由中国行使。若经济之条约，则外蒙有自由与外订立之权。俄国在外蒙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在外蒙有监视自治官府权，中俄入蒙货物均不纳税，凡外蒙政治问题中国须与俄国商酌办理。至此历时4年多的蒙古"独立"的丑剧宣告结束。

毕桂芳于1916年2月初，衔命赴奉招待俄驻日大使密亲王，顺便晤面奉天上将军段芝贵会商要公。主要内容是，安定一切人心，将文武两署人员未叙官者迅速查明请奖；对于党匪（指革命党人）务令军警一律严防，惟须认真访缉不得妄拿无辜；北京政府鉴于滇事（指云南宣布独立护国讨袁）发生，事前并无一人举报，惩前毖后、宣令所属军民长官严加考核属吏以定黜陟，毋令有朝秦暮楚者滥竽其间，致误大事。

毕桂芳于2月15日接待俄密亲王，并由长春陪送到满洲里，于日内返奉谒段芝贵回京复命。

黑龙江省第1师师长兼军务帮办许兰州，是北洋军阀的爪

牙，又同张作霖交往甚密，常去奉天拜谒，被称为黑龙江省的张作霖。他对巡按使职位觊觎已久，鉴于朱庆澜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认为有机可乘，复经其参谋长李景林的怂恿，对朱横加威胁。5月3日，朱庆澜被调回北京。朱离开黑龙江时，袁世凯电问许兰洲何人来黑省相宜，许复电称仍请毕桂芳回黑龙江省，以资熟手。袁世凯于1916年5月4日任命毕桂芳署理黑龙江省督军兼巡按使，特加毕桂芳将军衔，总揽黑龙江省军、政全权，并照准派许兰洲为军务帮办。毕到任前，督署由许兰洲护理。5月19日毕桂芳到任。当毕桂芳出京赴任时，张作霖曾致电北京政府，电阻毕桂芳之行。理由系以许兰洲署理黑省将军极为妥当，毕桂芳无庸前往。

毕桂芳由京起程过奉并没停留，于18日由昂昂溪搭车到省城。毕氏此行为旧地重游，新旧僚属届时自齐齐哈尔往车站欢迎，军警侍立两旁，守卫森严。因是毕氏再次主政黑省，车站自无须特别点缀，张挂国旗，乐队亦殊整肃。军界由马、步兵各官长勒队欢迎，警界除署长随同厅长前往晋接外，各警士持枪按剑分派警卫。各界欢迎者，除黑河道尹系先期出省城随同返江外，军署各部旅司令部按照署、地方缙绅及其他各机关主任官长于9时先赴车站迎候，百余人之多。11时毕桂芳下车与各界脱帽为礼，轻车简从，旋即冒雨入城，当时因风雨交加与扈从未及细询。翌日接见军警绅商各界，当众演说，大谈来江省政见，嗣复同许帮办接谈，此次来江省担负重责，如何维持地方治安，拥护中央，以便同心协力设法进行，方不负来此任上，并说江省绅商民众人等忠厚善良，决无意外之幻想，稍有疑点略经劝慰，无不立解，盖民之质朴。当时许兰洲与众人均称赞鼓掌欢迎，以表和衷共济之忱。20日，毕桂芳曾携同众僚属乘汽车到军警各重要机关巡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毙命，帝制宣告覆

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毕桂芳电贺黎总统新任，电文称："……奉国务院鱼电，本月7日黎副总统依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特此电告等因。我公声望之系人心，奉电之余，群情爱戴，万众欢呼，桂芳等受国重任以维持治安为要义。"袁世凯在帝制宣告覆灭后，北洋政府召告各省军政，军事长官仍称督军，民政长官称省长。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毕桂芳为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31日，毕改任督军，张国淦任省长，旋免张国淦职，仍由毕桂芳兼署江省省长，并监督该省财司法事务，特加将军衔，授勋四位，给七狮军刀一把。"今以全文武之政柄，胥为一人所把持。"在此之前，许兰洲已派他的师参谋长李景林为督署参谋长，因此，毕桂芳到任后对此非常不满，但又毫无办法。

毕桂芳上任之后，以为江省邻近东蒙古，对于各蒙旗王公感情素孚，毫无猜忌，故能了解实情，际此收拾大局之时，自应群策群力，查照蒙旗实情及当时形势，详订筹蒙7条建议，电告中央：①联络蒙王公。蒙王公在民国前经常晋京拜见，现黎大总统初膺大任，亦应亟谋联络感情。总统应拍电安抚，申明中央政府虽有更迭，而对蒙旗王公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免生误会。毕桂芳还建议黎元洪迅派谙熟蒙地情况并为蒙族欢迎之大员，分赴内外蒙古各王公处勤加安慰，使蒙族人民了解大局，免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蒙巴匪之煽惑。②筹划生计。欧战连年，中原混战，金融窘迫，内外受害尤大，本来内外蒙工商业发展逊于内地，虽有蒙古实业公司及蒙旗生计等会，终以进展迟缓未见大的功效。此时更应详加筹措，免使蒙族流离失所。其办法自然以开辟土地活动，振兴金融，土特产的开发，保护商旅最为紧要。其他如变换田产、发展交通尤为当前迫切之举，亦应同时并图。③严拿土匪。近时不逞之徒居心破坏，彼辈尤其对内外蒙古更是注意之地。究其原因，仍多受奸徒鼓惑。所以禁绝蒙患，应首绝匪徒之入侵，断绝之法则不外严守关隘，派员侦缉不使漏网，匪徒闻之

必远遁。④添驻军。各蒙旗驻防军队平时尚能敷用，当此大局未定之时，倘不增加军队，非但蒙匪徒轻视，也无以振兴蒙族人民之士气。故各蒙旗险要之地亟应酌添军旅以资震慑，并需事前与各蒙王公协商某处应加，某处应减，某处主力，某处虚声。目的使各王公明了加添军队防匪非防蒙族人民，免生误会。⑤分设治区。蒙旗现虽划为特别行政区，但仅蒙人民日益接近，各蒙旗旧法既不足以治理，猝然改建行政区划，看来很难办到，然而两地人民既自相融洽，但统一设治终必实行，未实行之先，凡有商市地方亟应分区设治，目前既易治理 ，日后根本大计 自可顺序进行。⑥升补蒙缺。蒙旗民之前封汗到副都统等级爵位，前时或裁或并已参差不齐，但此项制度纯系蒙人习惯历史而来，当此奠定大局之初，将现在各缺择人提补，以资鼓舞而使其欢心。如此办理则使蒙人既存竞进之心，国家亦间得安抚之效。⑦厚劈租税。蒙旗出产虽以牛马羊为大宗，然贸易近年已蒸蒸日上。如建昌茧毛织物、酥酪皮张盐碱等类均能日益发展起来，蒙旗所有地租，外货如茶烟、布匹之运入，多因临时规定，而以所收入之税分劈给蒙人者，蒙人既不能独立自营生计，则上至王公贝勒，下至兵民每恃所劈租税以自给，此时蒙族人民生活已陷入窘迫境地，极应按例劈之应劈各租税以安其心。

蒙古地处中国北疆，当此大局纷扰未定之秋，谋之以安抚之道，实为不可缓之要害。

为对付土匪，8月2日，毕桂芳下令黑龙江省各县成立地方保卫团。8月4日，北洋政府又令毕兼任滨黑铁路督办。毕桂芳主政黑龙江省之始 ，尚能注意地方治安 ，他认为蒙巴匪反复无常，暂因力绌而纷纷北窜，难保不乘机卷土重来，为预防匪患旋拟定防匪要策八条：①饬令英顺、任国栋两旅长赴大赉县，在绰尔河地方加派军队驻扎要隘防堵。②照会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王公一律严加防范以备不虞。③着令各王公迅速招降被裹胁之匪众以

分化瓦解敌人。④请各王公速练警团以图自保消灭匪乱于萌芽。⑤添设江省征蒙匪司令以便有所统一。⑥责成英、任两旅长为剿匪之专任，严定功过以资鼓励。⑦令各县知事非奉命不准擅离职守，并请奉、吉两省调拨陆军协同剿灭土匪。

毕桂芳以江军毗邻俄蒙，蒙地方辽阔，现有军队不过一师实不敷分布，呈请北京政府添练军队。然而北洋军阀政府政出多门，段祺瑞认为毕之所请自系实在情形，惟眼下江省军队方议裁遣，碍难再准该省添募。该省既有添练军队以严固国防之必要，应即将他省多余军队拨驻该省，实为两便，有关此举正在筹议之中。而北洋政府陆军部以江省边气未靖，允准速编混成一旅之师以固边陲。毕桂芳接令即表赞同，立刻召开军事会议，筹谋预算一旅军费，常年约在50万以上，人民负担未免加重，特电请中央拨款协济，江省财力实难办到，北京复电仍江省自筹。毕之添练军队只能纸上谈兵。10月4日，毕桂芳等13省区督军省长致电黎元洪总统要求北洋政府"提议于国会，照旧定礼教为国教，保存郡县学官及学田、祭田，设奉祭生，行跪拜礼，编入宪法，永不许再议"。10月8日，毕桂芳收编了逃窜到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布扎布残余匪帮。31日，因俄国人在富拉尔基擅自修筑炮台多座，是日，毕桂芳电请外交部向驻京俄使交涉。同年10月9日授勋四位。

1916年10月8日，蒙匪首巴布扎布进攻林西县，被击毙于林西城下的东营盘，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其残部如鸟兽散。

毕桂芳以巴布扎布虽死而余党犹散四方，为保蒙地治安视边防冬防最为紧要，为预防蒙巴匪计，凡景星、大赉、塔子城、索伦山各处皆驻有重兵以资震慑，同时扩充地方警察。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各旗虽设有警察，仍照会各旗极力添组以谋扩充而敷分布；招募蒙兵。防剿蒙巴匪军队，中央已电准添组一旅分驻各蒙地要隘，其所募兵士不可蒙汉一律编入；筹设蒙保卫

团。保卫团有保卫地方之责，而各蒙旗均未实行设立，故偶有匪患人民易遭蹂躏，已照会各蒙旗急行设立以图保卫。毕桂芳还于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扎赉特各旗添招警察；添编一混成旅军队；建立由蒙族人民组成的独立团，专驻蒙要隘，以便剿匪用作向导；应由中央通令各蒙旗速设立保卫团，以保地方治安，维护蒙地方秩序，致电黎元洪大总统，为保蒙四策。

黑龙江省在清王朝统治时期，财政上受中央政府救济。民国成立后，中央协款停止，嗣经核减，支出虽未至无米为炊左右支绌，终不敷用，毕桂芳急电总统府及国务院。电称，黑军警饷项、行政经费及教育经费均已三月未发，措筹无力，恳请拨款救济。然而北京中央政府财政自顾不暇，哪有力量顾及地方？毕桂芳只好向中央请免黑龙江省各项杂捐，并列单报请大总统，属于国家税应行停缓及酌减。各项捐税有：白面粉条税，加征酒税，猪羊牛印税，柳条税，烧饼税，缸货税，木植百货税，以上各税唯豆饼税减为每百斤征收大洋5分，余均呈请停缓。属于地方税捐应行停缓者有：巴彦县麻捐、店捐，庆县货床捐，爱辉县黑河镇烟筒捐，汤原县炭窑捐、入山营业警费、商业执照费，木兰县河绠捐，大赉县税契加捐、床捐……。以上各项均经呈请停缓。

袁世凯毙命后，由黎元洪续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上台后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段与总统黎元洪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导致府院之争。毕桂芳赶紧表白心迹。毕桂芳奉段祺瑞通电告诫后，遵即电复："昨奉艳电悚愧莫名，桂芳愚拙向不党同伐异，兹承明教，敢不怀遵，惟局势艰危正如风雨飘摇。而一般阴谋者竟不惜倒行逆施，破坏国家，心所谓危，有时遂不忍不言。我公热诚救国，万流宗仰，孰是孰非，当在洞鉴，耿之愚衷，尚乞垂察为叩。"

1917年春，张作霖与冯德麟交恶，赵尔巽卿段祺瑞命赴奉天进行调停，并请吉督孟恩远、江督毕桂芳派代表参加。3月1日

于奉天召开以赵尔巽为首的“调人大会”，调解张作霖、冯德麟之间的矛盾。孟恩远、毕桂芳也派代表参加，然均未奏效。5月19日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督军团向总统黎元洪呈文，要挟黎下令解散国会。东北三省督军张作霖、孟恩远、毕桂芳均列名其中。

毕桂芳原是旗人，后来改为直隶籍，又做过外交官，素讲究外表，对督署参谋长李景林这个武人总觉得不顺眼，李景林常对人说：“为什么毕督军对我不好呢？”后有人告诉他，“你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你以后坐或站要把两脚并紧，不可张开。”后来李景林对人又说：“我把两脚都并上了，怎么毕督军还看不上我呢？”1917年春天，毕桂芳夫人寿诞快到的时候，李景林来见毕桂芳，适许兰洲也在场。李景林说：“今年督军夫人寿日，许帮办打算给热闹热闹。”一面说着，一面用脚踢许，许兰洲马上会意地说：“我们大家操持此事吧，督军不必管了。”毕桂芳谦让了一番，并没有拒绝。

毕桂芳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他不是军人，而是外交官出身，他的诨名叫“毕不管”，是个海阔天空的胡涂角色。他官运亨通，一步步爬到黑龙江省省长的地位。他到底胡涂到什么程度呢？1917年3月14日中德绝交消息传到国防前线的黑龙江省，人心浮动。刚好这天是毕桂芳夫人的华诞，一厅长先期通知各县县长、各金矿局局长、本城各机关首长为毕夫人称觞祝嘏，第1旅旅长巴英额、骑兵第4旅旅长英顺携带大宗礼品进省。省会警察厅传谕全城商民一致悬挂彩旗以志庆祝。

毕夫人落落大方，传令召妓女侑酒，永安里香巢为之一空。一妓唱《碰碑》唱到“宝雕弓射不着空中飞鸟”，另一妓唱《刺巴杰》“实指望到山东母子相见”的一段，督帅、夫人都摆手说：“你们唱错了。我对皮簧都有研究，你们常到这儿来，让我教教你们。”女伶彩排时夫人亲自点戏，命傅宝兰演《新安驿》，这出戏带洞房一节，因剧情猥亵，内务部下令禁演，可是督帅夫

人传下话来："快快演下去吧，这是全剧最精彩的一段。"正戏之外还附演了一出"升官图"的趣戏。撤职来省听候查办的泰来县县长张毓华，登门贺夫人的寿，行着三跪九叩的大礼，礼毕长跪不起。夫人笑着问："你为什么不起来呀？"张说："本县绅士诬告我，请太太替我作主。"毕桂芳一面笑一面用手来搀他："这点点小事用不着太太作主，我就代替她作主吧，好好儿回任当差，快快请起。"

好戏演完不久，接下去便是许兰州"夺帅印"的武戏登场。毕桂芳在许兰洲的胁迫下卷入黎、段府院之争的政潮。许兰洲赴徐州参加第4次督军团会议甫毕返省后，于5月31日同毕桂芳联合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成命，否则江省宣布独立。在电文中称："……日前各省区督军、都统公同请求改正宪法，原出于爱国热忱，免蹈暴民专制之祸。乃我大总统对于修正之请求并无何种表示，忽于23日奉令免段总理职。同时又有特派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副司令之令，一要国会所议之宪法并无商榷之余地。……视各省若寇仇，令出非常，全国震惊。中央既无维持之意，各省区为国家计为地方计不能不自行设法以保治安。警电飞传，夜以继日，汹汹状态已若涌潮，夫国会之不良更仆难数。我大总统以法制为宗旨，非法举动谅为群小阴谋。近察各省情形非有正常之解决，恐统一规模将丧失我大总统在任之日。我大总统又何必曲庇群小定陷国家于危亡乎！独运神谋补救未晚。应请收回违法之命令，另定制宪之本根，以快群情而弥大患。不则国气相应，江省亦唯有取各省自保治安之法一致，近有军民愤激，众议咸同，谨为我大总统进最后之忠告，伏唯鉴察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等语，特此奉闻，敬祈明教。"

6月1日，毕桂芳又在许兰洲的胁迫下宣布江省独立。

由于江省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毕桂芳、许兰洲前时因蒙匪猖獗所发出的痛剿匪患的命令，也因此次独立而通令暂缓出剿。

但蒙匪尚不知道消息，仍请求招抚。毕桂芳、许兰洲准予投诚，以防日后该匪屡聚屡散，为害百姓。并将投诚的择其精壮持有枪械者三千余人编为六营，以该投诚者首领色得楞巴拉等为统领，暂归陆军步二旅任国栋暂行兼管，其余老弱者另行设法安抚。

许兰洲见毕桂芳软弱好欺，便欲乘北京政府混乱之机，唆使黑龙江省英顺、巴英额两个旅长赶走毕桂芳，并许诺事成之后提升二人分别任师长、和镇守使，以此来换取英顺、巴英额的支持，取毕桂芳而代之。于是，在许兰洲的导演下，英顺、巴英额见诸于行动，同许兰洲的亲信任国栋、道尹张寿增及其他地方官员多人，到督军署请毕桂芳让位于许兰洲，演出了一场逼宫戏。毕桂芳孤立无援，对如此突如其来的武力威胁没有丝毫防备，所以毕来不及进行抵抗，对英、巴等人的劝让毕桂芳当时没有做出决定，待英顺、巴英额等人走后，毕找来他的参谋长刘德权，商议此事如何对付。刘问毕桂芳："积华(英顺的号)态度怎样？"毕回答说："就是他领头来向我说的。"刘说："若是如此，你就让吧。"毕对刘说："你再去摸摸底。"刘无奈，找到许兰洲问是怎么回事（刘与许兰洲关系密切）。许是一个颟顸人，他说不出什么来，只说他们（指英、巴）非让我干不可，我没有办法。刘回来见毕，谓此事无可挽回，不如休息为妙。但毕桂芳还是不甘心就此轻而易举地让位，他还是找许兰洲商量，愿以省长相让而自留督军一席。许兰洲的目的本在取得督军，经过一再商谈，许兰洲已认可以师长、军务帮办兼省长，可转眼间又悟出这是毕桂芳的缓兵之计，并且得知毕已电召英顺、巴英额两旅入省自卫，许兰洲便又取消自己的诺言，限毕桂芳于24小时内辞职出境。

许兰洲分别以师长镇守使地位许予英顺和巴英额，以交换其对自己的拥护。6月上旬，北京政府接到黑龙江省内部发生政争的消息，便使用调虎离山之计，电召许兰洲到北京有所商洽。许回

电说，黑龙江省有两个图谋不轨的宗社党人，就是毕桂芳和巴英额，我要镇压宗社党，不能抽身到北京去。许兰洲认为“夺帅印”的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6月13日，毕桂芳在许兰洲的重大压力下召集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辞去省长兼督军职，参加会议的人自然不会有不同的意见。毕桂芳发表寒电(14日)通告自愿下野，并荐许兰洲自代。毕在给黑龙江省各道尹、县知事、设治局、矿务局等的电文中称：“桂芳不才再临江土一载以来，举凡军政民治，自问无丝毫之补救，每一念及午夜疚心，固由时局艰危，实亦德才薄弱，为国家计为地方计，自应退避以让贤能。许帮办英明果断洞彻边情，实能宏济艰难，为国柱石，征之军民爱戴之意既诚且深，谨将督军省长一切责任完全于本月16日均请许帮办担负，桂芳既于是日交卸，特此奉闻。”这样一位挨了打还陪笑脸的督军，把许的一团怒火化作了一腔喜气。与此同时许兰洲也发出通电，称：“毕督军辞职离省，所有本省军务政事悉以相委……时艰孔亟，旁贷无从不得不克承其乏，尚望诸公协力赞襄，以匡时艰。……各事均常仍率旧章，毫无更动，万勿诿谢以期共济，特此电告。”观之二电，新旧交替之情形，一不得不已，一为自命，可概见一斑。许兰洲对于督军兼省长，早有取代之意，兹乘中央扰乱只有强权之势，遂演张勋解散国会手段，毕督军辞职自承其后，业于16日双方交代清楚。许兰洲于15日接任督军，催促毕桂芳于16日离开江省。毕氏一直挨到18日才动身。许兰洲率全城文武官员各界头面人物400余人到齐齐哈尔车站。许氏在讲话中称：“毕督军虚怀若谷，卸职高蹈，采及轻[illegible]，挽留乏术、辞职未能，只得暂称其乏。”许给毕桂芳摘掉了“宗社党的帽子”而篡夺督军之权就变成“揖让”了。

许兰洲在夺印如愿以偿之后，却违背前言，并未任命英顺、巴英额为师长和镇守使，而是提升他的部下任国栋为师长。英、巴对此不堪容忍，乃起兵反抗许兰洲，于6月22日通电与许兰洲

脱离关系。他们又派人赶到哈尔滨把毕桂芳追回来，让他在呼兰立足，继续主持督军兼省长的“ 公务 ”。毕桂芳回北京之意已决，只允诺英、巴二人代其发一通电，说明他是受许兰洲胁迫而离开江省的。这就是号电出笼的经过。通电痛斥那个“精明果敢、洞彻边情、为国柱石”的许兰洲，通电称：“窃江省自去年5月师长许兰洲等以武力迫胁将军朱庆澜去后，大局岌岌可危，乃呈请大总统任命毕桂芳来江省维持大局。桂芳不避危险衔命莅江，猥以庸愚兼荷军巡重任以冀尊重中央 ，维持地方顾全大局 。到江以来，开布公诚与该师长等以至诚相接，意有所感动，以消其野心，不意该师长愚鲁过甚，辄为奸心煽惑，累起暗潮。日前竟乘此次政变遂肆意狡谋，复以迫胁朱庆澜者迫胁桂芳，屡遣重要人员来署警告，强迫退让，并分派军队监视邮电各局，凡中央及各省函电均被扣留，俾不得通消息，桂芳以大局为重，恐与争持不免激变致起外交， 则有大局糜烂之虞， 遂于本月16日托故让贤，暂将黑龙江省督军及省长印信移交该师长接管，听候中央命令。19日行抵哈尔滨，闻陆军第4旅旅长英顺、第1旅旅长巴英额及各团长佐校等，均抱不平，汹汹欲动，虽经再三劝阻，终恐激生他变，特电设法维持俾靖地方而安大局。其余回京面陈。临电悚惶不胜近切，待命之至，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毕桂芳叩号。”英顺、巴英额代毕通电的同时，还要求中央调许兰洲出省，仍命毕桂芳回任。

毕桂芳被逐返京过津时，于6月24日谒见段祺瑞和倪嗣冲，何为不得而知。毕桂芳于24日晚到京，25日午后拜谒总统，面陈许兰洲在黑省之跋扈情形，并请元首对黑省军民政务必须特别注意，以免发生意外变动。黎元洪对毕桂芳信极优渥 。6月26日，毕桂芳再次进公府拜见大总统，力陈详情，总统有意挽留回任，毕心有余悸不敢应允，当面力辞。黎元洪允之。北京政府以毕既不愿回任，拟聘为公府边事高等顾问，俟国会成立后正式任命为驻库

伦办事大员。

许兰洲针对毕桂芳的通电于6月27日又发通电揭露毕桂芳、英顺、巴英额都是旗籍，有"宗社党"之嫌疑。说："此次毕督军离江，本有政治关系，外间宣布，仅系表面交替理由。今英、巴叛变，用敢陈共始终，请将督、长从速任命，俾得专事征讨。"这个通电又把"宗社党"的帽子给毕桂芳戴上。

一时间黑龙江省呈现出两种势力对峙的混乱局面。拥护毕桂芳的英、巴两旅长，占领呼兰和海伦一线，但并未向省城进攻，宣称："静候中央解决。"许兰洲这边也没有力量去出击，毕桂芳于6月29日回到北京，想求助于北京政府，此时北洋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没有力量干预地方事情。

7月上旬，张作霖乘黑龙江局势混乱之机，运用乱中夺权的手段，对交恶双方进行拉拢，派孙烈臣北上游说。孙先到呼兰与英、巴晤面，英、巴则表示"一切唯张之命是从"。接着孙又到齐齐哈尔面见许兰洲，许与张作霖素有勾结，更表示"唯两帅之命是从"。7月26日，北京政府接受张作霖的保荐，任命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出任黑龙江省督军。

毕桂芳回到北京后出任总统府的高等军事顾问。1918年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1927年张作霖组织北京军政府，毕桂芳出任顾维钧、潘复内阁的赈务督办。以后情况不详。

朱庆澜

陈志新

朱庆澜，字子桥(一字子樵)，1874年3月11日（清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生于今山东省历城县。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镇渔后村。其父朱绵堂字星桥，少读书，太平天国时期游幕于山东，历聘各郡县主刑名，所至宽厚有仁声。母董氏山东历城县人。朱庆澜5岁丧父，恭承慈训，茹苦勤读。10岁时嫡母潘氏弃养，越5年又遭生母董氏之丧。“茕茕在疚。哀伤尽礼，家贫弃读，出为济南河工委员。按察使兼河工督办某，与语奇之。某调奉天府尹，遂应调出关”，为朱庆澜在东北扬历二十余春秋发轫之始。

朱庆澜继调奉天，先署东边道发审员，赛马集义州天桥厂、锦县各行政官。始徭典史，历擢于同知，改保道员，均兼领军职，任统领标统。朱庆澜在任上抚民宽而治军严，屡亲剿灭胡匪，皆捷。朱庆澜所至搏击豪强，肃清匪盗，不辞劳怨，为长官所器重。在锦州府府经厅任内统带绥锦营。升任三营统领，驻防锦州。是朱庆澜统兵之始。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火燃遍全国，朱庆澜在锦州创行征兵，剿杀义和团团众，因功任五营统领，驻防田庄台一带。旋辞文职，兼统南路巡防队。“尝于牛庄夜捕盗，误死美国领事，上官谓可诿曹属，公不允，慨以自承，因革职留任，闻者壮之。”旋以剿蒙匪功开复，以道员候补任前路巡防营

统领。1906年2月兼奉天乡镇巡警局总办，东三省营务处会办。部下剿匪误杀日兵无可屈挠 。后调驻盛京 。在盛京八营统领任内，捕获窝盗虐民之宗室洪其文，主斩之，为御史所弹劾，奉旨免议，声震朝野。时朝议方练新军，朱氏自请任军职。1907年8月24日，朱庆澜所部改编为陆军步队第1标，任标统。为奉天巡防营改为陆军之始。朱庆澜移防锦州，锐意训兵，所部精整为清军之冠。同年入将校研究所。1908年1月充督练公所参议。朱庆澜独立第一标驻扎锦州将及一年，铮铮有名，兹因蜀督赵尔巽借重需才，电调入蜀，并与徐世昌商允，许带文武委员约10人。

1909年4月，朱庆澜被调入川，任陆军第33混成协协统。简授陆军第17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料理军务。1911年5月，清廷"皇族内阁"悍然宣布" 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实质是借"国有"名义把铁路权利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不但引起广大人民群众极大愤慨，也直接侵犯了许多绅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权益，因此四川迅速掀起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其中人民反抗尤烈，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实行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示抗议。清吏赵尔丰主格杀勿论。朱庆澜一方面竭力劝阻，另一方面率所部第17镇官兵奉命严密注视时局的演变。朱庆澜忠于职守，8月25日在给清廷军谘府、陆军部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成都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的情况，称："其分发传单内载：'政府抢路劫权，自明日起，四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要求收回成命等语 。'一时人心惶惶 ，至五钟，城内铺户关闭过半，巡警巡防到处弹压 ，本镇因多数军队 ，明游市井，益滋惶惑，当即密令驻省每营派官长一员，带兵六名，便服分巡交通街巷，以防意外。""今晨实行全罢，冀达要求督宪代奏收回成命之目的。"朱庆澜还向上司报告说 ："教堂 、领事署、邮政电政局、大清银行，分外注意"，"刻无暴动情状"，"本镇目兵，不干路事，均各相安"。朱庆澜在8月26日的电报

中报告说："罢市米油铺仍开，各户均贴先皇帝神位，旁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二语。""本镇于昨晚，遵奉督宪札谕，明装与巡防划区巡视。风闻附郭之温江、新都各县，先后罢市，均未暴动。"惟有对造谣生事之人"恪遵督谕严密查拿。"朱庆澜在"川人护路之役，周旋其间，免于难者甚众"。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告捷，全国各省纷纷响应，重庆于11月22日宣告独立。11月29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以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推朱庆澜为副都督，尹昌衡被推为都督府军政部长。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诸事未集，加之军政府许诺发放的三个月恩饷未能如数发给，在军队里引起很大的不满。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等在成都东校场阅兵，巡防队遂因索饷发生哗变，乱兵向检阅台开枪，蒲殿俊、朱庆澜等在卫队护卫下逃匿，乱兵到处抢劫焚掠，全城一片混乱。其时尹昌衡于乱军中驰赴凤凰山军营，召集65标新军入城剿平叛兵。乱后，第17镇的军官和士绅们集合，以蒲殿俊、朱庆澜既去，军政无人统摄，尹戡乱有功，罗纶为同志会所属望，遂举为正、副都督。朱庆澜则离川北行，"说服马段诸将领翊赞共和"。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朱庆澜为总统府军事顾问，潜心边事。"尝谓东北一隅，足致我国于富强，未尝须臾忘怀也。"1913年7月6日，袁世凯屈服于沙皇的武力威胁，以宋小濂"因病"离职，本拟朱庆澜接任江省督都兼民政长，但考虑到同俄国人的关系，唯恐俄国横生枝节，因而派俄国通毕桂芳去黑龙江省署理督都兼民政长。8月25日，由朱庆澜职都督府参谋长。毕桂芳第1次主政江省仅百余日，袁世凯借改都督为护军使之机以毕桂芳为外交人员，不宜在边省担任军政要职为由免去其本兼各职。经宋小濂保荐，袁世凯于1913年11月30日命令朱庆澜接替毕桂芳出任黑龙江省护军使兼民政长，朱庆澜遂得经边之愿。

1914年5月，朱庆澜下令把驻省城的第1路巡防队步3营右哨压缩改编，因此引起该部哗变。变兵包围军署，向内鸣枪，时许兰洲正在军署与副官接洽公务，闻枪声奔赴出事地点，佯言："凡反对护军使的随我来，大家一起干！"旋把变兵引走，解了军署之围。尔后许兰洲率巡防队追剿弹压，朱庆澜在此兵变中几乎丧生。袁世凯闻讯后，一方面让朱庆澜召开全省军事会议处理此案，另一方面令朱庆澜将黑省军队整编。同年6月29日，袁世凯命令裁撤各省督军，设上将军或置将军行署。特任陆军中将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省军务，兼巡按使。7月1日，黑龙江省陆军、防军合编为黑龙江陆军第1师与骑兵第1旅，师长许兰洲，旅长英顺，许兰洲驻防省城。8月22日，朱庆澜与东三省中国银行行长潘鸿宾签订由中国银行发行的小洋券换回黑龙江官帖的合同。

朱庆澜在黑龙江省军政长官任上，励精图治。首先修建国防工事于边界，收回松花江航权，商民名其初航之船曰"庆澜"号以志焉。官银号年例纳二十万金，悉不受，移办蒙文学校，设女子教养院，收养无依女童。斯时黑龙江省百废俱兴，四境安谧，政府迭颁勋位、勋章。俄皇东巡，觇边自海参崴，怀畏而景慕之，亦以宝星为赠。

1915年1月29日，黑龙江省巡按使公署函称：发现《警告国人书》、《赵秉钧一席话》、《邱丕振遗书》等，诬称"乱党"图书。同年2月18日，朱庆澜呈报安抚鄂伦春人办法：令库马尔、毕拉尔两路鄂伦春人选择丰腴荒地耕种，由省拨车犁、牛马，拨付卢布二千余，另拨毕拉尔路牛四头，代牧畜筹办处"分养"。

朱庆澜久为上峰所器重，袁世凯在召见张作霖入京亲见时，尤极口称赞朱庆澜"军政民事办理完善"。故朱庆澜"入觐初莅京时，即荷总统赐宴，并另有军刀一柄，千里眼一筒"，朱庆澜

荣膺殊赐，可见大总统之倚重将军矣！朱庆澜此次入觐而陈黑省情况，“其所请求多蒙大总统允准，如采金局已准由将军主持，采得金砂后方归该局收买。对于黑省财政之建设，批准发行钞票一千万元”。以此二项，足见袁世凯对朱庆澜之信任。

黑龙江省土匪猖獗，为患无穷，朱庆澜上任后对此问题也深感棘手，曾多次同政府电商，最后议定如下：①筹款八万元，由财政部黑龙江各担任一半；②购买农舍四百间，农具四千副，发给降匪使用；③在黑省设立专门机关筹办此事；④如尚有余款，则设立一大工厂，俾使匪各能自食其力，变为安分良民。另外朱庆澜在致北京政府招匪固边电报中规定，如有自携枪炮马匹投诚入伍者，月饷倍于定额，庶可弭盗贼抢劫之风，而私售枪械之事亦自少矣。

袁世凯不以当上临时大总统直至世袭总统为满足，既而想当皇帝，又要假借民意标榜民主，于是各种劝进组织、筹安会纷纷出笼；劝进表、推戴书雪片般飞向北京。1915年9月，段芝贵、孟恩远、朱庆澜联合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等11省将军，劝告袁世凯“速正大位”。10月4日，孟恩远与王揖唐、段芝贵、朱庆澜分别于是日、5日、10日致电统率办事处，盗用三省人民的名义，表示拥护帝制，敦促袁世凯早登九五之尊。朱庆澜还电告代行立法院黑龙江省投票解决国体。电文称：“江省国民代表胡殿试二十二人依法投票表决国体，一致赞成君宪，即日该代表等以国民公意恭戴今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会场秩序肃穆踊跃欢呼。各界参观者无不额手称庆，除该代表等另电委托贵院为总代表及推戴书另寄外，谨此奉闻。”11月10日至12日，段芝贵、朱庆澜、孟恩远等又连电敦促袁世凯早行帝制。朱庆澜在11月11日给袁的电文中称：“皇帝陛下：圣鉴，唯政事堂阳电内开。‘奉上命迭据各省来电，有称帝称臣字样，以予否德无补国家，推戴之来，

何堪当此，行将以区区素怀，沥述于国民，且予从前清同僚，多属此肩，何敢受臣下之称；且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总数尚未报齐，改变国体亦未实行，万勿称帝称臣，使予愈抱不安也！’等因何达等因，仰见圣衷，谦抑必以民意为从违，莫名钦佩。现据各省通电自10月29日至11月8日，各省及特别行政区域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者，已有二十处之多，莫不全体一致赞成君宪，推戴之诚，悉出国民公意也！足见万众一心，输诚效顺，风发泉涌不可遏止！伏愿陛下念国步之艰难，鉴舆情之恳挚，早正大位，以巩邦基，幸勿再事谦冲致违众望。凡属臣民毋任激切屏营，翘企待命之至。再江省地方安谧，自国体决定之后，人心益见宁贴，庆澜愿担任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之责，堪慰圣廑。镇安右将军兼署黑龙江巡按使朱庆澜谨奏。11月11日，朱庆澜在电报中对袁世凯称帝拥护之诚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年授二等文虎章。

1915年11月29日，盘据在游格吉庙的巴布扎布股匪，被察哈尔多伦镇守使率兵击溃。是日库边办事大臣陈箓电告朱庆澜，巴匪已向洮南、海拉尔一带逃窜。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18日，黑龙江巡按使署将《改订货牙税章程》抄省内各地，被迫宣布免除押款，取消货牙公司名目。23日，袁世凯进行大肆封赏、授勋，朱庆澜被封为一等子爵。*袁世凯帝制自为，国人上下反对。蔡锷潜出京，转道日本赴云南，于12月25日联合西南诸将领，举义旗通电讨袁护国，全国各地纷起响应。朱庆澜于27日却发出拥护新皇帝之电报，称："……窃有日晚六钟后，云南唐继尧、任可澄通电请取消帝制，措词悖谬叛迹昭然，殊甚发指。查选举国民代表决定国体之时，该省国民一致赞成君宪，兹恭戴我皇帝为中华君主，舆论翕然。即该继尧可澄等亦累电劝进，请早正大位以奠国基。今国体已定，天命有归，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方深庆幸，乃该逆等竟敢莠言乱政，淆惑听闻，置国家

安危于不顾，其居心实为叵测，唯江省僻处边陲，消息迟缓，一面飞电贵州、四川切实探询滇省究竟是何状况，并即时飞电该逆，严词诘责，倘其立时悔悟，俯首请罪，情有可原，倘仍执迷则是甘居祸首，为国家之公敌，惟有仰恳我皇帝明降谕旨宣布该逆罪状，爰整六师声罪致讨，以昭炯戒，臣谨当整饬戎行，秣砺以待。昨已飞电，联奉吉一体严密防范。主遵有日处电，密电军警加意严防不敢稍有疏懈，现在地方安静，请释圣廑。臣朱庆澜谨奏宥印，12月27日。”

西南护国军兴，宣布独立各省与日俱增，袁世凯对北洋军的调动已感不灵。而朱庆澜却在1916年1月9日，率黑龙江省文武官员29人致电政事堂，电称：“政事堂钧鉴：堂密，请代奏皇帝陛下，圣鉴。窃闻立国之道在于应天而顺民。天意难知是征之民意，故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亘古以来未有得民心而不昌，失民心而不亡者也。今国体解决两月于兹矣！而登极之诏未颁，大典犹筹而未备，是使天下民心惶然回惑妄肆猜疑，因之一二肇乱之徒遂得乘机造为逆说以图煽乱，滇事之发生实未必不由于此也。上年12月29日，江省国民代表电致代行立法院请皇帝伐罪救民速张天讨，并早登大位以安人心。请词恳迫出于至诚。近来各省国民亦相继纷纷吁请，可见民心效顺，皆延颈企踵想望太平，伏冀我皇帝陛下，富天命之有归，鉴舆情之推戴，立颁明诏正位九重，庶几薄海，民心赖以维系，此国家根本大计，万难置为缓图者也！且夫民心者难得而易失也。当解决国体之日，万众欢呼，全国一致热诚勃发，遐迩风从，以为共和之痛苦既除，斯君宪之幸福立，致今乃迟之，又久而朝官寂然，在朝廷审慎迟迟，原不妨出以郑重，然箕风毕雨何足以仰测高深，以为朝廷不能俯鉴其愚诚，辄不免惶恐忧疑戚戚，然不可以终日。民情可畏古训昭然。臣恭领封圻何敢危言悚听，诚见民心不可过拂，大位不可久虚，爰率属披沥上陈，伏乞皇帝深维救民救

国之初衷，即时明降谕旨，宣示登极之期以慰臣民之望。臣等不胜瞻天仰日激切屏营之至。查江省防范严密，乱党无隙可乘。臣等对于辖境治安，凡权力所及之处均可担负完全责任。无论何时绝不至有乱事发生，请释圣虑，理合驰电以谨奏，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兼署巡按使臣朱庆澜……。”袁世凯图谋帝制，朱庆澜拥护袁世凯称帝极为活跃，人称他是袁世凯的亲信。

朱庆澜为安边起见，提出抚蒙策略，奏请在索伦山设蒙务宣抚局，奏中央批准，经朱将军奏任蒙人乌尔图那苏图为宣抚专员前往该处设局。查索伦山距省五百六十里，北界济沁河，东倚兴安岭，南接洮南，西邻呼伦贝尔，且与扎赉特札萨克图、图什叶图、乌尔穆各蒙旗紧相毗连，幅员辽阔，面积一万四千四百平方里，土地膏腴，林矿尤富，况该地紧倚呼伦贝尔反侧，设法经营以杜后患，朱庆澜特拟抚蒙八策详请中央核夺，其大要如下：①取抚蒙人仍照前蒙旗官都按季给职；②出放蒙荒拨给蒙人生计地；③准商民开采林矿；④添练陆军使蒙人充之；⑤设立蒙旗学校；⑥搜剿索伦山华蒙胡匪；⑦经业俾尔河渔业；⑧该处定为本省军民合作之特别区域。与此同时，朱庆澜清丈荒地，拟定移垦计划，迁移鲁省人民来江省垦辟，与鲁省巡按使酌商办理。1916年11月，朱庆澜批准中东铁路公司派员带兵分赴黑龙江省各处林场勘界绘图。3月，朱庆澜出巡。朱氏素日讲军人资格，故其冬日不着皮裘，行不乘车。近因边事紧要，防务重大，带二三人乘马亲赴各县巡阅驻军防务。

袁世凯帝制自为，激起各省独立风潮，黑省人员亦大有跃跃欲试之势。朱子桥颇持稳健态度，各省劝告朱氏之亟电，阅过一笑置之，唯对保卫地方极为注意。朱庆澜以为黑省地处边陲盗贼横生，尤恐党人潜入煽惑，土匪谋为不轨，若不严加防范，殊与治安前途有碍。于是特下戒严令，饬军警每子夜分班巡查以防不测。

黑龙江省以许兰洲为首的地方军阀势力同地方士绅势力勾结起来，借假朱庆澜迟迟不宣布黑龙江省独立为由，并历数金融之恐慌，商业之萧条，散发传单，绅商代表面见许兰洲，要朱庆澜调走，原因就是行政方面的事情，许以电话告之于朱。士绅代表再次开会，许兰洲派兵保护。会议电达中央，议决电请中央将朱庆澜调回，公推许兰洲接将军事。朱庆澜为保护地方治安起见，先布告安抚民心，并士绅之电已发出，遂俯顺人情力保和平辞职之电发出，态度如常，很为镇静。许兰洲被绅民推为将军，并颁布属令，朱庆澜来往电报一律扣发。朱庆澜给中央的辞电是在哈尔滨发出的，其电文称："现在江省中有二将军，形势混沌，人民惶恐，达于极点，银洋价暴涨，百物奇昂，官银号及广信公司均已停止兑现。"许兰洲排挤朱庆澜，以达到全权掌握黑龙江省之目的，素日官兵对朱庆澜就怀不满。1916年5月，又有去北京控告朱庆澜部下被服厂厂长潘桂亭帐目不清问题，朱庆澜竟不能晏晏安于位，愤然去职之迫不得已。而俄驻黑龙江省领事与朱庆澜感情颇深，不愿朱氏离任，竭力挽留，且加庇护。5月3日，袁世凯令朱庆澜来京，特任毕桂芳署理黑龙江省军务兼巡按使，毕未到任以前，许兰洲暂行护理，许兰洲著帮办黑龙江军务。朱庆澜接令挂冠赴京。临行旧书故剑，两袖清风，江人系之，及今益深。

朱庆澜由黑省来京后，三次谒见袁世凯，袁以朱氏治黑三载，对于内政外交办理尚称适宜，拟任朱为将军府参军。彼时俄驻黑领事曾对人言："中国好官，只有朱、王（王顺存系黑省警务处兼清乡督办），可惜中国政府不能用也！"袁世凯帝制覆灭，袁死黎继，黎元洪对朱庆澜很是器重，时粤局动荡，7月6日，黎元洪发布总统令，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省长。8月1日起身赴任。朱庆澜于8月23日抵达广东后，先疏通龙济光派首脑，然后只身进羊城，面见龙济光，告以各方情况，晓以利害，说服了龙

济光，愿即息兵罢战，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并率所部进驻海南岛，就任琼崖矿务督办，省内战事遂告平定。10月，朱庆澜授勋三位，加卓威将军备位于将军府。

朱庆澜长粤省后，一如在黑龙江省时，澄清吏治，严禁赌博，一扫贪污弊端，整理币制，创建朱九江祠，为士林矜式。朱庆澜任职期间，经常轻装简从，往视广州市内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对成绩卓著者予以奖励，有困难者则捐款为之补助，促其发展。省境逐渐安居乐业，这些均为粤人称道。

1917年6月11日，朱庆澜派员赴上海恭迎孙中山先生返广州。时北京府院之争政潮发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各省纷纷独立。粤省连日开军事会议，陈炳焜、李烈钧、陈炯明、朱庆澜齐集督军署，议决连衡两广云贵川湘六省举陆荣廷为盟主，亟兴义师挞伐祸首拥护共和。6月12日，陈炳焜、李烈钧、陈炯明、朱庆澜等及其重要官员再次齐集督军署特开军事会议，磋商对付办法。6月15日，朱庆澜反对督军团背叛中央，并发出拥护总统与国会电报。粤省殊形镇静，人民对于恶消息传来绝无震愕之色。

督军团强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其意实欲要挟中央以令天下，逐渐削弱拥护共和者之势力，以实现其复辟之主张，其阴谋诡计断不能因其暂不进兵稍为灭减，朱庆澜因此在省署召开大会，议决广东仍然出师讨逆，其总司令由朱自兼，率警卫军及滇军首先出发，以李烈钧为总参谋，胡汉民为总秘书，张开儒、方声涛为前锋司令。半月间出发，先攻福建，并通电北京大总统及各省知照。

1917年7月，张勋演出复辟帝制丑剧，朱庆澜首先通电反对。后张勋复辟帝制失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勋重掌北京中枢、毁约弃法，不恢复旧国会。孙中山先生高举讨段护法大旗，首得海军程璧光第1舰队和部分国会议员之拥护，朱庆澜则以广

东省长名义打电报欢迎孙中山先生来粤主持大计，与西南各省联合作护法运动。7月23日，朱庆澜电致北京政府陈达时局意见，并以恢复旧国会为请，朱庆澜还致电程璧光率海军南下，乃迎孙中山回粤，召开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发动各省军民长官士兵讨段护法。此间，胡汉民曾会见朱庆澜商谈讨段问题。朱说，护法运动实属正义行动，孙先生登高一呼，西南各省闻风响应。不过出兵讨段，滇唐、桂陆仍在观望，孙先生自己缺乏可靠实力，难收实效。如果孙先生有意建立护法军，他愿借此机会，将广东省警卫军拨出20营由孙先生改编为护法军的基本部队，待图发展。同时建议，还要向陆荣廷、陈炳焜多做工作，也要向广东省议会疏通。当天胡汉民将朱的意见报告给孙中山，孙听后高兴地说："朱子樵有远见，热情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等闲视之。大家要知道，我们的事业所以屡次遭到失败，原因虽多，主要还是由于自己缺乏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去扑灭敌人。"胡汉民第二次去见朱庆澜，首先代表孙中山感谢他对建军的提议和热情支持。

由于朱庆澜景仰孙中山先生大无畏不断革命的精神，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为此被桂系军阀陆荣廷、陈炳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排斥赶走为快。已被段祺瑞收买的陈炳焜向段献策，若要抵制孙中山，必先调走朱庆澜，于是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来威胁朱庆澜，并推荐广东人为省长。故北京政府任命朱庆澜为广西省省长。朱认为段内阁是违法的，况且广东省是属自治，不承认段内阁，更不承认调朱庆澜赴广西之命令，但形势的演变，籍隶浙江的朱庆澜此时已无法在广东立足遂提出辞呈。北京政府又于7月25日任命朱庆澜为广西省省长，朱未就，卸任北行暂居上海。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上海市各大中专学生象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集会游行，因其队伍庞大，在华洋杂处的闹市

街巷通过，须有较强指挥能力的人担任指挥。有人想到寓居上海的朱庆澜。于是各界代表一致推举朱庆澜为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朱氏欣然接受。朱果不负众望，从容不迫，并将游行队伍破例拉入租界，自上海有租界以来，华人游行队伍进入租界史所未有。足见朱庆澜有胆有识，且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凛然正气。

朱庆澜由粤北返，专注民生大计。在实业家张謇的建议下，得江苏省省长王瑚邀请，得冷遹 、包达三等人支持 ，募集股金20万元，在苏北射阳河北岸创建华成泰和盐垦公司。朱被推为联合公司董事长。公司成立后，化斥卤为膏腴，附近百万居民赖以饶给。朱庆澜荷锄戴笠，日与灶丁佃农为伍，尝日走百里，仅一食不以为苦。当局屡征其出山，却不屑一顾。

1922年10月17日，朱庆澜应张作霖之邀出关赴哈尔滨就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统辖吉黑两省护路军。11月24日，设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兼任 。同年12月 8 日 ，北京政府公布《东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办事处条例大纲》。1923年 3 月 1 日，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在哈尔滨正式成立，启用关防，朱庆澜就职东省特别区长官职。在就职宣言中明确了特别区行政长官的责任。他说：特别行政区长官的职务“在政治上解释不过把特别区内的内务、外交、司法、教育、实业各项行政事件立个行政长官来统一来办理。行政长官立个公署分成几部分找几个人，来统一来办理这几件事 ，每一件分出多少种类 。比如一个部里面分出什么警察的事，道路的事，户籍的事，卫生的事……”。朱庆澜在宣言中还殷切希望特区人民关心特区的事情，靠群策群力办好特区。他说：“在特区的人都可以用文字或言语去找主管那部分办事人或直接来找行政长官 。勿论用条陈的 形式或用警告的形式，务必把大众看到的毛病指的确，说透彻……。就是说得不对鄙人也只有欢喜感激。”虚心、服善、认错 ，难能可贵 。朱上任后，则厘收沿路俄人所占土地百十万亩。设广益、崇德男女两

中学及俄文学校，作育人材以千计，平息绥芬河、满洲里匪患，强邻惮服焉。

自中东铁路建成后，哈尔滨渐成繁华商埠，随着俄国人的增多，洋教堂迭起，但无象样的佛教寺庙与洋教堂抗衡，从1921年起，就有一些社会名流酝酿建立佛教寺庙以消弭洋教堂的影响。经请当局准许，着手筹办。先请名僧为住持，又物色有声望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来操办，群议推朱庆澜出面组织，成立佛教协会，朱庆澜为会长。极乐寺于1923年春破土动工到1924年竣工，香火日盛，僧人日增，寺院人员生活来源渐趋拮据，朱在卸任前又倡议建极乐寺墓地，朱的倡议得到支持，墓地于1925年初竣工。

朱庆澜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任职之初，正是苏维埃政权进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遇到了暂时的困难，特别是粮食短缺，朱庆澜本着"皆我人类，助人水火"的精神，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在东北四省与关内动员慈善团体捐献，发动大户助粮、助款。为鼓励捐款、捐粮，根据献粮多寡，颁发六种样式的奖章。各地总共捐粮三百火车，运往苏联赤塔。

1923年初，张作霖召集孙烈臣、吴俊升、朱庆澜开会，决定把边军5个旅驻守东省铁路沿线各处。5月20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密电东省铁路督办王景春，令其与特区长官朱庆澜协力撤销中东路地亩处，使其职权改归行政长官掌管。8月1日，东省特别区接收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改设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收回沿路部分土地管理权，滨江镇守使张焕相兼任该局局长。原地亩处俄人处长关达基拒不交卸，驻哈日、美、英、法领事支持关达基，并无理封存了地亩处文件，引起交涉，直到翌年9月29日，被封存的文件启封。1923年9月9日，张作霖与美公使舒尔曼谈中东路地亩局问题，张表示愿妥协处理。并电朱庆澜暂勿接收。实为张作霖态度软化，因此，中东路地亩处接收事拖到1924年4月15日在奉召开会议议决。朱庆澜致电张作霖，仍坚

持收回地亩处原议，为一劳永逸计。奈张作霖左右多贪恋权位，只图眼前利益，不顾国家权利之徒，鼓噪张作霖请朱庆澜到奉面劝妥协办理。

1924年9月，直奉再次交恶，爆发了第二次直奉大战，朱庆澜任镇威军后援军总司令，滨江镇守使张焕相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0月20日，东省特别区长官朱庆澜派特警处长前往吉林，与省长王树翰、参谋长熙洽密商联合清剿特区与吉林交界地区的“群盗”。1925年2月11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朱庆澜辞职。特区长官由王树翰兼任，护路军总司令由张焕相兼任。5月，北京执政府调朱庆澜任胶澳督办，未就。从此，朱庆澜脱离政治生涯，献身社会赈济事业，专心办理慈善拯救灾民。先后创办平津、关外义赈。

1927年，鲁豫旱灾，朱庆澜亲赴哈尔滨劝募赈粮，又联合平津慈善团体，募款180万元购粮散发，救活灾民数百万人。1928年，朱庆澜在锦州创办崇德女子中学，其夫人徐雅志任校长。

旧中国陕甘两省是灾害频仍地。陕西省自1926年连年旱灾，到1929年灾情惨重已达极点。朱庆澜将华洋义赈会、中国济生会、孝惠学社、热辽吉黑四省慈善会、万国道德会、五台山善济佛教会等慈善团体组织起来，定名为华北慈善联合会，到陕甘办救济。当时陕西92个县几乎无县不灾。其中关中地区尤为严重。1929年秋，颗粒未收者达十分之八九。平民百姓饿死二百五十万人，逃荒者四十万，至于流离失所、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甘肃情况与陕西基本相同。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常设的赈济机构为中央赈务委员会。但因忙于内战，赈务徒有虚名。民间虽有赈济团体募捐救灾活动，因力量有限无济于事。西北是冯玉祥的军防地。冯正联合阎、桂同蒋介石作战，本来所需粮饷弹械尚感困难，哪有余力救灾？这时朱庆澜则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名义亲赴陕、甘救灾。冯玉祥闻讯大喜过望，于1929年

秋在郑州特地召开会议，决定派河南省教育厅长兼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为冯的代表陪伴朱庆澜赴陕、甘。国民二军负责人鹿钟麟派陶荛卿随同协助。冯对朱一向很是钦佩，嘱陶、查二人要告诫沿途军政负责长官必须尽全力予以方便，不得有任何留难，违者严办。随同朱庆澜同行的还有一些热心慈善事业的社会贤达。朱等一行只随身带了少数急需的救济物资，因陇海路军运繁忙，不得不由查良钊返回郑州自调机车，才得以顺利西行。

朱庆澜到西安后住在江苏会馆，陕西省、西安市地方官员都前来拜会朱庆澜。陕西省民政厅长邓长耀是冯的老部下，为人作风正派，关心民瘼，到会馆跪见朱氏，说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救济无术，愧对百姓，决心以自杀来谢罪于百姓。经朱庆澜开导，才又振作起来，积极投身救灾工作。朱庆澜目睹了大面积灾区，嗷嗷待哺者众多，所带款项远不敷用，立即返回募集大量捐款。朱等返回郑州，刚刚停车，冯玉祥便赶到车站，只见朱庆澜一行在破蓬车内仅有帆布床一张，余者均为地铺，十分感动，流着泪对朱说："您老人家为了救国救民，不辞劳苦，生活又如此简陋，如果国家当局都能象您这样就好了。"冯对朱庆澜极为谦恭。他指着查良钊、陶荛卿对朱说："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能跟随您老工作是很幸运的。"

朱庆澜由陕返津后，就提出"三元钱救活一命"的口号，进行大规模募捐活动，得到天津各界大力支持。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为此还作了专题报导，辟专栏定期汇登捐款人的姓名和数额。象久大精盐公司、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等都捐了为数不少的款项。朱庆澜从商云汀的汇报中得知逊帝溥仪对西北灾情较比关心，建议向溥仪劝募。朱庆澜说，如果要对其行跪拜礼，他宁肯不去。后来，朱救灾心切，遂邀商云汀、陶荛卿陪同到张园溥仪寓所，与其常礼相见。溥仪对朱说："陕甘灾情如此之重，古来少有，你提'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鲜明有

力，很感动人。我现在得不到政府的补助，手中没有多少钱，救活一千条命就是了。”三天后，溥仪请商云汀经手，送来赈款三千大洋。

当时冀、鲁、豫三省也闹灾祸，本来缺粮，无力拿出更多粮、款救助陕甘。于是，朱庆澜亲赴东北劝募。朱在东北威望很高，募款进展非常顺利。第一次就募到两列车的赈粮。时值战乱，运粮车时时被阻，途经北宁、平汉、陇海各线，都靠朱庆澜亲自奔走，才得以将赈粮完好无损运抵陕甘。首次运粮，朱亲押车，沿途打好招呼，为后续运粮车过境取得便利。

朱庆澜不顾沿途辛苦，粮车一到西安，立即率七八名工作人员乘辆破旧卡车驰赴咸阳，武力调查灾情，慰问灾民。所到之处满目荒凉饿殍遍地，即便是活着的也不能言语。朱见状就让每个工作人员将带去的饮水滴入奄奄一息的灾民口中。一位老媪未得水，就以手指口索求，朱庆澜急令汽车司机说："把水箱里的水吸出来给她喝！"司机为难地说："水箱无水怎么开车？"朱说："救人要紧，我们就是走着回去也不比灾民苦。"老媪喝到水后能开口说话了，连连称道："甘露，甘露，今天遇到救命恩人！"这一天因滴水而获救的就有七百多人。第二天，朱庆澜视察扶风、武功重灾区。目睹许多灾民衣不蔽体，更有甚者青年妇女竟裸露下身，见有人来赶紧钻进窑洞或什物堆中。朱见状赶紧脱下长衫，撕成碎条分送他们遮体，随行人员也纷纷仿行，但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朱庆澜去天津，同工商界人士谈起，听者为之愕然，随即凑捐土兰布二百件（每件五十匹）运往西安，分给无衣少穿的灾民。陕甘空前灾情，引起当时文艺界的关注。上海有电影制片厂专程到陕甘拍摄记录片，并请朱庆澜题写片名为《人道》。记录片的放映推进了募捐的宣传工作。

朱庆澜在西安主持救灾工作，出现过许多令人感动的事例。有位七旬多靠补贴为生的老人，一天来到江苏会馆，坚持要求将

一只祖传的金镯交给朱庆澜救济灾民。朱劝他把祖传之物收留。但过了三天，他将手镯变卖，将钱全部交出。还有一老妇人来会馆求见朱庆澜。进门就放声痛哭，诉说她丈夫是个穷秀才，教私塾为业，现已饿死，女儿及女婿在兴平也都饿毙，剩下小外孙不知去向，后听邻居告之，方知被朱庆澜领往西安收养，所以老妇人赶到西安见到了外孙，因有吃有喝，外孙身体很好，使她感激万分，取出一块砚台和两串铜钱，要朱收下为救灾之用。朱庆澜收下铜钱，退还砚台说："两串铜钱是你的心意，比捐款千万元还宝贵，我收下了，砚台留给你外孙日后学习用吧。"当即命人写下收条，签名后交给老妇，并留下地址，以便按时送去赈粮。

陕甘受灾各县，到处是无依无靠的儿童，虽经暂时收容，但仍越聚越多。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无家可归的幼童，朱庆澜于1929年冬至1930年初，先在扶风县设立灾童教养院，用赈款购买灾后无人耕种的土地，成立"怀幼农场"，供灾童半耕半读。后又在绛帐车站设立运粮站，作为难童赈粮供应屯散之地。朱还商请冯玉祥在西安市腾出兵营三百余间，建立了"西安儿童教养院"。灾童小学毕业后即可进厂做工，成绩优秀者送入中学继续读书。对已成年的男女，由院方协助择配，后来朱庆澜每隔几年必去西安教养院视察灾童成长情况。

陕甘赈灾共用捐款百万元以上，其中仅上海一地捐款就达四十三万一千余元，经朱庆澜募集购粮达十六万担，灾民受惠者近百万人。当时上海报刊曾赞扬说，该会办事之敏捷，手续之完备，为从来办赈中所罕见。办事人员在朱庆澜的带领下，热心公益，除供给普通饭食外，并无薪俸。

朱庆澜为了救济陕甘灾荒，两年多的时间仅在西安市住有半年，余者均在各灾区奔走，监督放赈，因此陕甘人民有口皆碑，视朱如救星。1929年，于右任返陕西省，在西安向朱庆澜表示感谢。他说，陕西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的。一次工作人员查

良钊到五丈原视察灾情时，为土匪绑票为质，向陕西省府索要枪支弹药和财物。后来匪头目得知查是朱庆澜派去救灾人员，便亲自将查送回西安，面见朱庆澜谢罪。

朱庆澜在西安赈灾的同时，对西安因战乱破坏和年久失修的寺院和塔林进行抢救。

1930年秋，冯、阎、桂倒蒋战争失败，冯部下文武官员为蒋介石所通缉，有些人得到朱庆澜的庇护，如原西安市长杨慕时。有些官员在逃脱前把个人积蓄财物交朱庆澜作赈灾之用。

1931年春夏之交长江大水灾，使湘、鄂、赣、皖、苏五省地区成为泽国 。同年春 ，国民党政府任命朱庆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朱因专心致力赈务，亦辞不就。8月上旬国民党政府派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内政部长刘尚清、实业部长孔祥熙、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以 及尚在西北办理赈灾的朱庆澜 五人为特派委员，负责筹组“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全救会），并指明以此五人为常务委员，负责处理一切救灾事宜。全救会于8年19日在上海成立，朱庆澜任灾区工作主任。尚在陕甘奔走救灾的朱庆澜，由电报催促于8月20日返沪。8月21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与全救会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公推朱庆澜主持灾区工作，全权负责放赈工作。

朱庆澜来往灾区十多天，劳顿焦急，昼夜不得安眠，偶感风寒，高烧不退，陷入昏迷状态。多亏一位年轻医生协同助手赶来医治，守护两昼夜，始脱危险，朱庆澜未等身体完全康复，于9月初参加沪救会执委会议，作了灾区视察报告。指出苏北一带应继续派人详查灾情，进行急赈，同时建议应及早采取措施，将沿江各坝加固，防备明春运河水倾出，不能春耕。

朱庆澜对蒋介石集团剿共内战极为不满。9月9日，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邀请朱庆澜报告长江五省灾情惨状，朱在会上沉痛地说：“总之，东南各省以富庶称于全

国，今遇此浩劫，天之虐我，可谓既惨且酷，归其罪，揭其底，人事岂可辞其咎！值兹国难方殷，国步艰难，凡我国人再不大彻大悟，力图振兴，真为亲者痛，仇者所快。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侵略，我们可以御之，国家生存，人民生计，我将何以维持？”话中隐含讽谕，指斥人祸天灾相交，加重人民痛苦，引起市党部的不满。

朱庆澜根据视察灾区所得情况，拟订了具体救灾大纲，力主赈款必须全部用于救济灾民身上。至于放赈其他费用，则应由国民政府负担。经过争取，全救会委员长宋子文终于同意了这一原则。根据受灾面宽灾情严重这一情况，必须派出素孚众望廉洁自持的专员负责各省赈务。在派员过程中，许世英力荐金观甫任安徽省专员，豪绅某副之。朱庆澜则认为不可，最后派全绍武充任，金为此怀恨在心，后来竟弄出不少麻烦来。

朱庆澜在督促急赈的同时，积极主张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疏导积水，修筑道路，重建家园。当时在全救会工作的人员基本是义务职，每人仅给少量食宿津贴，少数专职人员的工作费用也尽量紧缩，向政府实报实销。灾区工作组每日三餐普通饭食，工作人员免费供餐，作为补贴。朱庆澜为了节省开支，将自己所住一品香旅馆房间腾出来，做为全救会来往人员的招待所，自已搬到姻亲家去住。恰逢陶行知先生也寓居该处，正在大场办山海工学团，该校师生得悉灾情后，主动向附近农民介绍朱庆澜的为人，农民深受感动，曾两次派人到朱的下榻处面见朱庆澜，捐款数十元。农民在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仍为救灾解囊，感人至深。

由于朱庆澜主持陕甘救灾成绩卓著，深得海内外人士的信任，因而函电交驰，汇来很多捐款，一般都指名委托朱庆澜个人办理义赈，由专人办理存入银行。其中发生过一起曼谷华侨总商会汇款十万元，被国民党党部的特殊人物勾结财政部在中途截留中饱私囊的事，事泄后这些人非但不自惭愧，反而怀恨在心，与

金观甫（抗战时附逆成为汉奸）朋比为奸，图谋陷害朱庆澜．他们唆使安徽一小撮豪绅出面告状，指责朱庆澜用人不当，“经济不公开”，“延误救灾”。事实上主持皖省赈灾工作的全绍武是虔诚的基督徒，办事踏实认真，操守严谨，得到中外人士的信赖，主持安徽赈灾也无懈可击．这伙人见中伤不灵，就买通小报肆意造谣，甚至将全救会庶务人员置放在灾区工作组外间以供外籍人士使用的蒸馏水器和硬纸杯，也视为铺张浪费，挥霍赈款的佐证。一时谣言纷起，弄得乌烟瘴气．后来，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上海名流史量才、褚慧僧、黄炎培、沈钧儒、沈恩孚等先后仗义执言，怒斥这伙人品格低下卑劣之至，只知有私不知有公．

朱庆澜自经手国内外赈款以来，就聘请上海著名会计师徐永祚等随时审核，最后由徐就财务帐目提出审核报告，予以书面证明，事实俱在，朱庆澜经手的赈款是无可指责的．长期以来，这些证明文件及朱庆澜有关赈灾的私人函件都由陶莽卿保存，朱庆澜面对种种谣言攻击，胸怀坦荡，与许世英联名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监察委员赴各灾区调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国势危殆．朱庆澜冒着救国“有罪”的风险，邀集各界爱国人士在上海开会集议，筹建抗日后援会，到会近二百余人，异口同声要集合群力，团结抗日，请朱氏致电各方，当场由陶莽卿起草，分电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和朱德等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后援会宣布成立，朱庆澜任会长．伺机北上设“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具体工作机构设在北平。

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闸北区，驻守这里的国民党第19路军在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朱庆澜积极组织支援活动。一次蔡廷锴和戴戟代表19路军将士，到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与各界人士见面，史量才特邀朱庆澜出席，刚入会场，蔡廷锴立即起身向朱敬军礼，并

说："老将军，我是您的老部下，您的一切都是我作军人的标准。"朱也客气地还了礼。同年1月，朱庆澜被聘为国难会议会员。

朱庆澜于1932年春束装北上，在北平会见了张学良，提出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取得张氏的同意和支持。迫于全国舆论压力，行政院长宋子文勉强以政府名义拨卡车若干辆给后援会。后援会的任务是为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和各地方部队的粮饷弹械、服装、医药以及钱款的筹集与运输。该会成立之初，朱庆澜与张学良、张作相去过承德劳军，并鼓励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坚持抗日。

朱庆澜就筹措援助抗日部队款项问题，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族奋起抗日救亡。海内外人士大为振奋，群起赞助，函电或派人直接联系，慷慨解囊，踊跃捐助。后援会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募捐，如办理京剧、话剧、歌咏、音乐等义演，办理书画家所献书画的义卖。有人还把现款、手饰、球宝等捐献给后援会，用以支援抗日。海外爱国侨胞，更是热烈响应踊跃捐助。其中泰国中华总商会汇款最多；爱国华侨捐款名列榜首的是陈嘉庚。国内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贡献最大。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节衣缩食，往往以斗米之资献给后援会，爱国至诚之心感人肺腑。

由于工作需要，后来后援会组织相应扩大，除在沪设立办事处外，在古北口、承德、平地泉也设了办事机构，加强与各地方部队的联系。后援会与救国会相互配合，互相支援，如卢广绩、王化一、车向忱、彭振国等都参加后援会的活动，声势很大。后援会成立后，不顾蒋介石集团的阻挠与破坏，派人深入黑龙江、吉林一带，与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王德林等部接洽，给予财政、物资和精神上的支援，他们也派人进关递送军事情报，汇报战况，并提出同年12月，为抗日苦战的王德林部乞援。

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29军宋哲元部取得喜峰口大捷，

后援会连夜派员劳军，并给29军以物资接济。29军官兵受到极大鼓舞。当时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朱庆澜将军》一文，介绍朱庆澜组织“东北民众抗日后援会”和支援义勇军的事迹，有人还把它印成单行本，广为发行，对全国人民抗战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上海文艺界还拍摄了《风云儿女》等影片配合抗日后援会的工作，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朱庆澜爱国赤诚，时刻不忘东北父老兄弟姊妹之苦。每逢9月18日那天，朱庆澜整日不进饮食，用以鞭策自己不忘国耻，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他的全家也半日不举烟火，对子女进行国难教育。

1933年“抗日同盟救国军”正式组建。朱庆澜与冯玉祥、吉鸿昌已事前相约迅速北上抗日。因此当冯玉祥提出援助时，朱庆澜立即派人从捐款中提出十万银元送交，并将运银元的大型卡车多辆，一并留冯使用。朱庆澜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客观上响应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致抗日的号召。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朱庆澜大力支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所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并与之密切合作恨之入骨，从而对朱庆澜所领导的后援会的活动，不断进行打击和破坏。更有甚者，蒋介石集团竟采取卑劣手段，从破坏朱庆澜的名誉下手，给后援会制造事端，借以困扰瓦解抗日救亡的支援力量。他们怂恿吉林抗日部队李杜等人到南京控告朱庆澜，支援抗日义勇军款项分配不公；后援会用款不当；并诬陷后援会有贪污之事；对朱庆澜进行人身攻击。蒋介石借机派人进行财务审查。后来于右任、张继等同南京立法院院长孙科商量，决定由立法院派人处理，绕过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的魔爪，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19路军为骨干，联合其他民主派别，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随即向闽浙边界推进。这是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国民党营垒内的一次分裂，是为福建事变，朱庆澜对

它给予了尽心竭力的援助。他们之间通过秘密设在上海的一架电台保持经常联系。那时李济深、蔡廷锴给朱庆澜送来聘书，委托其代为聘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高级顾问。朱庆澜还帮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购置了一批武装，筹措了十万元经费一并送去。

朱庆澜积极支援东北军民抗日活动的后援会，有背于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因此为其所忌，于1933年末被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同时被迫停止活动。朱庆澜迁居上海。在上海经朱庆澜和黄炎培介绍，杜重远认识了邹韬奋，由于政见相同，过从甚密。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被迫停刊，而邹出走国外。《生活》周刊，改名《新生》周刊由杜重远负责发行，继续站在时代前列为抗日救国大声疾呼。1935年6月7日，杜重远因《 新生 》周刊杂志上发表《闲活皇帝》而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关在上海龙华监狱。朱庆澜闻讯后亲自去监狱探望，并赠款改善其生活。后又代表黄炎培到狱中看望过杜重远。

1937年4月29日，朱庆澜离蓉飞陕，临行时赋诗一首：

卅载蓉城感旧游，
盈眸焦土使人愁。
欲迴东逝长江水，
溉润西川五百州。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朱庆澜与杜重远在西安相遇，在政治活动中，杜重远再次遭国民党特务捕押，朱庆澜又通过秘潜的关系将杜保释出来。

1938年冬，朱庆澜召开会议，将赈务委员会改组为赈济委员会。孔祥熙兼任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屈映光为副委员长，朱庆澜、余心清等四人为常委。并决定朱庆澜以常委名义兼任第

5救济区特派员身份主持第5救济区有关战区的救济及运送安置各地逃亡来内地的难民工作，机关设在西安市，朱庆澜住在灾童教养院院内。在第5救济区内的难民，凡有劳动能力者均给予小额无息贷款，许其做小本生意，或一二十人组织起运输队，可由总站分期给予贷款，可自力更生，不再领取救济费。为安置难民生产自救，朱庆澜还设立垦区，有黄牛哺垦区、黄龙山垦区，郿扶垦区等。为使西安、渭南附近地区的难民能够自食其力，特在西安、渭南两地成立"小本贷款处"，把无息、分期还本的贷款发给难民，作为小本生意的本钱，不少难民由此得以安家糊口。第5救济区成立后，朱庆澜派工作人员分赴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会同当地政府就地发放救济金。

朱庆澜还成立了难童学校来解决难民中的适龄儿童的就学问题。难童学校建在西安市南郊大兴善寺菜园，有房十间。其学童服装伙食学费等款项由公家负担，后来又在郿扶、汉中、安康三地同时设有难童学校。1939年春，朱庆澜亲去甘肃、宁夏等地，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民族团结友爱为重，除赈济款外，还在海原、固原、化平成立小学校，鼓励儿童和少年上学，以提高文化。

朱庆澜还募款修缮西安南郊的大兴教寺，修葺寺内玄奘法师师徒三人骨灰塔及纪念堂的墙壁经文石刻，又新建一座藏经楼。整修郿县法门寺的正殿、两厢配房、斜塔和塔内的文物及手书经典等。朱庆澜还帮助流亡关内的"东北中学"解决经费来源以及师生的生活问题。帮助解决义勇军烈士家属生活困难，通过19集团军林伯渠，向延安输送有为青年参加革命工作。通过在重庆的缪庆杰先生请重庆盐商捐款两万元修绛帐厂房。

朱庆澜爱国爱民，辛苦备至。在西安除日常工作外，还接待过境宾客、访问，以及国内各界人士来访求助，每天几无休息之时。朱自奉甚俭，几年来素食布衣，营养不良，加之常年操劳，

终至积劳成疾，经常咯血。即便如此，还抱病于1940年1月去重庆参加会议，筹商赈政计划，并向财政部申请黄龙山垦区的生产贷款等等。往来乘车劳累，于是病情加重，亲朋好友劝其不要返陕，朱坚持于10月返回西安。与此同时，朱的长子望溪踏海殉节之诚传来，朱更伤感万分，病益加重，遂于11月下旬留在临潼养病。

1941年元旦刚过，朱便觉身体不适，由秘书派车接回西安，仍住灾童教养院内。1月12日前，除带病处理公务外，应命为友人留下墨迹，为子女书写四扇屏，言语中流露出难以亲睹抗战胜利的憾意。并嘱如有不测，愿埋骨于终南山下。1月13日，晨起入厕，净手后盘腿静坐于炕上，于上午8时溘然长逝，终年68岁。灵柩暂厝在南关外大兴善寺内。陕西省奉命下半旗致哀，各方均发来唁电，18集团军办事处派伍云甫前来吊唁。

讣音至渝，国府震悼，明令褒扬，特给治丧费，生平事迹存备宣传使馆。3月12日，陪都重庆召开追悼朱子桥将军大会，蒋介石送挽额"国丧老城"，林森挽"忠勤可敬"。冯玉祥追悼会上宣读了他的悼诗。

朱庆澜稳健笃实，虽为中国之大官，但廉洁自持，赋性淡泊，常将自己所得之俸禄散之部下。救济穷困，无所吝惜，行动至为平民，无官僚派头。其一生致力于社会事业，不治家产。其做官，办政事，当慈善家，办赈济，完全以利他为出发点。

朱庆澜元配戴夫人，继配徐雅志，留学日本，为女教育家，曾在东北创办贫儿学校及崇德女学，蜚声中外，随朱致力社会事业，亦极热心。朱有子女九人。女德君居长。子八人，榕为长，以下是桐、杞、桦、模、树、权、松。

*叶公绰《绍兴朱子桥先生墓志铭》称"袁氏封公一等子爵，拒不受，遂以去职"。

许 兰 洲

陈志新

许兰洲，字芝田，清同治十一年五月五日（1872年6月10日）生于今河北省南宫市东八里庄村一个贫苦人家。其父许老文系清同治年间的武秀才，在清宫内充当卫士。母傅氏系本县同仁庄村人，生下一男一女便弃养。时许兰洲尚在襁褓中，由其叔父收养。许幼年家贫而孤，仅在本村读过两年私塾即辍学在家，同本村农民温二里割草拾柴，因不堪其婶母的虐待，负气跑出家门，到南宫县城药铺当了学徒。药店学徒非其所愿。许兰洲生而不羁，“长好武，自以为万卷公法，不若一发弹丸”。幼年苦练武术，有较深的功夫。后入湖南陆军学堂习武。毕业后投效袁世凯麾下，服役于“新建陆军”。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成为清王朝的忠实鹰犬，深得清廷和帝国主义的垂青。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斯时，北京乱后初定，社会秩序尚不安定。袁世凯早年受知于荣禄，遂派精于武功、忠实可靠的许兰洲为头目，带领兵丁20余人去荣宅守卫。许兰洲性情鲁莽，行动不轨。一次与宫中宦官发生械斗，殴伤对方。这些仗势欺人的宦官头目，岂能忍受这等窝囊气，于是纷纷向袁世凯诉苦告状。袁世凯大怒，立刻派人捉拿许兰洲问罪，后经荣禄说

情，总算饶过了对许的惩处，仅传去训斥一番了事。不久，荣禄将许兰洲送回，并嘱袁世凯多加栽培。许兰洲很快被袁世凯擢升为营官。一次，袁世凯派营务处提调到许兰洲营中去考核。因提调同许兰洲话不投机发生龃龉，许兰洲劣性大发，竟将提调暴打一顿。袁世凯得报后，当即将许传去撤差。令营务处总办王治馨将许责打100军棍，并罚其跪读一本军事训诂的书籍 。许兰洲经过竟日将此书背熟。事后，袁世凯将许兰洲送到张勋部下当差。

东三省人民自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八国联 军入侵以来，深受日、俄帝国主义之害，到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大地，特别是辽西一带，田园荒芜，庐舍为墟，胡匪横行乡里，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逃难人群，地面十分不靖。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电商袁世凯要求派遣军队出关平定匪患。清廷派张勋出关，授其为“奉军辽北总统”，驻防昌图县。许兰洲随张勋出关，并被推荐为黑龙江巡防营统领，带兵驻扎在肇州。嗣张勋被清廷调赴京师（实际未赴任）， 许亦因故被撤差。 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 ，东北改官制设行省 ，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权势在各省督抚之上。徐世昌上任后，以推行“新政”为名，加征捐税，“或新创名目，或增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因此激起人民不断反抗。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他以“无兵殆不可言治”为词，由清光绪 三十三年十二月 十六月（1909年1月5日）改革军制，将其前任将军赵尔巽所编奉天巡防队，编成五路巡防营，按照奉省区划分为“中、前、左、右、后五路”。许兰洲被任命为奉天巡防队，后路统领官，辖步队5营 ，马队4营 ，驻防郑家屯和洮南。是年，奉天省北部的昌图、三面沟等地发生匪患，有大股土匪窜扰，此外，在奉吉两省交界处红砬子等地也有一股胡匪盘踞。许兰洲率部同聂汝康所部会同围剿，擒斩“首要各匪97名，夺获快枪8枝，子弹200余颗，马34匹” ，一举将各胡匪

剿灭，地方赖以平安。尔后，许兰洲率部到黑、吉两省去剿匪。在黑山、青山、绥化一带会剿天灭洋。同年7月25日，在大青山与天灭洋接仗，在激战中将其击毙。

清宣统元年（1909年）夏许兰洲在江省巡防统领任内剿办陶什陶胡，立有战功，但因军纪不良，被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革职。同年12月，清政府“以奉边东路与吉林沿边各匪一律廓清，间有零星余孽就地营队足以清之”，于是命张勋返防入关。张勋遂决定将许兰洲继续留在东北。许兰洲与江省民政司倪嗣冲结下特别关系。当时黑龙江省巡抚程德全委任其为巡防营第2路统领官，畀以维持治安之责。而许兰洲的野心日益勃勃。

清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为了镇压地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无适合人选统领军队，见许兰洲久历戎行，遂启用许兰洲为统领官。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对北洋军队进行整编。黑龙江除陆军混成协外，将其余各种杂牌地方武装编为8路巡防队，许兰洲为第2路巡防队统领官，驻防省城。1912年4月，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受帝俄唆使降附于库伦，哲布尊丹巴任命乌泰为“中华民国的第1路司令”。8月16日，乌泰在靖安县（今白城市）发布告示，驱逐地方官吏，于20日在归流河南岸的白庙发布《东蒙独立宣言》，“布告独立，与中国永绝交通”，开始举兵叛乱。叛兵分3路向洮南、开通（今通榆）、突泉进发。声称“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科左后旗镇国公喜敏珠尔追随乌泰同时叛乱，并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占领了镇东县城。吴俊升率马队10营及山炮1营，共3000余人，由郑家屯驰赴洮南，与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派出的许兰洲率领的巡防队共同进剿。许兰洲率部与乌泰叛匪进行过多次交战，先后攻克其王府及其弟主持倡乱的齐默特

尔府。许兰洲因功由第2路统领官升充陆军步兵旅长，补少将衔。

1913年2月，北京政府陆军、参谋两部召开各省派员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军事编制和教练规程，黑龙江省决定派许兰洲和刘德权参加会议。临启程前因绥化发生土匪攻城事件，未果行。许兰洲奉命率队往剿。2月19日，在绥化东北12里童家窝堡处围攻土匪“君子仁”、“夸海”等股匪二百余人，经激战后，毙匪50余名 。20日在望奎镇南正蓝旗二井地方与“ 天下好”等股匪250余人接火。围歼“大甲子”等数十名 。特别是讨伐巨匪孙学武立了大功 。黑龙江省著名悍匪孙学武 ，斯时猖獗异常，呼、海、绥三府，青冈、拜泉、兰西、巴彦等州县，无不遭其蹂躏。不久前又盘踞在绥化西北，匪众2000多，烧杀淫掠惨无人伦，闻者无不切齿，虽经江省当局严饬军队剿除，无奈兵力单薄，地域广阔征调运转困难，因此，宋小濂商请吉林派军助剿，并派来省旅长许兰洲率陆防全军分路堵截。两师会合后，大小10余战，枪毙及生擒股匪不下300余名 ，旋经绥化黄知事会同许兰洲特派宣抚员前往匪巢说以利害，投城后并以征库总司令及四路民团团长许之。孙即认可，次日躬送宣抚员入城，许闻报当令4队官率排长数名、兵50人，徒手出城欢迎该匪入城，且令各商号悬旗庆贺，许兰洲与黄知事出署迎接好言抚慰 ，一面令匪众 分驻城外各旅店，宰猪数口，并有酒馔犒劳众匪。至晚许兰洲密调各处兵队，悉于3月4日到绥集中，3月5日许兰洲及英顺在警务公所诡称兵匪因赌起衅，请孙匪相见，面商事件。孙学武带二匪徒前往。至即一齐动手用刀将孙学武及二匪兵同时刃之。一面发表江电所授命令布告张统领、黄知事、春督办，一面布队分路进剿。许兰洲部署妥当即督饬各队同时出发，未及出城匪卡先开枪，各路官军奋勇冲上，击退贼卡逼近匪巢 。自早4时开仗战至晚9时，鏖战竟日获全胜。绥化一役斩灭贼匪500余名 ，枭贼孙学武首，“江省匪气，于焉尽肃清”。经此役，许兰洲因功获二等文虎章

加陆军中将衔，也得宋小濂赏识。绥化之役后，北京军事会议已结束，许兰洲为晋见老长官袁世凯，还是兼程赴京。袁世凯会见许兰洲，对其好言抚慰笼络之。

1913年3月，袁世凯谋杀宋教仁惨案发生后，引起国人震怒，纷起指责袁世凯，许兰洲在黑龙江省以《江省军界对于反抗中央者之宣言》恫吓愤起反袁的革命党人。《宣言》称："仍执迷不悟轻开衅端则是国民之仇雠，军人之公敌，先以文明为现时之对待，当以武力为最后之解决，决不任以民国大好山河断送于少数暴徒之手。枕戈以待，不尽所云。许兰洲等"对革命党极尽诬蔑之能事，表示对袁世凯效忠。

1913年9月16日，宋小濂"因病"离职，由毕桂芳暂行护理黑龙江省都督兼民政长办理善后事宜。时许兰洲由京归来，对新上任、手无寸铁的都督毕桂芳，并未放在眼里。他想把黑龙江省的陆军与巡防队全行整编，扩充势力。毕桂芳接到整编计划时，表示极为不满。毕十分清楚许兰洲整编的目的，如同意整编，就等于兵权旁落，将来必酿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毕桂芳与许兰洲之间嫌隙产生。

毕桂芳主政黑龙江省仅有百余日，袁世凯趁都督改为护军使之机，以毕桂芳为外交人员，不宜在边省担任军政要职为由，调京另有任用。而野心勃勃的许兰洲复觊觎护军使一席，不意中央经宋小濂保荐朱庆澜接毕桂芳，任黑龙江省护军使兼黑省民政长官。1914年5月，朱庆澜下令把驻省城第1路巡防队步3营右哨压缩改编，因而引起该部哗变。变兵包围军署，许兰洲解之。

袁世凯并不以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民国大总统为满足，还想过过皇帝瘾。其爪牙便为袁大造舆论。1915年8月，杨度等6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致使袁世凯进行帝制活动更为明朗化。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许兰洲派心腹进京声明，担任黑龙江省保障。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论

功行赏，许兰洲被封为三等男爵。至此许兰洲渐怀驱逐朱庆澜之阴谋，大事企图，肆意压迫 。朱庆澜不能晏晏安于位 ，因此，愤然去职。许兰洲因此军权在握而成为江省的权要人物。5月，在师长许兰洲策动下，江省宣布独立，“ 公推 ”许兰洲接任督军，朱庆澜被迫辞职。

许兰洲驱逐朱庆澜后，满心自任督军，大张威势，不意中央不许。朱庆澜调离开黑龙江省时，袁世凯曾电问许兰洲何人来黑龙江省相宜，许兰洲回电称，现在江省地方吃紧，如果中央一时无人，查有前署理都督毕桂芳，舆情爱戴，可否以其继任，于地方大有裨益，兰洲当尽力帮助，以缉乱萌。袁世凯照准，并派许兰洲帮办军务。5月4日，袁世凯正式任命毕桂芳署理黑龙江省军务兼巡按使，许兰洲帮办军务。5月19日，正式任命毕桂芳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命令发表后约1个多月，毕桂芳才出关赴任。在毕到任之前，许兰洲把其师参谋长李景林安插在督军署任参谋长，师部副官处长杨云峰为警务处处长。而毕桂芳亲自指挥调动的竟无一兵一卒。因此，毕对许兰洲非常不满，但又毫无办法。虽然规定全省军队必须按督军命令调动，但事实并非如此。蒙匪大举进犯边境，形势紧急，毕桂芳本想出兵讨伐，但无听其令者，事事受许兰洲的掣肘而无可奈何。督军之名只不过虚拥其位而已，最后终于同许兰洲发生冲突。

同年5月27日 ， 蒙人巴布扎布在喀拉喀河木古郎吐祭告天地，发誓刻印，公布檄文反袁，拥立“大清”，自称宣统年号，举黄色龙旗，禁止剪辫子。到9月25日，在日本人支援下，纠集蒙人一千三四百人，及胡匪1700余人及20多个日本人，合股进攻瞻榆县，瞻榆县知事及一名科长被打死。许兰洲奉命会同奉军将其一举击溃 ，毙200余人 。残部逃回呼伦贝尔一带 ，1917年被黑省督军毕桂芳收编。

1916年10月，北京政府为粉饰全国统一，下授勋令。许兰洲

被授为陆军中将衔，颁发二等文虎章及二等嘉禾章。1917年2月，黎元洪任命许兰洲为黑龙江省陆军第1师师长，许兰洲为人不但专横跋扈，政治上还颇具野心。他让毕桂芳来任黑龙江省督军，并非真心实意，而是权宜之计。许兰洲不以军务帮办、师长为满足，其真正目的是要以自己的实力谋取督军一席。为此许兰洲对北京政府不愿意助长各省军人"以下犯上"的风气大为不满，欲取毕桂芳的督军的位置而代之，只是等待时机。

不久，许兰洲就演出了"夺师印"一出武戏——黑龙江军务帮办兼第1师师长许兰洲欲取毕的地位而代之。

1917年5月31日，毕桂芳、许兰洲致电黎元洪，要求收回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成命，否则"江省将宣布独立"。同年6月1日，黑省军务帮办许兰洲赴徐州参加张勋召开的第4次督军团会议返省后，迫黑龙江省长兼督军的毕桂芳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实行"独立"。同日，毕桂芳宣布江省独立。

许兰洲欲乘北京政局混乱之机，唆使黑龙江省英顺、巴英额两个旅长逼宫，赶走毕桂芳。并答应事成之后，二人分别升任师长及镇守使，以此来换取英、巴的支持，取毕桂芳而代之。于是，英顺、巴英额见诸行动，同许兰洲的亲信任国栋、道尹张寿增及其他地方官员多人，到督军署请毕桂芳让位于许兰洲，否则将以武力对待。外交官出身的毕桂芳手下无一兵一卒，孤立无援，对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没有防备，所以来不及抵抗。他找来许兰洲商量，愿以省长相让，而自己只留督军一席。许兰洲的目的本在夺取督军一席，经过一番商量，许兰洲已认可以师长、军务帮办兼省长。可转眼间又悟到这是毕桂芳的缓兵之计，并且得知毕桂芳已电召英、巴两旅入城自卫。许兰洲马上取消了自己的许诺，限毕桂芳24小时之内辞职出境。6月上旬，北京政府得知黑龙江省内部发生政争的消息，欲使用调虎离山之计，电召许兰洲到北京有所商洽，而阴险好弄权术的许兰洲却回电说：黑龙江有两

个图谋不轨的宗社党，就是毕桂芳和巴英额；为扑灭匪类，这时没有进京的余暇。这时许兰洲认为"夺帅印"的时间不能再拖下去了。6月13日，毕桂芳在许兰洲的重大压力下，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辞去省长兼督军职。参加会议的军政官员自然不会有不同的意见。毕桂芳发表寒电（14日）通告自己下野，并荐许兰洲自代。毕桂芳在给黑龙江省各道尹、县知事、设治局、矿局等的电文称："桂芳不才，再临江土一载以来，举凡军政民治，自问无丝毫之补救，每一念及午夜疚心，固由时局艰危，实亦德才薄弱，为地方计国家计，自应退避以让贤能。许帮办英明果断洞彻边情，实能宏济时艰，为国柱石，征之军民爱戴之意既诚且深，谨将督军省长一切责任完全于本月16日均请许帮办担负，桂芳即于是日交卸，特此奉闻。"许兰洲也发表通电称："毕督军辞职离省，所有原来军务政事悉以相委，月轮材何克任此，而时艰孔亟，旁贷无从不得不克承其乏，尚望诸公协助赞襄，以厘时艰。……各事均常，仍率旧章，毫无更动，万勿诿谢，以期共济，特此电告。"观之二电新旧交替之情形，一不得已，一为自命，可概见一斑。

许兰洲在"夺帅印"后，于6月15日，接任督军及省长之职，赶走了毕桂芳非常得意，以为黑省即将成为自己的独霸天下。但中央政府憎恶许兰洲的横暴，不予正式任命督军兼省长，并有调往他省之意。正当许兰洲过督军兼省长瘾时，不料黑龙江省武将频思许氏逐人自谋之惯技，勃起反许运动，即英顺、巴英额两旅长以及全省军官联合起来掀起排斥许兰洲的活动。许兰洲赶走毕桂芳之后，本拟发表巴英额为师长。可事前任国栋找到许的夫人，说："芝老太忠厚了，师长让给外人当，将来人家如翻脸，就得受制。若是提拔自己的人，岂不妥当？"许兰洲就听信了他夫人的话，发表任国栋为师长，对于英、巴二人之事只说以后再说，竟忘了当初的诺言，又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英、巴对

此不堪忍受，极为愤怒。22日，英、巴致电北京政府，指出许兰洲胁迫督军辞职，宣布与其断绝关系。并要求北京政府将许兰洲调离本省，仍复命毕桂芳来督江省。

许兰洲窥窃权位，先逐朱庆澜去职，谋未得遂，今又以对朱者对毕，并通电自任督军省长以维系地方，并通电取消独立，自以为可以正式任命，不意该师各旅团长参谋一致起而反抗，电请中央待命讨逆。电称："强横窃据，国纪难容，大局安危，恳伸公愤，江省上师长许兰洲，以武力迫胁前将军去职，意在达到自己希望军长之目的，此时中央尚能振作，未遂其谋，毅然任命毕莅江得以维持危局，然彼野心不死，屡起暗潮，遇事挟持无非冀图满其欲壑，幸得次第消弭，地方获安，毕督办事困概可知矣！上月京军事会议，毕督已派代表有人，闻许兰洲趁此时机又启阴谋窃据之心，托词赴奉潜往京徐与督军团接洽，归来则以督军团赞成渠为督军讽示左右，首倡脱离关系，冀图得以自由行动。不逞之谋以参谋长李景林怂恿最力，苟利于己，虽祸及地方并弁髦命令亦所不顾，通电不久竟于本月16日以武力胁迫毕督退让攫得印绶，遂以自代，复又密令滥发纸币数十万吊，饷糈之费何至如斯之巨，是不陷全省于破产地位不止，似此攘权夺利违法乱纪，自为督军电传全省，群情不服，两旅官兵同深激愤，荷戈清命同声致讨，势不可遏。更恐武力对待扰及地方，失军人保卫秩序之天职，正在抗不承认，将呈诉中央。顷许兰洲巧于趋乘，首先取消脱离，欲冀中央任命为稳固窃据之谋，彼权位本自窃攘而来，不法行为举国无不声讨之，若转任命之，公道何在，国纪何在？法废堕何以图存？知中央决不出此，江省边瘠逼迩强邻，不特交涉堪虞，且为地方滋累，旅长等俱赋血诚，万不承认，现已通电与许兰洲断绝关系，整备军旅静候中央命令出师致讨，当此千钧一发之时，消兵弭祸，惟请主持公理，将许兰洲、李景林调离江省，仍催命毕督来黑收拾军心，维持地方，如有危险旅长等力负其

责，庶中央威信可以施行，不法行为不得复逞，大局幸甚，江省幸甚，冒昧迫切，无任待命，驻黑龙江陆军骑兵第4旅旅长英顺等19人。”军阀拥兵自重，大小武夫富有模仿性。若开一例效法者必接踵而起，“甚且得之于人者，还而施之于人”。然未有如许兰洲逐毕桂芳报施之速者也。许既逐毕自以为江省军政大权在握，讵知英、巴两旅长，声讨其逐毕之罪，转而逐许。以名义言，英、巴效法于许而正于许；以事实言，则英、巴以许之矛攻许之盾。既有背叛的师长，安可无背叛之旅长，顺逆相依、变乱相予，英巴以其人之道，还治许兰洲而已。同时英巴派人赶到哈尔滨追上毕桂芳，请他回江省在呼兰立足，继续主持督军兼省长的公务。毕桂芳回京之意已坚，只允英巴二人代其发一通电，说明他是受许兰洲胁迫而离开江省的。电报最后署名为“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毕桂芳”，其用意就是取消了卸职下野的宣言。表示他仍然是在职的省长和督军。英、巴二人于24日发出通电，指责“师长许兰洲去岁驱逐朱帅，今岁逼走毕督，未奉中央命令让权自代”。26日，陆军第4团团长鄂双全以许师长不顾大局，无故反对政府，违反民意，宣布独立等因，邀请各界宣布与许师长断绝关系，并在黑河下戒严令。

许兰洲针对毕桂芳的号电，于6月27日通电揭露毕桂芳、英顺、巴英额都是旗籍，有宗社党的嫌疑，并发布对英、巴的讨伐令。于是，黑龙江省出现了两种势力对峙的局面。拥护毕桂芳的英、巴两旅占领了呼兰到海伦一线，宣称“静候中央解决”，许兰洲以省城为垒相对峙，但无力量派兵出击。

毕桂芳6月29日，回到北京，想求助于北京政府，此时北京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无力干预地方之事。北京政府对于黑龙江省督军后任犹未任命之际，忽于7月1日，张勋拥清逊帝登台，演出复辟帝制丑剧。许兰洲于7月2日得张勋通电实行复辟，许兰洲立即拍电奏贺，一面令行警察厅长杨云峰

（许的爪牙）通令商民各户悬挂龙旗两日并改用宣统年号。清逊帝上台滥肆封赏，委派官吏，许兰洲获任江省巡抚，得意一时，泰然自得地认为“我事成矣”！但许兰洲不谙政治，对如何应付当时局面显得笨拙，便电询张作霖，要联合起来拥护复辟帝制。然而狡黠的张作霖迟迟不予表明态度。未几复辟丑剧在举国声讨中失败，帝制余孽、跋扈军人许兰洲为开脱己罪，又亟电飞驰表示拥护共和，称："国事纠纷，统一为亟似，宜即请副总统宣布中外，按照约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请段芝老仍行担任国务总理，速行组织政府，统一全国安定人心，鄙见如此，计荷赞同。何其颜厚！许兰洲同各地军阀同声痛骂张勋是复辟的罪魁祸首，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费尽了心机，又以赞成复辟之罪名加在英、巴身上为自己洗刷。此时许兰洲在江省将地方现款掘罗殆尽，饱于私囊。广信公司按日发行伪币（监理官不盖印）若干万吊，节济军费，其糜乱地方涂炭人民，莫此为甚。江省人民无不欲食其肉寝其皮，大有许兰洲一日不去，江省遂无宁日之势。这正是英、巴再次攻击许兰洲的口实。

许兰洲在江省的种种劣迹引起众怒。国民公会宣布许兰洲罪状。历数许信任群小，去岁逐朱自代未果，本应收敛，竭尽军人之天职，保卫地方治安，许反以兵权在握故技重演，迫毕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后又逼其让权，又滥发纸币以饱私囊。深恐地位难保，许兰洲复强迫无业游民捏造24县公民名义电请政府保伊为督军省长。唐季之藩镇窃据亦不过如斯，若长此以往纷纷效尤尚复成何国家！故江省公民会决不承认许兰洲为江省督军兼省长，请求中央将许调离江省。仍令毕督返江省或另简适当贤员收拾时局镇慑人心，并于督军未到以先，由公民团推英顺为保安司令维持地方治安。

许兰洲这次驱逐毕桂芳出江省，是张作霖通过许的参谋长李景林策动的。张作霖待北京政局稍微安定下来后，即派其亲信、

旅长孙烈臣赴黑龙江省，表面上是调停英、巴与许兰洲之争，实为观察各方动静。孙烈臣先到呼兰与英顺晤面（他与英顺是东三省讲武堂同学），双方谈得很融洽。孙烈臣临别时，英顺送给孙一辆双套马车，求其在张作霖面前多多美言，并表示一切唯张命是从。尔后，孙烈臣又到齐齐哈尔与许兰洲谋面。许与张作霖早有勾结，更表示“唯雨帅之命是从”。孙烈臣于7月中旬返回奉天，把上述情形向张作霖一一报告。张作霖立即电告北京政府段祺瑞，保荐他的儿女亲家、中央陆军讲武堂堂长鲍贵卿接任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段祺瑞很快复电同意张作霖的保荐。鲍贵卿于8月13日接任视事。鲍在离京时，北京政府将调许兰洲为将军府参军的命令交给他，让其到任后，根据形势再行发表。鲍贵卿赴任途经奉天与张作霖相见，张保证其顺利到任。鲍于8月20就职。鲍贵卿上任后，许兰洲仍与英、巴对立。许部参谋长李景林和师长任国栋主战。英、巴手下人数虽与许兰洲旗鼓相当，但绝非许的对手。鲍见状未敢发表北京政府调动许兰洲的命令。鲍本意打算叫许兰洲离开黑龙江省。因为许是军务帮办，又是师长，地位较高，曾驱逐过江省几任长官，鲍也感到棘手，不知如何办理是好，于是请来熟悉黑龙江省军政情况的刘德权相商。刘德权从中斡旋，劝许兰洲对英、巴不要开火，糜烂地方。许本来不太主战，刘德权又当面劝说李景林、任国栋息兵罢战。任、李二人表示“帮办既不主战，我们无异议”。许兰洲与英、巴对立，经刘德权奔走斡旋而告平息。但许兰洲对鲍贵卿来黑省就任督军仍是耿耿于怀，他不听鲍贵卿的命令，甚至拿出以前对待朱庆澜、毕桂芳的手段来对待鲍贵卿。但鲍贵卿同朱庆澜、毕桂芳不同，他既有张作霖为其后盾，而鲍氏本人与北洋派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许兰洲不敢轻举妄动，不得已改变手法，用软的一招来保住师长位置。

黑龙江省伪督许兰洲附逆有据，北京政府才简任鲍贵卿前往

接充。鲍系一庸懦无能之徒，诸事全仗其参谋张恕为之主动。抵江省后，许氏先贿张大洋6万元，张即为之出力保全其旧日之师长，鲍贵卿亦即听从之。张恕字允孚，军事学颇优，惟性饕贪婪，一抵江省居然吞许氏6万赃款。对鲍曰："许兰洲连逐军长固属罪有应得，然英、巴方面以旅长不受上官之命，亦非善类，今若去许之后，英、巴倘以武力要挟督军将奈之何，不如许仍充师长，以抵英、巴为愈也。"鲍氏竟为此说所动，极为赞成，尚不敢发表，恐英、巴方面再起风波。但张恕恃英、巴有师生之谊来哈尔滨说项。英、巴前来哈迎接鲍督恐江省大局不易解决，故留哈以听消息。英、巴二人以堂堂正正之语力相反诘，张恕反无词以应，垂头丧气而返。当张恕赴哈之日，许之私党张奎武即对许说："师长据守师部万不可交待，盖张氏此行决不能成功，其故因英、巴方面与师长已为不两立之势，今师长依然无恙，彼等又焉能甘心，为今之计，只可以硬取不可以软降，师长部下兵力过于单薄，不足以抵英巴，现在扎兰屯一带有蒙匪1000余人，师长派人前往收降，既收为己用以抗英巴，对鲍督也有话说。许氏从其计，将此地蒙匪尽行收抚调入江省，名曰"痛边匪患"，实在明以抵英巴，暗以制鲍氏也。许兰洲开始派人暗地里监视鲍氏之行动，凡交通机关，如邮电等局均派人把守，不准鲍氏自由拍发函电。鲍贵卿失去自由，纯系姑息养奸，咎由自取。鲍贵卿应了段祺瑞"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告诫，段祺瑞指示鲍到江省后，许兰洲若不肯交待，即诉诸武力，万勿稍存姑息之心以酿乱。结果鲍听张恕之言致许氏借口得据师部而反抗中央。

当鲍贵卿留许兰洲为师长电致中央时，中央极不以为然，以许之逐督军仍留其在江省必不免于捣乱，江省将永无安宁之日，正拟复电申斥，忽又接鲍贵卿电，称许兰洲在广信公司支取大洋30万元，应准其作正式开销，中央接斯电遂大为震怒，当即复电严行驳斥。江省公民联名赴国务院呈控许兰洲勒逼广信公司滥

发纸币以祸江省。于是中央遂调许兰洲来京予以参军之任。许兰洲先接鲍督受政府申斥之电，继接中央调任之命令，愤极遂于8月29日召集其军官会议，一致赞成反抗而戒严令下矣！鲍贵卿在软禁之中。

黑龙江省岌危已成不可遮掩之事实，鲍致电府院详陈黑省现状仍极可危。许、英、巴三军仍在交战，彼此恶感较前尤深，尚无正当之解决办法，日内必酿成巨大之祸患，特拟恳请总统、总理设法将许兰洲调京，所遗师长由骑兵第4旅旅长英顺、第1师第1旅旅长巴英额两者择一任命，或令许氏率其所部军队脱离黑境，再调其他部队来黑屯驻，以期黑省得免战祸而救商民。

许兰洲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对北京政府下令停战、调奉天任职均无意见。北京政府决定以许兰洲所辖骑兵5营及步兵3营移驻奉天，置张作霖麾下，并给许将军府参军衔。9月23日，在黑省兴风作浪多年的许兰洲迫不得已，率部开到西丰县驻扎。许兰洲到奉天后，由刘德权陪同拜会了张作霖，张氏身着马褂来迎，并先开口说："我对不起大哥，未能帮大哥的忙，因为我的队伍看着28师，腾不下手来，请你原谅。"彼此客气了一番。从此许兰洲便作了张作霖的部属，被任为奉天东路剿匪总司令。同年12月，北京政府任命许兰洲为中央讲武堂的副官长，其不就仍驻防西丰。许兰洲于黑龙江省多年，在军政界多次兴风作浪，对宋小濂、毕桂芳、朱庆澜等历任之督军、将军进行压迫排斥，肆无忌惮。不期逐人者，人恒逐之，英巴作难，许氏败衄，结局为张作霖氏收渔翁之利。

张作霖不但要掌握东三省的军政大权，而且要把他的势力伸向关内。1918年2月，张作霖趁北京政府冯国璋与段祺瑞新的府院之争之际勾结皖系，将奉军一部开入关内，分驻秦皇岛与乐亭，继之奉军又源源入关。许兰洲受命李景林第1旅之一部由西丰开到奉天，驻防东山嘴子一带，整装待发。1918年3月25日，张作霖

发表通电，声称："西南假和议，已明令申讨，凡我国民同仇敌忾，况我自属军人，责无旁贷，即派人赴滦州预备节节推进。"张作霖以武力统一南北为目，达到发展奉系势力为目的，遂派兵进关南征。许兰洲任奉军第1支队长，出动于陕西，又任援陕军司令，拟逐陕督陈树藩而继其后。是时，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倡导和平统一为名，压制以段为首的皖系，阻止奉军入关及其势力的发展。张作霖为扩充地盘大事厚援，进取结果，行见有成，但不料张作霖与曹锟曾有过默契，陕西划为直系势力范围，而以师长阎相文督陕，奉系势力难以入陕，陕督一席更不能实现。许兰洲亲为之炊，而供他人之食。其当时，愤愤不平可想而知。且此外更有不顺者，其支队长位置亦让与部下李景林，个人回到奉天。

1920年12月，北京政府任命许兰洲替代张作相任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因为别无建树，不久辞职，转任巡阅使署高等顾问之闲职。1921年，张作霖以蒙疆经略使头衔，攫得热、察、绥3区。当时曾拟绥远都统畀许氏，后亦未实现而罢。同年11月6日，许兰洲受张作霖之命，任黑、吉两省剿匪总司令，在奉天成立司令部，常荫槐为参谋长，率军在昌图以北直至哈尔滨一带进行剿匪。

1922年4月，第1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分东西两路入关作战。许兰洲为镇威军骑兵司令，常荫槐为参谋长，率张荣的奉军骑兵第1旅，张奎武的黑龙江骑兵第2旅和王永清的巡阅使署卫队骑兵团及所属独立团机关枪连3部组成，共约五六千人马。许兰洲骑兵为东路军第3梯队的左翼，在天津静海、马厂附近集结后，于4月27日下午出击，经文安、任邱、高阳向保定及西南方向进攻，直插直军的侧背。与直军交战中，许部张奎武旅在姚马渡一带，打退直军的进攻，占领子牙河的右岸，但由于西路军张景惠厌战溃败，影响东路军第

2、3两梯队的战斗，最后也全部溃退下来。撤退中，许兰洲部骑兵误入沼泽之地，不易展开，因而受到直军的四面包围。许兰洲"不长于骑兵，亦不谙骑兵之作用"。常荫槐亦系不晓军务之人。奉军总部原计划利用骑兵绕出敌军战线，或绕其侧面，或扰其后路，而许兰洲"乃用为正面作战，大城白洋桥一役，直将骑兵作成无用之物"，结果奉军骑兵一败涂地。许兰洲同常荫槐只身逃回关外。许部骑兵只有王永清团在撤退中保持完整建制，其余多为溃散。

第一次直奉大战，以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张作霖退守关外后，鉴于绿林出身的奉军素质太差，决心整军经武以雪战败之耻，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训练总监，姜登选、韩麟春副之，张学良为参谋长，许兰洲为顾问。许兰洲于直奉战后，开始从事经商活动。1923年，曾投资于盐业，组织康济恒商运事务所，任董事。

1924年9月1日，江、浙发生齐卢之战。张作霖于9月4日，通电支持卢永祥，并声明奉军因受直军压迫而开战。奉军仍称镇威军，作了战争前的准备和部署。奉军组成6个军，许兰洲任第6军军长，辖穆春、于芷山、王永清3个骑兵旅，协同2、4军攻取朝阳、赤峰，出建平、平泉之线，威胁直军侧背。奉军经过整顿，素质有了改变，战斗力大为提高，数量也超过直军，特别是直军内部冯玉祥前线倒戈回师北京，使直系曹、吴遭到惨败，奉军取得胜利。1925年，许兰洲兼任井陉煤矿督办。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举兵倒戈反奉。郭起兵第2天，李景林的老上司许兰洲从包头回沈阳路过天津，张作霖叫他乘便拉李一把，李表示决不与郭采取一致行动，李景林也因母在奉为质，遂决定不附郭反奉。郭松龄反奉联盟遂告吹，因此后路不保，兵源不足，战败致死。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许兰洲任大

元帅府侍从武官。1928年1月，蒋介石在取得日本的谅解，特别是得到美国支持之后，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攻张作霖。同年4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组成1、2、3、4集团军，对张作霖发起了攻击。张作霖于5月9日发出“息争议和”的通电，但无结果，旋通电退出北京。在离京前（6月1日）张作霖令许兰洲将“安国军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外交部的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关外。6月4日晨，皇姑屯血案发生后，张学良继其父业执政东北，许兰洲寓居北京，从此脱离军政界。其间一度出任北京卐字会会长、河北省国术馆馆长等职务。1951年1月14日凌晨，许兰洲因心肌梗塞而死于北京，终年79岁。

鲍 贵 卿

陈志新

鲍贵卿，辽宁省海城县人。原系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后因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转而成为奉系军阀中的重要成员。曾先后出任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督军兼长。1921年后，出任梁士诒内阁陆军总长。1928年后旅居天津，过着寓公生活。1934年在北京病故，终年六十七岁。因其善于敛财，人送外号称“钱褡子”，是北洋武备派中由军阀到财阀的典型。

鲍贵卿字霆九，清同治六年（ 1867年 ）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 今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西安乡小洼村 ）的一个贫苦农家。鲍贵卿先世居山东省牟平县，后迫于生计，逃荒到东北海城落户，垦荒种地 ，世代业农 。其父鲍永宽（又名见喜）是个木匠，生子五人，鲍贵卿为季 。鲍父母早亡 ，自幼孤苦失学；稍长，在七家子村、八家子村一带放猪，“伏处陇亩间，慨然有自立之志”。

鲍贵卿幼失怙恃，赖有贤兄嫂精心照料，稍得家庭温暖，不至孤苦零丁。因他天资机敏备受兄嫂喜爱，遂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鲍学习上进，启蒙书籍《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皆能背诵如流。兄嫂见状格外痛爱，企冀他能读书成名，出人头地，改换门楣。

大洼县地处辽河下游入海处，地势低洼，芦苇丛生，本地百姓多以打苇编席弥补农业收成之不足。鲍贵卿几位嫂嫂都在家中编席。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春，一天鲍贵卿的嫂嫂让他去卖苇席。他卖席得钱，在归家途中经过赌场，想侥幸发财免得嫂嫂辛苦劳累，不料时运不佳，须臾间竟把卖席所得输个精光。鲍两手空空，无精打采地回到家中，遭到兄嫂的责备，一气之下走出家门，并发誓不戴红顶子永不还乡。

鲍贵卿一时负气出走，徒步来到山海关，投到淮军正定练军总兵叶志超麾下。由于他学习勤奋，做事认真，深为叶志超器重。叶便把自己贴身丫头许配给鲍贵卿，这就是鲍的结发妻子。不久，叶志超又送鲍贵卿入榆关随营武备学堂工兵科学习。时王士珍、卢永祥、田中玉、张辛朔等都是鲍先后期同学，后来皆成了高级将领。其后，鲍贵卿又转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已有毕业生280人，这些毕业生中，有被称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曹锟、田中玉等，以及幼年班的魏宗翰、陆锦等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袁世凯新建陆军的骨干，其中有些人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物，形成号称“北洋武备派”的政治集团，鲍贵卿也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鲍贵卿从武备学堂毕业，拔充驻榆关正定练军炮兵哨长。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清政府应朝鲜国王之邀请，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起义，鲍贵卿等一批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随直隶提督叶志超开赴朝鲜，驻牙山。七月，日军进犯驻牙山的清军驻地，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叶志超畏敌如虎，败逃牙山，绕道平壤，谎报战功邀赏，被李鸿章任命为驻平壤清军总指挥。后在平壤保卫战中，叶志超再度弃城先期逃跑，狂奔500余里回到辽东。叶志超临阵脱逃受到丢官入狱的惩处。张勋、姜桂题、田中玉、鲍贵卿等也被视为甲午败军之将，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

罚。

甲午战后，袁世凯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1895年12月21日）奉命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新建陆军以淮军将领胡燏棻的定武军为基础，因此新建陆军中的各级军官大都来自淮军，同时也从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中选拔一批人才。在推荐的毕业生中除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著名将领外，对被革职永不叙用的甲午败将——鲍贵卿、田中玉、孟恩远等也委以重任。其中鲍贵卿被派到天津小站，任工程营队官。鲍在军中很快以才武见称，工程营主将王士珍、段祺瑞谓其"忠勤略异于侪辈"，从此鲍贵卿与王士珍、段祺瑞结下僚属的亲密关系。鲍出身寒微，但在军界中却平步青云，屡屡升迁，靠的就是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的殊遇。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袁世凯出卖维新派人士，由此受到荣禄的赏识，同时也得到西太后的青睐。袁世凯秉承西太后和荣禄的旨意，把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加紧训练，以增强实力。翌年组成了拱卫京师的武卫左、右、前、后、中五大军。六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左侍郎，仍统率武卫右军。鲍贵卿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在武卫右军充当左翼管带（营长），驻防天津小站。同年，山东地区兴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猛发展。十二月六日，清廷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武卫右军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全部开赴山东，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屠杀和镇压。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袁世凯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奏请北洋营制饷章，先练常备军左右二镇（镇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师）。从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年至1904年），在保定进行了"北洋常备军"的建设。清光绪二十八年初（1902年）鲍贵卿随王英楷、王士珍等赴直隶正定、大名、广平、赵州选募6000人在保定进行训练，于翌年七月（1903年8月）编齐，号称"北洋常备军左

镇”。当时鲍贵卿任该镇左翼步队第二营营长。清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左右两镇改称第一、二镇，鲍贵卿升任第一镇步队第四标统带，尽先游击。到清光绪三十年七月（1904年8月）北洋第一镇改为陆军第二镇，鲍贵卿升任该镇第四协协统（协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旅），驻防直隶迁安一带。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鲍贵卿衣锦还乡省亲，勘视坟地路过新民府，与幼年朋友——受抚后升充五营统领官的张作霖邂逅相遇，备感亲切，并下榻于张家，逗留数日而别。鲍贵卿和张作霖是同乡，曾对门而居，过从甚密。张年幼时因其母奶水不足常吃鲍母奶水，鲍母对张作霖有哺育之恩。为此张欲将长女首芳（冠英）许给鲍贵卿的长子为妻，鲍以长子已聘婉言谢绝，张又缠着将首芳许给比其小四岁的鲍的次子英麟为媳，盛情难却，鲍氏勉强应允。张作霖名为报恩，实为巴结北洋系，此成为张作霖与北洋系发生关系的契机。

鲍贵卿荣归故里，祭祀祖宗大会宾客于小洼村。一时间小洼村车水马龙好不热闹。鲍贵卿还请来风水先生为其父鲍永宽测看坟地。这些阴阳先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胡说什么鲍父茔地同张作霖父亲张有财茔地同在一条龙脉上（张有财坟地在桑林子）其家将来必出得第之人。鲍贵卿思想守旧、迷信，于是便在桑林子为父选择一块茔地，历时两年修建竣工。鲍贵卿回防时将侄儿鲍毓麟带回任上，教他习文练武，为毓麟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清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3月）鲍贵卿晋升陆军少将，清廷赏给鲍贵卿陆军协都统衔。鲍贵卿防地由迁安移驻保定。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速派北洋军精锐赴鄂与革命军作战。时陆军第二镇统领官马龙标免职，由该镇第三协统官王占元升任，鲍贵卿仍属第二镇。1912年1月26日，鲍贵卿与清军将领段祺瑞、姜桂题、段芝贵等50余人联名电请清帝退位，清廷无兵可用，乃于2月12日宣布退位 。秋 ，新建陆军镇协改为

师、旅制，鲍贵卿任王占元之第二师第四旅旅长。此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闹学潮，陆军部调集驻保定的鲍贵卿部包围学校，强行解散学生。王占元又以保定警备司令官的身份指责军校学生扰乱地方进行弹压。后来由国会议员和各省军事代表出面调停和干预，陆军部才不得不宣布再行开学。1913年2月，鲍贵卿获二等文虎章。6月，鲍贵卿加陆军中将衔。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李烈钧于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袁世凯派段芝贵为陆军第二军军长，鲍贵卿第四旅隶属之。鲍随队赴江西、安徽两地进行镇压革命。同年7月31日，鲍贵卿授勋五位。

二次革命失败后，8月，鲍贵卿隶属倪嗣冲部下，任安徽芜湖大同司令官。同年9月，任芜湖镇守使（又称大同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1914年春，白朗起义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连破数城。同年8月，义军转战河南、安徽等省。鲍贵卿奉命堵截义军出力不小，得到袁世凯的嘉奖。

1915年7月，鲍贵卿获二等嘉禾章。8月，大同芜湖镇守使官制废止，鲍为皖督倪嗣冲所忌，不安于位，遂解兵权内调进京，另候任用。旋出任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10月，鲍贵卿晋升陆军中将，免去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袁世凯称帝，大封文武百官，鲍贵卿被封为“一等男爵”。1916年10月获二等嘉禾章，11月获三等宝光嘉禾章。

1917年6月，黑龙江省陆军第一师师长兼黑省军务督办许兰洲，乘张勋复辟北京混乱之机，伙同黑龙江省的两个旅长英顺和巴英额预谋逼走黑省督军毕桂芳取而代之。许答应事成之后以师长位相许。毕桂芳解职后，许兰洲竟一反常态背信前约。为此，英顺、巴英额大为不满，乃起兵通电反对之，不承认许兰洲为督军。其间，北京政府正因解散国会、督军团叛变等事忙得焦头烂额而无暇顾及，遂给张作霖乘虚而入扩张自己的势力造成有利时

机。张趁黑龙江省局势混乱之时，先派其亲信孙烈臣赴黑省观察动静，对交恶的英顺、巴英额和许兰洲各方进行游说，最后混战双方都表示唯两帅之马首是瞻，张即刻发电报给北京政府段祺瑞，推荐他的儿女亲家、北京陆军讲武堂堂长鲍贵卿为黑龙江省督军。段祺瑞很快回电批准，这是因为段也想利用鲍贵卿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1917年7月26日，鲍贵卿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暂行兼署省长。27日，鲍贵卿加陆军上将衔。10月，获二等宝光嘉禾章。鲍贵卿出任黑龙江省督军兼长，为张作霖称霸东三省奠定了基础。从此，鲍贵卿便成为奉系军阀中的一员。

1917年8月，鲍贵卿北上黑龙江省赴任，路经奉天会见了张作霖，两人就治理黑省问题交换了意见。张作霖表示一定保证鲍贵卿顺利到任。鲍贵卿于8月20日抵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举行了盛大的督军就职仪式。因此又引起一心想攫取黑省督军宝座的许兰洲的不满。他不听鲍贵卿的命令，甚至又使出以前对待朱庆澜、毕桂芳的伎俩来。但鲍贵卿与前任朱庆澜、毕桂芳不同，鲍既有张作霖做为后台，又与北洋派有很深的渊源。许兰洲这次的算盘打错了。鲍同张作霖多次磋商，决定于1917年9月22日，把扰乱黑龙江省的最大隐患许兰洲及其所属骑兵五营、步兵三营与驻扎在西丰一带的奉军对调，由张鸣九率领4个骑兵营星夜驰赴黑龙江省，作为鲍贵卿的亲兵卫队。同时，再从奉天募兵十营，以张鸣九为旅长，增强鲍的实力。许兰洲虽走，黑省尚有以英顺、巴英额为首的小军阀，煽动军界反对奉军入境，并调动军队向鲍贵卿示威。英顺、巴英额的军队有二十营离开防地向省城集中。英顺要求鲍晋升巴英额为师长，他自己兼任镇守使，下属的各团长皆要提升为旅长，并要鲍贵卿立即发表。形势十分紧张，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鲍贵卿的地位岌岌可危。出于无奈，鲍表面答应，暗中却下决心欲除掉英顺和巴英额，但感到目前自己所掌握的军队仅有十营，兵力单薄，不是英、巴的对手，

乃密电张作霖派兵援助。

张作霖接到急报后，以剿匪为名，令吴俊升率二十九师一部北上进行武装调停，并电告张鸣九和张奎武：在二十九师到达之前，"省城与鲍督军倘有差错，唯你二人是问，叫你俩提头来见"。张作霖本想采取武力干涉，铲除祸根，然而为了争取主动，故先礼后兵。他首先对英顺、巴英额极力恳切相谕，劝其同原防地驻守，英、巴却置之不理。于是张作霖以北京政府名义，褫夺了英顺的陆军少将军衔，并将其与巴英额一起免职。至此，黑省骚乱彻底平定。黑龙江省小军阀间互争既息，从此军政大权归鲍一人掌握。这样，张作霖假鲍之手间接地把黑龙江攫为己有，奠定了统一东三省的基础。

黑省政争甫告平息，鲍贵卿为近数月来军队保卫地面不为无功，破江省军队向有定例寻常不许看戏之规，为士兵演戏。故于9月24日将齐齐哈尔市南北两大戏院包妥，令其合演，令各士兵看戏四天，以示慰劳。

1918年2月，因中东路事件成立了黑龙江省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督军公署参谋长张焕相兼任总司令。3月6日，"督军鲍贵卿规复旧制，改编混成旅四旅，骑兵旅二旅，又裁混成两旅改混成团二团，炮兵、宪兵各一营，机关枪一连，直隶督军。另编第十九混成旅，直隶中央，由督军兼代"。黑龙江省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为李庆禄，第二混成旅旅长为张鸣九，黑龙江省陆军骑兵第一混成旅旅长为袁庆恩，骑兵第二混成旅旅长为张奎武，吴士杰为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李梦庚为第二混成团团长，拟报陆军部。7月，北京政府发表任命状。为巩固鲍贵卿在黑龙江省的地位，在鲍贵卿赴任黑龙江的同时，张作霖由奉天派出一批军政大员随鲍同时到达黑龙江省。他们是前奉天财政厅长、现任龙江道尹王树翰，前奉天巡防帮统、现任旅长张鸣九，前营口渔业公司总办、现任省军署参谋长的张焕相，现任军署高等顾问的马瑞

禄，前营口警察厅厅长、现任省步兵团团长李荣九，此外由奉赴江省任各机关要差及各县知事等人不及备述，可见张作霖为控制黑龙江省费尽了心机。9月22日，“鲍贵卿电报陆军部，拟设立国防筹备处，由张焕相兼任处长，中东路与黑河警备司令部应办事项一切军事外交事宜悉交该处核办”。10月19日，鲍贵卿兼任滨黑（哈尔滨至黑河间）铁路督办，授勋四位。

鲍贵卿初掌黑龙江省军政大权，棘手之事到处可见。据探报，索伦县知事范振之被蒙匪绑赴索伦山，该县局员眷属也掠走多人。鲍以蒙匪猖獗殊于边防有碍，特任韩建甫为征剿蒙匪总司令，统率陆步、骑十营，尅日进剿，无论何处军队均由韩总司令指挥。同时在省城特令军警届时戒严密防蒙匪潜迹来江。征剿蒙匪费用已见支绌，鲍先由广信公司借用巨款发给征蒙军需备用，并派人送到索伦山。在派兵围剿蒙匪的同时还令各蒙旗速派兵力兜剿，务期早日荡平以除边患。鲍贵卿的努力并未完全遏止匪患。大股蒙匪分作数支由索伦山等地窜了出来，兼程而进，距省城仅百余里，姿意焚掠，所到之处皆为墟。

黑省匪患如此嚣张，鲍贵卿仍以匪患不足虑，兵乱不足畏，其唯一紧要问题为财政。自许兰洲逐走毕桂芳，英、巴逐许以来，内有许兰洲滥动公款挟制银行，外有英巴截留赋税、把持税局，不数月间以致省库款一空如洗，亏空百万之巨。鲍抵任后虽竭力收拾，均收效甚微，乃致市面金融滞涩，军政两费压至三阅月之久，月支来奉告贷，奉省亦同一空虚。最后电请中央拨款2万元以救燃眉之需，否则拟将印花税烟酒税二项借用以资通融。江省财政奇绌已达极点，财政厅对广信公司旧欠巨额1000万元不计外，因政变需款过户又欠广信公司120余万元，欠中国银行80余万元，业已三个月未发政费，各机关纷纷赴厅催索中央，中央又迭次严催立解之款，结果是旧欠既偿还乏术，新债又日益增加，江省财政之困窘已达极点。财政部催请黑省省长宜速行设

法归还前欠以清款目。鲍贵卿为解决财政上燃眉之需严追税款。鲍贵卿与财政厅长王丕煦交恶。现因军费需款至极，王又无法应付，鲍即将财政大权自握。特令财政厅将各县局欠解税款若干及某税局逐月未解之款开单送交省署，鲍贵卿直接照章催解。并由省署派人守提以重公款。前肇州税局长刘凤翔、青山税局长宋春海亏欠巨款，已由鲍贵卿直接押追，刘、宋二人已下陆军监狱，鲍还命财政厅长将全部宗卷送交军法课照案审讯，鲍此举大有效尤张作霖枪毙刘鸣岐以示振作之势。如刘、宋不将此款交清，拟以军法从事。前省城缴收局长陈桂山以税局存款私开天丰泰钱庄专事倒把，而后天丰泰又倒闭，柜伙全体潜逃，亏欠税款数十万吊。据查陈已回籍，鲍贵卿即令绥化县将陈桂山押解来省。又龙门县知事于文清亏欠荒价甚巨，数年未缴，鲍亦拟提案押追，无款呈缴者不能不了了之。

鲍贵卿自莅任以来，筹划江省各项政治不遗余力，拟定治理江省的政策有十：①甄别各县知事；②停止再发纸币；③改良银元本位；④劝商兴办矿务；⑤提倡重用国货；⑥视查一切教育；⑦通令添加警备；⑧恢复各县自治；⑨重申禁烟公令；⑩痛剿各县胡匪。拟定的治理江省十项政策还仅仅是纸上谈兵，若照章执行谈何容易，鲍氏行之维艰。

正当鲍贵卿受命积极准备收回中东路权时，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和省长郭宗熙于1919年1月22日“致电鲍督，建议趁中东路共管协议尚未签订之机，在铁路沿线厚集兵力，以争夺该路管理权”。3月1日，“鲍贵卿电告郭宗熙被扣留在昂昂溪站的俄人所招华工已返回哈尔滨，俄人又续招华工1500人。3日，郭宗熙密电各道县查禁”。5月5日，黑龙江省省长鲍贵卿下令，趁“羌帖”贬值之际，在沿边地区推行国币，并以其作为税捐货币，为收回中东路权作准备。

张作霖控制黑龙江省后，在穷兵黩武的同时，对江省人民进

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黑龙江省前几任行政长官都是武人专政，个个贪婪成性。鲍贵卿就任黑省督军兼长近2年时间，老百姓便称他是“鲍钱褡子”。鲍贵卿公开采用“招标”的办法卖官鬻爵，谁出钱多就把县长、警察局长卖给谁。他为发财年年办寿，还规定不收寿桃、寿果之类的东西，只要现钱。鲍在黑省搜刮别出心裁，巧立名目，他曾借用北京政府参加欧战的名义，于1918年11月25日“发起并组织欧战协会中国黑龙江省筹备部，并要求各界捐款集资”，以中饱私囊。鲍还曾于1919年4月12日，代表北京政府财政部出面与日商朝鲜银行签订借款500万日元合同，以1919年国内公债券为担保，款中450万日元归部，其余归黑省使用，从中得到好处。鲍贵卿在黑龙江省督军任上，大肆进行名目繁多的搜刮和盘剥，引起江省民众的强烈反抗。1918年10月，黑龙江省海伦县掀起抗阻车捐风潮，7000余名农民进城，联名上书鲍贵卿，请求减免车捐。

鲍贵卿出任黑龙江省督军兼长后，张作霖的势力也随之扩大到了黑龙江省。此时，张作霖囊括吉林省的欲望尚未如愿以偿，其障碍就是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孟是直系亲信，与北洋关系也很密切，他在吉林经营多年，对张作霖染指吉林根本不买账。早在1917年，张作霖借孟参加张勋复辟失败之际，就曾发起夺取吉林军政大权的攻势。但由于孟恩远在吉林任职多年，为人宽厚，加之北京政府段祺瑞还不想让张的势力发展得过大，所以孟得以继续留任吉林。

1918年9月7日，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于是再次向吉林夺权。1919年6月，张作霖首先唆使吉林公民何守仁等分别向国务院及东三省巡阅使署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扰乱金融，列举八大罪状。同时派代表赴京赴奉，恳请罢黜孟恩远，保举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其次，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名义，一面直接给大总统徐世昌去电，控告孟恩远在吉林财政失当，滥支军费，坐

视胡匪滋扰；一面发函给孟恩远本人，暗示他辞职。本来孟恩远和吉林省长郭宗熙已再三受到省民的弹劾，进而又受到张作霖的胁迫，无奈引咎自责，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7月，北京政府给孟恩远一个有名无实的"惠威将军"头衔，令其立即来京供职，同时特任鲍贵卿为吉林督军。

北京政府没有把张作霖的亲信、奉系色彩浓厚的孙烈臣任命为吉林督军，是为了避免吉林军民的强烈反对；而把虽为张作霖的老朋友、儿女亲家但奉系色彩比较淡薄、态度比较温和的鲍贵卿调往吉林，把孙烈臣安插到黑龙江省，是想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既缓和矛盾，又可讨好张作霖。但北京政府用心良苦的"易督令"，却遭到孟恩远及其部下的坚决抵制。张作霖见吉林孟恩远的军队决心对抗，遂增调奉军进入吉林境内，准备武力讨伐之。这时孟恩远致函鲍贵卿，请他在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不久，鲍贵卿给孟恩远回复说："咱们都是小站练兵起来的兄弟，论情当然可以保持中立，但奉张势力雄厚，倘战端一开，稍有疏忽，恐难获胜。以我愚见，不如息战为佳。"孟恩远接到这封信后，踌躇不决。

正当吉奉两军对峙时，7月19日，驻长春日军守备队奉命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以向北京政府示威，暗中支持张作霖夺取吉林军政大权，迫使孟恩远去职。亲日派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接到消息后，惊恐万状，为了明确责任，于7月25日发布命令，严厉指责当事者孟恩远，革除吉林陆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职务，令鲍贵卿立即去吉林处理善后。

孟恩远接到北京政府的训电后，见大势已去，心情沮丧，感到留任绝无可能，遂致函鲍贵卿，顺水推舟，讨个空头人情。他在信中说："如果我兄命驾前来接我职务，我即愿息战相让，倘不如此，只有兵戎相见，难计其他。"鲍贵卿"当时唯奉张马首是瞻，不敢擅专，即将此信交给张作霖"。张见孟恩远已决心下

台，也不再紧逼，孟恩远给齐齐哈尔发电，促鲍贵卿火速赴吉林就职。

鲍贵卿于8月初，率卫队两营抵达长春，与孟恩远谋面。鲍贵卿保证孟恩远及其属下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鲍的许诺对于孟的退让起到了促进作用。孟恩远、高士傧率部撤出吉林，张作霖也下令停止军事行动。8月5日晨，孟恩远和鲍贵卿同车进入吉林，交换了督军印绶。东三省终于避免了一场伏尸流血的大战，张作霖完全控制了东三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三省巡阅使，实现了梦寐以求主政东北的愿望。

鲍贵卿在与孟恩远交接时，给孟以很大关照，对其在吉林的一切财产权益，毫无条件地加以保护，以致后来孟对鲍的感情很好，常有往还。后来鲍贵卿卸任隐居津门时，手头拮据，孟恩远曾慷慨解囊相助，在富翁中传为美谈。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哈尔滨，在哈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展了推翻霍尔瓦特反动政权的斗争，沙俄在中国领土上的殖民统治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滨江县（即现在哈尔滨市道外区）知事经吉林长官的允许，派中国警备队进入当时属于中东路“附属地”的道里巡逻。接着中国增加了在中东路沿线的兵力，吉林、黑龙江两省分别成立了中东路警备司令部及哈尔滨临时警察局，解除了俄国士兵之武装。北京政府遂于1919年8月11日，“派吉督鲍贵卿接替郭宗熙兼任东省铁路公司督办，并兼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6日，鲍督办就职。23日，东省铁路督办兼护路总司令鲍贵卿委任张焕相为总参谋长。24日，鲍贵卿辞去陆军第十九混成旅旅长职，由张焕相继任。29日，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是日启用关防。在此期间，中国取消了中东路公司的“民政处”，设立了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接收了哈尔滨的一些市政机关，悬挂了中国国旗。北京军阀政府在接收帝俄攫取的非法特权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软弱无能，对十月革命后

中东路沿线和哈尔滨出现的动荡局势，束手无策，竟让东三省地方政府去“相机应付”。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未能全部收回，只是拖泥带水地收回了一部分。

1919年10月，鲍贵卿获一等文虎章。同月，徐鼐霖任吉林省省长，原任省长郭宗熙去职。11月，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兼任滨黑铁路督办，原任鲍贵卿辞职。

1920年1月20日，“鲍贵卿致电中东路坐办霍尔瓦特，声明中国对东省铁路享有完全主权，拒绝霍于本月14日发表的对该路俄侨‘实行国家统治权’之通告”。31日，北京交通部密电鲍贵卿，密筹一切，设法以协商或强制手段取代霍尔瓦特，迅速接管东省铁路。2月19日，鲍贵卿与霍尔瓦特订立东省铁路总公司改组办法。25日，新董事会成立，中方增加了3名董事，撤销东省铁路俄国护路军司令部。3月16日，鲍贵卿以中东路护路军司令名义，命令吉林军解除哈埠及铁路沿线沙俄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迫下台。20日，鲍贵卿接收哈埠行政权。是月，鲍贵卿晋授勋三位。4月，霍尔瓦特解职去北京，此后中东路坐办由中国政府派任。4月21日，鲍贵卿向北京政府报告接收中东铁路经过。5月4日，东省铁路督办鲍贵卿改订中东路司法职权，取消中俄会审制度。9日，东省铁路开始使用国币哈洋券。至此，中东铁路主权已被中国接收，沙俄势力已被驱除，这是鲍贵卿在吉督任内做的一件大事。

1920年6月，宋小濂任东省铁路公司督办，张景惠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原任鲍贵卿辞职。

鲍贵卿就任吉林督军后亦积极整饬吉林陆军，将其编成6个混成旅。是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张九卿、胡文灿、诚明、李梦庚、李庆禄、高凤城为吉林陆军第一、二、三、四、五、六混成旅旅长。9月，鲍贵卿兼任吉林省省长，原任徐鼐霖免职，鲍贵卿独揽吉林军政大权。10月，晋授勋二位。

鲍贵卿任吉督兼省长期间，庇护他的侄女婿韩边外的第四代继承人——韩绣堂执掌家业。韩绣堂为了延续他家的势力，在鲍的庇护下，把韩家私兵按陆军形式改编成山林游击队。该队共3个营，韩自任队长，不受县政府节制，直隶督军署。但自其父韩统领去世后，韩家势力一落千丈，毫无声望。大股土匪猖獗，游击队无能为力，官方遂将山林游击队收编改为自卫团，归地方管辖。至此韩家武装力量全部交出，管辖地方的权力完全丧失。韩家的衰落不仅限于失掉武装，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崩溃。韩统领死后，韩家开始败落，大总管江渭清投机倒把，几乎把家产赔尽，负债累累。为了挽回局面，由江渭清和韩统领三姨太出面，向鲍贵卿借了20万元，去了还债所剩无几。爱财如命的鲍贵卿，见韩家没有偿还能力，也看到侄女婿韩绣堂没有支撑门户，使韩家起死回生的希望，就派亲信去代替韩家收租索债，直到“九一八”事变止，每年地租都归鲍贵卿，租粮拉回吉林，韩家分文、颗粒不得。鲍贵卿对至亲尚且如此贪婪攫取，对黎民百姓的残酷搜刮就自不待言了。

1920年10月2日，“日本暗中收买的土匪‘长江好’攻入珲春县城，焚毁日本领事馆。日本旋即大造舆论，并派遣包括三个旅团和几个联队的万余名正规军，侵入大片东满地区”。珲春事起，北京政府和张作霖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电告吉林省长鲍贵卿，指出珲春事件责任全在吉林官宪，把肇事的责任推给鲍贵卿来讨好日本人，并令其抚恤和慰问死难者，设法剿灭土匪。为此，北京政府和张作霖还命令吉督鲍贵卿同日本人谈判，议定珲春会剿八条。这一消息传出后，首先引起吉林人民的强烈反对。是月，延吉公民急电北京政府，称吉督鲍贵卿已与日本人订立条约。鲍贵卿发表声明抵赖，但白纸黑字不容否认。12月21日，“吉督鲍贵卿，吉林官银号与朝鲜银行签订小洋200万元借款合同，以官银号不动产、吉林电灯厂财产及收入为担保，用

于救济市面金融。”1921年1月17日，鲍贵卿向北京政府年关索饷。21日，鲍再次向日本借款，借日本正金银行200万元，以官银号作担保，借期半年，利息五厘，实收九七。为此，遭到吉林省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张作霖的注意。

张作霖自1919年8月撵走孟恩远后，把鲍贵卿由黑龙江省调到吉林，并非本愿。他原想把孙烈臣安置在吉林，让张景惠执掌黑龙江大权，用自己的嫡系统治东三省，以便自由驾驭。调鲍贵卿去吉林不过是权宜之计，是准备一有机会就把鲍贵卿抛开。鲍贵卿任职以来，兼任中东路督办和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一面整饬省内秩序，一面努力收回中东路，建有“殊勋”。但在张作霖看来，鲍自恃有功，开始盛气凌人，在许多问题上，竟至与中央政府直接交涉处理。这虽非越权，但多少损伤了做为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尊严，因而张逐渐对其不满。这次吉林人民反对鲍贵卿，终于成为张作霖除掉鲍贵卿的口实。

鲍贵卿素来好利图财，绰号“贪财家”、“钱褡子”。他任用妻弟王子纲为吉林财政厅长，扰乱金融，中饱私囊。张作霖对此早有所闻，曾要鲍调内弟到大帅府做事，以掩人耳目，却遭其拒绝。张与鲍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鲍贵卿当然亦有所觉察，特别是对张作霖野心勃勃把势力伸向关内，与皖系段祺瑞发生冲突感到最为棘手。鲍贵卿拥护张作霖，但背叛多年恩谊的段祺瑞于心不忍；反对儿女亲家张作霖做皖系内应，既没有足够实力也下不了决心，鲍贵卿夹在中间进退维谷，十分为难，甚至为此患了神经衰弱症。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鲍不得不提出辞呈，暂住天津。鲍满以为张作霖会挽留于他，而张作霖竟没有这样做。

1921年3月12日，北京政府下令：吉林督军兼省长鲍贵卿免本兼职，授“霆威将军”。鲍贵卿“以疾去职养疴津门，前徐大总统三顾公于里第”。鲍贵卿下野后以害病为名蛰居津门，其实是失宠于张作霖而已。

张作霖于1921年12月18日，进京谒见大总统徐世昌，要求改组靳云鹏内阁，重新组阁。徐世昌在张的建议下，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鲍贵卿出任陆军总长。然而，梁在张的支持下组成的新内阁，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强烈反对，竟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在这种情况下，徐世昌为了既见好于张作霖，又能息吴佩孚的雷霆之怒，遂准备罢免梁士诒，拟用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总理组阁，以此消弭战祸。但这样做是否可行，徐世昌还是放心不下，又叫鲍贵卿到奉天与张商量。不料，张作霖果真不买这个帐，沉下脸来对鲍贵卿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张作霖这一闷棍打来，遂使拟议中的鲍内阁胎死腹中。直奉双方终于在1922年4月爆发战争。5月，张作霖战败，退出关外自保，暂不过问关内之事。鲍贵卿亦以病为由请辞，北京政府准假，以陆军次长张绍曾暂代部务。9月，内阁改组，梁内阁正式倒台，鲍贵卿也失去了陆军总长职务。

1923年10月1日，张作霖通电反对北京非法贿选总统。5日，曹锟当上贿选总统。11日，曹锟派鲍贵卿等赴奉谋私。19日，张作霖派张九卿入京，磋商奉直关系。

1924年2月11日，东省铁路公司督办王景春辞职，俞人凤代理督办职务。3月15日，鲍贵卿再任督办。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张作霖打败吴佩孚，奉军再次入关，张把持了北京政权。10月3日，中东铁路依《奉俄协定》改组，华方鲍贵卿等5人任新理事，苏方伊万诺夫等5人即接全路事务。1925年5月19日，中东路董事长鲍贵卿发出通告，宣布该路局长伊万诺夫所发之94号命令无效。23日，苏联政府发言人加拉罕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庇护白俄和帝制派。6月4日，北京政府妥协。9月30日，刘尚清出任东省铁路督办，前任鲍贵卿辞职。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

10月，鲍贵卿就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张作霖掌握北京政权后，踌躇满志，又想起他少年时的朋友鲍贵卿大哥来。1927年冬，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因病出缺，张作霖想请鲍贵卿出山接任，后因某种原因未能实现。但鲍仍被张作霖聘为帅府的顾问。1928年2月，鲍又出任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审计院长，一直活动在张的左右，为其出谋划策，成为股肱之臣。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车退往关外，鲍贵卿随车同行。当专车停在天津车站时，鲍匆忙下车去医院看望出生不久就住院的小儿子，未能与张同行。不料，张作霖回奉专车于6月4日晨驶至奉天皇姑屯三洞桥时，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张作霖被炸身亡，鲍贵卿却幸免于难。后来，鲍贵卿常感慨地说："是我的小儿子救了我这条命。"鲍从此视幼子为掌上明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组织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所谓的"中日纠纷事件"。1932年4月9日，鲍贵卿、吴景濂、王迺斌三位老者以东北旅居平津居民代表身分，同"国联"调查团在天津西湖饭店会晤，表现出爱国爱乡的热情，把意见书直接交给"国联"调查团。

鲍贵卿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学过工程学，尤其对房屋建筑更感兴趣。因此隐居天津时，他的住宅、别墅大都是他自己设计或监工修建的，建筑风格迥然。如他自己设计的天津"鲍家大楼"（今在天津市河北区第一文化宫附近，约150多间房屋），结构别致，室内装潢各具特色。北京西郊的鲍家别墅，建筑在群山之颠，房屋总计60余间，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推窗远眺，京城大观尽收眼底。又如，鲍在北京和平门半壁街的住宅，为张作霖所赠送，庭中太湖山石系圆明园遗物，是冯国璋当总统时送给他的，该宅几经翻新调度，颇有江南特色。

鲍贵卿晚年为其后事做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封建帝王的金鼎

玉葬给他很深影响。鲍的茔地选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占地700多亩，墓园地上地下的建筑都是他亲自设计和监工修筑的。墓园内有牌坊、石雕和石刻，这在军阀的墓园中实属罕见。而地下的墓寝，设计和建筑尤是独具匠心。它的内地成坡形，由门向里升高，下葬时把棺椁安放妥当后，室内事先安放好的足有几吨重的大石球便滚向出口门处，刚好把门堵死，严实合缝，想要通过此门进入墓里真比登天还难。鲍生前虽然费尽心机，可惜在其死后，700多亩墓地相继卖掉。解放前夕，墓被炸开，终没有避免被盗之厄运。

鲍贵卿不仅购筑大量房屋，还占有大量土地。1916年，张作霖强迫开放达尔汉亲王的旗地4000余方（每方45垧），张作霖及其岳母王老太太、鲍贵卿、冯德麟等各分割了千余方。鲍除了天津外，在通辽、开鲁也拥有大量地产。早在1914年，天津仁义地产公司成立，经营地产5000余亩，“均为朝野军阀、官僚、政客以及本埠富商大贾所有”。鲍是该公司大股东，以200余亩土地投资。仁义地产董事会鉴于鲍常居天津，又懂工程技术，且与当时要人过从甚密，遂推他为董事长，欲假其声势。该公司所属土地大多公布在天津南门外炮台庄附近，地势低洼，不宜营造房屋，于是鲍出资8万元成立顺记垫土公司，由解铭臣负责管理业务，用低价买进600多亩碱地，修筑一条轻便小铁路，把碱土运到炮台庄低洼地处垫平，然后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

鲍贵卿在天津南开中学附近有地60余亩，以每亩3000元的价格出售。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想买下这块地做学校操场，但一时又付不出这许多钱。张伯苓去见鲍贵卿，鲍碍于情面，只好半捐半卖，算是兴义学之举。后来南开中学连半价现款也付不出来，最后仅给了5万元算是了帐。在鲍贵卿的一生中，象这样“慷慨”解囊之事实属鲜见。在谈到鲍贵卿为人小气，这里不妨说件小事，足见鲍之一斑了。1924年的某一天，张作霖及其夫人宴请

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夫妇。坐陪的有张大帅的五夫人寿氏的母亲王氏，张的亲家鲍贵卿。时鲍贵卿已在帅府里住了较长的时间。因这些人平素吃腻了山珍海味、鱼翅燕窝，因此张作霖的五夫人寿氏特备一桌丰盛的素菜佳肴来招待吴氏夫妇。宴席四凉十热一汤，色香味美，个个吃得酒足饭饱。推开桌椅来到客厅休息时仍回味无穷。吴夫人吃得高兴当即慷慨解囊拿出200元钱赏给厨师，五夫人的母亲王老太太也忙随礼拿出100元来。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见吴夫人和王老太太都给了钱，便笑着说："今天这桌素菜主要是招待吴大哥和吴大嫂，我是陪客，这钱就免了吧。"张作霖的四太太许夫人嘴巴厉害，笑说道："我说亲家，人家王大姨也是陪客，不常在这吃饭，还给厨师100元呢，你不应当给两个？我代表厨师谢谢鲍大督军了。"张作霖忙过来打圆场："我知道我这位亲家不愿花这钱，我说老鲍，你要心疼我给吧，人家厨师已经道过谢了。"鲍忙说道："雨亭，那我谢谢你了，领你的情还不行吗？"张作霖的二太太卢夫人也说："亲家，这100块大洋花得不合适吧！"吴俊升在一旁也说："鲍老弟，你要开个银行怕也没问题吧！"鲍贵卿忙说："哪里，我和你比可差多了，我的钱还赶不上你一半多呢。"吴也忙说："不对，我哪能和你比，你老兄多会聚财呀！"

鲍贵卿喜欢吃面食，在张帅府居住期间，经常让厨师到小南门外一家烧饼铺买烧饼给他吃。这家烧饼铺的烧饼很出名，品种也全，有发面烧饼、麻酱烧饼、盘瓤烧饼、椒盐烧饼等等十几种。后来鲍贵卿离开大帅府后，曾想把这家烧饼铺的师傅带走，但是因这位师傅嫌他给的工钱太少（每月12元大洋）结果没有去。由此可见鲍贵卿之爱财如命，到鲍手里的钱如同老鼠钻瓶子好进难出。

此外，鲍贵卿还投资近代工业。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鲍贵卿投资的企业有：中国漂白粉厂（天津）、鹤岗煤矿公司（黑龙江

鹤岗）、耀滨庆记电灯公司（吉林滨江）、恒源纺织公司（天津）、鲁丰纺织公司（山东济南）、通原林业公司（黑龙江通河）、兴林造纸公司（吉林）、金城银行（天津）。由此可见，鲍贵卿是一个地道的地主兼官僚资本家。

鲍贵卿不狂嫖滥赌，也没有三房四妾，这在北洋军阀将领中确实少见。鲍在其原配夫人病故后，才娶续室王氏。王氏死后，鲍正隐居天津，起初要想找个侍女，便从妓院里赎出了出身贫苦的杨柳青姑娘，后鲍贵卿想扶他为正室，遭到儿女们的强烈反对，虽然也为其生了儿子，但一直被称作邢姑娘。

1934年2月26日，鲍贵卿年老体弱，突然痰壅气衰，由津来平。次日，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就医。后因医治无效，于3月1日下午4时许在医院17号病房逝世。其子鲍成麟、鲍芳麟、侄鲍毓麟在旁亲视成殓。终年六十七岁。

有关鲍贵卿的生年众说纷纭，日本史料多载鲍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根据其子女提供，鲍是属兔的，据此应为清同治六年（1867年）。

据一些材料记载，鲍贵卿出生在海城县桑林子。缘起其祖茔在桑林子，其父永宽也葬于此，故有鲍贵卿是桑林子人之说。作者于1986年春走访在京、津鲍的子侄及女儿鲍成麟、鲍毓麟、鲍丰等，皆说鲍出生于小洼村。又，马常忠撰《鲍贵卿出生地》一文中考证鲍的出生地也为小洼村。（见《大洼县志通讯》1984年第4期）

孙烈臣

陈志新

孙烈臣原名九功，字占鳌，后改占尧。清光绪十一年五月十八日（1872年6月23日）生于今辽宁省黑山县老河深屯的一个染匠世家。祖籍直隶乐亭县孙家庄。其先祖于清初徙居关外辽西义州大榆树堡子村，数传于清道光年间迁北镇之小黑山，居老河深屯。该屯清末始置县，遂为黑山县。其曾祖孙成，祖父孙起旺，父孙魁，三代皆以染业为生。

孙烈臣五岁而孤，幼失怙是人生之大不幸，与孀居母裴氏相依为命。裴氏为本屯裴荣廷之女，为人贤慧，愿为人佣，抚育子女成人。孙母靠做针线糊口，家贫如洗，度日艰难。幼年的孙烈臣饱尝人间冷暖和悲欢，为他矢志不渝地要改换门庭奠定了坚实基础。孙烈臣幼时家境贫微，无力常年向学，只乘冬闲之机进私塾就读三冬。其母常以家贫之苦告诫他勤奋读书。孙遵母教，惜时如金，不敢偷闲，学识大有长进，在启蒙幼童中名列前茅。后辍学佃田耕种或为他人打短工，由于辛勤劳动，家道逐渐好转。孙烈臣虽出身染业世家，然“鄙其艺而不为”，“习贾非所愿”。“唯好驰马试枪”，“偕马贩出走古北口，遇马群辄辨其良，所获多名马，逐利倍称”。所以，时人呼之为孙马贩子。

清季政治腐败，国事日非。外有列强入侵，索赔款割土地，

内有盗贼蜂起，鱼肉乡里，社会动荡不宁，民不聊生。富商巨室争托孙烈臣以守护家宅，故尝为炮手。孙烈臣“性温和善谈吐，任侠尚义，所交多蒙汉男儿之好身手者”。孙烈臣受人之请，乃去黑山县北新立屯镇立德堂受雇于王家。主人久慕其枪法过人，遂命其持械护院。后因与主人龃龉，离开王家，孙烈臣又投县城北天梁殿砬子山贾府门第当护院炮手。孙烈臣有胆有识，喜结交江湖义士，与蒙边绿林好汉皆相友善。山林绺子闻孙烈臣在此护院，多绕道而过，无骚扰，其名声一时大振，得主人嘉许，孙烈臣在贾家护院有年，佣金较优，奉寡母度日养家也算充裕，生活也得到温饱。

庚子之乱虽平息，但东北城乡未靖，只因沙俄军队仍赖着不走。此刻京奉铁路山海关以北至辽西一带，因清廷伊桥挡俄队由盛京北返防，漫无军纪，沿途骚扰地方，抢夺财物。当伊桥所部行至黑山县境胡家窝棚时，当地大团拟狙击之，事为砬子山财主贾秀才所闻，认为伊桥乃朝廷命官，虑及团勇无知，有伤伊桥，遗祸地方。乃命家中护院炮头孙烈臣持名片往胡家窝棚劝阻当地保险队，对伊桥勿行狙击，并谓：“不用他们招待，把队伍请到我们这里，由我们招待食宿。”伊桥在贾秀才家休息数日，得殷勤款待，动身返京时，贾秀才又派孙烈臣持自己名片把伊一直护送到山海关。孙烈臣对伊桥一路照顾周到，因此伊氏下扎委孙氏为名誉哨长。

孙烈臣得此殊荣便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田庄台招募马步军旅数百人，乃隶属清中路巡防统领朱庆澜麾下。巡防队改编，孙烈臣任前路巡防马队第4营管带、步队第3营管带。孙烈臣能身先士卒，练兵有法，用兵有方，爱兵如友，深得朱庆澜器重，升迁很快，调往洮南任守备。

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清廷改奉、吉、黑为行省，设东三省总督取代盛京将军，徐世昌充其首任。1908年，张

作霖奉徐世昌之命率奉天前路巡防队移防洮南，孙烈臣所部亦编入其麾下，被张作霖委任为马队4营营长。时蒙人白音太贵陶什陶胡犯边窜扰洮辽 。孙烈臣率马队 300人从张作霖追剿 ，连战皆捷 ，转战于内外蒙古之沙漠与草原之间 。孙烈臣于冬月出师渡洮 ，驰聘800里 ，直抵呼伦贝尔池畔 ，凯旋班师，深得张作霖器重 ，“ 叙功保守备加 都司衔 ， 由是知名 ”。清宣统二年（1910年），奉天成立讲武堂 ，孙烈臣请入堂学习 ，逾年卒业，以成绩最优 ，擢升奉天中 、前两路巡防队帮统。清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孙烈臣、张景惠等人成了张作霖在奉天的耳目 ，为张作霖率兵 进奉天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1912年9月，奉天中路巡防营及前路巡防营合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任师长，孙烈臣任该师步兵第64旅旅长。步兵第53旅旅长为衣钦保，汤玉麟为该师骑兵第27团团长，张作相、张景惠皆任该师团长。同时，奉天左路巡防营改编为陆军第28师，师长冯德麟，张海鹏、汲金纯分任步兵第55旅、第56旅旅长。12月，北京政府晋升孙烈臣为陆军少将。1915年1月，孙烈臣获三等嘉禾章；8月，加陆军中将衔。1916年3月，孙烈臣获二等文虎章。

1916年4月，张作霖同冯德麟密谋驱赶段芝贵，冯的28师演黑脸 ，张的27师扮演白脸 。张作霖召集重要军事会议，布置一切，孙烈臣建议以人民团体名义方为正大光明，张极表赞同。张便假借28师官兵要求惩办帝制祸首来威吓段芝贵，段闻讯魂不附体，即电请中央赴津养疴，以张作霖代理军务，冯德麟为军务帮办。段备专车一列 ，带走库存官款200万元及大宗军火。张对此佯做不知，并派孙烈臣率兵1营护送。车行至沟帮子，照例停车上水添煤，忽有28师邱团长持旅长汲金纯名片上车，声称是欢送上将军的，待上车后便拿出以奉天各法团名义和省议会及28师全体官兵名义发来的电报 ，上称 ：“缺任上将军段芝贵为帝制祸

首，奉天人民正拟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携省官款200万元之巨并军火大宗，闻风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依法处理”等语。段见电报惊惶不知所措，把电报给孙看，孙故意大声说："岂有此理，等我问问。”即下车到票房同邱团长谈话去了，段见孙烈臣久久不回，车站士兵又排队拥向站台附近，大有弩弓待发之势，始有所悟，不得已令左右将所携款银箱卸下，堆放站台之上。时孙烈臣上车报告说："奉天各界人情汹汹，一定要截留专车，押回奉天，经张代督婉商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及军火务须点清留下，并电请中央查办。”段吓得心慌手颤，连连点头认可，专车才得以放行，仍由孙烈臣护送到津，段从此避居租界。张驱逐段芝贵得逞升任盛武将军，暂署理奉天军务，并兼代奉天巡按使，成为奉天军政首长。陆军第28师师长冯德麟帮办军务，其地位仅次于张作霖，但是冯德麟自恃是绿林前辈，不甘屈居于张作霖之下，愤愤不平迟不就职。张作霖只好忍气吞声，亲登冯府言和，冯要挟筹码越来越高，遭张回绝，一怒返回北镇。袁世凯派张锡銮来奉调解未果。张作霖此刻采取软招，派亲信孙烈臣携带贵重礼物及现款30万元到北镇犒军，婉言劝冯回省城就职。5月20日，冯德麟率步、马、炮5营，班师进城，在城南风雨坛设立28师办事处，与张作霖的将军府相抗衡。6月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毙命。7月，将军改为督军，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0月，孙烈臣获四等宝光嘉禾章。

张作霖同冯德麟的矛盾尚未解决，又同绿林老伙伴汤玉麟因宠信王永江而产生分歧。张作霖重要亲信王永江，任奉天警察厅长，引起汤玉麟诸人的不满，因此，在阴下多次向张作霖进馋言，想搞掉王永江，非但遭到张的拒绝，还招来一顿臭骂："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什么？给王岷源牵马扶镫都不配。”张景惠、孙烈臣、张作相等一般高级将领听后均感不

悦，对王永江更加忌恨，而汤玉麟反对尤烈。按常年惯例，每逢正月初五、六，27师、28师都要宴请省城文武官员吃年茶。1917年的旧历正月初五日来临，28师作东道主，没有请王永江；而初六这天27师作东道也未有请王永江，张作霖头一天去28师吃年茶未见到王永江，心里就老大不高兴，初六这天又没见到王永江，忍不住便问："为什么没请王处长？"在座谁也未敢言语，张作霖接着说："28师不请王，我不说什么，怎么你们（指孙烈臣）也不请呢？""我们把王漏掉了，改日再专请他吧，你甭生气。"孙烈臣小心翼翼地回答。结果张作霖在席间竟同汤玉麟吵了起来，闹得不欢而散。王永江得悉，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为了缓和大家情绪，，特备下丰盛酒席，邀请省城高级文武官员联欢，解除误会，也有致歉之意。但汤玉麟、孙烈臣等均没到席，王永江大窘，事后向张作霖表示消极，张作霖为此大为恼火，见到汤玉麟便痛骂不已，要求他们向王永江赔礼道歉，这些人当然不肯，并在汤玉麟的鼓动下，集体反对王氏。商量拟好呈状，同去见张作霖，要求把王永江撤职，若不答应，集体辞职不干，回老家去，还推举孙烈臣代表发言。当他们见到张作霖后，未得开口，就遭到张作霖爹长娘短地大骂一顿。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发言，都瞧着孙烈臣，孙却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视大家。这时汤玉麟憋不住了，对孙说："占尧你倒讲话呀！你手里拿的呈文呢？"孙只好把呈文交给张作霖，张不由分说把呈文撕得粉碎，直接对汤开起火来，把个祖宗三代都给掘了出来，汤玉麟实在忍不住，竟同张作霖对骂起来。

翌日，孙烈臣往见张作霖说："我打算找阁忱（汤玉麟的号）打打圆盘。"张说："可以。"孙烈臣便去劝汤要其打消辞意，汤却说："辞不辞都不能找他，看他能把我怎样。"此刻孙烈臣向怀里取烟盒，汤疑心孙烈臣要取手枪，忙问："你打算怎的？"孙从容地把烟盒拿出来，又接着劝了一番，也未得要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北京中枢，对奉天张冯矛盾极为关注，派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日赴奉天进行调解，并请吉督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派代表参加，终未达成协议，调解无效，冯玉麟于3月6日重返北镇。

冯德麟与张作霖反目为仇，又乘汤玉麟与张作霖因王永江改革警政而相龃龉之际，与汤勾结起来，共同对抗张作霖。为破坏冯、汤的联合，张作霖在27师内召开了全体营、团长会议以团结内部。过去一度附和汤玉麟的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等见汤玉麟真欲与张作霖作对时，便都站到张的一边来，表示拥护张作霖，反使汤孤立无援，张作霖便于3月19日发布撤销汤玉麟旅长、刘景双营长职务，派孙烈臣率3200多名精兵包围新民，监视汤、刘的交卸。

汤玉麟与张作霖交恶，叛张事败逃走，得到冯德麟、张海鹏的掩护。5月，张景惠继汤玉麟升充63旅旅长。7月，张勋复辟，冯德麟参与其事，旋复辟失败，冯德麟被贬褫夺军权。孙烈臣升任陆军第27师师长，以张作相继任54旅旅长，同时张作霖自兼陆军第28师师长，从此奉天军权统一，孙烈臣成为张作霖麾下一员大将。

时黑龙江省政争迭起，原督署军务帮办许兰洲以武力胁迫督军毕桂芳去职，意在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7月上旬，张作霖派孙烈臣到齐齐哈尔进行调停。孙先到呼兰与英顺、巴英额二旅长会面，英、巴表示唯雨帅之命是从。孙又赶到省城齐齐哈尔晤面许兰洲，许与张素有勾结，也表示唯张作霖马首是瞻。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殊勋重掌北京政府，毁约弃法，不恢复国会，力主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先生揭起护法大旗南下广州，建立军政府，而后开始北伐。奉皖联合进兵关内。1618年5月，孙烈臣晋升陆军中将。护法之役展开，孙烈臣率奉军一部入关援湘任湘东司令，设司令部于长沙莲花池。孙烈臣在

湘东参战多次。6月，孙烈臣请辞奉军湘东司令，并自长沙返回天津。9月7日，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其势乃及于黑龙江、吉林。同月，徐树铮失宠于张作霖，乃辞去奉军副司令职，荐孙氏自代。12日，张作霖任命孙烈臣为奉军副司令。12月，孙烈臣获二等宝光嘉禾章。

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后，即以巡阅使身分发号施令。再次掀起向吉林扩张的暗潮。1919年6月，张作霖终于撕掉假面具，公开向吉林夺权。先是唆使吉林公民何守仁等分别向国务院及东三省巡阅使署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扰乱金融"，列举八大罪状。同时派代表赴京、赴奉恳请罢免孟恩远，接着发函给孟恩远，指责吉林财政不规而加以压迫。孟在省民的弹劾和张作霖的威逼下，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张作霖在孟提出辞呈时，要求北京政府把孟恩远免职，任命27师师长孙烈臣为吉林省督军，并派孙进京大肆活动。但北京政府没有任命张作霖的亲信，奉系色彩浓厚的孙烈臣为吉林督军，而把奉系色彩比较淡薄，张作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调任吉林督军，而把孙烈臣安插到黑龙江，采取了一种缓和的政策。张作霖虽然达到目的，但对孙烈臣没能调任吉林颇为遗憾。7月，北京政府任命孙烈臣为黑龙江省督军，并助鲍贵卿进兵讨伐孟恩远。黑龙江督军省长之职，遂令王树翰护理。8月，孙烈臣赴任。

孟恩远十分留恋吉督地位，加之前年留任成功的滋味尚未忘记，因此对高士傧等人的怂恿独立大为动容，孟恩远知道此次免职是由于张作霖的强权，并非北京政府之本意，如果出兵奉吉黑省界与奉军对峙，形成箭拔弩张之势，或许北京政府以不忍目睹生灵涂炭，会同前一年一样，再次撤销免职令亦未可知，因此过于盲目自信，侥幸于万一而无战意，把一切战备工作交于高士傧。

张作霖见吉林军队决心对抗，遂着手准备武力讨伐，并向中央政府请求讨伐令，编成吉林讨伐军，新任黑龙江督军孙烈臣为

东三省南路讨伐军总司令，抽调6个混成旅，计划四路进军互相策应，一举歼灭吉林军队。6月25日晨，孙烈臣威风凛凛，高举讨伐吉林军大旗由陆路向北进发，总司令部设在开原城。东路司令刘香九的先遣队也长驱直入范家屯，开始逼进长春，与此同时张作霖又把前年入关南征的奉军陆续调回加强战备。张景惠奉军暂编第1师也全部返奉，作为讨伐军的后援。四路奉军扼守各要冲，完成了只待一声令下立刻前进的部署。7月18日，吴俊升部出大赉向南推进，孙烈臣部进驻怀德。

但是吉林军高士傧等绝不示弱，他们在长春组织司令部，高俊峰为前敌司令，将吉军集中到吉长一带，奉、吉之战一触即发。正当两军对峙时，7月19日，驻长春日本守备队奉命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以向北京政府示威，暗中支持张作霖，迫使孟恩远去职。亲日派段祺瑞接到消息后，惊恐万状，着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张作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了。

新任黑督孙烈臣是张作霖最为信赖的心腹干将之一。孙烈臣为人稳健，处事圆滑，有温厚长者之称，孙既无学历又非名门，早年投身行伍，逐年晋升，终成为奉军要人。孙善辞令富有随机应便之才能，在奉系军阀中有仅次于张作霖的才干。孙烈臣去黑赴任前，在奉天同张作霖商量，网罗奉系文武官员组成新班底，他起用丁超为督军署参谋长，袁金铠为秘书长，宋文郁为省警务处长，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为财政厅长等。孙烈臣得意洋洋前往齐齐哈尔赴任，成为封疆大吏。从此奉、吉、黑三省皆入张作霖势力范围。第27师师长遗缺由张作相袭任。同年8月，孙烈臣加陆军上将衔，兼黑省省长。吉林事变平息后，孙烈臣到任。黑龙江省与奉天诸多事，多委王树翰办理。

孙烈臣上任后，以黑龙江省地处蒙边与俄国为邻，国防边防最关重要，眼下各县胡匪蜂起，执行奉天与黑龙江省军队联防计划，以满洲里、海拉尔、新安岭、武兴、泰来、大赉、肇州、安

达、索伦山等处为联防区域。现因黑龙江省军队不敷分布，欲将驻大赉之奉军第2混成旅郑旅长所统带之全军暂留黑省以资防守，已得张作霖允准实行。前驻呼兰骑兵第1团李少白团长随鲍贵卿赴吉林，现该团已留驻吉林。所遗呼兰防务尤关重要，只得派骑兵第2旅张旅长移驻该县以资镇慑，该旅长现已到防。

孙烈臣到任以来政务日繁，所有各军尚未亲自检阅，随着公务渐次就绪，打算近日赴各营检阅。又因省城内军警纪律松弛，做出对军警严加训勉的通令。凡军士警士于休假时上街或随长官赴各署公干均不得携带枪械，其服装要整洁，穿军服者不准野游。以上业经通令各旅、团、营及警务处转令各署遵照执行，违令者按法惩处外，特委军署委员阎殿凯稽查军警在街市有不正当行为，如服装不齐，无事带枪，酗酒观戏者，一律交军署或军警督察处送由该长官惩办。

孙烈臣还鉴于黑龙江省钱法毛荒已达极点，于9月16日由维持钱法委员会议决救济办法4条：①广信公司官银号所有财产一律变卖以为基本资金；②借使中交票以为兑换品；③官定银价以中交票收回江省纸币；④委任中交两行分期代收官银号纸币，业已交财政厅查照办理。

孙烈臣还虑及黑龙江省今年年景不如往年，各县新粮减收，并因江河水小，外埠之粮未能运进，所以省城粮米价格日益渐涨，而民食尤关重要。孙已指示省署拟定救济办法3条：①不准奸商大宗趸粮；②平抑价格不准抬高；③设法运输粮食以济民食，已经令行警务处商务会照办。这是孙烈臣上任后的新政策，能否贯彻执行，省民正刮目以待。

孙烈臣不但制订了新的治黑龙江省之策，在执法上尚能杜绝上下人情说项之风，有破官官相护之弊端。黑龙江山林警察队长兼山林副局长李紫英，纵贼种烟私发大票，克扣警饷鱼肉乡里，民之切齿，欲食其肉而后快。被孙烈臣派员查实，由呼兰原

籍解省，收押在陆军监狱，经军法课连续审讯，该犯知难隐讳，遂一一吐实交待，赃款达数百万之巨，孙闻之大怒，欲将该犯置之于法以肃官方。该犯胞兄李荫棠系北京参议员，因其弟犯案由北京星夜驰归，屡次晋谒督军孙烈臣，想为之说情。孙知其来意均拒而不见。省议会高议长玉堂与李犯系同乡，因孙烈臣不见其兄，乃约集呼兰各议员赴军署代为说项。孙烈臣谓，他事可见，如系李棠英事请勿面谈。高等无可奈何只得浩叹而返。孙烈臣执法如山，破除情面矣！

孙烈臣督黑省兼省长，以富国之道为实业，而垦植一道利源尤大。黑龙江省积极进行开放垦荒地。定有专章，人民领垦加以保护。然而官府提倡虽殷，而投资务农者仍属寥寥。究其原因乃边疆辽阔，内地人民对放荒地点、领垦手续及天气、土质好坏等诸多不了解，若不切实调查广为传播，不足以引起企业家之兴趣。为此孙烈臣指示由实业厅长、放务厅长及垦务员会同拟定垦务办法13项，通令各县切实调查以凭核办：①未放荒有多少。已丈量者注明实数，未丈量者注明概数；②每垧承领价格若干；③领垦手续若何；④由县城以及著名商埠或省城路程多少，并需旅费若干；⑤农民每日每人工价多少并招工难易；⑥建筑农舍何时为宜，每间农舍需费若干；⑦垦户是否必须凿井一口，需费多少；⑧着手开垦以何时为宜；⑨用普通耕犁每日能开地多少，每犁需骡或马几匹；⑩开垦的第一年能否即行种植并以何种作物为相宜；⑪业熟后每垧能收获多少；⑫各种农作物产粮每石平均价值约几何；⑬各种农作物之销路及每石运费若干。垦务措施不为不细，能否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

黑龙江省土匪猖獗，孙烈臣督黑后，剿不胜剿，感到棘手。正在苦无良策时，其左右向孙献策说，从前朱庆澜任黑龙江省巡按使时，土匪也不少，后经清乡督办王顺存积极清剿，不久即告肃清，所以王顺存在黑龙江省颇有威望。如将王顺存请出来委以

重任，江省匪患不足为虑。孙烈臣很快采纳之，嘱米春霖和潘桂庭二人去电邀王顺存，王复电即表愿往。王顺存在途经奉天时与孙烈臣相遇，孙乃偕王同去帅府拜见张作霖。张很客气地对王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于是，张电请北京政府任命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

同年10月，孙烈臣获一等文虎章，11月兼滨黑铁路督办。1920年2月，孙烈臣晋授勋四位。

孙烈臣督黑时，正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建立起苏维埃政权，遭到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叛匪的武装干涉之时，国内战争不已。黑龙江省地处边陲，北与俄国毗邻，苏俄红军与俄白匪军于满洲里界外，"更迭进退，边事至棘"。孙烈臣上任后，首先在满洲里边境处屯有重兵，同时布告招回蒙部复回呼伦贝尔故地，以固边防。早在1911年11月，呼伦贝尔蒙旗反动王公与库伦分裂分子串通一气，宣布独立，沙俄帝国主义分子则控制中东铁路，声言中立，实为阴下助蒙叛匪，并帮助蒙古叛匪进攻胪滨府。黑龙江巡抚则电呈外交部：照会沙俄政府，谴责其破坏中立诺言。1915年，中俄会议协定呼伦贝尔为特别区域，受中国政府辖制，然名存实亡。同时吉拉林金厂、察罕敖拉煤矿、呼伦湖渔业均为俄人侵占。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后，中国当局派兵保护中东铁路，孙烈臣上任，抓住俄国内乱之机毅然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归黑龙江省治理。"蒙旗首领贵福等亦呈请愿书倾心内附，遂请简呼伦贝尔善后督办镇守使"，并设置胪滨、呼伦、室韦、奇乾四县，国土主权得以收回，时在1920年4月。同月，孙烈臣随张作霖进关赴保定，参加曹锟召开的8省督军会议。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奉军助直倒皖，直胜皖败，奉军得到不少便宜。9月，北京拟司法部收回中东路司法权暂行办法四条，并电告黑龙江省督军孙烈臣。同月，孙烈臣晋授勋三

位。是月，俄国白匪军首领谢米诺夫与苏俄红军交战被打败，退至阿巴赅图，将迫入中国境内，又日本浪人阴谋欲设司令部于兴安岭站，孙烈臣则断然拒之，并密令驻满洲里的中国军警，如遇谢部残匪，勒令缴械不准入境，于是，收容白匪军数千人，备车送至海参崴安置。当时苏俄红军则要求引渡谢米诺夫等人并接收其武器装备，还要在满洲里车站设联络机关，皆遭到孙烈臣严词拒绝，孙烈臣令军队防堵苏俄红军进入中国国境，“浃沟之间边事大宁”。

孙烈臣念母孀居五旬，寒度霜日，抚孤鞠养之德，乃于1920年在故乡老河深屯之北，沙河之东，约2里处的大道上建石牌坊一座。石坊高6米，三开门式，流檐雕柱，龙凤呈祥。上起二楼，下有3门，正中门上嵌镶圣旨（其母受清朝封赏）方额，两旁门顶刻有两块金匾，左首书“节烈冰霜”，右边刻有“德高望重”。牌坊四周有石雕栏杆，鳞潜鱼翔，活龙活现，牌坊雄伟壮观。两座石碑，分列牌坊两旁，左边为旌表文碑，右边是建牌坊纪念碑。

1921年3月21日，吉林督军鲍贵卿因失职及疾病辞职，实为迫不得已。遂调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兼长，黑龙江省督军由吴俊升继任。3月31日，孙烈臣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王树翰随孙烈臣同往吉林。8月，王任吉林财政厅厅长，代理省长。

1921年12月，梁士诒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出任国务总理。梁上台后，大肆进行亲日卖国外交活动。梁的倒行逆施，即刻激起举国上下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直系军阀则利用人民对梁的不满情绪，进行倒梁活动。当梁士诒下令要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放弃关于“备款自办胶济路的主张，允许日本人的要求，借日款赎路”的消息传出后，吴佩孚认为攻击奉军的时机已经到来。直系抓住以张作霖为后台的梁士诒这一卖国行径，于1月5日，通电指责。从此张、吴展开了电报战。同月，孙烈臣

为阻止日本在哈尔滨交易所扰乱金融，逮捕中方股东11人，反引起日本领事的抗议。

1923年3月29日，张作霖召集吉督孙烈臣、黑督吴俊升、27师师长张作相及各旅团长在督署开会，决定出兵与直系作战。梁士诒内阁终于成了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的导火线。4月28日在由张作相、张景惠、金汲纯、吴俊升、孙烈臣联名通电的电报中，只宣布吴佩孚的罪状，并称“罪在吴氏一人，与曹使无涉”。4月1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达奉军总攻击令。这次混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冷战准备，却只打了6天即告结束，结果直胜奉败。张作霖除损失在关内的地盘外，并未受到致命打击。

北京政府在吴佩孚怂一再催促下，于5月10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并根据直系意见调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同一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及奉天各团体通电，否认罢免张作霖的“乱令”，19日，奉天省议会“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总司令兼奉天省省长。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通电：“自5月1日起，东三省政务自主，并与西南及长江各省一致行动。拥护法律，扶植自治，促进统一。”27日，张作霖回到奉天。6月8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正式宣告“联省自治”。又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奉军在秦皇岛附近与直军接触。从6月8日战至13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奉天城举行祝捷大会，进行大肆宣传。而西方国家则出面助直系一臂之力，同时，直军在九门口转败为胜。这时孙中山在广州由于陈炯明叛变而受挫，张作霖才接受以英国教士杨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居间调停人的停战建议。18日，直军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方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留尔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

为两军界线，19日起奉军撤出关外，大部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议会仍请张作霖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保持独立状态。

张作霖从第一次直奉大战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暴露出绿林出身的奉军素质太差问题，决心整军经武，重振军威以雪战败之耻。遂对官兵加紧训练，彻底改革。于7月22日在奉天省城东华门路北设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吉督孙烈臣兼任统监，姜登选、韩麟春兼任副统监，张学良任参谋长（由郭松龄代理）。该处后改为训练处。张作霖将东三省全部军队整编为步兵27个旅，骑兵5个旅，使用统一番号。8月14日东三省保安联合会在奉天省议会召开大会，28日闭会，通过了《东三省联省保安规约》，会议主席杨宇霆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

张作霖为笼络吉林省人民的感情，乃令孙烈臣将督军署移驻长春，以吉林省长还之于地方，省公署则设在吉林。孙烈臣感到军政路防集于一身应接不暇，乃请以吉林省长畀之魁升，蔡运升为财政厅长，王树翰任督署秘书长。护路军总司令推荐朱庆澜，移吉军署于长春便于居中控制，又请划中东路界线为东省特别区，即以朱庆澜兼行政长官以资统辖。为时不久，张作霖鉴于吉林省政局日益衰微，命孙烈臣仍回吉林，屏除魁升、蔡运升不用。9月23日，张作霖邀孙烈臣、段祺瑞之代表吴光新，与奉省军政要人开会，讨论划一军制；“军民分治”后保安副司令与省长职权之划分；自治各省之联络；应付北京取消自治；整顿吉、黑两省军纪；布置吉、黑两省边防，严剿俄党活动；组织联防司令部、三省高等军事教练所、三省保安各分会；划一三省财政，改定各项预算等议题。25日会议结束。同年12月18日，改以王树翰为吉林省督军署秘书长兼高等顾问、代理省长。吉林省孟恩远虽早已离职，但军民两政之高级官吏，多出于攀援请托，或为孟

督干儿义孙，地方亲民之官也是如此，因此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士习于弊风，以至寡廉鲜耻。王树翰既管行政，便产生革除积弊想法，因与孙烈臣相约，凡督军托交任用而以攀附升迁之人全部拒而不纳用。王树翰代省长系孙烈臣委任，所以凡遇用人、行政之事仍必先征得孙督意见，才敢施行办理。因此王树翰自代省长以来，事事不敢擅专，事无巨细均由孙烈臣首肯。

1922年，孙烈臣在故乡老河深屯东，东沙河之阳建家庙一座。宗祠分上下两个天井院，各有正殿三间，东西廊下有配殿四座。宗祠正门为三开门式，贴金漆红。整个宗祠是一座古代庙宇式建筑群，其建筑艺术之精美，在当时也为罕见。雕梁画栋，扬天高翘，凤舞龙飞，虎啸狮鸣，巧夺天工，维妙维肖。殿内壁画，色调鲜明，珍禽异兽，刻画逼真，花卉草木，栩栩如生。家庙院内，方砖铺地，高大石碑竖立正殿两旁。左边是孙烈臣的功德碑，右边是建祠记事碑。殿外门前，一对石狮，高7尺余，相对而立、雄姿伟健、欲吼欲望，呈现出一副护卫宗祠之神态。还有旗杆两根，高3丈6尺，指天拔地，分立东西；中间是一座影壁墙，高5丈，宽2丈4尺，其上雕花刻鸟，描金涂赤，红黄相映，辉煌夺目。宗祠四周，高墙环绕，东西各有辕门一座，东曰“启明”，西称“长庚”，此门虽设，常年不开。宗祠西跨院儿有平房5间，为护祠人所居。整个宗祠成正方形，共占地6千余平方米。解放后被列为地方文物保护单位，十年浩劫中被毁。

孙烈臣腾达后，修宗祠、立牌坊，实为光宗耀祖显赫门庭，为自己树碑立传，所耗巨资其来源不言而喻。

1923年1月5日，张作霖在省垣召集孙烈臣、吴俊升、朱庆澜开会，决定以边防军5个旅驻守东省铁路沿线。9日晚，张作霖在省公署召集三省文武官员再次开会，孙烈臣、吴俊升、朱庆澜、王永江、姜登选、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于冲汉等以及

各厅、处科长、参谋数十人与会，讨论三省军民政治之划一及防“苏俄”之步骤、剿除匪患之办法、三省官吏之调动、及整顿吏治等项内容，长时方散。19日，张作霖又召集孙烈臣、吴俊升、朱庆澜三司令会议。

孙烈臣滞留省垣开会时间较长，官场中时有更换孙烈臣督军兼长之传言。理由多是该督自上任以来，为时已久，吉省之政绩迄今尚无何等向上，其中财政紊乱竟自无法收拾，暴露出孙烈臣之无能，际此积极提倡民主自治，如将民政长任此类人物，洵属时代错误，而不能为福民间，亟宜另与适当位置，以资擢用能人而便革新吉省政务。

吉林之匪患已积重难返。当时有人说，黑龙江省匪患驾乎辽、吉之上，其实不然。以匪患轻重言吉、黑两省无甚差别，是小巫见大巫。“当局非不抚也，军警非不剿也，无如日益剿抚而匪数日益多。”况仅赖剿抚断难收肃清之效，因剿抚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从清末到张作霖统治东北，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官逼民反，迫于生计铤而走险，故有犯法为匪者不为耻，而反以懦弱为耻。有些原因狡猾不逞之徒放荡无赖之辈相牵而入斯道者乃益夥”。所以，吉林匪患成了军民两政当局急于解决的一大难题。为解民悬，在职权范围内，代省长王树翰曾竭尽全力去制服大小股匪。省公署训令一个接一个的下发，而积习多年之匪患并未因王树翰的一纸空文而荡涤净尽。当时匪首西边好、仁义老公平、老四海以及叛变炮手队与各路小股土匪约2000余人。因收降关系，群集蛟河镇延至吉林县一带，往返骚扰，大肆抢绑，人民携儿带女纷纷逃避，哭号之声震天动地。代省长王树翰闻之愤怒异常，以为该匪既有投诚之意，复行为非作歹，实属罪不容诛，遂即电请奉天张作霖，要求痛剿。由于王树翰的呼吁电发生效力，在奉天的孙烈臣、吴俊升立即电令各省派遣得力部队联合剿匪。然而，吉林匪

患之嚣张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竟在省垣旧历除夕之夜，人们点火燃放鞭炮辞旧迎新之时，发生股匪乘虚而入，抢劫财物，绑走人票之事，实在令人发指。匪患已危及省垣，鉴于省垣兵力单薄防务空虚，王树翰商得孙烈臣的允诺，将旧警卫队改编为警备队，专司防护省城。

吉林省不但匪患猖獗，官兵也大事劫掠，使民众不得安生。吉林各乡绅民因陆军及其他军队在各乡勒号柴草事同劫掠，不堪其扰，向议会议长请愿而转咨军政两长严禁勒号柴草以维民生。1923年11月13日，吉林省垣农工商教四会为此特议定会晤驻军官长和防队统领，吉林江东九十区乡民也因军队在乡勒索粮草事于同日结队来省向省长呼吁。此时王树翰正在长春与孙烈臣商量防务及政务整顿事宜而留长未归，得讯后，一面下令所管警队严禁扰民，一面备咨行军署，请各军队官长查禁。吉林军政两长同时发下训令，严禁不法事件发生。

王树翰代吉林省长以来，因时处多事之秋，棘手之事颇多，其中尤以匪患和筹款二项，实属艰难，不时萌发辞意。吉督孙烈臣以王树翰理政廉明，政声优卓，依畀方殷，决不准辞。并拜托东三省银行总行长刘尚清来吉林劝慰，致电慰留，意甚恳挚，王不得不打消辞意。

吉林省名为自治，实受张作霖支配。孙烈臣久居奉天省垣，对于职务，除较为重要及关涉三省者外，大都假手僚属，绝少过问。各机关公职人员遂因监督不周，不免坐食而嬉，渐生惰性，以致军民两政因循塞责，殊无整饬可言，惟有一特长，即奔竞倾轧之风，亦遂因而少戢。1923年11月中旬，孙烈臣以年关将近，军民两政不得不整饬进行以资结束，乃遄返长春，亲自处理。连日召集军民各重要人物在署开会，议定四条计划。（一）整饬军务。治军首要为纪律，吉林军队本训练有素，纪律亦佳，唯军人良莠不齐，统兵长官宽严也不一致，以致时有扰害乡里之事发

生。即应责成统兵长官负责办理，并不时委派军事调查委员，前赴各地抽查考核，如有因循扰民恶习不改，即行惩治不贷。（二）肃清土匪。吉林匪患积习有年，鱼肉乡里，民不聊生。当此冬防之际，亟应趁时痛剿，克日肃清，以绝后患。今后再遇匪警，各地军警团丁不可相互诿卸、推拖，应不分区域，竭力协剿，以便铲除。训令各镇使、旅长、道尹转饬团营长及县知事等，一律遵照办理，否则追究责任。（三）厉行禁烟。吉林省为烟苗禁种省分，惟乡僻细氓，以大利所在，不惜违令播种，致使烟苗遍地，流毒无穷。今将全省按道区划分四大区，责成镇使旅长道尹督率县知事军警等会同勒限铲除烟苗，奉行不利者，一律按法惩办。（四）整顿税源。赋税为国家维正之供，即为庶政推行之本。征税官吏断不容敷衍塞责，致滋流弊而碍税收，应严订规章，实力奉行 。且冬季为税收旺季，更应严加整顿 ，责成财政厅选派官员，定期分往各县税务征收局，查考税收事宜。

尽管孙烈臣研究订此计划，奈其身兼数职，军务繁忙，常常不能脱身料理吉林军政两务，而长期居住奉天省垣。近期宿疾未愈，精神衰弱，唯恐贻误戎机，故孙烈臣向张作霖提出辞呈，并保张作相督吉 ，王树翰职吉林省省长 。张作霖以东三省军务繁忙，还须仰赖孙氏臂助之力，对孙烈臣之请求未予批准，只允归故里静养。

孙烈臣自1923年以来，迭次因病请辞不许，在奉天省城养疾私邸。是年腊月新宅落成，孙烈臣偕夫人往观，见画栋雕梁，备极美观，赞美之余，老夫妻竟抱头痛哭，当时互谓曰："此等住宅吾二老去世，遗留于谁也！"闻者谓不祥之先兆。孙氏患有胃病，危而复安多次。此次则一病不起，近复加剧。1924年4月24日晚，孙精神倍觉清晰，聚集族人于病榻前谈话，旋食馄饨一大碗，当即和衣而睡，讵料25日凌晨3时许忽觉心痛异常，顿失知觉，当其家人赶到向孙说话已不能答，当其妻妾全至围绕孙时，

孙仪——微微点头，到3时50分在本宅离开了人世，终年53岁。张作霖闻讯即躬往吊唁，至则竟抱孙之尸体痛哭有半小时之久，挥泪如雨，泣不成声。“盖以生死之交，患难与共，追夫以往，念及将来于公于私均有莫大关连也 。”张作霖拨私款5万元治丧，以尽袍泽之谊，并令张学良前往料理丧事。孙烈臣共有七位夫人，并无子女，其所遗财产，张作霖恐生纠葛，已拟将来亲自为其分劈。27日送三之辰，张作霖又亲临孙宅吊祭，并拟将来勒碑建祠。张作霖于午后3时至孙宅第恭送，其余文武官员迨亦倾城前往。电车、马车往来者途为之塞。5时许，所有纸扎活自大北门出入经四平街出小北门，有纸扎之军乐队、步队、马队、辎重队及车辆金银布帛等项，并有纸汽车一辆及真皮箱4只亦同去焚化。迎过半小时许，孙之亲属始素车白马而过，而过道旁观者几乎万人空巷，观者以亲属咸无忧容，不免有所兴感！同日吉林省城各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孙烈臣归葬定在5月12日（农历四月初九），张作霖同众人商定用陆军上将之殡仪，除普通仪仗外，并用军乐及马步军队行列以昭隆重。5月12日午前8时，孙的灵柩自北关孙宅起灵向车站进发，运回原籍黑山县浮厝 。其仪仗首先为喷钱兽 、四大天王、神道碑、鼓乐道乐。贿选总统曹锟颁之匾额，题曰：“将星灵彩”；清逊帝溥仪所赐之匾额题曰：“功懋干城”；张作霖之匾额题曰：“三边保障”。次之为全副銮驾、官衔牌、道魂轿、万民旗伞、香亭、花圈、挽联、喇嘛经、纸扎活、丧柳。继其后为亲友送殡者，张学良身服期服步行泣送，三省文武官员同送者数百人；再次为孝子灵杠，杠用64人，红罩金绣，灵前后有人扮戏，出入仙童仙女八仙，还有三藏取经等故事；后者礼炮也；再后或车或马或轿者女眷也。自头到尾的归葬队伍延长数华里，市民围观空巷。沿途有路祭数台，10时始抵车站。站上搭松枝穿堂，停灵于西站台，早有骑1营步1营在站护卫灵柩，至军乐大作，军队举

枪致敬，灵停置，亲友致吊，鲍贵卿前陆军总长、吴俊升、马龙潭随后驱车至站，祭毕，灵柩升到灵车，所有仪仗等同载后车，亲眷在前安置妥当，11时，汽笛长鸣，灵车徐徐开动，鸣礼炮18响，显赫一时之孙氏西去矣。

这些大小军阀，在势时争名夺利，搜刮民脂民膏，使自己脑满肠肥。惜之短命，死后还要继续享受这人间的天堂，不惜挥霍万金。孙氏在军阀中尚非贪婪成性且如此，反之就可想而知了。

孙烈臣发迹后，广置田宅，土地万余亩，均出租给他人耕种。房产多处，奉天小北门外有公馆一处，分东西两院，三进院落，共百余间，原籍老河深屯村西约二里许的蟠龙山李屯村内，建有别墅一处，砖石结构的平房，也分东西两院，共50余间。此外，在北京、奉天等地还有商号数处，其中以奉天汇元粮业及北京汇元商行为盛，商号总值达数十万元。但孙氏正象当时报纸评论的那样："孙烈臣死，身后萧条，夫人以次7人，无子嗣，……倘大富贵一死皆休，可不痛哉！"

孙烈臣以无子女之故，蓄有姬妾7人，争风吃醋，时常吵闹，孙不堪其扰，而又无法摆脱，此为孙病重之主要原因。

孙烈臣于翌年闰4月下葬原籍，墓园占地6万平方米，不谓不奢华矣。孙的这种奢华并未因其归葬而告结束，到三周年时又大肆操办挥霍一番。张作霖对孙烈臣之死甚为悼惜，嘱令孙氏家族为其铸铜像。孙氏无嗣，过其近支之子宪钧为嗣继承一切。孙的专祠于1926年在其奉天城内花园中落成。孙氏故后三周年追祭之日所铸铜像业已竣工，遂于7月30日为揭幕入祠。入祠的前三日，有各地所送匾额对联，如"典重凌烟"、"精神宛在"等不一而足。8月3日到5日演戏三昼夜，4日为正式揭幕吉日，是日除朱庆澜入京未回外所有孙氏之旧亲、旧友、各机关人员皆躬往孙氏祠参与典礼。早9时来宾齐集，吉林军政界，如荣叔章等皆已赶到，吴俊升亦特遣公子恭行大礼。总招待为米春霖，总监

为上将军公署总参议臧式毅代表行礼。10时鸣爆竹，先奏军乐，午初1刻，毕集于祠前，由赞礼员就位唱赞，先奏清乐又奏军乐，有太清宫道众诵经揭幕。揭幕式毕，招待来宾，酒分三等，上级来宾皆食燕菜；中等者吃翅子；下等者吃海参。席毕有韩敬文献演魔术，还有城内大舞台秦徽两腔戏，至晚有中文电影，以助余兴，颇极一时之盛。

吴俊升

陈志新

吴俊升，原名兆恩字秀峰，后改名俊升字兴权，清同治二年十月十一日（1863年11月21日）生于今辽宁省昌图县老城乡长青村兴隆沟一个贫苦农家。祖籍山东历城，世代业农。清咸丰末年，山东年景不佳，吴家为生计所迫，外出谋食。其祖父吴天福迁到关外，落户昌图北。父吴玉、母李氏，有子女8人，吴俊升行二，身下有两个弟弟，三弟吴俊武，小弟吴俊卿。吴俊升为人粗鲁，五短身材，其貌不扬，走起路来歪歪扭扭。从小冻伤了嘴，留下后遗症，没等说话先流口水，说话吐字不清，唔唔半天不能成语，为此留下笑柄，人们送他外号“吴大舌头”。

吴俊升5岁时随父迁居昌图府。其父曾在蒙古马市上当马贩子。吴长大后以贩马为业，并耽赌博，混迹于宵小之中，是一个不事正业的流氓无赖之徒。吴俊升自七八岁时就给当地王大店家牧放牛马，年得白银一二两，补贴家中生活。这个穷“马倌”衣衫褴褛，流着两筒过海的鼻涕，吃饭时别人都不愿挨着他。吴俊升穷得只有一条露肉的裤子，换洗时只好躲在水泡子里遮羞。吴很会殷勤服侍店主人，故得其厚爱，遂收为义子。吴俊升发迹后，高兴时常讲起那段生活，博得大家一笑。吴俊升因长期放牧

而习马性，有过硬的马上功夫，为后来当贩马经济打了基础。

吴俊升的牧童生涯一直持续到13岁，后经人介绍进入老四平街的庆丰当铺当学徒。其间，吴常因点小事与人争吵，甚至动刀行凶，更有甚者，在一旧历正月，当铺里办高跷，吴扮成丑角在队伍里横冲直撞，用小刀往伙伴的屁股上乱捅乱扎，惹起众怒，视他为不屑之徒。吴生性顽劣不驯，经常惹事生非，数月后被主人解雇回家。吴俊升又来到本县兴隆泉村（今昌图县太平乡兴隆泉）李财主家做“半拉子”。夏季农活很累，吴俊升晚上常常露宿在大车铺板上。有一天晚间，李家财主从屋里出来，天黑看不清，以为车上趴着一只大黑熊，便吓得拔腿就跑。从此“黑熊显相”的讹传不胫而走。

吴俊升迫于生计，混迹贩马市场，充当马贩子经济人。他“驰马试剑，臂力绝伦”，“是时，尝为商家炮手，盗贼遁迹，举邑安之”。既而志在从戎，欲置身军旅，便投效到辽源捕盗营，年17岁。当时中国有句俗话：“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认为当兵是无能之辈或宵小无赖之徒。但吴俊升为要摆脱贫困，只好混到人民群众厌恶的军营中。最初在捕盗营当一名伙夫，顶头上司是丁把总，吴俊升的军旅生涯当始于此。吴俊升既习马性又善骑射，不久就当上了管理军马的马夫。到20岁那年，义父王店家资助了一套少一只蹬的马鞍具，李财主提供了一匹一只眼的马，这才真正当上了一名正式骑兵。当吴发迹后，不忘李家大恩大德，为其挂匾一块。

吴俊升当上骑兵后仍然不守军纪，但由于他善用马，精力充沛，膂力过人，还是受到上峰和同伴的喜爱。吴俊升到二十四五岁，已升为班长，这时的吴俊升仍是一贫如洗，没有办法，只好发挥自己习马性的特长，业余干起马经济来。驻地郑家屯是蒙古马的交易市场，吴俊升经常出入马店和交易市场，为买卖的双方做中介人，成交后得一定的好处。

吴俊升到34岁时，已当上了相当于连长的把总。1897年，吴俊升以把总带队讨伐海龙、通化地区的土匪，因功补缺守备，但越一级补缺为都司候补。1906年2月，清军绿营改制，所在部队编入后路巡防队，被任命为后路巡防队副统领官。1907年，因出征讨伐吉林的土匪有功，又被晋升为参将候补。1908年8月，由于统领马瑞禄转黑龙江省，吴俊升升任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又因讨伐峰密山土匪再有战功破格擢升副将后补，并被授予“勇字”称号。吴俊升因打起仗来异常勇敢，每次都冲锋在前，因此受到上司器重得以升迁。

腐朽的清政府为了维护日暮途穷的反动统治，对内蒙人民加紧搜刮，在内蒙东部大肆招垦，引起内蒙人民抗垦斗争。沙俄乘机利用内蒙民众同清廷的尖锐矛盾，派特务在抗垦队伍中挑拨民族关系，收买民族败类，策划叛国活动。当时混入抗垦队伍里的陶克陶胡（郭尔罗斯前旗一个没落贵族）就是投靠沙俄的一个匪首。这个坏蛋早在日俄战争前就同蒙族沙俄特务相勾结。日俄战后，继续为非作歹，扰乱地方。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剿灭叛国蒙匪，先后派洮南府巡捕队和吴俊升所部巡防营前往剿捕，均未平息。1908年，徐世昌又特调张作霖进驻辽源，攻打陶克陶胡。

同年夏，张作霖率部来到了郑家屯。吴俊升进入军界早于张作霖驻防郑家屯多年，以地头蛇自居，因此对张作霖来此甚为反感，不准张作霖部入城居住。适逢雨季，张作霖的巡防营食宿发生了困难。后经交涉，吴勉强同意入城，但在各方面仍设置障碍。张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也极力靠拢吴，便亲自到吴府登门拜访，竟遭吴的冷遇。特别是吴俊升在举杯劝酒时说：“唔，唔，这回你来了好！这土匪向来欺侮孬兵，我吴兴权曾受命剿匪多年，收效不大，流血不少，唔，唔，还是你来了好！”尤其使张作霖愤慨的是，吴俊升当着地方士绅的面，问张作霖是何时被招抚的，使张作霖当众出丑，大为难堪，真是无地自容，周身的

血涌涌。他望着吴俊升笑眯眯的眼睛，恨不得一把掐死吴俊升。可是张作霖不愧是闯荡江湖的汉子，还是强作笑脸应酬，接风宴席没有闹翻。

不久，徐世昌又派张作霖至洮南重镇，继续捕剿蒙匪，并将其所部5营扩编为7营，除原有的汤玉麟、张作相、邹芬等营外，又把驻洮南的孙烈臣划为张的部下，使张作霖的队伍增至3500人。张作霖见徐世昌对他这样重视，在追剿蒙匪中异常卖力，到翌年春，终于击毙蒙匪首领白音大赉，并把陶克陶胡逐出内蒙，取得追剿蒙匪的胜利。

张作霖追剿蒙匪大战告捷，得到清廷的嘉奖。凯旋归来的张作霖，再也不是一年前受吴俊升奚落的张作霖了。吴俊升屡次求见，张作霖概不理睬。1909年元宵之夜，吴俊升试图为张作霖摆欢迎的盛宴，以释前嫌。可是张作霖不买账，让吴俊升一直等到入夜，骑虎难下，最后不得不屈驾来到郑家屯西街“丰聚长”迎迓。张作霖本欲再次拒见，但经他的亲信张作相、张景惠的苦劝，只好作罢。但张作霖也不想轻易饶过吴俊升，一定要给吴俊升一个下马威。张作霖便在“天聚长”三套院后面的广场上，命令两队戎装佩剑的卫兵，列队举枪，让吴俊升钻“刀林剑丛”，灭灭他的威风。这个身短舌长的黑胖子吴俊升，对张作霖虚张声势这一套倒也满不在乎，他在马弁和卫士的簇拥下，不以为然地在刀枪阵中钻了过来。等张作霖迎出来，见士兵们这种威风凛凛的架式，反倒故做恼怒地骂了起来：“他妈拉巴子，谁叫你们来这一套？拿枪动刀，吓唬哪个？”当着吴俊升的面大肆训斥士兵，是项庄舞剑，骂给吴俊升听的。“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不假，可我他妈的拿过谁的一个笤帚疙瘩？那时我就是不服天朝管，后来日俄开仗，洋鬼子打算利用我，我为了得武器，没法子，有时也得叫他们利用利用。那时我是得抢就抢，得骗就骗，都是逼得没有活路，是为武装自己。后来感到不跟官家合作，成

不了大事，我才从了大清。咋的？有啥不光彩？……。”张的一番大骂使吴俊升满脸通红。张又发泄一阵，转身对吴说：“兴权兄何必为我摆下满汉全席？好，既然大哥一片诚心，雨亭我定不负各位美意，赴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兴，全国震动，奉天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趋尖锐，在奉天的革命党人潜谋独立，推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陆军第2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总司令，欲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赵尔巽患孤立无援，欲招外兵自卫。“或以张作霖及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忠勇可恃，乃急发电召之。”张作霖方督剿于洮南南区，得讯率所部骑士星夜兼程南驰，曾不三日，遂达奉天，余众继进，初驻重兵于城中，逐中路巡防队统领金道坚取而代之，于是两路马步军俱入掌握。初吴俊升得电踌躇待张作霖捷足先登，始悟失去了一次表演的机会。不过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也非常明显，在清王朝行将寿终正寝时，吴俊升受赵尔巽命，伙同张作霖等32名将领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反对民主共和，推行君主立宪，要求率军勤王，剿灭革命军，尽忠于朝廷。

1911年秋，蒙古扎萨克图王乌泰，叛国独立，欲乘机占有洮南一带，与俄缔约，得大宗枪弹。率4千蒙古骑兵，一进而陷洮南、庆州、镇东、安庆诸县，均望风降蒙军。袁世凯调20镇及23镇，合奉天巡防队击之。蒙叛军骁将除福胜、荣升、成德外，尤以陶什陶最勇悍。各路大军进剿，未奏掳功，独吴俊升率部，自郑家屯兜击，一战而挽回颓势。8月25日，达信阳窝堡，26日克复镇东。28日至洮南的东南特安堡，将蒙将荣升一军击破，洮南解围。嗣与吉林高凤城之23镇会师以后，蒙军始渐退去。

1911年12月，清廷擢升吴俊升为总兵候补，与张作霖、冯德麟、马龙潭齐名，称之奉天“四大重镇”。

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帝国主义趁机对

中国加紧侵略，利用中国反动势力，阴谋暴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前清廷内务府大臣肃亲王善耆同日本浪人川岛速浪勾结起来，组织宗社党，策动“满蒙独立”运动，他们支持蒙古反动分子喀喇沁王等招兵买马，拼凑“勤王军”，妄图建立“满蒙王国”。1912年6月8日，为阴谋组织“满蒙王国”，日本陆军上尉松井清助等率众向蒙古“勤王军”运送50辆大车的枪械弹药，是日，被吴俊升所部在郑家屯附近全部截获，悉数炸毁。当拦截交火时，打死日本侵略分子13人，土匪30名，蒙匪9人，重伤松井，还俘获了一些日本侵略分子和土匪。此后日本仍不死心，继续武装偷运军火，均被吴击溃。吴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与日寇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同时，沙俄仍继续支持内外蒙古叛匪在东北窜扰。时蒙古宾图王为部下及匪徒所拥立，又犯洮辽，吴俊升于康平辽阳窝堡间为蒙叛军所败，辽源，掏鹿、西丰等地先后皆危。时俄使通牒袁世凯，不妨承认其独立，否则即和平解决。蒙匪遣使游说，愿以东蒙古王位、任上将军并赠以军饷5万卢布相许来诱使吴俊升上钩，吴均置于不顾。1912年4月，东部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派遣葛根庙喇嘛锡勒图和该旗署的协理召吉诸庆额去库伦，向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表示“诚心归投”，并请求外蒙古反动分子给予援助。哲布尊丹巴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司令”。

乌泰叛国阴谋活动，早为东北当局察觉，为加强布防，令吴俊升扼守洮辽一带，并拨陆军炮兵一队归其节制。袁世凯以讨伐蒙匪至难，令赵尔巽编一师新兵为征蒙之需，而以冯德麟统辖。时吴俊升所部与左路巡防4营，混成协骑兵2营、20镇1协、23镇1协，偕同反攻。8月16日，乌泰在靖安县（今白城市）发布告示，驱逐地方官吏。为此吴俊升奉命赴洮南，“慑以兵威，晓以大义，仍冀和平解决”。但是在沙俄及外蒙分裂分子的煽惑

下，乌泰利用当地蒙民对“移民设治”政策和地方官吏、奸商的不满情绪，于20日在归流河南岸的白庙发布《东蒙独立宣言》，“布告独立，与中国永绝交通”，开始举兵叛乱。叛兵分三路向洮南开通（今通榆）突泉进发 。声称“ 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科右后旗镇国公喜敏珠尔追随乌泰同时叛乱，并采用里应外合办法占领镇东县城。吴俊升率马、步十营及山炮一营，共3千余人，由郑家屯驰赴洮南，与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派出的许兰洲的部队夹击叛军。初战互有胜负。后来，吴俊升采纳了书记官董吉庆提出的剿抚并举之策，孤立叛军。9月9日，吴即与叛军展开激战。打败叛军，解除洮南之危 。8日 ，吴又趁势收复嘎喜喇嘛庙。11日，攻克瓦房。吴俊升继续率部进击，13日在葛根庙两次大败叛军。同日克服乌泰王府，乌泰携眷进入索伦山，经呼伦贝尔逃往外蒙古。蒙匪既平，吴俊升于同月晋升陆军少将。4月授勋五位获四等嘉禾章，12月获三等文虎章。吴俊升平息蒙古反动分子乌泰的分裂叛乱活动，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13年2月，袁世凯将奉天后路巡防队抽一部编成陆军骑兵第2旅 ，吴俊升兼任旅长以牵制张作霖 。骑兵第2旅辖第3团（团长诺门巴图，团副梁忠甲）、第4团（团长石得山）。5月吴加陆军中将衔，8月，外蒙军队千余人进犯辽源，被吴俊升率队击败。11月吴俊升克复经棚（今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境）驼罗大王各庙蒙匪案内出力，吴俊升负伤遇险得部下梁忠甲奋力救助，化险为夷。吴因功获二等文虎章，晋授勋三位。12月，吴俊升任林西、经棚地区守备司令官。1914年2月，吴俊升晋升陆军中将，3月兼任洮辽镇守使。吴俊升不仅握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东部内蒙王公之上，俨然成了一个地方“督军”。吴俊升的威望提高和袁世凯的重用，引起张作霖的疑忌。张作霖为不受吴俊升

的压抑，使出同袁世凯相同的一着棋，推荐马龙潭为东边道镇守使，以示对吴俊升的牵制。

1915年4月4日，袁的心腹段芝贵率卫队到奉天上任，不久便拉拢张作霖、冯德麟、吴俊升等奉军将领充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张作霖、吴俊升等对狐假虎威的段芝贵也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 。9月 ，他们联名向北京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12月23日，袁世凯洪宪帝制自为之际，乃大封文武官员，吴俊升被封为二等男。可是在反袁力量骤起时，吴俊升马上参与张作霖的密谋，并支持其打出“奉人治奉”的旗号。

1916年1月 ，巴布扎布所部百余人在康平县与吴俊升部 交战，三名匪首被吴俊升擒获。4月，张作霖暂时署理奉天军务，兼代巡按使，冯德麟帮办奉天军务，张成为奉天军政首领。同年夏，巴布扎布率匪徒3千余人，在日本大尉青柳胜敏的指挥下，从呼伦贝尔盟喀尔喀河（即哈拉哈河）畔出发，向洮南方向窜扰。24日，巴布扎布自称宗社党领袖，率匪徒攻占突泉县城。25日，吴俊升与巴布扎布大战于突泉，吴亲自督战，毙敌5百余人，一举击溃巴布扎布叛匪。26日，吴收复了突泉，巴布扎布残部向郭家店逃窜。吴俊升在“突泉之战，右臂中弹伤骨折，医者剪碎骨十余片”，旁观者不敢睨视皆战栗，吴颜色不变，谈笑如常。10月吴俊升晋授勋二位，获二等嘉禾章、一等文虎章、一等宝光章。

1917年1月，汤玉麟因与奉天警务处长王永江不睦，谋叛张作霖，吴俊升、马龙潭多方调停均未奏效。后来竟发展到兵戎相见。在张作霖召开的27师全体营团长会议上，炮兵第2营营长阚朝玺首先发言，拥张惩汤，大家皆附和，于是按照阚朝玺的提议形成决议案，每人都签字盖章送交将军署张作霖。这时吴俊升也来见张作霖说：“若是大帅想打，俊升带队打前敌，我去揍这个兔羔子去。”张作霖听后高兴地说：“大哥，你把队伍集中候命

吧。”同年8月，中央骑兵第2旅及后路巡防队等为中心改编成陆第29师，吴俊升被擢升为师长。辖步兵第57旅(旅长耿玉田)，下辖步兵113团和114团（团长分别是蔡永镇和万福麟），骑兵第58旅（旅长陈锡武），下辖骑兵29团、115团、116团、（团长分别是陶经武、彭金山、陈辅升）以及炮兵第29团(团长石得山)。吴俊升所辖陆军第29师编制与一般陆军师编制不同，通常一陆军师应辖步兵二个旅，每旅二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骑兵团。而吴的陆军第29师少一个步兵旅，却多一个骑兵旅，此种编制在当时实属罕见。10月，洮辽镇守使一缺裁撤，吴旋奉命率部赴黑龙江援助新上任的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解除黑省步兵第一旅旅长巴英额、陆军骑兵第四旅旅长英顺的兵权。

1918年援湘之役，吴俊升编在第三路任司令，张作相副之，经津浦线南下，正面布阵于赣西，但二、三两路援湘军未到前线。8月，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兼辖吉、黑两省。1919年，张作霖第二次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北京政府调黑龙江省督军鲍贵卿转任吉林省督军取代之，把扩张势力的触角伸向吉林，时吴俊升兼任东北边防总司令，率29师驻守中东路西部边陲满洲里。吴自以为论功行赏，江省督军一席舍己莫属，讵料张作霖竟委本系之孙烈臣为督军，当时孙自京返，荣利兼收，意气扬扬，快乐之至，反视吴氏，则忿忿之情，有不能或已者，在吴之视孙，不啻后辈，而竟先自腾达，擢得督军之荣位，其怏怏亦固然也。1920年10月，吴俊升获一等文虎章。

1921年3月，吉林督军鲍贵卿受张作霖排斥，以失职及疾病，至辞职之不得已，其后任即内定吴俊升。吴氏是在张作霖的推荐下荣任督军而膺省长的，“从来毫无何等经纶抱负，知识简陋，除自肥囊橐外，一省政治财政军事若何，初不置意，犹风马牛不相及也”。不意由政略上，复调孙烈臣转任，以吴氏督江省。吴俊升积年之夙愿，如愿以偿也。吴氏当时之得意情况，可

想见矣。5月，吴俊升以王树常署理黑龙江督军军署少将参谋长兼任步兵第22旅旅长。王氏先后二次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深造，是奉军中学历最深的高级将领。但其初到督军署却遭到吴俊升的冷眼相待，后来由于王树常的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勤奋，对吴俊升也多毕恭毕敬，久而久之，才成了吴俊升心目中的"王葛亮"，事在人为也。同年6月吴俊升加陆军上将衔。是月吴俊升通令黑龙江省整顿保卫团。9月17日吴俊升电告北京政府，远东共和国在齐齐哈尔擅设领事馆。

1921年秋吴俊升父亲吴玉病故。吴于翌年秋将其灵柩送回昌图县兴隆沟安葬。吴俊升在其父生前就已把茔地修好。为光宗耀祖，表示孝道，送殡队伍浩浩荡荡，用36杠抬灵，分作两班，用人144，每两小时轮换一次，一班抬灵，另一班持枪两侧护灵。吴俊升手举白灵幡由四人抬着跟其灵后。由120人组成的军乐队，每到一村镇就奏起哀乐。20套玻璃马车紧随乐队之后，马的颜色各车均不雷同。车里坐着女眷。由70头骆驼组成的给养运输队殿后。送葬队伍到达目的地后又停灵七天。围观者人山人海，吊唁者络绎不绝，哀乐昼夜不绝于耳。讨饭者也成群结队不计其数。方圆七里八村不得安宁。吴将其父安葬后，派十几个士兵常驻兴隆沟，守护茔地。1923年3月，吴俊升又从长青堡、垮屯等附近村庄雇来一百多人为茔地植树。吴很迷信看重茔地风水，为此不惜代价修改河道，引河水倒流。仅种树、修河两项用去了一年多时间，不知毁了多少良田和道路。

吴俊升自升充黑省督军后，对张作霖感恩戴德，每逢年节，必由江省躬身赴奉垣谒见张作霖。遇到巡阅使署身分职务不同的军官却馈赠食物或金钱，还送温暖话："唔！唔！老弟，你不愿在奉天干，你到黑龙江去有你的官当！"但如果有人真的辞去了在奉的职务去黑龙江找他，吴俊升多是不予接见，即使接见了，必当着副官们的面大骂："他妈的谁认识你这小子。"这时找吴

的人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可吴俊升对待张作霖本人可谓百依百顺，身为黑省督军的吴俊升每对张作霖恭贺时都行大礼。逢年节，吴送张的子女压岁钱，遇有张作霖不高兴时，竟当众训斥："有那精神头把地方好好管一管，少来这一套。"吴虽难堪，还是喏喏连声。吴俊升出身行伍，目不识丁，但却能领悟处世之道，深懂旧社会官场逢迎周旋那套，对上恭顺，对下则粗暴凶狠，甚至十分狡诈。

1922年3月29日，张作霖召集吉督孙烈臣、黑督吴俊升、27师师长张作相及各旅团长在督署开会，决定出兵与直系作战。同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俊升竭力援奉，但素质极差的奉军不堪一击，被打得大败。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直系魁首吴佩孚为离间吴俊升与奉系关系计，曾使北京政府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省督军。吴接电后，连召集众将领商议，会上有人主张接受电令，万福麟则认为被要挟之命不可盲从，力主保持镇静。吴俊升采纳了万的意见，回电拒之，称北京政府命令为乱令。吴仍任黑督。东北奉系遂得巩固，因而消弭祸患于未然。5月19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兼奉省省长，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通电：自5月1日起，东三省政务自主，并与西南及长江各省一致行动。8月11日，黑龙江陆军训练处成立，吴俊升兼督办，王树常兼任处长。东三省对北京政府保持独立状态。是月东三省保安联合会在奉天省议会召开大会，28日闭会。会议通过了《东三省保安规约》，会议主席杨宇霆任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副之。11月吴俊升获一等大绶嘉禾章。

第一次直奉大战，张作霖败退东北后，决心整军经武，以图东山再起而雪战败之耻，乃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整训东三省陆军，统一番号，黑龙江省境内辖东三省陆军第11旅（旅长巴英

额）、第15旅（旅长万福麟）、第17旅（旅张明九）、第22旅（旅长石青山）、骑兵第2旅（旅长彭金山）、骑兵第4旅（旅长李冠英）、骑兵第5旅（旅长梁忠甲）。

1923年1月5日，张作霖召集孙烈臣、吴俊升、朱庆澜开会，决定以边防军5个旅驻守东省铁路沿线各处。3月21日，吴俊升严令禁止各机关团体举行反对“二十一”条的任何活动。同年7月，窜于黑龙江省各地的大约54名土匪头目，分别率领其匪众共约800余人，投到吴俊升麾下，要求将他们收编为军官，匪众收为士兵。吴俊升对这伙来降者费尽心思，权衡后，决定将其改编成一个团，派绿林出身的现已成为吴的亲信的徐海亭为团长。然而54个土匪头目都想为自己争好位置，为此闹个不休。吴俊升想，这些人的要求不会满足，如果他们再把各自的部下都煽动起来，免不了会惹起麻烦。心毒手狠的吴俊升动了杀机，决定全部杀掉。于是一面暗地里把徐海亭叫来，面授机宜，一面佯称要向匪头目授予官职，还亲自举行任命仪式。将其招到督军公署，卸掉他们随身武器，以参观吴的自用马为由，将人引到这些厩舍旁，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七八名士兵忽然围将起来，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头目，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部捆绑起来，押到西门外枪决了。800余名匪众也没有一人幸免。吴俊升一次杀掉这么多人，恐怕在军阀史上也属罕见。

吴俊升残暴成性，在其省督军衙署内，设有“土匪”的刑讯室，墙上挂着各式皮鞭，室内摆着各种刑具。吴经常亲自审讯，令副官用刑，将“土匪”打得皮开肉绽。酷刑下，常有诬民为盗之事，很多无辜者被折磨致死，但也有个别硬汉子，在酷刑下，咬紧牙关不肯认罪的，吴俊升则认为是“铁骨头”，竟然宣布无罪释放。

直系军阀曹锟于1923年10月5日，以重金贿赂当选总统，粤、皖、奉三方曾有联合倒曹吴之三角联盟。直奉双方都在做军

事准备。奉系仍名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下辖6个军，吴俊升任第5军军长。11月24日，吴俊升以黑龙江省督军、省长训令下发《整理黑龙江全省游击队办法大纲》，规定在省城设立全省游击队营务处，并将省署清乡办改名为黑龙江全省清乡局，附设于营务处内。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吴俊升于9月22日占领开鲁，攻陷赤峰，直取喜峰口，到10月7日，热河战争即告结束。10月23日，直军将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政权，12月北京执政府任命吴俊升督办黑龙江省军务善后事宜。吴于12月27日令，自翌年元旦起改省防军为保卫团。

1925年2月，吴俊升任善后会议会员，3月，东北军整编，兼任东北军第18师师长，辖第15旅及第22旅；12月23日，奉军大将郭松龄举兵倒戈，挥戈东下，直逼省垣。张作霖坐困省城无兵可调，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有人向张作霖进言说吴俊升按兵不动。事实并非如此。奉军在整编中，黑龙江省只编了两个师，17师、18师。到1925年10月，奉张作霖之命，万福麟17师及步兵梁忠甲第15旅出击多伦，参加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归吴俊升第五军建制。吴指挥三个骑兵师和步兵第15旅。万福麟为副军长，所部第17师为第1梯队。先遣骑兵已进抵围场、锥子山等处，即按令调头至锦州方向前进。因此，当时留在黑龙江省的军队只有省防三个旅，护路和维持地方治安任务繁重，实际是无兵可调。

正当各路骑兵进至赤峰、建昌、朝阳等地集结时，吴俊升得知郭松龄倒戈反奉，又得张作霖电，遂即到奉。吴俊升到帅府，见周围已堆满待烧的材料。张作霖含泪对吴说：“大哥你来啦，我要走了，你在这儿同郭鬼子周旋吧！”吴见张作霖有意刺激他，就说：“唔！唔！上将军，我和郭鬼子誓不两立，有他没我，我和上将军哥俩同生死，你先别走，我还有黑龙江骑兵，还有炮，

我跟郭鬼子决一死战，我抄他的后路。”张作霖遂任命吴俊升为讨逆军总司令，激战于巨流河。

吴俊升在巨流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说：“我是老粗，不懂得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怎么划，我知道两人打架，我扯谁的后腿，谁就得趴下，我带领骑兵，由辽中绕道去白旗堡，扯郭鬼子后腿去，他一定得趴下。”吴俊升于12月21日到达前线下达命令，组成以万福麟、马占山骑兵第五旅及骑兵17团为突击队的先遣团。穆春骑兵14师沿前头部队行进路线跟进，张九卿骑兵第3师为预备队，在大民屯左翼警戒。吴俊升最后训话，大意是要求拧成一股绳，郭鬼子来了我们都不能存在，和他决以死战。吴还说：“我出发后由梁忠甲旅长代行我的职权，上将军说了，你们都要服从指挥，唔唔，军无戏言。”梁忠甲送吴俊升，吴边走边嘱咐说：“唔！唔！子信(梁的字)，官印我给你，这个时候，不管谁，不服从，毙，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无戏言！”

由于吴俊升率骑兵焚毁了郭军在白旗堡存放军械、弹药、粮秣的仓库，损失殆尽，郭松龄力穷势促，于12月24日凌晨偕其夫人化装，率卫队乘坐大车向营口方向逃去。吴俊升策马直追，前卫部队王永清团在小苏家屯擒获郭氏夫妇，解至老达房后身魏家村，郭氏夫妇授首，奉系转危为安，“吴氏功莫大焉”！

吴俊升嫉妒心很强，见郭松龄夫妇被穆春部下王永清捕获，直接上报张作霖邀功，气得掉了眼泪，并和左右说：“唔！唔！这仗白打了！穆春这小子瞧不起我，抢了个头功！”从此，吴俊升怀恨在心。当1926年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发生多伦事件时，吴俊升乘机将王永清部抢劫喇嘛寺等诸多罪行，报与张作霖，目的在于加重对穆春的处罚。果然张作霖冷落穆春多年，使其饮恨终生。

1925年12月29日，张作霖在帅府召开善后会议。平定郭变虽然取得胜利，但大乱初定，创伤很深，军事政治百端待理。在战

争期间，张作霖为应付对方指责，曾通电罪己，表示战事结束，引咎辞职，还政于民，因而战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以符前言。此外，奉军在郭变前，已酿成新旧两派的对立局势，平郭变中尤以吉、黑两军出力最大，特别擒获郭松龄者是黑龙江骑兵王永清，所以对旧派进行褒奖。参加这次会议的军政要员有：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杨宇霆、王永江、袁金铠、王庭五等数十人。张作霖走进会场，环视一周，然后语调深沉地对袁金铠说："四哥，你把通电先宣布一下，明天就发表。"袁遂高声宣读。大意是：张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因而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政治交王永江、军事交吴兴权，军政由此二人主持，请中央派贤能前来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袁尚未读完，吴俊升站起来，摆手摇头说："唔！我一天也担任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儿撂下。"王永江也接着站起来说："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但有大帅在，我可以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误民。现在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在不堪设想。倘国人招致内忧外患，大帅实有负国家人民倚任之重。"吴俊升马上接王永江话茬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会议紧张气氛顿时化为乌有了。

张作霖听后，喜溢眉宇，站起来说："依大家意见，我只好勉为其难，将来有人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避路让贤。"说到这里突又环顾四周说："常荫槐来没来？"常从角落里站了起来说："我在这里。"张作霖正言厉色地说："常处长（军法处）我命令你坐专车把张学良给我抓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跑了拿你的脑袋来！"常刚想转身离去，吴俊升慌忙站起来摆摆手说："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张作霖假装怒气冲冲对吴说："你有什么说的？"吴说："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没有他一天不行，一天也不行。""你胡说八道！"张作霖跺着

脚申斥，声震屋瓦，全场皆惊。“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二万人在山海关，马上和冯玉祥合了股，合了股一定要卷土重来，这股生力军，要比新民的郭军力量大上几倍 ，打过来奉天就不容易挺住了 ，唔！唔！唔！现在应该赶快收编郭军败兵，马上封锁山海关，这个任务没有张军长谁也不行，谁也办不到，唔！唔！我可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唔！唔！他一摆手，那些人都回来了，冯玉祥啥也捞不着，那时直鲁联军才能抄冯军后路，张军长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掌中了，到那时候，我才敢保你进北京。”

这时杨宇霆站起来说：“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张军长现在一身系东北大局的安危，为大局……。”王永江再次站起来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未决问题改为另议。”王的话音刚落，张作相、吴俊升二人趁势上前每人扶张作霖一支胳膊拥其退席。

郭变后，在处理善后的另一次会议上，吴俊升坚决主张“刑乱用重，此辈叛徒，不易轻恕”，“将郭松龄的主要将领全部法办 ，永不录用 ”。而奉军元老张作相则提出与吴俊升相反的意见 ：“凡随同郭松龄反奉的将领和团级以上干部 ，一律从宽处理，不加株连。”张作霖采纳了张作相的意见。如果按吴俊升的意见办理，郭变后的奉军历史就得重新写了。

奉系军阀统治东北，连年用兵，穷兵黩武，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黑龙江省几任督军都兼省长，实行武人专制，一个比一个坏。吴俊升“其人貌视戆直，心实险诈，蒙上欺下，营私舞弊，无所不用其极”。吴贪婪成性，据当时的金融界估计，他的钱财比张作霖多，在东北军阀中是首屈一指的，可见他贪得无厌，无孔不入。1926年吴借儿子吴泰勋结婚之机，来一次大搜刮，办法是给全省大大小小的官吏乃至穷乡僻壤的乡长，

每人一张喜帖。所得贺礼就堆积如山，多为珠宝首饰，金银器皿和珍贵服装，至于喜幛之类就很难登上大雅之堂了。同年2月20日，张作霖召集吉督张作相、黑督吴俊升等人开金融会议，决定在官银号内设立公共汇兑所，为入口商办汇兑。

1926年夏，奉军入关攻打冯玉祥国民军，吴俊升率部相继占领了榆树、门沙口等地。7月21日，又占领了多伦，迫使国民军向绥远退却。不久，吴晋升陆军上将。时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吴俊升要求"保境息民"而不主张南下"讨赤"。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北方军阀作垂死挣扎。11月吴俊升、张作相、孙传芳、张宗昌等16名将领联名通电，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决定派奉军入豫援助吴佩孚，以直鲁联军支援孙传芳，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责令吴俊升、张作相固守后方。年底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进驻北京紫禁城，暗下决心不再离开北京，实现他梦寐以求图霸中原的野心，当一当总统、皇帝。张作霖纵然野心勃勃，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想到了吴俊升。

吴俊升收到张作霖的"即刻赴京"的电报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张作霖亲到车站迎接。

张作霖陪同吴俊升游遍了古都的名胜古迹，最后张作霖陪吴来到颐和园里，吴俊升站在排云殿下，终于说出了张作霖的心里话："唔！大帅，你把我叫到北京，你那心思我全明白。唔，别看我嘴笨，你那桩大事干脆就包在我的身上吧！"张作霖听后，越发佩服吴俊升的精明。于是吴俊升在偌大的北京，到处为张游说。

吴俊升在对日本公使说："唔！他出身胡子可不假，可他为人正派，脑袋瓜子够用，会打仗会用人。唔！他才是我们奉军的骄傲！"吴俊升说服了日本公使，又去向孙传芳、张宗昌进言："他是政治家！他凭什么问鼎中原？凭什么指挥两次直奉战争？唔！他北京政府里又没有靠山，全凭什么？唔！他全凭自己的英

雄！”“唔！他是军事家！从他打郭鬼子那场硬仗起，我就看出来了张雨亭了不起，唔！军事大才呀！这样的人我真恨不得捧他当皇上！”吴俊升直说得二位连连点头称是，直说得杨宇霆哑口无言。经过吴俊升的一番周旋，众将领居然愿意推戴。

1927年6月18日，吴俊升等将领通电推举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成为北洋政府末代最高组织者。7月，废除安国军、直鲁联军、五省联军番号，统一编为陆军第一、二、三、四、五、七等六个方面军团，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任军团长。张作霖为有巩固的后方，确保东北社会的稳定，委任吴俊升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吴俊升成了张作霖看家护院的鹰犬。在此期间，吴俊升对东北各地人民反对军阀黑暗统治的斗争进行了血腥镇压。1928年1月，以通化为中心的东边道10个县的农民大刀会举行了武装暴动，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张作霖甚为震惊，急忙调兵遣将，令吴俊升带两个骑兵团，会同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及其巡警队前去镇压。1月25日吴俊升率军队自奉天抵通化城，督“剿”大刀会。吴俊升对声势浩大的大刀会也是望而生畏。吴认为大刀会“自谓一念咒语，枪弹莫穿，犹如拳匪之言，未足信也。然而团结无畏，自信勇悍，殊足畏惧”。“故讨伐军警，不易迅奏捷功”。于是吴俊升采取两面手法，剿抚并施。一方面，吴赶到通化，组成以他为头子的司令部，分兵进剿。通化大刀会失败。吴俊升率部转往辑安、桓仁、临江继续“讨伐”。并急电吉林黑龙江两省派兵协剿，各县军警予以堵截；另方面，利用“和谈”来麻痹大刀会，进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2月21日，吴俊升根据日本特务提供的情报，亲自指挥4千多军警包围了大刀会的根据地临江县红土崖子和八道江，用重炮猛轰之后发起猛攻。双方激战五昼夜，军警死伤七八百之多。但吴的军队装备精良人数众多，大刀会不敌，乃突围。吴部俘获大刀会头领大法师张树声、尹老道等

10名一并杀之。吴俊升以巨大代价攻占大刀会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12岁以上者皆杀无赦，据不完全统计，通化、临江两地大刀会成员和无辜群众有三千五百余人惨遭杀害，其中会众1260名，有11名法师竟被惨无人道地“剐斩”。有3千多间房屋被焚毁。吴俊升“讨伐”大刀会后返奉，是日发表谈话：以通化为中心的大刀会，其数达7千，抵抗官兵者已大部被击毙，后事由清乡督办齐恩铭办理。

吴俊升镇压大刀会之后，张作霖因安国军的节节失利，不得不保其进关助战。4月29日吴俊升到德州布防。这天张宗昌正集合残兵败将，准备再作一次挣扎，为了使士兵能卖命，不仅亲自发给每个士兵6元现大洋，而且还来了一次痛哭流涕的演说。表演毕，张宗昌、吴俊升登上专车商议军情。败局已定，无话可说，只是三言两语，草草了事。闲来难忍，余兴大发，找来一伙娼妓，在专车上寻欢作乐起来，玩得高兴，每个妓女赏大洋一百元。前者卖命得6元，后者卖身却得了一百元，士兵气得破口大骂。

张宗昌退出济南后，吴俊升也放弃德州而走。接着吴奉张作霖之命，在榆关设后方司令部，掩护奉军各部撤退。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在济寻衅，无故屠杀中国军民4千余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其中就有中国外交官横遭杀戮。日寇以此来阻止蒋介石的所谓北伐。这时吴俊升进京为张作霖召开的军事会议出谋划策。吴认为与其在京不如归奉闭关自守，以待来日。辽东虽小足以为王。当时，张作霖因种种关系，未如所请，慨然与之东归。后来张作霖军事失利，决定撤兵出关，派吴俊升护送眷属回奉。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吴闻讯非常欣慰，欲赴山海关迎接张氏，闻其家人及僚属等均不愿其前往，吴则置之于不顾，乃抵关上，与张作霖偕同归来。不意专车行至皇姑屯南满路与奉路交叉处，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吴俊升被

炸身亡，终年65岁。

吴俊升是奉系军阀中仅次于张作霖、冯德麟的第三号人物。有多种怪癖，是一个地道的荒淫无度的好色之徒。对美女，他虽比起“长腿将军”张宗昌那数十人规模的“姨太太队”有所逊色，但也是三妻四妾，供其寻欢作乐。他对自己的主要嗜好从来不加隐讳，竟然挂出“自古名将爱良马，从来美人属英雄”的对联。吴俊升除爱美女良马之外，还有个特殊的癖好，那就是喜欢猴，堂堂黑龙江省督军署的后院，大半被马厩和猴舍所占。吴有上乘的良马千余匹，大小猴子成群结队，有专人喂养，费用公款开销。吴经常在早晨到马号猴舍观马玩猴。见到良马珍猴便眉飞色舞，一些无耻宵小以此阿谀奉承。于是，他的猴舍马厩竟成了当时求官行贿的场所。

吴俊升是个治国无术、残暴有方的军阀。他对政治一窍不通，掌握着省内兵马大权、行政大权和对省内百姓的生杀予夺的大权。需要金钱，就征收税金，或滥发纸币，随意挥霍。吴把全省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用于充实军备，而对民政方面则不予重视。如吴俊升因自己身体健康就漠不关心卫生事业，因为自己没有受过教育则对教育事业不予理睬，因为其思想陈旧和预算不公平使工业和交通也得不到发展。他几乎年年要为奉天出兵参战，花去的军费也不知有多少。为了不损害奉天的利益，他经常用省库广信公司滥发纸币，使纸币贬值，商业遭到很大打击。所以吴俊升在统治黑龙江省时，“钱法毛荒、治安紊乱”，均在辽、吉两省之上。省县的重要官员，多数被他的亲属、部下和以他为靠山的土豪、恶霸所把持，在吴的手下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赵家五虎”、“石家二弟兄”、“董家三父子”、“刘家御外甥”之类的人物。

吴俊升在长期军阀混战中发了横财，缴获无数战利品中饱私囊。特别是爬上督军宝座之后，更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得到大

量土地和财产，在当时仅次于第一号财主张作霖。但吴俊升本人并不甘示弱。有一次同张作霖谈话，他满口喷着唾沫星子，结结巴巴地说："唔！唔！别看你是大帅，可我的财产比你多。"吴俊升敛财之多，土地之广，真是洋洋大观，北起齐齐哈尔，南至郑家屯铁路沿线，占有良田27万垧之多，对农民进行无休止地盘剥。吴俊升还广办工商业，如齐齐哈尔广信公司（合办）、绥滨火犁公司、黑河金矿、洮南和郑家屯电灯厂以及四平天增长机器油坊，其中有些是与人合办的。以"天增长"机器油坊为例，就是吴俊升同热河都统阚朝玺合资经营的，这是四洮铁路范围内最大的一家机器油坊。该厂占地长半华里。高高的围墙，四角有炮台由专职炮手护院。受雇于"天增长"的员工很多，仅吃住在油坊里的工人就不下二百人，那里等级差别很大，从薪水到就餐分三六九等。油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粮栈"。吴俊升利用公款买来粮豆，经过加工，然后高价卖出，牟取暴利，每天卸粮大车百余辆；二是"钱庄"，以兑换现大洋、日本金票和奉票，从中渔利，有四五人专门办理此事；三是"信托"，即参加投机商们的粮价赌博活动，买空卖空。此外，吴俊升还自己在郑家屯开办了一个"天合长"综合商号；"永合长"商号，挤占半面街。"天合长"商号有粮栈、有当铺。号内设有副官办事处，两名副官为其管理。吴俊升的财产数也数不清，吴常对人夸耀说："咱家有很多钱，在东三省的人，每人平均给一块大洋那么多！"当时东三省的人有三千万之多，一人一块大洋钱即三千万了！吴俊升还建有公馆四处：在奉天小河沿上坎山神庙有一处；郑家屯有号称吴家辕门的公馆一处；大连黑石礁的避暑庄园以及北京皇城根各有一处。吴俊升无论是帅府或公馆固然修得别致考究而又文雅，而他本人却是不学无术的一介武夫，因此，在民间留下不少茶余饭后的笑料。诸如吴俊升到京讲话："小弟吴俊升初到北京，感谢父老款侍，唔、唔！去他妈的吧！"吴俊升有回看学生

的篮球赛。他看到学生为一个球奔跑得汗流浃背时，便口吐同情怜悯之言，"唔！唔！别抢了，回去让管事的一人给买一个。"吴俊升入厕见一癞蛤蟆就说："妈的吓我一跳，唔！唔！我也吓你一跳！"如此不伦不类的笑话不胜枚举。尽管是有人故意编造出来或是有意嘲讽他的鲁莽无知也为不可，更无从可考，不过在邹韬奋的文集中，确有一篇关于吴俊升"生吞香蕉皮"的记载，说的是这介武夫在奉天日本松竹斋带皮吃香蕉的丑行。吴的下属见此情景曾俯耳相告："大帅扒了皮吃。"吴非但不听，反而自以为是地大声说："唔！唔！我就得意带皮吃。"这种拙劣的掩饰，怎能不叫人捧腹大笑呢！

吴俊升升迁督军之后，偶尔回发迹之地郑家屯时，官府、店铺、学校、豪绅及乡民百姓都出来夹道迎接。而这时的吴俊升则走下火车，既不骑马也不坐轿，而是手托礼帽徒步前行，并拱手向乡亲父老问候，频频点头，招手向前来迎接的市民和学生示意，给人以谦恭之感。对欢迎的学生，还赏以微薄的学习用品，砚台、镇纸之类用品，收买民心。还乡时，还巡视买卖、学校，讲些语无伦次的恭维之话，对民众进行笼络。

有一点还值得提及，吴俊升在他帅府的财务开支中，有一笔不占很大比例的兴学费。在洮辽一带，确有一些子弟是靠吴的兴学费读书的，也有靠这笔钱到国外去留学的。当然这笔兴学费对吴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起到了笼络人心的作用，不过作为一介武夫有此兴学之举也是可取的。

张　　钺

张慕骞　张慕良

张钺，字成秋，幼名秉信，留日时曾用名鉴衡，字子铨。1884年阴历正月初八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黄旗寨乡谢家沟屯的一个贫穷的大家庭里。

当时清朝正值逐渐衰败，大家庭人口众多，全家一年的辛勤劳动还不能糊口。张钺的伯父张普春是一位勤劳的农民，是当家人。他有三个儿子，即张钺的大哥秉仁、二哥秉义及四哥秉智。父亲张果春也有三个儿子，即三哥秉礼，张钺本人排行老五，取名秉信，六弟取名张练。伯父、父亲及兄长等均不识字，在农村备受无文化之苦。他的父亲给地主家扛活。大哥张秉仁看到家里生活不下去，便与同乡青年同去北京及奉天等地跑小买卖，经营一些小百货，以补助家中生活。二哥从小就为地主家干活，因年幼有时在灶坑前睡着，便受到地主的毒打。三哥自幼也为地主家干活。四哥稍长后也下地干活。

张钺自幼好学，又加上天赋很高，主持家务的伯父张普春，鉴于全家无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所以他的伯父要全家节衣缩食，一定把张钺培养出来，全家也都赞同。他的父亲每天干完农活后，还得兼做木工活，以便积累一点钱，供张钺上学之用。

1892年5里地外的黄旗寨乡开始有私塾先生。他每天往返10

里地去读书。张钺自知时间宝贵，学费来之不易，便刻苦努力学习。因学习成绩好，受到先生的好评。跟私塾老先生学习四五年以后，他的伯父和兄嫂都认为他能有出息，便让他到铁岭县城里继续读书。每年假期回乡时，因为没有钱，总要徒步走百余里地。到家乡后当即下地干活，直到离乡上学为止。与张钺年龄同岁又同时读私塾的还有同乡本屯的杨五，他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学习也很努力，成绩有时优于张钺。两人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1900年为增加家庭劳动力，依父母之命，与20里地的于当铺屯比他大6岁的于姓姑娘结婚。翌年得长子，取名竞择。张钺学习刻苦，伯父见他有长进，便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学习，同时受到家中兄嫂等人的优待，他因而学习更加勤奋，等待机会投考官费学校。1904年得次子，取名竞渡。又二年后得一女，取名效兰。

1909年满清政府选派赴日官费留学生，东北地区考场设在锦州。自此张钺改名为张鉴衡（字子铨），报名后埋头准备应试课程。张钺因家境贫寒，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为了去锦州，母亲李氏为他借了一件蓝布衫，他便与同乡杨五先生同往锦州应试。杨家经济条件较好，自杨五去锦州后，家中便开始准备了猪羊鸡鸭等，等候好消息。不久考试结果传到谢家沟屯，得知"五先生"中举。杨家误为杨五先生中举，当即杀猪宰羊大摆酒席三天，宴请亲朋好友。其后，正式通知到谢家沟屯时，才知考中的不是杨五先生，而是张五先生张钺。据庚午年《开原县志》记载，张钺考试中举人第一名。杨五先生落地，羞愧难当，一气之下咯血致死。

1906年夏，张钺和锦州地区中举与录取的学生，全部集中在天津。由天津塘沽乘清政府所属的轮船东渡日本，首先抵达东京。同时赴日的东北学生有王树常（字庭五，辽中人）、于珍（字济川，铁岭城西罗家房身人）、孙丹阶（铁岭城东熊官屯人）、

杨宇霆（麟阁，法库蛇山沟人）及王××（铁岭白梨沟）等十余人，加上关内各省考试合格的学生，共计有30余人。这些青年学生都梳着一条辫子，先在东京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及军事基础知识。张钺以优良的成绩毕业。

1908年考入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张钺与于珍等分配在第三区队学习。在校成绩每年均列榜首，他还积极参加学校规定的各种军事演习，深受同期同学的爱戴，一致称赞他学品兼优。孙丹阶在同时赴日的同学中年龄最大，他因成绩关系进入东京振武学堂。

当时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张钺在校学习期间受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影响，与黄兴（克强）先生交往甚为密切，他经常参加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组织活动。为了表示革命他率先剪掉了长辫子，经邮局将辫子寄回原籍的谢家沟屯。家属及众乡亲见到张钺寄回的大辫子，不明真意，都失声痛哭，认为他背叛了大清国。张钺经常参加同盟会的各项秘密活动，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决心为推翻清王朝而献身。不久黄兴回国在广东组织起义军，离日本前他号召革命同志及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广州，共同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1911年张钺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毕业。和他同期毕业的同学，除前述的东北籍同学外，还有关内各省的同学徐树铮，以及其他区队的唐继尧、李烈钧、赵恒惕及程潜等。张钺根据黄兴离日本时的指示，归国后立即去广州投入黄兴元帅领导的起义军参谋部工作。先任该部的科员，后经史局长推荐升为科长，积极参加革命军的起义工作。

广东起义失败后，黄兴又准备在湖南起义，在晚秋季节湖南起义，革命军及参谋部的将士与清兵大战数日，歼灭一部分清兵，起义军威震湖南。清兵大力增援，向革命军反扑，参谋部突然被清兵重重包围，革命军继续奋力抵抗数昼夜，终因寡不敌众，

张钺以一小部官兵突围，越过寒风刺骨的湘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风餐露宿始免于难。自此他患了严重的腿疼病（急性风湿病？），行动困难。在革命军同志的协助与关怀下，由湖南辗转至南京，适值黄兴元帅再次自日本归来，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陆军总长，张钺仍在黄兴总长的参谋部工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准备工作。

1912年南北议和后，他因腿疼病不适于南方生活，便回到北京治病。

1912年（民国元年）张锡銮将军出任中华民国奉天的第一任督军，在北京正多方物色东北籍的参谋长人选。1912年8月黄兴在北京开会便向张锡銮推荐了张钺，张锡銮欣然同意。张钺在北京腿疼病稍有好转，便随同张锡銮将军到奉天赴任了。

张钺与张锡銮到职后，当即组建奉天新的军政领导机构，以及改革清政府遗留下来的各项工作。

1、成立督军署：督军，上将张锡銮。参谋长，少将张钺。参谋，上校熙洽。督军署下设军务、军需、军法及军医等等四课。奉天督军直属部队的情况是：27师师长，张作霖；28师师长，冯德麟。以上两师分别驻通辽、彰武及黑山等县。奉天市内有少许直属卫队等。

张锡銮到奉天后，有人建议说："在关里有一个张（勋）冯（国璋），在关外也有一个张（作霖）冯（德麟），所以在关里要处理好关里的'张冯'，到关外要处理好关外的'张冯'。"为此就请张作霖及冯德麟两位师长各保荐两个人，便于打通督军署与他们的关系。27师派陶历卿，委为督军署上校参谋，另外还有一名。28师派白运昌，委为督军署副官处长，另一名是崇元复。

2、筹措军政经费，完善税收，保证部队的开支。

3、改革奉天省旗民占有土地的制度。

4、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

5、筹建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开发矿产资源。

6、维护东北主权，监视日军"南满"铁路驻军的人数等。

其后，北京政府又特任陆军上将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除督理奉天军务外，兼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张锡銮因年迈，督军署日常工作均委托张钺处理，两人合作甚为融洽。

当时张钺的公馆在奉天小河沿，设有收发室、卫兵及副官等。张钺对开原县家乡的来客，不论贫富或男女老少一律接见。并将这一想法告诉副官，贫者走时还给路费，在黄旗寨乡有很好的影响，至今家乡的人都称赞他。家侄张竞德自谢家沟来看望他，被收发室卫兵截住，张钺还表扬他们忠于职守。

1913年夏，奉天省取消了旗民原有各种名目的土地，重新确定了赋额，受到农民的拥护。

1914年1月 有经济价值的 本溪湖至牛心台轻便铁路建成通车，张钺代表张锡銮前去祝贺。张锡銮在张钺的协助下奉天省的各项军政工作均走向正轨 ，工商业有了发展 ，社会治安逐渐好转。张锡銮后又被任命为奉天省民政长。

日本帝国主义垂涎东北的野心，日益暴露，不断地进行军事演习，骚扰我国居民，肆意寻衅。张钺向张锡銮建议，必须坚决抵制日本侵略势力继续向东北的渗入，积极整编东北三省的武装力量，制订新的军事人员培养计划，以维护东北的安全。张锡銮将军完全同意张钺的主张，加强奉天直属的驻军27师及28师的装备，严禁各部任用日人做军事顾问等。

张钺 在湖南突围时 得的腿疼病 经常发作 ，又加上日夜操劳 ，腿疼病日益加重 。夏季他回到家乡谢家沟屯或铁岭城内看花楼养病。1913年及1914年夏季均由督军署派小汽车携少校马副官、少校杨副官及一名厨师回乡，住在自宅的门房内。因他没有一点官僚架子，爱护乡间百姓，远近乡亲都来看他。有人说红肚子的青蛙能治腿疼病 ，众乡亲出于对张钺的关心 到田间捕捉这

种青蛙为其治病。每次治疗一个半月左右再返回奉天继续工作。他在乡间了解到治安状况，胡匪抢劫及绑票等事时有发生，他便继续剿匪，使乡间的治安亦有好转。他还建议在农村办学堂，使男女儿童能受到教育。谢家沟的女孩也开始上学，受到了初等教育。

1915年春节，张钺刚起床，张锡銮携夫人前来拜年，张钺及全家深感不安。张锡銮将军谦虚地说："你们常年侍奉我，在我身边工作360天，我在春节给你们拜个年是应该的，请不要介意。"可见张锡銮与张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届时27师师长张作霖及28师师长冯德麟亦前来拜年，共贺新春佳节。

正月十五元宵节，奉天城内主要街道张灯结彩，呈现出民国以来的升平景象。张钺为观察灯节的情况，乘坐督军署的玻璃车前往城内中街。街上非常热闹，家家挂着彩灯，还有扭秧歌和踩高跷的，燃放的爆竹皮铺满街面，可见节日的气氛。

其后，适逢张钺母亲李氏80大寿，督军署各部门前来祝寿，张作霖师长又亲自送上一幅锦缎的麻姑献寿图，表示祝贺。

27师武装力量日益扩大，张作霖的权力也日益扩大。张锡銮将军在奉天军事指挥方面遇有困难，于1915年8月22日调湖北署理军务，张钺同时辞去参谋长之职。段芝贵接任奉天督军，1916年6月20日段芝贵亦去职。

1916年7月6日张作霖继任奉天督军，邀张钺出任他的参谋长。张钺鉴于各种情况，婉言谢绝，同时推荐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杨宇霆（麟阁）出任参谋长。张作霖接受了这一建议，张钺便离开奉天而回北京。对张钺这一阶段的工作，解放后中国分省人物志辽宁省人物志第十一章有这样的记载："本来奉天之日本留学生，以张锡銮时代之奉天将军参谋长张钺及孟恩远时代之吉林将军参谋长张恕等为最先进，然而两张未得大展其志。"

1916年张钺回北京后住在安定门内大街头条胡同。鲍贵卿将军就任北京陆军讲武堂之长，邀张钺出任讲武堂教育长，其办公址址据说是在北海公园正门前方的团城。

张钺到职后，首先制订新的教学大纲，其后整顿各军事科目的教官。根据他在学校所学的培训军事指挥官和现代战术等，做出教学计划。重点加强学员对新战术、新战略和武器的全面理解与实践，以及指挥学员们进行军事演习等，以提高他们的指挥才能，同时加强学员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自1916年至1922年共培养了四期毕业生，充实到华北及东北的军队中去。其后，又轮训在职的校级以上军官，提高他们新战术理论水平与指挥能力。

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的狼子野心完全暴露。他曾收到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王树常（庭五）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后自东京寄来的一封信，得知日本陆军大学的某些理论课程不准中国留学生听讲之事，使张钺极为愤怒。他以日本侵略军不断进驻东北，在“南满”铁路沿线驻军等教育学生。经常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讲武堂学生和军官的神圣职责。张钺坚决反对任用日本人充当我军的顾问或参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早为张钺所警惕。鉴于张自日本归国后，参加广州及湖南起义，对国民革命及东北军政建设做出的贡献，北京政府授予他二等文虎章及三等嘉禾章。

此后，腿疼病经常发作，经过治疗及休养亦不见好转，以致影响他的正常工作，便提出离职养病的请求。获准后，改任军政部的谘议，月俸大洋200元。他的同事及同学先后在奉天及北京购置住宅，修建公馆。他一直遵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革命者不购置家产，他也不在奉天及北京修建住宅。他用自己的薪俸购置了大量汉、唐、宋以来的碑帖、字画及古玩等，共有三木箱。

张钺爱好书法，工作之余或在养病期间，经常临古人碑帖，书写具有爱国思想的《出师表》及文天祥的《正气歌》等。

张钺在北京养病期间，受到留日时同盟会友好的关怀，以及同学们的照顾，介绍了一些京师名医为其治病，健康状况有所好转。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利用到北京开会之机登门来访，谈及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附近陈兵的情况，以及其侵略东北的野心。鉴于北京及奉天均有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学校，张钺在北京又有培养军事指挥官的经验，吴督军便邀张钺来齐齐哈尔，为黑龙江省培养军官，以加强黑龙江省的武装力量。张钺鉴于健康状况及黑龙江的气候，乃婉言谢绝。不久，吴督军又第二次来访，谈到黑龙江省地处边陲，军官缺乏新的战术训练，急需加强边防建设……。张钺意识到吴督军的用意后，只好回答如身体好转时，可以考虑前往齐齐哈尔，协助吴督军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也是中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隔年吴督军又到北京开会，会后第三次登门来访，一定请张钺来齐齐哈尔。张钺鉴于吴督军的诚意，盛情难却，不好再推辞。家属留在北京，他于1923年只身来到齐齐哈尔。到齐市后成立了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 ，张钺任所长 还兼任吴督军的高级参谋。吴督军给予他良好的工作条件及优厚的待遇，他一面修养一面制订培养军官的计划。他所制订的教学大纲及规划，吴督军全部批准。军官养成所开始招收新生，按新的战术思想为黑龙江省培养军事指挥官。他又将在北京陆军讲武堂的经验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运用在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使学员的战术战略水平提高很快，颇受吴督军的赞许。

1924年日本帝国主义得知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的张钺，来到齐齐哈尔当了吴督军的高级参谋，又为黑龙江省培养新的军官，认为有碍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动。他们的特务不断地窜到齐齐哈尔，探听军官养成所的组织机构、军官培训计划

和招收的新生数目等情况。不久日本一个高级军官，以客人身份来齐齐哈尔拜访吴督军，并进行阴谋活动。当吴督军宴请日本"客人"时，邀张钺为翻译出席宴会。日本"客人"便证实了张钺确已来到齐齐哈尔。时隔不久，日本"客人"以答谢吴督军为名，回请吴督军。吴督军因故未能前往，请张钺代表他去赴宴。因张钺在齐齐哈尔为黑龙江省培养新的军官，日本"客人"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培养三年的学生，竟事事处处与日本为敌。酒后张钺双腿疼痛加剧，据我们的祖母回忆，宴会上张钺的酒中可能有药。同时日本"客人"还假惺惺地送给他两瓶红色方瓶装的酒。归来后病情突然加重，行动极为困难，便住进齐齐哈尔龙沙公园附近的黑龙江省官医院。吴督军多方邀请各地名医为张钺诊治。在卧床期间他的同学好友于珍、杨宇霆、王树常及孙丹阶等来电慰问或派人到齐齐哈尔看望，于珍及杨宇霆两位将军还准备接张钺回奉天治疗。后病情转重，下肢瘫痪，疼痛不能入睡，因治疗无效，于1924年夏病逝于齐齐哈尔，时年41岁。

张钺病故后，其侄张竞德为料理后事由开原县乡间赶到齐齐哈尔。在传达室内求见的师长及旅长均已等候多时，但吴督军第一个便接见了这个乡下人张竞德，弄得在传达室的师长及旅长们不明真相，他们小声议论此人的来历。我的二伯父张竞德与吴督军商妥后事安排，吴督军又亲自送张竞德至门外，更使一些师长及旅长们困惑不解。这位陌生的来客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张钺的侄子。相继其子张竞择由北京、张竞渡由沈阳赶来齐齐哈尔，吴督军都接见了他们，并对家属进行慰问。他十分惋惜张钺的逝世，后悔莫及，如张钺不来齐齐哈尔也不至于过早的发生这样事情。根据家属的意见，由火车将灵柩运回铁岭，吴督军派副官及卫队护送灵车直至铁岭，在铁岭召开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由杨宇霆及于珍两位将军主祭。参加的人员有北京

军政部及北京陆军讲武堂的代表，奉天、黑龙江两省督军的代表及两省督军所属各部队的代表，以及开原、铁岭两县的军政负责人等，还有铁岭工商界人士及学生等达千余人。上述各部门还送了挽联。他的留日同学王树常及徐树铮两将军及生前友好，北京陆军讲武堂及黑龙江吴督军等还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这位爱国军人。公祭大会在铁岭共开了七天。会后移灵至张钺的原籍开原县黄旗寨乡谢家沟屯。当时柴河涨水，公路被冲毁，乃改用木排由水路运回。灵柩沿柴河而上，直至谢家沟屯的前方。这就是过去众乡亲所说的张钺将军的"江来水去"。杨、于两位将军及其卫队与生前友好亲自送灵到谢家沟屯。在铁岭公祭的同时，在谢家沟的自宅内也搭起了灵棚，当张钺灵柩运回后，在谢家沟屯又开了三天追悼会。附近各乡均派人前来悼念他，后葬于屯西的虎头砬子山下。墓前竖有莲花底座七眼透笼碑一座，周围环绕小石狮柱的石护栏。碑的正面镌刻"中华民国陆军少将奉天军务司长督军署参谋长给予三等嘉禾章北京陆军讲武堂教育长给予二等文虎章开原张君讳钺字戍秋墓碑铭"，背面刻有瑞安林氏撰写的碑文，以显扬他自广州起义以来对国家和对民族的贡献。

解放后，他的留日同学孙丹阶老先生，出任黑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他和我们说："你们祖父张钺在日本留学时学品兼优，在我们同学当中他是最早晋升为将官的。在东京时他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黄兴领导下的同盟会小组活动。他富有革命热情，关心国家民族的兴亡，他归国后便走上了国民革命军的道路。他收藏有大批古代名人的碑帖字画，当时称为'黑老虎'，还有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等。"

1957年春节在北京东皇城根北锣鼓巷，张慕骞见到了祖父在日本时的同学王树常将军，他是全国政协的特邀委员。他说：

“你祖父先于我回国，张钺是一位爱国军人，虽受日本的军事教育，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早已洞察其奸，并嘱我们（指王树常将军自己）警惕日本的阴谋。可惜去世太早了……。”

在北京地安门米粮库胡同，张慕骞见到于珍将军，于将军也是全国政协的特邀委员。他说：“我和你祖父张钺是最好的同学和同乡，我们是一条船去的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三年，又在一个区队，张钺学品兼优，是我们同学回国后最早在军事上有成就的一个人。他若不是在湖南革命军与清兵作战突围时得腿疼病，也不至于过早地离开我们。”他还谈到张钺去世后，在铁岭及谢家沟的公祭情况，同时还给张慕骞看了一些在日本留学时的照片和同学谱等。

1972年春节苏炳文将军回忆说：“张钺将军在奉天任参谋长时，我正在保定陆军讲武堂学习。由于学习费用较高，我们在经济方面时有困难。东北籍同学推我为代表，与奉天督军署联系，希望在学习期间给予经济方面的支持。你祖父张钺批准每月给保定讲武堂的东北籍学生，每人补贴两块现大洋，直至毕业为止。我因学习成绩优异，你祖父还个别在经济方面予以资助。”苏将军的话语充满着感激之情。苏炳文将军和张慕骞说：“你的祖父张钺和父亲张竞渡，都为黑龙江的军队建设和抗日斗争做出过贡献。”

编者按：张慕骞，为张钺之孙。1953年1月15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78年9月代表黑龙江省出席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获科研先进工作者奖，为黑龙江省4名获奖者中的第一名。《黑龙江当代名人》、《中国科技工作者名录》、《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中国当代名医大全》对他有专条介绍。**张慕良，**为张钺之孙，为哈尔滨投资专科学校副教授，兼任哈尔滨市数学学会理事及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袖珍机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万 福 麟

陈 志 新

万福麟字寿山，清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80年12月20日），生于今吉林省长岭县（原农安县）巨宝乡靠山村小坝屯的一个贫苦农家，世代业农。其先世居直隶宁河县之官庄，到其曾祖父万金时携眷逃荒到东北，先落户宽城子（今长春市），后“徒居农安复由农安而长春”，到其祖父万治富时始在小坝屯定居。清季内忧外患频仍，万家和多数农家一样家境江河日下。其父万祥终年劳碌，全家仍不得温饱。

万福麟出身寒微，不能入学，以致后来目不识丁。八九岁便开始为人放牧，练就了一身骑马的硬工夫。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仅13岁的万福麟为本屯大户邓家当半拉子。1896年万又到吕生围子屯为吕家扛活，万到十六七岁时，仍身小力薄，还是挣半拉子工钱。万福麟在放牧、长工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其父万祥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家中无钱发丧，万氏兄弟只好用秫秸箔子将其遗体卷上草草埋葬。

万福麟早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虽终年辛苦，仍不得温饱。万事母至孝，胸怀大志，在困苦生活的煎熬下，极思改变境况，藉以对老母能奉养甘甜，遂急于求去，恰在这时得到一个极好机会。

1899年，万福麟给吕生围子大户吕家当长工的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东北大好山河又被沙俄占领，致使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百姓不堪其扰。当地乡绅共议，成立联庄会，有钱人家自备枪马，吕家恐其子弟当团丁有危险，央求万福麟顶替，早已厌恶放牧、长工生活的万福麟慨然应允。

联庄会共五十多人，首领汪、李二人见万身材瘦小，又是替人应差，便有意刁难，于是想用骑烈马、考智谋、试胆略这三关难倒万福麟。汪首领先开腔："万半拉子，你想当兵得过三关，过不了这三关，便不收你！"万福麟回答："那就请你考吧！"第一关是骑烈马，万拉过汪的大菊花青马，只见这匹马尾鬃挓起，扬蹄嘶鸣。汪轻蔑地问："万半拉子你能骑这马吗？"万毫无惧色地回答："能！"汪说："给他备上鞍子叫他骑，不过摔死你我可不偿命！"万很自信地说："不用备鞍子也能骑，不过累坏你的马我可不赔！"汪说："好，一言为定！"万福麟抓住马门鬃，飞身一跃骑在马背上，开始这马还竖巴掌，尥蹶子，乱蹦乱跳，可万伏在马身上稳如泰山。只见万福麟两腿一夹，用缰绳头猛抽马的臀部，马象离弦的箭蹿了出去，在茫茫的草原上奔驰起来，约一个多时辰，马浑身象水洗一般地跑了回来，万从马上轻轻跃下，围观的人无不用佩服的眼光看着他。接着汪要在万的头上顶个碗，站在百步开外，由他人开枪把碗击落。万说："这有何难！"他没有顶碗，却顶了个小茶杯，面向持枪者，可没人敢开这一枪，最后还是由汪自己朝天胡乱开了一枪。第二关试过便开始第三关考智谋。汪命人拿来一碗水对万说："你要劝别人把这碗水喝下去，就算你的智谋高。"万略微思索一下说："这我办不到，不过谁把这碗水喝了，我能叫他吐出来，我叫他吐多少他就得吐多少！"汪摇头不信，万福麟一本正经地说："可当场验证！"于是汪让马弁把水喝下去，要万试验吐水，万福麟露出胜利微笑道："吐水的事以后再说吧，这水可是喝下去了。"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上当，但都不约而同地赞叹他的机灵。万连闯三关折服了联庄会的首领，加入了联庄会，成为一名团丁。

当团丁是万福麟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联庄会又称吉林靖威军营队，其主要的任务是弹压人民的"不轨"行为，维护乡绅有钱有势者的利益。时八国联军劫难刚过，巨额的庚子赔款又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沙俄军队还赖在东北大地上不走，民众涂炭一言难尽。这联庄会的队伍，也趁火打劫真的拉出去成为明火执杖的土匪了。他们活动在今扶余县、前郭旗等沿江一带，不到半年竟达到一百三十多人。后来被奉天后路巡防营管带吴俊升收编，万福麟当上了哨长。1905年万被派到康平县巡捕马队任哨官，窦联芳为巡长，仍属吴俊升部下，后升任巡捕马队正巡长。1906年巡捕队改驻防辽源。

东北地广人稀，土匪素称猖獗，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民不堪其苦，故地方驻军即以征剿土匪为主要任务。东北土匪，历来慓悍善骑射，枪法高超，行动灵活，无惧于征剿之官军。而官军也只有具备善骑射的人始敢进行征剿，否则将损兵折将徒劳无益。因此，无论是土匪还是官军双方都特别注重射击术，尤其是乘马短枪或手枪射击术的训练。

万福麟自被收编随军征讨土匪以来，更是钻研训练方法，故在随军征剿中，以勇敢善骑和枪法准而著称，并屡建奇功，颇得长官赏识，很快提升为哨官。

1906年，万率队到吉、黑两省边境一带剿匪，这股土匪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匪首绰号大老疙瘩，自信枪法无有能出其右者，对万颇为轻视，谁料短兵相接时，大老疙瘩的右腕被万击中，这位自命为绿林英雄的土匪头子竟弃械投诚束手就擒。于是，万为地方除了一大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万福麟随吴俊升赴吉林东山里横道河子一带剿灭土匪刘芳勤等因功保任把总。是

年冬随吴俊升赴黑龙江驻兰西县。清光绪三十四年（1905年）万福麟随吴俊升返回吉林横道河子，分驻齐道河子剿匪朱双六指有功，保任千总加守备衔。是役毙匪50余名。吴俊升以该匪强悍有名，饬令索取验证，他人无敢应，独万福麟率兵士6人，往返百余里，冒险入深山断其六指半臂带回。吴俊升大奖器之。是年秋，巡防营改编为后路巡防队，调任第3营左哨哨官。冬万仍返兰西原防。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调万福麟移驻呼兰县界石人城子，护路于呼兰至绥化间，商旅称便。清宣统二年（1910年）冬调回辽源县附近驻防仍任哨官。清宣统三年（1911年）秋，因剿灭大股土匪王海楼战功卓著被擢升马队3营管带。为此万福麟更加注重训练队伍。其方法是精选良马，全队一律换成白色的高头大马，组织士兵训练马上射击、马上劈杀等工夫，所以万营在后路巡防队中战斗力为佼佼者。

1912年8月，扎萨克图镇国公两旗受日本人煽动叛乱举兵，万福麟随吴俊升在白城子等5县境内消灭叛国分子——乌泰匪帮有功，晋升为后路巡防队帮统。是年冬，蒙匪图木吉达作乱据热河、开鲁一带，猖獗一时，奉天都督张锡銮令以马队3营、步兵1营、炮兵1队混合编为一支队，万任支队长，随同第28师冯麟阁剿平，斩获不计其数，论功得赏金表、奖章及袍褂衣料等。是年12月仍回辽原驻防。1913年11月，万福麟随吴俊升克服经棚（今昭乌达盟翁牛特旗）驻罗大王各庙蒙匪案内出力，又立战功，授步兵中校，结五等文虎章。1914年春仍返辽源驻防，同年夏奉令移防洮南，仍兼马4营管带。1915年扶余蒙匪窜开鲁、突泉一带，万福麟奉段芝贵都督之令编组支队往剿蒙匪，2月剿平之，多宽抚，论功晋授四等文虎章。

1916年7月，在日本人操纵下的蒙匪巴布扎布与“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串通一气，揭起“勤王师扶国军”的破旗，啸聚四五千匪徒，从海拉尔南下窜扰，并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又与辽

南组织的土匪相呼应，妄图建立“满蒙帝国”。张作霖派洮辽镇守使吴俊升阻击巴匪，在突泉发生激战，毙匪徒五百余。巴匪被逐出经棚，追至“林西（今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属境）战役”，双方激战竟日，死伤惨重，蒙匪两个头目均被击毙，吴俊升腿也负了伤，胜负未定。吴调万的骑兵助战。万即向吴献策，要吴在葛根庙附近设伏，将叛匪诱至伏击圈，然后步骑夹击，一举聚歼之。吴用其谋。万率骑兵与匪接仗，蒙匪自恃善骑射，万就势佯退，蒙匪穷追不舍。未几，匪帮全部进入埋伏圈，顿时伏兵四起，万调转马头杀回来，只杀得股匪四处逃窜，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蒙匪大部被歼。由此万的声名大振，吴对万也更加器重，纳为心腹，晋授步兵上校。

1917年7月，中央骑兵第2旅及奉天后路巡防营等合编为陆军第29师，吴任师长。万福麟升任57旅114团团长。万在作战中服膺的信条是“不怕死”，“置于死地而后生”，故在征剿土匪过程中，屡建殊勋，升迁绝非幸运中得来。1918年秋，余匪赵国卿及蒙党齐大拉巴拉等3人以序伪称将军率众窜突泉，奉吴俊升之命编混成团往剿抚之，乱平仍返洮南任团长。1919年张作霖驱赶吉督孟恩远，欲攫吉林大权为己有，引起吉林军师长高士傧抗命，万福麟随吴俊升进兵农安。万时任独立骑兵团前卫，遥为威胁，督军孟恩远遂请高士傧潜逸，兵不血刃而难平。同年秋，俄内乱扰及中国边防不靖，万随旅长耿志田驻防满洲里防之。

1920年，万升任第29师57旅旅长并兼东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万不但知道护路责任之重大，而且也留心国内政治及国际局势。是年秋，沙俄谢米诺夫在国内被逐流窜到东北为害地方。万受命一面缴械白匪武器，一面直接安抚白俄大批难民，使地方免遭其害，此举深受上峰嘉许。是役晋升陆军少将，旋奉孙督军赞尧令调往大赉剿海伦一带之闯王、海青等各大股土匪，分别剿平。1921年春，吴俊升任黑龙江省督军兼长，万福麟返防满洲里任57

旅旅长兼任满海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

1922年万福麟兼任安泰镇守使，仍驻防满洲里。同年，万福麟官居陆军少将旅长，衣锦还乡，祭扫先人坟茔。购买茔地附近之荒坡地五十垧，植树造林，大兴土木，营造祖茔，为其父树碑立传。万福麟当兵前已和当地韩家之女结婚，并生一子，在其当兵为匪之时其妻韩氏，曾在家乡讨饭度日，多亏乡邻照顾，度过荒年。万这次省亲，还大摆宴席，宴请四邻以表谢意。对个别穷困人家，给予帮助，村民盛赞“万半拉子出息了，当官不忘穷乡亲”。经此回籍，其家迁往齐齐哈尔，其兄万福太也搬到白城子，都建了新宅院。今旧址依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败北，张作霖退到关外。经此惨败，张作霖痛感绿林出身的奉军素质太差不堪作战，而无学识的将校尤不足任指挥，遂决心整军经武，改革原来编制，将东三省各军统编为25个混成旅、5个骑兵旅，万的57旅改编为东北陆军第29师步兵第15旅，仍任旅长，驻防满洲里。

直系胜利后，为进一步分散及吞并奉系实力，促请徐世昌罢免奉天督军张作霖，遗缺由吴俊升充任。吴接电后，即召集高级将领会商，会上有人主张接受电令，万则认为被要挟之命令不可盲从，力主保持镇静。吴采纳了万的意见，东北奉系集团遂得以巩固而消弭祸患于未然。万的主张影响张作霖保持东北势力甚大，因此万得到张的倚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混战的枪声首先在热河打响。热河地方直军素质极差，与奉军稍一接触即溃散。奉军10天内占领朝阳。吴俊升亦占领开鲁，趋进赤峰。到9月末，奉军对直军已形成包围之势，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回师北京囚禁曹锟，使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一败涂地，循海南行逃回武汉。

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收编了许多直军，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为了统一指挥，遂改旅为师制。到1925年

共编成东北陆军20个师，另增编步兵第30旅，骑兵3个旅和独立骑兵第21旅。万福麟任新编第17师师长。是年9月，万升充骑兵副军长仍兼第17师师长。10月，调万部往热河赤峰准备进关攻打国民军。未数日，接张学良电报，谓奉、国两军和好，向连山方向靠拢。万部星夜回返，每接电报即此两语，令人莫测。及到义县方知郭松龄倒戈。万旋赶到新民车站面见张学良，建议用骑兵迅速袭击郭军司令部所在地白旗堡，并由万亲自率领骑兵，以"置于死地而后生"之信条，擒贼先擒王之手段，方能扭转大局，张采纳之。结果郭军粮秣军械损失殆尽，官兵士气顿挫，郭见大势已去，遂偕妻率卫队出逃，后被捕杀，郭变始告平息。是年末，万任新编第8军军长。

1926年初，奉军入关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第8军在吴俊升的率领下在多伦一带作战。1927年2月，奉军下河南，万部编在张学良第三、四方面军团内。奉军分路前进，第三、四方面军团担任中路和左路。万部第八军担任左路佯攻洛阳，待奉军占领郑州、开封后，万部始进洛阳，并无战斗。同年秋，山西阎锡山同河南冯玉祥密商与北伐军呼应。8月中旬晋军开始进攻奉军，在大同首先将张作霖派往绥远的军事校阅委员长于珍予以扣留，并遣傅作义旅潜袭河北，占领涿州城，牵制奉军机动兵力，影响其作战能力。奉军调来重兵，围困3个月有余，前后进攻9次，均未奏效。特别从第4次攻城开始，张作霖派万福麟担任指挥，攻城数次也未得破城。伤亡很大，万福麟气急败坏调来坦克助威，仍未挽回颓势。奉军一筹莫展。万福麟曾为涿州久攻不下遭到张作霖严责。最后万福麟狗急跳墙决定使用化学武器。使用四门小炮同时向城内发射毒气弹。万福麟到炮兵阵地督战时，假惺惺地说："我作损啦！不用说城里人，就连耗子也会熏死！"待500发毒瓦斯弹和燃烧弹发射完毕，奉军开始攻城时，守城晋军竟枪炮齐鸣，奉军攻势顿时受挫。万询问其原因，指挥化学战的那个白

俄指挥官答道："炮弹太少！欧战时一次战役发射几万发，有效！"其实那些毒气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剩余的，早已失效。为此阎锡山通电全国，谴责张作霖使用毒气弹，灭绝人性，张却以烟幕弹辩解。

万福麟指挥的几次进攻就这样失败了，感到智穷力竭，证明涿州城已非强攻所下。遵张作霖指示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力挖掘围城壕沟，以困死城内守军。但张作霖并没有放弃夺回涿州的打算，在封锁的同时，还对晋军进行瓦解。傅作义率晋军自1927年10月11日偷袭涿州成功到12月30日已被围81天。阎锡山认为涿州已失去战略作用，城内兵民交困，罗掘俱穷，遂授意傅作义与奉军谈判。经过双方代表七八天的折冲，再加上各调停代表之努力磋商，12月30日，城内晋军指挥官傅作义与奉天包围军指挥官万福麟，同时分别发出通电，万在电报中表明：涿州围困甚久，人民痛苦，概可想见，本军上下同具悲悯之心，所以未继续攻击，深恐殃及数万无辜，近因各慈善事业团体代表，红卍字会代表，山西同乡会之代表，涿县人民代表等，请求双方停战，为涿县商民人等留一线生机，和平解决，免延战祸。军人天职在保民，阋墙之事终须归好。"爰同徇其请傅总司令所统晋军，改为国防军，将来同御外侮，以后一切听中央裁示。我政府及张军团长胞与为怀，信仪昭著，决不取欺诈手段，改为国人非议，果推诚相与，当终始相全共抒国乱以示大公。"双方同时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傅于1928年1月6日出城投降。万福麟以下奉方高级军官、幕僚在南门外摆队相迎，在军乐声中握手言和，互道辛苦。万还亲陪傅作义到城南松村店，送傅乘专车去保定。

1928年4月，蒋介石继续所谓北伐，张作霖见"5·9"求和无望，于6月2日通电返奉，6月3日离京，4日晨专车在皇姑屯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吴俊升当场被炸身亡，张作霖因伤重流血过多旋即殒命。日本侵略者炸车的罪恶目的是乘乱制造事端出

兵占领东北。奉天当局识破日寇的阴谋诡计，临危处变密不发丧，巧妙地瞒过日本人的耳目。才有张作霖电令万福麟代理黑省督办之举。黑省军务督办遗缺先由吴的嗣子吴泰来护理，惟吴不到30岁的纨绔子弟烟毒甚深，充一团长恐难以胜任。张学良为维持东三省治安起见，特任第8军军长万福麟出任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后又兼长。万福麟自清末民初随吴俊升从军，谙熟黑龙江省舆情，固发祥于旧派。自郭变后，逐渐引为张学良的心腹，成为新派的中坚。当万的任命发表后，也曾引起少许风波。万曾以环境复杂应付艰难向张恳辞，张学良则坚催其到任，并说："你连老吴（指吴俊升）都侍候得很好，还有什么人对付不了的？"果然发生了"挡驾"赴任之事。当时黑龙江省军政两署旧人，也有照样"父死子继"的构想，吴俊升之独子泰勋尚幼，吴之嗣子泰来任师长职务，颇具继承乃叔遗缺资格，旋有黑省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等一面电万福麟请暂缓赴任，一面陪同吴泰来急赴奉天谒张。张学良先单独与吴谈话，温语相勉："两位老头既死，咱们年轻兄弟应当力求振奋，让老万接黑龙江军政，是当刽子手，放手去整顿；倘要你来继位，怎样能够破除情面，更动旧人？你仍以带兵为宜，即委以骑兵军长，来日方长，好自为之。"吴泰来表示感奋而退，私下嘱赵仲仁等不必再争。万福麟遂就黑省军政两长，于6月20日在齐齐哈尔先就军务督办之职。7月2日，黑龙江省绅民在省城龙沙公园召开欢迎新督万福麟的大会。万在会上演说称：此次承张、杨两军团长谆嘱来江省办理善后，又奉上将军电令代理督办之职，自感才力单薄何胜艰巨。"因念故督兴帅在江数载，正值内忧外患相继而来，奔走四方迄无宁息，卒至为国捐躯，言之扼腕。福麟素受兴帅厚恩不得不免任其难，力图振奋，爰本安民保境之意，以全兴帅未竟之心，况江省系麟旧游之地。""文武同僚多半契友，绅民故旧概属知交，感情素无隔阂，相处自易接洽。际此边防多事萑苻未净之秋，深愿官民一

体协力进行。风雨飘摇同舟共济，安良除暴兴学勤工，一秉坦白之襟怀为地方社会谋幸福，此心此志势在必行。想我江省父老昆弟尔所乐从也。值此开会之日福麟列席不胜荣幸，窃以推心置腹之言共相互勉，福麟不才竭尽全力以赴，愿我江省绅民不吝赐教。”

万福麟于6月28日上午身着便服，头戴琅琊草帽，带副官一名、卫士数名乘汽车赴日俄两领事馆拜访两领事以亲善邦交。此举乃本末倒置。复又到各机关视察近况毕返回帅府。万福麟又规定了会客及办公时间，午前8点至9点接见军界代表；10点早餐；11时至下午1时休息，午后1点至3点接见外来官员及本埠文官并各团体；3点至5点为办公时间；5时晚餐。还规定：①有特殊事情随时接见；②厅道处局镇守使师旅团长及统带等均在楼下或二客厅会见；③各县知事局长警察所长各校长武官营长以下均在大厅会见；④凡来署会见各员不论阶级大小所带从兵均须在传达室听候；⑤各处投效人员在承启处听候传见，复派前往。

皇姑屯血案发生后，张学良在前线闻讯出关奔丧，于7月4日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是日就职，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张学良就职时曾表示休养生息，绝不妨害统一。东三省议会议决为保境安民将奉吉黑三省各举保安司令一人。万福麟被举为黑龙江省保安司令，万于7月10日宣告就任并通电各方查照。其电大意为：东三省议会联合会议决推举福麟为黑龙江省保安司令，并准资送委托证书一封，关防一颗，准此本司令于7月10日就职并即日启用关防，除分别呈咨及分电外，特电查照并转行所属一体知照。

万福麟就职以来，曾一再声明保国卫民为本人唯一宗旨，故临敌未尝怕死兼圻决不爱钱，会及本省军政之浮滥，薪饷之虚糜，圜法之紊乱，商民之疾苦，痛心疾首异常注意。唯地方军民分治，呼声甚高，省内行政仍由于省长主持，暂取冷静态度未尝

过问，以避军人干政之嫌。至于军务方面除改编了团旅制分别归并外，力取人材主义，如裁汰冗员及骈枝机关，节浮冒增薪金等事．查国防筹备处向由督署参谋长兼任，今特归并于督署参事处，参事处虽兼任国防筹备处，实无筹备开支者一也。在前官兵饷糈预算实任者，因得养廉即请托兼差不任事者亦须观瞻，以致僧多粥少不足分配，再差者不能生活，又必须另谋兼差以资接济，扰扰攘攘循环不已。”究竟不出此一脔肉，因此人材难留，望望然去之，而用者遂不得不含混迁就，公务莫不如此害为甚。万福麟特制定阶级饷糈务使材乐为用。凡滥竽者得充数督署，近日言咨议顾问以及课员副官办事员差遣等领薪不任差者，裁汰约有300名之多。即以此节流之款加诸实任官兵。其他机关被裁汰者更难统计。以少校论，昔日少校薪俸最多者仅大洋六七十元，今则提到百六七十元，自此人各其事，事各呈功，有功者加功，犯法者坐法，毫不虚假，此其综核名实注重军纪者二也。

黑龙江省钱法毛荒，7月前哈大洋每元至320吊上下，生计艰难，人心惶惶，万福麟督促当局设法维持卖粮收帖压行易洋，至9日已落至265吊上下，据商界言，退落之速实为不可思议。此其安慰市面念及民生者又一措施也。以上乃万福麟上任来整顿军政之大端，至其微处尚有许多。

万福麟驻黑龙江省多年，所有官场及社会之恶习以及对群众之贻害洞彻无遗。“故来抚是邦凡事束身自爱，务导官民同入正轨，以便群策群力共襄新献，惟欲有所建设须先期改革”。万又被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为黑龙江省保安司令。保境是外御其侮，安民当修明政治。他说：“本人负唯一军政专责，自应淮保安两字作去，则僚友积习首当痛戒，振刷精神兴利除弊为不可缓之图，昭昭明矣。”万福麟于1928年7月16日，就黑龙江省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分别训诫僚友共同遵守，其整饬官方之训令大意是：近年来“世道凌夷官常不整，以致奢侈成风相沿为习”，际此国步艰

难，财为竭绌。“凡我同僚均宜严束身心，力去奢华”，克尽职守。“本督来抚是邦本崇尚节俭之旨，抱兴利除弊为怀”，欲树新风先期改革，例举数端为我同僚者戒：①崇尚节俭。……时事艰难生计窘迫，凡我同僚务宜力求朴实，庶几俭可养廉。②禁止宴会馈赠。查宴会馈赠为营求请托之媒，实辱节下行之举，即三节送礼几成惯列。此后亟宜一并捐除，免滋縻费借以杜绝幸进之门。③长官外出禁止迎送。查鹄候道左送往迎来既显铺张又滋误事，嗣后除特别情形外一概不准迎送。④严禁着制服军官进入娱乐场所，查戏馆窑娼等及娱乐场中，身穿军服之官佐不宜杂迹其间，即如有必要应酬，须换便服以维军誉。⑤官佐外出宜轻车简从。语云：“至诚格物以德服人。”嗣后任何官长不得携众仆从，即系高级主官有必要任务者亦须轻车简从免去声张。⑥非属军人禁穿军服。查军服乃国家制度向有规章，岂容任意穿着乱充下陈有辱军人礼统。今后如查有非正式军人穿着军服即以冒充军人论罪。⑦眷属出门禁止跟随士兵。军人为捍卫国家健儿，非以私事使役者，况于当街广众之中随侍妇女携抱幼童，殊属观瞻不雅，着即永远禁止。⑧禁止奔走夤缘。查国家用人本诸才能，只须清白乃心勤谨供职，长官自能辨别贤愚，次第拔擢。倘有营求买托借求招诈等事一经查实，定即科以贪污之罪。⑨禁止兼差挂名。国家设官原有定职，以一人才力有限身兼数差能不贻误事机？再如委人挂名闲差尤足招摇滋事 。以后各主管长官不 得滥竽委任紊乱官常。⑩严禁送达委任士兵索赏。查发给委任为高级长官特权送达委任断无需索赏赐之理，此后如敢有索情弊或私相受授希图示惠者，均一律惩处不贷。⑪禁止随从携枪外出。查败坏军纪、滋扰娱乐场所诸种非法行为者，无不由于随从士兵。以后各随从兵除跟随本官外出不准私自携枪械外出，非在假期即徒手士兵亦不准任意野游 ，违则连同该管官长一律惩处 。⑫主官对僚属与人民宜本亲善行事。查官民原属一体，僚属尤宜同心，庶辅车相依，

能收股肱心膂之效，切不可作势装腔，深居简出蒙蔽舆情。嗣后凡僚属员司地方人民，有因事请谒或条陈意见者，均须随时接见，既免隔阂复笃感情。以上数条概为江省目前痼疾亟宜分别治理，蠲除以示兴革。万氏整饬官方之训令不为不详，下步看其行动。关于整顿军队之办法，万福麟还公布《整顿军队之详细办法》，饬令所属遵照执行。

1928年7月20日，东北保安委员会正式成立，全体委员共17人，张学良为会长，袁金铠副之，万福麟是17委员之一。

万福麟以地方凋敝颓风，整军政用人唯才无知亲疏，观其种种措施言行，为官场中不可多得之封疆大吏。万福麟施政措施公布后，近又深恐宗族戚属不明大体或有招摇等情发生贻害地方，特晓示通衢训令僚属，如有上项人等滋扰情形发生，“即行扭办以昭大公”，其训令称“本司令承受委托责保治安任重才辁，深虞丛脞，念父老相期之殷，当地方凋敝之余，欲挽颓风宜图振奋，凡事一秉大公，决不妄徇私情，然责已固须防微杜渐。本司令从政二十余年”，用人以才不知关系，不以亲疏为好恶，“顾递为黜陟”，贤豪俊杰乐为罗致，“宗族旗属夙少登镛，今莅任伊始邦人僚属或有未悉”，恐有不肖亲友在外借势招扰或假冒敲诈等事，欺凌良善，滋扰乡里和地方治安，特明白宣示，如上项人等在各县地方敢有不法情形发生，应由各该地方军政长官立即捕获依法严惩。该管官吏如敢瞻徇庇护，准该受害人来辕申诉，讯实一并法办决不姑息。

说，总归是说，做，总归是做。万氏于8月11日抵满洲里视察，11日抵海拉尔，17日到安达18日至哈尔滨，挂专车一列共12节车厢，偕参谋长、秘书长各1人，随员20人，卫队40人，哈尔滨大小官员到站迎接待不必言，这哪里还有轻车简从的样子。训令是约束士兵、下级军官的，万不在此限。

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易帜典礼，张学良等

宣誓，与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一。31日南京政府特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副之。东北设立政务委员会，由张学良兼主其事，各省军政长官及诸元老为委员，以上均于1929年1月1日就职。东北三省形式上归属蒋介石南京政府统辖。

1929年1月10日，奉天城发生了惊人的内变，即所谓张学良枪毙杨常事件。外间认为万福麟难免杀杨常之嫌，尤其多疑常荫槐之死于万、常在黑省的嫌隙有关。当然事实并非是凭空哄传。万常供事黑省时间虽短，而芥蒂已产生，竟至水火不相容。张学良多次调解无效，万福麟滞留省垣不愿往任。张学良曾派过刘尚清赴黑省斡旋调停也无结果，最后拟调常荫槐长吉林，刘尚清职司黑省。外间以此为据传言常的死因起于万、常间的嫌隙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说起万之督黑，杨、常还真曾助过一臂之力。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杨宇霆、万福麟尚在关内，只有常随专车返奉，吴俊升既死，很多人对黑督出缺打主意，万的长子万国宾出身上层，耳濡目染，稍通权谋，于是找到他在奉的常荫槐大叔，以"其父督黑相恳，并以常的胞兄萌廷（方任黑省黑河道尹）升充省长为条件。常允予，却赴滦州与杨筹商，确曾同向张学良进言，至少减免杨的阻力。"常之胞兄虽未升任，万尚欢迎常萌槐出长黑省的伏笔。常上任后，还邀万国宾为政府委员。意在协调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也好相安。常不愿"督抚同城"倒是事实，一再示意督署宜速迁往黑河或满洲里，俾国防安全。常长黑省只有4个月，死后，仍由万兼长。万对此内事先并不知晓。1月11日，东北政务委员会电派万福麟暂兼黑龙江省省长职务。2月，南京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决定增加东北编遣区（第5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奉天省城。万福麟任主任。2月4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及辽、吉、黑、热4省主席同时在奉天省城宣誓就

职。2月9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万福麟为黑省政府主席。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是月27日，张学良任张作相为国防司令，万福麟为副司令。8月23日，沈阳军事会议结束，张作相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万福麟任副司令。

1929年秋，由于中东路事件而引起的中俄之战发生。身居黑龙江省军政要职的万福麟，因事前毫无准备，显得非常被动。只是命令梁忠甲和韩光第两个旅仓促应战。吕荣寰则向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告急，请派兵增援，张作相一面复电："军队没有开拔费，着路局电汇哈大洋十万元。"一面指使丁超摆出一副抗战的架势来。这时在奉天的张学良已发布动员令，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1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胡毓坤为防俄第2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进击北线。王树常到达哈尔滨后，住在道外新世界大饭店，每日花天酒地，玩扑克牌赌钱，根本不把抗俄当作一回事。因王树常所属的部队只能到达一面坡，如再东进，恐怕与吉林军队相抵触。胡毓坤到达海拉尔后，也不愿再前进，以避免与黑省军队发生摩擦。梁忠甲率部在满洲里抗击苏军保卫疆土的声誉日高，万福麟则怕其以凯旋将军的资格拿走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大印，加之其他种种矛盾，万福麟的抗俄态度极为消极。他对梁忠甲、韩光第两个旅既不增援，也不补充弹药，坐视他们孤军苦战，直至遭到惨败。

主持黑省军政并兼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的万福麟政绩如何呢？海峡两岸著述褒贬不一。台湾出版的论著说"对于省政即大事兴革，并锐意建设"，其最为民众额手称快者，莫如铲除恶霸，平反冤狱；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如文教方面，创省图书馆，建交通中学；交通方面，修建齐克铁路（齐齐哈尔至克山），整顿呼海铁路（呼兰至海伦）；社会福利方面，扩大公立医院，创建博济工厂和鹤岗煤矿公司等；国防建设方面，则于外兴安岭修筑要塞，建营房，屯田训练；培植军事干部，建立东北

讲武堂分校，办军士教导队，这些对巩固国防颇多益处。而大陆出版著述多记载万主黑以来是继续武人专政，老百姓骂他“万不是人”，他的大儿子万国宾同于凤至的远房侄女结婚，结为亲家。万福麟“其为人也庸愚无能，不明治理，不精军事，在江省3年有余，建树极少，贻误实多”。他统治黑龙江省时，流传着“政治万大爷，军事窦联芳”这样两句话，其实是讽刺万福麟的昏聩。“万大爷”是指其子万国宾，当时年仅二十几岁是一个学而未成的纨袴子弟，竟当上了省政府委员，无论什么大小政事，万都交他处理，真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军事大权万则交给与他同棚当兵的黑省警务处处长窦联芳掌管，其人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抗战爆发后附逆）。万福麟政绩如何，当地民众自有公论。

1930年3月15日，万福麟兼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4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起，初张学良曾通电息争，待到最后决战时刻，手握重兵的张学良大有“与楚则楚胜，与汉则汉胜”的举足轻重之势，各方相与争取，信使云集于沈阳。张学良尚举棋不定，遂召开东北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老派则坚持严守中立，这时以位置副军及封疆之任的万福麟有其重要性，他能斡旋于新老派之间。如在最后一次定案的东北政务委员会议上，老派首脑张作相依然不肯附和，向张陈词：“过去几度入关，害多于利，民不聊生，最后弄得大帅殉难，你就忘记了家仇省难吗？咱们早经公决，今后闭门养息，绝不过问内地事……。”时张学良意已决，不容多言。张少年负气，竟以主席中途退场，乃致在座面面相觑，无法下台。万出来打圆场，先把张作相好言相劝，又请回张学良继续开会，张作相才把话拉回来。张学良于9月18日发表拥护和平的“巧电”。然后编组两个军，以于学忠为第1军军长、王树常为第2军军长，率东北军进关进行武装调停。

10月10日，张学良在沈阳就职海陆空副司令，翌年4月移驻北平设置行营。同时成立“北平政务委员会，节制华北军政。推荐人员参加国民政府。同月万福麟去洮南为其母祝90大寿。

1931年6月，张学良因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时副司令行营译电员破译张学诚勾结石友三图谋不轨的密电。参谋长戢翼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万福麟、于学忠、王树常等参加，共同商量对策，会上决定由东北调4个旅入关驻守平津，讨伐石友三之乱。其中有万的两个旅。从此万留驻北平未再返黑，黑龙江省的军政大权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

“九一八”事变前，万福麟滞留北平，无法应付东北事变时纷繁复杂的局面，况且他当时最关心的并不是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是万家的安危。他电令其子尽快将眷属及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到天津。事变发生时，万早已离开省垣，落得有省归不得的结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震惊中外的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在北平大病方愈，他接到沈阳告急电后，于19日凌晨一时许，在协和医院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王树常等重要将领参加的会议，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奈日本倾全国之兵，“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有速报中央，听候指示”。万福麟等诸将领均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

19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树翰、莫德惠等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咨询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发言最多者为顾维钧和汤尔和。顾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由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意

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

两天后，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所谓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等，以及东北高级官员万福麟、于学忠、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王树常等27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亦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这两次会议使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坚定了。会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起草电报给南京，申述有关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23日，张学良复派万福麟、鲍文樾赴南京面蒋。蒋嘱万、鲍二人道：“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的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万鲍回北平传达蒋意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他人均无异议，独于学忠建议说：“日本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个团，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黑吉两省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当即说道，“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但事过一天，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

事变之初，万福麟如能怀有守土有责听张学良劝告，间道返省，日寇亦绝不能长驱直入。惜乎万计不及此，仍留北平度其安闲岁月。“世人只知沈阳失陷，是‘不抵抗主义’的错失，而对吉、黑两省之相继沦亡，绝未责及二人一语，衡情揆理，难得公平。”抗战期间，万居重庆南山，“每当提起东北之失，总是拍大腿，咳声叹气，无限悔恨”。到头来落得有失守土之责，亦是万生平自恨之憾事。1931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令免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本兼各职；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15

日，蒋介石再度通电下野张学良电辞陆海空副司令职。同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万福麟职总参议，协助张学良整顿6省军务及东北部队入关事宜。

1932年夏，日寇为巩固其在东北的伪政权，进一步扩大侵略，主要矛头指向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张作霖起家时的老伙伴，在东北军中素以专横拔扈著称，主政热河以来，横征暴敛，鱼肉乡民中饱私囊，将热河变成了人间地狱。迫于形势，汤不得不表示抗日，但又心怀有贰，摇摆不定。张学良鉴于热河的地理位置重要，汤已不理于广大人民之口，难当国防重任，有撤汤之心，南京政府也想趁火打劫，派人去热。万福麟也蓄谋得此地盘。张学良犹豫不决，征询张作相意见，张深知汤的为人，恐难受命，劝张学良考虑，因此张学良未作出斩钉截铁的决定。事后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怒，说张学良不配撤他，尤其对万福麟更加痛恨。同年夏，国民党南京政府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绥署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蒋介石为委员长，张学良代理委员长，万福麟任常务委员。同年冬，日寇阴谋侵占热河，欲进而越过长城兵吞华北乃至全中国。张学良将军积极准备抵抗。

1933年1月，日寇向山海关大举进攻，守将何柱国率军奋起抵抗，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1月3日榆关失陷，日寇进攻热河，此时张学良决心豁出家底和不共戴天的日本侵略者拚个鱼死网破。他将所节制的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辖3个军团，自兼第1集团军司令，张作相为第2集团军司令，万福麟为第4集团军指挥，归张学良统辖。在张学良决定抗日军事编组时，由北平军分会参谋处长王以哲领导起草军事编组计划草案，军分会总参议万福麟特嘱托王以哲，要把第2集团军司令一席提出两位人选，一是万，另一位是张作相。还要求用参谋处名义签署意见，以张作相年事已高，且久离军队实际工作，两者比较以万为适当。因万带领黑龙江部队，将是援热河的主力，由万去指挥第

2集团军的作战，是条件最妥当的人选。张学良审批所拟计划时，非常生气，立即找来万、王两人，对万说："现在是国难啊，你还嫌官小，热河方面对于黑龙江军队进入热河，本有好多疑虑，以为你丢了黑龙江，想借机去抓热河。我向那边说了多少好话解释，想不到你们还是这样官迷。"万福麟被说得非常难堪，脸红脖子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王以哲站在一旁打圆场说："督办带兵援热，最后目的在于去收复黑龙江，绝没有假途灭虢之意。"僵立下不了台的万福麟才搭讪地说道："只有老汤相中了热河是块宝地，好种大烟。我那黑龙江用十个热河都不换。"张学良十分不满地告诫万、王两人："我还没有确定下来的问题，大家可以提些意见，集思广益嘛。请辅帅（张作相字辅忱）出来是和热河商量好了，已经内定下来的事，没有再变更的余地。"万、王两人唯唯退出。

对热河抗战，北平与南京之间，东北军与所谓中央军之间，东北军与晋阎以及其他杂牌军之间，东北军内部将领之间，各怀心腹事，矛盾重重，哪里谈得上抗日救亡。

1932年2月18日，张学良和张作相、万福麟等27名将领向全国发表通电，决心抵抗日军的侵略，"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求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励，幸而成囿可复我山河，雪莫大之耻辱"。并呼吁全国各界支持。

1933年2月21日，日寇以通辽、绥中为基地兵分三路入侵开鲁、凌南、朝阳，矛头直指承德。中国军队也分三路迎敌，万福麟第4军团所辖丁喜春独立步兵第8旅，缪澂流独立步兵16旅、孙德荃独立步兵第19旅、王永盛独立步兵第29旅，于兆麟独立步兵第30旅，外加一个炮团，布阵在朝阳至凌原一线。汤部在开鲁等地与日寇一接触即投敌溃败，开鲁、凌南相继陷落，日寇转而攻取赤峰、建平、凌原等地。中路万福麟部则腹背受敌。但万部有5个旅和1个炮团的兵力，如能顾全大局，尚可支持一时。奈

方本人贪生怕死，保存实力，其部下又互相倾轧不识大体，如29旅旅长王永盛是万的内弟，第30旅旅长于兆麟是万的义子，这两个人平时就互不服气，战时彼此争功，谁也不能指挥谁，虽是一系军队，互不关心，打起仗来注定失败。张作相曾电令万部勿遽撤退，万不理，竟中断电话。万本应撤退到承德以固防务，而他却退到喜峰口内，丢下固守阵地的某团不管，致使朝阳至承德大道完全敞开，而汤玉麟尚未见到日本鬼子的影子，已逃得无影无踪了，致使日寇百二十骑大摇大摆占领承德。热河的失陷万福麟是有一定责任的。

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责难来自各方，张学良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出国“考察”。临行前，张学良将先后进关的东北军编为51、53、57、67等4个军，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其余统由于学忠指挥。同年5月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实际承认长城为中日国界。万福麟奉命率部分驻北平南苑、西苑整训补充。同年6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兴，万福麟参加围剿据守昌平的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同年秋，万福麟晋升陆军2级上将。

1934年1月，张学良归国，2月出任豫鄂皖3省剿共副司令，代行蒋介石总司令职，设行营于武汉。调东北军57军、67军全部，并53军的108师、112师、129师及炮兵7旅，南调内战前线参加剿共。万福麟则由北平移驻保定，116师仍驻北平市，负责北平市的防务。116师之691团成立了东北抗日先锋队，吕正操任总队长。

1934年刘桂堂在怀来一带作乱，旋窜昌平县威胁北平治安，万福麟奉命堵击。同年秋，汉奸白坚武叛乱，进攻北平市，被吕正操率队弹压下去，保卫了北平的安全。时万福麟出资在北平西郊购置土地为军人公墓，移葬散柩，并立碑记其事。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不顾民族利益，加

紧剿共内战，造成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局面，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议华北伪自治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到宋哲元部队镇压。运动发生后，吕正操还暗中保护上街游行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军长万福麟对进步的爱国学生实行压制和排挤，同宋哲元的步调相一致。宋对万福麟“敬公如兄，礼重殊厚”。万驻保定时与省府各厅委时相过从，并创建进德俱乐部，联欢军政职员感情。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此前，张学良恐驻河北保定的万福麟的53军发生变故，于10月就将受训于王曲军官训练团的黄显声派到53军任副军长兼119师师长，以牵制万的行动，意在适当时候接替万的工作。万福麟老于世故，已揣透张学良将军的意图，所以对黄显声非常忌恨，遇事处处掣肘，张学良对此亦有所闻。1936年10月，张学良派刘伟任军事校阅审判长，校阅53军两师的对抗演习，附带弥合万、黄之间的裂痕。校阅完毕，适逢傅作义去北平途经保定，万设宴为傅接风，刘伟出席坐陪，刘建议邀黄显声出席宴会，但终未解除他们之间的芥蒂。

万福麟在保定闻到西安情况不稳，“几度函张，恳陈利害，以贯彻清剿共患相助”。事变起，东北军独有万部超然局外。张学良曾密电驻洛阳东北军炮兵8旅黄永安，将驻洛阳的文武官员全部扣押或全部缴械。并电令万福麟统率所部配合黄永安行动，抢占郑州，卡断陇海铁路，阻止中央军西进威胁西安。万接到密电后态度暧昧，迟迟不动，也不给张学良回电，并以开会为名将53军副军长，支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黄显声骗到保定加以软禁。万福麟盱衡全局，“轸念国家前途，终于保持冷静”，效忠国民党，“虽处境困难，立场坚定”，叛张投蒋，按兵未动，致使中央军占领潼关，向西安逼近。万福麟于14日晨接何应钦电后，于上午11时召集各师长会议，当议决唯以中央命令是听，以

国家民族为前提，“矢死反共”以守委员长的意志为意旨，辅助宋氏维持冀察治安。同日对来访记者还表示：“本人与张私交至笃，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队乃国家之军队，故本人决不能因私谈公，为小失大，绝对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彻底反共，拥护中央到底，决遵照宋委员长之意旨，负责维持华北治安。”14日，万福麟与53军众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劝张“宜悬崖勒马，以国家为前提”，“并乞迅谋和平解决之方”。同日万福麟还给南京国民政府 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王树常发去拥护 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对西安事变的电报，在电文中说：“此次猝变，事前竟无所闻，当此困难当前，何堪自斩国脉。兄之为人，弟所深知，绝本服从天职，竭诚拥护中央，无论何时，此志不渝，当祈转陈敬公部长，是为至盼。”万福麟 、黄永安背叛张学良 ，背叛东北军，致使陇海铁路畅通无阻 ，国民党中央军开入潼关 ，威胁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黄显声在石家庄表示坚决拥护，并严阵以待。正在这时，南京国民政府特派高惜冰和黄恒浩（黄显声之叔父）到保定游说 。高等会见了万福麟 ，万当即表示答应高的要求，给南京发电报，表态效忠国民党，并表示要敦促他的老上司释放蒋介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押，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在危机的时刻，东北军内部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西安城内发生了王以哲被杀的“ 二二”事件。这时驻在保定的万福麟也蠢蠢欲动，待机准备投靠蒋介石，但又怕黄显声采取抵抗行动，因此未敢公开反对张学良。他对黄显声百般加以排斥，黄终于在1937年秋离开了53军。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以后，除军事上对西安进行威胁外，在政治上采取分化瓦解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手段，提出甲乙两案，要西安方面必择其一执行。甲案是东北军集中陕甘境内，保持于学

忠任甘肃省主席。乙案是驻西北的东北军，全部移驻江苏、安徽，为安置东北军政人员，设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于学忠按南京指示曾电告留平津的东北人士，征询意见，并希推派代表，和西安代表何柱国军长赴溪口晤张决定。在天津王树翰私宅，有万福麟、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常、汤玉麟、刘翼飞、胡毓坤、陈兴亚、高纪毅等多人到会商讨对策。这些人被视为"保守派"。会间王树翰报告于学忠电报内容后，万福麟就甲、乙两案首先发言："如果保存既有势力的老观念，自以东北部队退集陕甘边境，且与西北一些实力派人物靠近，甚至共产党也不远，但是岂容一误再误？为了有助国家统一与进步，我很主张接受甲案。"大家一致赞成万福麟的意见。

"二二"事件发生后，东北军内部分化，一些高级将领不愿坚持甲案，调离陕西开到豫、皖、苏。后由刘峙在开封主持东北军整编会议，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刘多荃、何柱国、万福麟、缪澂流、董英斌都参加了。据何柱国后来回忆："开会前，我们商议安排一个人为首，以威信和地位来说，应该推于学忠或何柱国，但万福麟自恃资格老，要争着做头儿。万的威信不高，他是从当差的出身，识不了几个字，说话也粗鲁，思想也顽固，西安事变前，他未得张学良同意，曾杀了一个积极主张联共的团长，张学良对他在军事上并不怎样信任，但他会拍马，在吃喝方面尽量迎合张学良之所好，东北军将领对他并无好感，他要做东北军的头儿，都不同意，结果还是推于学忠为头儿。"万的为人可见一斑。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万福麟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所属53军之百十六师、百三十师及配属21师、骑兵第4师，负责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务。万福麟防线的右翼为第29军宋哲元部，防务津浦沿线。左翼为32军商震部，防务平汉线。初期，日寇以大部兵力进攻右翼，

对万部只以小部兵力佯攻。迨至8月初，敌即以大部兵力向防守永定河之53军及91师进攻，经此战斗，伤亡惨重，百十六师在百三十师的掩护下撤到大清河南岸转进。

此时，平汉线中国军队纷纷后撤，53军在大清河南岸新镇一带占领阵地，阻击正面之敌军，掩护主力南撤，日军紧紧咬住不放，53军边打边撤，经过任邱、猪河，过南宁饶阳、涂县、束鹿，撤到赵县。担任全军殿后任务的691团广大官兵不满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指挥，经过梅花镇激战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大片国土沦丧之痛苦，决心不随主力南去，留在冀中打游击，乃向敌后插进，并在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留在敌后打游击。万福麟对此大为恼火。

53军与其他部队强渡漳河后，转进到辉县、百泉一带休整。这时整个平汉线的第2集团军全部溃退下来。万福麟的53军与友军已失去联系，两翼友军退走全无踪影。日寇飞机向万福麟所部不断散发传单诱降，说永定之战是临时误会，希派特使前来洽商。万福麟判明情况，自知已被包围，遂决定撤离阵地。在任邱召开各师长会议，表示对日作战绝不动摇之决心。他说："本人在北平时，土肥原曾几次求见，本人都拒不接见。"接着在会上说明撤退路线，由敌人后方绕道撤到太行山区实行游击。

53军在撤退中分成两个纵队，分别撤到山西阳城，晋城两地，暂归十八集团军指挥。八路军给予53军很大帮助。53军立足未稳便遭到日寇袭击。敌人火力很猛，百三十师徐团长阵亡，后两纵队在阳城附近的纳旗镇会师合击，始将追击之日寇打退。这时五十三军电台已与长官部取得联系，并奉司令长官程潜的命令在林县、陵川一带打游击。

1938年6月，万奉命率53军在八路军帮助下渡过黄河，在广武、汶水一带整训并防守黄河。9月，奉命调赴麻城、黄陂附近，继而南渡长江，守备湖北阳新一带，掩护武汉外围右侧背安

全，参加武汉外围保卫战。53军与日寇接仗后，右侧背遭敌击，损失很大，在三溪口坚持6天，为国民党政府抢运物质赢得了时间，然后又撤到刘仁八、金牛镇一带。先后与敌作战十多次，最后撤到贺胜桥、鄱阳湖三角地一带整训。

万福麟完成武汉外围保卫战后，在后撤途中经过长沙，得以晋谒蒋介石，“即以年高体衰请辞53军军长职，并保举周福成师长继任”。蒋念其辞请恳切，允请“并畀以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职，且设副总司令部”。

万福麟辞去53军军长职，领集团军副司令衔移驻重庆南山。万福麟戎马一生，饱经世故，“粗中有细”，每当提起东北之失，“咳声叹气，无限悔恨”。万福麟是战时群居重庆南山有实无名的“南山村长”，尤其最喜聊天。一次在重庆南山万福麟宅聚餐，座中有前代理东北大学校长，并称“东北抗日救国会”派（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李孟兴、车向枕等）首领王卓然，和万福麟谈起“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所作嘲讽张学良一首诗，流传甚广，认为“马诗”与事实不符，更冤枉了“老牌影后”。胡蝶虽曾去过北平拍外景，却一直与张学良陌生未相识。万、王二人闲谈中倒是点出“九·一八”时“另有其人”，而且王卓然、万福麟被搅在那件事里。王卓然说：“那时，从上海到北平的徐氏夫妇，住在印制局局长沈能毅家里，真是荒唐极了，惹得副司令不理正事，终日嬉戏，究竟是谁把她驱逐的？”万福麟回答：“现在可以说穿了，劝不了，拉不开，咱老粗，硬碰硬，还不是我一面叫人写信去恐吓，一面在夜间打黑枪，才算赶走那妖孽。”王卓然说：“你可把我害苦了。因为事先我曾迭次谏诤过；徐被吓后，不辞而别，副司令就硬说那是我干的，一直许多天不高兴，不理我。”万对王大笑说：“谁叫你是写匿名信的老手？像我这老实厚道的人，他决不疑心呀。”大家把疑团解开，哈哈一笑。后来张学良将军的左右谈过此事余音：“我

归国到上海时，确曾几度想和‘徐’联络，可是每当拿起电话耳机，立刻就自问：‘此番回来，昨死今生，怎能还扯这些无聊的事？索性就把电话耳机放下了。可见人生途中，驱除魔鬼，真不容易。”这是张学良将军驻节武汉兴致怡然的自白。

抗战中期，国民党政府恢复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建制，即以万福麟主政辽宁，万非常感奋，亟思带罪立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窃取胜利果实，发动内战，东北诸元老宿将统于接收期间为东北行辕所辖政务委员会委员。陈诚继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末期，加派万福麟充任副主任，后东北行辕改组为剿共总司令部，卫立煌为总司令，万副之。蒋介石政权在大陆被推翻后，“但是坚持反共，纵无任何职守，终随政府到台”的万福麟，故得到蒋介石“颁赐万福麟褒扬令”。万到台湾后任总统国策顾问。1951年7月15日因脑溢血而逝，葬于台中示范公墓，终年71岁。

梁 忠 甲

陈 志 新

梁忠甲，字子信，清光绪十三年六月二日（1887年7月22日）生于今辽宁省昌图县三江口镇前梁 村梁家窝堡屯（原奉天梨树县）一个农民家庭中。他祖籍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十二庄。其先世因山东连年闹灾，遂逃荒到东北，落户于梁家窝堡屯，垦荒种地，渐成当地大户。他的祖父梁文彦、祖母费氏，皆为目不识丁农民。其父梁琮林粗通文墨，为人正直，性情急躁，生活节俭又精明能干，年15便当家理财。梁琮林治家严谨有方，为本族人立下了许多规矩，稍有违反，按条惩罚，近支上下人口可以千计，无不为之慑服，这对梁忠甲性格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梁琮林有女4人、子5人，忠甲适其中。长子梁忠勇字冠莫，从小习兽医，194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次子梁忠文，自幼读书，后考入北洋海军大学，19岁便夭亡；四子梁忠录字冠庭；梁忠武字文正为季，今尚健在。

梁忠甲自幼家贫，且人口众多，"悉由其封翁扶养成人"。梁弱冠好武勤于学，尝以韩信自况，其父壮其志，故教养独其厚，不顾家中经济拮据，还是东挪西借供其读书。先入私塾启蒙，后适逢清季废科举兴学堂。1905年他考入奉天中学堂。1907年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选送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

1909年该校并入保定军官学堂。同年12月，于陆军部考试毕业。按规定梁忠甲被派到陆军第1镇试充军职。

梁忠甲在第1镇实习半年后，于1910年5月正式被派到陆军第3镇应差。以曹锟为统领的新建陆军第3镇驻防东北（长春、昌图一带）。同年8月，梁忠甲被“委任本镇炮队第3标第1营右队排长”。第3镇于1911年回防北京。同年2月，梁忠甲接奉陆部发给文凭及副军校（炮兵中尉）札覆。10月武昌革命爆发，11月中旬，梁忠甲随陆军第3镇开赴山西，在娘子关同民军作战有功，被褒奖为正军校并加协参领衔（上尉加少校衔）。1912年民国建立后，全国陆军各镇、协的番号一律改为师和旅。梁忠甲所在第3镇改为第3师，2月升充炮队第1营第1连连长。9月，他身染重病，请假开缺回原籍休养。

1913年3月，梁忠甲身体康复后，投吴俊升为旅长的中央骑兵第2旅任第3团团附，驻防郑家屯。从此梁忠甲为吴俊升的部下始终未离开左右。同年11月，因克复经棚（今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境）驼罗大王各庙蒙匪案内出力。吴俊升负伤遇险，梁忠甲舍死相救有功特授陆军步兵中校。同年秋，袁世凯在战胜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之后，立即抽调兵力对白朗农民起义军展开围剿。1914年初，梁忠甲被派赴河南对义军作战，在木兰坡追剿义军出力，“蒙赏五等文虎章”。同年3月，吴俊升因围剿乌泰匪帮出力，被袁世凯晋升为洮辽镇守使。梁忠甲从关内回防后，委充洮辽镇守使署一等参谋官。

1916年3月，蒙匪巴布扎布与“宗社党”头目肃亲王善耆在日本人操纵下，扯起“勤王扶国军”的破旗，纠集四五千匪徒，从海拉尔南下窜扰，妄图占领奉天，建立“满蒙帝国”。吴俊升奉命阻击巴匪，在突泉激战中，毙叛匪5百余名，巴匪被逐出经棚，追至“林西（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境）战役”中巴布扎布被热河米振标部毅军所发流弹击中丧生，蒙匪叛乱始告平息。在防剿

巴匪的遭遇战中，吴俊升中弹落马，梁忠甲冒死冲上救起，化险为夷。他作战英勇果敢，屡建奇功，吴俊升对他更为器重。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分裂为直、皖、奉三派，张作霖在奉天执掌军政大权。1917年7月，中央骑兵第二旅及奉天后路巡防营等合并改编为陆军第29师，吴俊升任师长，梁忠甲被委任为该师炮兵第29团第3营营长，又因围剿巴匪立有军功，加陆军步兵上校衔。1918年2月，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第29师炮兵第29团第3营营长。1919年4月，梁忠甲兼任本师军官团团长，负责军官训练，因成绩显著获2等银色奖章一枚。1920年1月，署第29师第57旅（旅长万福麟）第114团团长，12月真除第114团团长。1921年3月晋升陆军步兵上校。5月，兼任东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副司令。11月获四等文虎章。1922年12，部队番号改变，步兵第44团改为东三省陆军步兵第38团，梁任团长。

张作霖经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深知奉军官兵素质极差，亟需加强训练，乃决心彻底改革，建立新制度，整顿旧将校，充实陆军讲武堂，培养新骨干，重用和信任新人，整军经武，以求雪耻。张作霖将所有军队整编为陆军步兵27个旅、骑兵5个旅，适逢江省骑兵旅旅长石青山病逝，梁忠甲于1923年继任骑兵旅旅长。整编后番号为骑兵第5旅，归属陆军第29师建制，驻防海伦。不久兼任东省铁路军哈满及满海总司令。

直系军阀曹锟于1923年10月5日，以重金贿赂当选总统，粤、皖、奉三方曾有联合打倒曹吴之三角联盟。直奉双方都在作军事准备。奉军仍名“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下辖6个军。梁忠甲所部骑兵第5旅属吴俊升的第5军。1924年5月梁忠甲兼任黑龙江省防军第4路统领官，7月兼东荒剿匪总司令。9月，江浙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梁忠甲骑兵第5旅随吴俊升于9月22日占开鲁，陷赤峰，直取喜峰

口。梁忠甲旅为最前线，每战皆身先士卒，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驻热河的王怀庆师、毅军和龚汉治、张林等均被击溃，到10月7日，热河战事即先平息。10月20日，各线直军已被彻底击败。10月24日，直军得到冯玉祥在前线倒戈囚禁曹锟于北京延庆楼的消息，军心益散，到10月28日，张宗昌部由冷口进占滦州。在山海关方面之直军即被奉军缴械收编。吴佩孚自秦皇岛循海路退到天津，再经海上转逃汉口，奉军已获全胜。

奉系张作霖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实力剧增。1925年下半年，将东北势力范围内之军队整编为20个师又11个旅和1个辎重团，并建立起相当规模的海、空军，统称东北军。整编后，梁忠甲在吴俊升的第18师充任步兵第15旅旅长，回原防黑龙江省海伦。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1925年11月，奉军内部拥有重兵的郭松龄，乘势在滦州举兵倒戈反奉。

张作霖于1925年10月，抽调黑龙江省万福麟第17师及步兵第15旅梁忠甲部，预定出击多伦，参加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正面以梁忠甲步兵旅由京津进攻张家口，对冯背后以骑兵迂回，经多伦，企图在张家口会师。当先头骑兵已到达围场等处时，张作霖已发觉郭心有变，遂急令吴俊升率万福麟师和梁忠甲旅向锦州方向急进。

1925年11月23日，郭军沿京奉线东进。在山海关大败张作相部，乘胜追击到绥中、连山。当奉军第五方面军进入阵地阻击郭军的第二天，万福麟师、梁忠甲旅开到连山参加对郭军作战。郭松龄利用气温急剧下降、皂篱山下的海面突然结冻的机会，拂晓即向汲金纯师左翼进攻，占领了白马石阵地。在汲金纯首先乘火车逃走的影响下，梁忠甲尚能指挥所部抵抗郭军数小时，最后不得不于上午10时，撤出阵地转为军团预备队扼守铁道线，掩护全军撤退到义州。第三天午后，王之佑、于深澂、李杜等师旅长

们议定，于次日晨按骑兵16师、步兵15师、汲金纯师、梁忠甲旅的顺序，从义州出发，沿烧锅营子、魏家岭向新民集结，阻止郭军前进。

在新民巨流河两岸，郭、奉两军会战，梁旅属吴俊升第六方面军建制，布阵于左翼。吴俊升于 12月21日到达 前线并下达命令，组成以万福麟所部马占山骑兵第5旅及骑兵17团为突袭部队的先遣部队，穆春骑兵14师沿前头部队行进路线跟进，骑兵第3师张九卿为预备队，在大民屯左翼警戒。吴俊升最后训活，大意是要求团结，郭鬼子来了，我们都不能存在，和他决一死战。吴说："我出发后由梁忠甲旅长代行我的职权，上将军说了，你们都要服从指挥，唔、唔、军无戏言。"梁忠甲送吴俊升，吴边走边嘱咐说："唔，唔，子信（梁的字 ）官印我交给你 ，这个时候，不管谁，不服从，毙，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无戏言。"吴俊升率梁旅在巨流河东岸截击郭军，两军相遇，梁旅拚命御敌，致使郭军未能前进，使危在旦夕的奉军得以喘息，待援军赶到，将郭军击退。

巨流河会战结束后，属于黑龙江方面的万师和梁旅，刚从打（打虎山）通（通辽）线转入四（四平）洮（洮南）线返回黑龙江省。

梁忠甲于1926年春，随吴俊升入关，参加讨伐冯玉祥国民军的混战。奉、直、晋三方军队，先由吴佩孚、张宗昌指挥，分路向南口、张家口进攻。自8月14日，于珍第10军攻占南口，吴俊升部占领多伦。

1927年4月，梁忠甲任冲威将军，晋任陆军中将。10月，获2等文虎章。张作霖于1927年9月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为简化军事指挥系统，组织7个方面军，梁忠甲旅属于吴俊升的第6军团，为全军的总预备队。

1928年3月梁忠甲获三等嘉禾章。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

学良于6月19日，从关内返抵奉天，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积极将关内撤回之部队及原东北三省之军队，以旅为单位，来一次彻底整编，统称东北军。梁忠甲仍任第15旅中将旅长，并兼哈满护路军司令，驻防满洲里。

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在1924年签订的“奉俄协定”至1929年业已期满，有关东铁事宜应另行协商。1929年春，中东路因正、副局长权限问题，中苏双方发生争议，互有主张。“照中俄、奉俄两协定，应完全由东铁理事会讨论，此事本不在外交范围内”，双方几经会议协商均无结果。5月27日，双方关系突然恶化，“东省特警处悍然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并逮捕39人，苏联驻哈领事以此为借口，大批外交人员偷偷回国，秘密把馆内文件焚毁”。5月31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与中国绝交，领事馆降下国旗，领事回国。与此同时，苏联在军事上也积极准备，驻伯力的远东军区司令布留赫尔（加伦）从5月下旬就部署向赤塔以南至满洲里线上增兵，准备以武力进攻中国，夺回中东路的支配权。当时中苏外交谈判尚在进行，但苏方毫无诚意。终于在1929年7月10日，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蒋介石出于他反共仇苏的目的，认为中东路是苏联“宣传赤化”的大本营，从而影响他的反动统治，同时还认为东北虽已“易帜”，名义上拥护南京政府，而实际上张学良父子两代统治东北有年，形成了特殊局面，统治权尚不能完全达到。蒋介石为控制张学良，利用张学良急于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与苏联开战，使其陷入军事和外交困境，最后不得不依赖南京政府。在中苏关系尚未恶化时，张学良曾派军令厅长王树常赴南京，向蒋介石力陈不宜诉诸武力的意见。胡汉民对王树常说：“你是军人，怎么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很弱，他们不敢如何。”蒋介石也接着着说：“你不必说了，我已有电令给汉卿了。”王树常快快而回。蒋介石这样做是想使张学良毁弃1924年

东北当局与苏联缔结的"奉俄协定"，破坏多年东北与苏联事实上的东铁合营关系。

张学良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对时局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冒然决定采取武力手段强行接管东铁。这正中了蒋介石的诡计。苏联政府根本不想把东铁主权交还中国，所以利用外交谈判为掩护，暗里调集大军陈兵国境，边界武装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帝国主义也虎视眈眈，早存伺机侵吞中国之野心，东北边疆夹于两大强邻之间，而东北边防空虚，且无备又无战意，更有甚者尚存侥幸之心里。一旦折冲破裂，俄方兵势大，准备充足，而中方却高歌和平，徒待外交恐不免为人所乘，其后果很难设想。

苏联政府根据1924年"中俄协定"与"奉俄协定"的规定，于7月17日向中国驻苏代办提出最后通告，"华方所办之事均是最危险之事情，如不恢复东铁原状，对中国将有莫大危险"，以此威胁东北地方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时特任命熟悉中国情况的布留赫尔（加伦）为远东特别军区司令，确定以武力解决争端的方针，而后苏联多次出动飞机越境侦察，并扣留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正常航行的中国商船和渔船；割电线、绑架边民等挑衅事件屡屡发生。到7月下旬，苏军首先在中国东部发动武装进攻，派飞机轰炸中国绥芬河穆棱两车站；在西部，苏军则侵犯中国的满洲里和扎兰诺尔，抢走中国机车，炮轰车站。苏联军事进攻逐步升级，严重威胁中国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东路护路军分东西两线，即以黑龙江防军第15旅旅长梁忠甲为司令的西线护路军和以吉林省防军旅长丁超为司令的东线护路军，负责哈长线、哈绥线、哈满线的守卫任务。

哈满线全长935公里，梁忠甲率步兵第十五旅担任此线护路任务，归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万福麟指挥。梁旅全部官兵约万余人，旅辖3个步兵团。6月5日"接东北边防军副司

令长官公署的命令："近来俄人在边疆增兵，要严防入满。"梁即开始在满洲里和扎兰诺尔部署兵力，6月中旬开始在这两处构筑工事。此间，时有后方投军者要求入伍，梁忠甲在满洲里车站设立投军招待处，用来接待投军人员。从7月初起，一个月时间共收留300余人，这极大鼓舞了全旅官兵士气。在激战发生前，苏联在哈满线上隐匿间谍甚多。战事一起，铁路便时遭破坏，梁部分段设哨昼夜检查，随时修复被破坏之路，保障火车运输畅通无阻。苏军大批骑兵进攻扎兰诺尔，开始于7月2日上午8时，双方发生激烈战斗。至午后2时左右，苏军伤亡甚重，人马落水者均被梁旅所俘。3时许，苏军向北退去。这次战斗俘苏骑兵59人，经教育于3日晨放回。梁部张德厚连长阵亡。

7月12日下午1时，苏军千余名，乘小汽艇沿额尔古纳河逆流而上，向梁旅38团阵地右翼进攻，梁部当即迎头痛击，苏军被迫退去。当晚双方炮战3小时。自此以后苏军每夜都前来骚扰。到8月5日，苏军步、骑约6千余人，地空联合向梁部阵地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颇重。因梁旅阵地工事坚固，苏军进攻未得逞，至7日方退。苏军进攻此处未得手，乃调转兵力，向满洲里正面集结。梁忠甲得到情报后，遂将38团、43团调往满洲里。扎兰诺尔阵地由东北陆军第17旅韩光第部接防守卫。

中苏失和以来，做为守土长官的梁忠甲，时刻注视边疆事态的发展变化，采取了相应的军事措施。梁旅38团、43团于8月7日午后，与寇边苏军步、骑接战，经过激烈战斗，已成对峙状态。苏军飞机每天临空侦察，梁旅昼夜监视其行动。满洲里市内侨居很多苏联人，暗中向苏军传送情报事件时有发生，经缉拿大部归案。日本驻满洲里领事也不时到梁旅司令部探询军情，梁忠甲曾请他们撤到哈尔滨暂驻，以免危险，但日本政府不准。8月24，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公署派参谋长苏炳文到满洲里慰问，并视察阵地，同时接到张学良司令长官告将士书，其大意是"国土

不能一寸予人，我中华健儿守土有责，英勇向前杀敌，绝不让敌人越过边疆一步，定要雪爱辉之耻，报海兰泡之仇”。边防将士的士气为之大振。10月2日，梁忠甲据报：“苏联政府于9月18日向各国大使宣布，关于东省铁路问题，我方始终主张和平解决，并业经德国转达，对于中国交涉条件，虽以最大限度之让步，表示和平态度，而中国态度虚伪，毫无诚意。因认为今后之交涉无望，而本政府以前经过德国调停一切交涉断然中止。此后对于中俄国境方面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责任，非本政府所应担负。”10月10日，贝加尔方面苏军3万人向中国东北界进发，梁忠甲告急：“自10日晚至11日晚6时，苏联步骑向满洲里43团、51团、38团阵地射击。”梁忠甲的这些报告并未引起上司的重视。当大规模激战发生时，他们事先没有什么准备。黑龙江省边防司令长官万福麟，只是命令梁忠甲与韩光第仓促应战。吕荣寰则向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告急，请派兵增援。张复电说：“军队没开拔费”，着路局电汇哈大洋10万元。张作相却指使丁超摆出一副抗俄架势。这时张学良已发布动员令，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1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开往东线；派胡毓坤为防俄军第2军军长，率一部东北军进击西线。“王树常军长到达哈尔滨，住在道外新世界大饭店，花天酒地，玩扑克赌钱，根本不把‘抗俄’当作一回事。”王树常所属的部队只能到达一面坡，如再前进怕与吉林军相抵触。胡毓坤的队伍到达海拉尔，也不愿前进，以避免与黑龙江军发生摩擦。梁忠甲率部在满洲里抗击苏军保卫疆土的声誉日高，万福麟怕其以凯旋将军的资格拿走那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的大印。由于以上种种的矛盾，万福麟的抗俄态度是消极的。因此，他对梁忠甲、韩光第两个旅，既不增援，也不补充弹药，坐视他们孤军苦战。斯时东北的民气很高，许多大、中学生，纷纷采取行动。如沈阳冯庸大学学生，驾驶该校的一架自备飞机赴西线参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自动进行军事训

练，栗又文之弟栗德澄担任军训队长。与此相反，哈尔滨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却争相逃往内地，哈埠车站一时拥挤不堪。

满洲里一带，到11月中旬，气候大变，气温在摄氏零下30至40度左右，晴天也落雪花，大雪两三天一场，江河湖海均已冻结，成为一望无际的白色平原，特种兵部队畅通无阻，地势平坦广漠开阔易攻难守。苏军趁此机会，先切断满洲里到扎兰诺尔的交通线，首先主攻扎兰诺尔。11月13日，苏军步、骑、炮、坦克约一万五六千人，地空协同进攻扎兰诺尔和满洲里。第17旅旅长韩光第亲临前线指挥，打退苏军多次进攻。11月17日，苏军4万人，配以大炮60多门，飞机20余架，坦克40余辆，还有汽车等新式装备，猛攻扎兰诺尔，一面以相当兵力，包围满洲里，一面以部分兵力进袭嵯岗，以断中国军队之后援，当日扎兰诺尔车站失陷。韩旅在扎兰诺尔血战两昼夜，旅长韩光第亲临前线手提机枪冲向苏军，阵地屡失屡得，虽打退苏军多次进攻，皆因苏军陆空联合，炮火集中，18日韩旅长光第、林团长选青相继阵亡，张团长季英重伤后自戕。扎兰诺尔激战时，梁忠甲曾两次突围增援韩光第旅均未得手。然在满洲里已击落敌机两架，俘敌3百余名，夺获枪械不少。梁旅阵地坚固，损失不大。迨扎兰诺尔失陷，援应断绝，而攻扎之苏军，转而集中攻满洲里。梁忠甲以一旅孤军与苏军4万余，步兵、骑兵、大炮和坦克，陆空联合进攻相抗衡。东大营司令部被炸毁，民房也有不少毁于炮火，双方伤亡甚重。

11月17日早6时，苏军以坦克车30余辆，飞机29架向满洲里进攻，炮火非常猛烈。梁忠甲即指挥前线官兵迎击。无论苏军如何猛攻，梁忠甲尤骑马往来指挥，军士无不以一当百，一日之间，阵容并未发生变化。至18日，苏军又来进攻，炮火愈烈，连向梁旅阵地猛扑数次，但梁部军心巩固，迄未稍动，并以重迫击炮击落苏机两架。迨午后扎兰诺尔电话忽然不通，梁忠甲意识到该

处战况不佳，遂向军民表示：“有梁某在决不使满洲里有苏军踪迹。”因此官兵益发奋勇应战。战至将晚，阵地巩固如常。及19日，苏军忽增兵八九千人逼向梁旅，取包围之势，街内秩序因之紊乱。梁忠甲即刻在街里召集商民慰之曰：“请大家安心，我梁某要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亦与敌人周旋到底，尽吾捍卫国土保卫商民之责。”商民对梁忠甲本极敬仰，闻此言后，略微镇静。

当日下午全旅官兵子弹行将告罄，东大营司令部楼被毁，民房也多毁于炮火。从19日零时起，小白石山上指挥所为敌炮火毁，山上阵地失守。上午10时又接胪滨县（满洲里）长电话报告：“城内居民无粮，请想办法救济。”梁忠甲当即指示军需处长给居民发放粮食。此刻梁忠甲也确实心急如焚，即以无线电话向胡毓坤和江省副司令长官请援，要求补充粮食弹药，并告之：“吾子弹虽尽，尚有刺刀可以支持3天，但3日内须有援军到，方可永久支持。”迨20日晨，先后接到万福麟、胡毓坤等电话称：“因铁路破坏援军已不能前进，可相机突围，以全实力。”梁接电话后，方知已无力维持了，遂于午后2时许召集各界皆唯命是听，旋计划保护全体商民一齐退却。梁即下令编成突击队集结兵力，准备向吉布湖朗图前进。机关人员乘汽车在前，商民随其后，梁忠甲率骑兵3百（临时由官兵组成）在前冲锋。步兵夹商民而行以断后。突围队伍一齐冲到满洲里西南18里许的小白石山，这里已被苏军占领，用炮火截击梁旅官兵及商民。顿时炮火连天，致使汽车3辆悉碎，车上人员多半丧生于炮火。梁见状大怒，即一马当先向苏军炮火阵地冲击，骑兵随之，迳驰入苏军阵地，夺得苏军大炮7门，奈未得炮弹，无法使用。正当梁攻入时，战马中炮而亡，梁脚部受轻伤，遂以卫士之马代之，仍勇猛向前。而敌人之炮火亦愈加猛烈，殿后之步兵与商民死于炮火者不计其数。但每炮弹至，全体官兵却大呼曰：“众位勿惧，只要我们团结力坚，一切均可战胜。”因此苏之炮火愈猛，军民之意志愈

坚。每落一弹，军民即死伤多人。梁知不能突围，加之商民哭劝再回满站，免遇危险，乃率军民复归满洲里以待援兵。时苏军已尾随跟踪而至，遂又与入满苏军在城内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当天在小白石山约战6小时，梁旅伤亡数百，商民亦死亡2百余人，苏军也死伤无数 。到21日，梁旅子弹不存一粒 ，梁忠甲令拿出扎枪二千余枝，分给军士乃保商民向东西喇嘛街退却，由副旅长魏长林及孙副官长在前冲锋而出，沿铁路南侧边打边走，但不断遭截击。至东门外，魏长林副旅长及孙副长官皆殉难。梁忠甲乃忍痛亲身督战前进。喇嘛街乃苏军大本营，有生力军千余人，在彼守候。梁率疲惫之师及商民于当日11时许，即进抵喇嘛街。因步兵行动缓慢，联络被切断，梁忠甲乃回马去接应始得跟上。时已被四面包围一昼夜，未得饮食。自20日又冲锋数次，以寡众悬殊不敌，枪弹断绝不能出险。自20日到23日与苏军肉搏前后27次，上自梁忠甲下至军士商民，“均粮米未曾入口，甚是精神勃勃，奋力抵御，古今苦战殆无逾于此矣”！

从11月17日扎兰诺尔失陷，梁忠甲独率所部力战数昼夜，弹尽防破 ，时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前来调停 ，并对梁忠甲说：“贵军已山穷水尽，援军又已绝生，此时非暂缴械无以自全，愿君思之。”梁忠甲答曰 ：“我军子弹虽绝 ，尚有扎枪可与敌相见，……”日领事说：“不能供给敌人亦敝领事所乐闻，但交敝领事所保管当无他说，并愿担保商民性命财产及全部军士之生命。”梁忠甲闻之，泣不可抑，答之曰：“余守边防吏也，弹既尽，防已破，有死而已，他何敢知。”并以手榴弹自拟，幸日领事抢之急，卒为劝阻而止。梁忠甲自戕未遂。此时左右军民皆嚎啕大哭跪于梁忠甲面前，有的泪尽继之以血者。梁亦痛哭流涕，两眼红肿。日领事乃将梁氏拥至日领馆 ，军民皆徒手而回 。满洲里陷落，第15旅旅长梁忠甲等八千余官兵被俘，伤亡近两千人。

苏军主力入城后，指挥官李达夫想把梁忠甲送往伯力或莫斯

科。梁大怒对李说："不是你们先要求同时停火吗？我不是战败，也不是投降，我宁愿做边疆鬼，不作阶下囚。"李笑曰："满洲里太乱，为了司令的安全起见，有必要请梁司令离开此地，暂时到大乌利作客，俟双方政府交涉有结果再请司令回来。"梁忠甲就这样被迫率领参谋长张文清、李乐山，参谋处长刘斌，参谋王理寰、李世俊、乌庆霖，副官王呈祥等人到车站乘自己的包车，来到苏联境内大乌利车站。中苏西线武装冲突告一段落。

蒋介石唆使张学良与苏联因中东路争端而发生冲突后，不派一兵一卒的增援和弹药补给。然而却玩弄一系列外交手法，表示用外交行动全力支持张学良的抗俄。后来鉴于战事节节败退，又改变手法，请求德国外交部居间斡旋。认为张学良把祸闯下，只得由南京政府出面，设法用内政外交渠道挽救局面。张学良见败局已定，深感受了欺骗，才采取停战求和的办法，派遣吉林交涉员蔡运升赴伯力与苏方谈判。

1930年1月中旬，中苏外交官在伯力签约12条，梁忠甲在苏滞留一个多月后，于1月10日回到满洲里，2月任满海警备司令。

梁忠甲回满洲里后，收容部队移防海拉尔整训。2月15日，他率第15旅一些随员赴江省督办公署向万福麟述职。他首先要求将自己撤职查办，哈满护路司令另选贤能。万福麟不允，并让其参加军事善后处理会议。会上，梁忠甲发言"根据这次满、扎作战失败，深知我军装备落后，武器太差；无空、地作战经验，御空能力薄弱；指挥不统一，徒恃官兵勇敢各自为战是不行的。互不统属，指挥失调，尤其第2军归沈阳长官公署直接指挥。胡军长到海拉尔后，未到满扎等地视察过，也无任何联系，扎满混战数日，第2军按兵不动，坐视失败，使人遗憾！"此外，他还建议地方应加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团结，成立蒙汉语学

校。为储备铁路人才，应在海拉尔市设立一所交通大学，以备今后修铁路之用。同时建议修建由牙克石到漠河的公路，也要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梁忠甲回到海拉尔防地后，因料理防俄战役善后事宜诸问题，未曾返哈一视高堂祖母、乃父、发妻和幼子，以解其悬念之忧。他参加黑龙江省军事会议之后特别兴奋，治理哈满沿线不遗余力。3月7日晚，召集全旅官兵讲话，10时方散。当晚梁忠甲下榻于原道胜银行经理寝室。8日清晨7时许，护从马弁入内侍厅。因梁忠甲向例于晨7时起床，数十年如一日，讵意是早叩门，门尤严扃，该护兵以为梁忠甲宵来疲劳，致稍延起，故未敢惊动而退。延至8时顷各机关人士来部谒见，护兵乃入内报告，见门仍未开，因隔门高声报告，内仍寂无声息，于是大疑。急告之于张参谋长。张与司令部官佐数人闻讯大惊，乃破门而入。一进门恶气扑人，张不开嘴，见梁忠甲身着绒衣，上半身欹斜于床，下半身拖于地上，面色惨白，口际有白沫许多，且已凝结于唇，外抚其体已僵矣。此时尚以为可救，马上请来俄籍大夫，进行抢救，经约20分钟抢救无效，终因煤气中毒而身亡。

梁忠甲于1930年3月8日凌晨猝死于海拉尔司令部，噩耗传出，海市商民为之痛哭失声，聚于司令部门外者不下千人。及闻梁忠甲身亡确信者，莫不潸然泪下，甚至有痛哭失声者。感激梁忠甲驻海满有年，不但守土防俄有功，即所部军队，亦无扰害商民之处，故在满海一带政声卓著。梁忠甲的猝然死去，使张学良将军悲痛异常，另拨治丧费三千元（万福麟已拨三千元治丧费），抚恤有嘉。南京国民党政府又于4月4日，拨款五十万元，以褒奖梁忠甲及东北边防军在防俄作战中阵亡将士韩光第、魏长林、张季英、林选青等12人。5日，沈阳召开各界追悼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以彰忠烈，抚恤有嘉。

梁忠甲之猝死，使东北军劲旅失一良将。他自投军供职迭次

提升，前后21年间合本兼计14迁其官，其战功概可想见，而最彰著尤在满洲里一役。

梁忠甲自任职以来，“每以清廉自持，尝引军官横征苛敛、虐待士卒，任用私人克扣军饷为奇耻”。故其节俭异常，积少聚多，为家乡办公益事业。1928年间，梨树县教育界名流创办私立老城高级中学，致函梁忠甲筹集资金赞助办教育，梁忠甲献大洋三千元。同时出资创办第15旅满洲里兵工厂，约垫款10万元，“其目的纯为士卒谋幸福”，故深得士兵爱戴。至于家中情况，当时报载“梁忠甲身后萧条”，“遗族有6旬余老父，8旬余祖母，夫人亦仅4旬余，子5、女1”。长子年18岁，幼子仅5岁。梁在任职期间，“并未添加田一亩，筑房一楹，不过不时补助家用之不足耳”。其为官清廉，可想而知。

韩光第

陈志新

韩光第，原名玉楼，字斗瞻，又千翘，1915年改名光第，1895年10月31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出生在今黑龙江省双城县（原属吉林省）西关镶黄头屯一个大户农家。祖居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泉水眼村。清嘉庆年间其先世被移民迁到双城落户，垦荒耕种。经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人丁逐渐兴旺，成为当地一大富户。其父韩英贵始业儒，秀才出身，“累官至旗署佐领”，民国元年当选双城县议会议长，不久因病故去。遗孀范氏，本县徐家窝堡人，勤劳俭朴，吃斋念佛。有子三人，光第为季。韩光第自幼喜欢读书，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他恪守儒家孝悌忠信道德准则，虽少年丧父，却“事母以孝闻，对长兄尤称逊敬”，幼尝读《论语》，尤以“孝悌”自励。

韩光第天资聪颖，“倜傥卓荦”，九岁外出就读，读书善悟，渐露头角。暇与群儿戏，好垒土筑城，其父惊异厚爱。

韩光第出生在清王朝甲午新败的的当年，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东北人民倍受沙俄之害。1896年，沙俄威逼、贿赂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东北修筑中东路的特权，妨害了日本独占东北的计划，终于爆发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两个强盗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撕杀，给东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房舍为墟，百姓流离失所，人民的生

命财产惨遭浩劫。日俄侵略者在韩光第的幼小心灵留下了“碧眼东来，黄倭西上”的深刻印象。

民国元年，韩光第考入吉林省立警官高等专门学校。省城吉林，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使这位久居县城的少年大开眼界，深感祖国壮丽山河之可爱。学生、教师来自全省各地，他们思想活跃，见解各异，谈论的问题也很广泛、新鲜，使其耳目一新。而令韩光第最为感兴趣的则是救亡图存问题。韩光第是个进取心很强的青年，在学期间品学兼优，每试辄冠侪辈。他喜读历史，自惭孤陋寡闻，遂产生东渡日本留学之念。事前因其父早亡，孤儿寡母，族中长辈曾横加阻拦。其叔父竟以韩光第完婚为由阻止去日本。然光第之妻计氏菊芳，则极力支持。计菊芳为满族，其父当过私塾教师，计氏也粗通文墨，且为人温和宽厚，善良贤慧，虽长光第3岁，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她能支持丈夫远离家乡赴日留学，足见其深明大义。

1914年春，韩光第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途，路经北京，有机会饱览了文化古都之秀丽景色，每每驻足翘首，赞叹不已。巍峨的天安门城楼，壮丽的宫殿都使他留连忘返。圆明园的残垣断壁，使他对侵略者的暴行，恨恨不已。北京城里的小贩，沿街乞讨的叫花子，面黄肌瘦的大烟鬼又使他忧心忡忡。紫禁城雄伟的建筑是可爱的，百姓的贫困是可怜的，而游手好闲精神颓废之辈又是可悲的。他想，要改变中国现状非奋斗不可。

同行的留日学生都住在旅店里，唯独韩光第思之留日旅费筹措之艰难，故独自住在关帝庙内。早春的北京寒气逼人，他坐在寒冷的古庙之中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感叹：“中国太弱了！”“灾难太深重了！”“这长夜漫漫黑暗沉沉，不就是今日中国之象征吗？”他激励自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韩光第抵日本东京后，在表兄王冠五等人的帮助下，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他寄宿在一个平民家里。房东老夫妻只领一个

15岁出头的女儿，都为人和善，对韩光第的饮食起居照顾很周到，使其在异国稍感宽慰。

韩光第自幼对文史有浓厚兴趣，而尤其喜欢法律。他打算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帝国大学深造。为此，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期间，专心攻法律。不久，韩光第了解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很快强盛起来，特别是在军国主义思想教育下，日本青年多骄气横生，不可一世。做为穷国弱民的中国留学生常有相形见绌之感，而且不时受到日本人的白眼和凌辱。一次，房东家来了一个四五岁的小客人，竟指名要吃"支那"，这是一种印有中国图案的饼干，韩光第心中甚是愤愤不平。留日学生中的有识之士，常聚会议论，无不为国担忧，认识到日本是中国的一大祸害。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出兵山东强行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顿时举国上下舆论大哗。有爱国思想的留学生纷纷起来抗争，韩光第卷入了反日爱国斗争。他感到不能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于是提前返国。时袁世凯称帝，国事日非，外侮频至，中原鼎沸，终于形成全国讨袁护国运动。韩光第认为无武力不足以安内攘外，遂毅然投笔从戎，先入北京中央讲武堂，遂于1920年转东三省讲武堂，1922年毕业于第2期，名列前茅，时年二十有五，分发到吉林，充任排长、上尉副官。旋调至奉天任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步兵科第2连任中尉连附，后又改充中尉副官，1923年擢升连长。

1924年1月，韩光第调教导队步兵科第5连连长。是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张作霖仍称奉军为"镇威军"，韩光第改编在"镇威军"第1补充团第5连，任连长。后又调任镇威军一、三联军二、六旅联合卫队军士连连长，手枪队队长。10月晋升为少校。二次直奉战衅一开，山海关一带地区直奉双方争夺激烈。九门口之

役，肉搏数次，尸垒成梯，韩光第率手枪队几陷重围，均赖他率众勇敢冲杀得脱。奉军2、6旅攻九门口，韩光弟又随第6旅转战榆关、秦皇岛一带，屡歼直军劲旅，为军阀混战“迭奏虏功”，韩光第遂被擢升。

奉系张作霖经过第二次直奉大战，收编许多直系部队，实力大增。为便于统一指挥，改旅制为师制。到1925年5月，张作霖将东北境内的军队整编为26师又11个旅和1个辎重团，并建立相当规模的海空军，统称东北军。1925年3月，韩光第被提升为东北陆军第3补充团第3营营长，4月，被编入东北陆军第7师第5旅第84团任第3营营长。7月，调充东北陆军第7教导队第4期步兵第1营营长。对学生孜孜不倦，必使心领神会而后已。“余暇与同寅王以哲研究战术科学，而王以哲也以文学向韩光第请教。”韩光弟任教导队第4期1营营长，对于学兵启迪盖力，迨至日后提起该教导队之成绩莫不称许第4期者，韩之力居多也。此数年中，为韩之修养训练时期。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通电起兵反奉。郭军初兴，如秋风扫落叶，下榆关，克连山，陷锦州，直向奉天推进。前锋已抵省城附近的巨流河两岸，奉天城内一片混乱。张作霖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方面做下野逃跑的准备，一方面纠集残部，招兵买马，急调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军队南下驰援，拼凑成立3个方面军，组成“讨逆军司令部”。张学良亲到前线督战，沿巨流河布阵，阻止郭军前进。韩光第教导队被编在刘翼飞第4补充旅步兵17团任中校团附兼机关枪第1营中校营长，佐邵团长周旋于马户屯车户屯一带。在反击郭松龄兵变中，韩光第异常出力。他带领士兵奋勇冲杀，所向披靡，声名益振。郭松龄事变后，韩光第于1926年被王瑞华旅长特调，任27旅41团团长。

同年12月末，张作霖讨伐郭松龄之役甫结束，即派奉军3个

旅去追剿魏益三残部和监视冯玉祥的国民军。到1926年春，张作霖又发动对冯玉祥国民军之战 。韩光第随张学良入关 ，抵永平府，值友军与冯的国民军相持，经旬余未下。韩光第奉命换防率部到其地，迎头痛击冯的国民军。卢龙之役，韩光第独立攻取国民军占领之龙风塔寺，国民军拒险顽抗，弹如雨落，韩光第奋不顾身，再接再励，终占其地，迫令冯的国民军撤向南口。其后在通州二道关口北诸战役中，韩光第无不身先士卒，斩将夺关，为张作霖抢占地盘屡建奇功。

不久，吴佩孚与冯玉祥的关系再度破裂，吴、张重新联合讨冯。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中南海会晤，一扫前嫌，决定协力讨伐冯玉祥的国民军。时张、吴倾奉，直军10万之众投入讨冯南口大战。国民军扼守天险，坚垒隐蔽，直、奉军"恨难一举而下"。韩光第奉命绕道攻南口东北方之二道河子、十八盘一带，破冯军左翼，遂使正面阵地迎刃而解。

南口战后，韩光第驻防延庆待命，并整肃军纪。一名士兵，因私征驴马变卖 10元钱 ，遂处死 。韩在给其兄家书中写道 ："抢夺10元之物，以刑法论，罪固不应至死，虽然军中之法，不能以普通之刑相绳也。民国以来， 军纪废驰， 兵士之扰闾阎无所不至，人民对于军队积忿深矣。"韩光第此举纵或失之酷，然治乱国用重刑，借此以惩一儆百，则其为军人恢复名誉，实属难能可贵。韩光第虽出身旧军人 ，但又不同于旧军人 只知穷兵赎武，不知保民者，在延庆时曾亲书其胞兄，信中说道："百姓饿死者、伤死者，流离道路、家破物亡者，不计其数，触目见此无恶不作之军人，愈觉得惊心动魄。"光弟因频见民遭兵祸，故其家书关心民瘼之情，随处流露，此为一般旧军人所不及也！

1926年9月、10月 ，国民革命军北伐已深入鄂赣 、底定福建。1926年11月29日在天津蔡园组成安国军，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2月，张作霖命令三、四方面军团向河南进军，从此揭开奉军与直军、奉军与国民革命军战争的序幕。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继续所谓北伐，向盘踞在河南的奉军发起攻击。奉军从上蔡战事失利后，残部撤至鄢陵以南，冯玉祥趁势东进洛阳。在洛阳战役中，奉军战况日趋恶化，虽有第10军全力以赴增援，但因士气沮丧仍节节败退。此刻晋军也开始偷袭奉军，奉军三、四方面军团部被迫于 5月28日发布总退却令 ，全军北撤至黄河铁桥，韩光第奉命掩护退却。北伐军乘势猛扑来，大有风声鹤唳之势。韩光第却以五百人殿后，保护全军安全撤退，而全团竟不折一兵一矢，平安渡河，此亦难矣！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职，将安国军各旅改为师制，以张声势，对各级将领给予晋级开赏和颁发勋章以资鼓励。韩光第所在第二十旅改编为安国军第24师，以功擢升为少将师长，先后归第十六、十七军指挥，佩三等大绥文虎章，二等大绥嘉禾章。是年秋，晋军从侧背进袭奉军，发生望都之战。韩光第第24师驻扎在望都东南的刘指挥庄。晋军战而不宣偷袭过来。十六、十七军渐渐后退。韩光第仅率步兵两队、手枪队10余人奉命增援未退，亦无消息，众方滋疑，既而知其支撑未退，左右两翼反一鼓而下，望都才挽回颓势。此后，韩光第攻取获鹿左臂受伤，顾仍指挥前进，其勇敢有如此者鲜矣！

1928年4月，张作霖于5月9日通电息兵返奉。韩部奉命退到滦东地区，韩光第乘马夜行山岭间，坐骑受惊坠马受伤，就医于红十字会医院，因粉碎性骨折不能复续，需取他人之骨相接，韩光第认为取诸他人“无宁取诸自己”，遂商定以胫骨一段代之。医生凿取胫骨，叮噹作响，韩光第汗珠如豆，一手却执报纸阅读，谈笑自若，在场者无不惊异。

1928年7月4日，张学良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就职时张曾表示休养生息，决不妨害统一，并将奉军以旅为单位进行整

编。韩光第所部第24师被缩编为第17旅，韩任中将旅长授一等国徽章。万福麟电请张学良调韩光第入黑龙江省。是年末东北“易帜”，实现了全国在形式上的统一。韩光第于12月19日给张学良写信，建议张学良宜不时召请各元老访问庶政得失及外面舆论、地方民情与求治方策作为参考，还建议张学良“宜亲贤远不肖”，戒除偏爱偏信偏听之虞，从而兼爱兼信兼听。针对当时雇佣军队之弊病，建议张学良以国家千百年之大计着想，“痛下决心，排除万难，毅然以行征兵制”，并提出练兵之方法，先训育军官，尤以“正人心”三字开始，还建议张学良急急选拔外交人才、军事人才。在信的最后特别提醒张学良，要报杀父之仇。报仇之方法“宜励精图治卧薪尝胆，有坚定之决心，有充分之准备，此心此志灌输入文武僚属及三省有志之士之脑中。只要后来继起之人能承接此心此志，虽经数十年数百年”，“我辈武装部属皆可告无憾无愧于天地间矣”！

1929年7月10日，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该事件的历史背景及有关情况，见拙著《梁忠甲》一文，此不赘述。

哈满线全长935公里，梁忠甲率第15旅担任此线护路任务，归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万福麟指挥。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东北军事当局调东北陆军第17旅韩光第部进驻海拉尔加强西线防御。

第17旅移防海拉尔后，韩光第以为苏军时刻窥视，终有一日冲突发生，乃补充军力，勤加训练，并颁发临阵格言以提高部队战斗素质，在治军格言中写道：“国家养兵究为何事，际此战端将启，老辈军人再贪生怕死，尚有何面目见父母兄弟妻子邻里亲友乎！来多也打，来少也打，剩一个人也打，他有5万赤俄，我有10万子弹，管教他一个敌人两个枪眼。”“能克己者始能克强敌。如其苟且忍辱，为奴隶而生，不如从容就义，为英雄而死。一夫裂眦万夫侧目。”韩光第如此勉励将士，则其所以自处可想

而知。由于韩光第治军严格，不扰民，军风纪好，颇得市民欢迎。韩光第在与妻书中说："余三十无奇功，愧为男儿身……今兹露布边疆，上马杀敌，天其假我以缘，使丈夫得遂功名志乎？"韩在信中还说："不向风尘磨剑戟，亦当情海对婵娟。吾不愿学怡红公子，吾愿作拿破仑也。""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慨自碧眼东来，黄倭西上，神州陆沉，国几不国……。此仇此恨，宁能戴天？丈夫从戎岂为家，誓欲歼此大千世界，杀不尽的一群恶獠……"由此可知其志矣！

韩光第平素注重官长教育，1929年2月驻江垣，发表官长要多看书的训令。他认为现在社会的进步一日千里，诸种学识，层出不穷。我们前几年所得学识，若用之于现在，就有不适用之觉悟，其原因就是我们不学的缘故，被进化的潮流落下。"他还不断帮助军官总结经验："情况愈危险，愈紧急，愈宜镇定"；"有事时万不要怕事，困难关头牺牲一切，便可应付一切。当机立断贵于速，切戒迟缓观望；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古人云：利人方能利己，不要常存自占便宜教他人吃亏的心理。常言说，害人如害自己一点也不假。"韩光第对一般官兵教育有方，在一般官兵须知中写道："若遇棘手之事，当从忍耐二字痛下功夫；人活百岁谁能不死。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男儿要将支手撑天空，今日天快塌了，亲爱之兄弟们呵，其速携手同登此二十世纪之风雨舞台，作一个顶天的大汉。""军纪务必尊重，百姓务必爱护。做事问得过良心，抬头对得起青天，遇着什么样狂风骤雨惊涛骇浪，也不必怕他。"以上格言，岂徒为教战教守之良规，抑亦为希圣希贤之懿训。在海拉尔期间，曾对各级官长训话，他说："我们东省是国家东北的屏幛，现在东邻受有帝国的压迫。"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又说："北地时有共产的阴谋，实在处在危险的环境，各官想一想，我们军人是否与东北这块大地同生同死，共荣共辱？……"把共产同日本帝国主义

等同起来，显然是错误的。

韩光第不但教育官兵有方，注意学习，而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和平驻防时喜读《说苑》，常常劝人浏览，遇有往上海、北平者，辄托人购书。驻防海拉尔、扎兰诺尔后，仍寄信家中嘱托：再有人来令带如下之书籍，吴稚晖《人生观》、中山《名人必读》、《三民主义读本》二三四册。韩光第在火急之时尤不忘书籍，其勤奋精神可以想见。韩光第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在给妻书中，曾留下如此精美之句，“连朝积雨困人，精神至无聊赖，分兵布阵之余暇，看看黄公三略之章，读读吕望六韬兵法，闷来时试浇几杯白兰地，兴来时高歌一曲满江红。宝剑当为各将佩，红粉应赠美人涂。”读之几乎疑为风流潇洒之书生，谁会想到是披甲执枪之勇将呢！由此可见韩光第文学修养之一斑。

韩光第到防地后，直觉事态严重，故于1929年8月10日给张学良将军再次写信，陈述利害：“东铁事变外交紧急，我东北边疆夹于野心之两大强邻，既难联俄以拒日，势必驱虎而进狼，外交上稍有不慎，军事上再准备欠周，一旦和平破裂诚恐所谓俄、日及国内野心家三大问题同时并起。”信中把苏联同沙俄划等号，足见其对苏联没有好感。韩在信中强调：武力为外交后盾，和平随武装为转移，徒言外交决不可恃，况俄人狡诈成性不顾信义，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若俄知我方无备而无战意，战事猝发恐难应付，欲求和平而和平反愈不可得。韩又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只要保得国家领土在，耗款似不成问题。东铁沿线秩序混乱，时有俄人武装便衣马兵在沿线企图扰乱破坏，如交涉延及河水封冻时而不决，汽车通行，将益猖獗，颇似河南之红枪会便衣队类发生，闻边卡来人称述俄愈横暴，时有入境抢掠杀伤之事。韩光第在信的最后表示已迭向官兵宣言，前进有路，后退无门，战胜为一时之荣，战不胜宁为玉碎而不辱为千秋后世之荣。所幸官长等皆感，愿同赴困难，如不贪生怕死畏危先逃，所

部官兵当无一人胆小退却也。钧座如无令后退，纵剩一人一卒亦决不后退一步，惟有拼此满腔热血，以赴之。家事先有预嘱早已安排，薄田百余垧，老母堪奉养。区区之身非所敢爱，耿耿此心一无所恋，不能忘怀“中华民国与我”。

韩光第8月8日又写信给万福麟，在信中除陈述边境事态之严重外，对战事准备工作，提出了中肯建议和要求。他在信中写道：“目前和平决不可恃，凡事预则立，有备无患，况俄人准备较我似先一筹，冲突发生我方一切视彼举止而应付似稍立于被动地位。闻今日飞机示威尤甚，沿站均有俄人，见我方兵不加增，若密通消息与彼而启行，险侥幸之心。间接得俄方之情报，决裂时拟先占满海后言交涉或绕袭兴安岭以击我后，虽不足为惧，亦不能不早为之备。”韩光第还建议，在小岭子宜派调必要部队筑相当工事，一则支援前方，一则掩护省城，乘机建设国防永久大计最为上策。此次如无事则已，有时，满洲里、黑河双方将同时发生，虽黑河方面早已有备，若早完成此处临时也少忙乱一些，韩光第还请求万福麟把驻博克图的傅营归还建制，尤盼早筹及高射炮、飞机、汽车等加强装备。……以上请求事关国家大计，非个人勇怯的问题。军人守土有责，他说：“知之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韩光第在信中所提这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没有得到上峰，特别是万福麟的重视，万根本不予理采，致使战事突然爆发时，中国东北地方当局事先没有充分准备而手足无措。黑龙江省边防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只是命令梁忠甲与韩光第仓促应战。梁忠甲率部在满洲里抗击苏军的声誉日高，万福麟深怕其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对梁忠甲、韩光第两旅不增援，也不补充弹药，坐视他们孤军奋战。

满洲里乃国境门户，然平坦广漠，本无可守之险，加上彼我双方实力悬殊，益加难守 。中苏关系破裂后 ，苏军迭次越境进犯，中国兵力显然不敷，8月20日，扎、满两线战事吃紧、韩光

第第17旅受命进驻扎兰诺尔，俾梁忠甲守满洲里。

扎兰诺尔位于东铁哈满线终点之第二站，为满洲里与后方联络之咽喉，距俄境拉巴该图约30华里。供应东铁的煤全在此地。韩光第接到命令后，星驰夜进，督率所部，踏勘地势，挖壕筑垒，不时晓以爱国大义激励官兵，故士卒虽备尝艰辛，却无怨言，“盖因均明瞭关系自身切己利害也”。韩光第在给同乡王以哲的信中说：“……在海拉尔共住117日，做60日工，士兵尚无怨言。到此接15旅之阵地现已40余日，无日不在工作中。”当时士兵勤苦可以想见。然韩所恃者则于部属期待决心，所谓“拼”字之精神耳。

韩光第部阵地之坚固，此为中国内争以来所未见者，及涿州市亦不能及十之一二也。工事掩蔽部外有大战壕，掩蔽部内可住宿、作饭，出掩蔽部即为战壕，足以说明边防将士守卫边疆、捍卫国土之决心。

韩光第旅仅有士卒七千余人，然苏联屯兵百万之众。论其武器，韩旅无飞机、重炮、坦克、高射炮，亦无汽车，所有武器装备皆不如人，其胜负之数本可先知，然韩光第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已决。他不时向官兵表示“个人如胆怯先跑当为大众之子，天下之子，许尔等随时枪杀，尔等如有退缩，若不执行枪决，余亦为大众及天下之子”，誓与士卒战死疆场。故全体军人皆生气勃勃、无恇怯之色，广大将士誓死守土之决心在韩的信中可以看到：“是以接防以前，士兵即自动将刺刀开刃，足证必拼，是为数年来内争之所无。我官兵此次颇有杀敌必死之决心。”

扎兰诺尔地处边塞，人烟稀少，少与百姓接触，但韩光第仍严格管理部队，不扰民，军风纪甚好。他在给王以哲的信中写道：“兄处演习，招宴乡民，联络军民感情，开东北未有之先河，欣羡曷似，惜此处无乡民未能仿行！请将民歌寄来，以备明

春演习时联欢用也。”他又说：“若不严申军纪，勤加训练，势必如野火自焚，牢水自腐，欲不下地狱岂可得乎？殷鉴之昭，正可借镜，如他山也。吾辈须防己之失，勿须责人之短。”

韩光第率师防边，初以为风云之末，正是男儿立功之机会。既守扎兰诺尔月余，苏军屡次来犯，皆受挫而归，卒不得逞，其善于用兵于此可见。而又以韩光第在此，金瓯可以无缺。

满洲里、扎兰诺尔一带，到11月中旬，气候大变，气温在摄氏零下30至40度左右，晴天也落雪花，大雪两三天一场，江河湖泊均已封固，成为一望无际的白色平原，特种兵部队畅通无阻，地势平坦开阔易攻难守。苏军趁此机会，先切断满洲里至扎兰诺尔的交通线，首先主攻扎兰诺尔。11月13日，苏军步骑炮兵和坦克兵约一万五六千人，地空协同进攻扎兰诺尔和满洲里阵地。韩光第旅长亲临前线指挥，打退苏军多次进攻，敌受重创。11月16日夜，苏联以重炮60余门、飞机20余架并坦克20车余辆、汽车等新式武器装备掩护的两师兵力，于夤夜暗袭，猛攻扎兰诺尔，一面以相当兵力包围满洲里，又以一支兵力进袭嵯岗站，以断中国军队之后援，扎满联系亦中断。驻守满洲里的梁忠甲曾派出部队去支援韩部未能成功。

苏军首先进攻韩旅第14团之1营阵地秃尾巴山及3营阵地30里小站。战事一起，极为惨烈，大炮轰鸣，敌又复围以骑兵肉搏而至。守军数支1200百人的队伍当此数万之众，而武器装备陈旧不良。于苦战之余，全数殉焉。黎明，敌复用飞机21架，每架挟弹4枚，低空俯冲向韩旅阵地投下。而韩旅又无高射炮，敌机得以猖狂。而敌炮50余门，复以弹落烟起之处为目标，同时射击，弹如雨注，血肉横飞，敌步兵又以机枪百余架向韩旅阵地扫射，韩旅官兵于枪林弹雨烟雾迷濛之中，奋力抵御，无一后退，然而战壕之内，已积尸累累。午后1时，韩旅在扎兰诺尔车站又被敌骑兵包围，团长林选青已壮烈殉国。韩光第见情势危急，一

方面派人突围赴嵯岗、海拉尔求援，一面命旅预备队一营前往助战。韩光第也率骑兵连、卫队连冲出煤窑亲往救援，与敌鏖战多时，终因伤亡过大阵地动摇。第二营郭营长率残卒70余人向煤窑退却。时韩光第左臂已受伤，车站遂被敌占领。3时许，苏军坦克、装甲汽车复由后侧冲入，以机枪掩护，骑兵、步兵继之冲锋过来，煤窑被包围，电报、电话全部被破坏，与外界失去联系。韩旅官兵誓死血战守卫国土，短兵白刃格斗，尸骸枕藉。相互撕杀至日暮，苏军见韩旅不易屈服，于是炮声始暂沉，坦克也退去。经过整日恶战，韩旅阵地已完全被炮火破坏。堑壕皆平，伤亡较重，韩旅士气旺盛，指挥若定，连夜修补阵地工事，安排治疗伤员。同时将第6团步兵一营、特兵连各一部，编为突击队，拟候嵯岗援军一到即行反击。

乱石无语，白雪铺地，寒风刺骨，笳鼓石鸣。边塞之戍卒，死者、伤者、立者、行者，困处重围，凄凉万状。然而主将振臂一呼，全军皆精神抖擞作殊死战。18日拂晓，苏军步兵及坦克、装甲汽车，复向韩部冲击。苏飞机及炮兵，则用流散弹向扎兰诺尔市街射击，并投炸弹，坦克亦驶进街内，用机枪扫射，市街火光冲天，烟尘蔽日，商民惨毙。敌坦克又转攻韩旅阵地，用机枪向散兵壕内射击。韩旅连长汤海泉，以手榴弹去炸坦克，车坚固无损。汤连长复冒弹攀登车顶，以手枪向车孔射击，中敌弹落地而亡。此时韩光第带副官长张德元在前督战，腿部又负伤，犹奋战如旧。团长张季英见势不可为，问计良策，韩光第厉声曰："誓与此土共存亡。"张德元见韩光第受伤，苦劝暂退。韩光第说："强敌在前全军将没，宁忍以身先退乎！"语未毕，而敌坦克驶入散兵壕。韩旅手枪连牺牲殆尽。韩光第腹部又受创倒地，手捂伤处，大呼消灭敌人而逝！团长张季英重伤，见旅长韩光第壮烈殉国，不忍独生，便开枪自戕！副官长张德元见此悲壮惨烈情景，怒火中烧，急抢士兵枪支弹药，向敌猛烈射击。毙敌无数，

惜弹药已尽，敌见状始敢冲上包围，张德元遂为残暴之敌砍杀之。将帅即尽，无人指挥，于是所剩之士卒突围而退。扎兰诺尔陷落，被敌占领，黎民百姓遭杀戮。

扎兰诺尔之役第17旅主帅韩光第阵亡，官兵死伤十之七八。而苏之死伤已达四千以上。中国以一旅孤军抗衡两师之众。第17旅以旧式之武器，抵挡敌重炮、飞机、坦克之包围攻击，其失败乃败于众寡悬殊，军器之优劣迥异，后援断绝，非将士无勇也。

韩光第因弹尽防破遂殉职，年仅三十有三。遗有一妻二妾。妻计氏与妾生女四，嗣出继兄之子名树声。树声与光第生前好友同乡王以哲之女成亲。

君之去矣，实为东北军失去一良将。张学良将军为之震悼，东北人士无论识与不识莫不泣下沾襟，可见韩光第事迹感人之深，张学良将军亟谋褒恤，并令收集韩光第之生平事迹刊布流传，缉成《韩旅长斗胆遗迹》一书印刷发行以彰忠烈。东三省各地均召开追悼公祭大会，并于中山陵西侧立碑以彰勋业。

韩光第殉国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拨专款修建陵园。韩的陵园建在双城县车站北10里许的地方（今双城县洗衣粉厂处）。陵园由红砖砌墙围绕，墙外栽种钻天白杨。陵园正面是红漆铁大门。进铁门就看见高大三门流檐式的牌楼。流檐脊顶覆以绿色琉璃瓦；牌楼的门楣上从左至右镌刻着分别由万福麟、蒋中正、张学良题写的匾额："万世流芳"、"为国捐躯"、"气壮山海"12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穿过牌楼就是由四根水泥柱支撑的高大的方亭。方亭宽敞明亮，亭中央之龟趺上矗立着汉白玉雕琢的高4米的丰碑。碑的正面刻有"东北军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将军墓"字样。背面是碑文。方亭外四角各立一座龟趺驮着的汉白玉雕琢带流檐的小石碑，均刻有碑文。出方亭前行数步便是两鼎，青砖砌成的香炉分列左右。过香炉几步即是墓穴，上面用白灰修筑高高的圆坟顶。圆坟座由围墙环绕。由墓正面拾级而上便是隆起的圆

坟包。上有通道可绕圆坟包一周，外有围墙护卫，围墙上也镌刻文字。圆顶坟包围墙的正面有一红漆的假门。两扇假门中央对称一对虎头，虎口叼一对铜环。虎头上镶嵌绿色琉璃瓦。假门前放有长方形石桌一个，一对石制香炉分列石桌的东西。石阶底下是坟座，坟座四周仍有围墙，墙上仍刻有各界人士题的悼词、祭文、挽联等。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将韩光第陵园拆毁，到1958年全部毁弃，建起今天的洗衣粉厂。

苏 炳 文

陈 志 新

苏炳文，字翰章又幼泉，别号铁庵。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日（1892年10月22日），生于今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大民屯镇中古城子屯一个五世同堂、上下三十余口的富户人家。家有耕地二万余亩，以业农为主。其父苏景洵为清秀才，毕业于政法学校，以教书为业，思想较开明。

苏炳文幼年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乱之苦。他两岁时，适逢甲午中日之战；8岁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3岁时，日俄战起，辽宁又被辟为战场，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家亡国破，民族灾难深重，饱经苦难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野心，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街谈巷议，无不义愤填膺。苏景洵所在学校的师生也流露出救亡图存的愿望。这些都在幼年苏炳文的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苏炳文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写道："深恨国家之衰弱，痛愤异族之侵略，欲转弱为强，雪耻报仇，非有武力不能图存，慨然抱投笔从戎之思想。

苏炳文7岁时，在家乡私塾启蒙。1903年清廷施行所谓新政，陆续在全国各省设立一所陆军小学堂。1905年10月，奉天陆军小学堂创建，苏炳文得讯欣喜若狂，决心报效，但遭到族中多数长辈的反对。封建家规森严，苏炳文阻力重重。正在这时，其父

从奉天捎信催他前往。苏炳文如获大赦，欣喜非常。家中不给路费，他便徒步两日到奉天，在其父的支持下报考了陆军小学堂，考试三次皆合格而中。1910年毕业，被保送到北京清河陆军中学继续学习，1912年从清河陆军中学毕业后，又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编在步科1期4连。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大总统。为实现当皇帝的美梦，袁世凯到处招兵买马，在北京成立中央陆军模范团，以增强自己的实力。苏炳文于1914年冬毕业，被选到袁世凯自兼团长的中央模范团，由上等兵逐级升到排连长。模范团是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培养的亲信势力。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唾骂声中毙命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皖、奉三系，苏炳文所在中央模范团为皖系所控制。军队成了各派军阀争城夺地的工具。1917年7月，北京演出张勋复辟丑剧。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组织讨逆军，苏炳文在讨伐张勋的战斗中表现勇敢，荣立战功，被擢升第5混成旅（由模范团扩编而成）第1团第2营营附、中校营长等职，驻防北京南苑。

1917年8月，皖系段祺瑞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对德宣战，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苏炳文任第9师驻海参崴第2营营长，驻俄东海滨省，担任绥芬河至海参崴的护路任务。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炳文参加了协约国在海参崴举行的盛大阅兵典礼。回国后升充团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发生，同月皖魁段祺瑞战败，通电解除"定国军"总司令职务，苏炳文为直系王怀庆收编，降为北京卫戍总司令部卫队团第1营少校营长。

1922年4月，直奉战争又起，苏炳文虽非奉系军人，但因籍隶东北而遭疑忌，改任热绥巡阅使署中校参谋，苏炳文愤而辞职，到江南游历名山大川，博采各地风土民情，以广见闻。1923年9月，行到福州，受到旧友刘春台的挽留，充任福建陆军第1军第3旅上校参谋长兼第1团团长等职。1924年春，闽境内乱发

生，爆发皖直两系为争夺上海的江浙之战。盘踞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率兵入浙。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通电支持浙卢，分兵6路南下。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第2次直奉战争发生。苏炳文几年来目睹了军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争权夺势，相互兼并的罪恶行径，不愿再陷入内战漩涡，辞去军职北返，隐居不仕。直奉战后，奉系将领郭松龄酝酿起兵反奉，邀请正在犹豫徬徨中的苏炳文出任东北陆军第12旅及第6旅上校参谋长、步兵第85团团长。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通电起兵反奉，要张作霖息争下野，将政权交给张学良；攻击杨宇霆，捕杀姜登选，举兵东进，任苏炳文为第2旅参谋长。郭松龄旋将所部改编为5个军，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以林长民为幕僚长，任命苏炳文为第1军少将参谋长，奉命率部直插营口，正准备渡过辽河，迂回奉天，一举攻占张作霖的老巢。因遭到日本的干涉而受阻。12月24日，郭松龄战败出逃，结果被吴俊升骑兵所捕杀。郭死后，张作霖不咎既往，故苏炳文未受到株连，其所部为张学良收编，乃任第6旅上校参谋长。

1926年春，苏炳文随张学良入关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报助郭反奉的一箭之仇，兵抵滦河受阻不得前进。苏炳文建议张学良出兵迁安偷渡滦河，然后挺进龙山，猛击冯军侧背。张学良深以为然，特命第6旅依计而行，结果收到奇效。苏炳文也因此得张学良赏识。同年5月，苏炳文被调到第6旅85团任上校团长。

同年6月28日，在英美帝国主义撮合下，张作霖与吴佩孚正式会晤于北京中南海，均表示弃嫌修好，直奉军阀取得暂时妥协，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北伐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1927年2月，张作霖令张学良率奉军主力下河南，从而揭开了奉军与直军、奉军与国民革命军战争的序幕。3月，奉军第10军在河南郑州被地方杂牌军所围困。张学良急调第11军驰援。苏炳文率85团为先锋，东克开封，南进鄢陵，协同友军解了郑州之围。接着奉军与

北伐军在上蔡北部的西洪桥发生激战，苏炳文部损失较小，随即擢升为第6旅少将旅长。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将奉军各旅改为师制，以张声势。对各将领晋级升赏颁发勋章以资鼓励。第6旅改为第17师，刘伟任师长，后因刘伟患病师长出缺，苏炳文继任师长。同年8月中旬，晋军开始进攻奉军，在大同首先将张作霖派往绥远的军事校阅委员长于珍扣留，并遣傅作义师潜袭河北、占领涿州城，牵制了奉军机动兵力，影响作战能力。奉军调来重兵围攻3个多月，前后进攻9次，均未奏效。苏炳文曾率部参加攻城作战。

1928年7月4日，张学良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旋以万福麟为黑龙江省军务督办，苏炳文被派往黑龙江省任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国防处长。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苏炳文任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兼国防处处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苏炳文移驻齐齐哈尔。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苏军不断越境侵扰。8月24日，苏炳文以黑龙江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身分到满洲里，对守军第15旅官兵进行慰问，并视察阵地。1930年3月8日，梁忠甲因煤气中毒而猝死。万福麟任命苏炳文继梁忠甲任第15旅中将旅长兼海拉尔镇守使、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军司令，移防海拉尔。海满地区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时，曾一度被苏军占领，遭到严重破坏，各业凋敝，百业待举。第15旅官兵多数当过苏军俘虏，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因而苏炳文到职后，在整军经武，恢复地方生产上煞费苦心。苏炳文极力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对各族民众则善加安抚，鼓励努力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也积极恢复睦邻友好关系，开展互利贸易，经过一段苦心经营，海满地区出现了安定复苏的局面。同年10月，苏炳文调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中东路哈满护路军司令、东北军步兵第2旅中将旅长、市政筹备处处长。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日寇很快侵占了辽、吉两省大部分地区，接着又向黑龙江省进犯。困难当头，苏炳文忧心如焚，他以负疚的心情，忆起过去走过的道路，痛恨军阀混战，致使国破家亡。现在是到了以“武力图存”的时候了，保疆守土匹夫有责，何况受过国家栽培有血气的军人，他奋笔疾书：“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相侯。”随后，他毅然将全家20余口人送往北平，集中全力谋划抗日救国。

黑龙江省自从万福麟进关滞留北平而群龙无首，在外倭入侵时一片混乱。省督办公署参谋长谢珂急电苏炳文派兵赴省垣维持局面。同时电呈张学良、万福麟，建议从马占山、苏炳文二人中选派一人到省城支撑危局。10月5日，苏炳文率步兵第4团，驰赴省城，分兵驻扎在各重要部位，安抚商民，维持社会治安，静候上司部署。10月16日，洮南镇守使、汉奸张海鹏，在日寇指使下，妄图一举占领黑龙江省垣。同月18日，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长官，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就资历和才干，苏炳文均在马占山之上。当时有人担心苏炳文不服从马占山节制，影响抗日大局，劝苏炳文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服从马占山的指挥，共赴困难。苏炳文则诚恳地表示：“值此国破家亡之际，身为军人，只有团结合作，共御倭寇而已。敌如来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于倭寇绝对抵抗到底。”虽然平素苏炳文对马占山的印象并不好，但困难日亟之时，能顾全大局，把带来的步兵团留在省垣，嘱咐团长要听从马代主席的指挥。复又将驻满洲里骑兵第二旅程志远部调到昂昂溪待命，安排就绪才返回海拉尔防地。

江桥战役爆发后，苏炳文闻变，立即从仅有的两团人中抽调吴德林团参加江桥抗战。另一团驻防海满地区和维护哈满交通，以保证抗战的需要。江桥抗战失利后，少数白俄同日军勾结，乘

机作乱，骚扰呼伦贝尔地区，苏炳文团结蒙族，派兵弹压，在牙克石等地，击毙匪首拉格捷也夫和爱保夫，端了白匪老巢。当时报纸曾赞誉苏炳文与其部下“怀卧薪尝胆之志”。日寇于11月19日，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关东军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邀请苏炳文到齐齐哈尔一晤，苏炳文拒之。

1932年1月，张景惠任伪黑龙江省主席。2月，马占山一度与日寇妥协，黑龙江省挂上了伪满国旗，海满地区也不例外。但日伪军并未进驻海满，当时社会舆论对苏炳文的态度褒贬不一，日伪对苏炳文也莫测虚实。于是，日伪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试探和拉拢。

1932年3月9日，伪“建国大典”在长春举行，事前日伪曾邀请苏炳文前往出席，为彼所拒。3月中旬，伪军政部次长一行10余人，以检阅部队为名到海满地区活动，实际是考察海满地区内情，策划瓦解海满地区的军队。伪黑龙江省协和会也派人到海满一带拉拢地方各界人士入会。他们的目的是以宣传“中日共存共荣”和实施“王道乐土”来掩盖其侵略行径，企图用欺骗手段来缓和人民对日伪的仇恨情绪。

4月1日，担任伪职40天的马占山幡然醒悟，率卫队悄然脱险。7日抵黑河，举兵反正，通电继续抗日，并着手组织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电约苏炳文起兵，共图救国大业。苏炳文犹豫再三，仍取观望态度，按兵未动。日本以为苏炳文心在伪“满洲国”，关东军司令部便派宫崎少佐窜到海拉尔访问苏炳文，许以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伪“满洲国”军政部长、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三职任选其一，以资“借重”。苏炳文对日伪早有戒心，识破敌人是用调虎离山之计，答以“本人才力威望不足，难以胜任”，婉言拒绝。之后，黑龙江伪省长韩云阶、伪警备司令程志远，也数次派人到海拉尔窥探苏炳文对日伪的虚实及驻军第1、第2旅的内部状况。苏炳文不卑不亢，应酬得体。他们还邀请苏

炳文主持黑龙江省军政和到省城设事，均被苏炳文托词拒绝。

日伪对苏炳文益加疑惧，认为苏已怀有敌意，遂决定停发苏部军饷，并要派少量兵力进驻海满监视苏炳文的活动。6月，日寇以保护国境安全为名，采取强硬手段，要苏允许国境警察部队进入海满地区，遭到苏炳文的严词拒绝。经日寇再三交涉，苏炳文仍不答应。日寇最后竟威胁说："如不允许，即系怀有敌意，日军将派一旅团护送前往。"苏炳文感到问题的严重。海满地区处在祖国东北边陲，自然条件恶劣，民情异常复杂。地势虽利于守，但兵力单薄，一旦敌人越过兴安岭要隘，则无险可守。如果僵持下去，日寇会借口护送国境警察队而将1个旅团侵入海满，必成大患。伪国境警察队不过百二十人，左右不了局势，海满地区仍在自己军队控制之下，必要时还可随时消灭之。苏炳文本"小不忍则乱大谋"之计，提出国境警察队可以派，但要搭乘客车，不得另开兵车；到满洲里后"国防务须受当地驻军部队长官节制，地方治安仍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维持"。因日寇仍想以政治手段诱使苏炳文就范，故未再提苛刻要求。于是，由中、日、朝三种人混合组成的国境警察队大部进驻了满洲里，少部分驻在海拉尔。苏炳文此举颇引起海满军民的不满，指责苏炳文引狼入室，丧失气节。一些下级军官声言要拉出去抗日，与苏炳文决裂。7月间，国境警察队长秦树声赴伪京长春汇报，被驻扎兰诺屯步兵第1旅部分爱国官兵设计秘密处死，并自动沿嫩江西岸一带严密布防。海拉尔行政公署内部人员也不了解苏炳文之意，每见公文上伪"大同"年号，便感到是耻辱，直接向秘书长说："不能干了，这不成亡国奴了！"有位秘书还刻了"我非亡国奴"的图章以示抗议。也有人用历史上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作榜样来讽谕苏炳文。

军民的爱国热忱给予苏炳文很大鼓舞。为了抗日大计，他只好忍辱负重，一面与敌虚与委蛇（派秘书至满洲里与日本领事山

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等“秘密”交往），一面积极备战。苏炳文将130余名青年学生编成学生连。又秘密派人赴各地招募新兵，成立步兵第9团，在博克图兵营秘密创办兵工厂。此外，苏炳文还储存了1个月的粮食，扣留了从哈尔滨开来的数百辆货车和机车。并派人与朴炳珊、李海青、张竞渡等抗日队伍建立联系，潜入敌区侦察军情等等。

日寇自走卒秦树声“失踪”后，对苏炳文更加忌恨。千方百计削其兵权，以便把海满大权抓到日本人手中。6月间，日伪当局侦知苏炳文在积极扩充军备后，借口张殿九年老无能，军备废驰，撤销其哈满护路军副司令兼省陆军步兵第1旅旅长职，由汉奸冯广有接替。张部爱国官兵对日伪采取的釜底抽薪的恶计，极为愤慨，坚持不交军权。张殿九在部下爱国热情的鼓舞下，赴海拉尔与苏炳文相商，苏炳文明确表示：“唇亡则齿寒，大敌当前，岂能坐以待毙，惟有奋起抵抗，力尽卫国守土之天职。”遂决定调驻免渡河站之第6团，进驻富拉尔基，以阻止冯广有来接任。8月26日，苏炳文以协助安达站“剿匪”为名，调第8团南下，军用列车行至富拉尔基车站，以水急为由停止前进。第6团则星夜在嫩江西岸布防，实行严格检查，防止汉奸混入。当地群众、学生主动帮助军队防奸防特。9月中旬，开始沿江构筑防御工事，以应付昂昂溪方面来犯之敌。嫩江形势紧张起来。

随着事态的急剧变化，日伪也加紧施展威胁利诱之手段，多次派人到海拉尔，劝说苏炳文放弃敌对态度，到伪省城议事。苏炳文称病不往。最后韩云阶决定要出正在被监押的谢珂去做苏炳文的工作。谢珂将计就计，借机脱离虎口来到海拉尔。谢珂与苏炳文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友谊甚笃。但数月来的复杂变化，使两位老友互存戒心。他们先谈了分别后的情况，然后谢珂试探地说：“韩省长让我来，传达于你，张殿九因年老无能，必须撤掉，以整肃纪律。你的位置保持不动……。”苏炳文未容谢珂将

话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并坚定地表示："张旅长不能动，如果鸿广有强行前来接任旅长职位，难免发生意外！"这话使谢珂心中有了底。接着他们各谈了肺腑之言，互相信任，研究对策。决定由谢珂函告韩云阶，请收回成命，维持现状。

9月23日，苏炳文召集校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苏炳文在会上详细揭穿了日伪图谋海满地区的诡计，并表明他自己的抗日决心和态度。接着提出了行动计划 。会上群情激愤 ，一致赞成抗日。遂即讨论，决定以下事项：①以士兵情绪不安为由，立即由谢珂致电韩云阶，要求火速派人送款；②组织名称，拟定为"东北民众救国军"，以便向各地广为号召；③一致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司令，谢珂为总参谋长 。总部设有参谋 、副官、秘书、军务、军需、军医、军法、财政八处；④令各县编练地方部队，备补充之用；⑤预定10月1日，总、副司令通电就职；⑥由苏炳文负责筹备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部，一切暂做内定，密而不宣。

伪省长韩云阶接到谢珂电报后，连夜派伪黑龙江省司令官公署参谋处长金奎璧，携8月份欠饷50万元伪币到海拉尔。伪省参议陈鸿猷借观察为名也随之同行。金、陈二人带了全部重要物品而来，决心不返。苏炳文当即任金奎璧为总部副参谋长，陈鸿猷为总部参谋。

日伪当局眼见他们所派的伪省大员一个接着一个去而不返，加之海满起义的风传，遂决定由日方派人亲自出马，探寻动向。9月25日，林义秀少佐突然乘军用飞机到达海拉尔，苏炳文佯称卧病不起，谎说病愈后愿赴省城，亦愿辞职休养，但须稍候一些时日，以便部下安心"，并写"志愿书"为据。林义秀满意地回到了齐齐哈尔。苏炳文此举为海满起义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1932年七八月间，吉、黑两省连降暴雨，江河泛滥成灾，再加日寇烧杀抢掠，造成广大城乡"十室九空，路多饿殍"。人民

群众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只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重建家园，才是唯一的出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呼声遍及吉、黑两省城乡，爱国群众纷纷揭竿而起，但是黑龙江省抗日斗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马占山的第二次抗日基本失败。8月间又传闻马占山被日军击毙，零星小股部队多为日军围歼。以上种种，加之苏炳文部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促使苏炳文决意举旗抗日。苏炳文对此次义举抱有很大希望：①以海满揭旗抗日，希望使国联“明了日军侵略东北的真相以及伪造东北民意，强迫成立伪满洲国的情形，对于日本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行为，能有正义的议决案加以制裁”；②希望海满抗日壮举能使国民党政府借此“对日本进行正式交涉，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早日恢复东北原状”；③希望张学良借此机会率东北军出关，同坚持在吉、黑两省的部队成犄角之势，协同作战，痛击日军，收复失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苏炳文后来所说，所有希望“都成泡影”。

1932年9月26日，苏炳文在海拉尔秘密部署举义计划。9月27日晨，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各站护路军佩戴“铁血救国”的臂章，同时举义，占领车站，禁止列车行驶，切断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扯下伪满洲国旗，踩在脚下，让中国旗帜迎风飘扬。同日早晨，满洲里军政当局按苏炳文的部署，扣押了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书记生福田。同时还派两营士兵包围了国境警察队，除负隅顽抗被击毙30余人外，其余均举白旗投降。

苏炳文根据战时国际法规定，对逮捕拘押的日伪人员实行区别对待。各地日侨及外交人员、特务机关职员等属非战斗人员，送交满洲里日本领事馆收容，负责照料。国境警察队被缴械后属俘虏，交特区警察机关暂行负责管理。苏炳文的这些举措受到国际舆论的称赞，他们认为“行动迅速，指挥镇定，有良好的组织，而未涉及西人尤堪称誉”。

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举行“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及誓师大会。会上军民纷纷表示决心，坚持抗战，收复国土，群情振奋，气壮山河。许多中国记者参加了大会。中东路苏联驻海拉尔站站长、职员等也到会祝贺。苏炳文在会上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职，发表通电，举兵反正。宣布以张殿九为副司令，谢珂、金奎璧为总、副参谋长，张玉挺为前敌总指挥。“东北民众救国军”有两旅十个团共约五千人。由张玉挺、吴德林分别任第1和第2旅旅长。会议还以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苏炳文、副司令张殿九、参谋长谢珂等的名义，通电全国，控诉日寇残暴罪行，表达了军民抗日决心。电称“……文等不敏热血满腔，一息尚存，敢忘奋斗？……爰本东北三千万民众及各将领之拥戴，于10月1日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副司令职，并联络奉、吉、黑各义勇军，及被迫附逆情非得已之各军将士，克日会师，共清妖孽。就民心所趋向，以正义为依归。博国际之同情，维公约于不坠。务使我东北之千万民众之真正心理，大白于寰球，消灭伪国，铲除汉奸，揭破暴寇鬼蜮之伎俩，恢复中国固有之土地。……”誓师大会当天，从富拉尔基到满洲里，所有部队也都举行了誓师大会。

救国军成立大会后，苏文炳立即指挥部队向省城齐齐哈尔进攻。日寇闻报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就展开“和平攻势”妄图瓦解之，但未奏效。进而抢先于10月3日拂晓出动骑兵2千多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扼守海拉尔到满洲里地区之富拉尔基进攻，遭到救国军堵击部队的重创，未能过江。5日，敌少数部队企图渡江也被击溃。6日拂晓，敌军分乘30余只橡皮船强行渡江，遭到救国军猛烈射击，击沉敌船，而敌人凶焰不减，增兵到500多人，分批蜂拥强渡。救国军6团第3营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奋勇血战达4小时之久，终因众寡悬殊，退守富拉尔基。苏炳文急调碾子山步2旅1团驰援。高团率两个营赶到投入战斗，

给骄横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始稍后退。翌日，敌兵千余人，疯狂扑向救国军阵地。高团长也将预备队投入战斗，救国军士气大振，英勇反击，敌我双方伤亡很重。10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一，奉军部命令抽第14师团编成中山支队，增援海满地区。又调来参加制造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残暴异常的14师团长松木亘亮为伪黑龙江省的军事总指挥，全力对付东北民众救国军。

日本中山支队从齐齐哈尔西南桦本港偷渡嫩江，8日与救国军高团发生激战。救国军官兵前仆后继，血战两昼夜。高团长以下营、连、排长伤亡十几人，已失去指挥能力，士兵也伤亡四万余人，有全团覆灭之危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救国军高团第3营营长挺身而出，决定后撤到腰库勒村休整。9日，中山支队乘虚占领富拉尔基。救国军与日寇沿富拉尔基西北腰库勒一带对峙。是役后，苏炳文率领司令部主要成员张殿九、谢珂亲临前线，慰劳奖励将士，鼓舞士气。

自10月10日后，敌我每日均有局部冲突。日寇竟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弹，使前线救国军半数受伤。为此苏炳文于13日致电国联，控诉日寇之暴行。14日，苏炳文与前敌总指挥部在朱家坎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冬季嫩江封冻的特点，制定阻击日寇铁甲列车进攻的防御计划。还决定会同马占山等部，利用有利天时，东西分进，合击日军，收复省城。10月20日，救国军配合马占山等各部会攻齐齐哈尔。21日晨，救国军6团、1团、4团同时从三面向富拉尔基展开强攻。日寇猝不及防，死伤无数，向后溃逃。21日晚，又乘敌不备，突然袭击，千余官兵杀入敌阵，在黑岗子与敌激战3小时，将敌诱出，全部消灭。冲进富拉尔基市街的东北民众救国军与日军展开巷战。守城日军拚命抵抗。日寇被打得三易指挥官。指挥官原加寿雄少佐右腋中弹，伤势甚重，由斋藤实代理总指挥，又腹部中弹当场毙命；又由中岛花代替指挥，也被

击毙。救国军遂光复富拉尔基，这是北满抗日战史上的光辉篇章。

22日，日寇急调步、骑、炮兵团等增援富拉尔基一线，敌仗人多势众，且武器精良，而救国军经过数天浴血奋战，未得休整，人困马乏，遂于当日夜退出富拉尔基。同日，苏炳文会同马占山、李杜等致电国联，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予以制裁，并极力反对国际共管东北之任何企图。10月24日午后，民众救国军再夺富拉尔基，守城伪军陷于重围，急向日军求援。敌我双方在争夺富拉尔基战斗中，几次易手，得而复失，展开激烈拉锯战。

10月27日，马占山部攻打省城齐齐哈尔，苏炳文部遮断齐克路。同日苏炳文在扎兰屯以东，土尔池哈、碾子山等地设下防线，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会议后，广大爱国官兵英勇顽强，坚持战斗，不断重创敌人，于10月28日又夺回富拉尔基。31日，苏炳文部向齐齐哈尔移动，有500人进至齐齐哈尔城外。

日寇在战场上，屡遭东北民众救国军的严重打击，损兵折将，伤亡很大。接连不断地往富拉尔基抽调兵力，已打乱了他们的侵略计划，而且还需大量兵力才能改变黑龙江的局势。鉴于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认为，继续抽调兵力镇压海满民众救国军是困难的；日寇错误认为苏炳文拘押大量日侨未杀，有和谈的可能。北满即将进入寒冬季节，对日本作战不利，所以提出“疏通苏炳文”，“以救出日侨为着眼点”，“暂时避免武力解决”，“努力凭借政治工作达到目的”，于是，日寇动员日伪大员，对苏炳文展开和平攻势。

10月15日，日寇亲自出马，因无人敢去海拉尔谈判，就用飞机向海拉尔投通信筒，散发他们写给苏炳文的“求和”信。16日关东军司令部致电苏炳文称：“本军始终不渝地期待您恢复原来的方针，忠诚满洲国，迅速地释放日本侨民。关于和平解决后，您的荣誉，敝军负责传达给执政，并保证得到重任，若失掉和平

解决的机会，又危及日本侨民的生命，最后只有和阁下干戈相见。”10月27日，伪满洲国顾问板垣少将亲飞齐齐哈尔，进一步策划对苏炳文的和平攻势。10月30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的宫崎飞赴海拉尔上空投信，其内容是：①能保护日本侨民之安全，实为感谢；②此次事件系误解所致；③苏炳文之意已知。日寇阴谋散布苏炳文对自己有妥协之意来分化东北民众救国军，涣散斗志，诱骗苏炳文投降。

11月9日，马占山部在兴安岭与苏炳文部连成一片。但马占山在围攻海拉尔的战役中失利，邓文、朴炳珊、李海青等部也在作战中受挫。民众救国军对驻守齐齐哈尔的日寇的威胁已解，日军便全力来对付苏炳文。11月13日，日寇又唆使汉奸出马，全面展开诱降攻势。傀儡溥仪也亲自出马致函苏炳文，许以高官厚禄，劝其归顺。苏炳文不为金钱利禄所动，都一一予以拒绝。日寇无奈又使出邀请苏炳文谈判的伎俩，并请苏联从中斡旋。苏炳文对日寇的卑劣行径，极为蔑视，下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决心，拒绝与日本和谈。11月14日，苏炳文在国内报刊上把日伪大员的所有电文公诸于世，揭露敌人阴谋诡计。郑重声明“我方决无对日言和之意，请速向中外宣传，庶免误会”，声明中还揭穿了日寇制造伪满洲国的黑幕，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公正舆论。

日寇展开的和平攻势一无所获，只好通过苏联领事从中转圜，请求苏炳文释放被扣押的人员及日侨。苏炳文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依据战时国际公法，同意将日侨分两批交给苏联，第1批妇女儿童及非战斗人员；第2批参战人员及伪满官员；有军事间谍嫌疑的暂不释放。其接交手续由日、苏双方领事直接办理。对日侨财产能带走者准其带走，不能带走者，登记造册，交由地方公安机关保存。

苏炳文不为日寇的利禄所动，不为日寇的胁迫所屈。敌人黔

驴技穷，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日本关东军与日本陆相、参谋本部在东京达成协议，决定增兵东北，以武力解决东北民众救国军。11月11日，关东军武藤信一就发布424和425两项命令，称："嫩江两岸地区苏炳文、张殿久等指挥的'背叛军'约五六千人在齐齐哈尔对岸及东支铁道沿线各地构筑阵地，依然持抗日反满的态度……。务期在本月下旬对上述敌人，在兴安岭以东地区一举歼灭。"关东军参谋长小矶与板垣等频繁飞往齐齐哈尔召集军事会议，策划调数倍于东北民众救国军的兵力，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仅富拉尔基一地到11月中旬就集中了两万多敌军。

面对日伪大军压境，苏炳文于11月17日，发表通电，坚定地表示："我军正严阵以待，虽余一兵一卒也与之周旋到底！"11月19日，日寇以第14师团为主力，以精锐冈原支队服部骑兵旅团为先锋，配以装甲车、坦克车、飞机等向嫩江两岸民众救国军阵地猛扑过来。先以大炮轰击，继之飞机轮番轰炸。然后步骑兵迭次发起冲锋。苏炳文指挥救国军奋起迎敌，连续鏖战4昼夜。为保存实力，苏炳文令前线救国军放弃阵地，撤到朱家坎第2道防线。然而敌人的骑兵及装甲车又绕过江面，跟踪而至，对朱家坎阵地包抄起来。到11月22日，敌步、骑、炮兵近3万人向朱家坎阵地发起总攻。在苏炳文等人的爱国热情鼓舞下，守军步兵第1、第4团官兵浴血厮杀，虽抱定誓死杀敌决心，但敌陆空协同作战，炮火异常猛烈，民众救国军伤亡600余人，最后不支，撤到碾子山第3道防线。苏炳文急电南京请求援助。电称："……满海穷荒，军实堪虞，接济不继，饷械两亏。地方捐助，筋疲力穷，……前途瞻顾，泣不成声，存亡之机，千钧一发，……万祈激励邦人，速筹救济，借义师饷源，无虞中断，救国工作，得早完成，东北民众深切感戴。"11月22日，苏炳文会同马占山、李杜等致电国联，揭露日军的残暴，要求国联加以制裁，并抗议共管我国

东北的企图。郑重声明："东北民众对于暴日只有抵抗，决不屈服，除非杀尽我三千万人民，万不许其傀儡组织的存在，亦不承认任何非法权益的要求，更不能抛弃主权，造成所谓共管局面。……政府纵不能以武力收复失地，而人民则精诚团结，树立坚定不移之意志，誓将日军驱逐出境外，还我大好山河，不达目的绝不终止！"后来苏炳文还写了8章38节日军暴行报告书，提交国联，希望国联能对日本侵略者加以制裁。但蒋介石的回电却是说了些"坚贞奋斗，为国争光，殊堪嘉许"一类官样词藻，竟无一弹一饷之接济。

11月29日，苏炳文、马占山在扎兰屯站召开会议。12月1日，日寇增兵北满，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一调其第8师团、第14师团、平贺旅团、服部支队、骑兵第4旅团，以及蒙伪军、黑龙江省伪军等3万多人，向民众救国军大规模"围剿"，拟乘严寒速战速决。12月2日，黑省西部战况激烈，苏炳文与诸将领亲临前线，率官兵誓死抵抗。马占山亦到兴安岭指挥军事。尽管救国军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怎奈势力单薄，又乏后援，屡战不支，扎兰屯、碾子山相继失陷；兴安岭要隘也被敌人突破，海满地区门户洞开。苏炳文见大势已去，遂将海拉尔地方治安工作交与蒙族都统凌升、福松亭维持，又将不甘屈服于日伪统治的铁路员工和特、路两警官佐眷属及群众等用火车送到满洲里。一切安排就绪，于3日拂晓将总司令部迁到满洲里，博克图以西兵力集中满洲里，准备进入苏联境内。行前，苏炳文致电张学良，报告战事。电称："……已弹尽粮绝，敌军节节而进，我军势难立足，为避免地方糜烂，减少人员损失，迫不得已，拟即饮痛退入苏联、丧师失地，负罪良多，俟归国门，听候惩处……"此刻海满地区的一些爱国官吏、士绅及铁路员工纷纷要求随同苏炳文入苏境，表示宁愿颠沛流离关内，也不留在东北当亡国奴。苏炳文同苏联领事会晤，得到苏方允许后，于12月4

日带领民众救国军官兵、眷属等四千余人，分批乘火车，有秩序地退入苏联境内。苏炳文同各将领致电全国各界："……早知地处边荒，兵单力薄，难操必胜之券，徒以倭寇假借我民意，淆惑世界观听，不得不仗义声讨，用彰我东北真正民意……。自海满义举以来，黑省义军，响应四起，而我前方将士，血战肉搏，屡挫凶锋……。我兵力虽甚单薄，然前仆后继，奋不顾身，莫不以一当百，忠勇倍增。天不佑华，我已弹尽粮绝，寇竟有增无已，复以飞机多架，炸毁我后方铁道，断绝交通，……将士伤亡过半，实力已难支撑。退入苏境实为不得已。至于报国初衷，誓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苏炳文在海满的抗日壮举，黄炎培先生曾有诗赞曰："桓桓苏将军，纵败亦堪豪。"代表了全国人民对苏炳文的海满抗日义举的由衷钦佩。

7日，马占山亦进入苏联国境，8日，拟取道海参崴回国。9日，苏炳文在莫斯科发表《泣告国人书》。同时，苏联政府准许苏炳文率全部军官赴欧。10日，日本驻苏联代理大使天羽以"避免作反日宣传，妨害'满洲国'治安"为由，要求苏联将苏炳文、马占山等人交由日本军事当局看管。11日，苏联外交委员会，发表拒绝日本要求引渡苏炳文等人的要求。12日，中、苏宣布即日恢复邦交。20日，苏炳文一行抵达收容所在地托木斯克。苏方发言人加拉罕以苏炳文部在苏联困于给养，请中国政府接济。

苏炳文部在路经苏联各车站时，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挥手致意，高呼："欢迎伟大的战士"、"欢迎民族英雄"。车到赤塔，苏联远东军参谋长还到车站欢迎并致以亲切慰问。伊尔库茨克的苏联友人兴奋地告知苏炳文关于正式恢复中苏外交关系的消息。

1933年1月，日寇攻陷榆关。1月10日，丁超、李杜所部亦退入苏联。15日，南京政府汇款接济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

杜各部队。28日，日寇在榆关设总指挥部，侵略矛头指向热河。30日，苏炳文、马占山等发表《泣告国人书》呼吁国人“一致对外”，并表示“尚承鉴及愚诚……自当统率军士，驰返边疆，杀敌之愿，自信如前，马革裹尸，幸申素志”。3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确定第4次剿共计划。2月17日，经当时中苏两国政府协商安排，1004名妇女儿童及其他群众于1933年2月17日离开托木斯克，途经海参崴回国。在塘沽、天津、北京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和慰问。赞扬海满人民“赤心爱国”。2月23日，东北民众救国军官兵2500多名，离托木斯克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新疆，备受各界人民及少数民族代表的欢迎。官兵以能生还祖国，受到欢迎，欣喜若狂，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遣送民众救国军回国时，苏炳文曾声明，表示随部队一起行动。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复电说：“高级将领不能经过新疆，究竟何道回国，俟与苏联政府交涉决定。”3月15日，苏炳文和马占山的眷属以及一部分部属离苏途经海参崴归国。4月10日，张学良携眷出洋“考察”。4月14日，苏炳文与马占山等高级将领20余人离开托木斯克，16日抵达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等到车站欢迎，大使面告苏炳文说：“因新疆金树仁主席要求所有高级将领不得进入新疆，……决定你们高级将领由欧洲回国。”苏炳文气愤军阀当道，抗日救国困难重重。4月26日，苏炳文一行经波兰抵达柏林，中国驻法公使，中国留学生及侨胞200余人到车站迎接。留学生踊跃来访，并引导参观。翌日柏林各报登载“欢迎中国反侵略的民族英雄”的文章和报告。留学生发起集资活动，将特制的手枪赠送给苏炳文等留念。5月8日，应张学良电邀，苏炳文同马占山、李杜经瑞士会见张学良于罗马。张学良盛赞他们抗日之举，鼓励他们归国后不要忘记国耻，继续奋斗，为国家和民族争光。5月12日，苏炳文等一行乘轮穿越苏伊士运河入红海，经印度洋返国。沿途停泊，备受爱国侨胞的欢迎。在

孟买有千余名侨胞到码头欢迎，为苏炳文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在新加坡有四千侨胞到码头欢迎，赠送食品、香烟等，欲赠金20万元，苏、马二人婉辞谢绝。船过香港，万人等候欢迎。苏炳文目睹国外侨胞高涨的爱国热情，深受感动。6月3日，苏炳文、马占山等一行先期到达上海。数以万计的群众，手执彩旗，在黄埔码头迎候。6月，南京人民欢迎苏马二人的盛况更为空前。国民党各院部及各民众团体代表、青年学生拥到车站迎接。苏炳文感慨万端，当即挥毫写道："旌旗光拥万夫营，胡骑萧萧彻夜鸣。御扶还期酬素志，安边未忍负苍生。战云过眼空千里，棋劫伤心又一枰。勒马西山高处望，雄关何处是长城。"这诗充分表达了他渴望重返沙场的壮志。苏炳文还发表谈话，谓当本初衷，努力收复失地。被国人誉为民族英雄 。6月22日 ，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议，任苏炳文、马占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0日，苏炳文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不久，蒋介石电召苏炳文、马占山到南昌晤谈。蒋介石勉励他们几句后，马上冷淡地说："《塘沽协定》成立，华北战争已经结束 ，你们两个不必回北方 ，别生枝节，将来在中央服务，有所借重。"6月30日明令发表苏炳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并嘱苏炳文留居南方。

苏炳文寓居苏州，在南方赋闲起来。同年在《北风》杂志第4期发表抒怀七绝二首，诗曰："此身负尽兴亡责，失地未收何以家？为问吴门今夜月，可能分照到龙沙 。""国破家亡哀无已，翘首平津祸又贻，最是愁人昨夜梦，督师夺得嫩江回！"深以无路请缨抗战为憾。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苏炳文以为报国有期，多次请缨奔赴前线杀敌报国。但国民党政府不理不问。南京沦陷后，苏炳文随同国民政府迁居重庆，就任上将参议官。1938年8月，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第3团主任委员，奉命巡视鄂、赣、湘、桂等省部队的军风纪。1940年初，

巡察团被裁撤，苏炳文又退隐重庆。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谈判。1946年1月，政协在重庆开幕。在此期间，苏炳文同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相往还。国民党当局以其"思想异动，不满现状"为由，迫其退役。这时苏炳文已失去对国民党的信任，只身返回东北新民故里，以筹办工厂为业。

苏炳文投身抗日后，留在东北的产业，被日伪以"逆产"没收。送到北平的眷属也受到日伪的迫害，不得不隐姓埋名分居各处。其父忧愤而死，老母只好入道德会，被收养在安老院。长子虽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但因贫病交加，与妻子先后死于北平。次子和长女生活也受到颠沛和磨难。

194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民，苏炳文看到中国人民的希望，与解放军相处甚好。而国民党却大造谣言，胡说苏炳文被俘，已解到哈尔滨等等。3月，解放军暂时撤离，苏炳文留在新民安全无恙，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时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邀请苏炳文赴沈阳面谈，并电请国民党政府委苏炳文为东北剿共总司令部总参议。锦州解放之际，苏炳文同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策动部队起义，受到解放军首长的接见。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苏炳文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并在起义将官招待所学习数月。随后住北平奉养老母。1950年撰写自传一文。195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苏宅探望。后苏炳文应周恩来之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政协委员。1954年，又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同年12月受周恩来总理的任命为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选举为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推荐为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他还是民革黑龙江省主任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属特邀人士，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1957年苏炳文被错划为右派后，调到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任参事。1975年5月22日，病逝于黑龙江省人民医院，终

年83岁。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苏炳文错划右派平反，高度评价了他英勇抗日的爱国义举，肯定了他在解放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的贡献。

韩家麟

马占山的义子韩家麟

马玉文

1914年，我父亲马占山在吴俊升部中央骑兵第二旅第三团任少校连长，当时我家住在吉林省怀德县城。记得那年春节后，大约是正月初九，韩家麟第一次来到我家，给我父亲母亲磕头认干爹干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随我父亲。那时韩家麟年小身单，穿在身上的军装显得很肥大。父亲还让军需、文书教他学习，以后凡是有学习的机会都教他参加。

1914年至1930年韩家麟到沈阳东北军事研究班就读。这十六年间，他由一名侍从兵升任为中校副官，同我们家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我家的事主要由他照顾。一般情况下，父亲每次外出都由他留守，经常到我家同我母亲商量家事。我哥哥在外面惹了事或逃学，我妈就把韩家麟找来，韩便狠狠地训我哥一顿。我结婚时，一切操办都由韩家麟主持。因我哥哥当时有病，连“抱轿”（将新娘抱入轿内）都是他代替的。他就象我们的亲哥哥一样。

“九·一八”事变时，韩家麟正在沈阳军校学习，我们家住在海伦。1932年春节后，大约是正月十几，韩家麟突然来我家。这是他去沈阳学习后我第一次见到他。说奉我父亲的命令送我们去省城，因为我父亲也要去省城。到了晚上，他又把我和我丈夫、我嫂子、二姨等家人叫到一起，让我们只带些细软，不要穿西服，不准披斗篷，都化装成商人模样，连夜乘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韩家麟又送我们登上去大连的火车，并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到了大连再乘船去天津，并托我们去北京看看

他的家属。事后韩家麟就返回我父亲身边了。这是我同韩家麟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们辗转到了天津，第二天便从报纸号外上得知马占山反正，又一次举起抗日大旗的消息。这才醒悟到父亲让韩家麟送我们来天津的真实用意。不久，我们去北京探望了韩夫人，并送了些钱给她。

1932年7月，我们在天津从报纸上看到"马占山战死"的消息，全家万分悲痛。但当天晚上，在北京的万福麟派人专程来通知我们：马占山并未牺牲，已从东北山中来电报了，同时得知韩家麟阵亡的消息。

以后我听王少清（我父亲与人合开一家买卖的经理）说，日本人将韩家麟的遗首挂在海伦县城头示众了一百天，以炫耀他们"消灭马占山"的胜利。因韩家麟经常为我父亲过问买卖的事，王少清同他很熟，所以他一看被日本人挂出的人头，便认出是韩家麟而不是我父亲。据王少清说，韩将军的遗首头发很长，满面血污，惨不忍睹。

1946年2月，我到北京去探望韩夫人。她非常刚强，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大女儿随夫去西安，长子在重庆读书）度过了十余年艰难的日子。不久，我父亲也来到北京。一见到韩夫人，父亲老泪纵横，悲痛不已。我父亲安慰她，并再三告诉她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他。但韩夫人没有提任何要求。这年秋天，韩夫人因病去世了。3年前她曾患乳腺癌做了手术。她去世的时间大约是1946年中秋节后不久。记得她要吃西瓜，我让儿子去买，跑了许多地方也未买到。她去世时，我帮着穿的寿衣，我父亲给买的寿材。

注：马玉文是马占山将军的女儿，81岁，现任民革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本文是采访她后，根据她的口述材料于1987年10月29日整理的。

（吴铁男整理）

韩家麟遇难经过

张鹤川

1931年，我到黑龙江军事教导队上学。“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受张学良之命来到齐齐哈尔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从此，我开始跟随马占山将军。不久，我便认识了韩家麟。

韩家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老实厚道，待人温和，从不发脾气。他与马占山的关系很好，吃、住都在一起，协助马占山谋划军事。马占山的文化很低，一些军事命令之类的公文都是由韩家麟下达。

1932年4月，马占山重新抗日后，我们转战在深山老林之中，条件极为艰苦，经常处于日寇包围之中。吃的是小米糊糊，用脸盆当锅，用桦树皮当碗。大约是7月份，日寇集聚多于我几倍的兵力向我们再次进攻。这一仗打得很惨，奋战了3昼夜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记得突围时我骑的马陷入泥塘，这时日寇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多亏部军长将他的一匹备用马让给了我，我才得以脱险。突围后，由于敌人追得很紧，部队伤亡也很大。在过一条河以后，韩家麟带着40多人的辎重队（金驮子、钱驮子、大烟驮子等）同我们走散了，岔向另一条路。我骑的马将我带到马占山去的方向，因此才没有与大队走散。韩家麟带着辎重队走到一处烟房子（山里种大烟者临时的居住处）时便下马休息。由于过度疲劳，他们都睡了过去。马匹也无人看管，散在山坡上吃草。谁知就在这时敌人已经逼了上来，将他们堵在屋内，架起两挺机关枪向屋里扫射。除了两个老兵幸免逃出，其余将士韩家麟等30

余人全部被日寇杀害。这些情况是从逃回的两个老兵口中得知的。

注：张鹤川，1913年生，曾任马占山的侍从，少校副官，副官处交际科中校科长，傅作义部75师少校副官主任。现为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此文是1987年10月采访后整理的。

（吴铁男整理）

回忆我的父亲韩家麟

韩 国 珍

我的父亲韩家麟，字述彭，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梨树县小城子镇河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少年从军，跟随马占山。18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斗争。1932年7月，在一次同日寇的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4岁。

我家祖籍山东，大约是曾祖父那一代从山东逃荒到东北定居的。刚来时以开荒种地维持生活，靠3间马架子栖身，直到我记事时全家搬进新房后，那马架子还存在。我们家是个大户，有60多口人，种60多垧地，有三四挂大车。每当农忙时节，家中壮男全都下地，还请几个打头的。我的曾祖母心灵手巧，虽然不识字，但会画、会绣、会做衣服，还会用秫秸编一些小玩艺儿。我的祖父叫韩德富，兄弟3人，他居长。但他又是最无能的，不会种地，又干不好别的，只能干些推碾子拉磨等家务活。我二爷会种地，家里种地的事都归他管。我三爷是他们哥几个当中最聪明的一个，很象我曾祖母。他在家办了一个私塾，全家各户所有幼童，无论男女都跟他读书，后来还收了一些亲戚的子女入学学习。我就曾在我三爷的私塾中读过书。

我父亲出生不久，我的祖母就去世了。后来祖父又续弦娶了

小城子一家姓杨的姑娘为妻。这位继祖母对我父亲不好，全靠曾祖母把他带大。父亲7岁时就在我三爷家的私塾里读书。因他聪明好学，肯用功，后来考入小城子高小继续读书。我们家虽是大户人家，但对家里人只管吃、穿，至于零花钱，包括小孩到外边去读书的费用，“伙里”均不供给。只靠各户“小份子”想法解决。我的祖父没有挣钱的能耐，继祖母又不肯给，因此我父亲上高小学习的费用，都是靠自已努力学习获得的奖学金来维持的。写字时没有墨水了，就刮一些锅底灰代替。就这样一直坚持读完了二年高小，15岁时毕业就回家务农了。这时，我的继祖母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她共有二子三女），家务十分繁重。为了找个帮手，就托人给我父亲提亲娶妻，以承担家务。我的母亲刘志琴是吉林省怀德县人，比我父亲大4岁。原来没有名，是随父亲到军队后才起的这个名。母亲在娘家是长女，结婚时陪送得不错。听我母亲说，她和父亲是冬天结婚的，当时父亲没有棉裤，继祖母只给做了一条棉套裤。三天回门时才穿上母亲用被子改成的新棉裤。

父母结婚后的第二年（1914年），在中央骑兵第二旅三团当少校连长的马占山带队伍来我们家这一带剿匪。马占山住在我们家里，并且和我的祖父相处得很好。因为我家是地地道道的务农之家，既没有人在外头“做事”，又没有当官的，常常受当地土豪的气。因此，祖父就有改换门风的想法。他请马占山连长从家中所有15—16岁的男孩中挑一个去当兵，谋个好前程，以光宗耀祖。马占山选中了我的父亲。当年春节后，我父亲就到了马占山的队伍上，给马占山当侍从兵。

我父亲跟马占山走的当年（1914年），我出生了。我弟弟生于1918年，是属马的。从1914年到1923年这十年中，父亲一共回家4次。最后一次是1923年，来接我们全家随军，那年我刚10岁。记得当时他已经是少校副官了。1923年至1927年间，我们全

家住在黑龙江省海伦县 。1927年冬迁到安达 ，不久又搬到呼兰县。我大妹生于1925年，小妹生于1927年。记得我们家刚搬到海伦县时，是租别人的一间半房暂时居住的。父亲的工作很忙，马占山的军务以及家务事都由他负责。记得我母亲因水土不服得了一场重病，父亲因忙于公务一直未去护理，只派了一名老兵去照顾母亲。母亲病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好转，有人说抽大烟能好，试了几次果然见效。但母亲害怕抽上瘾，后来干脆就不抽了，直到很长时间母亲才恢复了健康。1925年秋天，我们又搬到姓夏人家的房子居住，这个人传教，他的儿子比我大，叫夏广德。大约在1926年，我们家才自己盖了间新房。新盖的房子前后院很大，母亲在院里种了菜，自用有余，还养了三口猪。1927年间，我父亲升为中校副官长。在海伦县居住时，我的曾祖父、祖父等家人曾来看望过我们，我母亲从农村搬进了县城，又当了官太太，但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还与在农村老家时一样，一切家务事都由自己操持，从未雇过人。父亲的同事及下属初来我家时，还以为她是我家的佣人呢。对此，我父亲毫不嫌弃。象他这样的军官大都讨了姨太太，只有他始终如一。

1930年，父亲被选送到沈阳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学习，我们全家也随着搬到了沈阳。到沈阳后，我们租了一家富商的房子居住。我家住一间半，对面屋的一间半也是东北高等军事研究班的一位学员全家居住。那位学员叫马永久，是万福麟的少校副官，是步兵。我父亲所在的马占山部全是骑兵。和父亲同期入学的学员还有一位叫金玉东的，现任辽宁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同住的邻居还有李迴遥（也叫李继渊）夫妇，他们都是教师。这一时期我已经上中学了。我的一位九爷，叫韩德余（或韩德庆），此间也在沈阳商业学校读书，曾寄居在我家。他毕业后在四平电力局任事，以后听说去长春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父亲还在沈阳军校学习。因为每天

都有日本兵来往于我家门前，母亲很害怕，她曾将父亲的一只马牌手枪藏在炕洞里面，逃离沈阳时也没取出来。为了防备万一，她还把父亲的一些军衣扔掉，把一些书也烧了。记得事变发生一周后的一周末，父亲和马永久化装从军校跑回家来，他们说学校的日本教官要学员与日军合作，有些学员为此妥协了，父亲和马副官寻机逃了回来。之后商量怎样离开沈阳去北平。当天夜里，我们两家简单收拾了随身用品和软细，带着两只猪皮箱，连夜雇两辆车去皇姑屯站上火车。父亲因常年带军帽，额头上的皮肤颜色明显的浅于脸部，为不暴露身份，他戴了一顶毡帽遮住，才混过了几道卡子。到皇姑屯车站时，逃难的人群如潮，乱轰轰的一片。车厢内更是拥挤不堪，既无食物，也没饮用水，直到过了锦州，才好了一些。到了北平之后，我们两家暂时安顿在旅馆。第二天，父亲同马副官就赶着去见万福麟。因父亲同万不认识，是由马副官引见的。当时万福麟的53军驻在北平，就把父亲安排在军部副官处任上校副官长，把马副官安排在参谋处。不久，我们两家在小祥凤胡同租了一处房子，每家各3间。过了一段时间，马副官因又弄到了比较好的房子，就搬了出去。正好在沈阳时的邻居李迥遥一家也逃来北平，就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李先生是教育界人士，在北平的同行中熟人比较多，我和弟弟上学的问题还是李先生托人帮助解决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李迥遥先生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的儿子现在陕西潼川工作。

我们全家在北平安顿下不久，在东北的马占山将军与日寇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北平。父亲听到消息之后，立刻找万福麟要求去东北，和马将军一道参加抗战。李先生来北平与我们住邻居以后，父亲就经常和他谈论抗战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并互相约定，等李先生的妻子生产后（当时已到临产期）立刻去东北。父亲要求去前线抗日杀敌，一开始万福麟不同意。后来经父亲再三要求，万才勉强同意，要他担任北平与东北马占山的联络工作。我

记得父亲是1931年11月离开北平的。临行前，母亲给他缝制棉衣，并将张学良和万福麟给马占山写有指示的绸子缝在衣内。大约在12月份左右，父亲从东北返回北平，向张学良和万福麟汇报了东北马占山与日寇作战的情况，没过几天，父亲又带着北平的指示返回东北。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家人的永别！

大约是1932年春天，李迿遥先生在妻子生了小孩之后也动身去东北参加抗战了。他是先于父亲牺牲的。后来他妻子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返回辽宁新民老家了。

我父亲阵亡后，万福麟派人送3000元现大洋抚恤金，还发给一个“抗日战争阵亡烈士证”。凭此证每年从北平民政局领取500元的抚恤金。一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抚恤金停领。

“七·七”事变后，马占山将军离开天津到西北参加抗日。驻防在陕西省哈拉寨时修建了忠烈祠，用以纪念“九·一八”事变后随他抗日牺牲的烈士们，父亲的名字列首。当时傅作义将军、邓宝珊将军都题了词。

抗战胜利了，但是我母亲经过十几年的伤感和艰苦生活的折磨已经重病在身。这时马占山将军的女儿马玉文回到北平暂住我家，虽经她帮助，但医治无效，母亲于1946年7月病逝。

马占山将军解甲归田后，回到北平家中安度晚年。不久，他开始为在北大读书的长孙女马志清物色佳婿。他看中了我的弟弟韩宝轩，认为宝轩是烈士之子，又品学兼优，很有父亲为人的特点，所以在征得大家的同意后，1948年由他作主，竟把自己最疼爱的掌上明珠许配给一个既无父母又无任何财产的小职员。1949年7月在北京马府为这对青年举行了婚礼，婚后宝轩仍在天津中国人民银行上班，志清继续在北大求学。1950年5月马将军喜得一外重孙女，这孩子的婴儿时期就是在外曾祖家度过的。马志清毕业后在天津组成小家庭，过着互敬互爱的美满生活。马志清现任天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我们共姐弟4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简况如下：

韩国珍　女　1914年生人　教师　已退休

韩宝轩　男　1918年生人　天津中国人民银行干部　已退休

韩国志　女　1925年生人　中共党员　石家庄第一人民医院医生

韩国华　女　1927年生人　中共党员　人民日报社干部

注：本文是由韩国珍同志于1987年10月27日在天津的口述材料和1989年5月28日写给庞镇同志的书面材料整理的。

（吴铁男等整理）

张 竞 渡

张慕骞

张竞渡，字仲楫，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904年12月14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黄旗寨乡谢家沟屯，排行第八位。父亲张钺这时读完私塾，正准备投考满清政府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母亲于氏，满族，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张竞渡自幼生活在贫困、落后、没有文化的农村大家庭里。及至学龄，因谢家沟屯内没有学习条件，便去5华里外的黄旗寨乡后沟一处私塾读书。每日往返10余里路程，冬夏从不间断。当时乡下治安非常不好，为躲避胡匪绑票，每天在晚饭后依母命到附近的罗家堡子亲属家借宿。

1911年其父张钺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1912年随同张锡銮元帅到奉天，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奉天督军的参谋长。

1912年张竞渡到奉天读小学。

1918年考入北京阜成门外父亲的同学徐树铮校长主办的正志中学（后改为成达中学），编在第八班。在校各科成绩优良，并爱好篮球、足球和滑冰等体育活动。在校与同班同学王家本（道生）甚为友好，同学间互助友爱。

其后，父张钺已由奉天转至北京陆军讲武堂，任教育长之职。由于生活在父亲身边，受父亲思想的影响，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在校学习期间列强瓜分中国愈演愈烈，国内军阀混战，各种派系军阀割据一方。他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21条。经常与万国宾（万福麟之长子）及丁文杰（丁超之子）讨论国事，他认为中国只有赶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人民才能得到自由和幸福。

1922年冬于北京成达中学毕业。他决心效班超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和民族。1923年春回奉天，考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他认真学习各种军事科目，成绩优秀。同时，他向同乡及爱国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拥护国民革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控制东北。鼓励家乡的青年人参加爱国活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势力。当时与奉天同泽中学学生代表卢兆祥来往颇为密切，对卢影响很大。

1924年7月在校期间，与奉天鼓楼南永年医院李秉辰院长之妹李秉申结婚，家居奉天大南关金角寺胡同。

1925年奉天讲武堂步兵科第五期（学制一年半）毕业，获优秀毕业生称号，被派至奉天督军署工作。当时张作霖担任奉天督军，因张竞渡系讲武堂优秀毕业生，授衔为陆军中校，军装上佩带“镇威”胸章。他分配在参谋处工作，主管奉天军队的军械更新以及军事教育等工作。曾与军械检查团共同检查了东北军的武器装备，为奉天军队的军械更新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职期间曾回谢家沟屯，看望家乡父老兄弟。他虽是中校军官，但对家乡父老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向邻里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野心，向家里的佣人宣传爱家乡、爱国家的思想，丝毫没有旧军官的作风，受到乡亲们的好评。

1925年北京陆军大学招收新生，分配给奉天督军署4个名额。条件是，品学兼优，工作卓著，且有培养前途的中校级以上的青年军官。张竞渡由于工作突出，经于珍（济川）军长及杨宇霆总参议的推荐，与另外两名青年军官在考核后被选送到北京学

习。1926年入北京陆军大学，按中校学员待遇，家住北京市西直门里大帽胡同。

陆军大学是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学校。他战略战术、射击教范、兵器、交通及筑形等科目的成绩，均名列前茅。此间与同学金奎壁（荆璞）、唐振海（静波）、王家本（道生）、樊光普（荫寰）、黄师华及范玉书等结为好友，经常探讨陆军大学学生的责任问题，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在东北掠夺矿山资源；霸占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辽东半岛等极为痛恨。张竞渡认为，作为一名陆军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应该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献身。每逢节假日友好同学相聚，有时同赴西山八大处、香山或颐和园等地跑步、爬山以锻炼身体。

张竞渡每天课后回家，遍览自订的北京及各地的报纸，对日本侵略军通过强占的大连及旅顺，不断向"南满"铁路附近增兵，感到愤慨，并决心为抗日救国献身。

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适值父亲张钺的好友王树常将军，在天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经常有书信来往。张竞渡常常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到天津看望王主席。王主席很关心他在陆大的学习，鼓励他努力学习，继承父志报效国家。王主席常与他谈起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况，告诉他日本帝国主义已做好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还谈到在日本学习时，有的课程不准中国学生听课等情形，以激励张竞渡为国家奋发学习。此外，与于珍军长亦有书信来往，于将军也非常关怀他的成长。在陆大学习期间父辈的教诲，使他树立了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军人高尚品质。

1930年冬北京陆军大学第八期毕业，回原选送单位奉天督军署。此时有的同学看到日军陈兵东北的严峻局势，不愿意回东北从事军事工作，但张竞渡却愉快赴任。

此时主持奉天军政大权的张作霖，已于两年前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少帅张学良继承父业，他特别重视东北边防军的建设

及青年军官的培养。1931年春节过后，正月初五派张竞渡、唐静波及白××等三名北京陆军大学新毕业生去齐齐哈尔，到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官公署报到。黑龙江代理军务督办万福麟，对他们都没按原军衔任职。张竞渡分配到副司令官公署卫队团第一营第三连接替郭宪钢连长职务，军衔由中校降为上尉。张竞渡说："我才20几岁，还很年青，就由从头带兵开始吧！"

张竞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军衔的高低，认真工作，对部下加强军事训练，实行以救国为中心的教育。他不怕苦，不怕累，提高了连队士兵的素质与战斗力。

任上尉连长一个月后，于1931年3月晋升为卫队团第三营少校营长，接替孟献德的营长职务。其营副为奉天讲武堂第八期毕业生上尉姚继武，三营部设于齐齐哈尔市的南郊。三营各连的主要负责人及任务如下：

七连连长王久祥，负责军械厂的枪支弹药和兵工厂的保卫工作。

八连连长于××，负责军马饲养和牧养场的后勤工作。

九连连长谢德春，负责辎重库工作。

稽查队队长李建功，负责稽查军风纪和维持公共场所秩序工作。张竞渡自任卫队团第三营营长后，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工作负责，对所属连队的辎重保卫工作尤其重视，除令连长加强警戒外，又将家乡辽宁省开原县的几名士兵刘海龙等调来，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又令王雨鹏等随时抽查辎重的保存情况，便于全面了解枪械、弹药等的保管情况。由于张竞渡这项工作抓得好，受到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的赞扬。

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挑衅制造事端，侵略东北三省的野心更加暴露。在此紧要关头张竞渡加强了三营的军事训练和射击演习，使三营成为一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他在训练期间与士兵同甘共苦，爬山涉水不辞劳苦。为监视日本军国主义在齐市雷家胡

同开设的昭和祥、永安大街的龙沙旅馆、南门脸的富山堂药店及一些当铺和大烟馆等据点的活动，指派稽查队便衣人员进行监视，并统计出日本在乡军人进出据点的数据等。

张竞渡营长经常深入各连、检查备战情况，鼓舞士兵的斗志。他带兵素用"勤、恕、廉、明"为座右铭，对士兵的疾苦关怀备至。他是戎马书生，严以律己，为人忠厚，性格爽朗，生活俭朴，办事公道。

在营内各连成立篮球队、网球队及足球队，经常开展连队间的友谊比赛。张竞渡对越野、爬山和赛马也颇感兴趣，营里经常开展这些竞赛活动。

每日公余，常以书法自娱，常写的是岳飞的"还我河山"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词句。他的魏碑和米南宫书法很为世人称道。

1931年"九·一八"的第二天，上午11时黑龙江副司令官公署参谋长谢珂收到沈阳急电，始知事变的发生。谢立即召开齐市军政要人的联席会议，会上传达了急电内容。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出席了此次会议。翌日徐宝珍向全团作了传达，大家无不义愤填膺。全团官兵纷纷要求开赴前线，准备消灭日本侵略军。

9月21日徐宝珍下达命令，命令二营营长王绍忠为前敌二营指挥官，三营营长张竞渡为前敌三营指挥官。二、三营及所属连队到嫩江北岸大兴车站一带布防，做好应敌的一切准备。二、三两营以大兴车站及铁路为分界线，二营在王绍忠营长率领下，在大兴车站的南方沿嫩江北岸向西构筑防御工事；三营在张竞渡营长率领下，自大兴车站向东至韭菜沟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前沿阵地在嫩江江桥的东侧，沿江在烟草地里修筑了堡垒和蛇形、锯齿形及横墙形的交通壕。因工事隐蔽在烟地里，对岸很难发现。同时加固了江桥北侧的桥头堡，增加瞭望哨。其后，又在大兴车站东南方的高地修筑了第二道防线，它的战壕跟第一道防线的

基本相同（战壕遗址今尚有部分遗存），两千余人全部进入阵地。

张竞渡全副武装，身着佩有少校军衔的灰色军服，穿黑色带刺马针的皮靴，带一只瑞士造的"旁开门"手枪，身背图囊，其中有：大兴江桥一带的地图，阵中日记本，狮纽铜印章，手电筒，红蓝铅笔等。同时挎有德国伯林葛尔次远镜公司出品的6倍望远镜一架，怀中带有德国制的CORGEMONTWATCH怀表一块。张竞渡带领战士严阵以待，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

大兴车站位于嫩江江桥的北侧，北去一百余里便是省城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门户，卫队团的各级指挥官多为我国陆军大学和讲武堂的毕业生，他们素质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这支少壮军人所率领的精锐部队，在这里布防是极为重要的战略部署。

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侵占全东北的目的，嗾使它的走卒张海鹏北犯。当叛军进抵江桥的前沿时，即被二、三营官兵击退。敌军再来进攻，又被我军击退，尤在三营阵地前方叛军死伤惨重。叛军被击退后，日本侵略军认为叛军无法为他们开路。一天，我守卫江桥桥头堡的哨兵，发现对岸哈拉尔葛方面的日军步兵向江桥移动，当即开枪射击，敌军亦还击。以多门师团及其所属天野旅团、里木旅团为首，及配有炮兵和空军的混合旅团也赶来增援，敌我双方隔江交火，鏖战三昼夜，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使其一举突破我军江桥防线的阴谋未能得逞。其后，我省防军炮兵十四团在朴炳珊团长率领下从克山赶来，向三营阵地增援，接着苑崇谷旅长率一旅屯垦军从王爷庙赶来参战。但敌军也不断增援，双方战斗愈为激烈。尤在拂晓及黄昏双方战斗更加频繁，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我军为阻敌进犯，在敌人没有窜到之前，工兵连已将江桥破坏，防止日本侵略军的装甲车过江。继之，日本侵略军在山炮、

野炮掩护及2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下，又加低空扫射，以配合船只架桥，企图一举渡江登陆又告失败。张竞渡在炮火纷飞的前沿，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将来犯的敌船全部击沉，又将日本侵略军的先头部队尽葬于大江之中 。 在三营阵地前打死了--名敌军少佐，他们又不能来收尸 ，只好暴尸于异国的荒郊旷野 ，自食恶果。张竞渡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时至今日大兴镇的老人仍有口皆碑。

马占山将军来齐齐哈尔后，当即率参谋长及卫队团团长徐宝珍亲自赴前线视察防地，先后在1418高地及三间房会见前敌指挥官张竞渡营长及王绍忠营长，部署江桥战役的战略方针。我军官兵深受鼓舞，士气大振，决心与阵地共存亡。

自10月下旬开始战斗更加激烈 ， 敌机自泰来五庙子起飞助战，山炮、野炮在望远镜观测后进行远、中、近距离射击，组成强大的火力网。我军坚守阵地，使敌军的渡江阴谋未能得逞。由于天气逐渐变冷，江桥前沿阵地仍在二、三营控制之下，敌军久攻不下，便把在日本本土北方训练多年的浦木师团调来增援。在马占山将军统帅下，我军英勇杀敌 ，坚守阵地 ，使敌军无可奈何。当日军接近我方沿江阵地时，企图再次登陆，又被我军猛烈还击将其击退。敌军再反扑，我军再把他们打退，双方拉锯战达十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为开火以来所未有。王营长及张营长十几昼夜在前沿指挥战斗，军服、军帽弹痕累累。张竞渡的战马在此次战役中被流弹打伤，但他仍寸步不离前沿阵地，痛歼企图再次渡江的敌军。三营的一个士兵刘海龙回忆说：“张营长在前沿阵地上，置生死于不顾，在硝烟弥漫子弹及炮弹乱飞的前沿坚持指挥，誓死守卫阵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打回去！”士兵们看到张营长在前沿与敌人搏斗，愈战愈勇，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由于敌军日夜炮击，战士刘海龙最后双耳震聋，当他回忆起这次战役时，倍加钦佩张竞渡出生入死以少胜多的指挥才能。参战的

卫队团官兵在这一战役中打出了军威，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马占山亲赴前线犒赏官兵。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及慰问电，似雪片样飞来。捐献的服装、药品和慰问品源源不断运至阵地。张竞渡还将他分到的美金交炊事班，改善士兵的伙食。

后来，为了战略转移，马占山命令二、三营官兵撤至拜泉县与海伦县之间的三道镇。张竞渡营长骑一匹黄马，邢介兴连长骑一匹白马，率二、三营官兵向指定地点进发。在日军飞机追击扫射下，张营长便将负伤的士兵扶上马，自己步行在队伍中间。因张营长爱护和关心士兵，受到广大官兵的爱戴。部队转移到三道镇后，三营营部驻在粮栈院内，邢介兴的机枪连分别住在姜家油坊和杨家油坊。卫队团江桥战役后尚余400多人。

1931年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入敌手。11月22日马占山主席率军政两署人员撤至海伦。三营在张竞渡营长领导下，在驻地三道镇补充兵源，扩充武装力量，加强抗日爱国主义教育以利再战。他与入伍的爱国青年及士兵，一起开展了冬季大练兵，做好持久的抗日战争准备。1932年2月根据上级部署，李振华及张竞渡率原卫队团转移至讷河，准备从正面阻击进犯的日军。自江桥战役开始后，张竞渡的好友、陆军大学时同学、驻通辽及彰武的骑兵第三师参谋处中校处长王家本，曾多次打电报给张竞渡，关心他的处境。电报中曾提到，如战局不利请将所部带至通辽，与骑兵第三师会合共同抗日。张竞渡谢绝了王家本的好意，在讷河附近做好迎敌部署，誓与浦木师团的小泉联队拚到底。

张竞渡在写给老家的伯父及家属的信里，表达了他的抗日决心，讲述了江桥抗战的杀敌情况，以及重创浦木师团的战绩。家人得知他的军帽及马裤虽弹孔无数，但身体发肤未受任何损伤，三伯父高兴得立即祭祖致敬致贺。

1932年3月底马占山主席再举抗日旗帜。4月7日马占山扩建和新编部队，以原卫队团为基础扩建为步兵第1旅，徐宝珍任

旅长。同时张竞渡升任上校团长。马占山在去黑河重建省政府的途中，对克山、拉哈及讷河等地的军队重新做了部署。马主席在讷河西门里小学操场，由徐宝珍旅长陪同检阅了张竞渡团及李振华团的全体官兵。他绕场一周后，对全体官兵讲话：辽宁及吉林两省已被日寇占领，人民遭受涂炭，爱国军民要团结起来，奋起抗日，坚决把日本侵略军打出中国去！在场官兵听到马主席的讲话，抗日爱国热情更为高涨。根据拜泉军事会议的决定，兵分三路与日军决战。徐宝珍旅为北路，向嫩江桥方向运动，以断绝日军后路。张竞渡团参加了这一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海伦地区军民基于民族义愤，积极响应马占山抗战义举。群众的爱国热情激励着苏炳文将军，更增强了他发动海满抗战的决心。为了准备作战，苏还储存了够全军用1个月的粮食，扣留了从哈尔滨开来的数百辆货车、客车和车头，并派人与朴炳珊、李海青及张竞渡等抗日力量建立联系。张竞渡表示大敌当前，惟有各地义勇军奋起抵抗，始能给日本侵略军以致命打击，完全同意苏炳文将军海满抗战的策略，并准备在海满抗战开始时加以策应。

张竞渡在讷河的团部设在东门里广信公司院内，他经常与爱国青年马云接触，倾听爱国青年及学生们对抗日前途的看法，还谈到他的抗日救国大计。他与马云的长谈中曾说起江桥战役时作过的一首诗：

打出日寇去，
还我好河山，
共饮庆功酒，
酣睡亦安然。

同时张团长经常书写古人的爱国诗词，激励自己抗日救国的决心。

徐宝珍旅长慑于日军装备精良，又有空军助战。在敌军压境

的情况下，抗日态度有了动摇，当即引起张竞渡及下属官兵的强烈不满，终至演成坚决抗日救国的张竞渡与徐宝珍的争执。出于民族义愤，张竞渡忿而辞职去了嫩江，爱国官兵3,000余人亦先后赶往嫩江。他在嫩江万源达建立了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大力招兵买马，组建抗日义勇军队伍，联合友军高举抗日大旗，原徐宝珍旅部下坚决抗日的军官及士兵，继续响应号召，继续向嫩江集中，省内各地爱国青年也纷纷前来参军参战。全部武装力量近万人。张竞渡在嫩江就任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司令部组织机构如下：

司令，张竞渡少将；参谋长，吴景璞（字跃东）；支队长，邢介兴；步兵团团长，张宏勋；骑兵团团长李振华，连长田春荣，连长高广仁；炮兵团团长，张孝文；工兵营营长，刘润川（字青普）；辎重营营长，孟献德。另有民团，包括警察、民兵、爱国青年及农民等。还有收编的绿林好汉，如占江龙和访友等。此外，宣传处由爱国青年陈涤非、梁立河二人负责，约有数百名学生组成宣传队。据邢介兴回忆，宣传处的二位负责人具有左倾思想。他们以铁血救国军的名义，散发了大量传单及张贴了标语。陈涤非后被日本侵略军杀害。

1932年7月以来义勇军接连不断地给进犯的日寇以沉重打击，因而名声大振。在齐克路沿线频频活动的，除张竞渡的义勇军外，还有南廷芳、宋喜和及吴天石等部队。他们不断破坏交通，炸毁桥梁，袭击日军军车，切断日军各部间的联系。沿线战斗异常激烈，日军死伤惨重，整个齐克路沿线被义勇军破坏达20余处。

7月6日，日军小泉联队由博尔多站侵入讷河县境，旅长徐宝珍指挥作战不利，日军攻入县城后，徐向日军妥协，讷河陷入敌手。

张竞渡的抗日义勇军在嫩江迅速发展，但武器及后勤方面的诸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了持久地进行抗日斗争，有的军官建议与

苏联取得联系，张司令同意此种意见，终因交通关系未能取得苏联的帮助。有时部队缺乏给养，官兵们以土豆和青菜充饥，张司令身为一军之长，亦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虽为高级将领，但很少佩武装带和穿皮靴，和士兵一样打绑腿，所以官兵及老百姓称他为"布衣将军"。

嫩江县城内，驻有司令部，其下属的支队长邢介兴驻泮云隆，直属二营驻万源达，三营驻仁义德；其余各兵种及部队驻在嫩江至讷河一线。

张竞渡整军经武，秣马砺兵，对来自各方面的部队加强训练。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订了学术科教育计划，并按期实行。所属各团营分别作野营演习以及实弹射击训练等。军官重点学习中外战术，如中国的《孙子》和岳飞的八百破十万、周瑜赤壁大战以五万破八十三万、曹操的官渡之战以七万破八十万及韩信等人的著名战例，外国的有毛奇战法、麦刚森中央突破及兴登堡两翼包围等有名战法，以提高他们的战略战术水平。

加强政治教育。成立政治短期训练班，培养政治骨干，组成了若干抗日宣传小队，到老百姓当中做抗日救亡宣传。对官兵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讲述国内外时事、抗日必胜的理论以及展望抗日前途；讲述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抗敌正气，戚继光收复台湾和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思想等等；大唱爱国歌曲，如岳飞的《满江红》、反映荆轲英雄行为的《易水送别》和《北望满洲》、《男儿励志歌》等；宣传国际联盟已派李顿爵士来东北调查，确认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属于军事侵略，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兵。

经过教育激发了全军的抗日斗志，也受到嫩江及讷河一带的老百姓爱戴和拥护。因而以张竞渡为首的抗日救国义勇军的声威大振，使敌军不敢继续向北推进。马占山主席路过嫩江时，在

嫩江税捐局会见了张竞渡，面授继续抗日的大计，更加鼓舞了全军的抗日斗志。

在此期间除在讷河至嫩江一线做好应敌的战略部署外，还不断地进行游击战，打击浦木师团小泉联队的据点，使敌军进攻嫩江的计划受挫，准备撤到讷河及拉哈。

1932年8月6日上午7时，徐子鹤部会同张竞渡部义勇军7千余人攻打讷河县城的小泉联队及伪军，激战一昼夜给敌人以很大杀伤，英勇善战的义勇军初露锋芒。按马占山的指示，义勇军主要采取游击战术与敌周旋，时时袭击敌人，使其不得安息。义勇军在完成上述目的后于8日撤出。徐宝珍率伪军出城追击，被义勇军伏兵击毙。徐死后张竞渡在嫩江一次军官集会上对部下说："徐宝珍的死罪有应得，他是中华民国的鬼，还是满洲国的鬼？"以此谴责徐宝珍叛变投敌的可耻下场。整个会场寂静无声。他接着又说："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之际，我们中华民国军人，要为国家为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不把他们打出去，决不罢休！"

9月15日，张竞渡为配合苏炳文进行海满抗战，率部离开嫩江转移到讷河。下旬一个下雨的日子，马占山率兵从海伦来嫩江，由于日寇的追击，他在嫩江只住3天，然后去讷河及甘南等地。马主席在讷河东门里广信公司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他身着蓝色棉袍在会议室内来回踱步，沉思着抗日大计。他在会上先听取了各方面的军事情况，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根据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各部的战绩与发展情况，马主席重新编组了所属军队。在此次会议上传达了南京政府国防部的任命，任命坚决抗日的张竞渡为步兵暂编第二旅少将旅长。

9月下旬，苏炳文发动海满抗战，张竞渡积极响应。

10月14日马占山旧部朴炳珊在拜泉宣誓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副司令兼东路总指挥。在此前后，李海青、李振华、张竞渡也接

受了救国军总司令部的任命，并在各自驻地宣誓就职。

马占山10月15日命令依 安县抗日义勇军 李云集部联络张竞渡、徐子鹤部3千余人围攻拉哈镇，计划攻占宁年（今富裕县）后直取齐齐哈尔。

10月20日马占山亲督 徐子鹤军以及张竞渡 、宋喜和所部两骑兵旅进入拉哈附近 。张竞渡指挥其部下分别由嫩江 及讷河出发，他将指挥部设在讷河县境内的狼洞子。21日凌晨将杨大屯以西铁路破坏30华里，断绝敌军后路交通线。兵分三路猛攻日本侵略军前哨据点拉哈车站，抗日义勇军官兵奋勇冲杀，将敌军包围在拉哈站。被围敌军，数次派特务、侦探，欲潜逃出包围圈，向齐齐哈尔乞援，均被义勇军捕获。直至23日，日军一名副大队长从齐齐哈尔回归拉哈途中始知拉哈被义勇军包围。他急忙返回齐齐哈尔向师团报告，松木急派一个中队，在飞机掩护下，援救拉哈被围的日军，该队日军又数次遭到义勇军截击，到达拉哈南部时亦被义勇军包围。松木又忙令驻宁年的敌步兵第五十联队第五中队、驻齐齐哈尔的日军第十七联队第一大队急救拉哈。

29日抗日义勇军拉哈街内的日军大部被歼灭，仅余少部退入车站，与驻车站内的日军会合，死守在车站拚命顽抗。抗日义勇军已奋战八昼夜，前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且伤亡严重，连、营、团阵亡十余人，战士伤亡450多名 。指挥部遂命令前线撤出一部分军队休整补充，将预备队增援第一线。这一战役，在张竞渡指挥下，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我军一部撤回讷河，一部回师嫩江，此即为江桥战役后的拉哈战役。自此日本侵略军的头目得知张竞渡是我军的主要 指挥官之一 ，不但可以打阻击战，还可以打反击战，是阻止他们向北推进的主要对手。自江桥抗战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竞渡所部先后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达21次。消灭了小泉联队的精锐前锋，并俘虏其一部。拉哈之役毙敌600余人，内有10余名尉级以上军官。

回师嫩江后，冬季即将来临。为了抗日义勇救国军的给养，张竞渡各处奔走筹措粮饷。同时深入连队鼓舞斗志，官兵团结一心，坚决反满抗日到底！他经常教育官兵们说：“我们中国人不能眼看着大好河山让敌人夺去，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为决定下一步的战斗，马占山亲赴讷河、嫩江等地与各抗日将领会商。这时，黑龙江省遍地大雪，寒风刺骨，而我军的军需供应又异常困难。战士们为国杀敌，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许多战士身着单衣作战，子弹枪械更感缺乏，每一战斗都要付出重大牺牲，日加艰难，不断失利。而日军援兵和给养不断运到前线。抗日救国军指挥部，遂决定部队撤退后休整。

日本侵略军的多门师团及浦木师团是张竞渡司令的死对头，从江桥战役打到拉哈战役，敌军企图消灭张竞渡率领的抗日义勇救国军成为泡影，而日军在几次战斗中却损兵折将，小泉联队又遭到毁灭性打击。张竞渡在一年多的反侵略战斗中，百炼成钢。他坚信一条真理，对日本侵略军只要敢打敢拚，他们就不敢越雷池一步。敌军增兵拉哈后，不断受到我军的打击，使其一举吞噬黑龙江省的美梦破灭。抗日将军张竞渡的名声，威震嫩江流域各县。侵略军浦木师团几个头目惊呼：“我们的人死在张竞渡手里的太多啦！”而老百姓却赞扬说：“要抗日的，去找张竞渡。”马占山主席路过讷河时，在讷河北烧锅再次会见张竞渡司令。马主席将讷河及嫩江一带的正面战场 抗日指挥大权 ，委托给张竞渡。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侵略计划，陆军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经过一系列策划，决定再次增兵黑龙江省，同时采取软硬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一面继续对海满地区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施行诱降，一面集中主要兵力进攻黑嫩平原的各部抗日义勇军，以便将来全力对付海满一带东北民众救国军。

张竞渡后来得知苏炳文及马占山已进入苏联，在司令部万源达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分析了黑龙江省的军事形势：敌军的优势兵力必将从西线转向北线；我义勇军连年作战，已极度疲劳，且弹药给养所剩无几。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义勇军将士抗日决心毫不动摇，加强了讷河及嫩江的防线，使中国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嫩江县的上空。

敌人也分析了张竞渡的情况，他有坚定的反满抗日思想，非绿林出身者可比，从江桥抗战打到现在非常有威望，拉哈战役显示了张竞渡的指挥才能。于是通过叛国投敌的伪黑龙江省长韩云阶及第三军管区司令张文铸等汉奸，派遣特务爪牙打入义勇军，采用种种卑鄙手段企图瓦解这支坚决抗日的队伍，甚至还想暗害张竞渡，由于卫队及副官的严密防守，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2月12日日军为进犯嫩江，动用飞机6架飞至嫩江上空，投下20余颗炸弹，炸毁县政府和张竞渡司令部所在地万源达。张司令在敌机轰炸中安然无恙，镇定自若，继续指挥部下做好迎敌准备。

敌人看到短时间内难以征服张竞渡，便利用起叛国投敌的汉奸步兵混成第四旅旅长贾金铭。贾金铭遵照日军头目的安排，佯举反满抗日旗帜，以共同研究“抗日救国”采取联合抗日行动为名，邀张竞渡司令至讷河境内的贾旅驻地。张竞渡遵照马占山主席临别时的指示，为联合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便带了几名副官及随从人员张长贵等去讷河境内的贾金铭旅驻地。

汉奸旅长贾金铭，是个老奸巨滑的大烟鬼，颇受日寇的赏识。他大摆宴席为张竞渡接风，在席间吹捧张竞渡是中华民族英雄，令人钦佩的爱国者，前途不可限量……。贾金铭又进一步施展伎俩，与其换谱结为兄弟，把张竞渡“留”在旅部同吃同住，实际上是把张竞渡软禁在那里。几天后伪省来“文”，请张竞渡到齐齐哈尔任军管区少将参议。张竞渡坚决拒绝，说：“我是中

国人，绝不当卖国贼！”。并痛斥贾金铭的阴谋和卖身投敌的行为。贾金铭见事已败露，便急忙用武装“护送”张竞渡到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火车站将张竞渡交给了前来“迎接”的浦木师团特务。张竞渡到齐齐哈尔后软禁在伪军第三军管区司令部内。浦木及其爪牙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先用重金收买，将一大包黄金摆在张竞渡面前，劝他就任伪第三军区少将参议，张竞渡立即将黄金推到地下 。日军头目已为给他的少将军衔太小 ，便又“封”为伪第三军管中将参议，还说：“你才二十几岁，中将军衔就不算小了，干好了将来还可以到长春中央政府去当大官。”由于张竞渡坚持民族的崇高气节，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满洲国的官不当，满洲国的钱不挣，决不当卖国贼。有我张竞渡在世一日，就与你们日本鬼子战斗一天！”敌人的任何高官厚禄，都动摇不了张竞渡的爱国信念。在一个严冬的拂晓，将张竞渡押赴齐齐哈尔市西门外的刑场，他站着面向敌人的枪口说：“你们杀了我一个中国人，杀不了所有的中国人，日本侵略者一定要失败 ，中国一定能胜利 。”当敌人让他跪下时，他说：“我是中国人，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敌人面前不能跪，我要看着日本侵略者的灭亡。”张竞渡时年二十八岁。

张竞渡遇难后，嫩江及讷河等县的民众说：“张竞渡像岳飞一样忠心报国，坚决抗日到底。中国军人都像张竞渡那样，日本鬼子根本就打不进来，占领不了奉天和吉林。”

一位追随他坚决抗日的军官说：“郭松龄不幸牺牲，是东北青年军官的第一个不幸。张竞渡的不幸牺牲是东北青年军官的第二个不幸。”

张竞渡的部下有的经苏联回国参加了革命，如西久真同志曾任东北边防驻江副司令官公署卫队团第三营第九连事务长及排长等职，江桥战役后升为第三营第九连上尉连长。拉哈战役后，曾被伪军收编。在苏日诺门罕战斗中，他杀死了日军指挥官，率部

进入苏联，以后回国在延安参加革命。“九三”胜利后随八路军到齐齐哈尔，任黑龙江省实业厅厅长后转辽宁省商业局局长。另有一部爱国官兵进入关内，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张竞渡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到北平，陆大同学唐静波、金奎璧、王家本及黄师华等生前友好集会，愤怒声讨日军罪行，曾派人到张竞渡遗族居住地辽宁省铁岭市，拟将其子接往北平，由陆大同学抚养和教育。

九三胜利后，1947年马占山将军到沈阳任职时，曾接见张竞渡的遗孀李秉中，对张竞渡的爱国思想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为张竞渡亲笔写了一份殉国证明。这时马将军会同在沈阳工作的陆大同学金奎璧、唐静波、范玉书及樊光普等，联名呈请国民政府国防部，经核准由白崇禧部长签发了国拱字第46317号的《恤亡给与令》，以表彰张竞渡于“九·一八”事变后，在江桥战役和拉哈、讷河等战斗中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府追认张竞渡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011145号革命烈士证明书，他的家属得到党和政府的妥善照顾。

彭济群自述

编者按：彭济群，字志云，辽宁省铁岭市城内西关（今铁岭市银州区）人。1895年生于一个读书、经商、作官的大家庭。15岁赴法留学，入巴黎土木工程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17年毕业回国，参加社会教育活动，任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团体的干事、总干事、委员等职，推动了北京中法大学、北京法文专修馆等的建立。1920年两次赴法，参加法国中法大学里昂学院校舍的建设，并进入法国里昂大学及巴黎大学（理科）习数学。1929年奉天易帜后，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并任辽河工程督办、葫芦岛建港总工程师兼港务处长。1929年又兼任国民党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1931年任东北党务办事处常务委员。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入关。1634年在华北水利委员会任职期间休假去法国，任里昂中法大学里昂学院院长一年。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任国民政府嫩江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1946年由齐市逃至沈阳组织嫩江省政府驻沈办事处，1947年兼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秘书长，1948年兼任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11月3日沈阳解放后被我军俘虏。

在八年抗战的时期内，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四川、广西、江西、福建等地；任务是领导华北水利委员会撤退技术人员，办理有关两省以上受益的水利工程。在日本投降的那年，即一九四五年

的六月间，我由福建乘飞机去到重庆接洽公务。在当年八月间正预备返回福建的时候，突然获得日本投降的好消息。返福建的计划变更，转而预备复员工作，筹划如何从速返去天津，如何收复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会址及如何推进会务，并同薛笃弼（当时反动政权水利部部长）谈商华北水利委员会复员及经费等问题。当时收复失地及接收政权等呼声煽起了东北三省（老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同乡们应运而生的多次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听到的全是一些有关收复家乡失地的空谈言论及某些人谋利求权的遐想。我因为自己有固定工作，故对这些事只能分一部分时间去参与，因之活动性比较落后，野心欲望甚小。当时在重庆东北三省人士当中传说着：接收东北失地的大员人选有吴铁城、陈诚、熊士辉等呼声。故当时我猜想这可能是为接收东北失地的某项问题要向我探问——因为我在辽宁省作过建设厅长并且在当时我尚负有辽宁省政府委员名义（当时在重庆有一辽宁省政府的组织存在）。同时我遇到高惜水（后来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他口中得知：可能是为出任省主席职位的事。因为他已有所闻，并有所接洽。后来我同熊士辉会面时，高惜水也在位。熊同我们两人说了若干客气话并约我们出来帮助他去接收东北三省失地。在当时他并未说明要我们担任何项职务，只说明是重要职位，也没说准是那个地方去。我当时的思想中就认为去东北家乡，由日本敌人手中收复回来失去的国土，恢复我们自己的政权是一件很荣誉的事。并且要担任重要职位，可能是省主席，对于发挥自己的愿（望）——在工程建设中有所贡献，为国家、为同胞们、为社会谋幸福——量有不少帮助。故当时就应允尽力为国家效劳，愿意参加到收复失地的工作中。不久之后，就得到消息，通知熊士辉出任反动政权的“东北行营主任”，同时在重庆报纸上看见行政院（反动政权的）的命令新任东北九省主席的人名，其中有任命我彭济群为嫩江省主席一项。由此就开始向各方有关系者接洽；

商研各省政府委员的人选；省政府接收人员的择定、名额的多寡、经费的数量、接收的方式等等。终日忙碌在同反动政权国民政府以下各院、部接洽有关接收的各项业务。在当时熊士辉说：去东北接收是收复政权，接收各机关；到东北后只须派负责人去各机关接管总职，故无须乎由重庆带去许多事务人员，伪满时的各机关组织未动，故接收后在人员方面，除日本人一概照专有规定办理而外，中国人全数留用，在一考核期间后再定去留、任用；各项属于中央政权管理的事项，如各大学、铁路航船、电信、司法、银行、水利、军政、空运等，均归中央各有关部、院、会等处所派专人接收；各省政府接收的是本省内的民、财、建、教、警察等。因此规定各省政府接收人员名额不得过大，随省地大小而有所核定。嫩江省政府接收人员数目归总为七十五名。为商洽人选消耗了不少的时日。除了向行政主管方面商计外，尚要同东北同乡商询。因为有多数同乡想返回家乡来，希望参加接收工作，故在取舍上颇费周折。最后根据熊士辉交来的合格人选提名介绍名单及各部会首长推荐的人名内择拟了省府各厅长、警务处长及秘书长的人选（秘书长可由各省府主席自选请任，故嫩江省政府秘书长黄恒浩是我自己选择推荐的），计有民政厅长梁中权，财政厅长宁向南，教育厅长苍宝忠，建设厅长暂空由我自己监理，秘书长黄恒浩及警察处长张维仁，经呈送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定后发表。同时并发表了省政府委员人名单，计有梁中权、宁向南、苍宝忠、黄恒浩，刘博及赵？中（一时想不起来名字）等。另外又由各有关方面探访、询问、选择，由我同各厅处长等分别约请了各位秘书及其他各职员。为了便利接收工作，熊士辉交给我们一些有关东北政治设施（伪满时代的）材料，备作参考。为了从速来东北接收，又因为当时的陆路交通不便，空运能力又薄弱，故决定每个省府接收人员分批由空运、水运及陆运北来。嫩江省接收人员经指定由空运先来十四人，其他人员再分批由水运陆续北

上。我是由重庆在一九四五年末（日期记不清了）携同梁中权、宁向南、苍宝忠、刘博昆、张维仁及曹建勋（后任秘书）、赵德厚（后任市长秘书）、董大年（后任民厅秘书）、金？（后任教厅秘书）、高福洪（后任建厅工程师兼秘书职务）、崔某（后任警务处秘书）、熊文洪（预拟齐齐哈尔警察局长）及韩清琦等乘飞机北来。当日抵北京停留一夜，又于次晨乘原飞机直飞长春。在北京的一宿间，除同近亲略会外，无所活动。到长春后住在反动政权下的东北行营所（在）地旧“满炭”大楼内。两三日后，听到东北行（营）先来人员的谈论，讲述当地情形及我自己目睹“满炭”大楼内上层资料室零乱情形，开始感觉到接收工作不会如我在重庆所听到的那样顺利，精神上受些影响，有些激动，不理智的发生一些不正确的感想。当时长春境内除了苏联军队驻在外，可以说尚有两个政权存在：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领导的反动政权（我是其中之一分子）。一切市政全待整理新建，社会上情形不十分安定，所以我出“满炭”大楼的时间，机会全很少。除了同苏联红军马林纳夫斯基司令部有所接洽、往来、应酬，同莫德惠及住在招待所中的接收人员接洽外，在社会上活动全无。在此时间内静待苏联方面的通知，好去接收。终日在作接收事务上的准备；商洽经费、规划组织、预备文稿（如宣言、布告等）、收集法规章则等，并接见由嫩江省区内来长访问的人员。此项来访人员在第一次会见时全系由熊士辉方面介绍。（我们住在东北行营办公楼内，我接见的人除由重庆来的人同我的一个远族晚辈（彭奇英）及远亲（李某）而外，我会见的人中最重要的一批是申振先（伪满时省长，当时尚在齐市任维持会负责人）、王玉堂（齐市商会会长）、董子佩（伪满建厅厅长）、孔玉书（齐市商界代表）及其他人等共计七八人左右（其中或有法院代表一人，我记不清了）。申振先等表示：代表嫩江省各界来向东北（行）营报告情形，

并同时欢迎我们早去接收省政 。当时我问他们 嫩地各方现状如何。他们答称（谈话大意如下）：于毅夫主席领导的嫩江省府已迁去甘南，齐市内急待人去接收、坐镇；各外县亦皆照常，八路军(当时的称呼)未到，也没人接收。我问他们有关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等情况。申振先等人答复说（谈话大意如下），政务停顿，各市县由维持委员会暂行维持，公物文件均严密保管；省库净空，但经费尚可想办法筹借；学校均已停课，尚未开班；各公家经济组织，各合作社等已不办业务，静候改组；银行停闭；法院关门；市面萧条；铁路、电信方面除苏联军用而外，客运、商店、民邮现停，……等语。我问他们在公用事业方面如电灯、电话等情况如何。他们说电灯 、电话在市内尚有部份放电 、通话。当时我就要求他们（ 谈话大意 ），要他们早些回齐齐哈尔去，尽力继续维持市面及各地 ，静候我们去接收 ，要他们同住在“满炭”楼内的财政特派员、交通特派员、司法特派员、教育特派员等接头，请早派专人随同省政府接收人员去嫩江接收；要他们爱国家，信任政府（指反动政权国民政府），帮助政府；要他们在思想上信仰三民主义，研究三民主义，要他们安心工作，在我们将来接收时多多帮忙，不要担心惩治汉奸一层，政府（指反动政权国民政府）是会宽大的，我更不会违背法令同你们作难的等语。他们同我商谈后，经我安慰了几句话，就别去了。我又接见过当时在齐齐哈尔市电报局的负责人（姓名是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他带有苏联军事当局的证明文件。由他的口中听到一些有关嫩江省当时电政情形及现状。他说（谈话大意），现在齐市电报电话局（当时是否总称电业局记忆不清了）由他维持得很好，他是技术人，原局长走了，由他负责管理电务，业务方面电话尚能通 ，电话机号码机有 一部份被苏联方面来人拆卸走了，现在所余的电话号头除去机关同苏联军部使用外，商号尚有几拾号；电报机可使用，但是现在不能通电；广播电台已停播，

缺乏零件，不易修整等语。我安慰了他，并嘉奖他几句，要他回去继续维持，不要令电机等受了损坏。我接见过丁广文。他说：他在嫩江省及黑龙江省 两地区有二十万武装民众 ，他自己是被推任为总司令的，能指挥他们那些武装民众，将来接收人员到来后，他可以帮忙、保护；我彭某人去到嫩江时，他更愿意相助保护。同丁广文一齐来与我会面的尚有一赵某，据丁广文说是他的参谋长，老黑龙江省人，家住在齐齐哈尔。我问丁广文他的那些武装群众驻在地点。他答复的是：驻在齐齐哈尔、克山、北安一带各处分散全有。我因为听他的口吻太大，不敢接近，我要他早点回去，好好组织起来他那些武装，不要扰民，静候我们不久去接收，好一同合作帮忙；如果他需要经费及军械物品等须向东北行营熊士辉那里接洽商拨，我领导的这个政府力量薄弱，不能为力。我会见过一自称是齐齐哈尔铁路局长龚某(记不清姓名)，他到行营访交通特派员，顺便看看我；我问他一些铁路上的情形，他答复的是：商运虽然没有，铁路上尚无大变更，只是缺乏经费等语。此外尚有几人，因关系不大，当时印象不深，情形模糊。只其中之高志民 （名字记不清了，铁岭县人）， 见面时自称是同我的外甥张槐荫在铁路局的同事 ，他说张槐荫本想同来会我 ，因有事没来；高自称他能帮我的忙，因为他与光复军（即尚其悦等领导的不法武装组织）有关系 ，将来我去到嫩江后 ，他可以帮忙相助。我当时答复：将来定要借重，并要他早一点回去相候。尚有一某某（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他后来曾由我主持的嫩江省府发表他为洮南县或白城子一带的某一个县的县长名义）。他自称在洮南一带有力量，他是国民党党员 ，在伪满时代 ，他是地下工作者为国家曾有贡献，此次来长春有事向行营接头，藉便会我，向我报告那边的情形。我答复他：希望他继续为国家出力，将来我派人接收嫩江省南部各县时，要他帮忙，目前如有消息可送给熊士辉转给我。在长春这次住有二十天左右，因得不到苏联红军司

令部的关于可以去接收的确切答复，奉令撤退。随即乘飞机携同原来之人员返去北平，在北平等候时局的演进。撤到北京后，我回到我家居住（我在北京有二十三间祖遗的住宅），省府同事们住在招待所（东华门里），后迁至象坊桥旧议院院址居住办公。当时我们第二批人员尚未到北京。在北京停住期间内，重大事务无多，紧急烦琐事务仍然不少。筹发办公人员生活费用，催促留滞重庆人员快来，筹商接收办法，商讨党政工作如何联络——如党（指国民党）委人选省政府主席是否兼任；各地党部何时成立等。经几次开会商讨，议定有关党政工作两项，即决定省政府主席不兼党务委员；东北九省党务（指国民党）由东北行营主任熊士辉统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洽会商解决之，原在各省省党部尽可能缓期成立，俟省府接收后再成立党部，开始办公。此后一项作为一项建议，由熊士辉向各有关方面洽商之。我在北京住到民国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又奉令再去东北接收，随即乘飞机及原来之十四人再到长春。在长春仍住"满炭"大楼。二次飞到长春后，知道苏联军司令部已同意去接收嫩江省政，并允协助。故赶备一切办公用品，领取经费，请拨卫队，商洽车辆（火车）等事。这次住在长春只有几天的功夫，会见嫩江来人无几，我尚能恍惚记忆的，似有：丁广文、高志民等。因为就去嫩江接收，故未作细询详谈。后经熊士辉俄文秘书向苏联军司令部商洽妥当，允拨一列火车送我们先到哈尔滨，随后再拨车辆运送卫队。我同梁中权等携带公务会同莫德惠等及松江省政府接收省政人员关吉玉（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职务）等一行同车去哈尔滨。留下张维仁偕同警务人员等候带领卫队连随后来哈。我们到哈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车站前有许多人欢呼，杨卓庵也到站相迎。杨卓庵在当时任哈市市长（也是反动政权任命的），他招待我同关吉玉住在马子元的家里（马子元据说是在中国银行作事的一个亲日汉奸），我们同来的人住在海关办公处楼上。我在马家

住了三四天后，也搬到海关楼上去住，同我来的一位苏联军派来护送我到嫩江省去的联（络）官也同我住在一起。我到哈市后就开始同当地驻在的苏联军事当局接洽车辆去嫩江。三天后张维仁带领熊士辉派来的一连卫队及警务人员到哈市。张维仁领来的卫队连长王某来见我。我要他同他带领的人们严守纪律，效力职责，到嫩江后不要有扰民的行动等等。王某答应了。我在哈市的那几天里除了同苏联军城防司令及铁道司令、地区司令等应酬外，同本国人来往不外乎省府、市府中的接收人员。在那里接见过由齐齐哈尔市来的欢迎人（有三四次），他们的姓名我未记住。在哈市我们商定做了保安警察的臂章千数来个（记不准是五百或是一千），备作到齐市后编组保安警察时使用。苏联军城防司令请我吃饭时，告诉我：他为了帮助我接收便利计，由他再派一个联络官同我去嫩江，如有事时，可由长途电话来联系——这位司令官在抗战时期到过重庆等地，对中国情形熟悉。在我离哈市前两天，他说的那联络官来见我，我留在我处同马林纳夫斯基元帅派来的那位联络官在一起。所以我去嫩江时，有两位苏联军联络官同行。由嫩江来欢迎我们的人们中又看见了那龚某。可是后来这位龚某没回齐齐哈尔去。我们由哈市乘苏联军铁路司令预备的专车去嫩江。在到昂昂溪换车之前，在车中会见丁广文，他说是来迎接我，并随同到齐市去，——后来我才听说他是坐在警务处人员车厢中跟来的。在昂昂溪换乘由齐市铁路局预备来接我们的专车。这列专车是由铁路局一位处长（姓名记不清，好象是姓王）押运来的。同车来的有由齐市来的欢迎代表三个或四个人。他们说：大家已经等待一天了，从昨天就出来欢迎。因为就要到齐齐哈尔了，大家互相应酬几句话，未作深谈。火车到齐齐哈尔时，车站上已排列许多人在等候相迎。我下车后，申振先首先进前招呼，并领导来的欢迎人们呼欢迎口号，当时向我介绍了些人（他们的姓名，不记得了），其中有一苏联军官。随后申振先领我

到站内候车室小憩，并会见各界欢迎代表互作寒暄。当时人多时促，喧声甚烦，现时情形已经模糊不清；其中使我注意的是在候车室人群中有一和尚。由车站乘坐申振先坐的汽车(当时省府公物中唯一的汽车)赴省府所在地。一路上受到排列在马路两侧的各界人士的欢迎。汽车把我送到旧城城内前省府官舍休息。我们的人陆续坐马车来到，申振先等已赶来招呼，备了两三桌酒席为我们接风。当日就住在那所房子里。在那个院落中有三四所小楼，我住的那座据说是万福麟在齐市时修盖的。随我同来的：刘博昆、梁中权、苍宝忠、宁向南、赵德厚、曹建勋、董大年、金？、韩清琦等住在一齐；张维仁领着熊文洪、高凌昭及警务处人员另住在后院一座平房内；当时尚有交通特派员（反动政权派的接收人）派来接收电业局(？)电力局(？)的两位，临时也住在一起（后来搬到哪里，是不是电业局内就不道了)。我们是当日上午到的齐齐哈尔市。略为休息，就告知申振先要他即日通知苏联军部方面(因为当日苏联军方面尚承认申振先等是嫩江齐市行政负责人）说我已到来，拟日内就职接收政权，并希望同他们在我就职期前会面，请他们约定时间（指苏联军负责人）。并同时要申准备交出。我记不清是当日下午或是次日上午（多半是次日上午）同苏联军事当局会的面。我去到他们司令部谈话时是由赵德厚任翻译。会苏联军城防司令时有张维仁及熊文洪同去；同苏联军地区司令谈话时有张维仁同去。同时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同来的负全省（警务处长）或市区警务（警察局长）责任的人。在齐齐哈尔当时尚有一位苏联特务司令（这个翻译名称不知对否，当时全以此名称呼）因为未在市内，故未会见。我们的谈话着重三项问题，即：政权的接收、治安的维持 、保安警察的编组 ，同时并决定了接收外县的办法——有苏联军驻在的地方由他们派员联络。我到齐市的第三或第四天举行的就职典礼（我以前记得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细想起来不对，应当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几号，因为我记得在齐市

住了三个月，在四月二十几号撤走的。）我们就职时，参加典礼的人除了省府旧有工作人员及各界代表等，客人方面有苏联军地区司令官，城防司令官及其他军官十余人。在各界代表中使我注意的是一位外籍天主教传教师。在举行典礼时，我们讲话后，苏联军地区司令官讲话致祝辞；申振先等致了祝辞。会后举行了招待茶会。即日开始政务措施：发表布告，派熊文洪接收市警察（局），逐步由各厅长处长等整顿业务。我终日忙于设法展开接收工作，同苏联军事当局洽商有关事项。筹备开学，进行编组保安警察大队等事，也占用一部时间设法筹款。此外即同各界人士会谈，筹划如何安定局面，谋划如何恢复公共事业等，因为国民党党务负责人韩春暄（反运派派来的嫩江省党部主任委员），交通特派员、财政特派员、司法特派员等未来，所以有些人来找我商洽有关党务、电政、路政、银行、司法等问题。当时事务烦杂，现就我可能回忆得来的分别记之如下：

（甲）民政方面：

当时接收政权及机构、财务、公产等，须通知苏联军部得其协助或经其承认他不占用时，始办理接收。同我来的人共总十四人（由重庆来的）不敷分配，故注意选择人。想训练一部份县长人材，又因缺乏教导的人同书籍、资料等未办成，后来停下了。派赵德厚接收了齐齐哈尔市政府，并由赵任市长；市政府原来工作人员未动；市政府迁移了地点办公——在一所苏联军交回来的楼房里。派高志民接收了龙江县；高说：他有一部武装民众可以维持治安（后来据报告说这一部武装被苏联军缴了械）。派不出人去接收，遇有外县地方维持会的人来接洽听命时，就暂派他们维持，与以暂行代理名义，拨给五万块钱作为支持费（希望他们不要借名捐款），如泰来、景星、林甸等县。在蒙旗方面，托鄂某（名？）及包（名？）（当时他们在齐市住，在我那里担任一名义）等向杜尔伯特旗及伊克昭盟（按，应为依克明安

之误，下同）转达我的意思，要他们听命。因此鄂、包等要求我在省府组织内成立蒙旗厅。我因为限于组织法令，没答应他们的那种要求。伊克昭盟来过人请接洽，我给过他维持费（大概是五万元）。有人说可以同杜尔伯特旗接头，我要他们去办，后来没得回音。我召开过一次市民大会。因为天冷，大会是在一家戏园内开的，我门席讲的话，要求他们安心作业，拥护政府，协助我们执行接收工作等语。我招待过文艺界人士，要求他们改进他们的旧有组织，作有利的宣传。我召开过慰劳爱国志士茶会，招待在伪满时代被日本人捕押过的国人志士（大多半是铁路上的职工）。在宗教方面，天主教齐市主教胡某某（他是法国人）访过我两次，参加过省府的及各界的聚会（如就职、春节、各界代表招待宴等）。我们谈过话。我告诉他说，他们可以安心工作，我一定依法保护他；要他帮助我，不要故意阻碍了我们的接收工作。他要求我准许他们办的学校开学（女子中学及小学）。我答应他我同意；要他同教育厅接洽，依照规章办理。我曾回（忆）有一次，由于几个挪威国籍的基督教传教士（东北三省各地的，以在沈阳者为多）撤走回国，经过齐齐哈尔市，他们来访问我，来见我的两人说（谈话大意），他们一共有二十左右人在齐市聚齐，现已全到市内，待车去满洲里，他们希望来见我，向我致敬，要我约定时间。我当时约定在次日（或两日后）的下午招待他们吃茶。当日应约来的有二十左右人，其中有女子两三个，还有两个小孩。我问他们撤走的原因。他们应答说（大意），战争才停，教务在半停状态，他们有的多年未返国，今借此时机一道回去；已将事务交给中国传教士继续办。我们在一起吃了茶点，谈了些挪威国的风景及情况，而散。拜（访）过他一次，到他们的宿舍去看他；曾借看过他有一本法文字典类的书，后来送还他了。在基督教方面，我没有看见过齐市的外国籍传教负责人；我接见过基督教代表（中国人，他们的姓名记不得了）。他们没有作个别的要求，只求

我保护他们的工作。我也答应了他们，我一定依法保护。在佛教方面，就是那个和尚——去到车站接我的那位，来访我数次。他的法名我不记得了（或是“德一”）。他说他是铁岭县人，俗家姓杨，来齐市没有几年，现在某寺居住。他同我谈他们庙产的事，求我帮忙。我没答应管，要他向市政府请求去。他又谈到他对共产党方面情形熟悉，他同于毅夫省主席能说话。因之我就要他把我们这里的设施情况，同我的意志（谈说大意）：双方统是中国人，为求国家的富强最好不要互相争夺，应当静候和谈的成功；我更希望能同他面谈等等传达过去。可是后来未得回话，我才想到杨某是在骗我。为便利市民的交通，我们曾设法恢复民邮、民运（火车及私商汽车），但均未办好。为探询社会上各宗教信仰的概况，我曾接见过一朱某。他说他是卍字会或道德会（记不清了）的代表，他是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某（此人年龄已大，在早年曾作过省议会会长等职）一道来的。李、朱二人同我谈过，说他们可同甘南省政府方面（当时于毅夫主席领导的嫩江省政府住在甘南）接洽，可以作我们双方的中间人，能促使当时省内存在的不安情况安定下来。我当时认为这是很紧要的事，如能作到确是很好，所以就托他斟酌办理，后来也没有得到结果。我们参加了齐市中苏友好协会，我们改组了当时旧有的中苏友好协会，由省府拨给了少数的经费，并继续推李某作会长。我要求苏联友邦人士也要多多参加作会员。我们出版了《嫩江日报》。限于物质条件，报纸篇幅不大，印刷不良。因为刘博昆从前在新闻界作过事，就由他负责主持名义，由李化民实际负责办，后来刘离齐市去沈阳，就全交李化民办下去。报馆经费暂由省府垫借。各县有时来人，接洽局部问题，均由民政厅办理，细节不详。当时住齐的日侨尚在苏联军管理之下，故未办遣送。

（乙）财政方面：

我们由长春到嫩江时，带了四百万经费。到齐市后用款之处

甚多，携款数小不敷开支甚巨。当时除在齐市内筹款外别无他法。申振先等交来一笔帐，存款则无。当时公营事业停摆，公家物资已无，且各处皆来正式接收不能处理，变成现款。所有用费须仰仗由长春拨汇。又因交通不便，运现款不易，遂在齐市局部开徵捐税，勉强使银行开门。银行开办后（系以前伪满时之中央银行改业），藉向外汇兑办法（在齐市收现款，在哈尔滨交汇款之办法），收集一部份现款。此外又向齐市各界富户商借。为应付公务人员生活维持费、警款、接收用费及其他各项开支，我们召集过——在一次请客宴会中——申振先、李某（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王玉堂（商会长）、孔玉书（富商）、鄂某、赵某（富户）、庆七、庆八（富绅）等等（尚有其他人士，记不清了），商借三千万元，要他们帮忙设法；规定的拟借数中不要拿小凑大，要每份在五万元以上的，后来借到只有几百万元。原拟要孔玉书拿一千几百万，可是他只借了百十来万。在征收捐税方面，我们削改了伪满时旧额，免除了多项种类，收进数目甚微。由汇兑方法调进一部现款。想由财政厅发行暂用票券，后来没作成，没办。公产未变卖筹款。财政厅在我住的楼前街一所房内办公。

（丙）教育方面

在教育方面，我们设法使各学校开学，开办了一次师资训练班，召集资格合适的各校教员，给以短期训练。训练班在开学时同结业时，我去给他们讲过话。我要求他们（讲话大意）：要熟悉业务，要研究三民主义，要信仰三民主义，要忠于国家，要以身作则等。当时开学了两处或三处学校。天主教主办的中学也开了学。我们组织了青年、儿童节等大会。我每次均到会讲过话。我对他们说（讲话大意）：要他们好好用功，要爱护国家等类的话。青年节是在一所大房内、儿童节是在龙沙公园内举行的。社会教育也商定设法进行。至于如何作的，我未注意。只记得看见了第一批协和语名称更正表，例如：出张、采用……等等用国语

说应当用出勤、任用或录用等等。

(丁) 建设方面

毫无设施。新市政府的改装是唯一的建设。收复电信交通，同电灯厂的整顿是当时的最大任务。

(戊) 警政方面

省政中民、财、建、教四大项工作内以警政为主要政务之一。警务原归民政厅管理，因其重要提高一级，组织一处来办理，归省府直辖。由民政厅督导，当时我们训练了一批警务人员，备作将来接收各县政府及齐市警察整顿、改组时之用。训练时间约有一个月之久；在开学同结业时，我也去讲过话。我告诉他们说，要爱国，要爱民，要忠于职守，要廉洁，要公正，要熟悉业务，要勤慎勇敢等一类的话。这批人员是由张维仁等选择训练的，我是在市警察局内同他们讲的话。为协助接收，据据在长春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反动政权派的）同苏联军总司令部的协议，我开始同齐市苏联军事当局商洽组织保安警察的事。原定名额为三千名，因编选困难，直至我离开齐市时止，正式点名待编的只有一千几百名（一千六百？）。我因为缺乏军械曾同苏联军地区司令洽商拨用他们缴下日本军队及伪满军队的军械，为求集中驻训保安警察，曾向苏联军商洽接管旧兵营。这些商谈均未得结果。为招训品质较良的警士，曾向苏军接洽接管他们解除武装的伪满军队士兵编为保安警察，也没得结果。故而在编组保安警察大队时，虽然告戒警务方面要谨慎，要挑选，要重质不要图量足，可是办的仍然不好，我对人民反而造下罪恶。在当时有些人来会我，谈些有关组织保安警察的方法同如何借用武装组织保护去各外县接收政权的建议。我会见过尚其悦，他说他有军队（即指他那不法武装组织"光复军"）可以帮我；会见过一张某，他说他在景星、富拉尔基一带有武装群众愿意归编为保警；又会见过龙某、王某、高志民等，他们不是表示有武力，就是说能号召，愿意帮

忙。除了尚其悦的来头太大，我未敢加可否，其他各人我要他们继续同警务处洽商一切。我们编组保警时大半是就他们一群中挑选一些。同我一道来的保安警察大队副队长高凌昭，他是龙江县人，地方熟悉，经他招致了几百人。由安广来的陈某带来几十名（该县旧有的）武装警察。我当时没有武器的来源，没有购军火的经费款，组织保警队遇到若干困难，阻碍，就这样零零星星地选择了一千余名正式登了记，静候编组训练。由泰来退下的几十名旧警察说来，后来没有来到，他们送来了五名（记不准了）被俘的八路军（当时称呼），要我法办，经我交警务处问询后，戒告一番，释放了（我未亲自见过这几个人）。在业务方面，筹备拟议了将来随同各县长去接收的警察人员（即训练班中之一部），整顿了交通警同户籍警，编制了手枪队，便衣警察等。当时苏联军队尚未撤退，我们编组保警事同他们须取得密切联络，因为他们负有保持地方治安的任务。有几处的经警务处接洽有了头绪的武装力量，在来齐市途中被苏联军队缴了械。故我们决定，免除误会，先发给经洽选待编的保警肩章。经同苏联军部商妥后，我们将预备将来正式保警编成后使用的臂章发给佩带。可是不久就发觉有了流弊——发生了假造。我当时就叫警务处赶快更换臂章。但是流弊未能杜绝，冒充仍然还有。这样一来，正式登记待编的保警尚不能集中训练，零星分驻在市商营旅店内（当时按天给房伙费，付店价），管理殊欠严密，再加上假借名义，或冒充混进市内的不法武装在市面上活动，使社会上受了惊扰，不能十分安定。当时以及日后，人民因之受到了祸害，是我的罪恶所造成的。当日我为保持地面上的安定，同我们自己的安全计，我曾告诉警务上，说（大意如此）：我们来接收遭遇阻力甚多，在政治上现当和谈时期，重要问题待双方中央来商定，但我们行动也应当秉承和谈之目的来进行；我们要维持地方治安，不准扰民，不准招事，也要在已接管的地区内制止扰乱治安

及危害我们的阴谋行动或人物，可以破获之、逮捕之，但一切行动中，不准有流血事情，所以在齐市有过几次逮捕人的事情。有一次在四月中，同时逮捕过百余人。在逮捕的人中，听说有共产党员及同甘南驻在的省政府（于毅夫主席领导的）通消息的活动人物。警务处向我报告过，可是没见过被逮捕的人。当日有人来告过密，我交给警务处去核办。为修理破枪支及车辆，同时维持一部份铁路技工的生活，我曾找铁路工厂代修枪械等。当日苏联军宪兵昼夜出勤查街，同我们警察查街工作有时不能配合。为此，我同苏方洽商过合作步骤及方法。

（己）各训练班之目的

我们到嫩江接收人员数目极少，须用原有各机关旧日人员。故为改进他们的思想与认识，为审度他们的才力，测考他们对主义的认识及信仰等，极需尽速训练人才，故先开办了教师训练班同警政训练班。因时间急促，所以训练时间甚短，大约在一个月左右。在训练中重要事项，是要他们对国家的认识，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对业务知识的改进，如何执行职务，如何防止反对我们的人们危害我们的动作（专对警务说）等等。这里当然谈到要防止共产党局势增长的错误指示。我同他们讲过要自卫、要自保、要避免流血。

（庚）关于国民党党务方面

韩春暄没有来齐齐哈尔，党务（指国民党说）方面没人出头接洽，因之有许多人来找我谈党务。我未负嫩江省党务的任何职务，对一切党务计划毫不清楚，对各项问题不能作答复。但因为自己是党员，当时又是地方省政负责者，又不能、也不应当推卸不问，故就在职权内尽力之所及者及时应对。据他们说全是些在伪满时代的地下工作者，爱国青年志士，对情形熟悉，有勇气，深爱国家与民族，我是初到嫩江，情形生疏，极盼有人协助，故对于他们也怀存希望，即尚没能使他们帮助我，对公对私是有益

的，我现在记得的同我谈过话较多的有赵岳山，他说他是（地下工作时代）党务负责人，他说有不少党员由他指导；丁广文也来谈一两次；尚有一张某、季某、刘某等来谈过；其中之刘某他说他是老国民党党员，同赵岳山及关某等不是一事，他在教育界有部份力量等等 。对于他们要求维持费事及党部挂牌子事 ，我答应，我要他们等韩春暄到来后再决定，我没权办。我劝他们要合作，应当团结在一起 ，不要自相争夺削弱了力量 ，令党外人见笑，乘机取利；尤其是共产党当前，组织严密，势力日增，我们更当努力自强以图救国。我曾对来访的人们当面劝告他们团结，也曾对他们说要他们帮助作接收工作，及采得消息（指市面上各方对接收人员的看法、动作同共产党方面的活动情况等）后告诉我知道。少数的维持费用 ，我曾借拨过一些——不过几万块 。因为我知道梁中权同苍宝忠他们 兼省党委 （国民党嫩江省党部委员），所以要求梁中权帮助我多同他们应付，以便免除他们多来找我，减少麻烦我的机会。他们经我劝告后，是否真正作到互相团结，及有无具体统一组织同如何组织的，我当日未理会到。总之在当时我所体会到的是：他们当中可概略分之为三派，即"党专"、"复兴会"及其他等三派，其中以赵岳山似乎比较有力量。我同赵岳山接头、谈的话比较也多一点。有一个关大中（是否这个名字，记不准了）据说是"党专"负责人，可是我在齐齐哈尔时没有见到他——后来在沈阳时，会见过他一次。高××是在铁路局作事，他对我表示他同不法的武装组织" 光复军 "可以接头，因为他同尚其悦同过事（在铁路局），他能要"光复军"不来侵害我们，他说他是党员，在铁路局里的党员（指国民党）他能领导。所以我曾要他作局内党员的团结工作。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土光复以前，在嫩江省是没有组织与活动的（据我听到的）。在我到嫩江后也没听说有什么发展。虽然我知道刘博昆兼青年团嫩江负责人，我没有问过他。我只在张槐荫口中听到他们

要加入团（是在问我对他加入团的意见谈话中）。

（辛）司法方面

司法特派员陈某（名记不清）未来。法院不能开庭，囚粮无法拨给，法院在银行有小数存款提不出来，人员生活无法维持；有些案件也不敢处理。为解决这问题，我负责准许法院开庭办案，着银行付给他们的存款，我另拨了些囚粮。当时法院负责人李某及另外一人（检察官类的人）来会过我。

（壬）银行、电政、铁路等方面

各有关接收特派员没有来。除了交通特派员派了两名电务人员（一个姓姚，另一个不记得）随我同来接收了电业局及电灯局而外，别的方面没有正式接管。电业局同电灯局（名字或为电灯厂）因为即时要用，我同苏联军部商洽妥后，接过使用，同时仍供给苏方用电——电力同电光。原先去长春同我会面的那人，后来因为贪污电业器材被送押，电业局事还由姚某管理。我需要一调拨款机构，即着前伪满"中央银行"负责人李某恢复营业开始对外汇兑并兑红军用券。用旧有银行行址，及工作人员改组成反动政权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嫩江分行，即用中央银行名义开门。我在齐市后段时间内所有用款即仰仗他来调拨。我要求熊士辉拨款存在哈市中国银行内，由该银行见嫩江中央银行负责人签名票据支付。用这样办法，我调拨了现款。该银行是由财政厅监督。在我离开齐市时，我把我调拨的同向市民商借的存款数目提出来了用，我把人家私人存款留在银行库里了——数目可能小有出入，但不会大。银行人不知道我们撤走，他们可能推想我骗了他（因为有人向我这样说过）。私商银行也有一家开了市。在铁路方面，我没拨给款，我帮他们设法开行客票车，也只通行两三次就停止了。

在整个政治上来说是一无成就的，可是我们能力有限不会作出更好的工作。这样工作之外，尚有当时政局的情况要我预备应

付的方法。当时苏联军队要撤退，虽然说改过期，后来知道要在四月二十六号（记不准了）撤走。杜聿明的军队在苏联军撤退前不能来，撤退日恐更难赶到；熊士辉来电报，要我在苏联军撤退时接管防务，接受苏联军交回的营房住舍及其他产业。我为应付接收工作之繁重，维持地面治安及我们自己的安全的需要，在财政、警务及情报工作上加紧了工作。我向孔玉书等富商借款，我加紧了保警的编组，我在齐市作了街中防御工程，我告诉国民党员组织起来帮我通消息情报（指对社会中同共产党方面的说），我告诉铁路方面（当时自称局长的不是在哈尔滨来会我的龚姓某，而是一位姓刘的）车辆要听我调遣等等。同时我电熊士辉要杜聿明军队在苏联军撤退时赶到。几经电商，终无详确决定。我曾向熊士辉处表示（大意）：我不甘心将同我来嫩江省的一些无保护，也无自卫力量的人们留在我的面前看着他们束手待毙。我当时测度，可能要在苏联军撤走后，我们须努力突围撤退。及至四月中旬左右，我探询过苏联军地区司令官的口气，我问他说：如果我要送我的几个人员走，去哈尔滨，他能不能帮忙坐他们的火车（当时只有军车能通）。他答复：他要请示他的上级。赶到二十号或是二十一号那一天上午，苏联军地区司令官独自来访我，到我的住处来会面。他告诉我说：他奉到马林纳夫斯基元帅的电命，他送我及同我一道来接收的人员，不包括卫队，即去哈尔滨，他就通知铁路司令为我们备车。这个消息对我是突然而来的，因为以前虽有这样幻念，可是预计为时尚早，幻想在苏军撤走后也许准我们撤出。当时因为我尚未接到电报，故答复他我们未奉撤令，不能走。我们商谈后，决定同我来的人可以即时乘他为我们准备的火车撤走，我同警务人员俟接到电令后再说。当时我们正同苏联军长春来的一位军官商议开欢送苏联军撤回国去的大会，拟在龙沙公园内举行。那位军官希望我出席讲话，故想不到就走这一层。当天下午，我接到中国军事代表团转来熊士辉以

行营主任名义来的电令，要我带领原来人员即刻撤哈尔滨。所以我就又通知苏联军司令官我已接电令撤走，但因开会的关系同市内治安的关系，我留警务处处长张维仁带领警务人员后走，请他保护他们。我因就要走，遂告诉张维仁：我们当时拟议在苏联军走后，我们成立戒严司令部的计划取消；要他代表我出席欢送大会讲话；要他设法布置将来通信的方法，要他派保护苏联领事馆的二十名警察——他们要的等，我与他留下六百万上下现款，并将管翻译电报的韩清琦留与他帮他的忙（因为韩是嫩江省人，对地面熟悉）。不记得是次日或是后一天的晚间，我带同（当时刘博昆、梁中权已先走了）苍宝忠、赵德厚、宁向南、曹建勋、董大年、高凌昭、李化民、张槐荫及姚某（电务人员）金某（教厅秘书）及其他人等三十来人乘坐汽车赴昂昂溪，再换乘火车到哈尔滨。我们离齐市前对外界未发表；走时由苏联军专车送的，故很秘密，市里无人知道。离开齐市第二天早晨到的哈尔滨。中国军事代表团派人接我们到松江省府招待处住的（在马子元家）。在那里住有三四天后，我们省府十四名同松江省政府关吉玉、哈市府杨卓庵、中东铁路董事会的刘哲等伴同军事代表团董佩卿等共约六十多人乘火车赴苏联，到海参崴候船。在我离海参崴的前几天，张维仁、熊文洪等一行六七人由赤塔乘飞机赶到。我们遂一同乘苏联海船，经日本到上海。我们到上海停了两三天就去南京向各有关方面报告，并电熊士辉告我行期。遂又由南京同飞机到北平。在北平小憩，等待由上海回来的人到齐。随后又一同乘火车来沈阳。当时黄恒浩已率领一部由重庆乘船来的省府工作人员早到了，他们已在沈阳中华路中南路的一所房内，成立了"嫩江省政府驻沈办事处"。因为那所房子较小，我们到后，房间不敷分配，就又分在三四处办公。省政府委员增加的军事委员是孙麟同王兆昆（名字记不清了）。同时成立了嫩江省保安司令部（在沈阳办公），由我兼任司令（规定省主席兼任），由孙

麟任副司令管理编组及训练保安队事务，并筹备再度接收嫩江省政及进驻齐齐哈尔事项。我们编组约有五六百人驻在长春附近。由孙麟去长春点编过这些人。原拟定每省编组一千五百人，当时因困难太多（如军费军火等）进行甚慢。后来陈诚来到沈阳拟即取消此项办法，在改组省政府编制时，就同时取消了它。省府留下一连卫队外，其余人员均交与反动政权军事当局直接管理了。

省府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的人在一起，教育厅人员、会计处人员、警务处人员另外分在三处办公。我是在七、八月间到的沈阳，自那时起（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间这一段时间里，无重要事情办，可是烦琐零碎事不少。其中比较重要的事，自松北联立中学在长春的成立、省政府的改组，增加军事省委两名，缩小省府编制，及办理救济难民等等。除此而外，办理一些例行公事。在这一时期内，我们曾由警务处派人去嫩江探听，采访那边的施政消息，我曾接见过由齐市来的人，谈询些当地情形；会见人里比较重要的人是王玉堂或孔玉书（或者两人全会过，记不清了）。到当年九月间，行营改组为行辕，陈诚来接熊士辉的职务后，陈诚约我兼任行辕秘书长（反动政权下的），我就又到行辕办公。当时省府办事处的职务交给黄恒浩多负责，全权处理。当时行营旁面有两个政务组织，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经济委员会”。在行辕成立后，这两个组织合并成立为“东北政务委员会”。我的任务是作行辕同政委会的联系工作、同办理行辕内的非军事性的事务。当时重要事项是平抑物价，惩治贪污（当时的所谓贪污）及稳定货币等项事务。后来行辕结束，我办理结束事务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底始毕。卫立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前后来到沈阳成立“剿总”，另找吴汉涛任该总部秘书长，并要我兼任政委会常务委员，在政治上帮他一些忙。我在四月底办完行辕结束事务，我去南京、上海看陈诚当面报告交

待情形。七月初旬又回到沈阳，每日到政委会办公。因为会中政治同经济两部事情有人多负责，我的工作比较清闲。当时嫩江省府办事处仍由黄恒浩主持。当时战争局面愈来愈紧，人民解放军势力日增。在沈阳的同我一样的反动政权下的许多官吏及各界人士纷纷飞走，市面不安现象愈重。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记不准了）卫立煌通知我：要移地办公，要我们三个政务常委同他一道走。在二十九号（或是三十号）那天上午，我轻装到剿总部伴同卫立煌去东塔机场。我们同行的有高惜水、王家桢（两政务常委）赵家骧（参谋长）。到东塔机场后，在等飞机来的时间内，陆续又来了不少军政人员。飞机来了一架。卫立煌登机后，因为人多，我自己手脚又不伶俐，没上得去，摔下梯子来。飞机走了，我诚心想逃，没有逃得了。当日除了又一架运物机略为一停又飞去后，没有再来机。我随乘车回我的住所。后来政委会的职员要我去政委会大楼内住，我就又坐车到政委会（已在深夜了）。在半夜里，他们叫醒了我，说有消息飞机就要到，要我去东塔机场。我就起来，坐车到机场。在那里候了一天，也没走得了。晚间回到家，黄恒浩来看我，说他就走，并要我同走。我当时因为摔伤了后腰，行动不便，就叫他自己走吧，我不走了。当晚我家已无被褥，遂去中纺公司职员宿舍借住。在十一月二号那天，接收中纺公司一位姓王的行政来接点房物。我就告诉他我是彭某。他叫我在那里等候处置。三号那天他又来了，还有另一位同来看我。我把两支自卫枪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走了。到了当天下午，来了两位武装同志（有上午来过的那一人）约我去军管处。我随他们转了两个地方，后来转到铁路宾馆，后来又把我送到公安局，把我逮捕了。

由重庆同我到东北来的接收人员中较重要的人物有：

（一）省委兼秘书长黄恒浩。他是凤凰城人，年五十多岁（指当时的年龄），在民国十八年时，他任辽宁省财政厅秘书兼沈

阳税务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省府撤到锦主办公，我们任他兼代省府秘书长职务。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后，省府撤到关里，停止工作，黄就转去南京（当时我们无联络，他的详情不知）。他在东北中山中学作过事。抗战期间，他在四川重庆、广西桂林等地经营商业。他是国民党员，他同齐世英接近，齐接近陈立夫，故黄在党内彩色接近二陈。

（二）省委兼民政厅长梁中权。他是通化县左近人，年四十多岁。我在重庆组织嫩江省政府时才认识了他，他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政治学校教课，他在山东、江西等省任过县长（熊士辉任江西省主席时），他是国民党员，接近二陈。我们来嫩江时，他兼任国民党嫩江省党部委员。在沈阳解放时，他在沈阳。我在密山农场劳改时，在工作时遇见了他两次，在我离密山前，听说他已改造期满，被释放回家了。他可能回通化或去山东省他的老家，在齐齐哈尔尔时，关于党务应付由他接头时多。

（三）省委兼财政厅长宁向南。他从前作过张学良的秘书，在我们撤进关去后，张学良去欧洲，他也转到英国念书，学经济；抗战军兴后不久，他回到重庆，曾被戴笠等捕去押了些时，释放出来后，转到银行界作事。我约他来东北时，他正在中国农民银行任计核职务。他是在民国十八年东北行政人员加入国民党时入党。他对党务不热心，无所活动，可以说是挂名而已，他同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各派别全无密切关系。

（四）省委兼教育厅长苍宝忠。他是老黑龙江省人（那一县说不清了），年三十多岁。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生。我在组织省府时，才认识了他，他当时正在东北大学（当时校址留亡在四川三台县）任职，在来到东北后，他曾兼代一时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他是国民党员，兼任国民党嫩江省党部委员，他接近陈果夫一派的藏启芳——当时的教育特派员兼东北大学校长。在沈阳解放前二十天左右，他为接洽安置东北进关学生就业问题，乘飞机去了

北京，在解放时，他尚留在北京。

（五）省政府委员刘博昆。他是老辽宁省籍（那一县说不清了）。以前他在新闻界作过事．民国十八年在国民党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任过宣传工作，后来他转到外交界作过事，当组织省府委会时，他正在重庆外交部（反动政权下）作专员。我们到齐齐哈尔后，他兼代秘书长（因黄恒浩尚未到）不久他就离开齐市返回沈阳，在沈阳生产局作副局长（正局长是王家桢），省政府事他就不过问了。后来他被选为立法委员。他是国民党员（因为发表言论，在北京被捕过——在张作霖时代），嫩江省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他接近张继等一些西山会议派，他同陈立夫说不到一起。他接近兴中学会一派。

（六）省委赵？中（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他是嫩江省人。我认识他时（组织省政委会时）他在重庆内政部作事。他是国民党员，彩色我知不清。

（七）齐齐哈尔市长、省府（俄文）秘书赵德厚。他是东北人（那省说不准了），通俄文，在中东铁路上作过事，年四十多岁。抗战期中，赵作过苏联军事代表团招待处俄文翻译。在组织省府时，由前张学良在西安时的秘书长吴家象介绍来的，同我到东北来帮我同苏联人办交涉，担任俄文翻译工作，任市长交待后，在沈阳省府办事处时代，他负省府参事名义。他是否国民党员，我说不清。沈阳解放时他在沈阳。

（八）省府秘书曹建勋。留法学生，湖北省籍，生长在北京，年三十三岁，在省府秘书处作事，任我的机要秘书，有时代作些私人秘书事。他是国民党员，对党务无贡献（据我所知），普通党员接近我的这一方面（我在党务方面接近教育元老派蔡元培、吴雅晖、李石曾等）。

（九）省府科员韩清琦。他是嫩江省人，资历不强，在省府任科员（在齐市时，有人尊称他韩秘书），管理译电（非机要性

的）。随我到齐市后，在秘书处当科员管理电报收发等事项。我撤走时，把他留给张维仁，帮助他作通讯工作。张维仁到海参崴时没有他。我到沈阳又看见他。他是国民党员，他接近藏启方一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方面接近谁我说不清。

（十）.接收专员、齐齐哈尔市警察局长熊文洪。他是辽宁人，年三十来岁。留日学生，习警察。随我到齐市后，熊接收了市警察局，撤退回到沈阳后，就在沈市警察局兼任职务。他不是国民党员，他接近当时的国社党，他可能是国社党员（是否说不准）。

（十一）民政厅秘书董大年，教育厅秘书金？，建设厅技正高福洪等。高福洪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在华北水利委员会任技士，副工程师。他没有入国民党。

（十二）嫩江省保安警察大队副队长高凌昭。他是龙江县人，年三十多岁，军人，校官阶级（上校）。他是当我二次由北京飞来长春以前，经张维仁介绍，我找他来的。在齐市时，他招集了有四五百个待编的保警。我由齐市撤退时，他随我们一同到的海参崴。到沈阳后，省府改组保警队成立保安队时，他离开了嫩江省政府。

我在齐市时，接近当地的人们中，重要一点的有：

（一）申振先，他是伪满时代该省省长，东北人，四十多岁。我在齐市时留他在市内，备遇事供我咨询。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中，他一天乘机搭乘汽车跑走了，下落不明。

（二）王玉堂，齐齐哈尔市商会会长，年有四十多岁，山东省人，他在齐市经商，粮商（？）。关于定做制服，代苏联军价购食物、交付一切价款，我全同他接头；省府、市府有同市民交易事项全由他经手办。我撤到沈阳后，他来见过我（是他或是孔玉书我说不准了），谈了些当时地方上现状。后来听说他跑去北京了。

（三）孔玉书，齐齐哈尔市富商……我向他借款，他交到的数目约在五拾万至百万间，距向他商借数相差太远。我在沈阳时，他来见过我。说他就回去。我同他谈询一些地方情况。

（四）李某，旧省议会会长，旧日的劣绅、地主。在到齐市时，他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名义来欢迎我。他找我求我帮他办中苏友好协会，拨款，谈洽有关政治上和谈问题等多次。他住在市内。

（五）鄂某、包某。鄂为蒙古民族，包某为达呼尔族，年龄约在三 四十岁上下。他们在蒙旗方面有力量，他们有一部份蒙古人武装势力。我为安抚这部分武力，托他们进行过招致工作。在我预备组织齐市戒严司令部时，曾想利用他的这部武力作帮助，在我撤离齐市前，我曾告诉张维仁设法拉他们，不要叫他们帮别人打我们。我当日要拉住他们，同时又怕他们靠不住——因为有人说他们同共产党人有来往。他们要求过我在省府内设蒙旗厅。

（六）和尚法一（名字记不确了）三十多岁，俗姓杨；天主教主教胡某，法国人，住在教堂宿舍里。医生某，他是苏联人，住在齐市有多少年了。他的妻子也是苏联籍。他们在齐市内行医。他们请我吃过一次晚餐，在座有苏联军城防司令等六七人。

（七）赵岳山，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派在黑龙江一带的工作人，年有三十来岁，东北人。后来他离开齐齐哈尔市，跑去四平当省议会副议长。

（八）邓觉民，嫩江省人，年五十多岁，教育界人士。曾任于毅夫主席领导的省政府教育厅或建设厅长名义。我曾请他帮忙到省府担任一职务，他没来。

（九）丁广文……国民党党员，自称有几十万武装力量（他是总司令）。尚其悦，铁路局处长，自称为（不法武装组织）“光复军总司令”。赵某，二十多岁青年，齐市富户之子，后来在市政府中曾任职务。我们撤走后，他留在市内。后来在沈阳，我又

见过他本人或是他的弟兄（他们是哥两个）一次。张国栋，伪满市长，东北人。刘某，齐齐哈尔铁路局长。宫某，嫩江省人，齐市龙江饭店经理，通俄语，担任申振先的翻译，随张维仁跑到海参崴。庆七、庆八、赵某等一些当地劣绅、富商、地主等。

我是国民党员，在前民国元年学生时代加入党的。民国十八年时，我曾担任过辽宁省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省党部常务委员等工作。自民国二十年以后，对党务工作即又不实际参加积极工作。（下略）

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